

# 目 录

## 第一 部

山青水秀的吉林城·····	3
打倒卖国贼·····	7
我的学校·····	13
“地下国民党”·····	17
南北炕上·····	21
毕业即失业·····	28
斧劈“灶王”·····	32
新天地·····	36
乡村教师·····	44
永生难忘的歌声·····	49
凭着两只手·····	53
在吉海铁路上·····	59
“九·一八”·····	62
一台“油印机”·····	67
忙中出错·····	70
力难胜任的重担·····	76
磨房遇险·····	81
我们需要枪·····	86
杨靖宇同志来了·····	94
特别支部组成以后·····	102
去游击队·····	108

人心所向·····	112
李世超大智若愚·····	120
变生意外·····	127
出了叛徒·····	134
转道北上·····	141

## 第 二 部

新春伊始·····	149
挚友重逢·····	153
曲折的会见·····	159
紧急情况·····	168
“敖连特”影院前·····	173
“八一”前夕·····	179
机关“家庭化”·····	186
风雪寒冬·····	195
春天的寒流·····	202
当面对敌人的时候·····	207
革命仍在前进·····	214
面对困难的李升同志·····	218
叛徒出现了·····	230
决 斗·····	243
革命第一·····	252
关 怀·····	258
狭路相逢·····	269
老万同志·····	277
五磅“氯酸钾”·····	284
特务网·····	289
来路不明的人·····	297
转移机关·····	306
为了工作·····	309

北上前夕·····	313
汤原路上·····	319
汤原的反日会工作·····	324
十三条枪·····	332
成长壮大·····	342
严惩汉奸地主·····	347
再见吧,哈尔滨!·····	352

### 第三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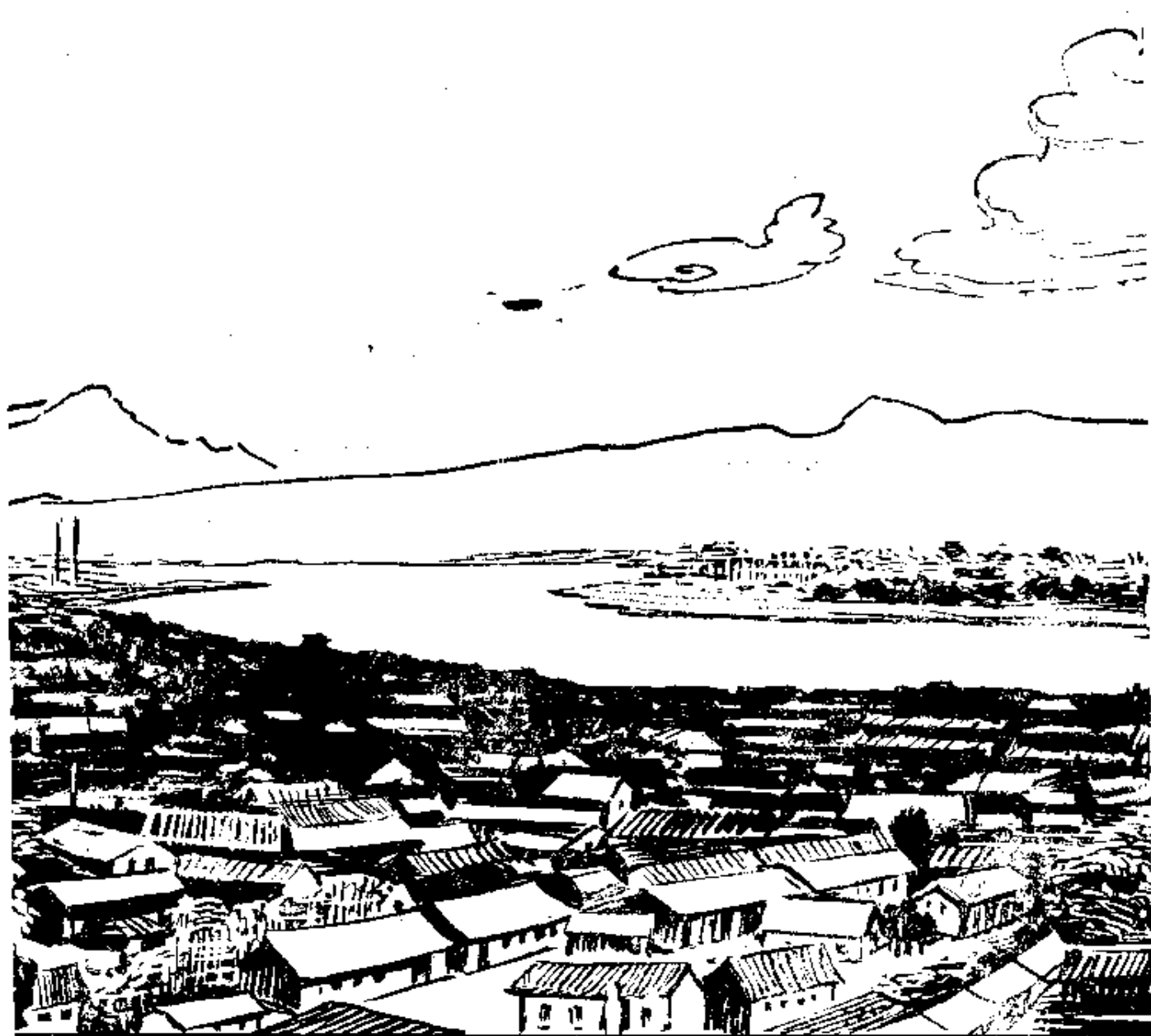
辞别延安·····	357
出关之前·····	362
归 来·····	370
寻 找·····	377
报务员的打算·····	382
哈尔滨之行·····	386
打进敌人内部·····	393
警 钟·····	406
溯本求源·····	415
工作不能停止·····	422
危急的时刻·····	425
胜利前夜·····	437

### 第四部

“八·一五”前后·····	451
群魔乱舞·····	457
针锋相对·····	463
从小到大·····	467
由地下到地上·····	470
在大会上·····	474
喜讯传来·····	479
在长春·····	483

严重警告·····	491
突然的袭击·····	495
一波方平，一波又起·····	503
春风解冻·····	508
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	515
<b>第五部</b>	
接受任务·····	521
上  路·····	526
闯进蒋管区·····	533
黑暗的一夜·····	537
和同志们在一起·····	540
第一个掩护职业·····	549
康祥春的理想实现了·····	555
伪满余孽·····	560
功亏一篑·····	565
在龟蛇遍地的地方·····	568
称心如意的办法·····	576
在风雪中·····	582
一个好主意·····	588
敌“军运指挥所”的译电员·····	596
在欢欣鼓舞的心情下·····	600
春节前后·····	605
第二个掩护职业·····	609
从日落到日出·····	613
同志们，再见吧！·····	617
<b>后  记</b> ·····	621

# 第一部





## 山青水秀的吉林城

我的故乡吉林市，很久以来就是东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之一。这里是水旱码头，工商业发达。水路有松花江，上可通桦甸，下可通哈尔滨以至三江口；旱路有三条铁道畅通南北，公路运输更是四通八达。封建王朝在这里置州设府；清朝时期为吉林省会，设有将军衙门；军阀割据时代将军衙门变成了督军府。袁世凯、蒋介石都向吉林伸过魔爪。什么州官、知府、将军、大帅、省主席……所有的封建统治者，一直把吉林视为福地，屁股一坐到这里就不愿意离去。说起“福地”二字，还有一点儿来历呢，这就和吉林的自然风景分不开了。

吉林是一座山青水秀的城市，清澈的松花江水，从白头山的天池直泻下来，经过松花湖，越过人造瀑布，通过丰满水库，途经十里，无湾无岔，流到吉林市。江后面的玄天岭，峭拔挺立，插向天空；状似猪嘴的猪嘴砬子，隔着一湾江水，和这座古城遥遥相望；龙潭山侍立在左，小白山躬身于右，左右前后，四座名山，众星捧月一般把吉林市围在当中，再加上一条长长的松江之水，傍山依城，静静流过，真是“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这绿水青山，把吉林市打扮得无比俏丽，虽说是座古城，却显出一副年轻的风貌来。正因为如此，那些最初来到这里的“风鉴家”们，才相

中了这块地方，他们从水色山光中作起文章来，把十里江流指为风水胜地，说那里必出“贵人”；说围绕吉林的四座青山是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从此，这块地方就被称为“福地”了。后来就在这个旧名“船场”的小镇上，修起了吉林城。城名吉字，大概也和“福地”有关。虽是“福地”，可也曾闹了一次“火烧船场”的灾祸。这场大火，从临江门（旧名迎恩门）外的犇膻斋饭馆烧起，一直延烧了许多条大街小巷。于是，风鉴家们又作出文章来，在吉林市制高点的玄天岭上，取八卦中象征火的“三”字，修了一个“避火图”。这些自命为善观阴阳的风鉴家们满以为从此就可以永镇火灭，天下太平了。但是他们却看不见那些无形的“火”还是一直在延烧着：历代封建帝王、新旧封建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者，就是最凶恶的纵火者，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把人民置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在这同时，人民的革命火花也已闪起亮光来，从星星之火造成燎原之势，革命的烈火烧红了天，烧亮了地，烧出一个新世界来！从此，吉林才成为真正的福地。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一九〇九年，我出生在这座城市里。父亲去世很早，幼年跟着母亲、姐姐、妹妹种菜园子，勉强维持生活。我母亲是位刚强的劳动妇女，她早年丧夫，把未来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儿子身上，立志要供我读书。当时公立学堂还不多，在小学教育中，私学馆还很普遍，而一般老年人也不相信公立学堂能念好书，所以母亲就送我进了私塾；直到一九二六年，我才考入吉林文光中学补习班，主要是补习算学。这一年我十七岁，十七岁才开始念中学，这在今天看来，是大得出奇了，但在当时，象这样的“大中学生”，到处都是。那时早婚的风气还没有革除，东北尤甚，十六、七岁的爸爸，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有不少中学学生都已娶妻生子，当爸爸了，我的情况也是这样。



那时候的东北，正是所谓“张氏天下”的黑暗王国。北洋军阀奉系首领张作霖，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长期统治着东三省。张作霖和他的部下群僚们，大都是辽中、台安、盘山、黑山一带的土匪出身。这些从“高粱地毕业”的军阀们，象乌云一样，遮住了东北的青天。

一九二四年，张作霖打败了直系军阀，进一步把持北京反动政权。一九二七年，他自封为“安国军政府大元帅”。张作霖一人成佛，万族升天，当年当土匪时手下的几员大将：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等，都先后攀登上了统治者的高位。

在吉林省，张作霖的把兄弟张作相爬上了督军兼省长的宝座；日本帝国主义的鹰犬熙洽，当上了督军府的参谋长。他们对外逢迎日本帝国主义，对内勾结封建势力和买办资产阶级，三座大山同时压在吉林人民头上。这时，张作相的亲族也都成了无恶不作的“皇亲国舅”，他的流氓侄子被帮闲们称为“少帅”，几个叔叔被称为“老大人”、“四大人”，连绰号叫“小怪物”的叔伯姐夫也成了吉林一霸。这些人间败类，象竞赛一样争干坏事，放赌局，开烟馆，卖官鬻爵，包揽词讼。所有旧社会里最龌龊的勾当，在他们看来，都成了夸耀门楣的美事。

然而，这时整个中国的革命运动，正处在蓬勃发展的阶段。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以后，中国工人阶级已经自觉地登上了政治舞台，逐渐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全国各大城市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使军阀统治集团不断受到打击。在这种形势下，张作霖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收拢民心，竟也唱起“民主”的高调来，开始在全省搞“代议制”，企图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来装潢自己的门面。于是，一场“竞选议长”的丑剧，便正式开锣上场了。

当时，剥削阶级的两个上层人物林仙洲和程科甲争当副议

长,明争暗斗,用尽各种方法,购买选票。程科甲用几个“银号”作为自己的后台支柱,大把的钞票送到议员手里。林仙洲更不示弱,包下了高级饭店“南味斋”和头等妓馆“瀛仙书院”,专供议员们淫乐。而议员们便拿选票做买卖,价码越抬越高。偏巧这两个竞选者又是势均力敌的对手,每票必争,争到最后,可以控制的票数仍然不分上下。这时,有两个惯做投机买卖的议员,看准了时机,就把快要攥出汗水的两张选票“抛售”出去,被程科甲花高价捞在手里。于是投票的时候,程科甲便占了上风,当上了副议长。林仙洲斗败了,挥霍了大批钱财,输了一所“祥记当”,卖了一处油坊,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偷鸡未成反蚀一把米,议长没当成,买卖先改了字号。林仙洲变成这场闹剧中的悲剧人物,但程科甲在这场“争夺战”当中付出的代价也绝不少于林仙洲。羊毛出在羊身上,副议长宝座下面有黄金,程科甲伸出了贪婪的双手,不择手段地搜刮民财。有一次,他竟和一个卖国集团勾结起来,认贼作父,向日本帝国主义者出卖中国主权,引起了学生的愤慨,发动了一场爱国运动。这时,我正在文光中学读书,文光中学的董事长杨策就是这个卖国集团的主要成员。因此,我所在的学校便参加了这场斗争。

## 打倒卖国贼

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东北的侵略，是有深远的历史基础的。从甲午海战、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就以“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为大本营，进行远远超过铁路业务范围以内的政治和经济上的侵略活动。

一九二八年，日本帝国主义者企图把吉敦路延长到朝鲜会宁，接通朝鲜，以便于侵略。同时，还要把吉林东、南、北三面环江的大块商业区变为日本人的商埠地（实质就是租界地）。为了实现这个侵略野心，首先由日本特务丰琦勾结省议会副议长兼天图铁路局局长程科甲和省教育厅厅长刘芳圃，阴谋开办“兴业土木公司”，接着又拉拢了亲日汉奸文光中学董事长杨策等人参加。这些汉奸们在这个“公司”里都当上了“好汉承”股东（注），程科甲、刘芳圃、杨策各得八百股，其他许多大小汉奸，各有股份。于是这个卖国集团，便在“兴业土木公司”的经济组织掩盖下，展开了出卖中国主权的罪恶活动。

在这次卖国罪行中，为日本主子出力最多的是杨策。这个吉林最早的日本留学生，对日本人的生活方式怀有特别的感情。日本人为了满足他的私欲，特地奖给他一座精致的日式小

（注）好汉承股东，就是只享受股东的权利，分红利，而实际上并不拿股本金。

洋楼。

纸里包不住火，事情传出来了，于是，一场学生爱国运动，便在吉林城内迅速地掀起来了。

当时我正在文光中学读三年级，因为家境贫寒，升学不易，开始时只是埋头读书。后来参加了学校的读书会，接触了一些进步文艺书刊，便对军阀的黑暗统治渐渐地产生不满。特别是由于我家住在城东关，紧挨着商业区，眼看着日本人一天天增多，日本买卖一家家开张。不久，又见日本帝国主义的国旗竟在中国的天空飘荡起来；还传来消息说，这里就要变成日本人的租界地，商业区已被汉奸出卖等等。早已郁积在心里的怒火一下子冲上头顶，书也不能安心读下去了。这时候刘芳圃、杨策等汉奸的卖国行为，也已传进学校。同学们先是三五成群地议论，后来所有爱国的和有正义感的同学都起来了，大家一致要求学生会采取行动。这时，全城学联也已行动起来，召开紧急会议，提出了响亮的口号和激动人心的行动计划。学联能够这样雷厉风行地采取行动，真有些出人意料。原来学联的领导权主要为省立“法专”和“一师”的学生所把持。“法专”是当时吉林省唯一的一所专科学校，学生多数是三、四十岁的成年人，这些人原本不是正经学生，都是些旧职员和有钱人家的纨绔子弟。“法专”一成立，就都挤进去，想要混张文凭，好当个承审、法官、律师。这样一群官迷把持了学联，怎么竟能慷慨激昂地反对起卖国贼来了呢？原来“法专”的校长李伦三在政治上是个野心家，他对教育厅长的高位垂涎已久，一心想把刘芳圃挤下来，自己爬上去。这时他抓住了刘芳圃与日本人勾结的小辫子，有意利用学生运动，打倒刘芳圃。而“一师”的校长张乃仁，又与关内的国民党有勾结，也想乘机搞点儿政治资本，抬高自己。这两个人，各怀心腹事，一狼一狈，一拍即合。他们看准了时机，利用了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

于是，就象在干柴上投了一把火一样，一场反对卖国贼的运动便轰然而起。这个内幕，一般青年学生当然无从得知。我们不加怀疑，反而更被学联突然采取的坚决立场所激动。学联迅速地向全城学生发出了号召，通知所有的学校于同一时间在省议会门前集合，包围省议会，然后到督军署请愿。学联提出的行动口号是：“打倒卖国贼！”“打倒帝国主义！”“收回商埠地！”“反对延长吉敦路！”

我们学校的学生会接到通知，立即召集全校同学开会，传达全城学联的通知。礼堂里群情激愤，一片沸腾。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这样激动人心的大会，直觉得血往脸上冲，巴掌拍得手心红，口号喊得嘴发干。在大会上，全校同学决议：立即罢课，组成宣传队、纠察队、请愿团，连夜做好一切准备工作，于第二天清晨，也就是学联规定的统一行动时间，开往省议会。

我参加了宣传队的工作，和几个同学负责印刷传单，制做游行用的小旗。我们整整干了一夜，印成的传单摆满地，糊完的小旗堆成堆。天还没亮，校庭里就象滚沸的开水，热气蒸腾，传单被拿走了，小旗每人一个，都放在袖筒里，准备到督军署拿出来。队伍很快就拉了出去。

我们和东关几个学校的学生一起浩浩荡荡地向省议会前进，一路上撒传单、贴标语。讲演的同学按事先计划好的地点，留下来向群众宣传。游行队伍里每个同学，都拚着力气喊口号。口号声传得远远的，街上的人越聚越多，学生的爱国热情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学生喊口号，上班的工人跟着喊，商店里的人们从铺面里冲出来也跟着喊，有的干脆参加了游行队伍。于是，队伍扯满了街，口号响满了城，人心象弓上的弦，绷得紧紧的。

我在游行队伍中担任纠察，也帮助同学们贴传单。传单越贴越快，浆子才刷上去，就有几只手从后面伸过来帮助往墙上

摠，回头一看，都是些从来未见过的陌生面孔，他们却象老熟人一样热情地点着头。这是支持，也是鼓励！贴传单的同学也激动地点着头，又向前面奔去。我虽然一夜未睡，但身子却异常轻快，有生以来从未这样痛快过。

队伍走到保真阁胡同的时候，忽然从前面传来“打倒卖国贼杨策”的喊声，同学们立刻被提醒了：杨策就住在这个胡同的日本小洋楼里。

队伍停在保真阁胡同口上，怒吼声震天地响起来，不知是谁拚着力气高呼了一声：

“同学们，我们要杨策出来——”

“冲进去呀！”

队伍唿拉一下子拥进保真阁胡同，人们呐喊着，奔跑着，向杨策住的日本小洋楼冲去。

杨家的大门关得紧紧的，鸪鸽吓得从房脊上飞走，狗咬了两声也吓得躲起来，满院没有一个人影，连窗帘都遮得严严实实的。

愤怒的同学们，拥到了门前，有的上了台阶，有的爬上了大树，口号声冲天而起：

“卖国贼杨策滚出来！”

“打倒卖国贼杨策！”

“惩办杨策！铲除教育界里的坏蛋！”

一刹时，杨策小楼的墙壁上贴满了传单。一张大幅漫画贴在大门当中，把“忠厚传家”的大门心盖得严严的。漫画上用彩色画着一只肥胖的卷毛绵羊，伸长了脖子，直竖着两角，瞪起两眼，蹬开四蹄，拚命地拉着一辆日本东洋车向前跑。漫画上还写着几个不成行的大字：

东洋车，动杨策，冷血动物杨！

不一会儿，一首粉笔写的打油诗又出现在漫画旁边：

卖国贼 杨 策，  
拉着东 洋 车；  
若不快放手，  
当心脑袋壳！

打油诗立刻变成了拉拉词儿，随着口号声，轰然震耳地响起来了。

正在相持不下的时候，传来学联的指示：队伍立刻开到省议会前集合，统一行动。

同学们怒气未消地走出了保真阁胡同，重整队伍，奔向省议会。

省议会的双门大开着，门前挤满了来自各校的队伍，不一会儿，一大群人从里面拥出来，走在前面的是几个穿长袍马褂的老人家，后边紧跟着一群雄赳赳的学生代表。

人们更加激动起来，消息从前边传到后边：

“省议长被揪出来了！”

“有没有程科甲？”人们争着问。

“没有，其他正副议长都有。还有省律师公会会长宋炎，这个老家伙不肯出来，是被揪出来的。”

“把他们揪到督军署去！”

“对！揪到督军署去，让他们在前边给咱们开道！”

“快往前边传！”

人们的要求从后边往前传，越传声越大，最后汇成了所有人的喊声。

穿长袍马褂的大人先生们从省议会高高的台阶上被拉了下来，外号叫宋大胡子的律师公会会长挣扎着、喊叫着：“你们这是侵犯人身自由，你们不合法……这是绑架……”

他那瘦削的手臂被几只强有力的大手扭住，一直扭到队伍最前面去，和他的同类站在一起……

一眼望不到头的队伍，从省议会又拥向督军署。督军署前早已断绝了行人，一排排全副武装的卫士如临大敌似地站在门前，刺刀闪着寒光。

队伍一直冲到门前，人们的胸口对着刺刀，愤怒地喊起口号，督军署前人山人海，吼声象沉雷一样震天动地。

学生代表揪着穿长袍马褂的大人先生们走进了督军署。

人们继续地呐喊着，等待着……

忽然，一个军官杀气腾腾地从门里冲出来，向卫队喊了几声，卫士们的枪响了，一排子弹从人们头上呼啸着飞过去。这时，站在最前边的“法专”学生，这群别有用心的“爱国者”，首先乱了阵脚，惊叫着向四面逃去。其他各校的学生因为接不到学联的斗争部署，也开始混乱起来。紧接着，冯占海的三十四团的全副武装的大兵冲过来，由张作相的卫士长指挥着，和学生短兵相接了。这时，学联的“领导者”们早已逃得无影无踪。学生队伍失去了统一的指挥，很快就散了。

一直坚持在斗争最前线的是那些学生代表们，他们被扣押起来。

一场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因为没有正确的领导，就这样虎头蛇尾地收了场。几天以后，由于爱国学生的一再呼吁，军阀政府才放出了学生代表。他们除答应不延长吉敦铁路之外，其他一切仍然照旧。《骂卖国贼刘芳圃》的歌子虽然流传开来，但刘芳圃本人却仍然稳坐在教育厅长的宝座上，“法专”校长李伦三的阴谋没有得逞，只赚了一身骂名。

学生运动尽管失败了，但它留给我的印象却是那么强烈，过去许久，心还在激动不已。我的头从书本上抬起来了，注意着时势的变化，观察着同学们的思想活动，开始思考起政治问题。



## 我的学校

一九二八年上半年,张作霖在北平忽然和英美帝国主义者勾搭起来,在他们的阴谋“援助”下,建筑打通铁路(打虎山到通辽)和葫芦岛港口,一下子和日本帝国主义者发生了利害冲突。就在当年六月,张作霖因所把持的北平政权垮台,跑回东北。日本特务预先在皇姑屯铁路上埋好了炸弹,专车驰过,五十三岁的张作霖被炸成重伤,很快就死了。子承父业,封建军阀和封建帝王原是一脉相承,老子丧命儿坐殿,年轻的张学良登上了东北统治者的高位,东三省仍然是“张氏天下”。

“张氏天下”当时虽然也称为中华民国,却和南方挂的旗帜不一样,南方这时已经换上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北方却仍然挂着“红黄蓝白黑”的五色旗,新旧军阀虽然同污,却还没有合流,国民党的脚还没有伸出山海关。虽然如此,国民党的一些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书籍,却已经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开始流传。而在这时候,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也已象纯金一样在混乱的思想界中闪闪发光;革命的文艺书籍已在浩如烟海的书卷中发出了与众不同的光彩。但是,当天空还象暗夜一样漆黑的时候,点点星光虽然耀眼,却不能照亮整个大地。各式各样的旧货色以及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还统治着混乱的思想界。

在顽强地抵制新思想。于是，革命的、修正主义的、改良主义的和各式各样的反革命思想之间的斗争，开始展开了。

我们的学校，是英帝国主义爱尔兰基督教长老会在吉林创办的。办学的目的是想通过“教义”来麻醉青年学生的思想，为它的政治侵略扫清道路。爱尔兰人牧师惠彰德经常给学生讲圣经，并给我们上英文课。教员中教徒也很多。基督教思想在学校里占据着统治地位。而另外一些形形色色的旧思想却也和它和平共处，有时一个人身上就有几种不同的思想表现：一方面是基督教徒，一方面又尊奉孔孟之道；一方面念着圣经，一方面又看言情小说；一方面对现实不满，一方面又把头埋在书本里。这些错综复杂的思想，反映在学生所读的书籍上也是五花八门：有人抱住古老的线装书不肯放手；有人死啃《胡适文存》；什么李清照的词，徐志摩的新诗，张资平的多角恋爱小说，章衣萍的《情诗一束》，新翻译过来的《福尔摩斯探案》，陈旧的《三侠五义》等等和鲁迅、郭沫若、沈雁冰、蒋光慈的进步作品混在一起。真是各取所需，良莠不分。

先前，学校里曾以国文教员马骏名为核心组成一个读书会。马骏名倾向于孙中山的学说，暗中常引导学生读《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民权初步》等书籍。当时国民党既没有伸足于东北，这些书籍也就没有取得合法的地位，要偷偷地读，所以参加的人数并不多。在同学们的介绍下，我也参加了这个读书会。但就在我参加后不久，还没有来得及详读这些书籍的时候，马骏名却离开了学校。代他而来的国文教员是冯铁生。这位冯老师对读书会很重视，来到后就立刻抓住了这个组织。他的作法与马骏名完全不同，不再引导大家读孙中山的著作，而是让大家多注意时事，研究时事。他把读书会变成了“时事研究会”，组织大家读报纸，讨论世界大事。每次讨论，他都讲得很多，讲的

内容在我们听来都是最新鲜的。他的知识渊博,知道那么多世界各国的情况,尤其对苏联的情况,了解得最透彻。他经常把苏联和英美各国比较起来谈,也把沙皇俄国和苏联比较起来谈。于是,在我们面前就出现了一个虽然还较模糊但却是一个崭新的天地,一个比“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更加新鲜的世界。大家对苏联的革命逐渐发生了兴趣,对本国的大事更关心了。

冯老师不信基督教,也不信佛教,孔孟之道也不沾边,他信什么呢?一时谁也弄不清楚。关于他的过去,他自己也很少谈起。在教会学校里不信基督教的老师本是少数,而冯老师的生活作风更是少数中的少数。他不和其他老师一起吃小灶,却在学生寄宿食堂里吃大锅饭。好逸恶劳是旧社会知识分子的传统习惯,而他却喜欢劳动,整个暑假,都在乡下的老家里干农活,开学的时候,脸晒得黑黝黝的,好象才从印度旅行回来一样。给学生讲课,他也讲劳动创造世界,讲工人阶级的革命性,这是多么新颖的道理!他给我们出作文题,也和从前的国文教员不一样。有一次他在黑板上写了“大皇帝”三个字,让大家作篇文章。“是哪个朝代的大皇帝?”有的同学站起来问。“从古到今,都可以写。”“现在也没有皇帝呀!”同学们嘟囔着。这时,冯老师把嘴张了张,要说什么,但又止住了:“你们多想一想,随便发挥吧!”他在好多问题上就是这样让同学们自己独立地发表见解。课堂上的思想逐渐活跃起来。

冯老师的出现,有如在前进道路上划过一丝闪光,使我似懂非懂地知道了一些新东西。我急于想知道苏联的社会情况,更想知道中国得怎样才能变成苏联那样的社会,中国革命是否也得无产阶级来领导?……这一系列问题弄不明白,于是我就更希望多接近冯老师。但,就在我们放寒假到春季开学的期间,冯老师竟忽然不见了,我们课也听不下去了,到处打听,一直

打听到校长沈希贤那里。

沈希贤是个彻头彻尾的洋奴才，英国牧师放个屁，他就唱台戏。惠彰德的“牧师府”被他给踩平了，耶稣和上帝在他嘴里就象老和尚念无量佛一样，一张嘴就是。他装成最虔诚的基督徒，实际上却和“以赛亚”的税吏一样，干着假冒伪善的事情。这时，他见同学们来问冯铁生老师，便把眉毛一皱说道：

“他是从苏俄莫斯科东方大学回来的赤化分子！知道吗？赤化分子！不信上帝，是个犹太！”他痛心疾首地叫喊着，“我们真粗心，怎么能这样让这样一个罪人站到神圣的讲坛上，这是罪过！”

“那么他现在在哪里？”同学们担心地问着。

“我不知道。”他眨着眼睛说，“上帝的眼睛是亮的，上帝会惩罚他的！”

……

冯老师失踪了。他在学校里只教了这么一个暂短时期的国文课，象闪电一样，才放出光亮来，就消逝了。他留给我的是一些模模糊糊似懂非懂的道理。我还有那么些问题要请他告诉我，教导我，但是他却不见了。现在，道路只能自己摸索着往前走了。

## “地下国民党”

张作霖死后不久，国民党的脚就悄悄地探出了山海关。所谓国民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忽然钻进了吉林市。蒋介石的国民党和军阀本来就是一个蔓上结的两个瓜，形状虽不一样，却是生在一个根上。吉林的军阀对他们闭一只眼，睁一只眼，看见也装看不见。于是，新钻进来的朱晶华、任重、于汉章等国民党吉林省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就在吉林市大肆活动，建党结社，狗扯羊皮，只差没有登报宣传了。所谓“地下”，只是在时机还没成熟的时候，给自己披上一层神秘的外衣而已。

就在他们来到吉林后不久，在新开门里维新街出现了一家报社，名为《吉林新报》，报纸的宗旨据说是“提倡民族精神”，“反对帝国主义”。人们都知道这就是国民党吉林省执行委员会的机关报。好多人都对这份“新报”抱着新的希望，既是“革命党”办的报纸，就应该有个革命的样儿。但是，才出刊不久，就怨声四起，议论纷纷了。议论先从资产阶级的上层人物开始，然后传开，越传越远。原来这个报社的一些访员（记者）们，就象钻窟窿盗洞的耗子一样，耳朵恨不能插进人家的私房里去，专门挖人隐私，“隐私”挖到手，真是如获至宝，马上写成新闻，然后再想法把稿子送到当事人的手里。当事人一冒汗，大把的洋钱就送到访员

手里，钱送够了，稿子就不登了，于是“耗子”再另去一家盗洞。象这样的访员，人们早已在《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晚清小说里看见过，却想不到“革命党”的报纸也这样干，而且因为有省党部撑腰，干得比任何报纸都凶。他们的笔比警察的棒子还厉害，他们的手比放高利贷的手还贪婪，一切最卑鄙、最无耻的手段他们都干得出来。他们的广告栏比任何报纸都大，这一面是提倡国货、发展民族工业的消息和言论，那一面就是“请吸芬芳哈德门香烟”的大幅美人图广告。谁也弄不清他们到底是在提倡国货，还是在为英美等帝国主义的商业作宣传。

《吉林新报》的社址选择得也很特别，东边是女子中学，西边是女子师范，当中就是报社。那时候的男学生大，女学生比男学生还大，女中一年级的学生大多数已都超过“及笄”之年了。访员们充分利用了这个有利的地势，每逢女学生们课外活动的时候，他们就拥到马路上，不但远观，而且近追，堵住女学生说下流话，丑态百出，弄得学校提出抗议，社会上舆论纷纷。

国民党在吉林的出现，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注意，这是吉林政治生活中的一件新鲜事。冯老师曾经告诉我们要关心时事，这怎能不吸引我们的注意呢。开始，我也和好多同学一样，对他们抱着一些幻想，幻想“革命党”能干出革命的事来。但是越注意越使人失望：敲诈、勒索、流氓行为，无耻的作风，真使人愤慨！偏偏这时候，国民党的脚又伸进了我们的学校，他们先在东关成立了第二区党部，由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张乃仁负责。紧接着就要在我们文光中学成立分部。成立分部就得有党员，于是消息传来：国民党要用考试的办法发展党员，考的课程是《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大纲》等，谁要应考就到区党部去报名。这时，我们同班的同学，我最好的朋友温彦升悄悄地和我说：

“考国民党了，你去不？”

“你呢？”

“我想去。你也去吧！在一起，有个伴儿。”

“我不去。”我摇摇头说。

“为什么？”

“难道他们的所作所为你没听到，没看到？他们哪一点有革命党的气味！”我愤愤地说。

“可他们也不都是那样啊！”

“好样的我还没看见。”

“好样、坏样也都是传闻。再说，我们信的是‘主义’，孙中山主义还是救国的真理嘛！”

“那就等我以后学通了再说吧。”

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我和温彦升的感情本来最好，为这件事，却弄得不欢而散。

温彦升去考国民党了。我的心情很烦躁，国民党使人失望，冯老师在我心头留下的一些问题又找不到答案，家庭生活又日渐困窘，内心有些彷徨无主，便摸索着找些进步书刊来读。这一时期，上海出版的新书，如雨后春笋一样，不断地出现在书店的书架上。《奔流》、《洪水》、《南国半月刊》等杂志；郭沫若、沈雁冰、蒋光慈等人的小说和诗；冯乃超、李达、马哲民、杨东莼等人的社会科学论文等等，我都尽量找来读。有的社会科学论文我读不懂，不大理解，放下了，又去读小说，虽然读得很乱，但满有兴致。

我对蒋光慈的作品发生了很大的兴趣。他用“超超”笔名写的小说《少年漂泊者》使我深受感动。我读了又读，汪中的遭遇引起了极大的共鸣。他的贫困和不幸数倍于我，但他活得有骨气。他有许多话都是我平常意识到而说不出的，经他一说我

明确了。他憎恨军阀统治，憎恨万恶的社会，他把穷人的不幸都归结为社会的黑暗，他的愤慨引起了我的愤慨。他在自序里说他“忽然跳出来做粗暴的叫喊”，可我就喜欢这“粗暴的叫喊”，这叫喊使我的眼睛比以前明亮了，对社会认识得比以前清楚了，我至今还感激这些艺术作品给我的启蒙教育。

这时，去到区党部报考国民党员的五、六个人，已都考上，区分部也在学校里成立。国民党员在学校里的活动是半公开的，没有干涉。我和温彦升的感情从那次谈话以后已经有了距离，这时更觉无话可说了，他们不来找我，我更不去找他们。我读我自己的书，去找我自己的路。



## 南北炕上

一九二八年末，蒋介石和张学良勾结在一起，鼓吹了一个“易帜运动”，达成了所谓南北统一的协议。“红黄蓝白黑”的五色旗换上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地下”国民党钻出了地上，朱品华等人一步登天。

政治上的剧变，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希望，人们盼望着这个“革命”能够扫除封建军阀的腐朽统治。但是这个希望又落空了。军阀的陈酒装进了国民党的新瓶里，除去旗帜变了，省议会的大楼改为国民党的省党部之外，其他都是原封未动。省督军署参谋长熙洽坐上了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的宝座。那些满脸大烟油子，浑身腥臊气味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那些贪得无厌的大奸商、银号老板，以及掌握军队的大小军阀们，都当上了国民党员，一切都是换汤不换药，新旧军阀完全同流合污了。

军阀们为了麻痹人民，追求形式上的新鲜，省党部的门面装潢得富丽堂皇，迎门影壁上，涂上一大幅“青天白日”的国民党党徽，两边挂上蓝地白字的对联：上联是“打倒贪官污吏”，下联是“打倒土豪劣绅”，横批是“天下为公”四个大字。军阀们讲起话来，也把民生、民主、民权挂在口上，实际上他们谁也没看过三民主义。

但是，这一切，也起了一个刺激人们神经的作用，人们对民主、自由的要求更强烈了，对旧事物的反抗性增强了。这种时代精神反映在我们学校里，便是对强加在学生头上的“上帝”“真主”，由不满变成反抗。我在前面说过：在我们这个教会学校里，基督教思想在形形色色的思想中是占据着统治地位的。学校用一些强制性的规定强迫不信教的学生去崇信“上帝”，早已引起了不信教同学的不满，这种不满过去大半是压在心里，现在却逐渐显露出来。

学校里的宗教活动，有时是以青年会出面组织的。青年会会正<sup>(注)</sup>张忠是忠实的基督教徒，他和我同班，因为我平时好打抱不平，和同学们也团结，所以他便有意识地接近我，表示好感。那时每逢星期六的晚上，都是青年会的例会时间。有一次，青年会通知全体学生到市青年会听讲演。主讲人是从上海来的全国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顾子仁博士，这种传道士的讲演，不信教的人听来最无聊，我满心不愿意去，但张忠一定要我去，我就勉强站到队里了。

顾子仁是个仪表不俗的人物，穿一身青蓝色带大团花的缎子大褂，经过训练的嗓音象歌手一样圆润。他一张口就说道：“今天我向大家讲一讲美国的事情……”接着就对美国大肆宣扬。他说：美国人因为虔诚信奉上帝，过着文明幸福的生活……一切人类必须忠诚信主，才能得救……青年人要把自己的未来“交给”给主……在讲演中间，这位博士又夸耀自己曾经代表中国在“国联”大会上讲过话，英美报纸上还登过他的照片等等……

听完讲演往回走，我憋了一肚子气。张忠却来搭讪着和我说话：

---

(注) 青年会会正：青年会是那时候基督教会在学校里的组织。会正，相当于学生自治会的主席。

“你听顾博士讲得怎么样？”

“我怀疑他是不是美国人？”

“你别逗笑话了！难道你没看清他的长相？”

“那么就是入美国籍了。”

“别胡说了，人家曾经代表中国出席过国际联盟会议，而且在会议上作过演说，英美代表都对他伸大拇指头，热烈地和他握手。”

“这我相信，手里还可能攥着美国钱呢。”

走在我们旁边的同学都笑了。于是好多同学都参加了议论，议论立刻分为信教和信教两派，信教的捧顾博士，不信教的骂他是美国洋奴。议论变成了争论，一直到进了校门，争论还在继续。

回到学校，已经是夜里十点多了。我发现宿舍灯还亮着，是谁没去听讲？还在用功？我好奇地先一步进了宿舍，原来是下一班的同学纪儒林，他正在灯光下边看波格达诺夫的《经济学大纲》。

纪儒林是永吉县缸窑人，原来在毓文中学读书，因为反对学校当局，被指为“过激派”而开除了。以后，他就设法进了文光中学。他和我都住在第二宿舍，开始，我对他没有什么特别好感。后来，见他一天到晚读书，读的又都是进步书籍，便和他接近起来。使我惊讶的是他不但书读的多，而且对国家大事也比一般同学了解得多，见解也高，于是便对他有一种羡慕和敬佩的心情。当时宿舍里是南北大炕，北炕住的是以张忠为首的基督徒，我和纪儒林住在南炕上，我们南炕的几个同学大多都不信教。这样，无形中就形成了两派，虽然谁也没说明，但是大家心里有数。

这时，我发现纪儒林没有去听顾子仁的讲演，就想把讲演的

内容说给他听，我才开了个头，张忠就进来了。他一进屋，就对纪儒林板着脸问道：

“纪儒林同学，你去听讲没有？”

“没去。”

“为什么不去？”

“不喜欢听就不去呗！”纪儒林扬了扬手中的书说，“去听他那一套，不如在家看点儿书好。”

“看书？”张忠恶狠狠地盯着他手中的书说，“你看的是什么书？”

“这你没权过问。”

“我……”张忠冷不防一个箭步，一下子把书夺到手，看了一眼就嚷起来，“啊！纪儒林，你不去听讲，原来是在家里偷偷地看‘赤化’的书哇！”

“什么叫赤化？”纪儒林一下子从炕上跳到地下，指着张忠问。

“波格达诺夫是赤俄人，《经济学大纲》就是宣传赤化的书。”张忠也往前凑了一步说，“你不服，我告诉训育主任去……”

“干什么？张忠！”我一肚子火都从这一声喊里冒出来。我一推纪儒林，一跳站在张忠面前，拳头攥得紧紧的。

张忠被我这一声喝，冷了一抖，直愣着两只眼睛看着我，一时说不出话来。我们俩本来是好朋友，从来没有撕破脸，这时我实在忍不住了。

“张忠，你不要欺人太甚！”我直冲着他说，“信教是自由的，看书也是自由的，你凭什么要挟人？什么叫赤化？你听谁说的？”

张忠被我这一连串的发问，问得干张嘴说不出话来。脸涨得象猪肝。这时，同宿舍的同学也都陆续进来了，大家看情形不

妙，要闹起来，便来推张忠和我，张忠转身要走，我一把从他手里将书夺过来，递给纪儒林说：

“你快看，你看完了我接着看。开除学籍咱俩一同卷行李。”

张忠被同学拉到外边去了。我坐在炕上越想越生气，我气张忠仗着洋势力欺负人。这是什么学校？非让学生听不愿意听的讲演，信不愿意信的基督教不可，什么“上帝”，我偏不信。

当时学校的规定是每星期日早晨，学生都要到礼堂去“做礼拜”，祈祷，有敢违误的就罚写四行正楷小字。过了两天，正好是“礼拜日”，早晨，祈祷还没开始，我就一个人坐在教室里，研好了墨，铺好了纸，手握毛笔，坐那等着。我知道，校长沈希贤每天早晨都要到各个教室查看一番，今天我就坐着等他来。不一会儿，校长先生果然迈着方步进来了，他见我端坐在教室里，一挥手说：

“就要祈祷了，快去吧！”

“我不准备去了。”

“为什么？”他眉头一皱说。

“我已经认罚了，准备铃一响就动笔写四行小楷。”

“啊！你怎么敢……”

“报告校长，我这是按校规办事。”

“你……”沈希贤的鼻子都快气歪了。

正这时候，铃响了。我提笔就写小楷。他干站了一气，一甩袖子，大步走出了教室。我知道他被气坏了，但我这是按规定办事，你能怎么的？反正也快毕业了，毕业就再不受你管了。

这天晚间，在宿舍里，我把这件事讲给南炕的同学们听。北炕的教徒们（包括张忠在内）也都在那里听着。我故意讲得绘声绘色，把南炕的同学逗得哈哈大笑。张忠憋不住了，他哼了一声说：

“这算什么青年人？青年人应该有驯服的性格，听老师的话，以基督耶稣为榜样。”

“都说以耶稣作榜样，可我就没看谁钉在十字架上。”我仍然对着南炕同学说。

南炕同学又是一阵哄笑。

“你们根本就不配谈耶稣，他的伟大人格，你们根本不了解。”张忠转过头来，直对着我们开火。

“我们比你了解得透彻，不信我考考你。”纪儒林笑嘻嘻地对张忠说，“如果我要打你的左脸你怎么办？”

“张忠就应该把右脸也伸过来让你打。”南炕另一个同学马上接过来讲。

“用这个精神来检查你们的行为，你们根本就不是好基督徒，好基督徒就应该老老实实在那里听着，这才符合你们那种不抵抗主义精神哩！”纪儒林讥讽地说。

“对野蛮人就不能沉默。”张忠仍不肯示弱。

“这话是耶稣说的？”纪儒林问。

“不是。”南炕又一个同学把话抢了过去说，“这是昨天他们那位顾博士说的：中国人野蛮，西国人（指西洋人）文明。”

南炕上又是一阵笑声。

“笑什么？”张忠气得脸煞白，说，“信教，做礼拜，这是牧师和学校的规定，谁也不能违反！”

“对！我不违反。”南炕一个同学回答说，“可我坐在那里，心里想什么谁也管不着吧。来，我告诉你，我都想些什么……”说着他便凑在南炕另一个同学耳边上说了几句什么，两人又都笑起来了……

从这一天起，几乎天天晚上，南北炕之间都要展开一场舌战，越战越尖锐，越深入，越广泛，从宿舍一直引到教室和操场

上。为了更有力地驳倒对方,我们开始设法寻找一些对争辩有帮助的书来读。纪儒林找到一本陈豹隐著的《科学的宇宙观》给我们看,这本书中用唯物论的观点阐明了宇宙现象,有力地批判了唯心论和迷信的宗教思想,使我们的辩论更具有说服力了。真是“真理愈辩而愈明”。自从经过这一阵子公开的和隐蔽的思想斗争,到我们快毕业的时候,已经有好多同学不上礼拜堂做祈祷去了,也不参加“查经班”了。

## 毕业即失业

一九二九年，我从中学毕业。同学们有的准备升学，有的回家乡去等待机会找工作。我呢，“升学”两字连想都没敢想过，我必须马上找工作。三年中学，母亲茹苦含辛地把我供出来了，如今，我怎么能不担起这副生活的担子呢。

那时候中学毕业，大小也就算个知识分子。教育不普及，中学毕业的人还不是很多呢。但是，要想找点事做，却不是那么容易的，学校根本不管，得自谋出路。出路有很多，可要凭“门子”、凭钱才能够找到，这两样我都没有。五口之家，全靠母亲和妻子给人做手工维持生活，维持不了，就借高利贷。结果是债主多过亲戚，亲戚这时躲得远远的，债主却踢破了门槛子。越靠近旧历年，债主来得越多。年关，年关，旧社会的旧历年就是穷人的一关。

这年冬天，冷得胜过往年。快过旧历年的时候，正是三九寒天，天空总是灰蒙蒙的，街上到处是冰雪。“牛马行”里每天都要拉出去几个冻死的乞丐。能躲在屋里的人谁也不肯上大街，我却整天迎着刺骨的寒风跑来跑去。我渴望工作，只要是凭自己的劳动，什么工作都行，有了工作，老母就能吃上安心饭，一家人就不至于挨饿受冻了。



旧历年到了，我仍然一筹莫展。别人家都张张罗罗地买年货，我家什么也买不起。寒风袭来，门庭冷落，穷愁交加。妈妈病倒了，我顾不得再上外边去找工作，赶紧想法子弄一点钱，给妈妈请医生，抓药。

一天早晨，我正蹲在外屋灶坑下给妈妈熬药。突然，门被踢开了，冷风夹着浮雪从外面卷进来。我打了一个寒颤，抬头一看，一个满身黑衣服的承法吏（法警）当门而站。

“这是老李家吗？”

“正是。”我忙站起来，关上房门。

“你们欠债不还，衙门传你到案，”他一伸手，递过一张纸头来，“这是传票。”

“请你小一点儿声。”我接过纸头，往屋里一指，悄声说，“屋里有病人，我们到外面谈。”我拉他到门外，西北风刮得他手上的传票飒飒响，我急忙去看上边的字。

“不用看了，你马上跟我走。”承法吏冻得端着膀，不耐烦地说，“衙门里年前的案子很多，你今天马上就得到案！”他看我有些为难的样子，停了一下，又说，“如果你今天不能到案，我交你这个朋友，你可以打个‘听审不误’的保条，我带回去。”

我茫然地看着传票。妻子听见声音也从屋里出来，仰着苍白的脸，睁着一双惊惧的眼睛望着我。

“妈醒了没有？”我忙问。

“没醒。什么事？”

“要钱的事。”我想了一下，回头对承法吏说：“我马上就跟你去。”

“你等一等。”妻子忙去屋里拿出我的棉袍、帽子，替我往身上穿戴，一颗颗泪珠从她脸上直往下掉。

“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我去去就回来。药，快熬好了，一会儿

妈醒了，你端给妈喝，妈要问我，你就说出去借钱去了，千万别让她知道这事。”

话嘱咐完了，我刚要走，承法吏却一瞪眼睛说：

“慢点儿走！打官司的规矩你不懂吗？”

“什么规矩？”

“被告人得拿印纸钱哪！”承法吏指着传票说。

“多少？”

“这玩艺儿没定价，”承法吏嘿嘿笑了两声说，“你看着办吧！”

我忍着气，让妻子去邻居家借来两角钱给他。他接过钱，嘴撇得象个瓢，把脑袋晃了两下说：“这只够印纸钱；我是坐车来的。”

“你也看见了，这两角钱我还是现借的，我要有钱，也不会打这样官司了。朋友，以后再补付吧！”

他白愣着眼睛看看我和妻子，用力地哼了一声，转身就往外走。我也就跟他走了。

官司一直打到腊月三十才算结束。

一进家门，久病初愈的母亲正在脸贴着玻璃窗朝外望哩。我一脚迈进屋里，孩子忽地从炕上跑过来，张着小手往我身上扑，妻子忙一把抱过去。

“都过年了，你怎么还出去借钱，没钱不也一样过年！全家太平平比什么都好。”妈妈一直以为这几天我在外边跑是为了借钱，哪知却是为了还债。

“对。没钱也一样过年，妈病好了，咱们这年过的就有劲儿。”

真的，妈病好了，全家都有了笑模样。我打起精神，把炕烧得热热的，给孩子也换上件新衣服。妈让我写副对联，我说：

“对。咱们没有别的，还有一张红纸。”于是，妻子研墨，我

裁纸,准备开写。写什么呢?妈在一旁让我写吉利话,有什么吉利话好写呢?在这个黑暗社会里,“吉利”根本就与我无缘,穷人是和倒霉连在一起的,要想“吉利”,除非是……这时我又想起冯老师讲的那种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来了,那该多么好!我想到这,感情一激动,提起笔来就写,上联是:有朝一日遂我愿;下联是:普天之下无穷汉。横批写了四个大字:自寻幸福。写完了,妈妈让我念给她听听,我就把我的想的和写的,都对妈妈讲了。妈边听边咂着嘴说:

“哟,孩子,你这个愿许得太大了,得怎么办才能那样啊?”

妈这么一说,我也觉得有点儿泄气。是呀,现在一家人吃饭还成问题,又怎么能……这不是说大话吗!想要重写,又没有红纸了,就这样吧。整个晚上,我都为这个问题苦恼着。妈妈她们烧神纸、接神、祭灶,我也跟着忙活着,但心里却一直想着这问题……

## 斧劈“灶王”

俗话说：“年好过，节好过，平常日子不好过。”一过了年，我又为找工作、借钱还债奔波起来。

正月十五那一天，为找我一个表兄，跑了半天，最后有人说：我要找的人到张作相的侄儿“少帅”公馆去了，他经常在那里混，我只好上那里寻他。

“少帅公馆”在西关轱辘把街，大门口上挂着“锦州张寓”的“门封”，门口站着一名卫士，背着黑绒子弹袋，挎着盒子炮。门里门外出来进去的都是些不三不四的男女。我走近传达室，经过盘问，才放我进去。里面是三合大院。没来这里，我曾听人讲过，张家在这所三合大院里开着赌局和花烟馆。这时，一进院，就听见从东厢房里传出来唱淫荡小调的女人声，接着就是一股刺鼻的大烟味儿钻进鼻孔。我急忙三步并作两步走进正房，一开房门，一片嘈杂的吵叫声从里面直冲出来。堂屋地上，香烟缭绕，不知供奉着什么神佛，东西两屋都是“宝局”，成堆的人挤在一起，就象滚成蛋的蚂蚁一样。几个卫士站在旁边伸手“抽头”，纸烟味、酒味和汗臭味混在一起，呛得人喘不过气来。我急忙在人堆里找了找，没发现我要找的人，便跑出来，往西厢房走去。越走近西厢房，大烟味越重，一拉房门，烟气就象浓雾一样从里

面喷出来，一排大炕上躺满了男男女女，一盏盏烟灯，冒着红黄色火苗，一杆杆烟枪，发出呼噜呼噜的声响。团团浓烟从许多张嘴里、鼻孔里往外滚着，烟灯旁边全是骷髅一样的脸，鸡爪一样的手……我屏住呼吸，正在寻找，我那个表兄却早看见我了，忙走过来，我用最快的速度和他说了两句话，转身就往外走。因为走得太急，几乎碰倒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大块黑黑的东西，我定神一看，原来是一块二三百斤重的大烟泥（熬大烟的渣子）。我只觉得一阵恶心，缓了一口气，忙甩开脚步跑出屋，冲出了大门。迎着刺人的寒风，我深深地吸了一口冷空气，才觉得轻松一些。回头看看，卫士正在门口踱步，“锦州张寓”的牌子下面仍然是人来人往，我忍不住一阵愤恨：这是什么世界！是鬼的世界，烟鬼、赌鬼、色鬼……还有人拿枪保护着他们，印把子掌在他们手里，就这样胡做非为，还供着神佛，莫非还想上天！我情不自禁地向地下用力唾了一口，卫士站住脚瞪起两眼望着我，我一跺脚，转身往家走去。

家里照样冷冷清清的，母亲又在窗前望我哩。我一进屋，母亲就说：

“大正月十五，还在外边跑！快暖和暖和，给灶王爷上炷香，好吃饭。”

我没说什么，拿起香往外屋走。灶王爷是贴在一块木板上的，木板挂在灶台旁的墙上。我点着香，插在香炉里，香烟一冒，我猛然想起刚才在“锦州张寓”里看见的情景：他们那里不也正在烧香供神吗？他们供的玩艺儿我为什么要供？让它去“保佑”那群恶鬼吧！想到这里，气不打一处来，我一步登上锅台，一把将灶王爷连板拽到手里。正好这时，母亲从屋里出来了，老人家被我的举动吓坏了，一边抢一边喝道：

“你这是要干什么？”

“送他回老家！”

“你胡说些什么，有罪！快住嘴！”

母亲吆喝着，把灶王爷抢在手里。我怕急着母亲，只好住手，但还不甘心，忍不住又指着灶王爷给它一句：

“看在妈妈面上，让你多呆一宿，明天就让你上‘西天’。”

我怕妈妈生气，说完就进屋了。妈妈自己又郑重地重新挂上灶王爷。

也真巧，当天晚上，妻子忽然得了感冒，发烧、头疼。妈妈埋怨我说：

“都怨你，得罪了灶王爷！”

“好吧！明天我就给他赔礼。”

妈妈正忙着给妻子找药，也没细琢磨我的话。第二天大清早，我趁妈妈还没起床，就从被窝里钻出来，悄悄走到外屋地，拎起小斧子，一手将灶王爷连板拽了下来，一手举起斧头，猛力劈下去，干透的木板，一碰斧刃，叭的一声分为两半。我一时性起，叭、叭、叭，接连着劈下去，一斧比一斧快，一斧比一斧狠，灶王爷变成了碎木片。我把木片架成堆，在上面坐了一壶水，划着火柴，用碎草一引，干柴烈火，马上着了起来。我擦了擦头上的汗，眼望着欢蹦乱跳的火苗，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多少天来的怨愤，好象都随着这口气吐出去了。火苗越烧越高，火光越照越亮，我的心里也觉得亮起来。我忽然意识到：我这不就是在家里闹起“革命”来了吗？对，非革命不可！把这个“群鬼”的世界给它“革”变了样……但，怎样才能做到这一步呢？一想到这里，只觉心里一惊，是呀！我个人面对着这样一个黑暗社会，能有什么作为呢？一个人怎能革命呢！我爽然若失地坐在地上，火苗在我面前一闪一闪地往上冒着，忽然，一股热气扑到脸上，火焰中升起了滚滚的白汽，水，烧开了。

头天晚上，妻子出了一身透汗，早晨起来，头清眼亮，病好了。这回我可有理由说服妈妈了：如果灶王有“灵”，为什么我劈了它，我妻子的病反倒好了呢！妈妈见灶王爷已经变成飞灰，也就没再说我。从此以后，我家里就再也不供灶王、天地牌之类的玩艺儿了。

## 新 天 地

转眼工夫,又到了初冬的季节。我仍然处在穷困交加的失业情况中,当我为生活四处奔走的时候,仍然常常作着革命的幻想。生活越没出路,我就越恨这个万恶的旧社会,也越幻想着革命。但,幻想终归是幻想,一和实际联系起来,我就又感到茫然了。就在这无计可施的时候,我想到了文光中学的同学纪儒林,这个读书极多,胸怀大志的同学,可能会有些想法。于是在一个星期天里,我去文光中学宿舍找到了纪儒林。一见面,他就问我找到工作没有?我把一筹莫展的处境告诉了他,他看了看宿舍里闹哄哄的同学说:

“这里不方便,走,到外边去走走!”

我俩从学校里出来,往巴虎屯方向慢慢走着。这是初冬的一个绝好的天气,太阳照在身上使人感到暖融融的。刚下过一场小雪,脚踩在松软的雪地上,一步一个脚印,脚印里浸出一汪水来,道很僻静,没多少行人。

“你的困难处境我早就料想到了。”纪儒林靠近我说,“象咱们这样穷学生,没钱没势,在这个社会上根本就没有立足之地嘛!”

“我恨透了这个社会!”我狠狠踢了一脚路旁的积雪。



“光恨没有用，得想办法……”

“你有什么办法吗？”我迫不及待地试探着问。

“办法只有一个：革命！”纪儒林挥了一下拳头，又深沉地说了一句，“革旧社会的命！”

“对！革命！”我高兴得差点儿喊了出来，我没有找错人，纪儒林说出了我要说的话，我激动得血往上涌，一把拉住他的手说，“对，我们一起革命，一起干！”

“光咱们俩不行，得有更多的人。”

“更多的人……”纪儒林这一说，又唤起了我那个人奔走，孤立无援，幻想破灭的苦闷之感，方才的激动一下子都消失了，我不由得停下脚步，呆呆地望着纪儒林说，“是呀，光是一两个人不行，得有更多的人，可是上哪里找去呀？”

纪儒林回头看了看，一拉我的胳膊，一边和我并肩向前走着，一边悄悄地说道：

“你听说关内闹红军的事没有？”

“红军！我听说过呀。”

纪儒林又慎重地向路两旁看了看，然后悄声地但是有力地 说：“他们领导农民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红色政权……”

“红色政权！”我一下子又兴奋起来，忙问道，“是不是象苏联那样，没有人剥削人，人人有工作……”

“对，对，正是那样。”纪儒林连连点头说，“现在关内象这样的革命根据地已经有十几个了，红军已发展到十几万人了！”

“哎呀！我怎么不知道！”我一跺脚说。

“国民党封锁消息。”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纪儒林稍一迟疑说，“我是从一个关内来的亲戚那

里听到的。”

“我能不能见见他，和他唠唠？”

“他已经走了。”

“真可惜！”我挥了挥手说，“他还说了些什么？”

“他说：红军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红色政权就是共产党领导的政权。”

“共产党！共产主义！”我激动得抓紧纪儒林的臂膀，“这可太好了！实行共产主义，革有钱人的命，这正是我一心向往的。只是不知道我们这里有没有共产党，要是有的话，我们好一起去参加！”

“你想的真简单。”纪儒林亲切地笑了笑说，“共产党不象国民党那样，摆在明面上，一考就参加上了。他们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得现找。”

“在吉林能找到吗？”我迫不及待地问。

“我想是能找到的。共产党一定在受苦人中间活动。”

“好，我们一起找，找到了一起参加。”

“可是得悄悄地找，自己多留心，千万不能和别人随便说。国民党和军阀们抓住共产党是要杀头的！”

“我知道。”我频频点头说。

我俩就这样一边走着一边谈，从学校谈到巴虎屯，从巴虎屯又谈到我家，越谈越高兴，越谈心里越亮堂。往日心里总象系个大疙瘩，今天这疙瘩算是解开了。一直谈到妈妈招呼我俩吃饭，我才觉出肚子饿得直响。

自从和纪儒林谈完话以后，我好象在阴霾的天空中看见了一线阳光，连睡觉做梦都和过去不同了。理想的实现虽然还有些渺茫，但，希望的火花却不断在眼前闪耀。

这一个时期，纪儒林常到我家里来，每次我俩都谈到很晚很

晚,我们谈无产阶级革命,谈革命必须由共产党来领导;谈社会的黑暗,谈军阀的混战……越谈心里越亮堂。这时,什么生活中的困难,失业的苦闷,都好象烟消云散了,身上也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一天傍晚,纪儒林又来到我家,他脸上挂着笑纹,是什么事情使他这样兴奋呢?

他一直走进西屋,我刚跟进屋里,他就赶紧回身关好房门,然后小心翼翼地贴身衣兜里掏出几本小册子来,严肃地对我说:

“维民,你不总想知道更多的革命知识和情况吗!这回你看吧。”他把这些小册子郑重地递到我手里,又接着说,“这几本东西得来不易,你要小心着看,千万不能被任何人发现!”

我忙接过来一看,一本是油印的小册子,名叫《红旗》,是中国共产党机关编印的,一本是油印的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法大纲》,另外还有一份铅印小报,名叫《大实话》。

这对我来说,真是如获至宝,我惊喜地问他道:“儒林,你这是从哪得来的?”

“你先看吧!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东西。”他没有正面回答我。但,我是多么渴望能够知道和这有关的一切呀!我急忙又问一句:

“这么说,你已经找到了?”

“只要我们努力找,总会找得到的。”

“哎呀!你真的找到了!”我惊喜若狂地拉住他,“快告诉我,在哪里?我几时能见到他们?他们都是什么样的人……”

一连串问题,一下子都从我心里冲出来了,我自己也没想到问得这么多。

“你先不要问了。”纪儒林使劲握住我的手,热情、诚恳地望

着我，说：“你先用心读读这些东西，有什么问题记下来，我俩一起研究，至于你问的这些问题，将来都会明白的。”

将来，这将来还有多久呢？我真恨不能马上就见到那梦寐以求的共产党人。但我从纪儒林热情的眼光里，细细品味着他那诚挚的话语，我知道等待是必须的了。这个念头一放下，眼前这几份宝贵的材料，立刻对我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我忙埋下头去贪婪地读起来，就象蜜蜂扑在花心里一样。后来，我仿佛觉得纪儒林悄悄走出去了，又仿佛觉得妻子进屋里来取什么东西，这些我都不去管它，只顾读下去，读下去。天黑下来了，清秀工整的油印小字越来越模糊不清，我的眼睛几乎紧贴在书本上，仍然读下去。一会儿，妻子过来把灯点上，书上的字迹立刻显得清楚起来，我读得更起劲了……这时，在我的面前，打开了一个似熟悉又陌生的新天地，这个新天地里的景物，有的似乎在梦境里看见过，有的对我则完全是崭新的。我象个初进宝山的小孩子一样，惊喜的声音不时在自己心中喊起：瞧，共产党在赣南成立了江西工农民主政府；在闽西成立了闽西工农民主政府；赣南和闽西，离这儿好远哪！瞧，红三军团与红一军团在会攻长沙期间，合编为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了，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军团，方面军，这是多么大的队伍呀！朱德、毛泽东，我早就听说过……看，这里还有一篇关于毛泽东的文章：《重读毛泽东同志〈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有感》，原来毛泽东同志这篇文章早在一九二八年就写出来了！快看看文章的内容吧！于是，密麻麻的油印小字，在我眼下似乎都变成有生命的东西了。屋外边已经星斗满天，下弦月从东边升起来，越升越高。孩子、母亲和妻子都睡了。远处不时地传来几声犬吠，近处却静悄悄的没一点声响，吉林城也睡了。只有我反而觉得清醒、兴奋。

新天地的大门敞开了，这新天地是属于我们的。

几天过去，仍然是在晚饭后的时间，纪儒林满面春风地领来了一位陌生客人。客人约有三十多岁，穿的是青布棉袍，外面罩一件黑呢子大衣，大高个子，圆脸膛，鼻梁上架着一副深度数的近视镜，嘴角上挂着亲切的笑容。一见面，还没等纪儒林介绍，他就热情地向我伸出手来。

“这位是张先生，在东局子兵工厂作事。”纪儒林忙向我介绍说。我忙握住他伸过来的大手，说：“快请坐吧！”

“你的情况，儒林都和我讲过了。”他拉我坐在炕火盆旁边，一见如故地说，“怎么样？找到事情做没有？”

“还没有呢。”我把火盆往他身旁推了推答道，“最近找过几次从前教过我的张又谦老师，他正在设法给我找个小学教员的位置……”

“呵！要不要花钱运动运动呢？”他幽默地笑着说。

“他说不用。真要用钱的话，我也拿不出来。”

“要是拿得出钱来，事情可也早就找到了。钱多了，什么都会送上门来的。”纪儒林插了一句。

“是呀，矛盾就在这里。”张先生收起笑容，双眉微蹙地说，“现在就是钱的世界，连找个出卖劳动力的工作都得花钱运动。可是，没钱的穷人又到处都是。一方面是处处要钱，一方面是处处没钱。这就是矛盾！”

“是穷人和富人的矛盾。”纪儒林接着说。

“对，是阶级矛盾。这就是这个社会里最主要的矛盾，也是必须解决的矛盾。但是得怎样解决呢？”他的声音忽然大起来了，话，说得那么果断而有力，眼光从纪儒林身上移到我身上。刚才纪儒林领他一进屋，我的心情就开始激动起来，我本能地意识到他可能就是朝思暮想的那一种人，我直望着他那火热的

眼睛，不由得全身一阵激动，不假思索地冲口喊道：

“怎样解决？只有革命！革有钱人的命，消灭剥削阶级！”

“说得好。革命，彻底革命！不革命中国就不能富强，穷人就没有活路。”他激动得站起来面对着我，说：“当然，个别的人也可能找到出路。譬如你，求你们的张老师找个小学教员当，你的生活问题解决了，也可能今后一帆风顺，飞黄腾达起来——我这是比喻——但是广大的劳苦大众呢？他们并不能都有一个张老师可找哇！他们有的要饿死、冻死，被有钱人逼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只顾自己吗？只为自己而活着的人，是最渺小的人。革命者应该是为全体劳苦大众而活着！你说对不？”

他的话句句说到我心上，使我憋在心里那些朦朦胧胧的问题，刹那间都清楚了，眼前好象顿觉明亮起来，仿佛感到那些只为自己找事、借钱而奔波的行动，是那么渺小，是和一个革命的伟大理想，不能相比的。正在这时，他好象看透我的心事一样，接着往下说：

“当然，革命也必须吃饭，也必须有些事情做。问题是在心里要时时不忘理想，不忘革命，当革命需要的时候，就会毫不犹豫地抛开一切个人利益，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要知道，革命是艰苦的，甚至是要流血的。”

他张开两手，严肃地站在我的面前。我激动得心直跳，不由得往前走一步，说：“如果需要的话，我一定会抛开个人的一切。您知道，我是多么恨这个社会！恨不得一拳打碎它。我要革命，问题是……”我望了望纪儒林说，“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

纪儒林微笑着扭过头去。张先生也温和地笑起来，他又拉住我的手，和我一同坐下说：

“人少不要紧。毛泽东同志最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火是从星星之火烧起来的，革命也是从

少数人开始的。”

他一提起毛泽东来，一下子引起了前几天夜里读文件所遇到的一些问题，于是，我就一股脑地提了出来，张先生也更加热情地讲下去，纪儒林也不断提些问题，我们越谈越起劲，一直谈到深夜，他俩才告辞回去。

我送他俩出了大门，出了街口，他俩走了，我站在那里一直望着他俩的背影消失在夜空下面，我还不想回去，我多么想和张先生永远在一起呀！一个晚上的谈话，真胜读十年书！可是我连他的住处都不知道，以后怎么联系？我也曾经问过他，他只说住处不定，他曾答应今后来看我，但愿他能常来……

## 乡村教师

经过长时间的奔走，我的职业问题终于解决了。我的老师张又谦转托文光中学校董、永吉县教育局刘局长，替我找乡村教师工作，碰巧桦皮厂两家子小学校空出一个缺来，就把我补上去。

母亲和妻子一方面为我有了工作而高兴，一方面又因我要离家外出而放心不下。娘俩整天忙着给我整理衣物：一卷行李，几件换洗衣服。衣物本来很简单，但，娘俩却忙个不停，缝啊，补啊，很怕有一点儿不如意的地方。

我有了事情做，能凭自己的劳动生活了，这本是足以使人兴高采烈的事情。但，心里却总有些闷闷不乐，这倒不是因为舍不得离开家，在中学读书的时候，我就在学校寄宿，二十岁的青年人，哪个能恋家呢。使我不好受的是我不得不暂时离开我的良师益友：张先生和纪儒林。虽然张先生一再劝勉我，说革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到乡下去正好可以多了解一些农民的实际生活情况，了解地主怎样剥削农民，了解农村的阶级关系，锻炼自己的革命意志，这正是个好机会。但我仍然感到难舍难分，就象一个久困暗室的人，忽然有人给把门打开了，让阳光照进来，而你正惊奇地望着这一切，想要有所作为的时候，门又忽然掩上



了，人也走开了，这时候你感到的孤独，怕要胜过以前呢。

两家子是一个偏僻的村落，从桦皮厂下火车还要走四十里旱路才能到。当时的乡村小学还沿用清末的“学田制”办学，学校的一切开支经费，都靠学田收入来解决，而学田地又多半由学校的校董经管着，校董则由当地推举出有点文化的地主来担任。两家子小学的校董姓滕，人称滕三爷。这个滕三爷，既是学校的校董，我总要见上一面的。县教育局告诉我，他的儿子在桦皮厂当区助理（副区长）。因此，我一下火车，就去找这位“小校董”。我的意思是想接个头，应付一下就算了。谁知“小校董”一听我是新派来的教员，竟特别客气，说“老爷子”有话，一定要他亲自送我到村。我推辞不过，只好坐上他的车，一同去两家子。

滕家住的是高门大院，一望就知是个不小的地主。车到门口，小滕先跑进去。我一下车，老滕已迎出来了。他两撇八字胡，一件串绸长衫，迈着方步，双手一抱拳，说了两句半文半白的客套话，竟是一派斯文的样子。父子俩把我让到上屋，女人们装烟倒茶，不一会儿，就摆上一桌丰盛的饭菜来。我当时真如坠在五里雾之中，这家地主为什么这样如敬贵宾似的招待我？常言说“礼下于人，必有所求”，莫非他有求于我？可我……有什么可求的地方呢！那么他真是一个“敬重斯文”的开明绅士吗？这样的地主，我还没见过呢。几年来我受尽了有钱人的白眼，我对有钱人早已形成了一种牢不可变的“成见”。因此，当今天忽然变成座上宾的时候，觉得浑身很不自在。无论他们的态度装得多么诚恳，话儿说得多么受听，我都觉得是虚伪的，是内含欺诈的。我恨不能马上离开这里，让我到学校去吃一顿粗茶淡饭。我在这边胡思乱想，他们在那边已一唱一和地殷勤相让起来：

“李先生，吃菜，吃菜！”老地主夹起一只鸡大腿放在我的接碟里，说，“穷乡僻壤，没有什么好吃的。”

“李先生今后如果有什么为难的事情，尽管到区上找我；县里咱们也有人，一切都没问题。”小地主抹着油嘴说。

“老弟到这里也就象到自己家里一样，今后尽管常到我家来。缺东少西也只管吱声……关于李先生的束修费……”老地主咽下一口肥肉，放下筷子说，“到时候就如数送上。至于学田的一切收入和开支，李先生也不用操心，到时候开出清单来，请李先生过目，李先生只往上面盖个手戳就可以了。李先生空出时间来，可以专心教学。”

“对。这些事情管起来麻烦透了！”小地主紧跟上说，“老爷子闲着没事，多管一些，论东道之谊也是应该的。您说是不？”说完，又干笑了几声。

随着这几声干笑，我心里倏的一下什么都明白了。虽然当时我只有二十岁，但，困难的生活环境，使我懂得了更多的事情。我明白这家地主为什么这样招待我，这样丰盛的饭菜是为何而设。这个隐情一经识破，饭菜再丰盛，也难以下咽。于是，我立刻放下碗筷，起身告辞，任他们怎样挽留，也不再坐了。

走出门外，在老家伙抱拳相送的时候，我说：

“学田当然仍由老先生经管。我相信老先生一定会把所有的钱都用在办学上。”

“那当然，那当然。将来一切开销都有清单。”老家伙眨着眼睛回答着。我对他们父子点点头，便往学校去了。

两家子小学校，共有五间草房，一间是教员——也就是我的宿舍；一间是厨房，厨房后面间壁出来一个小房间，一个老校役住在那里；另外三间通连在一起，是学生教室。

学校只有四十几名学生，却包含了四个学年，从启蒙的孩子到四年级的学生都在一个课堂里上课，这叫做四组复式班。上一堂课，四个学年的书都得讲到。学生听课的时间少，教员可得

繁忙。学生最小的八、九岁，最大的竟有十六、七岁的，有男生也有女生。

我的小学教员生活开始了。这是我一生中第一个职业。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教学工作上，一天备四个年级的课程，讲四个年级的课程，放下这样来那样，工作的劲头蛮旺盛。我必须把这些孩子们教好，让农民的子弟得到应有的知识。

开始，我的确天真地把这些学生都视为一般农民家的孩子。但，经过一番了解，我惊讶地发现：这里面几乎竟找不到一个贫苦农民的孩子，至少也是中农以上人家的子弟，绝大部分学生家庭都是富农和地主。我对这个发现不仅感到失望，而且产生一种痛苦的矛盾心理：难道我每天站直了腿，讲干了嗓子，就为了教育出一批小地主、小富农吗？让他们学会了写、学会了算，好去记阎王账、打剥皮算盘吗？

这种想法，一直影响着我的讲课情绪。我把这种苦闷心情，写信告诉了纪儒林。他在回信中却提出了和我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说张先生也已看过我的信。张先生说，小孩子好比一张白纸，地主、富农的家教可能把他们染黑，我们却可以做些“漂白”的工作。地主的子弟也是可以革命的。另外，应该在课余时间多接触些贫苦农民，多熟悉他们、帮助他们，劝他们送子女上学。这封回信，真象一股清泉一样，立刻冲净了我心中的烦躁。学生年龄毕竟太小，讲革命道理当然不行。何况那时我自己知道的革命道理，也少得可怜呢。我便尽量多讲些爱国主义思想，讲平等待人，讲人必须劳动……这时，我已了解了我的工作意义，所以工作劲头又高涨起来了。

工作从生疏变为比较熟悉，可以多抽出一些课外活动时间。我便有意识地去接近贫苦农民，相机劝他们送孩子上学。开始，我也有一点天真的想法，以为他们不送孩子上学，大多是因为不

懂得学习知识的重要。但一深入到他们的生活里面去，在我眼前就展开一幅悲惨的画面：当他们一家几口人只有一条被盖的时候，当他们整天吃糠咽菜的时候，怎么还能让孩子去念书！他们多数都住在小马架子里，这是一种最坏的房子，房檐低低地垂在地上，房门只能开在房山头上，墙壁上挖了一两个小窗户，就是在阳光灿灿的大白天，屋里也总是黑洞洞的。他们种地没有畜力，农具也都残缺不全，只能和地主在一起“挑份子”，使用地主的生产工具，打下来粮食，地主拿走一半。春、夏没粮吃，借一斗还二斗。生活对他们，是折磨、压榨、苦役和鞭撻。孩子生在这样家庭里，从懂人事儿那一天起，就开始了沉重的劳动：拾柴、挖菜，跟着大人下地，给别人家放牛、放猪。他们要和父母一道去抗饥抗寒，哪有机会读书。他们有时候跑到学校来，站在窗外，张起一双黑溜溜的小眼睛往里看，竖起小耳朵往里听。他们多么希望能够坐到教室里的小凳子上啊！但是，贫困剥夺了他们受教育的权利。他们的父母何尝不想让自己的孩子也能识文断字呢？每当我和他们谈起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便眼泪汪汪地谈不下去了。有时，也有的老乡咬起牙关说来年开学一定送孩子上学。遇有这样的农民，我就鼓励他们，答应不收他们的学费，农忙时节给他们假。经过一番努力，竟也有几家贫苦的农民准备在来年开学时送孩子上学了。我自己也盼望着明年能有新的成分出现在我的教室里。但，我怎么能知道，到明年，连我自己也不能再到这教室里来了呢！

## 永生难忘的歌声

学校放寒假，滕家老地主主要请我吃饭，给我饯行，我拒绝了。又要套车送我上火车站，我却坐上别家的卖粮车走了。

好长时间没回家，家里人看到我都很高兴。我看到母亲过日子克勤克俭，我的微薄收入还能够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心里也踏实了。

我和纪儒林几个月未见，急着去找他，我把农村的所见所闻：地主的残酷剥削，农民的苦难生活，都讲给他听。他忍不住紧握着我的手，愤慨地说：

“维民，城里城外，到处都是一样。有产阶级恨不能把穷人放在锅里炸出油来喝，阶级矛盾一天比一天深，不革命怎么能行！”

“这道理我早已明白，而且要求一天比一天强烈。尤其这次在乡下看到了农民的悲惨生活以后，心里更是不能平静了。不革命，人民简直生活不下去了！但是，革命不能光是说，需要行动！”

“你想怎样行动呢？”纪儒林用闪闪发光的眼睛直望着我问。

“我自己当然是没法行动了。反动势力这么强大。一个人，

对着一个社会，怎么能行动？”我停了一下说，“我很感谢你，你使我知道了好多从前不知道的道理；你给我找书看，你领张先生来看我——我当然知道张先生是什么人。张先生的话，我都一句一句记在心里，这次在乡下，我也是按照他的话做的，才使我看到了农民的悲惨生活。现在，我要求行动，并不是说我自己要干起来。我知道，中国革命没有共产党领导是不会成功的，行动，必须受党的支配。我现在是要求党告诉我应该怎样做。我希望能和张先生好好谈谈，希望他能了解我的心情。”

“你的心情，他已经了解了。”纪儒林微笑着点点头说，“你在乡下来的信，他都看过。他说你的思想有很大的进步。他说你已经……”纪儒林说到这里，忽然把话停住，对我笑了笑说，“过两天，他会来看你，到时候他会告诉你一切的。”

“那么，我明天就去看他，不好吗？”我迫不及待地说。

“你真是个急性子，过两天他一定会来的。”

见过纪儒林以后，我就焦急地盼望着张先生快来。第一天没见到他来，第二天等到吃晚饭时候，还不见来。晚饭后，我站在街口上翘首张望，直望到太阳落山，还不见来。冷风吹得我直打寒颤，我烦躁地向前走去，在街上转了一个圈，怅怅地回到家中。一进屋，忽然看见张先生和纪儒林正坐在炕沿上等我呢。我高兴得几乎喊起来，我忙奔到张先生面前，紧紧握住他伸过来的手，说：

“张先生，你好。我还以为你和儒林今天不能来了呢！”

“如果儒林昨天找到我，昨天我们就来了。”他一把拉我坐在炕上，微笑着说，“听儒林说你等共产党等急了，你看，现在共产党可找上门来了。”

他这一说，我的脸刷一下子红了，心也止不住猛地跳起来。我虽然早已知道他是个共产党员，但经他自己这一说，我竟止不

住地激动起来。他见我这样，忙接下去说道：

“有的人可就怕沾共产党的边儿，他们管这叫‘赤化’，‘赤化’是要杀头的。”

“我不是要沾边儿，边儿我早沾上了。”我稳了稳神，望望纪儒林，严肃地说，“半年前我和纪儒林俩在这屋里发过誓，一定要革命，要找到共产党。后来他把你领来了，我知道你就是共产党，正要和你多接近，谁知又到乡下去了。这次回来，我再也不能放过这个好机会了。这一个时期在乡下，我的感受太深了。从前，我一直以为自己生活困难，吃高粱米、啃咸菜，就觉得苦了。可是看看农民，抱空饭碗的有多少？种粮的人吃不上粮，不种粮的人却仓满囤圆。这是什么社会！如果把农民的生活比作地狱的话，我的生活就是在地平线上；可是地主呢？他们却上了‘天堂’。不劳而获的人为什么要坐享其成？应该从‘天堂’上把他们打下来，让他们下‘地狱’！说句心里话，从前我想革命，是从个人的生活困难上开始的，虽然也有些让天下穷人吃饱饭的思想，但是很模糊。可是现在，一想起革命，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些受剥削最深的农民，他们应该有好日子过，应该成为土地的主人！共产党的‘土地法大纲’应该成为农民的行动纲领；共产党的理想是必须实现的最好理想。因此，我才急于要见到你，我要把憋在肚子里的话都说出来。”

“你要说的话，我已经知道了。你来的信我都看过，你前天当儒林谈的，我也都知道了。”

“可是，有一句话是我从来也没说过的。”

“什么话？”

张先生和纪儒林都有所期待地望着我，我不由得激动地一举手，说：

“我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做一个共产党员！”

“我们也正是为帮助你实现这个愿望而来的。”张先生和纪儒林都站起来。张先生庄严地说道：“经过我们研究，认为你已经达到了共产党员的标准；现在我代表党组织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今天起，你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想不到朝思暮想的愿望，刹那间就实现了。这时，我反倒说不出话来，只觉得心怦怦地跳，脸阵阵地热。张先生和纪儒林一人拉住我一只手，紧紧，紧紧地握住。

“维民，从今天起我们就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并肩战斗的同志了！”纪儒林喜形于色地说。

“对！同志，我们是同志了。你以后就管我叫老张同志吧！”

“好，老张同志！纪儒林同志！”有生以来第一声叫同志，“同志”两个字一出口，我的眼圈就湿润了。同志这两个字有多么美好！大家为了一个共同志愿而奋斗，人和人的命运一下子就紧紧地联在一起，同甘苦，共患难，再也分不开了。

“你会唱国际歌吗？”老张同志问我。

“不会。”

“你听，是这样唱：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的罪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作一次最后的斗争……

纪儒林也随着唱起来。清澈的月光从窗外透进来，低沉而有力的歌声在屋内回旋。门帘被轻轻地掀开，妈妈伸进头来，格格地笑了，她笑得那么慈祥。好象她也知道了儿子此刻的幸福心情。



## 凭着两只手

入党后，党让我仍旧回两家子小学去工作。党指示我要多接近最贫苦的农民，和他们交朋友，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以后，党还会不断地和我联系，指示我下一步工作。

我怀着兴奋的心情去教育局见三区学务委员杨永贵。他把我让到会客室里，拿烟倒茶，满面堆笑，非常客气。

“快要开学了，我想明后天就回两家子去，不知杨委员有什么指示没有？”我开门见山地说。

“你来得正好。我正要找你呢！”他吞下一口茶说，“关于你的工作问题，我们研究了一下，想给你调换个地方。”

“想调换个地方？”我一愣神说。

“是呀，更换一个学校！”他嘿嘿地笑了两声说。

为啥要把我调走呢？我心里一急，忍不住地说道：

“杨委员，我在两家子小学教学，自问是拿出了自己的一切力量的。学生教的好坏，教育局可以下去考查……”

我刚说到这里，杨永贵马上摆着手说：

“哪里的话。老弟，你不要着急，关于你在两家子小学教学的成绩，我完全了解。和校董滕三爷谈起老弟来，他也是赞不绝口。”

“那么，我希望教育局还让我回两家子去教学！”

“老弟，你不要性急。”他眨着细长的眼睛，往前凑了凑说，“这次给老弟转勤，完全是为老弟打算。听说老太太岁数已经大了，孩子又小，家里需要人照顾，所以打算把老弟转到离城近一点的地方来。这样，既能达到教育救国的目的，又能尽孝于老人，不是两全其美吗！”

这又完全出我所料，这番好意来得太突然了。听他那一片花言巧语，一时之间真让人摸不着头脑。但想起了自己的责任，我马上答道：

“我的家完全能离开，老太太身体也好，不用我挂念。我在两家子小学已经教了一个时期，和学生也有了感情，我还是希望能回去！”

我的强硬态度大概也出乎杨永贵的意料之外，他非常着急地挤咕了几下眼睛，接着又嘻嘻笑了两声，说：“关于老弟转勤的事，也不是我个人的意思。现在老弟既有异议，我们就再商量一下。”

“多咱能决定呢？”

“快，你回去听信吧！”

从教育局出来，我满肚子疑问解不开，忙去找纪儒林，通过他找到了老张同志，把事情の詳細经过向他讲了一遍，根据他的判断：两家子小学的病根是滕三爷，有他在暗中作对，我想回去是困难了。现在应该争取到郊区农村学校去，如果能成，离吉林市近，联系方便，也有好处。

和老张同志谈完以后，我又再去教育局。一连去了三次，这位委员都躲起来不见我。我一着急，找到了刘局长。记得张又谦老师第一次介绍我见他的时候，这位局长的态度还非常和善，可是这次竟板起面孔，双眉紧蹙，用轻蔑的眼睛上下直打量着

我。他指指写字台前的椅子让我坐下，微微掀动了几下嘴唇说：

“你找我还有什么事情吗？”

“杨委员说要给我转勤，我连找三次，也没见到他。现在学校已经要开学了，不知决定了没有？”

“怎么？他说要给你转勤？”他忽然改变了原来的姿态，微露惊疑地把身子往前探了探问，“是他提出来的？”

“是呀！是他主动告诉我的。”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惊疑，忙说明了一句，“当时，我正准备回两家子小学，他不让我走。”

“不对呀！杨委员当我说你嫌两家子离家太远，学校又小，班次又少，交通也不便利，所以你自己提出要求转勤。”

“什么？我自己提出要转勤！”我惊讶得几乎跳起来，刹那间，我什么都明白了。这个卑鄙的小人，用甜甜的话语，嘻嘻的笑声，让我在家里伸长脖子白白等了两天，又让我白白跑了三次。满心的憎恨，想要发作，但我终于忍了又忍，耐住性子说：

“他说的不对，这都是杨委员的意思。我不明白这话从哪儿说起！”

“原来是这样啊！”刘局长若有所思地点着头说。

“完全是这样。我一直希望回两家子。”我不放松地紧逼道，“就是现在，我仍然要求回两家子，我在那里已经熟了。”

“现在已经晚了，杨委员早派别人去了。”

“那么，能不能把我派到郊区去？”

“现在学校马上就要开学，所有的教员都派满了。哪还有空位置留到现在！”

“那么我怎么办？”我惊恐地问道。

“你……”刘局长欲言又止地顿了一下，然后惋惜地叹了口气。

气说，“老弟，你还是年轻啊，人情世故没摸透呀！这样吧，你先不要着急，现在委员们要下乡去视察，到时候看哪里出缺，再把你补上。你先回去等着吧！”

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和刘局长几十分钟的谈话，使我对旧社会的了解更深了一层。我回头望了望县政府的大门，大门上的青天白日旗正在迎风抖擞。我不由得暗暗骂道：“什么青天白日？简直是暗无天日！”

我又失业了。失业事小，不能实现党在农村的工作计划事大。我又去找老张同志，他的愤慨不亚于我，但，一时也没什么好办法。当时，吉林党的组织才建立不久，经费困难。所以我的职业问题必须先解决，党的工作要根据我的新职业来安排。按照党的指示，我又去文光中学找张又谦老师。

张又谦老师不在，正好碰见王范五老师。这位老师对学生很好，对我也很了解；于是，我就把失业的经过向他说了。他一听我对滕三爷的态度，就把双眉一皱说：

“唉，你和这种地头蛇叫的什么真，他请你吃饭你就吃，又没下毒药，怕什么。”

“我不愿意和这种人同流合污。”

“吃顿饭就叫‘同流合污’？要是这样你在社会上还怎么生存？”

“我觉得应该有一个真理存在。”

“什么真理？”王老师睁圆了眼睛说，“你在这个社会上找真理，比在窑娼里找处女还难！当初我在你这样年纪的时候，也曾经梦想过寻找真理，可是碰了一些钉子以后，就知道梦想终是梦想，人总不能离开地面去生活，要学会通权达变，适应环境啊！”

“我以为应该彻底改变这个环境。”

“什么？彻底改变环境！”王老师先是直盯盯地看了我一会

儿,接着又哑然一笑说,“唉!你还是钉子碰得少哇!眼前你连职业都没有,吃饭都成问题,还谈什么改变环境!你还是听我这个‘识途老马’的话吧!吃饭要紧哪!现在想要牢牢实实地捧住一个饭碗子有多么不容易啊?有多少人明争暗斗地往下抢,一旦被抢去,再想找回来就比登天还难。拿你自己说吧,你现在得怎么办?你找我,我既没有‘窗户’也没有‘门子’,能有什么办法?没事情做,难道你就饿着肚子找真理?”

“实在没有事情,我还有两只可以劳动的手,我想总不至于饿死。”

“这么说,你能吃得起辛苦?”

“再苦也苦不过乡下的农民!”

“你要是肯吃苦,不怕低气,我倒想起一件可救燃眉之急的事情来。”

“什么事情?”

“给咱们学校的同学们洗衣服。”

“洗衣服?”

“对!你要是同意的话,明天在‘朝会’上,我就把你的困难处境向同学们讲一讲,让同学们把衣服交给你拿家去洗,洗的差一点儿,他们也能原谅的。”

“既然洗,就要洗好。”

“这么说,你同意了?”

我肯定地点了点头。王老师伸手从衣兜里掏出两千吊官帖和十元永衡大洋塞进我手里说:

“这点儿钱你先拿去,暂时维持生活;另外再买一些肥皂、洗衣板儿等用具。”

我刚想说不要,一见王老师那种诚意助人的样子,只好默默地收下了。

谢别了王老师，我就回家准备起来。两天后，我去学校找学生自治会会长梁致祥，他非常同情我，当时讲好：每星期内我去取送衣服两次，有什么困难，学生自治会帮助解决。衣服取回来了，于是妈妈、妻子和我就动手洗起来。院里拉起一条条绳子，绳子上挂满了一件件衣服。我成了临时的洗衣工人了。

## 在吉海铁路上

有衣服可洗,有饭可吃了,但是我的心情仍然很沉重。我整天在家里洗衣服,离开了群众,党的工作得怎样开展?一个共产党员不能很好地为党工作,虽然有饭吃也不香,偏巧这时候我的大男孩伯坝和不满一岁的小女孩都得了春季麻疹,没有钱到医院去医治,只能吃不花钱的“偏方”,结果小女孩病死了,母亲和妻子的哭声,更加重了我的烦躁。

老张同志和纪儒林同志不断到我家里来,他们除了勉励我之外,又在一起研究了我的工作问题,最后决定设法到铁路上去,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可以,主要是为了在铁路职工中开辟工作,先启发和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然后再相机组织活动。

经他俩一提,我猛然想起有一个叫关芝忱的老同学正在吉海铁路局做事,我何不去找他呢?党同意了我的打算,于是我就找到了关芝忱,经他委曲婉转地想尽办法,才在吉海铁路东关分站给我谋到了一个站务夫(雇员)的位置,月薪二十九元永衡大洋,职务是给站长结算报单、写封筒、车牌……

东关分站的站长名叫于振镛,是个既贪婪又狡猾的家伙。同事们既怕他又恨他,却又无可奈何他。我来后不久,正赶上他老家来了一封“母亲病重”的电报,他要请假回普兰店老家探

亲。站长要回家的消息一传出来，就由他的亲信出头，张罗给他凑份子，每人大洋五元。当时象我们这麻、佣员，每月只有二十几元的薪金，一下子拿出五元来，好多人都得勒紧了裤带往外掏，我却根本没有理睬这回事儿。

不久，站长回来了。没过两天，就下了一道通令，调我去做“检斤”。我一接到这个通令，心里立刻明白了。这是给我挖下一个陷井，想要把我推下去。

凡是熟悉旧时铁路工作情况的人都知道，“检斤”虽然只是给零担货物过过秤，表面上看来非常简单，但是其中的人事关系却十分复杂。原来“检斤”这里是一道关口，什么货物，分量足不足，都得从这里过一遍。作“检斤”的人，必须和私官两方都有联络。尤其要和“脚行头子”（装卸工的工头）勾结起来，“脚行头子”从货物里抽头，甚至大量地盗窃，检斤的人得设法给遮盖过去，然后再参加分赃。现在，站长忽然把我推到这里来，这不是有意要推我下井是什么呢？偏巧这时又从关芝忱那里传来一个消息说，吉海铁路局里有一个外号叫“傅蘑菇”的职员，向站长荐举一个亲戚，站长立刻答应下来了。于是，站长的眼睛更加盯紧了我，推我去当“检斤”，看那样子，真恨不能立时抓住我的小辫子才好。我估计事情不能再拖延，不如干脆走开，也好给以后的工作留个余地。

这时，我虽只来了几个月，但也已结识了一些人。除去车站里的同事之外，和车、机、电等工人也有了一些接触。工作虽然还没有正式展开，路子已经有了。

因为老张同志和纪儒林同志都到乡下工作去了，于是我就去吉林大学（原“法专”）临时宿舍找到共青团员常家栋，通过他找到党的另外一位领导同志老齐，向他作了汇报。老齐同志同意我离开东关车站，但须和铁路工人保持联系，并进一步做他们的



工作。

于是，我给站长于振镛留下一封信，狠狠地揭了他的底，痛斥了他的丑恶行为。我就从此离职了。

不久，老张同志和纪儒林同志回来了。在老张同志领导下，重新整顿了吉林党的组织，建立了支部，划分了党的小组，给我介绍了四位党员同志，我们编为一个小组，我担当小组长。

不久，“九一八”事变的炮声响了。日本帝国主义者蒋介石不抵抗的卖国政策下，迅速地占领了吉林市。从此，祖国东北的锦绣山河开始了灾难的岁月。

## “九·一八”

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已是处心积虑，蓄谋已久的事情了。在吉林，日寇的势力不断扩张，移民不断增多，日本货物在市场上大量倾销，日本大楼一幢一幢地盖起来，什么名古屋大旅馆、居留民会大楼、东洋医院大楼……等等，都傲然地在吉林市面上矗立起来。在日本商埠地里，日本浪人贩卖吗啡、鸦片；勾结土匪，供给枪弹。他们用毒品来毒害中国人民，用军火在中国土地上制造混乱。所有这些，国民党军阀政府都充耳不闻。他们苟且偷安，养痍为患，终于引狼入室了。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寇武装强占了沈阳城。九月十九日，事变的消息传到了吉林市。人心惶惶，奔走相告，市面上的空气立刻紧张起来。这时，张作相正在锦州老巢里给他母亲办丧事，吉林的军政大权完全操纵在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兼省督军署参谋长熙洽的手里。熙洽是清朝的近支皇族，曾在日本士官学校留学，与进占长春的日寇师团长多门二郎有师生关系（多门曾任士官学校教官）。这个死有余辜的卖国贼，在事变刚开始就主动与日本特务进行勾结，阴谋出卖吉林省。九月二十日，熙洽命令吉林全体驻军整装待发，当晚即强令张作舟及冯占海所部撤往榆树、舒兰一带待命。只留下警察维持治安。二十一

日，吉林剩下一座无兵的空城，警察每人只给留下五粒子弹，多余的全部缴回，换来的是一个白袖标，投敌的预谋已经公开了。然后，熙洽即命令十旅参谋长安玉珍乘专车至土门岭迎接日寇司令官多门二郎入城。

这时候，老张同志和纪儒林同志正在乡下。作为一个普通党员，事变突然一来，我虽然满腔愤慨，心急如焚，却又赤手空拳，无计可施。听说日寇就要入城，我便盲目地跑到车站上去探听动静，通过朋友的关系，混进了已被警察警戒的车站。这时国民党汉奸卖国贼们，早已穿着崭新的长袍马褂，停立在站台上，准备迎接日寇。站在他们前头的，是以日本商务会头子三桥为首的日本“侨民”，这群殖民主义者，年纪都在五十岁以下，穿着黑衣服，缠着黄裹腿，戴着白袖标，袖标上写着“预备”两字。他们象鹤鸟一样伸长脖子探望着。一直望到晚上七、八点钟，两辆日本兵车才开进吉林站。从车上下下来三、五百个日本法西斯强盗，他们也都戴着白袖标，只是上边是“多门”两个红字。这群侵略者刚一下车，等在站台上的所有汉奸们便都一躬到地，有几个老家伙吓得衣服直抖，看样子几乎就要下跪了。刹那间，我直觉头发往上竖，血往脸上冲，鼻子一酸，两眼直冒金星。我一跺脚，掉头走出车站旁门。

一架日本飞机，掠过玄天岭，低低地在吉林上空盘旋起来；一团团小纸片，从飞机上旋转着飘落下来。小纸片越来越大，变成了红红绿绿的传单，随着秋风到处飘荡。眼看几张传单在我面前飘舞着，我抓住一张一看，是日寇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的“安民布告”。日本强盗以君临一切的姿态出现在吉林的天上和地下。

当天夜晚，吉林全城布满了日寇岗哨，日本人开设的“名古屋旅馆”前面，更是戒备森严，日酋多门和卖国贼熙洽正在里面

举行会谈。吉林大街上，住户关门，商店落锁，吉林人民开始了更加悲惨的生活。

我这时唯一的希望就是盼老张和纪儒林快点回来。我本来知道，在这大敌当前的时候，他们一定是会很快地驰回吉林的。但是，我仍然不顾一切地出去寻找他们。

日寇的武装部队不断在城里举行示威游行，日本兵的皮鞋整天踩在吉林马路上；日本骑兵的马蹄声从这条街响到那条街。日本青壮年侨民都缠上了裹腿。一块“吉林省长官公署”的牌子，出现在旧督军署门上。卖国贼熙洽在日本人的刺刀保护下，作了伪吉林省临时长官。由日本强盗一手主持的汉奸临时政府宣告成立了。

就在这时候，老张同志突然出现在我家里。真象大旱逢甘雨一样，我一把拉住他，好久说不出话来。他也呆呆地望了我半天才说：

“你瘦了！”

“我盼你和纪儒林都盼红眼了。”

“事变来得太突然了，我在乡下听到消息就往回赶。”他拉我坐下说，“纪儒林现在还在乡下呢。”

“多咱能回来？”

“很快就会回来。我们必须马上行动起来！”

“对！这几天我心里象着火一样。”

“不要急，大敌当前，我们要沉着应战。”他一边说一边从衣兜里掏出一张布满小字的纸单来，“你看，满洲省委已经发出了《告东北民众书》，现在我们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向人民进行宣传，要彻底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揭露蒋介石反动派的卖国罪行；唤起人民的觉悟，号召全体人民起来反击日寇，不当亡国奴！”

我接过党的《告东北民众书》，一边贪婪地看着，一边听他继续讲下去：

“现在日本人在我们吉林还没有站稳脚根，冯占海的军队还在城外和日军对峙，东北各地都在响着枪声，我们必须抓紧时机进行工作。因此，党决定派你负责铁路方面的宣传工作，在吉海、吉敦、吉长三条铁路的职工中，进行抗日宣传。”

我的头从《告东北民众书》上抬了起来，全神贯注地听着党交给我的工作任务。

“宣传材料，过几天我再送来；但是你不能等待。”他又补充了一句。

“对。我要求马上就行动！”

“你要连夜把它多抄几份。”他指着《告东北民众书》说，“明天你就设法把抄好的材料送到铁路职工手里，让他们传阅。”

“我一定多抄。”

“除此之外，还要在可靠的工人当中，进行口头宣传。晚上回家的时候再抄，要尽量争取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党的政策，激发起他们的爱国热情。但是你自己一定要多加注意，不能暴露身分，要有长远的隐蔽斗争打算。”

“我知道。”

送走了老张同志，我就埋头抄写材料。第二天早晨，我怀着异常兴奋的心情，向东关车站走去。一队全副武装的日本兵从街那头走过来，挂满铁钉的皮鞋脚，重重地践踏着平静的马路；肩头上的刺刀迎着太阳直闪白光。我轻蔑地瞥视着这群野兽，心里不由想道：我们一定要和你们斗争到底，一定要把你们赶出去！

就从这一天起，我每天都在几条铁路沿线上跑。老张同志不时给我送来宣传材料。当时因为党的经费困难，宣传材料既

不能铅印,也不能油印。好多材料全靠我们动手抄写。因此,每张材料都必须送到实际生效的地方去。这时,我在铁路上已有好多熟人。吉海路上已经有了工作对象;工作起来很顺手。有时我就把材料贴在车皮上,让它沿着铁路跑到更远的地方去。

## 一台“油印机”

日寇在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纵容下，迅速地占据了沈阳、长春、吉林各大城市，并且企图一口吞下整个东三省。但是全东北的人民决不屈服，东北的爱国军民拒绝接受蒋介石的卖国指令，在外无援兵，内无弹药的情况下，纷纷树起抗日的大旗，拚死抗击日寇。使日寇在两三个月内南不能渡大凌河，北不能渡松花江。他们在几个已被占领的大城市里，虽然拼凑起一支汉奸队伍，建立了临时伪政权，组织了伪军警，但是人心不服，号令难行。在吉林，学校早已解散了；工人个个无心工作，铁路上屡出重大事故……我们党在这一段时期内，除作宣传工作外，并在青年中组织了“青年反帝大同盟”，发动外地学生回乡去做抗日宣传鼓动工作。在已经投敌的军队中，也派去党员相机组织哗变。纪儒林同志这时已被派到于深澈的队伍里去了。

为了工作方便，老张同志这时已搬到我家来往。我家住三间房，独门独院，地点也偏僻。我把东屋让给老张同志住。老张同志是吉林党的负责人，他一搬进来，我家就成了吉林党的领导机关。老张同志工作很细心，十分注意机关的安全。在一般情况下，他从来不约会外面的同志来住处谈工作或开会。他经常到蒙古旗胡同省立图书馆去，借着换书和看书的机会和同志们

接头,再约定谈话或开会的地点。当他留在住处的时候,总是把绝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写宣传材料上。他写我抄,有时他也和我一同抄。每天抄得手腕子酸痛,但数量总离需要相差很远。心里越急越觉手抄得慢,我们多么需要一台油印机啊!但是这时党的经费仍然非常困难,市面上油印机很少,价格又很贵,根本买不起。买不起,又迫切需要,怎么办呢?我们苦思了一夜,最后决定,干脆自己制造一台油印机。

天下无难事,就怕有心人。我们终于用一块光滑的木板,一块骆驼绒,一块细纱,做成了一台油印机。没有油墨辊,我们把一支粗大的黑漆文明棍(手杖)截成两截,按上能转的把手,做成油辊;没有钢板,就找一块细钢锉来代替。就这样,经过反复试验,从白纸上的一块一块小墨疙瘩开始,终于印出黑字来了,这真使人喜出望外。印刷品的质量虽然还不能令人满意,印的效率也很低,但比手抄却要快出好几倍。我们有了自己的“油印机”了!它虽然是这样简陋,象儿童玩具一样可笑,但掌握在我们手里,却成了打击日本强盗的有力武器。不久,我们又弄到一块旧钢板,老张同志的仿宋小字写得更加清晰,宣传品的质量提高了。有了这样一套非常珍贵的宣传武器,使我们在工作中享受到极大的愉快!

“油印机”使我们的工作半“机械化”了。我们的时间也比以前充裕一点儿了。空下来的时间老张同志就给我讲党的历史、党内斗争生活,有时也讲讲他个人的战斗经历。

老张同志是河南人,南京金陵大学农学系毕业。他很早便参加了革命活动,亲自经历过广州暴动和北伐战争。在北伐战争中一条腿负了伤,伤好后,党派他来到东北。一九二九年,满洲省委调他来吉林开辟党的工作,他是吉林党的最早的组织者,纪儒林就是他最先吸收入党的同志。



老张同志告诉我：吉林党的组织虽然建立不久，但是革命活动和共产主义的思想影响，却是在很早以前就有了。远在清朝末年的时候，林伯渠同志就在吉林当过“提学司”，开办“劝学所”，提倡学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反对科举制度，为民主主义革命打下了思想基础。最初来到吉林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人，是谢宗五（即尚钺同志）。他原来在南方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后因为生病讨保在外医治。病好了逃到吉林，在毓文中学教历史。吉林军阀政府发现他在学生中宣传共产主义思想，要逮捕他，他就到北满特委工作去了。从他的经历中使我想起了冯铁生老师，冯老师也是这样被军阀逼走的，冯老师如果不走，说不定也会住到我家来，同我们一起制造“油印机”，印刷宣传品呢！

## 忙 中 出 错

秋天过去了，西北风刮起来，白雪铺在街道上。松花江开始封冻了。

往年冬天，我家都把东屋空起来，不生火，可以节省些柴炭钱。今年我在东屋里安上一个小铁炉子，又把炕洞子也收拾了一下。我知道老张同志是河南人，才到东北不久，不适应东北的严寒季节，因此在条件可能的情况下，我希望能把屋子烧得暖和些。但是老张同志却不同意生炉子，和我争论得面红耳赤。争来争去，我还是把炉子安上了。每天由我把炉子点着，把炕洞子烧热，让屋里不断暖气。可是，我经常在铁路沿线上跑，我一不在家，屋里就断了烟火。母亲和妻子过来点火，他不让点；有时把火生起来，他不是不往里添柴，就是有意把火压灭了。每次我从外面一进屋，就感到屋里冷冰冰的；伸手一摸火炕，也没有一点儿热乎气。我忍不住地向他一皱眉，他却挺起腰板，把抱着的双手往下一耷拉，嘴里啧啧地说：“今天天气真好，和我们河南差不多！”嘴里虽这样说，身上却禁不住地打冷颤。我望着他那一身单薄的衣服，看着他那冷飕飕的样子，真是又难受又好笑。我只好不理他，赶忙拿柴引火，他知道拦不住我，也只得由我去干。我在这边干，他却在那边发议论，什么不能作温室里的花草，要

做高山上的青松啊；什么人需要锻炼，革命需要艰苦啊。听着听着，我望着他那薄薄的夹袍说：“锻炼也得有个限度，你现在穿着夹袍，在冷屋子里锻炼，还不锻炼出病来！”听我说完，他却嘻嘻地笑了，说：“我从来也不生病，你不信咱们就打个赌，把炉子撤下去，看我这一冬能不能过去！”真会做工作，他绕着弯要撤炉子，我才不打这个赌呢。真要把老张同志冻病了，他既不能让请医生，也不会放下工作，到那时候，岂不要急死人！从前，我记得他穿过一件新棉袍，还有一件呢子大衣，现在竟都没有了，一定是在经费非常困难的时候卖掉了。

东北的天气，一入冬就一天冷似一天，不穿棉衣根本就不行。我和妈妈商量，勉强凑了几个钱，买了二斤新棉花，用旧衣裳面子做了一件棉袄，拿给老张同志。他高高兴兴地穿上了这件“新衣”，原来的旧夹袍仍旧套在外边，乐呵呵地走到妈妈面前，用河南腔调对妈妈说道：

“大娘呵，穿上你老做的这件‘火龙衣’，热得我真要出汗了！”

妈妈看他穿得圆滚滚的，乐得对我拍着手说：“看你大哥，穿得象个老窝瓜！”

我们俩听妈妈一说，都纵声大笑。孩子见我们笑，也跟着笑起来。老张同志真的要笑出汗了。

一九三一年过去了。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辽吉两省之后，这时正向黑龙江省大举进攻。黑龙江省督军兼省长马占山自从打完了名震中外的江桥战役和三间房会战之后，这时已经退出省城齐齐哈尔，在海伦与盘据在哈尔滨的汉奸张景惠勾勾搭搭，极有放弃抗战，附逆投敌的趋势。在这危及存亡的关头，吉林市党组织为了激励人心，组织敌后抗日运动，准备在一九三二年“二七惨案”纪念日前后，掀起一个抗日宣传高潮。为了赶制宣

传材料，老张同志和我从早到晚不停手。这时候已经快过旧历年了，家家户户都在“忙年”。他们忙，我们更忙；老张写，我印，流水作业，忙得真心盛。但是忙中出错，险些出了事情。

一天，我们印完了一批宣传材料，夜已经很深，街上早已“戒严”，当天是送不出去了。老张同志和我就把它卷好，放在一截洋铁炉筒子里，挂在装破烂东西的小棚子里，等明早送走。

紧张地劳动了一天，我的头刚一挨枕头就呼呼地睡着了。睁开眼睛一看，天色已经微明，老张同志早已起来，正凑在窗前借着晨曦看一份宣传材料呢。我忙翻身起来穿好衣服，就到小棚子里去取宣传材料，准备立即送出去。开了小棚子门，抬头一看，我立刻愣住了：放宣传材料的炉筒子竟不翼而飞！我急忙四下寻找，哪里还有踪影？我急忙转身奔回屋里告诉老张同志。老张同志大吃一惊，从炕上跳下来，推开门就往小棚子跑。我忙抓起棉袄，撵着给他披上。我们俩在小棚子里又察看了一阵，他忽然一拍大腿，非常懊恼地说：

“唉，怨我，不该粗心大意！”

“怎么能怨你呢！是我放的……”

“可是我应该想到，现在年关傍近，正是好闹小偷的时候！”

“谁能想到他会偷破炉筒子呢！”

“小偷进来了，总不能空着手走。”他迅速地瞥视一下小棚子里的破烂东西说，“这小屋里除了炉筒子，还能拿什么呢？两截炉筒子也可以换顿饭吃呢。”

“我不把它放在炉筒子里就好了！”

“好了，现在不是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得赶快作应变的准备。”

“怎么准备？”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突然的情况，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只是愣愣地站在那里。

“走，进屋！”他拉我一同回到屋里，关上门。他告诉我和他一同行动，把文件、宣传材料、蜡纸、油墨、“油印机”都搜集在一起，又叫我找来一个包袱皮，包成一个扁平的包袱。他指着包袱说：

“你能不能马上在院子外边找个隐蔽的地方，把它藏起来？他稍微又想了一下，说，“地方不要太远，但是要保险。”

我这时已经明白他说的“应变准备”是什么意思了。这类问题平常本来早就谈到过，但事情突然一来我却慌了手脚。这时我忽然想起一个地方来，告诉了他。

太阳还没出来，麻雀刚刚醒来在树枝上叫，西北风吹着路上的浮雪，冷清清的没有行人。我夹着包袱，走到铁路线前边，一堆堆旧铁道枕木摆得高与人齐。我站在那里慎重地向四周仔细地看了看，晨光微曦看不见一个人影，听不见一点声音。我把扁平包袱慢慢地伸进枕木底下，枕木上挂着一层白霜，边沿上堆着白雪。我深恐碰出痕迹来，小心翼翼地往里探，一直把整个手臂都探进去，才松开手，又仔细观察了一下，没有留下任何印记。刚要走开，忽然发现地面上留下一溜脚印，真是大意，来时怎么忘记带把笤帚来！只好又绕着其他几堆枕木走了一圈，布下一个“迷魂阵”，然后绕道回家。

到家我把藏放的地点和经过告诉了老张同志，他才松了一口气说：

“今天我们放假，休息一天，看看动静吧！”

“你对这件事情还有什么估计？”我坐在他旁边问。

“炉筒子肯定是叫小偷拿走了。”他想了想说，“如果小偷是个识字的坏人，或者是宣传材料从炉筒子里掉出来被坏人抬了去，那么昨天晚上或者今早上，敌人也就来搜捕了。现在天已经大亮，没有动静，侥幸躲过的希望就大了些。因为心向日本人的汉

奸总是少数的。”

“对。如果我们的传单真的从炉筒子里掉出来，被好人拣去，还许替我们散发出去了呢？”

“这种可能也会有。但是，我们还是应该从最坏的方面作准备。今天我们花上一天工夫观察动静，如果没有事，明天就恢复工作。‘二七’快到了，下面等着宣传材料用，我们不能多耽搁。”

就这样，老张同志和我坐等了一天，一天的时间好不容易熬了过去。第二天清早，一起床，我就去把包袱取回来。我们的工作又开始了。老张同志说要把失去的材料在旧年前补出来，我们的工作就更加紧张起来。老张同志有时白天出去布置工作，晚上回来就开夜车，眼睛熬红了，也不住手，买一瓶“大学眼药”，不时地滴几滴。

除夕的晚上，我和母亲、妻子张罗着包饺子。老张同志一个人伏在东屋的桌子上刻钢板，灯光暗，蜡纸字小，刻起来非常吃力，他目力又不好，佝偻着腰，眼睛几乎紧贴在钢板上。我看他太吃力，就过去劝阻说：

“今天是大三十晚上，休息一下吧！咱们跟妈妈一起包饺子去。”

他挺起了腰板，两只胳膊往上一举，伸了个腰说：“再有一张就完了，你不还等着印吗？”

“吃完饺子再说吧！”

“误不了吃饺子，我管保比你吃得多。”他说完了要笑，却禁不住打了个呵欠，眼角上滚下了泪水。他忙摘下近视镜擦眼睛。

我见他两眼布满了红丝，眼球好象越发往外凸出了。我拿起桌上的“大学眼药”瓶来，替他滴了几下。他把头靠在椅背上，

伸手一推我说：

“你快去包饺子吧，我等着吃现成的！”

我知道他不写完是不能放手的。便在火炉里加了几铲煤，又回西屋包饺子。

饺子包完了，窗外接连着响起了大大小小的鞭炮声。远近亮起一片灯光，映得窗上红光闪闪。妻子正在煮饺子，堂屋里热气蒸腾，孩子早换上了新衣服。我忙推开东屋门，从桌上拉起老张同志说：

“别写了，给妈妈拜年去吧！”

“好的，好的。”

老张同志笑呵呵地从桌前站起来，理了理衣服，跟我一同走进西屋。

西屋里摆好了成盘成碗的饺子，妈妈正往桌上摆筷子。老张同志一进屋，站在门口就向妈妈作了个揖，说：

“大娘呵，你老过年好！给你老拜个年吧。”说完，他笑嘻嘻地就要跪下磕头。

妈妈忙上前拉住他说：“他张大哥，免了吧，免了吧，如今不讲这个了。”

妈妈说得我们大家都笑起来。正这时候，男孩子伯坝拿着三个爆竹跑进来找香头，我问是哪来的，他笑嘻嘻地指着老张同志说：

“张大伯给买的。”

“让他放去吧！”妈妈找着一根香递给孩子说，“去年没放，年过得不旺，今年过个吉利年！”

我们又笑起来，笑声未了，院里爆竹就响起来，声音不大，但很清脆。我们全家就在爆竹声中坐在一起吃上了除夕的饺子。

## 力难胜任的重担

“二七”纪念日过去以后，传来了日寇要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的消息。不久，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公开投敌（后又反正），溥仪进入长春。一九三二年三月九日，在日寇编导下的伪“满洲国”宣告成立。

这时候，满洲省委派军委老赵同志来吉林，研究组织抗日武装问题。老张同志听说要在吉林农村里组织抗日武装，非常兴奋，每天和老赵同志在一起计议。老赵是刚从苏联回国的同志，工作热情很高，在来吉林途中得了感冒，仍旧坚持工作，熬了几天，病加重了，感冒变成肺炎，躺在炕上发高烧，没钱治病。我和老张同志急得打转转。妈妈看他吃不下饭，从邻居借来一斤白面，给他做碗面汤吃。这时在高大夫医院（基督教医院）有一个姓张的护士，是党的积极分子，通过她的关系，想了许多办法，才把老赵同志送去住院。

老赵病好出院以后，组织抗日武装的问题，也已酝酿成熟。他又和老张同志最后研究了一次，就离开吉林，回哈尔滨去了。送老赵同志走后的第二天早晨，我象每天一样，刚拿起伪装好的宣传材料，要送走，老张同志忽然对我说：

“今天先不要出去了，咱们把以后的工作安排一下。”



我知道他要谈组织武装的问题，这正是我心里久已盼望的事情。便急忙放下宣传材料，听他说下去。

“关于组织武装的问题，省委已经决定从农村开始，据点决定设在磐石县的明城镇蛤蟆河子。”

“那么远！”我不由得脱口说了一句。

“也不算远，坐火车一天就能到。决定设在那里，主要是因为那里有群众基础。你知道吗？磐石在几年以前就有了党的活动，早在一九三〇年五月就成立了县委！”

“那么早？”

“所以说有基础哇！特别是蛤蟆河子、玻璃河套、二十家子、拐子炕那一带地方，群众非常好，他们大多数是朝鲜族人，阶级觉悟很高，对日本帝国主义恨入骨髓。现在那里已经有了几个党员，也组织了农民协会，只要我们发动得好，很快就会武装起来。”

“谁去发动呢？”我迫不及待地问。

“我去。”老张同志兴奋地说，“省委已经决定把磐石县委改组为中心县委，由我负责。”

“这样说你要长期住在那里了？”我心里一急，不由得站起来直盯住他说。

“期限不一定。”

“那么我呢？我能不能和你一同去？”

“不能。”他坚决地摇摇头说，“党决定你要继续留在这里，担负重要的工作。”

“重要的工作？”听见这几个字儿，我已顾不得再提要求，只是满腹疑问地望着他。

“党已经决定，在我离开之后，由你负责领导支部工作。”

“什么？我负责……领导！”我惊讶得几乎跳起来，一把拉

住他说，“这怎么行，领导？我连想都没想过。”

“从现在起你就应该想了，而且要仔细地想。”他非常冷静地说。

“不行啊。”我急得连连摆着手说，“一点经验也没有，那得怎么领导啊！”

“经验是从实践当中来的，我还可以把我的经验告诉你。”

“可是，你眼看就要走了！”

“我们还可以常见面，你可以自己去找我，也可以叫别人去。省委已经决定，吉林支部的工作由磐石中心县委领导；咱们虽然分在两地，但，工作还是要不断联系的。”

“那总不如你在这里好。有你在，我时时都有依靠；而且工作也具体呀。”

“要依靠党，依靠群众。你总不能做一辈子具体工作啊！一个党员，应该是党让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能畏缩不前。”

“可现在这是领导工作啊！”

“党相信你，才让你做领导工作。这是党的决定。”

“党的决定！”我望着老张同志那种不常见的严肃面孔，知道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心一镇静，问题也接着涌出来了：我得怎样开始工作？以至工作任务，工作方法，工作对象……等等，都一股脑儿向老张同志提出来。老张同志一直是有问必答，不厌其烦地向我反复讲解。他告诉了我吉林市党团组织情况，党员和团员主要是在各个学校里：一中、女师、毓文、文光等校已都有了党团员，从前，这些党团员都按指定时间、地点和老张同志会面。老张同志告诉我，最近几天内他就负责把关系替我接好，由我按照过去的规定和他们单独会面。为了保证安全，老张同志特别嘱咐我要严格遵守地下工作的纪律，没有特殊情况决不召集开会，一定要用单线领导的方法和个别同志发生联系。我的

住处今后不仅是支部机关所在地,而且还要成为中心县委和省委的联络站,所以更要注意机关的安全。今后支部的任务,主要有三项:第一是继续宣传抗日;第二要积极发展党团组织,再经过一段努力,可以在学校中先建立党团小组;铁路方面,过去只偏重于搞宣传活动,今后应该吸收经过考验的进步职工参加党、团组织。吉林工业不发达,铁路是工人最集中的地方,要加强工作;第三,组织武装还有另外一个办法,就是组织投敌的伪军反正,他们当中有一些是被迫投降的,不甘心为日寇效力,只要我们的工作做得好,就有可能反正。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短时间内也不容易有效果,必须经常注意挑选勇敢、机智的党员,慎重地派到伪军当中去。除此以外,等磐石游击队建立起来,还要负责物资供应和通讯联络工作。

所有这一切情况,老张同志都不让我用笔记,更不许我开人名单,只能依靠大脑。我只好把激动的心情尽量平静下来,用力强记,有不清楚的地方就向他问清楚。几天的工夫过去了,应记的已经记住,应接的关系也都接好。老张同志决定要走了。

妈妈虽然不知道老张同志到乡下去的具体任务,但是却知道老张同志是为打鬼子、为穷人过好日子而奔波。这时,妈妈领着妻子已把老张同志的行李和衣服都拆洗好了。临走的那天早晨,妈妈特为炒了一盘鸡蛋,给老张同志饯行。吃完饭,老张同志辞别了妈妈,我送他出了大门,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贴在我耳边上悄悄地说:

“维民同志,大敌当前,多加努力!有什么问题,就去找我。”

我只顾点头,说不出话来,但觉鼻子一酸,泪水在眼圈里转,强忍住了内心的难过。老张同志走远了,但他的话却一直留在我耳边:“大敌当前,多加努力!”这声音越来越响,使我立刻振

奋起来。

老张同志走后，我立即按照他的指示工作起来。每天到约定地点和党、团员谈话，布置工作任务，抓宣传，抓发展组织，同时还要发现可以派到伪军里去的同志。时间一天天过去，我越来越觉得工作头绪乱，精神负担重，每天躺在炕上，觉也睡不好。伪军中已经派去了一个叫张春荣的同志，是一师的学生，工作很积极，觉悟也很高。但是年纪轻，经验差些，能否完成这样复杂的任务呢？铁路方面也开始了建党的工作，我的老同学关芝忱首先参加了党，从他开始，接连吸收了几个党员。在学校中，党员也有了发展，团员发展得更快些。但是新参加的党、团员，质量到底怎么样呢？我心中总感到不踏实。最近和两个进步的中学教员谈过话，有一位先生竟向我大谈起唯心论和唯物论的哲学来，这类书我读的很少，弄得我无词以对。回来后，发个狠心，想埋下头去好好读几本书；但一坐下来，心里总象有一大堆事情似的，坐也坐不住。想把工作效率提高些，又觉得无从入手，得怎么办呢？长此下去，工作岂不要出毛病？越想心里越没底，于是，便决定去磐石蛤蟆河子，找老张同志。

## 磨房遇险

蛤蟆河子是个不大的村落，居民大多数是朝鲜族人。绿油油的稻田围绕着一簇簇朝鲜式的小草房，弯弯曲曲的田埂形成了自然的小径。当我顺着小径走进村口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了。几个朝鲜族小孩正在稻田边抓蛤蟆，大大小小的蛤蟆在水里直蹦，不怪地名叫蛤蟆河子。这时，一条狗从村口里跑出来，后面紧跟着一个中年汉子，穿一身破旧的灰军装，大敞着怀，一条破皮带斜挎在肩膀上，斜着眼睛紧看我。我心里一动，尽量保持坦然的态度，一直从村口走进去，按照老张同志预先告诉我的接头地点，我找到了权光的家。权光没在家，老张同志正和几个朝鲜族农民谈话。他穿着一身农民的短裤褂，脸比从前黑了，瘦了，但精力还很旺盛。他一看见我，几步就扑过来，我俩两只手握在一起的时候，我感到他手掌上生出了硬帮帮的老茧。

“怎么来的？”他热情地望着我问，“路上好走不？”

“从明城走来的。”

“是中午那趟车吗？走的好快哟！”

“我恨不立时就见到你。”

“出了什么事情吗？”

“没有。”我笑着摇摇头说，“只是想快点儿和你见面。”

“真是个急性子！”他笑着拍了我一巴掌，回头对那几个农民说，“咱们今天就谈到这儿吧！抗债的斗争既然开了头，就要和老申家斗到底！农会要抓紧这个斗争。”

农民们答应着走了。老张同志送走他们以后，就兴奋地对我说：

“农民发动起来了，现在已经和大地主老申家展开了斗争。老申家是这一带的土皇上，有钱、有势、有枪杆子，掌握着好几十大排武装。斗争一开始就非常尖锐，最近老申家的走狗常在这一带活动，可能是闻着点什么风了。”

老张同志这一说，我忽然想起在村口遇见那个穿旧军装的中年汉子，便告诉了他。他一听，眉头一皱说：

“这正是大排上的走狗，我们倒要多加小心了。”他向四周看了看说，“走，我们到磨房里去！”

他领我进了磨房，又出去找到权光的爱人，让她在院外放哨。

磨房是一间低低的草棚子，棚子里堆放着一些干草和几件破烂农具。一张破板门，快掉了，后窗也只剩了窗框。夕阳的余晖从窗外斜照进来，热得人直出汗。老张同志又把板门关上了，门窗间的对流空气被割断，小棚子里就象蒸笼一样闷热。

“怎么样，暖和吧？”老张同志和我并坐在草堆上，笑着擦了一把汗说。

“见着你，心里热；现在是里外一齐热了。”我一抬手把头上的汗水淋在地下说。

“这成了内外夹攻了！”老张同志大笑着说，“分手日子不多，可就象离开一两年一样，快谈谈吧！支部工作开展得怎么样？很好吧？”

“开头还好。”

“现在呢？”

“越来越觉得乱起来了，心里一锅粥，脑子里一盆浆子，手里是一团乱线，总理不出个头绪来。”

“你可真会形容。”老张同志又笑起来说，“那就快唠唠吧，一项一项地来！”

于是我就把已经做的工作从头汇报了一下。我刚说完，老张同志就笑嘻嘻地一拍腿说：

“你这怎么说是一锅粥？是一碗肉。几项工作都做得不错嘛！就是我在那里也不过如此啊！”

“可是我越来越觉得乱。最近这几天和两个知识分子谈话，谈得我直出汗，比在这屋里出的还猛。”

“出汗就擦呗！”老张同志就势擦了一下汗说，“做工作还有不出汗的？出了汗就觉得轻松了。”

“可是，我却越来越觉得担子重了。近来连觉也睡不好，怕出错，给党的事业造成损失。我真盼望你能够回去一次，哪怕是短时间也好。”

“回去是可以回去一次的，只是最近……”

我正聚精会神地盼他说下去，他却忽然把嘴闭上了，头一歪，眼睛迅速地投向屋门。在这同时，我也听见有人向磨房跑来。老张同志一拉我，猛从草堆上跳下来，向门旁跑去。我也紧跟着跑到门旁边，站在老张同志一起。门，猛一下被推开了，一个黑裙白衣的朝鲜族妇女象一阵风似地跑进来。

“老张，不好了！大排兵摸上来了！”她的汉语说得非常流利。

“几个？”老张同志一抬手把门推上。

“七、八个，端着枪一直奔咱们这边来了。”

“快走！”老张同志一指后窗口向她说，“往西走，上山，你领路。”

她应了一声，便敏捷地跳出窗口，我也紧跟着跳了出去。回头一看，老张同志正趴在门缝上往外看动静。这时，她又轻声催了一句：

“快走！别看了。”

语音未落，老张同志早跳了出来说：“快！很近了！”

我刚一迈步，他又一指我穿的白裤子说：“脱下来！目标太明显了。”

我只穿着一条裤衩，跟着前边这位朝鲜族妇女向前狂奔，老张同志紧紧跟在我身后。

穿过稻田，是一片高粱地。北方季节晚，六、七月的高粱，刚刚没过膝盖，藏不住全身，只好奋力往前奔跑。我用足力气，跑得张口喘，也撵不上前边的妇女，正纳闷间，忽听老张同志在身后告诉我说：

“顺垄沟跑！顺垄沟跑！”

我低头一看，才发现自己一直是骑着垄台跑的，没膝的高粱在两腿中间蹭过去，怪不得跑得这么吃力！

出了高粱地，迎面就是一座山，山下光秃秃的，从半山腰往上才是一片茂密的树林子。我们几个直奔山上，奋力穿过坎坷的小径、崎岖的山路，一口气跑到树林里，累得一屁股坐下，再也不想起来了。从树林缝隙往外看，影影绰绰地看见几个大排兵，正在磨房后边四处搜寻，显然是没摸到我们的踪迹。

“让这帮蠢货在稻田里找吧！连个脚印他也找不到。”老张同志靠在一棵大树上说。这时，我看了一眼仍在向林外探望的朝鲜族妇女，老张告诉我，才知道她就是权光的爱人。过了一会儿，她回过头来说：“他们走了，回去了！”

“他们走，我们不走，就在这里过夜吧！”老张同志说着看看我，又笑着添了一句，“这里总比磨房好得多，大树当被，青草当



褥子，你在城里上哪找这样好的地方去！”

“这里晚上凉，我回去取两件棉衣来。”权光爱人站起来说，“再拿些吃的来。”

“多加小心。”老张同志嘱咐她说。

权光爱人自信地点点头，又向我注视了一下，抿嘴微笑着向我腿上指了指，还没等我弄清楚是什么意思，她已经轻捷地走出林子了。我低头一看，才发现大腿里面划了许多小伤口，有的还正往外流血丝呢。

真是城里人，怎能骑着垄台跑呢？”老张同志笑着说。

“经一事，长一智，再跑就好了。”

“再也跑不多久了。”老张同志意味深长地说，“现在我们只有两支小枪，等农民都发动起来以后，我们就可以搞到更多的枪。有了枪，有了队伍，区区几个大排兵何足道哉！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把他们都发动起来。你们在城里发动工人、知识分子；我们在这里发动农民；两只铁拳，一齐打下，日本鬼子怎能招架？”

两只铁拳，一齐打下！老张同志说得多好。可是城里那只“铁拳”，得怎样才能组织得更有力呢？于是我又向老张同志提出要求，希望他能够回去一次。老张同志答应过些日子一定回去看看。

太阳已经落山。权光爱人送来几件棉衣，还提来一罐子苞米楂子水饭，里边还有几个大米粒。我们饱餐了一顿。

天色完全黑下来，参天的树木枝叶遮住了满天星斗，草丛里散发出清香的湿气，阵阵凉风从山上吹下来，吹散了一天的闷热，吹得人心神舒畅；如果没有蚊虫的不断骚扰，这真是一个好地方。我和老张同志躺在地上，谈哪谈，一直谈到公鸡在村里叫，小鸟在树上跳，他才送我下山，绕道回了吉林。

## 我们需要枪

高粱抽穗的时候，老张同志果然回到了吉林。他全面地检查和整顿了吉林党的工作，分别和每个党员见了面，加强了党对团的领导。他日夜奔忙了几天，很兴奋。临走的时候，我问他：

“得多咱才能把武装队伍组织起来呢？”

“队伍已经形成，广大的农民就是武装队伍的基础。现在只是缺少枪支弹药。”

“得从哪里来？”

“从敌人手里。”老张同志充满信心地说，“现在正在等待时机，只要时机一到，我们就立刻动手，你听好消息吧！”

一九三二年秋末冬初的时候，老张同志突然又来到我家。他比从前更瘦了些，但精神却比任何时候都旺盛。一见面，他就紧握住我的手，凑在我耳边上说：

“农民武装运动成功了，游击队已经上山了！”

虽然是轻轻的一句话，却象洪钟一样响在我的耳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革命的烈火燃烧起来了！心里止不住的兴奋，我不觉狂喜地问他道：

“搞到多少支枪？”

他看了看站在旁边的母亲和妻子说：“说来话长，晚上详细谈吧！”

吃完晚饭，已经是星光满天了。我们俩搬了两个小凳子，坐在院里，他一边喝着水，一边向我谈起来：

“你不是知道老申家吗？这是一家不杀穷人不富的大地主。蛤蟆河子一带的土地，是农民一镢头一镢头刨出来的，但是却都换上了老申家的地契。结果，农民走道是老申家的路，喝水是老申家的井，如果空气能独吞的话，也会变成老申家的了。老地主的大儿子是磐石县立中学的校长，磐石县的官僚汉奸都是他的至亲好友，帮他组织大排武装，供给他枪支弹药。自从有了大排，他更是一手遮住了半边天，为所欲为了。”

“这样的地主，我见过。”老张同志的话，一下子引起了我的回忆，我忙说，“两家子小学的校董‘滕三爷’就是这样的土皇上。”

“天下的老鸦一般黑呀！”老张同志喝了一大口水说，“我到那里以后，就发动农民和他展开斗争。从抗债开始，斗争一直没有断，到秋天，斗争形成了高潮。我上次来不是说等待时机吗？时机成熟了！”

“是不是发动农民抗租、抗粮？”

“对。中心县委对这次抗租斗争作了决定，普遍发动农民，农民一下子就起来了，农民提出缓交一年租粮的要求，老申家态度非常强硬，不肯让步，并且声言要强抢农民的粮。党马上召开了农会积极分子会议，会议决定：第一，连夜运粮上山，运不走的就埋起来；第二，把青年农民组织起来，以‘长苗子’为武器，编成游击队，保护粮食；第三，组织农民进一步开展抗租、抗债、分粮、吃大户（即地主）的斗争。

“农民有了党的领导，行动真是快得惊人。只一夜的工夫，大部分粮食都上了山，新组成的游击队也上了山。游击队虽然只有两支手枪，其余的都是长苗子，但是农民的革命劲头真足，那个威武劲呀，就象扛着机关枪一样。

“老申家的走狗在天没亮的时候发现农民往村外运粮，立刻报告了老申家，狗腿子和大排兵马上就出动了，全村翻粮，直翻得人喊马嘶，鸡飞狗叫。可是结果呢，翻出的粮食还不够一个毛驴驮的。

“老申家恼羞成怒，要抓领头人，可是人早就跑没影了。

“我们在山上隐蔽着，听说老申家要抓人，大家心里都气得鼓鼓的。气得年轻小伙子们就要回去和他们拚；年纪大些的就说两手攥空拳，拚不得。是呀，重要的还是武器问题，没有镢头怎能砸碎石块？正在这时，忽然有一个同志想出了一个好主意来……”

“什么好主意？”听到这里，我忍不住插了一句。

“你去的时候，还记得从明城到蛤蟆河子走过一条公路吧？就在那条公路上，经常有一小队伪军守备队来往‘查路’，可是他们这些蠢材，能查出个什么来，一个个吊二郎当的，不过是白磨鞋底儿罢了。

“这群兵，虽然是一群邈邈兵，但是枪，却都是一色崭新的‘三八大盖’。出主意这个同志正是看上了那些枪。他提议，我们埋伏在公路两旁，给这群邈邈兵一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缴他们的械！这个同志一提议，大家伙都拍手赞成。我又动员了一下，真是一个个摩拳擦掌，高兴得闭不上嘴。

“第二天，天没亮，我们就下了山。不走大路，钻高粱地，人不知鬼不觉地来到公路旁。你还记得不？那条公路上不是有座大桥吗？我们就埋伏在桥头不远的高粱地里，等呀等，从太阳出

来一直等到贴晌，这群邈邈兵才从桥脊梁上冒出头来。这时候，火热的太阳从头顶上直照下来，高粱地里不透风，闷得我们个个出了一身透汗。可是这群邈邈兵竟都大背着枪，袒胸露臂地往前走，走的那个慢劲儿呀，真象一条才蜕完皮的懒蛇。这时，我们的心紧跳起来，盼他们能快点儿走哇，只要走到我们的面前，那就……喝！可倒好，他们不但不快走，反倒站下、散开、坐在桥头上休息起来了。有的摘下帽子扇风，有的抽烟，有的忙着吃从兜里掏出来的什么东西，一边吃一边往地下甩，好哇，吃起香瓜来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有的同志耐不住性子了，就要趁机冲过去。这倒真是个好机会，怎么办呢？冲过去吗，桥头离开我们的伏击地还有四五十米远，只要往前一冲，被他们发现，就可能打响；从高粱地里移动过去呢？人多，又是横垄沟，必然要出响动。最好的办法还是等待。但是等待却最难挨，那滋味真象把一块熟肉摆在饥肠辘辘的人的眼前似的，极想吃，又不能马上动筷，只好两眼盯住，看着、盼着，每一分钟都好象无限长。盼呀盼，好不容易盼得他们站起来了，又变成一条往前移动的懒蛇了。这时，我们手里的家伙早就擦出汗来啦，大家的眼睛随着他们转，老洋炮也随着他们动，三十米、二十米、十米、五米，到眼前来了，我刚把小枪一举，同志们就象弦上的箭一样，腾腾地从高粱地里猛窜出去：

“‘不许动！举手！’震耳的喊声响起来；老洋炮，红缨枪，铁锹……几十件家伙一齐对准了这群被吓傻了的呆鸟。

“敌人万没料到会在路上遇见这样一股出水蛟龙。他们可倒真听话，立刻都举起手来，还有好多扑哧扑哧跪在地上喊饶命的。

“敌人的枪一支支被摘下来了，子弹袋一条条被解下来了；好多同志都有了双料武器。挨排一数，一共十五个俘虏，十五支

‘三八大盖’枪。

“枪拿过来了，俘虏怎么办呢？既不能押着走，更不能象敌人那样残酷杀戮。于是就由我向他们宣传了一番抗日道理，放他们走了。

“他们走，我们也走，一路上同志们高兴得直想唱，怎能不高兴呢？我们有了枪，我们成为一支名副其实的游击队了！”

老张同志讲完了这段英勇的事迹，我乐得嘴也闭不上，不由得说：

“好，干得真漂亮！这回可以和大排兵干一场了！”

“干是要干的。我从这回去就准备袭击大排，缴他们的械。”

“再缴了大排的械，我们的力量就更大了！”

“力量是大了，但是以后的问题也不简单哪！”老张同志的脸色逐渐严肃起来，他稍稍沉思一下说，“在我们还没有枪的时候，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从敌人手里把枪夺过来。现在枪有了，正式的游击队诞生了，同志们都非常高兴，战斗热情特别高，恨不能一口把大排队吃掉，然后就去打伪军、打日本鬼子。这都是非常好的条件，但是作为领导者，就应该考虑得更多些，更远些。自从我们打击了老申家，缴了守备队的枪以后，老申家的大排和伪军、日本鬼子已经完全勾结在一起了，正在蠢蠢欲动，伺机报复。另外，还有一个恼人的土匪问题：在磐石、桦甸、伊通、辉南一带，到处都是土匪，大帮小股，各报山头；他们除了抢劫之外，还有时彼此吞并，就象大鱼吃小鱼一样。对他们同类尚且如此，对其他方面的队伍，就更是得机会就下手了。我们的游击队才建立起来，枪才到手，人刚上山，自然是他们眼中的对象。这样一来，我们的队伍就有腹背受敌的危险了。”

听老张同志这一讲，我也感到我们的处境确实艰难，得怎样进一步打开这个局面呢？我默默地望着老张同志，老张同志也

在默默地想着。这时，屋里的钟响了十二下，已经是午夜的分了。

“有困难哪！”停了一会儿，老张同志又象自言自语似地说：“我们一定要摆脱这个困难的局面。我现在想……”他望了望我：“最好是先转移一个地方，建立一个合适的根据地，然后一边扩大队伍，一边练兵。”

“转移到什么地方去好呢？”我也和他一起思索起来。

“我初步想到玻璃河套去，那里已经有了我们自己的人，地势又好，敌人一时也摸不到，等他们摸到了，我们的力量也就成长起来了；那时候再狠狠地打击敌人。”

“那么，要在什么时候转移呢？”

“事不宜迟，我想回去就行动，先缴大排的械，然后就转移。”他看了看我又补充一句，“等我们转移到新地点以后，就派人来和你联系。”

“你儿时回去？”我意识到他不会在吉林多耽搁了。

“咱们把吉林的工作安排一下，两天后我就走。”

说着话，屋里又传出了一下钟声，已经是后半夜，我们才回屋睡下。

两天后，老张同志离开了吉林。这两天的工夫，他找了好多人谈话，一刻没得闲，我只担心他的身体，谁知他却有永远用不完的精力，就象源源的泉水一样，永不枯竭。

大约就在老张同志走后三、四天的一个傍晚，我从省立图书馆回到家里，一进屋，妈妈就兴高采烈地和我说：

“维民，你快看看谁来了！”

天色刚近黄昏，屋里有些暗，又没点灯，我正要细看是谁，一个人影已经扑了过来，一只大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我不用问已经恍惚觉出好象是纪儒林同志，不由脱口喊道：

“儒林，是你！”

“正是我，没想到我会来吧？”

听到自己同志的声音，我心里只觉得发热。

“怎么没想到，只是没预料你会今天来，事先也不捎个信儿。”

“来不及写信，接到任务我就往回赶！”

“什么任务？是不是和我在一起？”

“不是，可是和你不远。”

“走，我们到东屋去唠！”我边说着，边拉着他从西屋来到东屋，还没坐定，就接着话头唠开了：

“我这次是从省委来。”

“你不是在部队上吗？”

“在部队工作不久，就调回省委，这次省委又派我回来，到老张同志的游击队去。”

“哎呀，老张同志刚走三、四天！”我一拍大腿说，“他要知道你来，一定会等你。”

“他回游击队了？”

“正是。他说队伍要转移……”

“转移到哪里？”

“可能是玻璃河套。”

“啊呀，那我得快去！”他猛地站起来了。

“你急什么哪？”我忙拉他坐下，“怎么急也不能今天晚上就走啊！”

“得走。要不快去，他转移个新地方，我怎么找呢？”

“那就先在这里工作。我还想和老张同志谈，把你留下，我实在力不胜任。”

“不行。”纪儒林同志紧摇着头说，“第一，省委的决定不能变



更：第二……”他笑着不往下说了。

“不要硬编理由了。”我也笑着拍了他一下子。

“不是编理由，你不知道我的心情。”他顿了一下，忽然变得严肃起来：“我很愿意和你在一起工作，吉林也是个熟地方，只是我心里多么想拿起枪杆子，正面打击敌人哪！眼看着日本强盗脚踩着我们的江山横行，真恨得难以忍受！在伪军里工作的时候，整天听着鬼子、汉奸们喊叫，心里恨极了，但是又必须忍耐。好不容易忍耐到工作有了基础，再努一把力就可以置鬼子和汉奸于死地的时候，却又被敌人注意上了。这样省委才调我出来。很久以来，我的气憋在心里，坚决要求到游击队上来。现在能够亲眼看见敌人在我的枪声中倒下去了，我怎么能放弃呢！”纪儒林同志越说越激动起来。

我默默地听着纪儒林同志的话，也默默地在想：他这种感情我是完全理解的，象这样的想法，我又何曾没有呢？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都会有！当强盗冲进你的屋里，当野兽撞进你的院里，毁了你的理想，毁了你的生活的时候，你怎能不盼望自己的手里立刻拿起一杆枪，一下子射中他们的胸膛呢！是的，中国人民不好战，也从来没有侵略过别人；但是，一旦有人闯到中国的国土上来纵火的时候，这火就一定要焚毁它自己！

于是，我不再留纪儒林同志。当夜我俩足足长谈了一宿，第二天清早，我就送他踏上了征途。

## 杨靖宇同志来了

正当我盼望听到游击队消息的时候,老张同志又回来了,和他同时来的还有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年人,他身穿青布棉袍,外罩青色马褂,八字胡下,饱经忧患的皱纹中露出温和的笑容。蓦地看来,似乎并不相识,细一辨认,才看出是磐石跑省委的交通员老刘同志。他从前曾到我家来过一次。那时他完全是老农民的打扮,现在不但换了长袍马褂,而且还留起了八字胡,很象一个商人。

他们一进屋,身子还没坐稳,就问我上哈尔滨去的火车时间。我见他们行色这样匆忙,急问发生了什么事情,老张便约略地向我讲了下面的情况:

原来老张同志回到蛤蟆河子以后,就在一个夜晚,偷袭了老申家的大排兵,缴了他们的全部枪支弹药,随后即将游击队转移至玻璃河套。原想在这里整训和扩大队伍,谁知这里成帮结伙的山林队(土匪)也非常多,我们初到,只打抗日旗帜,没有山头字号,不抢、不劫,显然不是他们同类。于是,他们就都瞪起眼睛,互相串联,想要一下吃掉我们。

这时,在这一带有一个报号“常占”的山林队,头目常占,是个老土匪,为人老奸巨猾,有政治野心,“九一八”事变后,竟也打

起抗日旗号来,旗号是空的,他是想借抗日为名扩大自己的力量。我们一到那里,他和其它山林队的态度完全相反,有意地对我们表示好感。当时我们虽然也探出了他的一些底细,但是一方面迫于咄咄逼人的形势,另一方面也想争取、改造他变成真正的抗日队伍。因此,在几次接触以后,我们游击队就和他暂时合作了。合作的条件是:枪口只能对向日寇、伪军、汉奸和恶霸地主,决不许扰害老百姓。由老张同志担任政治委员,常占任队长,我们的一个叫孟杰民的干部任副队长。合作后的队伍有七十多人,七十多条枪,力量超过了附近的任何山林队。外面的形势稳定下来了,但是内部斗争却一天比一天尖锐。我们逐渐发现,常占不只不是真心抗日,而且还脚踩两只船,暗地和伪军、汉奸保持着联系,这样的投机分子,根本就不可能争取到抗日战线上来,于是我们就尽量争取下边的人。但是和我们一样,常占和我们合作的用意也是要争取我们的人,扩大他的力量。于是两方面的矛盾就越来越明显化,现在已经成了纸里的火,很快就要烧透亮了。

形势逼人,今后得怎么办?老张同志感到有必要亲自到省委去汇报这复杂的情况,请求指示。游击队的工作暂时交给孟杰民和权光两同志负责。

我一听情况确实紧急,留他们草草地吃了一顿饭,就送他们上了火车。

四、五天后的傍晚,老刘同志忽然一个人来到我家,我忙问他老张同志在哪。他说:

“老张同志留在省委工作了。”

我一愣神说:“那游击队的事情呢……”

“游击队的事情省委另外派人来解决。”老刘同志微微一笑说。

“谁？在哪呢？”

“杨靖宇同志。”他把声音放得低低地说，“现在他在车站前边的旅馆里等你。是一位负责同志，这次是代表满洲省委来视察工作的。”

杨靖宇同志我没见过，但是听老刘说是负责同志，我的心高兴得直跳，解决问题的人来了！

我急忙穿上衣服，跟着老刘同志就向外走，恨不得一步就跨进旅馆。

到了旅馆，进了狭小的房间，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商人打扮的中年人，高身材，高鼻梁，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热情地望着我，迎着我不切地点了点头。老刘同志忙指着他高声地说：

“这是张掌柜的，到吉林来办货，您多关照！”他一边说一边带上了门。

“不要客气。”我一边照样寒暄着一边把手向杨靖宇同志伸过去。在这一板之隔的斗室里，同志的感情，只能用两只手四只眼睛来表达。我提出请杨靖宇同志到我家去住，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们算了店钱，就一同回家。

初冬时分，天黑得非常早，到家已经是掌灯的时候。见到了妈妈，介绍了妻子，我就端着灯领靖宇同志进到东屋，我一边给他倒茶，一边迫不及待地说道：

“你来得太好了！游击队的处境的确使人担心。”

“我这次来，就是到游击队去帮助工作，顺路把吉林的工作也研究一下，但是我不能在这里多耽搁。”

“吉林的工作也存在好多问题，我没有经验，力不胜任。但是问题还不象游击队那样迫切。”

“是呀，游击队的问题必须马上解决。”他低头沉思了一会儿，忽然抬头问我道：“明天什么时候有上磐石去的火车？”

“明天早晨就有。”

“好，我明天早晨就走。”

“我和你一道去吧。”

“你替我担心吗？”他解开了眉头的疙瘩，露出一丝微笑说。

“你是初次来，道上很不太平，有土匪。”

“加点小心就可以了。我来前已经有了准备，土匪的规矩和黑话也学会了一些，可以应付过去。何况还有老刘领路，他是个山林通。”他坦然地笑了笑说，“明天早晨走当天可以到吧？”

“不出岔子可以到。”

“但愿不出岔子吧。”

“你看他们的问题得怎么解决？”我忍不住地问道。

他抬起头来，严峻地望着我，把手稍稍一挥说：“必须争取主动，和常占马上分开，山林队可以争取，也可以和其中真正有抗日决心的队伍合作，但是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则：他们必须站在我们的旗帜下，服从我们的领导和指挥！如果象现在这样……”他说到这里，忽然把话停住，烦恼地摇了摇头说，“好了，现在不多谈这些了。还有一夜的时间，我们谈谈吉林的工作吧。”

“你坐了一天车，不累吗？”

“坐车就是休息。你谈吧。”

于是我就谈起来，他听时很活跃，不时提出些讯问，随时发表些意见，最后他说：

“吉林是个大城市，党、团组织发展的也很快，今后更是大有可为。从发展上看，再属于磐石中心县委领导很不方便，应该直属省委领导。”

“最好能派个有经验的同志来领导我们的工作。”我马上提出了久存于心的要求。

“能派来当然好。”他笑了笑说，“但是路是你们走出来的，只要紧紧依靠党的领导，今后路会越走越宽的。关于这个问题，等我到磐石以后再作决定，然后再报告省委。”

一夜之间，我们谈了所有的问题。第二天清晨，靖宇同志就由老刘同志领路，坐火车走了。我按时默算着他的行程，盼望他能早到，盼望游击队能战胜困难，度过难关。六、七天过去了，正在我翘首盼望游击队消息的时候，杨靖宇同志忽然回来了。只几天的时间，他却大大变了样子：上身穿了一件撕得破烂的皮马褂子，大袍下摆露出了棉花，纽扣七零八落，帽耳朵也开了线，棉鞋用麻绳绑在脚上。我不由得猛吃了一惊，几天来对游击队安危的胡思乱想，一下子兜上了心头，我忙抢前一步，拉住他手问道：

“你怎么啦？游击队的情况怎样？”

他握住我的手，微笑了笑，笑得还是那样坦然，那样安详。我的心稍微安定些了。他把手摇了摇说：

“咱们到屋里谈。”

进屋后我倒了一碗水，他一口气喝了下去。分别只几天，他瘦了，大眼睛里也布满了红丝，他见我直盯着看，便含蓄地笑笑说：

“你看我这样，是不是象斗败了的公鸡？”他下意识地弹了弹身上的土说，“几天的光景，长了好多见识，你知道吗？我们的游击队已经和常占分开了！”

“几时分开的？是在你去以后吗？”

“以前。分开的时候还打响了，打死常占两个炮头。”

“我们的队伍呢？”我急忙问道，“受到损失没有？”

“没有。看情形主动权是在我们手里，常占没讨到什么便宜，因此就十分记恨我们。”

“哎呀！那么你去找常占……”我担心地望着他那身破衣服说。

“我去的正是时候，常占正在火头上。一听说我和游击队是一伙的，立刻就把我绑上了。这时我已经猜到情况有了变化，一边心里打主意，一边问他为什么这样对待我这远方的客人？他说我装蒜，拍桌子瞪眼睛地骂我们游击队丧良心，还说好来好散，为什么打死他两个炮头？他越骂我越明白，他骂着骂着我在这边笑了。我这一笑倒把他笑愣住了。我就乘机和他谈：‘我这次来正是为给他们和好来的，我是游击队的上级派来调查情况的，情况查明了，事情就好办。游击队是有组织的，要团结全国人民抗战，绝不会亏待朋友。’他见我这样说，就有些缓和下来了。我就进一步向他讲抗日道理，讲我们的力量，讲来讲去，他终于给我松了绑，放我下了山。”

听到这里，我才松了一口气。方要插嘴，他却摆了摆手说：

“事情还没完呢，我才被这边松了绑，那边又上绑了。”

“是怎么回事？”才放下的心又提起来了，我又急忙问道。

“你知道有个报号‘殿臣’的老土匪吧？他手下有个叫‘六国军’的小土匪头目。”

“我听说过。”我点点头说。

“我撞到他们手里去了，这可真是一帮‘红胡子’！绑上我又踢又打，硬说我是化装的朝鲜人，是日本人的密探。我说：我哪块有朝鲜人的记号呢？朝鲜人和中国人都是黄种人，怎么能单凭相面就一口咬定呢？朝鲜人说中国话有我这样口音吗？我这一说，他们再一细听我这河南腔，才觉出有点不对劲。可是又不肯改嘴认错，就硬往我头上戴密探的帽子。我说你们要杀我，何

必硬要让我承认是密探呢，一颗枪子就完了呗；你们要是想真正弄明白情况，就应该容我说话。我这一说，他们才给我容出一点空来。我就试探着问他们认识常占不？他们头点的非常快，我就告诉他们说，我是常占的朋友，这次上山正是来找常占的。他们就考问我常占的情况，我才从那里出来，怎么能问得住。我一讲，他们立刻就放下了老虎架子，给我松了绑。原来常占和殿臣是一个辈的，‘六国军’还矮一头呢。他们给我赔不是，说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我说不打不相识，今后就有交情了。他们留我吃了一顿饭，才送我出来。”

靖宇同志讲得很随便，我却越听越兴奋，忍不住笑起来说：“这回没再遇见‘红胡子’吧？”

“没有。再遇见，我这身衣裳恐怕就要零碎了。”他也扯着衣服笑起来。他又严肃地说：“现在我只着急一件事情，不知道游击队在哪里？情况怎么样？我已经派老刘去找去了，不知道他能找到不？”

“不要紧，就是老刘找不上，我们也能知道。只要他们安定下来，就会来人通知新的联络地点。”

“好。那我就在这里等他们！”他高兴地一挥手说。

靖宇同志在我这里住下了。我找了一件旧棉袍替下了他的破衣服，棉袍还暖和，只是短了一些。

几天以后，交通员老刘同志在桦甸、永吉的边界上，横道河子附近，找到了游击队。于是纪儒林同志领着权光到我家来，从他们口中，证实了靖宇同志的估计完全准确，我们和常占打响，完全是被逼无奈，如果不打就要遭他毒手。

杨靖宇同志决定第二天早晨就到游击队去。当天晚间，他给省委起草了一份报告，由我用密写方法抄写，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寻找游击队的经过情况，吉林党的发展情况，并建议由省委



直接领导吉林党的工作。

靖宇同志让我带着报告去省委汇报工作，他交给我十元日本金票作路费，又告诉我两个接头关系。

送走了靖宇和儒林同志，我把工作安排了一下，就启程上哈尔滨。

## 特别支部组成以后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哈尔滨，是东北最繁华的城市，大批白俄的流入，各国投机商人的往来，给哈尔滨涂上了一层浓重的异国色彩。羡慕“西方文明”的资产阶级，异口同音地称它为“东方小巴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后，极力维持它的“繁华”，想用表面上的兴盛掩盖他们血腥的内幕。于是，在西方色彩上又挤进了一些东洋情调，哈尔滨完全变成了奇形怪状的城市。这种畸形繁荣使我感到极不舒服，就象小时候看封神演义，那些三头六臂的神将，虽然热闹，却极不可亲。

我按照靖宇同志给的联络地址，见到了冯鼎铉同志，由他把介绍给省委秘书长老罗同志。我面交了靖宇同志的书面报告，又全面汇报了吉林的工作。老罗同志要我去道里斜纹七趟街参加一个短期训练班，然后再回吉林。

这是我入党以后第一次参加党内学习，学习时间只有三天。在地下环境里学习，既不能发讲义，又不许用笔记，也不能长时间的讨论，完全靠一个人用脑子记，三天中，我用力默记下党的历史，党的知识和开展工作的指示，以及一些地下工作的纪律和技巧问题。时间虽然极短，但是收获很大，精神生活比以前充实多了，身上也象长了力气。

从训练班出来，又见了一次老罗同志，他交给我一批党内文件，同时告诉我：省委同意了靖宇同志的意见，把吉林党支部改为吉林市特别支部，由我担任特支书记，受省委直接领导。过些日子，省委将派巡视员张弓同志到吉林去巡视工作。

我把文件伪装了一下，包在行李里，就坐车回吉林了。在车上，我越想越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吉林的党、团员这时已经发展到五、六十人，在女子师范、第一中学、毓文中学、文光中学和吉海铁路已经都有了党、团组织，木柴厂也有了党、团员和党的积极分子。得怎样才能把党的工作做好呢？在省委，我曾向老罗同志提出过我力不胜任，要求增派有经验的同志。但是省委已经作出了现在的决定，作为一个党员，必须无条件服从了。现在，我只能尽自己一切力量，多想办法，把工作做好。于是我就在火车上想起来。火车驰过北方茫茫的雪原，树木向后飞，我的心却向前赶，恨不能早一时赶回吉林，把我的一些想法告诉同志们。

回到吉林后，我就按照省委的指示，组成了吉林市特别支部。支部决定立即开展以下几项工作：

在吉海铁路，组织工人怠工、破坏、罢工等活动，使日寇的军用物资不能及时运出。

在木柴厂，发动工人要求缩短工作时间，要求增加工资。针对原来十二、三小时的做工时间，提出“实行三八制”的口号。

在学校，发动学生反对读经书，反对用封建道德来麻醉学生思想。

在特别支部领导下，几项工作同时开展起来：吉海铁路的事故骤然增多，机车被破坏，道钉被拔掉，正常的出车秩序被打乱；木柴厂的工人把“实行三八制”的口号用墨刷子刷在木材上，向厂方展开了合理的斗争；在各学校里，反对读经的浪潮迅速地掀

了起来。学生们在上经学课的时候，吵闹、怪叫、吹口哨，后来无形中形成了罢课，不读经学。有的学校，一上经学课，教室里就空无一人。

反读经运动，共青团员们作得很出色。尤其是第一中学的团组织，更发挥了青年先锋队的积极作用。当经学教员老柴头一进教室的时候，学生们就在团员的鼓动下拍桌子、跺脚、打口哨、喊起响亮的口号：“反对读经！反对麻醉学生思想！经学教员滚出学校去，滚！”

经学教员老柴头，是个有名的封建堡垒，封建思想在他脑子里已经完全凝固了，是一个顽固的卫道者，有时甚至顽固到什么也不顾的程度。有一次，他迎着学生们的喊叫，颤颤巍巍地登上了讲台，哆哆嗦嗦地推推架在鼻梁上的金丝框眼镜，脑袋摇得象拨浪鼓似地喊起来：

“同学！同学！诸君为何反对孔孟之道？半部论语治天下，诸君不读孔孟之书焉能成大器！……现在人心不古世道沦丧……”

老柴头的哀号被学生的喊叫声淹没得时断时续，但是这个顽固堡垒却丝毫不肯退让，他摘下帽子，用一只手举得高高地继续喊道：

“同学诸君！我们是礼仪之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纲理伦常不可乱，长幼尊卑不可坏。”他狠劲揪了一下胡子，声嘶力竭地喊着，“请同学诸君看看我这一把年纪，把我当作一个识途老马，听我一句忠告……”

“不是识途老马，是顽固老牛！”同学们响亮地喊起来。

“同学诸君，你们少小不努力，老大……”

“什么老大？把‘老大’抬出去！”

一声呐喊后，同学们冲上讲台，伸胳膊拽腿，抬起老柴头就

向门外跑，老荣头高声嘶叫起来，唾沫飞溅，胡子都气歪了。他被撂到操场上，躺在地下不肯起来，同学们却一哄而散。

学校当局见学生们闹得这样厉害，害起怕来，要往教育厅挂电话，电话线却被一个叫金景的共青团员给掐断了。这个金景在这次斗争中很活跃，被大家选为团支部书记。

由于各个学校反对读经的浪潮越来越汹涌，伪政府只好在一个时期内把这门课程停了。反对读经的斗争得到了胜利。共青团的组织在斗争中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团结了更多的青年，团的战斗力加强了。

就在这个时期，省委巡视员张弓同志来到了吉林。张弓同志是山东人，曾做过新闻记者。北伐时，在军阀张发奎的武汉军官教导团里做党的工作。一九二七年七月武汉政府叛变革命后，随着教导团到了广州。在路上，见张发奎越来越反动，屠杀了好多共产党员，他就在叶挺同志领导下，参加了“广州起义”。他来到吉林的时候，恰巧是十二月初，正是“广暴”纪念日的前夕。特支便召集了少数党员同志，请张弓同志作了一次关于“广暴”的报告。

张弓同志在吉林住了十几天，检查了党、团的工作。他特别指出：吉林市党、团组织发展的快，青年人多，要加强领导，提高警惕。他提出要派一两个共青团的干部到省委去受训。经特支研究，决定派一中的金景和冯育生前去。当时也曾考虑到金景才做团的工作不久，父亲又是伊通县大地主，作过税捐局长，似乎应该多考验一个时期。但终因他在斗争中积极，工作又负责任，所以还是派他去了。

张弓同志走后不久，纪儒林同志从游击队来了。

纪儒林同志带来了使人兴奋的消息：杨靖宇同志已经决定留在游击队里工作，游击队经过整顿，现在已经发展到三个大

队，有三百多名战士了！

听见这个数字，不由得一阵惊喜，我忙问纪儒林同志，为什么会发展这样快。

纪儒林同志回答得简单、干脆。他说：“完全是充分发动群众的结果。”他见我还在直着眼睛看他，似乎不能完全明了其中的深意，便补充说，“杨靖宇同志到那里后，首先把队伍带回磐石根据地，因为我们的战士都是磐石人民的子弟兵，在磐石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到磐石后，又对战士进行了深刻的阶级教育，提高战士的政治觉悟，整顿纪律。这样一来，游击队和磐石人民的关系就更密切了，于是参加游击队的农民就越来越多。”

纪儒林同志接着和我谈了好多关于军民关系的动人事迹。关于这一点，在我们后来缴获的敌人资料中，也有明确的记载，摘记几条如下：

“该共军均规律正然，严禁鸦片、海洛因、赌博等恶习。”（《满洲共产匪之研究》）

“该共军以‘红色民众’为基础方能存在；对于民众，注意很深，严戒其士兵胡作非为。”（《满洲共产匪之研究》）

“红军的活动状态，与土匪完全不同，行军中到民家吃饭时，一定开付饭钱，拿去的东西也一定给钱，如果当时没带着钱，日后一定送到。”（通化省警务厅）

“收揽一般农民的方法：对于贫农极其恳切叮咛，宿营之际，使老幼睡在炕上，自己却睡在地上，使役农民的时候给相当酬金。”（通化省警务厅）

“该匪军这种军规肃然的民众态度，有益于和民众感情的融洽亲和，加强着二者的结合。”（《满洲共产匪之研究》）

敌人对我们的“研究”，倒也反映了一部分真实情况，我们就是凭着军民“二者的结合”，才能迅速地发展壮大，战无不胜的。

但是对于我们为什么能和人民这样“融洽亲和”，敌人却无论如何也“研究”不透，正象俗语说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是“度”不出所以然的。他们只能从表面现象上进行“研究”，“研究”了十几年，也仍然是表面现象，这对敌人是个最大的嘲弄。

在和纪儒林同志谈完了游击队的发展情况后，我就问他这次来的任务是什么？他说：

“主要有两个任务；第一是游击队缺少一个专搞宣传工作的同志，靖宇同志希望能在吉林物色一个忠实的知识青年，送到游击队去。”

“这没有问题。最近就可以送去。”

“第二是要筹办一部分常用的药品和宣传用品，送到游击队。”

“这也没问题。”我翻了一下日历说，“现在马上就要过春节了。春节前后咱们把东西办齐，过了春节，你随东西走；人，由我送去。”

“东西比较多，火车上的搜查得怎么应付？”纪儒林同志说。

“通过铁路上的党组织掩护起来，决不会出问题的。”

“那么我就得在这里过春节了。”

“这正是我的本意。”我笑起来说，“我们在一起过个最愉快的春节吧。”

纪儒林同志也笑起来，笑得那样欢畅。这时我们怎能知道，这是我们一起最后的一次欢聚了！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面，经过几次剧烈的变化，他到哪里去了？是否还健在？我寻找了多少次，问遍了所有的熟人，都没有寻到他的下落。我估计他是做了无名烈士，牺牲在敌人手中了，象他这样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决不会苟活在世界上的。儒林同志不见了，但他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 去 游 击 队

纪儒林同志走后不几天,我送一位知识青年去参加红军。这个同志名叫张维显,在北京大学念书。他是榆树县人,从关内回来的目的就是要参加抗日的武装斗争,意志非常坚决。经组织考查后就决定由我送他前去。

这时游击队驻扎在伊通县边境上的营城子附近的一个山沟里。我没去过,便照原定联系地点,去玻璃河套找农民会长老万头。

我和张维显刚一进玻璃河套沟口,忽然发现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小男孩子跟在我们身后,紧走慢走,他总和我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张维显同志不住回头看,我拉他一把,让他只管走。快到老万同志村口的时候,小孩突然放快了脚步,追过我们,一头钻进树林子里,一眨眼就无影无踪了。这时,张维显突然站下,神色有些紧张地说:

“回去报告去了!我们的行踪已经被人发现,怎么办?”

②

“不要紧。”我有把握地说,“这一带是我们红军的根据地,农民都是有组织的,这个小孩可能是农会派出来的。”

我这一说,张维显的心才有些安定下来。我们俩就进了村子,一路打听着来到老万同志的门前,刚一跨进院门,就见一个



五十多岁的健壮老人，圆面孔，红脸膛，大眼睛，黑胡须，正站在房门口，直眼看着我们，没等我们开口，他就问道：

“你们是从哪来的？”

“从吉林。”我回道。

“来玻璃河套干什么？”

“找一位姓万的老人。”

“我就是。”他威严地捋捋胡子说，“找我有啥事？”

“这里说话不方便，是否到……”

“不用。”他把手往周围一比说，“到我们这儿屋里外头一样，有啥话你就敞开说吧。”

“我们要找红军游击队。”我见他说得干脆，也就干脆地说，“我叫李维民，他……”我的手刚往张维显同志那边一指，还没等说出来，老万同志忽然往前走了两步，喜笑颜开地说：

“李维民，李同志！我知道了，听老张同志说过。”他一边说一边把两只劳动了一生的大手伸过来，紧紧地握住了我们俩的手说，“方才多有慢待了，快请屋里坐吧！”

他回手一拉房门，我们刚要迈步，忽然一个小圆脑袋从里面钻出来，对着我们俩龇牙一乐。我们一看，正是方才在我们后面跟踪的那个小男孩子，他的小眼睛笑得象个弯弯的月牙，对我们扮了一个鬼脸，就钻进一座豆秸垛后面去了。我们走进屋里，刚坐定，一晃看见有两个人影从豆秸垛后面走出来，一直向门外走去。我和张维显不由得相对一笑，老万同志也笑了。

我们向老万同志说明了来意，他听了非常高兴，亲切地摸着张维显的学生装说：

“没想到在北京城念大书的人也来跟咱们一块打鬼子，这事我可得在农会里好好宣传宣传。”

我们两个听得都笑起来。

第二天,老万同志就派了一个农民领我们去找游击队。

游击队住在营城子一个山村里,我们在一户贫农家里找到了杨靖宇同志,他正和干部们开会。他的脸色比从前黑了些,穿一身青布棉袄棉裤,脚穿一双旁开门的胶底鞋,打着深黄色的裹腿,腰里系着一条子弹袋,斜挎一支匣枪,朴素里露出一股英雄气概。他把参加会的同志一一给我们作了介绍。我一看没有纪儒林同志,赶忙问他。他说,纪儒林到省委去了。

这时已到中午,我们和靖宇等同志一块吃了一顿高粱米干饭,大葱蘸大酱。吃完饭,我就问靖宇同志对吉林工作有什么指示。靖宇同志领我到村头一棵大树下,提出了四项要求。第一、与磐石地方党组织建立密切联系,把从吉林得到的日本人的军事情报,及时地通过磐石党组织传递给红军游击队。把搜集情报工作作为吉林支部重要任务之一。第二、如果条件允许时,可以组织吉林的工人、学生派代表到游击队来参观和慰问。第三、医药和宣传用品要不断供给。第四、游击队曾派一位叫曹国安的同志去伪军十四团做反正工作。曹国安是北京某大学的学生,已经当上了伪军排长,驻防在吉海路上的烟筒山车站。现在游击队住处不定,联系有困难,以后改由吉林特支和他联系,必要时要派人去帮助他工作(注)。除此之外,他还要我买一块红缎子,准备做军旗。

当天我就离开了游击队。

由于红军在杨靖宇同志领导下坚决抗日,英勇善战,爱护人民,关心人民的疾苦,所以在磐石、桦甸、伊通、辉南、金川、柳河

---

(注)后来,曹国安同志率伪军十四团迫击炮连全连士兵,反正至磐石游击队。曹国安同志曾任杨靖宇同志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师师长,后在战斗中牺牲。

等一带广大地区里威望一天高似一天，战士也一天多似一天。就在这时候，游击队正式命名为中华苏维埃三十二红军南满独立第一师，杨靖宇同志任政委兼师长。

五月初，吉林特别支部组织了一个有工人、学生参加的慰问队，由金景率领，携带着一批慰问品，秘密去红军部队进行慰问。金景从哈尔滨受训回来后，就担任了吉林市共青团特支书记，因为慰问队的成员主要是青年，所以就由他带领。

慰问队回来后，带来一个捷报：红军在桦甸县的横道河子，对伪军守备队进行了一次突袭，多数敌人都被我们消灭了，我们缴获了好多物资、弹药、枪支。紧接着这次突袭后，红军又有了飞跃的发展，关于这个发展，他们讲了下面一段故事……

## 人 心 所 向

横道河子战役后，红军的大部队载着胜利品先撤走了。杨靖宇同志率领着师司令部的同志又处理了一些善后工作，才离开横道河子，这时大部队已经走得无影无踪了。杨靖宇同志知道他们是按照司令部的决定往辉南县进发的，于是便率领着司令部的几十名同志赶往辉南县。但是一直赶到天黑也没有赶上，怎么回事呢？是否走两岔去了？不然也会遇到大部队的联络员哪？杨靖宇同志考虑到这个情况以后，便感到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必须马上停下来，派人去联系大部队。

这时，司令部正好走到伐木区的“楞场”<sup>(注)</sup>里，“楞场”上除了堆放着好多木材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窝棚”，“窝棚”里面有火炕，还有几条用木头钉成的长条凳子。这正是一个很好的宿营地点，于是杨靖宇同志就下令派出岗哨，就地宿营，同时派人出去联系大部队。

这正是冬末春初的季节，冰雪方消，寒意未退。一入夜晚，山风吹来，更觉春风入骨，冷气袭人。杨靖宇同志心中有事，不能入睡，便披起大衣，走出“窝棚”在外漫步。

---

<sup>(注)</sup> 楞场：伐木区堆置木头的地方。每逢冬季，木材堆置得特别多。俟解冻后，再顺着桃花水，放入河中。

上弦弯月，高挂在树梢头上，风吹树动，地面上闪动着银光。

杨靖宇同志走了一会儿，方要回转“窝棚”，忽然听见远处传来隐隐约约的人声。距离较远，听不真切，好象在争吵什么。细一辨方向，声音正是从横道河子来路上传来的。那里曾派去两名岗哨，是他们两人中间发生了口角，还是出现了什么情况？杨靖宇同志忙领着警卫员向前走去。

正在这时，一个黑影从远处跑来，警卫员抢先一步，高声问了口令，弄清是派出去的岗哨以后，便闪在一旁。

岗哨奔到杨靖宇同志面前，喘吁吁地报告说，前面路上来了十好几个拿枪的人，为首的一个一定要面见司令员。

“他们是哪里的？”杨靖宇问。

“他们自报是长青‘辮子’（注）上的。”岗哨喘了一口气说，“他们听说我们是三十二红军独立第一师的，就一定要见杨司令员，我们支不走他们……”

杨靖宇同志稍想了一下，点点头道：“请他们来吧。”岗哨应声跑回去了。

这时，警卫员便请示杨靖宇同志需不需要通知同志们作战斗准备。

杨靖宇同志摇摇头说：“不用。如果来的是敌人的话，就不会费这么大的周折和岗哨吵嚷了，岗哨只有两个，他们早就下手了。况且这一带正是隋长青活动的地区，他们自报长青‘辮子’也符合情况。”

虽经杨靖宇同志这样说，警卫员还是悄悄地唤醒了几个同志，暗暗地把枪握在手中。

---

（注）辮子：纠合在一起成帮的山林队和土匪叫“辮子”。

杨靖宇同志早就知道隋长青队的一些情况，这虽然也是一个山林队，但队里的多数人都是“九一八”事变以后，被日本鬼子、汉奸“逼上梁山”的农民。隋长青本人也敢于和日本鬼子硬碰，对地主劣绅毫不容情。所差的只是没有一种远大的理想指引他前进；没有一种正确的思想作为他的行动指南。杨靖宇同志考虑到他们的这种斗争是不能持久的，因此决定给他们一些帮助，把他们完全吸引到正路上来，成为一支真正的抗日队伍。现在，他们自己找上门来了，杨靖宇同志怎能不乐于接见他们呢？

杨靖宇同志回到“窝棚”里，让警卫员点着一大块松树明子，松树明子跳动着红色的火舌，闪闪的红光，照在杨靖宇同志脸上，更觉庄严。门声一响，走进两个人来：一个是红军的岗哨，另一个人身材不高，空着手，没拿武器。杨靖宇同志知道这是把武器放在岗哨的警戒线外边了。

走至近前，岗哨往旁一闪向来人介绍道：“这就是我们的杨司令员。”

来人很精神地说：“报告杨司令，我是长青队的侦察小队长。”

杨靖宇同志把手往身旁炕沿边上一伸，请这位小队长坐下。小队长没肯坐，仍然直立着继续说道：

“杨司令，我是奉长青队长的命令，特别赶来见司令的。我们长青队长听说杨司令打下了横道河子，特别让我和弟兄们前来道喜。同时请杨司令能赏光和我们长青队长见一面。”

“长青队长现在哪里？”杨靖宇同志急着问。

“离这里还有二、三十里路，他和全队弟兄都驻扎在那里，等候我的消息。本来长青队长要亲自率领弟兄前来的，一则怕来人太多，惊动司令；二则怕追不上司令，劳师动众。所以就让我和侦察队的弟兄们来了。我们长青队长平日非常钦佩杨司令，

屡次要和杨司令见面，也前脚撵后脚的撵了几次，都没撵上，这次请杨司令无论如何也要赏光。”

杨靖宇同志见这位小队长人很精明，话也讲得明确，态度也很诚恳，从他身上也可以感到长青队不是一个普通的山林队，便点点头说道：“好。请你回去转告长青队长，我因为有事，不能马上去见他。如果他有时间，请他来吧，我在这里敬候。并且请你和长青队长说，我也很早就想和他见面，苦于没有机会，现在我非常欢迎他前来。”

杨靖宇同志的话，几乎使侦察小队长高兴得跳起来，他激动地说：

“报告杨司令，我马上就回去——跑着回去，明天太阳出来以前，一定把长青队长领来，请杨司令千万等着我们。”

说完，转身就要跑。

杨靖宇同志忍不住笑了笑喊住他说：“你先别走，和你同来的弟兄是不是还在岗哨外边等着你呢？”

小队长说：“是呀。”

杨靖宇同志说：“请他们进来歇一歇吧，我们这里没有什么吃的，来喝点水吧。”

小队长忙摆着手说：“不，谢谢杨司令。我们都得马上回去，不能耽搁，我们这就走。”说完他转身没走上几步，忽然又转回来说，“杨司令，你方才说没什么吃的，是不是还没吃饭呢？”

杨靖宇同志笑了笑说道：“我们的给养都随着大部队走了，我们这些同志随身带来了一点干粮，垫补垫补也就可以了。”

“那怎么行呢！”小队长睁大了眼睛说，“杨司令和弟兄们到了这个地区就是到我们家门口了，怎么能不吃饱饭呢。请杨司令稍等一下，我去请长青队长，让我那些弟兄们去给杨司令弄饭去。”

“不用。”杨靖宇同志忙拦他说，“千万不用，弟兄们跑了很远的路，都辛苦了。再说都夜深了，去惊动老乡不好，我们这样已经习惯了……”

“请杨司令放心。弟兄们对这一带情况非常熟悉，他们自有办法。”小队长说完转身急步走出门外。

杨靖宇同志见拦不住他，就急对举步要走的岗哨说道：“你快和他一同走，请他们千万不要去弄吃的。”

岗哨应声走出去了。

小队长走后，司令部里的同志——他们早已醒来了，有的还在暗中保护杨靖宇同志呢——都兴奋地议论起来了，有的说长青是来请红军帮助他们打哪个“响窑”<sup>(注)</sup>；有的说是来向红军学习；有的说是来拉红军和他们合作；有的说是来探听红军的虚实；有的说隋长青要拜杨司令为老师；也有的说是来投奔红军……杨靖宇同志一直在微笑地听着，从这里可以了解到同志们的思想状况和看问题的方法，等到同志们争论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才说道：

“同志们说的都各有各的道理，而且都说的很具体，从这一点上说，大家都是未卜先知的诸葛亮。”

同志们都笑了。他接着说道：

“在这一点上我就比不上同志们，我说不那么具体，我只能作一般的判断：首先，我觉得隋长青的来，是善意的，友好的，这一点不知你们同意不？”

同志们齐声说同意。

---

<sup>(注)</sup> 响窑：指拥有武装保护的大地主的庄园。当时住在乡镇里的大地主都修筑起高大的院墙，四角上设有炮台，雇佣着护勇（炮手），备有一定数量的枪支，一方面用以保护自己，一方面用以镇压农民。



杨靖宇同志接着说：“如果同意，那么有些同志的判断就不能成立了。第二，我觉得他来找我们，一定是要做对抗日有利的事。如果他要投靠日本鬼子、汉奸，他就不会来找我们了，因为我们和这一种人是死对头。这一点不知你们同意不？”

同志们又齐声说同意。

“我看有这两点就够了。你们说对不？”

同志们都笑了。

弯月西沉，夜雾朦胧。杨靖宇同志刚要入睡，忽觉身旁有人行动，忙睁眼一看，见是警卫员和岗哨站在身旁。

岗哨忙伏下身说道：“报告司令员，长青队上的弟兄给我们送饭来了。”

杨靖宇同志一听，忙翻身坐起来说道：“怎么还是弄来了？我方才不是嘱咐过千万不要去弄吗？”

“是呀，都和他們说了，他们也答应了，可还是……”岗哨无可奈何地说。

杨靖宇同志说：“既然这样，就请他们快进来吧。”又回身对警卫员说，“招呼醒几个同志，帮他们把饭担进来。”

同志们都醒了，大家听说有饭可吃，便都兴奋起来。

和警卫员同来的有五个长青队上的弟兄，杨靖宇同志向他们表示了谢意，请他们坐下休息。

吃完饭，东方已经发白，杨靖宇同志领着警卫员和几名干部走出“窝棚”登上一堆较高的木头垛向横道河子来路上望去，只见从太阳冒红的山角下转出一簇人马，行进速度很快，走到山口的時候队伍站下了。从里面走出三个人来，一前两后，一直向山上走来。

杨靖宇同志命令司令部同志集合，准备欢迎客人们。

杨靖宇同志出了“楞场”，大步迎上前去，只见为首一人，头戴大皮帽，身穿短皮袄，中等身材，二目炯炯有神。后边一个是那位侦察小队长；另一个是个彪形大汉，看样子象是个保镖的卫士。那位侦察小队长抢先一步，奔至杨靖宇同志面前，说：

“杨司令，我们长青队长特来拜见。”说完，他将身一闪，说，“队长，这位就是杨司令。”

隋长青将身站定，注视着杨靖宇同志。

杨靖宇同志忙伸出手来，要和隋长青握手。谁知就在这时，隋长青忽然将双膝一屈，咕咚一声跪倒在地，“梆”的一声叩了一个响头，同时说道：

“杨司令，隋某奔波半生，过的都是黑暗生活。如今见着共产党就似见到了太阳！从前，隋某领着百十多名弟兄，不知走哪一条路是好？可是如今，杨司令在这一带坚决抗日，爱民如子，威名远震，使隋某佩服得五体投地。隋某和弟兄们越来越认清，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有出路。现在隋某决心效忠于共产党和杨司令，请杨司令收下隋某和弟兄们。”说到这里，他声音发颤，眼中泪花闪闪。

杨靖宇同志忙将他扶起说：“长青队长，你的诚意使我感动。我和我的同志们，素日都知道长青队长为人正直，抗日坚决，今天相会，是件喜事。我们司令部的同志们都在上边等着见长青队长，快到上边去吧。”

杨靖宇同志拉起隋长青的手，率领一行人直向“楞场”走来。走进“楞场”，司令部的同志们热烈鼓掌欢迎。

杨靖宇同志拉着隋长青走进窝棚，请他坐下，向他讲了好多道理，从国际、国内形势、党的坚决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的政策，一直讲到党和群众的关系以及未来建设共产主义的理想。隋长青听了心服口服，最后表示：他和他的队伍，完全归杨靖宇同志

指挥，抗日救国，决无二心。

从此，隋长青和他的队伍，就随着红军，走上了抗日的道路。

当红日东升的时候，派出去联系大部队的同志回来报告说，找到了大部队，现在已经进入辉南县境，在一片密林里等候杨司令和司令部的同志们。

杨靖宇同志发出了急行军的命令。司令部的同志和隋长青队的人马汇合在一起，向前进发了。

## 李世超大智若愚

自从吉林特别支部组成以后，省委不断派人来帮助工作。五月初，张弓同志第二次来吉林巡视工作，同时研究组成吉林市委问题。紧接着，团省委也派巡视员傅天飞同志来到吉林，由共青团特别支部书记金景负责接待他。

这时，我们正在准备纪念“五九国耻日”<sup>(注)</sup>的宣传材料，就请张弓同志起草了一个宣传稿。在这以前，已经由女师国文教员李世超同志起草了一份《时事问题分析》的宣传稿，我拿给张弓同志看了。他看后赞不绝口，就问起我关于世超同志的情况，我便向他津津有味地讲起来……

李世超同志是吉林省伊通县伊丹乡人，父母很早就故去了，留下了十几垧地和几间房子，他就靠着这些产业读书，最后考上了北京朝阳大学。

这时，正是一九二七年前后，是中国人民空前觉醒，革命与反革命两大阵营斗争异常激烈的时代。而在青年学生当中，这种斗争的空气更为强烈，正象鲁迅所说：“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

---

<sup>(注)</sup> 一九一五年五月九日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激起全国人民的反日运动。各界人士规定以五月九日为“国耻纪念日”，反对日本侵略中国，要求废除二十一条。

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

还在中学时代，李世超同志就是一个富有爱国主义思想的青年人。进入大学以后，他便很自然地站到革命的一面，和反革命的学生进行斗争。

他很喜欢读文艺作品，旧文学基础也极好。一九二八年以后，他经常订阅鲁迅所创办的《奔流》杂志，从这里他开始接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并对马列主义的社会科学发生了兴趣。紧接着他就加入了党所领导的群众团体“革命互济会”。这时，他开始意识到自己依靠土地收入来生活、读书是可耻的。于是他便给家乡的妹妹写了一封信，声明将全部土地、房屋都给妹妹，自己在大学毕业以后，将靠劳动来生活。以后，在他妹妹出嫁的时候，他便将那些财产完全陪送出去。当然，今天看来这种作法也是很彻底的，但是在他才接触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当时，能够这样做也是可以说明他那革命的决心了。

当李世超同志将要在大学毕业的时候，他那由父母包办结婚的妻子病死了，留下一个小女孩名叫小英子。后来，经同学介绍，他和女学生石正芳认识了。石正芳是个稳重温和的姑娘，她一下子就爱上了李世超这个正直而又热诚的青年，李世超那崭新的思想，把她完全吸引住了。

但是李世超对石正芳的家庭却很反感。她祖父是个旧官僚，住在北京西城报子街一所古老的旧式门宅里，门口挂块“石宅”的牌子，在西城一带是有些名声的。在这个宅院里出入的人都是些不劳而食的剥削阶级，李世超很鄙视这些人。所以当他们将要结婚，岳母提出要李世超搬到这所深宅大院的时候，被李世超同志一口拒绝了。他和石正芳说：

“如果你愿意过自食其力的生活，和我完全平等地在一起，你就和我结婚。让我寄人篱下，这是万不可能的。”

石正芳依了他，两人在外边租了一所小房子，同住在一起。

石正芳的母亲对这个富有自尊心的姑爷也没有办法，何况她也并不是反对这件婚事。在她看来，姑爷家里有产业，书念得也好，又是学法律的，将来定会青云直上，飞黄腾达，所以也就由他们去了。

这个在旧官僚家庭熏陶下的老女人，从她的阶级本性出发来看李世超，结果完全看错了。在李世超同志的脑子里，根本就没有她那一套想法。他学的是法律，但是对法律却越来越不感兴趣。他想的是今后做什么工作对国家更有益处。本来他从大学毕业以后，完全可以挂起牌子当律师，这在旧社会是个四通八达的职业，既可以发财致富，又可以转身跨入政界。但是他完全摈弃了这种作法，选定了教育工作，他感到教育青年，把革命思想灌输给青年一代是十分重要的。

这样，毕业以后，他就当了中学教员。先在长春市吉林省立二中教史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他回到了吉林，在女师教书。

就在这一年，经人介绍，我认识了他。才一接触的时候，我并不感到他有什么值得特别称道的地方。他的外貌看来是憨厚的，大高个儿，后背微有些发驼，两片稍嫌厚些的嘴唇旁边，是青虚虚的络腮胡茬儿，近视眼上戴一副黑边的眼镜，穿着朴素的布衣服。他对人很谦虚，话语不多，有些沉默寡言。但在接触几次以后，尤其当他了解到一些我的政治倾向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他是一个很有见识，充满感情的人。在我们的谈话中，我发现他心底里蕴藏着那么多象珍珠一样的宝贵思想，他对敌人是那样的憎恨。他恨日本强盗的侵略，更恨国民党的不抵抗。在和他多次的接触中，我断定这是一个已经背叛了本阶级的革命者，是一个未来的政治家。这样，在一九三二年，我就介绍他参

加了中国共产党。

李世超同志入党以后，斗争的目的更加明确，人也好象年轻了许多。他不遗余力地为党工作，把主要精力放在做学生工作上，除了把他那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巧妙地传播给学生以外，更注意把具有进步思想的学生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为了准确地判断哪些学生是真正有进步思想的；哪些学生是平庸的；哪些学生是反动的，他用了好多办法：有时是作正面的考查，有时是从反面去试验；有时是从政治上，有时是从生活上。有一次他在给女学生讲外国文学，讲到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剧本《娜拉》的时候，他故意称赞剧中男主人公海尔茂对娜拉那些玩弄女性的形容，什么我的“会唱歌的小鸟儿”，又是什么“爱淘气的小松鼠儿”，他都加以赞扬。接着当他讲到娜拉在斯丹保领事家里跳那不勒斯土风舞的时候说：“她简直象鸟儿般的活泼，蛇儿般的柔软，猴儿般的敏捷。”他说这把女人形容得很恰当，很形象。他这样讲述的结果，便引起了一些女学生的反对，首先起来反对的有李洁秋、秦淑云（大秦同志）、董毓秀等人，她们质问他道：

“李老师平常告诉我们一定要争取妇女的彻底解放，要争取男女的真正平等，现在怎么反倒称赞起这些侮辱女性的话了呢？李老师平常的言论是不是虚伪的呢？”

他听了这些指责一点也不恼怒，下课以后，他就把这些指责他的学生记下来，然后寻找适当的时机，和她们个别谈话，高兴地笑着对她们说：“如果你们觉得我在课堂上讲的那些话是侮辱妇女，那就说明你们有觉悟，是有思考能力的。”他就是这样通过一些正面的、反面的方法，把学生的思想了解透彻，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对那些经过多方面了解确实可靠的学生，就发展到党、团组织里面来。

他对发展组织有一段很好的议论，是我永记不忘的，他说：

“发展组织要象铁匠打铁一样，紧拉风匣勤烧火，等火候够了，马上就下镢头。但是一定得等火候够了，不然下镢头早了，就不易成材，你想打把快刀，结果反倒是钝的。”

他在女师里还兼教古文、经书。这时候党正在学生中间发动反对读经运动，反对日寇提出的“王道乐土”的封建麻醉性的口号，实际上也就是反对日寇统治下的伪政权。李世超同志在这场运动中充分地发动了学生，他先从反面讲学经书如何好，如果实行了孔孟之道，国家就会富强，世界就会进步等等，故意把这些道理讲得矛盾百出，非但站不住脚，而且听来是可气又可笑的。但他自己却装得非常严肃，好象是一个传道士在讲《圣经》。如果在讲的中间，校长来查堂，他就讲得更有劲，更庄严。这样一来，学生就越听越不顺耳，越听越来气，逐渐地便产生了一种自发的反对情绪。这时，他就乘势紧抓住这股情绪，巧妙地发动学生起来反对读经，化自发的反对情绪为自觉的斗争，使无组织的变成为有组织的行动。结果反对读经运动便很快地在女师学校里发动起来：学生撕了经书，罢了经课，“王道乐土”这个骗人的口号在学生中间实际是破产了。

女师的学生运动，在李世超同志的领导下开展得很好。他在工作中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肯用脑子，一件事情总要经过反复的考虑、比较，然后才动手去干，而一干起来便决不肯中途撒手，总要干到底。他也非常讲究工作方法，讲究斗争策略，他常说巧妙的方法会在工作中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在前面说过，他这个人从外貌上看是憨厚的，甚至是很平常的，话语也不大多。所以刚接触的时候，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觉得他至少不是那种聪明人。事实上也真出现过这种情况。他刚到女师时，同学们还不了解他，引起了女学生们的议论。议论来议论去就给他议论出个外号来，管他叫“大傻瓜”。有



人领头这么一叫，这个不太好听的外号就传开了，传来传去传到李世超同志的耳朵里。可是他出人意料之外的非但不恼，反倒笑起来，笑得很开心，好象对这个外号很满意似的。

后来，当我听见这件事情问他的时候，他先是开玩笑地说：

“叫‘傻瓜’还不好吗？自古‘愚人多厚福’，叫我傻子会给我增福的。”说完他又笑了笑。稍停一会儿，他严肃地说，“是的，我喜欢这个不太着人喜欢的外号，而且是真正的喜欢，不是装出来的。你知道我在很早就立志要干革命，自从接触我们党以后，我这个志向就更坚定了。革命，革谁的命呢？革统治阶级的命，革日本鬼子和蒋介石的命，但是目前政权不在我们手里，我们不能明争，只能暗斗。这样的现实就规定我们必须时刻警惕敌人。我们不能摆出一副革命者的架子，不能在脑袋上贴个革命者的帖儿，必须隐蔽住自己。工作愈做得多，愈要很好地隐蔽，在暗中狠狠地揍他。敌人挨了揍，还找不到揍他的人在哪里，就会引起他们心理上的恐慌，这就是我们的胜利。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就欢迎‘大傻瓜’这个外号。我不但欢迎它，还利用它。在个人利益上，我决不和那些‘聪明人’争，他们要占点小便宜，就给他们。只要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有利，个人吃点亏算什么呢。”

经过这番谈话，我对李世超同志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从他身上，我彻底明白了“大智若愚”这四个字的含意。

世超同志不但对工作热心，对同志也十分关心，当他看见我每天到各处徒步奔波的时候，就劝我买台自行车，说省时省力，方便工作。我笑笑说：

“人长腿就是跑路的，年轻力壮，跑点腿还可以锻炼身体，现在党的经费这样困难，怎能胡乱浪费呢。”

他听完憨厚地笑了笑，再也没说什么。我以为事情说说也就算了，谁知过了些日子，我再去他那里的时候，他屋里竟摆上

一台崭新的“成吉思汗”牌自行车。他见我进屋，就笑指车子说：

“你一会儿回去就可以骑着车子走了。”

我一下子愣在那里，一时之间不知该怎样是好。

他见我有些尴尬，忙拉我坐下说：“你跑路是为党工作，我这也是尽了自己一点力量，我的经济情况你是知道的；正芳领着孩子回北京娘家，她这个布尔乔亚家庭有的是钱，什么也不用我负担，我现在就只管母亲和自己，钱用不了，留着有什么用呢？”

“可是你自己的生活却十分艰苦啊！”我瞥视了一下他那家徒四壁的屋子说。

“比起工农来我们不是在天堂上吗？这话你不也说过吗？”

他又憨直地笑起来。我看着他那双热诚的眼睛，知道再说也没用了，只好点头收下了。

……

张弓同志听了有关世超同志的这些情况后，止不住地高兴。他建议在未来的市委会里一定要吸收世超同志参加。我说不但要吸收他参加，还要让他做负责工作呢。我们谈得很兴奋，这时我们谁也料不到几天后会发生那样重大的变故啊！

## 变 生 意 外

在张弓、傅天飞同志来后不久，冯仲云同志也来到我的家里。我过去听老张同志讲过仲云同志的情况：他是无锡人，清华大学数理系毕业，一九二九年调到满洲省委工作，先以数学教授为掩护职业，后来就完全做党的工作了。他来的时候穿着一件整洁的青布大褂，脚下是一双皮鞋，头戴一顶半新不旧的礼帽，很象一位乡下的小学教师。因为彼此早已知道，仲云同志又非常平易近人，所以我们就一见如故地畅谈起来。他告诉我，他这次来，主要是到游击队去传达中央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六日的指示信。我忙问他指示信的内容。他说：内容很丰富，主要是指出在东北要结成武装反日统一战线，要在群众当中发动武装反日的运动，建立民众反日政府，树立和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我听到后非常高兴，要求他给吉林特支进行一次传达。他说当然要传达，但是参加人数不能多，地点最好在野外，我们当即决定在龙潭山上进行传达。

当时因为张弓同志已经住在我家里，我家又要印“五九”宣传材料，所以就送仲云同志到一中的共青团员邓晓村同志家里去住。他家住在城里富余胡同门牌四号。

仲云同志传达完中央指示信的第二天，是五月六日。这时纪念“五九”的传单、标语、口号等已经赶印出来，当天下午，发到

各支部。发时规定：西关一带由第一师范和毓文等中学负责；东关一带由女师和一中等中学负责。其它地方由铁路等单位负责。特支规定在当天晚间八点钟同时行动，一齐散发。

就在这一天，由靖宇同志派到伪军十四团工作的曹国安同志忽然来到我家。他兴奋地告诉我：伪军的反正工作已经有了很大的收获，迫击炮连已经全部掌握在我们手里，现在最好能有一位党的负责同志去和弟兄们见见面，坚定信心，激励士气。我听后非常高兴，我说：

“你来得正好，现在省委的冯仲云同志正在吉林，团省委的巡视员傅天飞也来了。仲云同志是老党员，他不但可以代表省委，而且可以把中央的新精神向大家讲一讲。”

“党、团省委都有人在，那太好了！”他轻轻地拍了一下手说，“最好再能派一位学生代表去。”

“人多了好吗？”

“没有问题。我马上回去布置，保证安全。”

“好吧。”我想了一下说，“派金景去吧，他既是学生，又是共青团特支书记。”

“好极了！几时能去？”

“我一会就找仲云同志商量一下，如果他同意的话，明天就可以去。”

我们又把接头的地点和暗号规定了一下，曹国安同志就返回驻地烟筒山去了。

送走他以后，我马上去邓晓村同志家里把情况向仲云同志作了汇报，同时请他前去。他慨然答应。当时约定：第二天——五月七日早晨七点钟，在吉林车站和傅天飞、金景会齐。从他那里出来，我又通知了傅、金二人，要他们准时到车站会冯仲云同志，共赴烟筒山。

人在一生的记忆中总会留下一些难忘的日子，有的甜，有的苦，有的使你激动，有的使你心跳，哪怕事隔几十年，再一次想起，也记忆犹新，一切情景，都历历在目。一九三三年五月七日，在我的一生记忆中就永远占据了这样一个位置。

早晨，吃完饭，我和张弓同志研究了一下工作，他出去找党员谈话，我一看表，快到八点了，也刚要出去检查一下昨晚撒传单的情况。忽然，仲云同志和傅天飞同志急匆匆地闯进屋来，我不由一愣说：“你们不是七点钟车吗？怎么还没走？”

“金景没去。”仲云同志直看着我说。

“没去！”我很惊奇。

“我们一直等到七点多钟，火车都开了，还不见金景的影子。”傅天飞同志擦了一把汗说。

“你们是在指定地点等他？”

“从去也没离地方。”傅天飞同志说。

“你昨晚是通知他本人？”仲云同志问。

“当面告诉的，他满口答应了。”

“金景平常表现怎么样？”仲云同志沉思了一下说。

“工作积极，虽然有些毛手毛脚，但是还认真。”

“没有耽误过什么事情？”

“从来没有。”我摇摇头说，“象这样重要的约会没有非常事故他是不会不到的。”

“这样说……”仲云同志望了望我和傅天飞说，“可能是出了事情！”

“昨晚他出去撒传单。”我不由心里一动说，“是不是撒传单出了问题？”

“很可能。”仲云同志重重地点了点头说，“我们必须考虑到

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你这里有没有文件？”

“有油印机和一些材料。”

“马上掩藏起来。”仲云同志说，“然后再设法打听金景的情况……”

仲云同志话还没有说完，我忽然听见院门有响动，忙探身一看，只见文光中学教员于汉章推着自行车闯进院里。

“什么人？”仲云同志警惕地问道。

“党的积极分子，只知道我和党有关系，人还可靠。”我急说了这几句，于汉章已经喘吁吁地冲进屋来。

“老李！”他瞥视了仲云和傅天飞一眼说，“你出来一下。”

“什么事，快说吧。”我一指仲云和傅天飞说，“两个熟朋友。”

“我方才上新开门去，看见日本宪兵队的大马车在马路上飞跑。”他急抹了一把汗说，“我闪在旁边一看，忽然发现常风亭坐在车上，几个全副武装的日本宪兵把他紧夹在当中，他的手倒背着，好象上了绑！”

“你看准了是他？”我急问了一句。

“没错，我马上到学校去看看，你也要多加小心。”

“好吧。”我点点头说。

于汉章才出屋门仲云同志就急问我道：

“被捕的是什么人？”

“一中的团员，和金景是同学。”

“问题越来越清楚了！”仲云同志挥了一下手说，“现在情况严重，必须马上行动！”

“你和傅天飞同志先离开这里吧。”我担心地说。

“我们都要离开这里！”仲云同志说，“但是在离开前必须把油印机和其它东西掩藏好。”

“好，我马上清理东西。”

正在我们开始清理东西的时候，院门又响了。闯进来的是  
一中团员朱殿超。他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一步迈进门槛，就直对  
着我说道：

“坏了！金景和郭连郊都被捕了，现在……”这时他才意识到  
屋里还有两个人，把话头停住，瞪着两只眼睛直呆呆地望着我。

“快说下去！”我焦急地一挥手说，“都是自己人。”

“现在敌人已经包围了一中。”他大喘了一口气说，“正在学  
校抓人……”

“金景是什么时候被捕的？”仲云同志问道。

“昨天晚上他和郭连郊到东菜门外去撒传单，整夜没回学  
校，今天天一亮我就和几个团员分头去找他。在东菜门外，听人  
议论说：夜里在江沿马路上抓住两个撒传单的学生，我一听就知  
道坏了，忙往学校跑，离校门很远就看见校门已被日本兵把上  
了！”

“金景他们是几点钟出去的？”我忙问道。

“昨晚九点多钟。”

“什么？九点多！”我一愣说，“不是规定在八点钟全市统一  
行动吗？”

“我们也是按规定时间撒的传单。金景和郭连郊本来是出  
去检查撒传单效果的，走的时候金景顺便把没撒完的传单又揣  
在身上了……”

“真罪过！”我忍不住气往上冲，一跺脚说，“为什么刚撒完  
还去撒，这不是给敌人送上门去嘛！”

“先不要谈这些问题了。”仲云同志一摆手说，“赶快行动  
吧！”

“好。”我急对朱殿超说，“你现在赶快去通知不在学校的团

员，让他们赶快隐蔽起来。”

“我就去。”他转身就往外走。

“你自己也要多加小心！”我撵出门外去，又补充了一句。

这时候母亲和妻子也都知道出了事，跑过来问情况，我一边清理文件一边说抗日的事被日本人知道了，现在正抓人。母亲一听就催我们快走，妻子在一旁急得落泪，大孩子伯坝这时已经七岁了，人小，可懂事了，靠在奶奶腿上抹眼泪，仲云同志忙说。

“现在不光是我们走，大娘和弟妹也要领着孩子出去躲一躲，维民不是一般的……”

“我们都走？”妈妈没等仲云同志说完，就急说道：“家扔给谁呀？”

“妈妈！”我把包好的油印机猛往地下一放说，“家，不要了！我们都必须走，妈不走，我在外怎能放心！”

妈妈看看我和仲云同志，眼泪在眼边上直转，半天，猛一拍腿说：“好，我们娘几个都走！可是得收拾收拾东西呀！”

“要快！”仲云同志说，“一刻也不能多耽搁。我们和维民先走，你老随后就走。”

“妈先到大姐家去躲一躲，把家门锁上，万一没事再回来。”我边说边把清理出的文件递给妻子说，“把这扔到灶坑里烧掉。”

妻子接过文件拉着伯坝转身出去了。妈妈却仍眼望着我们说：

“那你们上哪去呀？你冯大哥他们好办，是外乡人，回哈尔滨就行了……”

“不，我不能回哈尔滨。”仲云同志急转向我说，“我的任务还没完成，我必须到部队上去。”

“我和你一起去。”傅天飞同志接着说。

“好。至于你……”仲云同志把头转向我，稍稍想了一下说，



“在必要的时候，应该到哈尔滨去，向省委汇报这里的一切情况。”

“我可以去。”我点点头说，“但是必须得把这里的事情处理完，情况弄清楚。”

“一定要提高警惕。”

“我们都要警惕。”我戴上帽子，挟起包好的油印机对妈妈说，“妈，你们一定要赶快离开家。在你们没走以前，有人来找我，就告诉他出事了。老张要回来，让他赶快回哈尔滨！”

“那你还上哪去呢？”妈妈拉住我的衣服说。

“妈妈不要惦念我，日本鬼子抓不着我。”我忙安慰妈妈说，“我现在还要去办几件事，完了也可能上大姐家去。”

“大娘，我们走了。”仲云同志对妈妈说，“不要难过，事情也可能很快就会过去的。”

妈妈的眼泪猛地落下来，我一咬牙，一拉仲云和傅天飞同志说：“走！”

出了西屋门，妻子和伯坝正在灶坑前边蹲着，灶坑里的火正猛烧着，红光直照在妻子眼泪滚滚的脸上，见我们出来，她猛把手捂在脸上；伯坝却跑过来抱住我的腿。我哄着他说：

“快跟奶奶去收拾东西，听奶奶和妈妈的话。”我又转对妻子说：“好好照料妈妈和孩子吧。”

妻子没有抬头。我推起自行车，和仲云同志走出屋门，仿佛听见妻子断断续续地说：

“你要远走，可来个信啊！”

西屋里才三、四个月的小崽仲篪也啼叫起来，我把心一横，和仲云、天飞同志走出了院门。我心里万分焦急，我必须赶在敌人的前边，去给一些党员同志送信。我不能去送仲云和天飞同志了！我们紧紧地握过手，仲云同志又再三嘱咐我要警惕，我们压下了千言万语，就这样匆匆地分了手。

## 出了叛徒

我骑着车子在街上猛跑。油印机已经藏在我的族宗嫂子家里。又到省立图书馆去找过张弓同志，他已经离开了那里，到哪里去了呢？但愿他能在母亲们离开以前赶到家里知道消息。

街上传来日本兵的奔跑声和摩托车的吼叫声。莫非敌人在倾巢出动？

我飞奔到李世超同志家里，真糟！他妹妹说他和毓文中学的国文教员周玉琢先生出去了，我忙请他妹妹去给送信，让他赶快隐蔽起来。

从李家出来，掉转车头，又飞奔到关芝忱同志家里，让她家里通知他和陈雪范等同志赶快离开。

我既担心仲云和傅天飞同志是否走出去了，又不放心邓晓村同志一家的安全，于是又飞奔至邓家。晓村同志的爱人是个淳朴的农村妇女，红着眼圈告诉我说：他们已经都走了。连晓村妻妹阎玉梅也躲出去了。我劝她也躲一躲，她咬着牙说：我不走，鬼子来抓，我就去，他们能把我怎的！我见她这样坚决，只好听任她了。

从邓家出来，我又跑了几家。这时候已经过了晌午，应该通知的党员，都已经直接和间接的通知过了。心里记挂着母亲她

们，是否从家里走出来了？便奔向大姐家里。

大姐家里冷冷清清的，母亲他们没来，大姐也不知道出了事情。我把情况约略地告诉了大姐，她听后也非常着急，要去看母亲。我拦住她，让她去找二妹夫王益。二妹夫在铁路上当“车守”，人很机警，是党的积极分子。我让大姐转告二妹夫去我家以及李世超、关芝忱等同志家里探听情况，然后到赵家糖房胡同二号宿姨娘家里找我。我考虑到大姐家里好多人都知道，不能久留。

大姐要我吃午饭，我心急如焚，勉强咽了几口，把李世超等同志的住处写在一个小纸条上，交给大姐，让她带给二妹夫，我直奔宿姨娘家里。

宿姨娘家住地偏僻，表兄弟是汽车司机，常年在外，家里来往人不多，知道住处的人极少，急切间我就选定这里为临时住处。

在宿姨娘家，我焦急地盼望着二妹夫能快些把情况探听来。如果敌人并没到我家里去，李世超、关芝忱、邓晓村等同志家里也安然无事，那就是说战斗的组织仍然存在！金景、郭连郊在敌人面前经受住了考验。但是从已经出现的迹象上看，这可能吗？常风亭的被捕、一中的被围、大批敌人的出动，又怎么解释呢？郭连郊才入团不久，根本不了解什么情况，在敌人面前也说不出什么来。组织安危的整个关键都在金景身上。作为吉林党的领导成员之一——团的特支书记，金景知道的情况太多了。如果捆绑常风亭的绳索是从他那里抛出来的，那结果就不堪设想了。金景，到底会怎样？是党的忠实儿女，还是党的叛徒？我，平素对金景的了解到底有多少？先是在汇报中听到了他的聪明能干，又在反读经斗争中知道了他的积极敢干，于是就信任了他，送他去哈尔滨受训，把团的工作交给他，遇见事情和他研

究，从没有怀疑过他的一言一行。今天，放在非常事变的严重关头，重新衡量，才忽然发觉自己对他了解得是那样少，那样片面。现在，我的思想却一刻也离不开金景，我极力想对他作出一个判断，但却找不出更充分的根据来：聪明、积极、敢于都不能代替临危不惧，宁死不屈的英雄气节，答案只能从已经发生的事实中去寻求。我度日如年地盼望着新的情况。

一直到第二天的清晨，二妹夫才喘吁吁地闯进来。他一把拉住我说道：

“姐夫，情况不好，你在吉林不能站脚了！”

我忙问道：“到底怎样？你快说吧！”

“日本鬼子现在正到处抓人，你家，李世超、关芝忱、邓晓村的家里都搜遍了；一中好多学生都被抓走了，邓晓村的老婆也被抓去了……”

“邓晓村本人呢？李世超和关芝忱呢？”

“他们都躲出去了。”现在街上很乱，日本人到处闯，密探可哪钻，好多人都在私下议论，说抓共产党。姐夫，怎么会一下子弄成这样？你们平常的行动不是很严密吗？连我你都不多说一句……”

“出了叛徒！”我把拳头猛往桌上一敲，一夜未眠的眼睛本来干涩，这时觉得眼前直冒金花，头发也象要往起竖，我咬紧牙站在那里。我真恨不能亲手枪毙这个叛徒，金景，你叛变得好彻底呀，你把组织和同志们都出卖了！

“出了叛徒？”妹夫的眼睛瞪得溜圆地说，“是谁？”

“告诉你也不认得。”我摇摇头，稳了稳情绪说，“妈妈她们现在怎样了？”

“妈妈倒没什么，只是……”

“只是什么哪？快说吧，不要吞吞吐吐的。”

“我昨天听到信，就往妈妈那里跑，一进屋，好险没让乱东西绊倒了，家里翻得盆朝天碗朝地，连天棚都挑开了，妈妈正坐在炕上守着小伯坝哭，小伯坝闭着眼睛不懂人事，血从嘴角里往外淌，脸象白纸一样……”

我心里猛一翻腾，忙问道：“怎么弄的？”

“我当时也吓了一跳，忙问嫂子，嫂子抽抽搭搭地告诉我：你才从家走不大一会，日本鬼子就来了，还有一个一脸麻子的中国人，进屋就指名要你，动手翻东西。偏巧妈妈这时候正在厕所里，听见屋里乒乒响，就赶快溜到门外去，不大一会儿，住在你家里那个姓张的客人就回来了……”

“是张弓！”我心里一震，冲口说道，“他怎么样？”

“妈妈在门外，就是为了等他。一见他面，妈妈就告诉他出事了，让他赶快走开。大概是妈妈一时情急，没加小心，被屋里的麻子一眼看见了，领头就往外跑，日本人也哇啦哇啦地喊着往外冲，小伯坝就紧跟在他们后边。这时候张弓已经跑远了，他们冲到大门口，找不到人，一把拉住母亲，举手就打，小伯坝在后边一看打奶奶，小眼睛一瞪，象疯了一样扑过去，从鬼子手里往外拽奶奶，鬼子不松手，伯坝猛一低头，一口咬住鬼子的手死也不放，鬼子疼得哇哇叫，一抬腿，大皮鞋脚猛踢在小伯坝的心口上，孩子往后一仰，四脚朝天倒在地上，大口鲜血从嘴里喷出来。妈妈和嫂子都扑在孩子身上哭。鬼子翻了几句话，掉头就往街口跑，那个麻子中国人恶狠狠地指着妈妈和嫂子说：‘抓不着李维民，就拿你们全家示问！’说完他也转身跟着鬼子跑了。他们错把张弓当成你了。”

“这样说张弓同志还有被撵上的可能？”

“你听我往下说呀！”二妹夫对我摆摆手，继续说道：“我进屋的时候，鬼子才走不大一会儿。我听嫂子讲完情况，就劝妈妈

和嫂子赶快走，鬼子要撵不上张弓，也抓不到你，一定要回来。妈妈守着伯坝只顾流泪。我一看实在不能再耽搁了，一手抱起伯坝，一手拉着妈妈，忙叫嫂子抱起炕上的小崽，锁上门，我们出了街口，叫了一辆马车，就到了大姐家。

“这时候我忽然想再回去探听探听情况，如果鬼子很快地回来，就说明他们没有抓到张弓。”

“对，你做得对！”

“我到了街口，刚往里一拐，就看见有一个小老头正扒在你们家门缝上往里看，这是谁呢？要干什么？我忙闪在一棵街树后面偷看。小老头扒了一会门缝，又贼头贼脑地往左右看。他这一回头我才看清楚了，原来是你那个抽大烟的远房叔叔！”

“是他！”我心里忽然一动：我把油印机藏在他儿媳妇那里，莫非是他听见我家出事了，以为人都不在，来趁火打劫？这个大烟鬼是什么事都能办出来的！

“正是他，脸瘦得剩一刀条了。”二妹夫点点头说，“他回头看没人，推开门就进去了。我知道他进去没好事，不是偷就是摸，我一生气，想进去堵住他，给他点教训。正在我举步往前走的时候，忽听背后有人跑过来，不是一个人的声音，不少皮鞋脚，踩在地上咚咚响，不用看，是敌人回来了。我没回头，放慢脚步，装成闲散的样子往前走。敌人跑到我身后，哇啦了几句，这时我不能不回头了。我一回头，身后三个鬼子，还有那个麻脸中国人，一齐往我脸上盯，盯了一会儿，麻子向鬼子翻了几句，鬼子一挥手，他们扔下我又向前跑，我仍不慌不忙地向前走。我眼盯着他们跑进了你家院门，心里说：你们拚命跑吧，谁也抓不着，只能抓着一个大烟鬼……一想到大烟鬼，我心里不由一蹦，哎呀！不好！大烟鬼知道大姐家，也知道我家，日本鬼子要利用他……”

“对，你估计得对！”我忙点头说，“日本人一定要牵住他当

狗使，两个烟泡就可以把他摆弄得滴溜转。”

“我一想到这里，忙转身往回跑，跑到大姐家，把情况简单地说了说，妈妈和嫂子也都同意我的看法，我们抱起孩子就往外走。这时候伯坝已经不吐血了，可还是昏迷不醒，我用两只手托着他，孩子身上滚热，我心里直觉难受。往哪里去呢？近亲家是躲不住了，我问妈妈大烟鬼知道姨娘这里不？妈妈说不知道，可是老人家不同意上这来，她说姨娘家只有一间房，冷丁来这些人太招眼，万一传出去，一家人谁也跑不了，她们倒不要紧，主要的是你！”

“妈妈讲得有道理，这里不能来，往哪去呢？这时候太阳已经偏西了，我们不能在街上停留，又核计了一下，决定去投江南老邱家。”

“是邱辣椒家？”我眉头一皱说。老邱家是我妈妈的两姨兄弟，邱辣椒是他家外号，是富裕中农，刻薄成家，胆小怕事，投他怎成？我不由得摇着头说，“你们怕是白跑了，这家人无利不起早，我们平常总也不来往，出了事去投他，哪能收留。”

“你猜得对，我们一到那里就碰了软钉子，妈妈刚强一辈子，怎能受人白眼，领我们出来，从江南又跑到洋草沟，还没找到个站脚的地方。天快黑了，伯坝不但烧得更厉害，还发起喘来，仲篋在嫂子怀里也不住声地哭，妈妈急得直跺脚，我心象滚油煎，活了这么大，也没经着过这样难心事。冷风飕飕地刮，吹得伯坝一阵阵哆嗦，我怕妈妈发现，搂紧他在前面走，走向哪呢？最后还是嫂子想起个地方：八虎门外中兴村祁恒春家里。”

听妹夫讲，我鼻子直发酸，强忍住泪水，点了点头。祁恒春和我从小同学，住过邻居，我妻子的弟弟和他家还有点干亲的关系。他家开砖瓦窑，很重情谊，不会象邱辣椒那样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妹夫接着讲的情况，果然证实了这一点：祁恒春很同情我

们家的遭遇，把母亲们安置在一座久不住人的窑房里，搬来了一口锅，送来一些小米，一家老小总算有了个落脚的地方！

妹夫讲完，我忍不住地想去看母亲和孩子们，但是他拦住了我，他讲的有道理：经过一天一夜，敌人会布置得更周密，我不能出去冒险。是的，大敌当前，同志遇难，组织遭到这样严重的破坏，好多同志生死不保，存亡不知，在这样关头怎能感情用事，如果万一因为探亲被捕，自己死也不能瞑目了！要冷静，要沉着，要进一步弄清情况。于是我向妹夫提出，要他替我办下面几件事：

第一、尽可能设法探听一下被捕的和没被捕的同志的消息。要想法和李世超等同志的家属再联系一下；打听邓晓村妻子的情况，如果已经放出来，就设法找个适当的地方和她见面。了解敌人都问过她什么，从这里可以知道些情况。

第二、找到吉海铁路列车长董国璋，让他帮助探听情况，同时告诉他：党内出了叛徒，这个叛徒还不知道他们那个小组，让他不要担心，但要提高警惕。

第三、派一名铁路上的同志去给玻璃河套老万头送信，让老万头把吉林发生的情况，火速通知游击队。

第四、把我骑的自行车拿去当掉，把钱送给母亲，给孩子治病。告诉母亲，千万要保重身体，不要挂念我。

几件事情，妹夫都一一答应了。临走的时候，我再三嘱咐他：要多加小心，最好不要在家里住，防备敌人搜捕。他满有信心地答应着走了。



## 转道北上

一天，两天过去了，不见妹夫来，我心急如火，几次想出去，都被姨娘拦住。整日闷在屋子里，心情特别沉重。党遭到了这样严重的破坏，是谁之过？叛徒金景，固然可恨，但是是谁信任了他？是谁把千斤重担放在这个不可靠的人肩膀上？自己对地下斗争既缺乏经验，对阶级斗争的残酷性和复杂性也认识得不够。只是简单地认为：参加了党，就等于把一切献给革命了，于是就放宽了对同志的了解，甚至是放松了做地下工作的组织原则，使横的关系多了，竖的关系少了，结果一旦生变，便波及全局。作为吉林党的负责人，自己辜负了党的信任，人民的期望，给革命造成的损失，是没法弥补的。现在，自己被困在这斗室里，既不能和党联系，又不知同志们的消息，这种情况怎能继续下去！我必须出去向党汇报，检讨自己的工作，重新投入战斗。正当我万分焦急的时候，二妹夫终于来了！他手里提着一个小白包袱，一进屋就说：

“姐夫，情况越来越坏了！你那个大烟鬼叔叔果然当了日本人的走狗，领着鬼子到处搜捕你；大姐家，我家已经都翻遍了。”

“真无耻！”我气得一敲桌子说，“告诉我，几个同志家你联系过没有？情况怎样？”

“联系过了。邓晓村的妻子已经放了回来。”

妹夫放下包袱说：“我还打听过一位一中的老师，他们说事情全坏在那个姓金的身上，他进去后把所有的人都咬上了，连学生带老师，抓起来三、四十人！”

我心里一阵难过，忙稳了稳心神说，“你还听到了什么？”

“我还见过李世超的妹妹，关芝忱的妈妈。李世超已经往哈尔滨去了，关芝忱和陈雪范也都离开了吉林。”

“听到张弓的消息没有？”

“听一中老师说敌人也正在追捕他。”

“这么说他已经走出去了！”我稍微松了一口气。

“现在就剩你了。我已经见到了董国璋。”

“他怎么说？”我急切地问。

“他建议你赶快离开吉林，最好今天走，他在车站上等你，一切都由他负责安排，你看……”他一指提来的包袱说，“衣服已经都给你准备好了。”

他急解开包袱，里面是一套整洁的铁路职员制服，上面还挂着铁路的证章。

“你换上衣服，不用经过检票口。火车司机是董国璋的弟弟。你如果上哈尔滨，绕道到沈阳再换车。沈阳的情况会好些。”

“好吧。”我略想了想说，“走前我想去看看妈妈。”

“妈妈那里……你最好不要去了，空气这样紧张……”他说得吐吐吞吞的，眼睛故意避开我。

妹夫平常是个爽快人，我觉出他今天的情绪不对，忙追问道：“妈妈怎么样？你快告诉我实话。”

“妈妈很好哇！”他抬起头来说。

“孩子呢？”

“孩子……”他不愿说下去，眼睛又避开我，犹疑了一下，然

后一挥手说，“反正早晚你也会知道，告诉你吧……那天我从这儿出去，没直接去找妈妈。我骑着你的车子，办了几件要紧的事，最后把车子送到当铺当了，昨天晚上到了妈妈那里。

“我一进那座小草房，就看见妈妈和嫂子正守着伯 塏哭，我一摸，孩子手脚已经都凉了。我忙问请先生看过没有？”

“嫂子哭着说：孩子昨天就不行了，要请大夫，没有钱，奶奶一着急，听人说北仓胡同有一个有钱人家要生孩子，需要雇个老妈子侍候月子，她就去了，先支回来半月工钱，托人从高大夫医院请来一位西医，忙了一夜，又灌药水又打救急针，今天早晨摇着脑袋走了。”妹夫迟疑了半天，又告诉我，他去时孩子已经奄奄一息，等他再次把大夫领到屋里，孩子已经放在地下……

我的头轰的一声，一刹时，孩子的声音笑貌，活着时候的一些情景，都一股脑儿在我眼前闪现出来。我坐在炕沿上，妹夫背对着我，沉默着。半天，他才低沉地说：

“孩子已经埋上了。妈妈支了人家的钱，昨天就去上工了。临走的时候让我嘱咐你：不要去看她了；让你记住：孩子是让日本鬼子给踢死的！”

“我忘不了！”我一咬牙，从炕上猛站起来，对妹夫说，“咱们现在就走！”

“还去看妈妈？”妹夫一愣神说。

“不，妈妈是刚强人，靠着自己的劳动能生活。你嫂子年轻力壮，领着一个孩子总不致于饿死。现在国破家亡，革命第一，我需要马上找到组织！”

妹夫含泪点头，动手帮我打扮成铁路员工的样子……

从黄旗屯总站开往朝阳镇的列车就要开车了，检票口前排着长长的旅客行列，铁栏杆前站着一群日本宪兵和伪警察，搜索盘查、侮辱着旅客，检票口好象鬼门关。

开车的前两三分钟，我随着董国璋同志从铁路员工通行的便门里上了站台，站台上五步一岗，十步一哨，警戒森严。董国璋同志悄声对我说：

“一切都安置好了，你只管在车队长室里坐着，如果搜查得紧，就到车头司机房里去，我弟弟是个机灵人。”

我点点头。

车队长的办公室和行李车连在一节车厢上，行李车的角落里堆着很多梨包，董国璋同志走过去拿出几个安梨放在车队长的办公桌上说：

“吃罢，败败心火。”

我点点头，看看左右没人，悄声说：“以后省委也可能派人来。你们的党小组要提高警惕，坚持下去，继续斗争，要让敌人知道：他们想把吉林党一网打尽的妄想，是永远也办不到的！”

“好！我们会狠狠打击敌人！”他用火辣辣的眼睛瞧着我说。

对面的车门响，有人来了！我和董国璋同志用力地招了招手，他迅速地向车门走去。

两个日本宪兵走进来，瞥了我一眼，向行李车走去。我坐在车队长办公桌前，顺手拿起一个安梨咬起来。两个家伙回头看了看，龇牙一乐，钻进行李车里去了。不一会儿，又摇摇摆摆地走出来，前边的一个对我挤了挤眼，推开车门，两个相跟着走出去。

汽笛啸叫起来，车身颤动了一下，往前移动了。车外面，武装的敌人象枯木桩子一样，一个一个闪过去，他们眼睁睁地望着火车开走。火车，象条呼啸的巨龙蜿蜒前奔，它越过口前，飞过鳌龙河，经过明城、磐石，一直往前奔，我眼望着熟悉的城镇，碧绿的田野，清澈的河流，心里不由在想：游击队、杨靖宇同志现在在哪里？还在这一带吗？远处就是苍翠起伏的青山，他们在哪

座山上？抑或打下了哪座城镇？同志们，打吧，狠狠地打吧！即使暂时失败，将来胜利也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火车在飞奔，青山一座一座地移过，在最高的一座山头上，我好象看见有一面红旗在随风飘扬，红旗越升越高，上接蓝天，天也在红起来……



# 第二部







## 新 春 伊 始

一九三三年的春天，吉林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我离开吉林，转道北上。

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在外交上刚刚退出国际联盟；在军事上正加紧向长城各口进攻；在政治上正准备把溥仪由临时执政移向傀儡皇帝的宝座。日寇这时已撕下各种伪装，用它那强横霸道的行动向全世界、全中国人民表明，它不仅要永远侵占东北，还要进一步侵略全中国、全亚洲……日本侵略者的倒行逆施使东北人民更加觉醒，如火如荼的抗日斗争，在各个地方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公开的武装斗争，隐蔽的地下活动，城市、乡村、工厂、学校，每一个角落都闪耀着抗日的火光，每一个爱国者的心都象是一颗未出膛的子弹，对准了日本侵略者。这些地方，这些角落，这些赤心，又都被一条无形的红线联结起来，这条红线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往一个中心汇集，这个中心就是哈尔滨——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所在地。省委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高高地举起了革命的红旗，率领着东北人民展开了英勇的抗日斗争。在红旗的招引下，五月，我从南满绕道到了哈尔滨。通过同乡好友关锡庚同志的关系，迅速地 and 省委接上了头。

一天傍晚，在道里炮队街口，我和省委秘书长老罗同志见了

面。他三十多岁，白白的面孔上长着一双明亮的眼睛，穿着风衣、西服、皮鞋，手里拿着钓鱼竿，身上背着鱼具，潇洒倜傥，很象个青年学者的样子。他对我象老相识一样，和我并肩走到松花江畔，找了一个水深人静的地方，抛下鱼钩，插好鱼竿，望着滚滚的松花江水，款款地谈起来。

我向老罗同志汇报了吉林党组织遭到破坏的经过，检查了自己的过失。他默默地望着水面上的“浮子”，“浮子”一上一下地跳动着，忽地没入水面，有鱼上钩了，但他象没看见似的，并不拽动鱼竿。半天，他才吁了一口长气，开始问我吉林还有哪些党员保存下来未被捕，也未暴露的？我一边回忆着一边告诉他。当谈到李世超同志的时候，他告诉我，这个同志已经来到哈尔滨，和省委接上头，开始新的工作了。我高兴地提出要和李世超同志见一面。我本来也知道在这样环境里，没有必要最好不来往，但是我是多么想念李世超同志啊！而且我也很想和他共同回忆一下吉林的工作，听听他对这次严重事件的看法，这对今后的工作是有好处的。开始老罗同志面有难色，经我再次要求，他才同意，告诉我等过几天再通知我见面的时间和地点。最后，谈到了我的工作问题，老罗同志分析了形势，认为我不能再回吉林了，那里准备另派人去整顿和重建组织。省委决定留我在哈尔滨，帮助做发行工作。老罗同志眼望着颤抖的鱼竿说：“哈尔滨是北满的政治、经济中心，敌人拚命要把哈尔滨完全抓在手里，现在正一步一步地逼紧，关东军不断地增派宪兵，警察特务系统也在想办法设法搜罗民族败类：地痞、流氓、烟鬼、赌棍和形形色色的坏人。斗争越来越尖锐；一方面是人民的觉醒，一方面是敌人的加强控制。在这样形势下，我们共产党人必须加紧战斗，加紧宣传，唤起民众，因此就要扩大宣传品的发行量，这样一来，人手就不够了，所以要我暂时做一阵。他说，“党对这项工作的要求，就

是要及时地把宣传品从省委发行站送到各区、各点里去。这个工作从表面上看似乎很简单,实际上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拿着宣传品在敌人的罗网中穿行,还要不出事,这就需要一种特别的机智和勇敢。”

老罗停住话,好象在思考什么,等待着我的回答。我望了一眼江面,鱼竿不再颤动了,“浮子”静静地漂在水面上,鱼儿早就跑了,让它自由吧!我的心头一阵激动,对老罗说:

“没有任何意见,完全服从党的分配。希望能尽快开始工作。”

“明天我就介绍你和一位老李同志见面。”老罗同志点着头说,“老李同志名字叫李升,雇农出身,是冯仲云同志在汤原开辟工作时介绍入党的,一直做交通员的工作,人非常好,对党特别忠诚。现在因为要加强发行工作,所以临时把他调过来。你多和他谈谈,他对哈尔滨很熟,工作也有办法。”

“明天什么时候和他见面?”我迫不及待地问。

“明天……”老罗同志抬头看了看天色。这时太阳才落,西天边上有几片鲜红的火烧云,映得江水闪着红光。

“就是这个时候吧。”老罗同志又看了看表说,“地点在夹树街大石头房子后面。老李同志熟悉那一带的情况。”

“夹树街大石头房子?”我困惑地摇摇头说,“我没去过这个地方。”

“非常好找。”老罗同志笑了笑说,“大石头房子就是铁路局,后面是一片树木,象个简陋的街心公园,非常肃静,你到了夹树街,一眼就望见了。”

“好吧。”

我刚要站起来和他告别,他又一把拉住我关切地说:

“再坐一坐。你才来到这里,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没有?”

“没有。”我摇摇头。

“住的地方怎么样？”

“住在同乡同学张克勤那里。他是医专学生，和几个同学在道里商务街合租了一所小房子，就是人多，闹一点，暂时住一住还可以。”

“他们的政治情况怎么样？”

“都是进步同学，张克勤是青年团员。”

“嗯。”他点点头说，“他们那里有铺盖吗？你从吉林出来未必带行李吧！”

“在那种情况下当然不能带行李了。”我笑了笑说，“不过现在已经有了，我的老同学胡仲有一套行李放在张克勤那里，我就先利用上了。被很厚实，很暖和，我睡得很香。”

听我这样说，他也笑了。稍停一下，他又问：“经济上怎么样，困难吧？”

“还可以维持。”我不由得摸了摸兜里仅有的两张纸币说。

“我知道你一定是很困难的。”他说着望了望我的口袋。

“困难不大，我能克服。”我笑了笑，“请领导放心，我是在困难日子里长大的。”

“好吧。”他看了看表说，“以后有什么需要和问题，就通过发行站找我。”

他站起来，拉起鱼钩……鱼钩已经没有了，只剩了一条长长的秃线。

临分手的时候，我问他冯仲云同志回来没有？他摇摇头。我们相对着沉默了一下，我知道他也在为仲云同志担心呢。

我们分手了。我回头看着他的背影，心里感到一阵温暖，前两天还多少有点背井离乡之感，现在完全没有了，我又有了“家”，有了亲人。

在我的生活道路上，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 挚友重逢

又是一个傍晚，我和李升同志在夹树街见了面。这里老树遮天，行人稀少，果然是一个谈话的好所在。

老李同志，已经是五十多岁的老人了。他年纪虽大，身体却极好，高大的身躯，腰不弯，背不驼，红红的长瓜脸下飘动着长长的胡须，双目炯炯有神，说话声音响亮。一接触就使你感到他是那样热情、爽朗和乐观。他穿了一身粗布的短衣服，布鞋、布袜，用宽腿带扎着裤脚。身上还背着一个帆布的大兜子，上边写着《大北新报》四个字，里边插着好多报纸，打远一望，就知道他是干什么的。这个掩护职业想得真好，“身份证”挂在外边，省却多少口舌。老李同志自己对此也很满意，见面没谈上几句，他就拍着兜子笑着对我说：

“往后你要干长了，也去报馆领这么个兜子挎上，上边装报纸，下边装宣传材料，既方便又保险。”

“不用往后，明个你老就介绍我去领一个吧。”我高兴地说。

“不行。”老李同志笑着摇头说，“头一宗你才来这里，人生地不熟；第二宗装啥得象啥，干这行也有这行的规矩，我也是留神学了一气才干上的。咱们不比一般‘报贩子’，若让人看着不象，

凑巧再被‘狗’盯上，就坏了大事。再者说你……”他又上下打量了我一番说，“看样子也象个念书人，容易引起人家的疑心。”

这老人说得头头是道，怪不得老罗同志那样称赞他，真是胆大心细的好同志。

“你也不用着急。”老李同志大概觉察出我有些失望，忙安慰我说，“明个我先领你去偏脸子八道街认识认识道里区委书记金剑啸同志。道里区的发行站就设在他家里，以后你就管送道里区的宣传材料。”

“好。”我又高兴地说，“我现在正住在道里区，来往方便。”

“方便事小，安全事大。你才来这里，还不大熟悉敌人的情况，哈尔滨这几个区，数着道里好对付。最坏的是滨江县——就是道外，那些特务警察，都是从好人堆里挑出来的，坏透了，他们见缝就下蛆，管日本人叫爹，是咱们劳动人民的死对头。我在道外转了几年，还能摸着他们的来踪去迹，所以我就跑滨江，把道里分给你。开头，我先照料着你走几次，以后熟了，就好办了。”

老李同志的话，语重心长，我心里着实感动。实际情况既是这样，我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了。接着，他又把道里的情况详细地向我介绍了一番。又订好了接头地点，才分手了。

第二天，我们一同去道里区委书记金剑啸同志家里。金剑啸同志背着一块画画用的画板，手里拿着鱼竿，正要出去。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因为他有约会，只简短地谈了谈工作，规定好送宣传品的方法、时间，以及他家中的平安警号，我们就出来了。

从这一天起，我就开始了新的工作。但是只管道里，工作分量终是有限的，我便向老罗同志提出，要求增加工作。几天以后，我又兼跑南岗工会发行站。这个发行站就设在“敖连特”电影院对面的小学校里。有一个老校役，管收发宣传材料，人好，

地点也保靠，这又是老李同志的主意。

发行和印刷工作是联在一起的，有时我跑完发行，也帮助搞印刷，负责印刷的同志姓王，因为是山西人，大家都管他叫山西王。他待人热诚，一见面，总是问寒问暖，亲亲热热的。

工作顺利，我的劲头也很高，我觉得，从我的年龄、工作经验和水平来看，做这些具体工作是最合适了。

就在这中间，我和李世超同志在松花江边见了面。他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胡子长得老长，头发齐在耳边子上，本来是近视眼，这时却没戴眼镜，眼球向外凸出，看人很吃力。他穿着粗布大夹袄，长腿便裤，下边系着腿带。这个样子和打扮，不认识的人决不会想到他是一个念过大学的知识分子。我们见了面，乐得淌眼泪，顺着江边走到我和老罗同志谈话的地方坐下。几天没来，这里已是柳叶点碧，丝垂金线的春天景象了。

我们坐在一起，互相打量着，禁不住又笑起来。他摸着胡子，笑着问我象个干什么的？我笑说他象个“打板先生”。他说“虽不中不远矣！”接着，他就向我讲了下面的一些情况。

原来李世超同志是和张弓同志一同到哈尔滨的。由张弓同志介绍，马上就和省委接上了关系，省委了解到他从前在北京读书的时候，曾经参加过党的外围组织“革命互济会”，因此便分配他负责这方面的工作，并且指示他首先要在码头工人中间发展会员。

经过一番了解，李世超同志便决定搬到道外头道街一家码头工人最集中的小店里去住。

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小店，长长筒子屋，两层吊铺，人坐在吊铺上刚能直起腰来。到晚间工人都下工回来以后，筒子屋里就挤满了人。两盏度数极小的电灯高吊在天棚上，工人们要补衣服、抓虱子就得凑到灯下来，因此灯下就成了大家活动的中

心。这时候串巷卖唱的、卖酸梨、瓜子的、抽帖算卦的，都在这狭长的屋地里串来串去，屋里充满了劣等烟草和汗臭味。

李世超同志经过一番改装，便扛个小行李卷来到这里。一进门，先上了店簿子，改名为吴德禄，职业是教私塾的先生，因为家乡闹土匪，流落到哈尔滨。从此，在这个小店里，李世超同志就被人们称为“吴先生”了。

李世超同志为了去掉自己知识分子的气味，连近视眼镜也摘下去了，只到读书写字的时候，才戴上一副铜框的老式近视镜。他的行李也极简单：一床蓝地白花的“麻花被”，一条家织布的褥子，一个两边有绣花顶头的老式枕头，外加一块狗皮。除此之外，还有一部《三国演义》、一部《聊斋》、一部《古文释译》、一个墨盒、两支毛笔。所有这几样东西，都是从破烂市上搜罗来的，恰合老私塾先生的身份。

李世超同志在小店里住下来以后，就努力接近工人，实心实意地为工人做事情。他替工人写家信，写得非常用心。这信一写开头，就不断地有人来求他，他是来者不拒，这样就成了免费的“代书”。他字写得好，意思写得周全，名声传出去，有些不住在店里的工人，也来求他，结识的工人一天比一天多起来。到了晚上，他就给工人讲《三国》和《聊斋》上的故事。听众愈来愈多，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后来他就教他们学文化，再后来，当他逐渐摸清一些工人的情况以后，就看准时机，看准对象，向他们讲些抗日和革命的道理。

工人越来越和他亲近，当他讲古的时候，工人们就给他泡茶。有些工人偶尔买来点好吃的东西，也总要先给“吴先生”送来一些。

有一次，一个工人得了霍乱症，上吐下泻，闹腾得很厉害。那时工人们得病，轻易不请医生看。请一次至少也得一天的工



钱,所以就硬挺,挺好了算,挺不好再说。

李世超同志知道这个工人得了霍乱症以后,就跑去安慰他说:“你不要着急,我有办法治。”

他找了两个铜板(硬币),泡了半碗咸盐水,铜板沾盐水,在这个工人身上刮了起来。

第二天,这个人就不泻不吐了,病好了一大半。

码头工人是最讲义气,最见不得好处的。有人对他好,他为你卖命也情愿。李世超同志在他们心目中是个有学问的人,是位可以作为他们老师的“先生”。但是却没有一点架子,不但和他们同吃同住得很好,而且还对他们那样热诚,给他们那么多的帮助。这就使他们不但喜欢他、尊敬他,而且越来越信任他了。

听完了李世超同志的叙述,我心里很激动。这样一个知识分子,为了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完全叛离了原来的阶级——地主家庭,抛弃了一切可能得到的“荣华富贵”,扔下了妻子儿女,心安理得地蹲在小店里,全身心地和工人在一起过艰苦的生活,如果没有坚定的信仰,怎能做到!我知道他和妻子石正芳的感情非常好。她虽然是北京的“名门闺秀”,旧官僚的女儿,却很忠实于爱情,对李世超同志照顾得无微不至。现在两人分离了,不知石正芳的情况怎样?当我问起的时候,他摇摇头说:

“不知道。我走的时候她正领着孩子在北京住娘家,她母亲病了……来到这里后,也没给她去信,消息完全断了。”

“你最好给她写封信,免得她惦念。”

“我想过,还是不写为妙。”他苦笑着摇了摇头说,“你不知道她那个人,写了信,她就可能拖着儿女找上来。有了家口,我目前的工作怎么办?莫如象现在这样好。反正她不会饿着,她娘家有的是钱。”

“那么将来怎么办呢?”

“看我的工作情况吧。”他沉思了一下说，“也可能我们走不到一条路上去，她终久是个有钱人家的‘小姐’啊！”说到这里，他有些烦恼地挥了挥手说，“算了，不谈这个吧，一工作起来，这些就不在心上了。”

他放下手，拾起一块石子，扔在江水里，一道道水纹，闪着金红色的光亮，向四外扩展开去。已经是夕阳西下的时候了。

“肚子叫唤了。”他笑了笑说，“我们找个僻静的小馆去畅饮两杯吧，见一次面多么不易啊！”

我知道他不喜欢喝酒，我更是与此物无缘，他所说的“畅饮”，只是一种感情的表示而已。

我们没有“畅饮”，倒是实实惠惠地吃了一顿。我们两个人都已经好久没有开荤了。

从小馆出来，他塞到我兜里两元钱，凑在我耳边上悄悄地说：

“留下吧，别象现在这样饿瘦了，吃饱了才好工作。”

他用力地捏了捏我的手，转身走了。我眼望着他消失在黑夜中。我们谁也不知道谁的确实住处，再见面不知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 曲折的会见

北满的春天是非常短促的，几场大风一过，就已经绿叶成荫，春去夏来了。

一天，我和印刷机关的山西王在约定的接头地点见面，他忙告诉我说：

“老罗同志调转工作了。印刷和发行工作，暂时由另外一位同志领导，这位同志想和你见见面。”

“多咱见面？”我忙问道。

“明天下午两点钟。由我老婆给你们接头。地点在道里‘孔氏洋行’门前。”说到这里，他忽然笑着挠了挠头说，“我老婆……你没见过吧？”

我摇摇头。

“她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俄国人。”

我忍不住地说：“那就好认了，有特点。”

他听我这样说，立刻收回了笑容，严肃地说：“不，你才到哈尔滨不久，还不了解，这个城市里象这样的女人并不是个别的，所以光凭这一个特点是不可靠的……你别着急，听我说，当你发现有这样一个女人，她右手拿着白手绢，不住地擦头上汗的时候，你就要多加注意。这时候，你就要有所表示……”

说到这里，他从兜里掏出一支蓝杆铅笔递给我说：“你要拿着这支笔，一下一下地敲打着你另外那只手，装出很悠闲的样子。这时，她就会过来问你：‘你见着老冯没有？’你就回答她：‘看见了，你要找他吗？’她说：‘是。’说完这几句话以后，她就会指引你和那位负责同志见面了。”

我把这些话都默记下来。临走前，他又嘱咐我说：“记住，明天午后两点，时间是以‘马迭尔’的大钟为标准，要提高警惕，多加注意，近来‘狗’很多。”

第二天，我提前吃完午饭，就往道里走去。

这是个绝好的天气，过了晌午，太阳当空一照，穿着单衣还出汗。哈尔滨摩电车本来很方便，票价也不贵，但我那时出门很少坐车，能省下一分钱也是好的。我怕万一去晚了就紧走，汗直往下流，口也干渴得很。路旁有好多冷食店，门口“哗哗”搅着冰糕，屋里“呼呼”吹着电扇，但这些当时和我都是无缘的。我到一家杂货店门前，买了一大碗凉茶水，咕嘟咕嘟一口气喝下去，心里觉着挺痛快，再走起路来脚步也轻了。没用多久，就到了“马迭尔”。

“马迭尔”是犹太人卡兹博开设的娱乐场所，三层洋楼，大玻璃窗，里面有饭店、舞厅、赌场、剧院、旅馆，……总之，这是典型的资本主义腐化堕落的地方。资产阶级、政客、汉奸们就在这里表演着最荒淫无耻的丑剧。我恨透了这个鬼地方，每当我从这里路过，看见大玻璃窗里那些晃来晃去的秃脑门时，就觉得恶心。但是今天，我没有心思观察这些人间败类了。还离很远，我就向那镶在门上的大钟望去，当我看清表针正指到一点半的时候，才松了一口气。我那块不走字的怀表，比它慢十五分钟，多亏我早来了，不然岂不误了大事！我把表对了一下，就离开了这里。从“马迭尔”到“孔氏洋行”，顺着“中央大街”往前走几步就

到了。时间有余，我便放慢了脚步，缓缓地向那边走过去。

“孔氏洋行”是德国人开的买卖，门面不大，里面卖些精致机械和呢绒、皮毛等高级商品，顾客不多，所以门前比较清静。我走到这里的时候，还差十多分钟到两点。我装做很悠闲的样子，往左右看了看，没发现什么行迹可疑的人；又进商店里转了一圈，里面冷冷清清的，一个白头发的外国老头，坐在沙发上直打瞌睡。我放心地走出来。迎门的人行路旁，摆一个长条靠背木椅，街树从上面覆盖下来，椅子上一片阴凉。我一看还差三分钟就到两点了，便坐在木椅上，随手掏出那支蓝杆铅笔来摆弄着。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马路上的行人稀稀落落的。

两点钟到了，我一边用铅笔敲着另一只手，一边向我来时的路上望着，我想她也一定是从“马迭尔”那边来。就这样我敲敲停停，停停敲敲，但无论我怎么敲，也没有敲来我迫切希望见到的那个有特征的女人。两点已经过七分了！怎么回事？她为什么还不来？难道出了什么事情？我不由得不安起来。是不是要离开这里呢？目的没有达到，真不死心！正在我犹疑不决的时候，忽听背后有一个女人咳嗽一声，我心一动，微微地侧过头去一看，真的，一个女人，穿着天蓝色的旗袍，靠在街树上，倒背脸站着，看不清面孔，只能看见微黄的卷发，披在脑后。我乘她没有回过头来的时候，忙把身子转向她，手中的铅笔也又随着敲打起来。这时我是多么盼望能快些看到她的面孔，看到她手里拿的东西，如果她的面孔是我所希望看到的那样，她手里拿的正是雪白的手绢，那我就能很快地和我新的领导同志见面了。我是多么热切地盼望着这样的会见啊！过去的经验告诉我，每一次这样的会见，都使我得到不少的教益，使我的革命劲头更大，信心更强，前进的步伐更坚定。一个党的地下工作者，是多么希望能和党经常在一起，和领导同志经常在一起！但当时的情况是

不允许这样做的，会面的机会是不多的，时间是短暂的。越这样，我越珍视这样的会见，盼望这样的会见。正是这种迫切的心情，使我这时的内心更加焦急，盼望面前这个女人快些回过身来，快些让我弄清楚她是谁。但她却站在那里不动。我忍不住了，不由得也咳嗽了一声。这一声果然有效，她回过身来了。这时，我也顾不上装那份悠闲的样子，忙往她脸上看去，那是张白白的面孔，眼珠有些发黄，鼻子不高……我所期望看到的特征在她脸上表现得并不明显。这是不是一个“混血儿”的面孔呢？对一个初到哈尔滨的人来说真是不易判断啊。在我产生怀疑的一刹那间，她正举起右手，用一块雪白的手绢擦着额头上的汗水。真象奇迹一样，这一动作把我的一切疑虑都打消了；我真高兴得想当时就站起来，心怦怦地紧跳着，但尽量抑制住内心的喜悦，忙用铅笔不停地敲打着手。我以为这个动作一定会使她立刻和我说话的，谁知她只是冷淡地看了我一下，随即又把身子转过去了。这真使我大惑不解！怎么回事呢？是她没有看清？是她没有经验，不敢和我答话？我忙看了一下表，两点已过十多分钟，决不能再保持这种僵局了，也不能再在这里久停了，我必须立刻采取行动，否则是不利的。这时已不容我再作更多的分析考虑，忙左右看了看，正巧身边没有过路人，便抓紧时机，又咳嗽了一声，这声比方才的还大，一听就知道是故意挤出来的。随着这声音，女人又回过头来，奇怪地望着我，我顾不得看清她的眼色，忙向她点点头，接着我就按照山西王告诉我的话，把声音压得低低地向她发问道：“你见着老冯没有？”这话本应该是对方先问我的，但我当时的确等不下去了。

谁知我不问还好，这一问，她立刻把眉头一皱，眼睛一瞪，对我大声说道：“什么老冯不老冯的？你是什么意思？”

这可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她这副声色俱厉的样子，怎能

是自己的同志呢？我感到情况不妙，而且十分危急，必须抽身走开。我忙向她点了个头，抱歉地说：“对不起，我认错人了，请您原谅。”说完，我起身就走。我怕被人注意到，也怕这个女人跟上来，忙坐上一辆出租汽车，让司机开着向南边疾驶而去。我这个平常连摩电车也舍不得坐的人，这时却坐上汽车，真是连我自己也想不到的事！

汽车跑过水道街口，我回头一看，后边没有车跟着，忙让司机停下来，把我兜里仅有的三角钱完全给了他。下了车，又绕过两条街道，确信没人跟踪时，我的心才完全安定下来，返回身向住所走去。

在往回走的路上，我仔细地想了想方才所发生的事情，这时我才发现我真是太冒失了！太粗心大意了！实际这个女人的出现，是有好多破绽可寻的：第一、她不是从“马迭尔”那个方向来的；第二、她的面孔并不象“混血儿”；第三、从她站在我身旁那时起，根本就没有理睬我，如果象我开始所设想的那样，她是没有经验，不敢和我答话，她怎么又会站得那样安然？……这一切，不都是可疑之处吗？但我当时完全被急于和领导见面的焦躁心情所左右，没有看破这些。急躁和粗心，这对一个地下工作者来说就是错误！我真恼恨自己！可是我又想，她那块白手绢是怎么回事呢？她为什么擦汗呢？莫非说这是巧合？是呀！她头上是有汗珠的，不是故意装出来的。至于白手绢，使的人就多了……想到这里，我断定自己是完全错了。这时，紧跟着一个使我极为不安的问题又来了：这个女人既不是山西王的老婆，那么山西王的老婆上哪里去了呢？她为什么不来呢？真的出了什么事情？这一连串的问题进入我的脑子后，就使我一刻也不能安静下来，我在苦想着，琢磨着……我不能再出去乱跑了。我相信山西王夫妻对党的忠诚；我更相信党会来找我的。

果然，山西王来了。我一下拉住了他的手，忙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经过他的讲述，解开了这个使我不安的谜：原来他的妻子已经被敌人盯上了。当她从家里出来时，在往“马迭尔”走的路上，忽然发现后边长了“尾巴”，有人跟上了。后来她想了好多办法方将这条“尾巴”甩掉，这时已经过了三点钟，她想再去“孔氏洋行”也见不到人了。何况这个情况说明她已处在危险的境地当中，必须快想对策。她忙赶回家和山西王讲清了情况，由山西王请示了领导，就在当天夜里，他们转移了地方。

听了这些话，我才一块石头落地。这时我更感到自己粗心大意的错误。我觉得应该向党向同志检讨。我才说了个头，山西王就止住我说：“这些，咱们先不谈了，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当个教训记住吧。今天，我来找你，一方面要和你说清情况，免得你担心，另一方面就是还要和那位同志见面。”

我忙问他定在哪一天？他说：“就在今天。由我负责领你去，咱们马上就走！”

我止不住高兴地问：“在哪里见面？”

他说：“道里新城大街。咱们马上走！”

到了新城大街，我们正往前走着，山西王忽然暗中拉了我一下，我忙随着他那目视的方向往前一看，只见迎面走来一个穿黑色长衫、制服裤子的中年人。当这人走近我们的时候，我见他那敏锐的目光正和山西王的眼睛对成一条直线。山西王一侧脸，用下颚对那人指我一下。

那人明白了山西王的眼色，他看看我，嘴角上挂着一丝轻轻的笑容。这时我知道了，我面前的这个人，正是我急于见面的新的领导同志。当我扭过脸，用目光询问山西王的时候，他已经迈步走进街市的人群中去了。

这时，那人看了我一眼，又向我眨眨眼睛，就迈步穿过摩电



车道，向北走去。我装作散步的样子，偶尔用眼瞟住那人的身影，沿着他的去向来到松花江边。

这时已是天色沉暮的黄昏了。落日的余晖染红了滚滚的松花江水，江心上船只荡漾，江沿边游人徘徊。我见那人在江沿上拣了个僻静的挨近水边的石阶上坐下了。为了应付这周围的环境，我假装和那人是老相识，从地上拣起一块小石子向他头顶扔过去，石子落在水里，在他面前溅起一片水花。他扭过脸来嘻嘻笑着，颇象老相识似地向我一招手。我挨近他的身边坐了下来。

我们看看身后的江岸没有游人，望望眼前的江面上也没有船只，这正是谈话的好机会。

“我叫张守仁。”我将肩膀挨近他的身边，把化名告诉他，紧紧握住他暗中伸过来的手。

“我叫王鼎三。”他亲切地笑笑说，“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了。现在老罗已经不在这里，李升同志最近要出去跑一次交通，暂时你和我直接联系。”

我点点头。他稍微沉思了一下说：“老罗知道你的住处不？”

“从前的住处他知道。现在我又新换了一个地方。住在医专同学朱协的院子里，他是青年团员。”

“那好。”他慢慢扭过头去环视一下周围说，“现在先把我们的社会关系订好，以防万一。我现在的职业是中学教员，我们的关系可以在这上面打主意。”

我们俩研究了一下，确定为：王鼎三同志是我哥哥的老师，我是榆树县土桥子人，要投考医专，求王老师给我帮助。

订好了社会关系，我就向他汇报工作情况。我发现，他对地下工作的技术问题非常注意、非常细心。他在听完我汇报以后又着重说：“在敌人统治下的地区里工作，一定要细心，每一个细

微的地方，都要花费心思，稍微有一点漏洞，被人察觉，就要坏大事。‘宁使想到而不用，不使有用而忽之’。”

正说到这里，突然从江心里传来一阵‘嘟嘟’的吼叫声，水面上迅猛地滚过来一排排的波浪，一只插着日本旗的“江兔子”（一种小型汽艇）从西往东开过来，尖尖的船头从水面上翘起来，船屁股紧压在水里，象条鳄鱼一样横冲直撞。浪花洒满江心，旋涡滚滚，所有江心的小船都拚命向江边逃去，两个日本男女在汽艇里咧开大嘴乐。见这情景，我忍不住的气往上撞，王鼎三同志也眼望着跑远的日本汽艇，愤愤地说：“他们横行霸道的的时间不会太久的，我们时时都在打击他们，往致命的地方打！”

天色黑下来，松江两岸亮起灯火。王鼎三同志知道我还没吃饭，就拉着我的手站起来说：“走吧，吃饭去。”他又笑着说，“我能供你吃饭，不过饭菜可能简单些。”

我笑着和他沿江走去。他又边走边说：“我说吃的简单些，不是因为没钱，我有钱哪！我在中学教书，又在别的学校里兼课，收入不少呢。除了家用之外，我都交党费了。”

我知道，这时省委活动经费相当困难。由于敌人的侵略，关里和关外被分割，敌人封锁得紧，中央给的经费不易带过来，能够带过来的数目也有限，因此就靠一些有职业的同志自觉地拿出自己的工薪，补充经费的不足。想到这里，我说：

“能够吃得饱就好。”

“对，‘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现。’我们找个实惠地方，饱餐一顿。”

他领我到“白宫饭店”，这是个“一角钱”的饭馆。所谓“一角钱”，就是所有的汤、菜、饭都卖一角钱，饭菜便宜可口，地点又僻静，顾客也不多。我们花了四角钱，吃得很香，看起来他在这上也用了心思呢。

从“白宫饭店”出来，我们就分手了。后来我才知道：王鼎三同志家里有妻子和五个孩子，每到开薪的时候，他只留下最低的生活费用，孩子穿着上补丁的衣裳，家里吃着粗米素菜，他把节省下来的钱全部交给组织上作经费。就象他把自己的赤心，完全交给党一样。

## 紧 急 情 况

前面说过,我已经从张克勤的住处搬到高士街朱协的宿舍里。他们两个都是医专学生、青年团员。朱协在思想上表现得比张克勤更激进一些,对我也表示出一股特别的热情,一定要我搬到他那里去住。我因为他自己住一间房,比张克勤的住处清静些,就搬去了。

这时,李升同志出去跑交通,偶尔我也到道外去送宣传品,有时材料取来,来不及送出去,需要带回来,就感觉很不方便。朱协经常领回来一些同学,在屋里说说唱唱。都是二十几岁的青年,不安静,一间屋子,哪里不翻到,使我非常担心。我把这情况向王鼎三同志汇报了,他决定让我自己租间房子。凑巧,就在朱协住的院里,空下来一间白俄小房子,租金十三元一个月。我便租下来,搬进去了。

就在我搬进新房的不多日子,一天,吃过晚饭,正凑在窗前看书,忽然门一开,进来一个人,戴顶草帽,穿着串绸大衫,当门处光线较暗,骤然间看不清面目,直到他又往前走了一步,我才认出,嘿!原来是冯仲云同志!我一下从椅子上跳起来,扑过去,紧握住他伸出来的手,说:

“你怎么才回来?可真让人担心哪!”

“不完成任务，怎么能轻易回来呢。”

“我真怕你在吉林不能脱险。”

“吉林车站当天就戒严了，我和傅天飞同志是从黑牛圈车站（即北山站）上的车。”他摘下草帽，拉着我坐在床上说，“出了吉林，又遇了好多风险，但是终于完成了任务。”

“那么你又跑了好多地方？”

“整整转了一大圈，路上的事情一言难尽，等将来有工夫再细说。好在我也不走了。”

“你不走了！”我高兴地说，“这么说我们能常见面了？”

“不但常见面，还要在一起工作呢。”

“在一起工作？”

“对。”他点点头说，“老罗走了，王鼎三同志也另有任务。省委决定由我代替他们的工作，从今天起，你就直接和我发生关系。”

“这太好了！你经验多，会给我更大的帮助。”

“我知道你在这里工作得很好。你的情况王鼎三同志都和我谈了。你的工作安排，暂时还都照旧，和我接头的方法也照旧。等我把别的方面工作安排好了，咱们再详谈。”他看看表说，“今天我还有别的事情，不能多坐了。”

他刚拿起帽子要走，又停下说：“我们的社会关系，也按照你和王鼎三同志所订的那么说吧。最近要特别提高警惕。据可靠的消息说，敌人要进行大搜查，所有的宣传品都要及时送出去，最好不要在宿舍里过夜，要多加小心。”

仲云同志走了。我按照他的指示，把残留的宣传品都送出去，我更加警惕起来。

果然，不出几天，市面上就紧张起来，街道上随时都发生临时戒严的情况（伪满初期，日寇统治不稳，经常用临时戒严的手

段镇压人民)。半夜里时而车鸣犬吠，敌人开始了大搜查。

一天，冯仲云同志忽然通知我到马家沟教堂街旁边的公园里去会面。我接到通知，急忙去了，坐在我们过去见面时的条椅上等他。不久，冯仲云同志提着一个很大的包裹喘吁吁地来了，他急忙把包裹递给我说：

“这是一包新宣传材料，现在情况很紧，不能多转手了。你立刻把它送到道外十四道街劝业商场三楼去，交给老胡，让他马上发出去。”

这位老胡是呼海路站长、共产党员。我一边答应着一边接过包裹来。用手一摸，包得很松，一条线毯子，赶着四角在上面系了两个大疙瘩，外面又裹了一条花单子，看上去既不象行李，又不象衣服包，扛在肩上又小，夹在腋下又大，这样个四不象的东西，拿在街上走，岂不危险。我忙向仲云同志说道：

“想办法伪装一下吧，这样容易惹人注意。”

“来不及了。”仲云同志向周围迅速地巡视了一下说，“这里也不能久停，拿到马路上，叫辆车送去吧。”

既然来不及伪装，当然行动越迅速越好。我便毅然拿起包裹，向仲云同志说：“好吧，我一定想法送到。你从另外路上走吧。”

出了公园，正好有一辆空斗车，我让斗车直奔南岗，再去道外。这条道比较肃静，一般的临时戒严都在热闹街口，偏僻街道轻易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只要不遇上戒严，就可能平安完成任务。

北方的斗车，是一种两轮马车，后座比赛马场的车大，可以坐两个人，踏脚处有一块方桌大小的地方，象斗形——斗车的名字可能就是从这里来的。我把包裹就放在这“斗子”里，用手按了按，高矮和下面的挡泥板差不多，从外面看不显眼，然后把两

只脚踩在上面，端然正坐。这时斗车已经跑过了南岗，眼看就要到道外了。我的心不由得有些紧张，去“劝业商场”，道外的几个热闹街口，真象几道关口一样，是无法回避的。

斗车奔驰着，穿过许多马路，越过桃花巷，转眼就要到正阳街口了。我注意向路两旁观察着，如果前边有情况，这里的行人一定会有反映，而且一定会有便衣特务混杂在行人中进行监视。但路上的行人很稠密，车又跑得快，竟使我目不暇接，无法判断清楚。忽然，我发现正阳街口上，站着好几个全副武装的伪警察，正在堵截车辆，盘察行人，不由得全身一阵紧张，向左右看了看，没有胡同，也没有岔路，有几个行迹可疑的人，站在一个小饭馆门前，用贼溜溜的眼睛盯着行人和车辆。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车既不能停下，更不能磨回去，那怕稍一犹疑，都会把“警犬”的狗眼引过来。眼前只有一条道，往前走，不回头。决心一下，心里反倒安定下来。这时车已经接近警戒线。我留神观察，几个警察搜查得并不很仔细，象例行公事一样，问问、摸摸就过去了，可能是连日的搜索收获不大，他们也有些松劲。但无论如何，这个形势对我是非常严重的，只要敌人的手碰到这个四不象的包袱上，几支枪口就会立刻转向我。我个人的安危事小，党的工作受到损失事大。宣传品就是发行员的生命，无论有什么客观原因，不能完成党的任务总是终生遗憾。

车子已经到了警戒线。这时我只有一个在当时看来几乎近似幻想的希望：不让他们注意包袱，要想办法……有什么办法呢？只好见机行事了。

马的脚步放慢了，前边先停下的两辆车，正在受盘查。我迅速地从车上跳下来，正要迎着—个警察走过去，忽然那个警察向我一龇牙，挤出一个干笑来。我象条件反射—样，也向他—乐。他接着又点了点头，说：

“你是哪个所的？”

“我……”我忙顺口胡诌道，“协和所的。你们辛苦了，还没换班吗？”

“遇见事，加班了。”他苦笑了一下。同时把头一歪，嘴一动，表示我可以走了。

我又笑着点点头说：“有空过去玩。”一迈腿上了车，车夫鞭子一摇，过了警戒线，往前跑去。

这个戏剧性场面的出现，真使人意想不到。为什么他对我这样客气？问我是“那个所的”，这个“所”指的是什么？真不得而知。我伸手摸了摸头上渗出的汗珠，又去裤兜里掏手帕，当我一低头的时候，发现自己下身穿的是条和警察制服一模一样的黄裤子，忽然心头一动，又摸了摸上边穿的白衬衫和头上的麦秸草帽，一下恍然大悟：我这身打扮竟和便衣警察类似，他一定误认为我为换班后的警察了，因此才问我是哪个“所”的。而我胡诌一个“协和所”，正和马家沟的“协和街派出所”对上了号。

找到了原因，心里一阵轻松，虽然前面还不是坦途，但是心里有了底。果然，在五道街口，又站着几条拦路“狗”。迎着他们，我镇静地从车上下来，装作亲近的样子向他们点着头说：

“辛苦了，还没换班吗？”

“你是哪的？”一个警察也点点头问道。

“协和所的，才换班。”

那个警察从头到脚打量我一番，一摆手，斗车又过去了。

我坐上车，不由得又看了一眼黄裤子，心里忍不住地笑了。



## “敖连特”影院前

当年七月，省委决定调我去反日会工作。反日会是省委领导下的三个抗日群众团体之一。书记是山东老徐，还有一个于洪同志，专做青年工作，我的分工是负责发动和组织船夫。

松花江上的船夫，多半是划小船的，他们和马路上的洋车夫一样苦，完全是靠自己的力气生活。一年四季，靠江吃饭，夏天光着黝黑的臂膀划小船；冬天穿上老羊皮袄滑爬犁。从江南到江北，从道里到道外，这种小船和爬犁特别多，爬犁滑行在冰上，不但比小船快，而且比马车还快，人们很喜欢坐，所以到冬季江上也很兴隆。船夫多半是山东夏津和河北盐县人，成帮成伙，重义气，讲交情。我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就想法学了一些河北盐县和山东夏津的土话，熟悉了一下当地的风俗民情。然后就去和他们接近。我先去观察了两天，挑选其中一个老成的人为对象，先坐他的小船，和他谈家常。我已经知道他是河北盐县人，就先向他说我是盐县崔家口的人，小时候家乡闹灾荒，再加上“老缺老杂”（盐县土话，土匪的意思）也多，所以就跟“俺呀”（我母亲）来到关东……他一听，非常高兴，越谈越近。我告诉他，我是失学的学生，找事情找不着，将来也想租条船划。我们谈得很亲热，一下子就变成了乡亲。有了一个乡亲，几天后就串连起好多

乡亲。我经常去帮他们划船，写家信，在一起吃饭，有空就聊天，天数长了，我就向他们讲抗日道理。这些船夫，受尽日本鬼子和警察特务的欺压，一谈抗日，都摩拳擦掌、义愤填膺。反日会的旗帜打得又非常鲜明，所以不久就发展了一批会员。

正在这时，我接到一个通知，要我在第二天的下午两点钟，和道外区委书记老张同志见面。地点在南岗“敖连特”影院前边。

接到这个通知，使我兴奋得一夜也没能睡好觉。原来这个区委书记老张不是别人，正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久思不得一见的良师益友。到了哈尔滨以后，我曾几次想和他见面，都因为没有工作上的必要，搁置了。他的情况，虽从领导同志那里打听到一点，但都是有限的，现在我就要看见他了，怎能不激动。好容易熬过了一夜和大半天，没到一点，我就往南岗走去。

“敖连特”电影院，是一家白俄开办的小影院，地点离南岗秋林洋行不远，影院虽不大，门前却也热闹，烟卷床子，卖酸梨、瓜子、落花生的，散乱杂人总不断，过往行人，有时也停下脚步，买点小吃食，或者看看电影海报。我赶到这里，还差十几分钟才到两点，按惯例，应该不迟不早到这里才好。但是这一次我却不愿再去别处徘徊。我一直向影院里走去，想要先到售票室里转一圈，看看有没有形迹可疑的人，然后再到外面等他。谁知当我才踏上门口台阶的时候，忽然一眼瞥见有一个高个子穿便服的人，正站在电影照片橱窗前边看得出神，这人背对着我，看不见面孔，从那微驼的后背，稍嫌瘦削的肩膀上看，正是老张同志。莫非他也和我的心情一样，急于见面，提前来了？这时我正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不便马上退出来，只好先走进去。到了里面，稍微停了一下，忙转身出来，一看橱窗前边，人没了。我忙往四下扫了一眼，却见这个人顺着马路往南边走去。从走路的姿势上看，正是他。我心里一喜，毫不迟疑地跟上去。我盼望他能回头看看，可他

目不斜视地只顾往前走。我心里渐渐纳起闷来，他也没看见我，怎么就走了呢？莫非是好事多磨，有“狗”盯上了……这时正走到秋林洋行的橱窗前边，我忙停下脚步，装作看陈列的商品，借机侧过头去往来路上看了看，后边没“尾巴”，也没有形迹可疑的人。这时老张同志已经走到大直街口上，一侧身，竟顺着秋林洋行往里拐去，在拐弯的时候，竟也没回头，真让人琢磨不清。不管怎样，我是要跟住的。我忙离开橱窗，跟踪而去。这时我也拿定了主意，反正我不让你离开我的视线，你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今天总要见面。

大直街上有两个大教堂，一个尖顶，一个圆顶，圆顶的雄伟宏大，青铜色的圆盖，坚实的墙壁，象一座宫堡。有两个老白俄，正站在教堂前边画十字。他们捏着指头向头上、前胸、两肩飞快地点画着十字，画完颤颤巍巍地走了。这时，前面的老张同志也正走到教堂前边，面对着紧闭的大铁门站下了，只有这时，他才象漫不经心的样子，侧过头来向我这边望了一眼，当他的眼睛扫到我的时候，微微地一笑，不露痕迹地点点头，然后转过头去，竟也对着教堂画起十字来，我心里一乐，知道这是等我呢，忙紧走两步，站在他的身边，也学着他的样子画十字。他画得好象很虔诚，并不瞅我。我却忍不住地悄声说：

“你怎么不等我就走了呢？”

“你从远处一来我就看见了。那里人多，不好见面，就引你往这边走来了。”

“可是我要真的没看见你，没跟你走呢？”

“那我就再遛跬回去，反正你见不到我不会走开的。我心里有底。”

“你有底我可没底了，弄的我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我忍不住笑了说，“你真沉得住气，连头也不回一下。”

“这也是个锻炼。”他也笑了笑说，“哈尔滨这个环境复杂极了，中国汉奸、日本特务、国际奸谍，应有尽有，道外的环境更乱，不加小心，就要误事。譬如我听说你来了，心里多想见面哪！但是处在这样环境里，多见面不如少见面，没有工作上的必要，最好是不见面。”

“那么今天是有工作上的必要了？我忍不住问了一句。”

“两种原因都有。”他点点头说，“工作上的安排，老徐要传达给你，我却自己揽过来了，这叫公‘私’兼顾。”

“希望你能经常这样‘兼顾’才好。”

我们两人对看了看，都笑了。

大直街上，行人不多，我们信步又转进一条街道上去。这里更加幽静，街两旁间杂些白俄住宅，偶尔有几个白俄妇女在树荫下嬉笑，使这条街充满了异国情调。

“你的工作情况我都知道了。”他收住了笑容说，“今天我们时间有限，不能总在街上转哪，抓紧时间谈工作吧。”

我点点头，他又说：“省委决定，七月三十号，就是‘八一’的前夕，要在道外区搞个‘飞行集会’，由我们党出面和群众公开见面。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发动群众的工作。你回去就把船夫当中的反日会员组织起来，让他们再串连可靠的积极分子。在三十号十二点钟以前，陆续地到五道街和七道街之间的王麻子膏药铺前边等着，正午十二点，以爆竹响声为号令，哪里爆竹响，大家就迅速往哪里围，要把讲话的人团团围住，不让坏人钻进去。”

“讲话人是谁？”我忍不住地问道，“是你吧？”

“嗯。”他微笑着点点头，“讲的很短，主要是宣传党的抗日政策。讲完了要分些人拥着讲话的人走，等讲话的人换完衣服，大家再分开。”

“换衣服？”

“这叫‘金蝉脱壳’。”他笑着开了句玩笑。稍停了一下又接着说，“讲话一开始，除了我们自己的人以外，会迅速地招引来好多其他听众，连警察和特务也会招来，等他们分清楚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我们的会也快散了。不过我们在准备的时候一定要携带‘武器’，要准备一场‘武打’。”

“我懂了。”我点着头说，“让他们暗藏着石灰粉和铜大钱，有警察和坏人动手的时候就往他们脸上摔。”

“对。不必每个人都准备，挑几个精壮的小伙子就可以。会员要有分工，谁掩护讲话的人，谁对付敌人，谁撒传单，谁领着喊口号，要好好组织一下。”

“我知道了。”

“这次‘飞行集会’省委很重视。我们是针对着敌人的猖狂活动给他个迎头痛击，一方面唤起民众，一方面打击敌人。参加集会的除了党和团的组织之外，道外区的三个抗日群众团体——工会、革命互济会和你们都要积极参加。有人提出来还要和你们搞竞赛呢！”

“是谁提出来的？”我想了一下说，“是不是李世超同志？”

“你真会猜。”他亲切地笑了一下说。

这时候，我们已经出了街头，正来在一个十字路口上，他放慢脚步，说：“你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我兴奋地说：“你放心吧，一切都没问题，竞赛起来我们决不落后。”

说完，他就向前边一直走去。我向东一拐，走上了另一条街道。

我一边走着，一边盘算着回去怎样开始工作，怎样发动群

众,越想越兴奋,脚步也越快起来。这时我当然不可能知道“飞行集会”是一种“左”的冒险主义的做法。我只是被这轰轰烈烈的英勇壮举所吸引,心情振奋,欢欣鼓舞,只盼这个“集会”早些到来,给敌人一个迎头痛击!

## “八一”前夕

北市场五道街和七道街一带,是个最热闹的地方,光王麻子膏药店就数不过来,一家挨一家,大小匾额上写着各种王麻子,除了真王麻子、老王麻子、真正老王麻子等之外,还有自号为“假王麻子”、“真假王麻子”的,一个王麻子大家抢着叫,弄得真假不分,良莠难辨。

王麻子膏药铺北边是一排饭馆,饭馆旁边是一些卖衣服的,还有茶馆、小吃铺、缝穷的……再往里去,就是妓院。每天从早到晚,人流不断,三教九流,都往这聚。在这里,几个大子儿,就可以吃顿饭;衣服破了,也有人缝,所以码头工人、船夫、洋车夫等也往这里来,至于其他的散乱杂人,更把这里当作“消愁解闷”的地方。

今天——七月三十号,将近正午的时候,这里聚集的人越来越多,每个王麻子膏药铺前都聚拢好多人,卖狗皮膏药的把王八盖子敲得山响,说得嘴角直冒白沫子;饭馆、茶馆里座无虚设,门里门外,人流不断,连缝穷的老太太身旁都围了一些人。

钟声方要敲响十二下的时候,有些人离开了原来站的地方,在行人中“闲逛”;有的虽未离开,却不时回头张望;小饭馆里,算饭帐的人多了,茶桌上的空碗多了……

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出现在五道街的街口

上，他下穿齐膝盖的短裤，上穿翻领的短衬衫，红红的脸膛上闪烁着一双火辣辣的大眼睛，一头短发好象要冲天竖起。他一只手拿着点燃的烟卷，一只手插在短裤兜里，迈着矫健的脚步，来到五、七道街最热闹的地方。他接连用力地吸了两口烟，使烟头上的火烧旺，紧接着，把另一只手从裤兜里迅疾地拔出来，手里握着一个红色的东西，烟头往上只一凑，手一扬，叭的一声，一个爆竹响了。

就在这同时，一个戴眼镜的高个子中年人站在他旁边，另一个彪形大汉夹个布包，一只手拿个板凳，一只手攥根竹竿，紧站在高个子中年人的背后。

一声爆竹，在这个喧嚣的市场上，本是微不足道的响声，今天却象一声霹雳震撼天宇，惊动了四面八方的人。只见爆竹的青烟还没有消散，忽拉一下人们就把这三个人包围起来。一刹时，各个热闹场所的人都随着爆竹的响声往这里猛跑。有些不知发生了什么新鲜事的人，看见人们都往这一个中心汇集，也都接二连三地往这里跑来……

就在这时，一面鲜红的大旗在密集的人海当中竖起来了，红旗下面，站出了那位高个子中年人，他的上半身突现在千百人的头顶上，庄严的面孔，露着激动的笑容，这正是中国共产党道外区委书记老张同志。他迅速地向周围环视了一下，然后把手一举，放声高呼道：

“父老兄弟姊妹们！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今天在这里和大家公开见面了！”

千百人一下子静下来，远处的人继续往这里跑，王麻子膏药铺前的热闹场上已经没有听众了，只扔下卖狗皮膏药的人扎撒着手向这里张望；每家饭馆的门都大开着，人们嘴里一边嚼着饭一边向这里跑；擦皮鞋的背着箱子往这里跑；打竹板的，抽贴算



卦的，剃头的都往这里跑，几条街上的人都往这里集中，集中……

“爱国的同胞们！”老张在红旗下面挥舞着手臂喊道，“我们要携起手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东三省，要把日本强盗赶出去……”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人群里突然举起一只手愤怒地吼道，“日本强盗滚出去！”“誓死不当亡国奴！”

千百只手同时举起来了，愤怒的吼声响彻云霄。

几根电线杆子都爬上了人，一迭迭传单从上面抛下来，传单在人们头上飘摇，落在密集的人丛中，人们抓住，互相传递。

几个警笛同时在人们的背后嘶叫起来，但叫声才起，却又戛然而止。白石灰面子在半空里飞扬，几个武装警察一霎时都变成了白脸曹操，警笛落在地上，远处的警笛接着响起来，警察象警犬一样往这里狂奔。

红旗仍然在飘扬着，讲话的人和群众融合在一起了。霎时间分成几股人的洪流，向几条街内分头走去。走在后面的人想要再看一下讲话的人，可是摸不清他走在哪股人流里。有几个歪戴帽子的家伙，跟在人群后面瞎撞。

远处的警察跑来，蹲在地下的“白脸警察”挣扎着站起来，眼泪和血水混在一起，白脸变成了花脸，他们忍着痛睁开了血红的眼睛，恐怖地向场内张望。场上的红旗仍然牢牢地插在地下，红旗下已空无一人，只剩下几张传单，随着微风在地下飘动。

警察们急得暴跳了一阵，一个人也没有抓到。只好拾起传单，拔下红旗，扛在肩上去向他们的主子报告。

红旗在街上飘扬，过路行人抬头仰望着红旗，激动地笑了。

“飞行集会”过去了。在总评“集会”工作的时候，李世超同

志负责的“革命互济会”得到了第一位“飞机”的称号。我们反日会被评为第二位——“火车头”。工会名列第三。

在这次工作中，值得特别写一写的就是放爆竹的那位年轻的小伙子——“飞行集会”的“司令员”小王同志。

小王是道外西门脸天合印刷厂的青年工人，当年二十一岁，是个勇敢的共青团员。当他接到“司令员”的任务后，兴奋异常，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挑选下三个爆竹。但他还怕到时候出事故，又买了一个灯泡，万一爆竹响不了，就摔灯泡，反正到时候得响一声才行。

“飞行集会”开完以后，他兴奋得一夜睡不好觉，躺在床上想呀想，想来想去又想出一件激动人心的事情来。他一夜中做好了行动计划，天一亮，就把自己的想法悄悄地向团组织作了汇报，团组织马上批准，同时让另一个青年给他作助手。

这天是七月三十一号，“八一”的前夕，小王要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写在耸立于车站前边的伪满“建国纪念碑”上，向“八一”献礼。

哈尔滨车站是全市的交通要冲，通往道里、道外、南岗、马家沟的电车在这里换车，大汽车在这里始发，人力车排成行，小汽车排成队，上下车的旅客和来往行人昼夜不停。日本宪兵、警察、特务把这里作为监视重点，特别是在“节日”（包括革命的节日）前后，这里的反动机器转动得更欢，“狗”更多。

小王同志了解这一切情况，正因为了解，他才挑选了这个时间，这个地方。他要把反日的口号写在敌人的头顶上，写在稠人广众之中，写在交通要道之间。

这天白天，他和同伴凑了十二元钱，买了一小桶上好的“拉哈油”和一把毛刷子。一桶油就是十二元，够他一个月的饭钱了，但他一点也不可惜，只盼这种驰名的油漆能把“纪念碑”那麻

面洋灰的厚壁钻透，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八个大字深深地镶进去，水刷不净，刀刮不掉。

夜越来越深了。喧嚣了一天的哈尔滨已进入梦乡，街道上静悄悄的。车站前边虽然还有车辆来往，但是也比白天少多了。电车和公共汽车都已回库，只有出租的小汽车和人力车还在这里等着接站。等车的乘客都蹲在票房里，只有那些象幽灵一样的警察特务们，还不时地在车站前边逡巡。

午夜十二点的时候，小王和他的同伴悄悄地来到车站前边。他们两个完全换上了一身黑衣服，连“拉哈油”桶都用黑布裹上，真象武侠小说中的夜行人一样。他们很快地溜到“建国纪念碑”下边，定了定神，靠在东面碑根下向左右望了望，又侧耳听了听，忽听见西面象有人在说话，忙把“拉哈油”和毛刷子放在碑根上，站起身来，蹭到北面，仔细一听，原来是两个小偷因为分赃不均，在吵架。

小王忙一拉同伴，悄悄说道：“小偷吵架，招风，先躲躲。”

他们刚要走，只听见一个小偷说：

“‘狗’来了，快走！”

还没等小王他们迈步，两个人影从西边碑根下颯地一声窜过来，好险没撞在小王身上。小王两个人忙屏住呼吸把身子紧贴在碑壁上。两个小偷从他俩面前擦身而过。紧接着，警察的腰刀碰着皮靴哗拉哗拉的响声清晰地传来，一个细长的家伙从西面走过来，顺着两个小偷的去路张望着。警察站的地方离小王他们俩只有五六步远，一回身就会被发现，正在万分紧急的时候，忽然远处一声火车长啸，接着只见所有的人力车都向收票口拥去，汽车马达也开始发动，收票口前的灯亮了。站在小王他们前面的这个细长的家伙，也急急忙忙奔向收票口。

“纪念碑”前静悄悄的。

“有火车进站，好机会，快动手！”小王一拉同伴，急转身到东面碑根下。东面正好背对着收票口，很僻静。马路上的灯光，射到这里已经成了“强弩之末”，昏昏暗暗，很不易被人看见。小王一把抓起毛刷子，一手提起“拉哈油”桶。

那个小伙子忙面壁站好，两脚一叉，接过油桶说：“快上！”

小王双手按住同伴的双肩，轻轻一耸，两脚扣在同伴的腰眼上，又一使劲，膝盖便跪在同伴的肩头上，一手扶墙，一手接过油桶，往起一站，把毛刷子伸进桶里沾好油，晃开膀子写起来。

“小王，大点写，越大越好！”同伴本来看不见小王在写，这时却象看见一样，一个劲儿让往大写。

“瞧好吧。”小王满有把握地悄声说，“离八里地就让他看见……哎，往北挪挪，再挪……好了。”

收票口那边人声嘈杂起来，小汽车的喇叭开始响了。

“还有几个字？”

“两字，”小王悄声说，“不要紧，沉住气，有碑挡着，看不见。”

第一辆小汽车从碑西面开过去了，接着北面又有车向道里开去……

“别忙。”小王一边写一边说，“‘主’字油少，我再描描。”

又有台人力车跑过去，步行的“大队人马”声越来越近。

“好了！”小王兴奋地说，“蹲下！”

同伴将身往下一蹲，小王跳下。互相拉一把，便转到南边的碑根下。这时走在前头的下车旅客已经和碑身平行，这是往道外和南岗去的。

“走吧。”同伴一拉小王说，“正好掺到人堆里去。”

“不忙。”小王从碑的西南角上探出头去往收票口方向望了望说，“人还没放完，所有的‘狗’都在那围着，咱们再转回去看看咱们的‘大作’。”

说着，两个人又转到东边，东边仍然是静悄悄的。往道里去的人从北边走，往道外、南岗、马家沟去的人从西边走，这边马路上竟没有什么行人。他们俩迅速地离开碑身，回头一看，两个人不约而同地乐了：

“好，写得棒！”同伴高兴地说，“真够大了！”

“小点声！”小王忙拉他说，“快走吧。”

两个人轻快地走上东面的人行道，他们手拉着手，嘴里还吹着口哨，就象从哪个通宵的游艺场里玩罢归来一样欢快。

“八一”的太阳从东方露出了红脸，鲜艳的红光直射在伪“建国纪念碑”的墙壁上，那上面“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八个鲜红大字，个个都有缸口大，迎着火红的太阳，红上加红，光辉灿烂。

车站前边戒严了。一辆一辆日本宪兵队的摩托车停在“纪念碑”周围，鲜红的大字下面站满了暴跳如雷的日本宪兵，一些伪警察手足无措地忙乱着，他们在碑墙根下架着梯子，从日出一直闹到日中，用水刷，用汽油抹，用斧子砍，好歹才算把字迹弄模糊。

字迹虽然模糊，事情却深入人心，没出一天，就传遍了哈尔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八个红色大字，写到哈尔滨人民的心里了。

不久，日本帝国主义的官方报纸《大阪每日》及《朝日新闻》也不得不登上这条消息。

小王同志是个真正的优秀工人，是个英勇机智的青年，对党、对革命忠心耿耿。只可惜从我离开哈尔滨以后，至今不知他的下落。我不知他在哪里，但他却一直存在于我的心中。

## 机关“家庭化”

九月，船夫中的反日会工作已经完全开展起来，几个比较集中的停船地点，如中国大街，炮队街，道外五、七道街，都有了反日会的组织。这时，省委指示我把反日会的工作交出去，由省委宣传部负责人老姜同志和我面谈新的工作。

我和老姜同志见了面。他是个瘦高个、长瓜脸的中年同志，说话慢声慢语，态度非常和蔼可亲。他告诉我：省委决定由我负责组织一个机关，专搞印刷和发行工作。现在冯仲云同志到外地去了，我的工作暂时和他联系。接着他向我讲了印刷工作情况和对我的要求。

原来山西王已经调走，印刷和刻蜡版等一整套工作都由小白同志做，尤大嫂负责掩护他并当助手。小白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刻一手好钢版字，端端正正的仿宋体，写得又小又真，一丝不苟。他工作能力很强，年纪又轻，精神头也足。所以一开始还能应付，后来需要刻印的材料越来越多，除了经常不断的宣传材料之外，还有党内文件和省委编的《东北民众报》。他住的环境好，机关巩固，有时白天也可以工作，虽然如此，工作还是干不完。一忙，就容易出差错，影响宣传材料的质量。因此，省委就决定把刻蜡版和印刷两项工作分开，小白同志专门刻蜡版，印

刷和发行工作由我负责，两个机关分开，由尤大嫂来往传递蜡纸。

印刷和发行是个重要机关，如果没有固定、安全的环境，根本就不能开始工作。因此老姜同志要我先租一所清静的房子，然后组织一个家庭，使机关家庭化。这两个要求对我都是难题。我原先住在高士街的房子已经退掉。几个月来一直没有定居下来，现在临时现抓，环境还须清静，哪有那样现成的。至于家庭化，更有困难。吉林的家和我根本没有联系，我不知道那里的敌人是否还在追捕我，没法将母亲、妻子接出来。真家搞不成，假家就更难了。老姜说：有一个政治上很可靠的女工，患了骨结核病——长“漏”，卧病在床，不能工作。如果我实在没有合适的对象，可以暂时和她同住机关，报上夫妻关系。但她只能起掩护的作用。我表示再找一找看。我多么盼望能有一个有工作能力的同志和我在一起呀。

我找到了李世超同志，请他替我想办法。他向我提供了一个非常宝贵的线索。

原来我们在吉林的时候，有一位叫秦淑云的女师学生，是世超同志的学生和老乡，由世超同志介绍参加了共青团。她工作积极，性格爽朗。我第一次在李世超同志那里见到她时，她向我侃侃而谈，毫不象当时一般女学生那样忸怩作态，娇揉造作。她告诉我她们有姐妹二人，妹妹叫秦淑华，在女中读书。她们出生在封建家庭里，小时候死去了母亲，和继母关系不大好。当时伊通女中教国文的有一位叫冯铁生的老师，常给他们讲一些革命道理，她们一些进步同学就在冯铁生老师的影响下，开始了革命活动。后来，她才和妹妹转学到吉林读书，她在女师，她妹妹在女中。我一听她谈的冯铁生非常象我在文光中学读书时的冯老师，一问，果真是他，我们都非常高兴。我们都是在冯铁生老师

的指引下接触革命的,无形中彼此间更多了一层了解。以后,我们虽然不常见面,但是从李世超同志那里不断听到她积极工作,敢于斗争的情况,我对她是信任的。吉林党组织遭到破坏后,我也很替她担心。这时,听到李世超同志提到她,就忙问她的情况。世超同志告诉我:他在街上遇见了一个姓潘的学生,说秦淑云现在逃到长春,躲在她姑妈家里,书念不成,家也回不去,很苦闷。我听到后,忙向李世超同志要了通讯处,又找到老姜同志,向他汇报了秦淑云的情况。老姜同志听到后很满意,要我立即去信,暗示她来这里可以为革命继续工作,希望她快来。我连夜写了信。

真象俗语说的:“孩儿离不了娘,瓜儿离不了秧”,革命同志离不了党。只身逃到长春的秦淑云同志,见到我的信,立刻毫不犹豫地来到哈尔滨,准备接受党分配给她的新任务。

她来得这样快,真出我意料之外。房子还没找到,怎么办?我请示老姜同志,他要我们先找个号房(公寓)住下,报上户口。于是我们就在道里商铺街二十一号租了一间号房。户口上我报名叫张守仁,秦淑云改为张淑贞,是兄妹关系,原籍吉林省榆树县人,一同到哈尔滨来补习功课,准备升学。

有了房子,我们急于想开始工作,便向老姜同志提出了要求。

老姜同志来到我们住的号房,一看象鸽子笼似的一间挨一间,就把眉头皱得老高,又一听我们户口报的是兄妹关系,便摇摇头来。

他和秦淑云同志还是第一次见面,当谈起吉林的情况时,秦淑云同志说:吉林党组织遭到破坏的当天,宪兵队还没到她们学校抓人的时候,女师的训育主任李寡妇就先得到信了,立刻把进步同学监视起来。秦淑云发觉后,当天夜里翻过院墙,逃到长春



谢姑妈家里去了。

老姜同志听到这里笑着问她院墙有多高？

她说：“一丈二的砖院套。”

老姜同志问她：“那么高的院套怎么跳过来的？”

秦淑云同志笑着摇摇头说：“我也不知道当时怎么有那么大的劲头，登着掉砖头的地方就爬上去了，跳下来的时候也没摔坏。”

老姜同志也笑着说：“这就是革命的劲头。不然就是马克思在天之灵保佑了你。”

说得我们大家都笑了。

老姜同志又问秦淑云，吉林还有谁和党、团组织失掉了关系？他对我们说：“和组织失掉关系的滋味最难受了，我们要帮助这些同志回到队伍里来。何况我们现在还非常需要女同志来做机关工作呢。”

秦淑云同志说她只知道毛诚同志在伊通县。还有一个姓吴的女同学现在哈尔滨大北医院当护士。她们俩都是在伊通女中时候就参加工作的，都很积极。毛诚同志更是精明能干，立场坚定。

老姜同志立即同意写信要毛诚同志来。对大北医院的女同学，老姜让秦淑云同志去谈谈，做做工作，如果可靠，即吸收参加工作。

老姜同志临走时告诉我们：这样的环境不但不能开始工作，住在这里还要提高警惕。他要我们再等一等，见我们情急意躁，又安慰我们说：“房子已经有了眉目，很快就会找到，以后工作多得很，不要着急。”

老姜同志走了。我们只好等待。这期间秦淑云同志去大北医院找过姓吴的护士，因为环境杂乱，未及详谈。

一天，秦淑云同志不在，我正在屋里做饭，忽听外面有一个女人声音，说找秦淑云。答话的是房东老婆，她扯着嗓子说：

“我们这院没有姓秦的，你们找错门了吧？”

这时，我的房门正半掩着，我忙隐身门后，顺着门缝向外窥视，只见有两个女的，一个年轻姑娘，一个中年妇人。听见房东这样回答，那个姑娘奇怪地问道：

“你们这院不是商铺街二十一号吗？”

“正对，可就没姓秦的。”房东老婆往前凑了凑说，“这个姓秦的是男是女？什么模样？”

“是女的。”姑娘比量着说，“高高的个儿，瓜子脸儿，短头发，大眼睛……”

她还没说完，房东老婆就抢着说道：“你说这个人好象张淑贞。是不是二十多岁，说话、走路都挺洒脱的一个姑娘？她才搬来不久。”

“正是，正是。”姑娘忙点头说。

“可是她不姓秦，姓张。”房东老婆边说边把手向我们的房门一指说，“她就住在那间房子里，方才我看她出去了。她哥哥在家。你们去问她哥哥吧。”

我忙把身子往里一缩，心里直着急，这是两个什么人？来历不清，身分不明，得怎么应付？正这时，只听那个姑娘说：

“奇怪，秦淑云也没哥哥呀，她只有一个妹妹，我们平常就管她们叫大秦、小秦。”

“一时也弄不清。”另一个女人说，“我们先走吧。”

两个女人道了麻烦，走了。

我轻轻关严门，心里纳闷：这是什么人呢？知道得这样详细，连大秦、小秦都清楚？

不一会儿，大秦同志回来了。我忙问她：

“房东老婆看见你没有？”

她见我问的突兀，摸不清头脑地摇着头。

我接着又问道：“你回来时遇见两个女人没有？”

“什么样的女人？”她愣愣地望着我说，“我没留意。”

我松了一口气，忙把方才发生的情况告诉她。她想了想，一拍手说：

“这一定是大北医院的小吴。”

“你把我们的地址告诉她了？”我一惊问道。

“我因为她那里谈话不方便，也觉得知根知底，就告诉她了。”大秦同志脸一红说。

“唉！”我急得一拍腿说，“你怎么这样粗心！哈尔滨这么大的地方，一个谈话的地方都找不出来？而且既然告诉她，就要说清楚你现在姓张，不姓秦。”

我一时着急，一阵连珠炮，说得大秦面红耳赤，眼睛水汪汪的，咕嘟着嘴喃喃地说道：“我也告诉她找张淑贞，谁知她这样冒失。”

我一见她这样，也觉得批评得急了些，就忍了忍说：“好了，不要说这些了。要紧的是快想办法弥补一下。现在房东老婆必然对我们起疑心，如果她把这些情形告诉她男人，问题就可能复杂了。我们一定要马上想法打破她的疑团，至少不让他们想到政治方面去。然后你再去大北医院，设法告诉小吴她们暂时不要再来。”

大秦同志点头答应着。她也越来越感到问题的复杂性。原来我们的男房东是个耍光棍的市侩出身，现在投靠了伪政权，当了个卫生队长，官虽不大，交际却广，无风还要起浪，如果听见这件事情，哪有不见缝下蛆的道理呢。

我和大秦同志忙着研究了一下对策。吃完晚饭后，大秦同

志去大北医院，我就慢步进了房东的房门。

房东老婆正一个人坐在炕上摆纸牌，看见我进屋，眼珠一转，忙满脸堆笑地移身下地说：“张先生怎么这样清闲，快坐下吧。”

我也笑着坐下说：“队长没在家吗？”

“出门了，得几天才能回来。”

“他老总是忙着。”我暗暗松了一口气，忙又接着说，“我总想得空和他老谈谈，请他指教指教，可是又老不得机会。”

“唉，官身不由自己呀，从打当上这个队长，私官两相，哪用哪到，哪象从前那样清闲自在。这会儿可倒好，号房的事都摞给我了，这么多人家，让我上哪照管得那么周到。这不是，头会就来两个女的，我一个姓秦的女人，硬说住在咱们这，我这记性也不好，就记不住哪有这么个姓秦的。可她说那长相，我又觉着象咱们这院的……”

房东老婆一边说着一边拿眼睛直溜我，说到这里故意停下了，象是在想，可眼睛却盯在我脸上不动。我已经胸有成竹，便微微一笑说：

“方才那两个女人来的时候我正在屋里，我也听见了。”

“啊，你听见了……”她被我这坦率的态度弄得反倒有些尴尬了，“那你知道这姓秦的……”

“正是淑贞。”我不等她说下去就接过来说道。

“啊！淑贞不是张先生的亲妹妹吗？”她故作惊奇地说。

“这话说起来有个缘故。本来我早就想告诉您和队长，实在是因为不大好意思开口。您是最明白不过的人，青年男女的事也瞒不过您的眼睛，我也不想瞒您。我们相处虽然不长，可是很投缘，您和队长对人一片热诚，老住户没有不称赞的。今天您既然问到了，不怕您笑话，我就实话实说吧，还得求您和队长多照

应。”

“唉，咱们娘们没说的。”她往前凑了凑说，“谁没搁年轻时候过过，若有啥为难的地方，你也只管说出来，咱们再想办法。”

“我和淑贞是表兄妹，她本姓秦，叫秦淑贞。我们是从小在一起长大的。”

“哟，我说长的不大象亲兄妹呢。”她挤咕着眼睛说，“你这一说我就明白了一大半，快说说吧，这样事我经的多着呢。”

“后来，我们的感情越来越深。但是，父母不同意我们结婚，没有办法才从家里逃出来。因为没有结婚，户口上就报了兄妹关系。最近我们想把关系改过来，名正言顺地生活下去。”

我的话刚说完，房东老太太就咧着嘴说：“这事儿你们放心吧，我活了大半辈子，净成全人家好事了，‘任破十座庙，不破一座婚’，你们就安生在这儿住着吧，只要你们不当别人说，保管传不出去。”

我从房东老婆那里回来，大秦同志也回来了。果然是大北医院的小吴来找，她已经通知她最近不要再来了。

第二天，我和老姜同志接上了头，汇报了情况。老姜同志说新房子已经找妥，在道里外国八道街（即端街），白俄的房子，两间房，四不靠的独门独户，环境很好。一切家具都由省委安排，过两天凑置齐全，就可以搬进去了。老姜同志又指示说：在房东老太太那里要编好搬家的理由，不要引起她的不满和疑心。在搬到新地点去以后，一定要报夫妻关系。这完全是为了工作上的方便。因为环境艰苦，只好如此，组织上完全相信同志们会自觉地遵守党的纪律，一心为党工作。

我激动地向党作了忠诚的保证。

过了几天，当端街的房子安排好了以后，我向房东老婆说：我们的住处已经被同乡知道了，现在要搬到一个县城里去。房

东老婆深信不疑，她的号房本来是空不下来的，自然不留我们。

这时敌人的户口制度还不健全，还没有建立起一套管制的办法。我们利用了它的弱点，在端街重新报上了户口，户主是张守仁，职业是家庭教师；秦淑云改名为何淑贞，和我是“夫妻”关系，职业是打字学校的学生。

我们搬进了新的住所，在“家庭”掩护下开始了新的工作。

## 风 雪 寒 冬

冬天来了，几场大风雪过去以后，哈尔滨就变得素裹银装，遍地冰封了。

我们住的房子墙坚壁厚，本是易于保暖的，但由于要省下几个经费，火墙总不烧热，所以墙上就渐渐地挂上一层白霜，屋里的温度常常降到零度以下，水放在桌上，有时就冻成冰碴儿。

屋子冷，可我们年轻力壮，冷点怕什么！组织上每月给我们的煤火费，能省一点就省一点；多挨一点冻，就多省一点钱，这冻挨的也值得，也高兴。工作上给我们的乐趣，能使我们抵得住一切困难。

自从搬到这端街以后，印刷和发行工作就开始了。我和大秦同志分工合作，我主要是搞印刷，她主要是搞发行。工作摸索着干，从生疏到熟悉，越干越有劲儿。

我经常到指定的地点去和尤大嫂碰头，取小白同志刻好的蜡纸。说起这位尤大嫂来，还要单提一提呢。尤大嫂这个称呼当然是从尤大哥那里来的。尤大哥是位老党员，满洲省委在沈阳的时候，他和尤大嫂都在沈阳工作。他们俩是从小的夫妻，尤大嫂是山东农村姑娘，裹小脚，梳圆头，和尤大哥结婚的时候，斗大的字认不得一口袋，尤大哥却是喝饱了墨水的“秀才”。两人

一起过日子，尤大哥就教大嫂文化，大嫂也真争气，一来二去就学得粗通文墨了，吟诗作赋不行，读书写信却一点也不费劲儿。大哥因此也很看重大嫂，大嫂对大哥更是一心扑实，大哥的意志，就是大嫂的行动指南，大哥开始了革命活动，大嫂就给掩护，大哥参加了党，大嫂的觉悟也提高了，不久也入了党。从此，她就和尤大哥在一起，风里来雨里去，一心为党工作。后来，满洲省委的某些组织被破坏，尤大哥被捕入狱，尤大嫂因为没被敌人摸到凭据，敌人也根本猜不到这样一个小脚女人会是共产党员，便把她放了。省委转移到哈尔滨，尤大嫂领着六、七岁的独生女儿，和党一同来到哈尔滨，住在省委机关里，管文件、跑内部交通（通称“内交”）、掩护领导同志，分配什么做什么，全部心思都花在工作上。小白同志组织机关的时候，一时找不到合适而可靠的掩护人，省委考虑到这个机关的重要性，就派尤大嫂去了。尤大嫂和小白同志年龄相差很多，不象母子，也不象姐弟，小白就管尤大嫂叫姨。尤大嫂除了帮助小白印刷、搞家务之外，每天都出去送文件和宣传品。她穿着肥大的黑裤子、蓝布衫，挎个针线包，针线包里有各种袜底板，各色碎布头，也有成件的衣服。大一点的宣传品就裹在成件衣服里，小一点的重要文件就掖在裤脚里。她这样挨街串巷一走，谁一看不问而知就是个“缝活的”。当时哈尔滨这样“缝活的”女人多得很，大多数又都是小脚的山东女人。尤大嫂不用装扮，自来就具备一切条件，所以她走到哪里，平安无事就跟到哪里，工作从来没出过差错。

尤大嫂的这一切情况，我是从老姜同志那里听到的，我从心里敬重这位老大嫂，每次见面，都想多和她说几句话。但是我们的会面，又绝大多数是在冰雪满地的寒风里，我们不是怕寒风吹，是怕敌人的耳目众多。

尤大嫂和小白住在马家沟，冰天雪地，她走起路来有多艰难



哪！我怕她多走路，所以碰头地点多数是在教堂街的花园一带。有时遇上风雪交加的坏天气，大北风搅着烟雪，拍得人抬不起头来，路上每个行人都缩起脖子，迈着大步快走，而只有她，象在薄冰上行走一样，一小步一小步地往前迈。每当这时，我真恨不能马上跑过去扶住她，一直把她送回去。但是环境不允许你流露出同志的感情。她走过来时，每看见我总是露出慈爱的笑容，想必是她也有多少话要和我说呀！但是谁也不能多说什么。她小心地把一条裤子或者一件上衣交给我，有人经过时，顶多说上两句“缝活的”应该说的话，然后又慈祥地微笑着点点头走了。风刮着，雪花围着她团团转，望着她那逐渐模糊的背影，不由得想起鲁迅在《一件小事》里的几句名言来：“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她满身灰尘的后影，霎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

每逢我带着这种激动的感情走回家去，就总感到自己的工作做得不够多，不够好，应该更努力，更刻苦。

我们的印刷工作，多半是在夜间进行。我和大秦同志用线毯遮严窗户，关紧门，然后再把火墙的小铁门打开，把火柴预备好，以防万一发生意外时，好烧蜡纸和印成品。

油印机是伪装在一张小桌子上的，从外边看，是一张毫无破绽可寻的小桌子；打开看，也和一般小桌子一样，里面装着乱七八糟的东西。油印机就装在桌子上盖里。所谓油印机，主要是那块细纱，下边玻璃是现垫上去的，油墨辊隐蔽在别处，往起一凑，就是一台油印机。

最初开始印的时候，我们使不好这台特制的油印机，有时整夜的印，屋里非常冷，却累得满头大汗，结果印成的东西质量很低，有些字迹模模糊糊，送到区和群众团体的发行站里，同志们直提意见。工作没干好有啥话可讲呢，我们昼夜研究，又去向小

白同志请教。小白同志告诉我们最好用石印油墨印，用尼丝油调墨，这样印出的字不但不易模糊，而且墨不掉，染不上指纹。回来一试果然好些。这时小白同志刻蜡版也更细心了，用日本最好的“四号掘井牌”蜡纸一笔一划地刻，我们自己也逐渐摸索到一些经验，特制油印机的脾气也渐渐摸熟了，于是工作效率和印刷质量都有了提高。但有一点却不易突破，就是印省委的指示文件，这样文件要送到很远的地方去，为了便于携带，规定用一种非常薄软的白绵纸印，这种纸最调皮，劲使不均匀不行，油墨浓淡不适度不行，弄不好就透过去，一洒一大片。后来我们试着向印完的软纸上擦粉，每张纸用女人化妆用的粉拍向上拍几下，这样一来，果然不洒不透，字迹清楚了。

我们就这样一点一滴地积累经验，工作越干越顺手，到后来，每小时能印八百份，一张蜡纸能印两千张。印到当中，把蜡纸用汽油洗一次，然后再印，又清楚，又轻快。印完后，再把宣传品装订成小册子，封皮上照着美人图，画上时装女人，写上《妈妈好糊涂》、《王二姐思夫》等标题。有时还套上两色，看着既热闹又便于掩护。

一切工作都完了以后，就把油印机再隐蔽起来，然后用汽油洗净手上的油墨，把废纸付之一炬，一点痕迹不留才能躺下睡觉。

有时因为睡得太晚，早晨就起得迟些。有一天，我们还没有起床，忽然有人敲门，我一愣，这是谁来得这样早？从我们搬到这里后，接受了上次的经验教训，根本不和外人来往。领导和工作上直接联系的同志到这来都有规定的时间，现在是谁敲门呢？我一边披衣起床，一边问是谁。外边的人答了话，听语声是房东白俄老太太。她很少到我们家来，这么早来干什么？我忙开开门。老家伙一进门就操着流利的中国话说：

“你们的火墙坏了吗？怎么总不大冒烟？”

接着她走到里屋门口，向里一探头又缩回来说：“太太还没起床？”

“她不大舒服。”我顺口说道，“您请屋里坐吧。”

她一脚迈进屋里，奇怪地看着我和大秦同志的两张床。眨眨眼睛问我道：

“怎么？你们两口子吵架了吗？”

我知道是两张床的摆法引起她的疑心。原来我们两人的床一个墙角一张，大秦同志的靠东北角，我的靠西南角，我的床上这会儿还堆着被子，大秦头向里睡在她的床上，这怎能不使她多心呢？我忙装成不好意思地笑道：

“内人身体不好，所以暂时分开睡。”

她听见也笑着说：“你们中国人说道真多，身体不好更要睡在一起，好多照顾她呀。你看，她盖的也不多，这屋又冷……”说着，她向四周环视了一下，忽然象发现了什么秘密一样，惊奇地叫道，“怎么，墙上有霜！”她扭动着肥胖的身躯，忙跑过去用手一摸，痛心地说道，“哎呀，这怎么行呢？明年开春墙要坏的，为什么不烧火墙呢？没煤吗？”

看着她这痛心疾首的样子，我既觉好笑又觉不安，忙用脚踢踢煤箱子说：“有煤，没有还可以买。只是……”我用手指了指床说，“您看，我们习惯睡早觉，起来就忙着出去做事情，一天只有晚间烧一遍，再加上手懒，所以就……”我学着俄国人的动作，一扎撒手，作了个无可奈何的表情。

“这样下去不行啊，以后天气还要更冷，如果……”

我没等她再往下说，忙笑着说道：“以后您放心吧，一定多烧。再这样‘锻炼’下去，内人的身体也受不了。”

她见我这样说，脸色就逐渐平和下来，又唠叨了几句，便转

身走了。

我送她回来，见大秦同志还躺在床上，心里纳闷，她当真就睡得这样实？方要去招呼她，忽见她一翻身坐起来，边披衣服边笑着说道：

“你编个什么理由不好，偏说我有病？”

我看着她，也笑着说：“难道你还迷信？就是讲迷信的人也不怕人咒，‘一咒十年旺’。”

“谁迷信！我怕添麻烦，以后遇见这个老白毛子又该问我什么病，吃什么药，还兴许给我介绍个白毛子大夫呢。”

“那你就认真地让大夫给看看呗。”我止住笑，正色地说道，“你最近常咳嗽，可真别熬出什么病来。”

“也不是纸糊的，哪有那么娇嫩。”她也止住笑说，“说真的，从明天起咱们可不能睡早觉了，工作干得太晚就干脆不睡，连轴转，早晨一定要在火墙里笼把火，让烟囱冒点烟。”

“烧火墙的事简单。”我思虑着说道，“倒是要想些办法把我们和房东的关系搞得好些，这和巩固机关有很大关系。”

“她那么势利眼，见钱眼开，得怎么才能和她处好。”

“也许我们正要在这上打打主意，至少是不要象烧火墙这样，露出‘穷相’来。”

大秦同志听我这样说，也陷入沉思中。我见她还拥被坐在床上，便躲到外屋去升火，好让她穿衣服。

从这以后，我和大秦同志就有意识地在老白俄面前装出有钱的样子，房钱总是提前交，有时当领导同志来送生活费的时候，便拿着他的钱包去交房钱，故意从里面掏出厚厚一迭钱来，当面数给她。过旧历年的时候，我们也买上二斤肉。三十那一天，我和大秦同志把肉切成片，放在大勺里一顿爆炒，炒得满屋油烟，当看见老白俄从院里走过的时候，我就把房门大敞开，满

屋油烟一齐涌出,肉香一下子飘满全院。大秦同志又把大勺敲得叮当响,调弄得老白毛子鼻孔直张,接连往里吸气,我偷偷看见忍不住要笑。等她过去后,我忙关上门。大秦同志拿起大勺,我们低头一看,肉片已经成了焦糊的肉渣子。

这些办法果然有效,老白俄再也不来查看火墙了,见着我们总是笑眯眯的,离远打招呼。这个旧俄国的资产阶级,就只认识钱,在她心里,好象有一架天平,一边是钱,一边是人,她把每个人都放在这上称,然后再定出人的高低上下。为了工作,只好对症下药,心里却越来越厌恶她。

在这个时期里,还有一件事情要提一下:一件是前面提到的毛诚同志在接到大秦同志的信以后,已经从伊通县赶来了。她来时正值尤大嫂要调回省委机关,所以省委就让她接替了尤大嫂的工作。从她来以后,我就不再到马家沟去取蜡纸了,每次都是她亲自送到我们的住处。

这时候,冯仲云同志也从外地工作回来了,我们的工作仍由他负责领导。

## 春天的寒流

一九三四年的春天来了。这是个不平常的春天。

在这个春天里，滚滚向前的革命洪流中，却出现了一小股逆流。自然界中的寒流可以影响庄稼的年成，革命中的逆流也会造成事业上的损失。

一天清晨，天方破晓，我和大秦同志工作了一夜，还正在鼾睡，忽被一阵敲门声惊醒，声音是轻微而急促的。我忙睁开眼睛，一抬头看见大秦同志也已醒来，她正惊异地望着我。我忙翻身下地，披上一件衣服，悄悄地向门口走去，心里想：这样早来敲门，能是什么人呢？这是不寻常的！我隐身在门旁，侧耳听着，思索着。敲门声是急促的，但轻而不乱，这不象敌人的举动，我的心稍微平静了些。这时，大秦同志也悄悄地来在我的身旁，她俯在我耳边轻声地说：“敲门声这样轻，不象坏人，问一问吧？”她和我的判断是一致的，于是我压低了声音问：“谁？”

“是我，开门吧。”外面的声音也是低低的。

“好象老冯！”大秦同志抓住我的胳膊说。

我也听出来是冯仲云同志的声音。这样早，不在规定见面时间，他来做什么？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情，我的心不只没有平静下来，反而更加紧张了。我急忙将门打开，冯仲云同志一步跨

入，反手关严门。他穿得很整齐，帽子压得低低的，帽檐齐到眼镜边上，新刮的胡子，不注意真认不出来是他。

“老冯，出了什么事情？”我迫不及待地问。

冯仲云同志没有马上回答我，抬手摘下帽子，大秦同志接了过去。

他双眉紧锁在一起，嘴闭得严严的，嘴角拉下来，我和大秦同志都期待地望着他那严峻的面孔。

“现在，我们三个党员，开一个临时的紧急会。”冯仲云同志严肃地说，“我们党内，发生了一件事情，共青团省委书记刘明佛和团省委宣传部长杨勃被敌人逮捕了！被捕后，他们在敌人面前贪生怕死，竟认贼作父，背叛革命，成了自首分子，出卖了同志！”

听到这里，我不由得和大秦同志同时惊呼起来：“叛徒！他们作了叛徒！”

一听到叛徒，我就恨得咬牙根，在吉林，叛徒金景出卖过革命，使革命受到了莫大的损失，现在又出现了刘明佛和杨勃。刘明佛我见过，中等身材，面孔发黑，走起路来稍微有点瘸腿，是个中年人。想不到这个表面上装得很革命的家伙，竟是一个软骨头，一个投机分子！想到这里，我忍不住气愤得一拳击在桌子上说：“可耻，可恨！”

我听不清大秦同志也说了句什么，只觉得血往脸上冲，眼睛里火辣辣的。

这时，冯仲云同志拉住我和大秦同志，低沉而有力地 说道：“不要激动，遇到了意外的事情，最可贵的就是冷静！叛徒出卖了革命，敌人想要乘机粉碎我们，他们疯狂了，越是这时候，我们越要冷静，在冷静中想办法对付敌人。现在省委机关已经转移，应该隐蔽的同志已经适当地隐蔽起来。今天我来，就是要安排

一下你们的工作。”说到这里，他扫视一下我和大秦同志问道：

“你们认识这两个叛徒不？”

大秦同志摇了摇头，我说：“杨勃我不认识，刘明佛见过一面。”

“在哪里？”

“在南岗公司街，共青团发行站小蔡同志的家里。”

“他认识你吗？”

“小蔡同志给介绍过。我们还谈了一阵，他告诉我朱协表现得很不好。”

“你的住处他知道不？”

“不知道。”

“小蔡同志知道不？”

“也不知道。”

“好吧。”冯仲云同志稍微沉思了一下，对我说：“从现在起，你白天不要出去了，发行工作都交给秦淑云同志一个人。”

“不出去了？”我听了一愣说，“要在家蹲多久？”

“不会长。我们不能任敌人疯狂下去。现在凡是能够坚持下去的工作都要坚持下去。我们要让敌人知道，在任何情况下，革命是粉碎不了的，人民的力量是阻挡不住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冒险，作无谓的牺牲。现在刘明佛和杨勃已经完全投靠敌人，变成了敌人的“狗”，让敌人牵着到处钻，搜捕我们的人，破坏我们的组织。省委机关应该转移的已经转移了。你们这里既然没暴露，就不要移动。但是刘明佛既然认识了你，你白天就不能出去了。如果有必要的接头工作，可以利用一早一晚的时间。”

白天不能出去，这真急死我了。我知道越是在这种时刻越是需要加紧工作。但是偏偏在这个时候要把最宝贵的时间扔



在这方圆十几米的屋子里，这真使我难受死了。我刚要再陈述意见，大秦同志却抢着说道：

“我同意仲云同志的意见，你先不要出去啦。两个叛徒都不认识我，我完全可以代替你的发行工作。”

仲云同志点点头，立刻把它变成了党的决定。党的决定，就是铁的纪律，我不能再说什么了。

仲云同志接着说道：“关于你们的印刷工作，暂时先停几天。几天以后，毛诚同志还要来。”

“是送印刷蜡纸？”大秦同志止不住高兴地问道。

“嗯，咱们的《东北民众报》，还是要坚持着出下去！其他宣传材料和党的文件也要继续印下去！”仲云同志坚定地说。

我一听《东北民众报》还出刊，其他材料也还印刷，毛诚同志还来，心里不觉也添了几分高兴！《东北民众报》当时很受群众欢迎，它在号召人民团结抗日，打击敌人，宣传党的政策上起着很大的作用。至于其他宣传品，更对人民起着重大的鼓舞作用。当时在哈尔滨的工厂、学校，街头巷尾，经常出现我们的传单和标语；宣传小册子，也在人民中间广为流传。想到这里，我忍不住地说道：

“最好能早一天让毛诚同志来。更盼望能早一天告诉我白天也可以出去工作的决定。”

仲云同志点点头说：“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放心吧，组织上不会让叛徒绊住脚的，会踢开他们的。”

仲云同志边说着边看了看表，又掀开窗帘的一角向外望了望。

太阳已经出来了，石头马路上洒满了阳光，一辆送牛奶的小车在马路上吱扭吱扭地走着；一个下了岗的警察，低垂着头，半闭着眼睛，歪歪斜斜地走过去，破皮靴在马路上“踢沓”地响着。

仲云同志往起一站说：“好了，我们的会就开到这儿吧。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和困难没有？”

“没有。”大秦同志干脆地说，“我保证在老李不能出去的时候，把他应该做的工作负责做好！”

仲云同志拿起帽子，无限关怀地看着我和大秦同志说：“一定要提高警惕，敌人可能要清查户口，也可能盘查的很仔细，要把你们的家乡住处、职业、社会关系等等都研究一致了，不要出一点漏洞。”

“我们早已研究好了。”我和大秦同志一齐说。

大秦同志见仲云同志要走，急端起一盆洗脸水，轻轻地推开门，向外望了望，然后走了出去。

一阵晨风吹进来，吹到身上凉丝丝的。

在屋里，只听见一盆洗脸水抛在院中的声音。稍停，大秦同志进来了，她轻轻地说了句：“没人，走吧。”

仲云同志又把帽子低压在头上，迅速而有力地握了握我们的手，闪身走出去。

我们不能送他到门外去，只能站在门里，望着他那消失在街道上的高大身影……

## 当面对敌人的时候

刘明佛和杨勃的叛变给党所造成的损失是重大的。不仅使哈尔滨市内的党团组织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而且株连到其他地方的党团组织。事后我们得知,这次事件原来是从西区(注)①团委机关那里开始发生的。

西区的团委机关里面住着一个团委委员,他以学生的面目,租了一间单招男子独身汉的白俄房子(注)②。因为地点僻静,和房东相处得也好,长期以来也没发生过什么事情,所以这里就作为团省委和下面联系的中心站,刘明佛和杨勃经常到这里接头。在这个院里,住有十几户人家,其中一家的男的是一个伪机关的小职员,这人平常对人谦恭有礼,从不多嘴多舌,好象只知养家糊口,此外不管天下任何事情。谁知这个表面老实的家伙,却是一个阴险的暗藏敌人,是特务机关的“嘱托”(特务腿子)。

在他们这个院里,有一个俄国式的公共厕所。这种厕所的

---

注① 西区:当时哈尔滨共划分为东西两个区,直属省委领导。原属老滨江县管的道外、太平桥等地为东区;老特别区所属的道里、南岗、马家沟等地为西区。

注② 单招男子独身汉的白俄房子。当时居住在哈尔滨的白俄房主,有时在自己的住房里倒出一个房间出租,为了清静,便单招独身住户,或男或女,要随他家的情况而定。住客的饮食、清扫,多由白俄房主负责。

顶盖是两层木板压在一起，在里边一伸手，就可以把木板托起来。这个秘密被西区那位团委同志发现了，于是他有时就利用这两层木板存放文件：把当中一块往起一托，文件往旁边木板上一放，然后再把当中木板复原，文件就压在里边了。他满以为这是万无一失的地方，放过几次又没出差错，胆子也就大了起来。

一天早晨，太阳还没出来的时候，他又到这个“秘密机关”去放文件。他在前院看了看，没有人；又站在厕所内听了听，也没有动静。于是就放心大胆地托起木板，把文件放进去。

谁知这时厕所后边正站着院内的更夫，这个人已被同院那个特务腿子收买掌握，一直在暗中监视着院内几个他们认为可疑的房客，其中就有这位团委同志。这个更夫站在厕所后边，忽然发现厕所上的木板盖活动一下，高起来了，又听见纸响，接着木板又落在原处，人也从里边走出来，他忙隐起身子，盯着那个团委同志进了屋，然后就象猎狗一样窜进了厕所，一下子把文件拿在手中。他大致地翻开看了看，手激动得哆嗦起来，心也直跳，好象拿着的不是一卷子纸，而是一叠纸币。他如获至宝地把纸揣在怀里，象一个惯窃一样溜进了特务腿子的房门。

过不多大会儿，从特务腿子屋里溜出两个人来，一直溜出大门。

不久，西区团委同志就在屋内被敌人逮捕，连摆在窗上的平安警号——一盆花，都没来得及毁掉。

捕走我们的人以后，阴险的敌人立刻封锁了整个院落，许进不许出。同时留下几个特务暗藏在团委机关的屋子里“蹲仓子”。狡猾的敌人按原来的样子保持了屋里的一切东西，尤其从屋外能看见的东西更是丝毫未动。

就在第二天早晨，首先是杨勃闯进来，接着是刘明佛，两个人立刻被捕。

贪生怕死的刘明佛和杨勃，在敌人的威胁利诱下，彻底地叛变了革命，不但向敌人供出了他们所知道的一切，而且出头搜捕我们的同志，破坏我们的机关。

就在这时，我们一位打进敌人警察厅的老赵同志，迅速地获知了刘、杨叛变的消息，冒着巨大的危险偷看了刘、杨的口供，及时地向组织作了汇报。省委立刻采取紧急措施，应该转移的机关马上转移，需要隐蔽的同志立刻隐蔽。虽然如此，也有一些同志落在了时间的后面，不幸被捕。这些同志在敌人的审讯室里，在刑场上，都表现了共产党员宁死不屈的高贵品质。他们当中的几位同志，是我终生难忘的。其中之一，就是曾经一度领导过我的王鼎三同志。

王鼎三同志在刘、杨叛变之后，本来已经接到省委立即隐蔽转移的通知，只为他要通知几个工作关系，迟走了一步，结果被敌人逮捕。

由于叛徒刘、杨一口咬定王鼎三同志是省委负责人之一，知道许多他们不知道的机密，所以敌人就变尽方法用最残酷的刑法拷打鼎三同志，鼎三同志在血泊里痛骂叛徒刘、杨，直到壮烈牺牲，还骂不绝口。

以后，当我们听到鼎三同志慷慨就义的消息时，都止不住热泪滚落……大秦和我立下誓言：“我们活着的人，一定努力为党工作，为死难同志报仇雪恨！”

随着鼎三同志英勇牺牲的消息之后，又传来常家姑嫂坚贞不屈的英雄事迹。这两位普通劳动妇女，临危不惧的英雄气概，竟使残忍成性的敌人之为震惊，有的敌人竟忍不住地向外人悄悄地讲述了常家姑嫂在刑场上的表现，于是一传十，十传百，从此，常家姑嫂的英雄形象便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常大嫂和常小妹，一位是共产党员，一位是青年团员。常大

嫂的爱人老常同志是东区区委委员。他们一家三口人，都在同记商场附属的皮鞋厂里当工人，又都是党团员，可算是革命家庭了。

常家是东区区委的发行站，我们印出的文件，都由她们转发给各个党团支部。嫂嫂负责发行党内文件，妹妹管发团内文件，她们胆大心细地为党传送文件，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很好地完成任务，从未出过差错。

自从刘明佛和杨勃叛变之后，警察、特务满街飞，说不定在哪条街口，在什么时间，警察或特务就会一声令下，来个临时戒严，把人流如水的街道，封锁得象突然冰冻了的一般。那时的哈尔滨，真是随时都会变成一座死城。

由于环境异常紧张，区委通知老常同志离开哈尔滨，家里只剩下了姑嫂二人和一大包没有发出去的文件。

这一天早晨，老常家的烟囱没有冒出一缕炊烟，心烦意乱的姑嫂二人，哪里还有心思吃饭呢？

姑嫂二人面对着眼前的的一大包文件发愁了。

门外边，隐隐地传来“笛笛”的警哨声和“嘟嘟”的摩托车声，今天她们对这些声音的感觉特别敏锐。

“狗东西们搜查、戒严，闹得这么紧，文件送不出去了！”妹妹的心止不住地跳着，她用颤抖着的声音悄悄地说，“怎么办？烧了吧！”

“不！”嫂嫂连连地摇着头说，“省委印这些文件是多么不容易呀，印文件的同志们是在敌人刀刃子上工作呀！我们不能烧，留着它，这是我们扩大反满抗日的武器！”

妹妹听了嫂嫂的话，咬紧牙关坚定地点点头。可是文件得藏在哪里呢？她四下看了看，禁不住长叹了一口气。

嫂嫂正望着摆在柜子上面的一个皮箱出神，她想着，想着，忽

然一把拉过妹妹，把嘴唇挨近她的耳边上说：“把文件放在皮箱里……”

妹妹疑惑地问道：“那能挡住搜查吗？”

嫂嫂说：“把文件装在箱子里，在箱盖上贴上个‘刘春山’的字条，就说刘春山是你哥哥的朋友，是他寄存的。敌人要搜查出来，咱俩就都这么说。先把文件装里头，再把皮箱放在柜里，鬼子若搜不出皮箱，这些文件就保存下来了！”

姑嫂二人一阵忙活，把文件藏好了。她俩都未来得及好好喘口气，嫂嫂就把妹妹拉到床边上坐下，用一种无限信任的目光打量着妹妹。

“妹妹，万一被搜查出来……”嫂嫂仰起头，停顿了一下说，“在狗东西的面前，咱俩可别说两岔去！就说是个朋友寄存的，箱子里有什么东西咱全不知道。”

妹妹点头听着。

嫂嫂捧过妹妹的脸，看了一会儿，忽然问道：“鬼子要打你，你怕不？”

一提鬼子，妹妹就恨得皱起眉头，睁圆了黑白分明的大眼睛说：“我是共青团员，死也不怕他们！”

正说到这里，忽听一阵摩托车声由远而近地传来，响声在她们门前戛然而止。姑嫂二人猛的一惊，还没来得及走到门前，只听“当”地一声，屋门被一只皮靴踢开了，接着闯进来一群警察和便衣特务，进屋没容分说，就将姑嫂二人用枪逼住，紧接着就是一阵乱翻，藏在皮箱里的文件被搜出来。姑嫂二人被逮捕到道外日本宪兵队。

到了日本宪兵队，敌人就审问常大嫂那个皮箱的来由。常大嫂就照事先编好的话语去回答。

敌人抡起皮鞭，带着飕飕的风声往常大嫂的身上抽打着。常

大嫂的衣裳被抽得裂开一条条的破缝，血从衣缝中流出来！直到她被打得昏迷过去。

敌人又提出她的妹妹审问。

妹妹一见嫂嫂被打得半死不活的情景，酸痛难忍，泪珠在眼中滚来滚去；可是当她一见龇牙咧嘴的宪兵军官，和那两旁手持刑具的凶手时，仇恨的怒火赶走了心中的难过。她睁亮一双大眼睛，挺着胸脯，用和嫂嫂一样的话语，回答敌人。她也和嫂嫂一样，被打得衣破肉烂，直到失去知觉。

敌人用水喷醒姑嫂二人，依然追问那些文件的来由，姑嫂二人依然是照样回答。于是又一阵毒打落到姑嫂的身上，打昏了，又喷醒，又打，又昏过去。就这样一连闹了几 天，敌人没有得到一句他们所需要的口供。鬼子恼羞成怒，最后使出了最残无人道的法西斯兽行。他们把常家姑嫂的两只胳膊拽得平直，两个凶手各用手中点着了的火柴烧着常家姑嫂的腋窝毛。常家姑嫂咬紧了嘴唇，浑身颤抖，汗珠从血迹斑斑的脸上滚下来。

宪兵军官用手把常大嫂那张汗流滚滚、满面怒容的脸扭向常小妹，嘿嘿地笑着，指着她腋窝下的火苗说：“你不可怜小姑娘吗？”可是敌人的算盘打错了，法西斯分子是永远不会理解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

常大嫂和常小妹，虽然身受难忍的酷刑，可心情是安然的，她们互相信任：“你我都不会叛变革命，和敌人斗争到底，直到死！”

不论敌人怎样审问，不管敌人用什么样的刑法，她俩依然从容地面对敌人，直到又昏死过去！

又一个新的刑法出现在这座日本宪兵队的审讯室里。他们扒光了常家姑嫂的衣裳，与其说扒衣裳，莫如说是撕下粘在两人身上的血迹斑斑的布条子！接着敌人就用钢针扎常家姑嫂的指



甲：

这些对常家姑嫂来说，只能是更增加了她们对敌人的仇恨！她们准备死，但决不说出一个有害于党的字眼儿！

宪兵军官急得嗷嗷乱叫，伸出拳头在空中胡乱地抓挠着。宪兵队长把打手们叫到身边，与他们交头接耳地核计了一番，然后便在地上铺上一层玻璃碴子，凶手们将常家姑嫂推倒在上面，然后抡起皮鞭狠力地抽打。常家姑嫂在玻璃碴上翻滚，伤肿的身子，又淌出新的血流。等到常家姑嫂又一次昏迷过去时，地上的玻璃碴子已经被鲜血染红……

常家姑嫂宁死不屈的英雄事迹，教育和鼓舞着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后来每当我在道外街头看到我们的宣传品的时候，就仿佛看见她们那巍然耸立的英雄形象……

## 革命仍在前进

自从冯仲云同志通知我们刘、杨叛变那一时起，我白天就不能出去工作了。

大秦同志告诉房东老太太，说我病了。于是在大秦同志出去之后，我就只能放下窗帘，闷在屋子里，心情十分烦躁。世界是如此之大，但却只有我十几米方圆的活动地方。为了保持身体的健康，我便在屋里做体操。体操做累了，就看书，放下书就再做。有时我自己也觉得好笑，这是什么生活呀！我真盼望毛诚同志能快把蜡纸送来，我一定加倍仔细地印，印得比哪一次都好！

几天以后，大秦同志从街上回来，我们刚吃完晚饭，毛诚同志就来了！她带来了我们的希望——《东北民众报》和其他宣传品的蜡纸稿，我们高兴得几乎流出了眼泪。

当天晚间，当四周都沉入一片寂静的时候，我们的特制印刷机又摆在屋当中了，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我和大秦同志都象看见久别重逢的挚友一样抚摸着它。本来大秦同志出去跑一天够累了，应该休息，但她说什么也不肯，我只好依她。

我们两人，一个印一个翻页，四只手象一只手，动作迅速而协调，心情激动而愉快。正当那叛徒出卖革命，敌人疯狂四出的

时候，革命仍然在进行着。共产党在东北是扎下深根的，这根是扎在人民群众当中，任凭敌人怎样叫喊，怎样疯狂，也摇不动，拔不掉！就在这静静的夜晚，《东北民众报》又出刊了。明天，它就会从这里飞出去，飞到人民群众中去。

接连的夜间工作生活，竟养成了我白天能睡觉的习惯，这对我当时来说真是一件好事，首先它减少了我因为白天没有工作而感到的苦闷，其次它使我真象一个养病的人，我一声不响地躺在床上，谁还能疑心呢。房东老太太来了两次，看我总是躺在床上，以后便不大来了，这个白俄大概怕我得的是传染病，传染上她吧。

白天能睡觉，但体操并没有断了做，每当醒来，我总是要做上几遍。从做体操当中，我逐渐感到我的体力不如从前了，我真盼望组织上能快些派人来，告诉我可以出去工作的决定，我在期待着，迫切地期待着……

一天下午，我正在睡梦中，忽觉门响，微微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是冯仲云同志微笑着站在门前。我心中一乐，一下子从床上跳起来，狂奔过去。

仲云同志忙把门关严，笑着握住我的手说：“你真粗心，门开着，这样欢跳，让人看见，哪象个病人？”

我忙拉他坐下说：“我这个病人就等着你这位‘医生’呢，你来了，大概就会宣布我病好‘出院’了！”

“这场‘病’还没有把你闹糊涂。”仲云同志幽默地说着，“好吧，我这个‘医生’就宣布你‘出院’了。”

本来是猜中了的决定，但我还是忍不住地兴奋得跳起来，我忙问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今天，现在。”

这真是喜从天降！我一把抓起帽子，拉住仲云同志说：“今

天破个例,你和我一同出去走走吧,哪怕是一条街也好!”

仲云同志笑着抽回手去,说:“你先冷静一下,省委还有重要的指示呢。”

听到省委有重要指示,我立刻严肃起来。虽然不是很久没有听到省委的指示了,但对我当时来说,确实隔了好久好久哇!

仲云同志也变得严肃起来,他说:“经过研究,觉得大秦同志一个人可以把发行工作担负起来。省委决定,从今天起,由你负责全部交通工作!”

熟悉地下斗争的同志都知道,交通工作是党对敌斗争的大动脉,是上下级和各个地区互相联系的纽带。党把这样重要的工作全部交给我,这是党和人民对我最大的信任,一霎时,我真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了。

仲云同志见我默不作声,就问道:“怎么样,有困难吗?”

“没有。我一定尽力去做!”最激动的感情,这时反倒变成了最简单的语言。

“好吧,现在我把交通员的名单和他们的情况,以及接头的地点、方法告诉你,这里面有你认识的,也有你不认识的,要牢牢记住。”

接着仲云同志就向我讲了交通员的姓名和他们的详细情况,这些我都不能用笔记,只能依靠我的脑子。我聚精会神地听着,默默地背诵着:负责东、南两面的老李同志、省委的交通员老孟头、汤原的老谢、磐石的老万、珠江的张石匠,另外还有中央的交通员,沈阳、旅大各地都有。所有的一切,我都努力地记住它,有不确切的,我就问清楚;有记错的,仲云同志马上就给以纠正。最后,他对我说:

“最近这两天,你就要把这些完全记熟,后天,你就可以开始

和他们接头了。”

送走了冯仲云同志，我兴奋得再也坐不住、躺不下了。关起门来，在屋里来回走着，我真盼望大秦同志今天能提前回来，好和我共同高兴！

新的、更重要的工作就要开始了，我要百倍地努力呀！

## 面对困难的李升同志

交通员的工作,是重要而又光荣,辛苦而又危险的。他们跋山涉水,不管路途多么遥远,可能遇到什么风险,都要勇往直前地走下去。省委的指示、命令、战斗部署、一切重要的文件,都要从他们的手中传递下去;下面各个地区和单位的汇报、请示也要经过他们的手送来。他们风里来,雨里去,来去都负着重大的使命。他们的工作,是值得尊敬的;他们的事迹,是值得记载的。

说起交通员,首先应该提到的就是李升同志。我和他已经“老相识”了。当我从吉林到哈尔滨第一次开始工作的时候,就是和这位老人在一起。后来,他回去专跑交通,我们就不常见面了。但是他那高大的身躯,飘荡的长髯,甚至那伪装卖报的《大北新报》的报兜子,都常在我眼前浮动。现在我们又回到一起工作了,自然亲热异常。一年多不见面,他非但不显得老,身板好象更直了,脸色也更红润了。有一次他笑着告诉我,他就是云游的散仙,一年四季,穿山越岭,渴了喝清泉水,困了睡向阳坡,到了游击队,听同志们讲怎样打鬼子,和同志们唱歌又跳舞,心象开了花……你听,他把自己的工作描写得有多么轻松,好象交通员的工作就是跑跑腿,走走路,一点不用费什么心思。实际上正好相反,这是一种多么复杂而细致的工作啊!它不但要求

你勇敢,而且要求你机智;不但要求你能言,而且要求你善辩。当工作需要的时候,它要求你和什么人都能搭上话,和什么人都能交朋友。交通员的身分,也不能是完全固定的,有时就要换一换,变一变,但要换得自然,变得象。所有这些,都是交通员的业务。几年来,老李同志就在这上花费了很大的功夫。每当他留在哈尔滨的住处等候任务的时候,他从不老老实实地等在屋里,总是到最热闹的地方去走动,表面上看起来他是在闲逛,实际上他正是在观察、分析、研究那里的一切人一切阶级。用老李自己的话说,就是“听得多见得广才能有胆略”。老李同志正是那种表面上看似悠闲,心里却从不休息的地下工作者。正因如此,他的工作才做得非常出色,在交通局的全部交通员中,他是最优秀的一位。他总是从容地完成比较困难的任务。在接受任务的时候,他也从没表示过困难,都是欣然而去。和他在一起工作,真让你感到有信心,有力量。

但是有一次,真是稀有的一次,老李同志在接受任务的时候,却面有难色,这真是不寻常的现象啊!这现象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现的呢?有什么情况能难住老李同志呢?说起来话还很长呢……

刘、杨叛变后的当年,夏末的季节,我收到省委一份重要文件,要求选派一个老练的交通员,把文件送到汤原游击队去。当时省委知道跑汤原的老谢被派走不久,还没回来,所以在指示中特别提出要我选派一个老练的人去,一提起老练的交通员,我立刻就想起老李同志来了,经过一番考虑,便决定去道外找他。

老李同志住在道外太古八道街,和省委交通员老孟住在一起。那时的太古八道街,是个比较复杂的地方,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但住户中最多的还是那些旧社会里最底层的人。老李同志住的那个院子,除了一家小成衣铺之外,便都是妓女的“下

处”了。“下处”是不接“客”的，妓女在这里已经不被作为“商品”出卖，看起来是可以过过人的生活了。其实不然，从这里可以看到她们悲惨生活的另一面，这是妓院业主公开虐待、毒打、拷问妓女的地方，夜静更深的时候，常从这里发出凄厉的女人尖叫声，让人听来汗毛都会竖起来。看一眼这样的生活，就会在心中投下一条痛楚的阴影，这是人吃人的社会的又一个侧面，人在这里被野蛮地践踏。我曾为此劝过老李同志换换地方，但他却不肯。他和我的看法不一样，他说看着她们那不人不鬼的生活，更感到旧社会的不合理，必须推翻它，这就更增加了干革命的劲头。何况住在这里是最安全的，谁也想不到这里会住着共产党员。他有他的道理，我也不想说服他，也可能他的道理是更实际的。

今天，我又到这里来了。一进那灰色的小院门，就听见有女人的吵骂声、啜泣声；一个年轻的女人，坐在门里的一个小木凳上，仰着脸，半睁着呆滞的眼睛，向西半天望着。

西天上，半坠的太阳，映得白云变红。这正是吃晚饭的时间，我选择这样个时间来，估计会把老李同志堵在家里。

那个年轻女人披散着一头烫发，脸色蜡黄，眼皮浮肿，眼圈发黑，嘴唇上没一点血色。她向天边一动不动地呆望着。我只看了一眼，便忙把头低下，从这张年轻人的脸上，我已经看见了她那全部悲惨生活的烙印。

我一直走进老李同志的房子，房子共是三间，他和老孟住在东屋；西屋是个一东一伙的小成衣铺。我进屋的时候，老孟正蹲在地下盛饭，小米干饭，黄澄澄的冒热气。桌子上摆着一盘炒洋葱，一碟红咸菜。老孟一抬头见是我，忙放下饭碗，亲热地拉我坐下。我问他老李呢？他说在西屋呢，前些日子买了十几尺青华达呢，让西屋给做一身大褂，这会正在那看呢。



我听见一乐：老李同志又做新衣服了！老李的衣服已经有几套了，可是都不一样，有的穿上象地主，有的穿上象买卖人，也有的穿上象才进城的老庄稼汉。他在做衣服上花了不少心思，组织上给他的钱省吃俭用的留着，除了做各样的衣服之外，就是交朋友，在这上他可舍得花钱呢。他朋友交的多，但不乱，有两个交友原则：一是真正的劳动人民，这是他准备发展的对象，也是他依靠的基本群众；一是对工作上有利的，这一种数量不多，但却什么人都有，甚至还有警察呢。

我深知他这两个特点。因此，每次给他旅费和活动经费的时候，除规定的数目之外，都再多给他一些。他有时坚决不要，有时却很顺当地拿起来，遇到这时候，我就准知道老李同志不是交朋友需要钱，就是要做衣服。

今天，我听老孟说老李又做衣服，便忍不住笑起来，不知他这身衣服穿起来象于什么的呢？我和老孟正在说话间，老李同志已经闻声进来了。

老李同志笑着说：“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到我们院里来了？”

我高声说：“日子多看不见你老，想念啦。”我称呼老李同志为老，是因为我们两个把社会关系订为姑表亲，是表叔侄的关系。

我急于想谈正事，便向老孟使了个眼色。老孟会意地拿起大马勺走出去。

老李随手关上门，走近我小声问道：“有什么情况吗？”

从老李同志的问话中，我感到他对我这突然的来临，已经产生了不平常的感觉。

我忙说：“没有什么情况，有件临时的重要任务，需要你跑一趟。”

他一听有重要任务，脸色立刻舒展开了，多纹的嘴角挂上了

微笑，忙问：“什么任务？”

我说：“省委有一份重要文件要送到汤原游击队去，老谢没回来，想让你去，你看怎样？”

我满以为把任务一说，他一定象往次一样，高兴地问我几时走，有什么要求。谁知这次得到的却是一阵沉默，老李同志的双眉皱在一起，脸上的皱纹立刻增多起来。我直直地望着他，一时之间弄不明白，为什么会在他那乐观的脸上，闪现出这异乎寻常的表情。他在想什么呢？

屋里静得很，外屋的马勺响起来了，我听见一个男高音说：“怎么还炒菜？”

“来客人啦，李大哥的表侄来啦。”老孟的声音也很大。

我知道这是对面屋里的成衣匠在和老孟说话。

老李还在沉思，我忍不住地问道：“怎么，有困难吗？”

老李慢慢地点头说：“你知道我在汤原住过好多年，就是在那里找到的革命，入了党，工作的时间也不短。”

我说：“这些我都知道。”

“汤原在刘明佛、杨勃叛变以后，也出了叛徒，这你也知道吧？”

经老李这一说，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是担心在那里遇见叛徒，这问题我在来时确实没有想到，怪我考虑的不周到，给老李同志出了一个难题。于是我也沉思起来，在想怎么办？是否另找别人？有没有更合适的人？留在哈尔滨的几个交通员都在我脑子里装着，更为老练的除了老李同志之外是不容易找到了。于是我便试探地再问道：“到汤原以后能不能多想些办法躲避一下叛徒的耳目？”

“办法倒是能想，现在就是摸不清情况，那边究竟出了几个叛徒？都是谁？我在那里工作的时间长，活动的范围大，游击队

上的同志差不多都认识我，县城里的同志也多半见过面，遇上就会认出我来。”稍停了一下他又说道，“我决不是惧怕他们，别看我年纪大，要是组织派我去硬干，我保证还能撂倒几个敌人。可现在他们是在暗处，咱们又不能硬干。我个人出了什么事，都能挺得住，从做秘密工作那一天起，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敌人的堆里我闯过，也和他们硬碰过，可是这次是让我去送重要文件，我琢磨的主要是任务完不成怎么办？重要文件送不到岂不是误了大事；要再让敌人得去，对革命的损失就更大！”

老李说得有道理，我不能再说什么了，决定在入夜以前，再去请示省委。临走前，老李拉住我手说：

“你去吧，今晚我不出去了，等着听你的指示。若是省委认为我去合适，我就坚决去。你把这个意见反映给省委吧。”

老李同志的话很使我感动。我匆匆地离开了这里，去和省委联系。

经省委研究以后，决定还是由老李同志去。省委说他去固然有危险，但是也有有利条件，第一他对那里熟悉，人熟、地熟，工作起来就方便；第二他有胆略，经验丰富，一般的敌人是奈何不了他的；第三就是他对党的一片忠诚，对敌人的切齿憎恨。老李同志的这三条，是别人比不上的，别人去还不如他把握大。省委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我第二次又奔往老李同志的住处，这时已经是晚间八、九点钟了，我怕到那里太晚，就坐上了电车。

到桃花巷我下了车，刚要拐入巷口，忽见一个高大的身影从旁边闪了过来对我说：“你来了！”

我定睛一看，正是老李同志，不由喜出望外，忙说：“你从哪来？”

老李说：“我就坐在摩电车站的对面。”他又靠近我，轻声地说：“我在等你呢。”

说话间，我们已经走进桃花巷，这里人多，灯也亮，路两旁的小馆里刀勺叮当直响，跑堂的直着嗓子的喊声此起彼伏。一家馆子电灯通亮，在靠马路的窗子里，一个大胖子正在煎锅烙，几排煎好的锅烙底朝上放在锅边上，迎着灯光一照，直放油光。这时我肚子里一阵咕噜咕噜的响，才想起来还没有吃晚饭。正好我们也要找个说话的地方，就对老李同志说：

“咱们找个地方喝几盅吧。”

老李说：“好吧。”

站在小馆门旁拉客人的跑堂的耳朵真尖，他竟听见了我们要喝两盅，忙一边往里让，一边直着嗓子喊道：

“喝酒里边请，吃饼白喝汤！”高声喊完又用一般的声音说：“请吧，请吧，什么酒都有：烧酒、啤酒、葡萄酒、白兰地……”

我往里边一看，屋里人很多，不方便，就将身子一闪，躲过跑堂的，和老李同志向前边走去。在一家馄饨馆前，我俩停下了，这里面客人很少，灯也不大亮，比较肃静。我看了老李同志一眼，他点点头，我们就进到里边挑个墙角座位坐下来。我知道他喝不多少酒，我更是两盅就会醉倒，就只要了一小壶酒两碟一角钱的小菜，两碗馄饨。我和老李同志先唠了几句挡人耳目的话，等酒菜都上齐了，跑堂的又站到门旁去了，就低声对他说：

“你知道我会回来吗？”

“我盼你能回来。”老李喝了一口酒说，“你走后我很后悔，我怎么强调起困难来了！上边既然相信我能完成，我就应该尽力去做才对。这样我在屋里就坐不住了，知道你也不愿意上我那个院里去，就上摩电站这迎你来了。”

我笑了笑说：“你要迎不来呢？”

“那我就到道里去找你，一定得把任务要回来！”老李同志把酒盅往桌上一撂，低沉有力地说道。

“不用你去要，任务还是你的。领导说任务重要，非你去完不成！”

老李同志望望我，没有立刻说什么。他的眼睛里，闪烁着激动的亮光。老人拿酒壶的手都有些发颤了，他满斟了一盅，一仰头喝了下去，我还没看见过老李喝这么多的酒，忙说：

“你别喝多了！”

“不要紧，人逢喜事千杯少哇。组织上这样看重我，就是刀山，我也能一口气跑到顶尖上去。”他想了一下又说，“明天上午我就到船码头上去，若是顺利的话，当天就走，最晚不超过后天。”我知道他已经有了安排。

“东西都‘装置’好了吗？”老李问我。

我说：“今天晚上我回去就办。你用什么身分走？”

老李说：“外县的小地主。”

“好吧。明天十点钟，我到码头上去找你，‘东西’在那里交给你。”我看看表说，“我还得去买点东西，先走一步，你老可别喝多了。”

老李笑着说：“成年在外边跑，肚子里能装多少，我心里有数，你放心吧。”

我向老李点点头，招呼跑堂的算了帐，付了钱，就离开了老人，向正阳街走去。

正阳街是哈尔滨道外最热闹的一条街，自从日本人侵占以后，虽然不如往日繁华，但买卖家还是尽量支撑着门面。日本人也努力维持着往日那繁华的景象，强迫各商家晚间不许早关板，不许早闭灯。所以这时候虽然已经快到十点多了，仍然还是灯火通明，不同的是街上的行人已经不太多了，有的地方甚至只剩下巡逻的警察和特务。日本人就靠这些东西来维持着表面上的虚假繁荣。

我到“大罗新”买了两铁桶水果糖，这是哈尔滨有名的糖果，用刷着亮油的铁桶装着，有一尺多高，圆形的，里面的糖块多是黄色的，透明、发亮，吃上去味道很鲜美。从外县来的人多数都买回两桶去，送给亲友。给老李同志带上这样两桶糖，再配上两瓶“世一堂”的虎骨酒，是很合外县小地主身分的。

买完东西回到道里住处，已经很晚了，大秦同志正在椅子上打盹儿，我知道她是在等我呢，便说：

“你怎么偏要等我呢。我不是已经给你留下字条，说我可能晚些回来，要你先睡吗？”

大秦同志睡意朦胧地说：“谁知道你回来这么晚呢。”她见我拿着两桶糖两瓶酒，就又笑了笑说，“看这样又得开夜车了。”

我说：“是呀，今天得好好加一加工，这是一次又危险又重要的任务呢。”

大秦同志见我这样说，就要和我一同工作，好说歹说才算把她说躺下了。我把窗户、门都挡严，就开始了这既细致又有趣的工作。

我拿过糖桶来，先用酒精把桶盖的封口纸润湿。这是一条印有精细花纹和商标的薄纸，如果弄不好，就很可能弄断了，那样这盒糖就不能用了。用酒精润湿，主要是为了保持花纹纸的颜色不变。至于封口纸启好启坏，就全看启时的技巧了。对此，我已经很熟练，我能够把任何薄纸的封口打开，然后再封上去，使再细心的人也看不出来，这也是工作中锻炼出来的，开始时候也曾因为弄不好而苦恼过呢。

我把封口纸启下来，小心地放在一旁，把糖倒出一大半，剪好两个和糖桶里口一般大的马粪纸，把文件夹在当中，放进铁桶里，然后再将那一大半糖装进桶里盖上盖，封好口，这样就大功告成了。任何人也不会看出马脚来，拿起铁桶来一晃，里边哗啦

哗啦糖块直响，上下一敲，也叮当响，听不出是两层底来。除非把铁桶砸开，不然是看不漏的。

说起“装置”和带东西来，虽然是一些技术上的问题，但却关系到党的工作能否顺利开展和同志的生命安全，因此，是必须多研究多想办法的。带东西要分人、分对象、分季节，看这个交通员是以什么身分出现的，如果是老农民打扮的，就带上一块大玻璃镜子，把文件夹在后面，然后再配上一对帽筒，或者是一套壶碗，看上去很象陪送姑娘出嫁的样子。如果是在秋天，有时也拿上一把洋铁壶，把文件放在壶嘴里，两边用东西挤住，再配上一卷窗户纸，让人看去一点也不扎眼，很象个过日子的老农民。如果是在阴历年前，有时也拿上一套蒸干粮的笼屉，笼屉帽子的席子是两层的，中间夹着一层纸，把这层纸拿掉，换上我们的文件，或者就用原来的纸，把党的指示用淀粉写在纸上，干了看不出字来，还是一张白纸，等到看时，拿碘酒一擦，字就显出来了。这个法子是比较保险的。总之要动脑筋，除了拿东西要合乎这个人身分之外，还要研究他去的那个地方缺什么，如果那里镜子很多，再让他拿镜子，那就容易引起人的疑心。各方面都要想到了，才保险。

今天，我装这两桶糖，对老李同志来说是很熟悉的，因为他经常以外县小地主的身分出现。

装完糖，天已经放亮了，我忙收拾好东西躺下养一养神，好准备明天上码头。

哈尔滨“码头”的票房子在五道街头上，和松花江只隔着一条沿江的马路。

我拿着糖、酒到了码头，正是九点半，时间尚早，便沿着江边走了走。

“庆兰号”轮船正停在码头上，脚行（码头工人）在往船舱里

装货，一个穿洋服的日本商人站在跳板上指挥着，跳板是用三块厚木板并在一起搭成的，日本人直喊“哈牙哭”（快）。码头工人背着沉重的大木箱子，一快走起来跳板便上下乱颤，日本人大概怕跳板断了，忙从跳板上跑下来，嘴里也忘记喊了。

“庆兰号”当时是松花江上的一条大船，它象火车中的快车一样，到一般的小码头是不拢岸的。船上的餐厅很宽敞，除了三等的统舱之外，还有一、二等包房，不过数量很少，票价也极高，当时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似乎也只是给穿和服的日本人和汉奸们准备的，一般的中国人是坐不起的。

“庆兰号”船大，人多，这对老李同志可能是有利的，因为他可以比较容易地混在人群中躲过敌人或叛徒的耳目。想到这里，我看了一下表，已经快到十点了，便向票房子走去。

票房子里排了长长一列等候买船票的人。这些人都是从一清早起就排在这里的，好多人都坐在地下，有的在打盹，有的在吃干粮。当时三等舱的卧席都是有号的，从一号排起，号和号都挨着，如果号卖完了，剩下的人就只能挤在边上坐一坐，或者坐在甲板上，道近的人还可以对付过去，道远的人就受不了。所以人们都早来排队，企图买到一张有卧席的票。我估计老李同志一定来得很早，可能排到前边了。进了票房子我就从头看起，一直看到排尾，也没有看到老李同志。我正在纳闷，忽听身后有人叫我，忙回头一看，正是老李同志。他穿一件蓝市布大褂，宽宽大很大很合体；脚上白洋袜子，青色白布底鞋，头上戴一顶细纹草帽，右手一把竹股刻字的大扇子，左手提一个包袱，包袱皮是新的，胳膊上搭一条毛毯。这身整整齐齐的穿戴，再加上老李那红红的脸膛，修长的胡须，让人看来，真象不太富裕的地主。

老李同志见我上下打量他，会心地微笑着说：“表侄，昨天我说不让你来送，怎么偏来呢，你公务那么忙，还行这套俗礼干什



么。”

“没关系，我出来的时候和科长说了一声。”我顺着他的话音胡编了一句，随着就把手里的铁桶糖和虎骨酒举起来说，“顺便到街上给家里兄弟们买了点糖，给你老买两瓶酒带回去。”

“你看，你还费这个心思干什么，都是自己家里人。”老李边说边接过去，同时往外推着我说，“你快回去吧，送客千里终有一别，别耽误了公事。”

我知道他是要推我到外边去谈情况，便一边客气着，半推半就地和他一道走出来。

出了票房子，顺着江沿往西走，人比较少一点，我见前后行人都距离得比较远些了，便问道：

“今天能走上吗？票买了吗？”

老李摇摇头说：“今天怕不能走了，等明天‘远江号’吧。”

我说：“‘庆兰号’不是很合适吗？船大、人多，容易遮掩。”

老李说：“不在船大小，主要在人上。这次不比往常，我必须物色一个能够利用的对象，这个人得和我合得来，还得是往汤原去的。今天起大早我就来了，暗暗地找到现在，也没发现合适的，看这样子得明天了。”

“如果明天再遇不到合适的呢？”我有些着急地说，我真盼望能早一天将文件送到游击队去。

“明天找到找不到我也走。”老李坚定地说，“我心里也着急，可是着急也得沉住气。我再到票房子去转一圈。”

我说：“好吧，明天十点我再到这里看看，如果看不到你，就说明你已经走了。”

他点点头，就回身往票房子走去了。

我看看老李同志的背影，盼望他今天或者明天，能找到他所需要的对象。

## 叛徒出现了

八点刚过，我就从道里住处往道外江沿码头上走去。

从昨天和李升同志在江边上分手以后，我脑子里就不断地想：老李同志是否已经走成了？他所需要的对象物色着没有？是一个什么样的对象？从工作速度上讲，我希望他昨天能走成，但是另一方面，我又希望他在今天走，这样我就可以多知道一些情况。因为我对老李同志这次汤原之行，始终是很担心的。不是担心一路上一般警察的搜索，特务的侦察，沿途的关卡，这些都不能奈何老李同志；更不是担心路途遥远，山路崎岖，老李同志是吃得起任何辛苦的，多么难走的山路，在他脚下也会化为平川。我只是担心遇见叛徒。叛徒，这是疯狂的狗，咬住人不松口的。

我一路上想着往前走，恨不能一步跨上松花江边，看个究竟。

从道里步行到道外五道街，通常需要走一个多小时，今天我只走了五十多分钟。拐过三道街北口，就望见“远江号”轮船拢在码头上。我因急于要见到老李同志，就一直往票房子走去。

票房子里依旧有很多等着买票的人，仍然是排着长长的行列。我一眼就看到老李同志那高大的身材了，他没有走。他还

是穿着昨天那套整齐的衣服，手中拿着包袱和毯子，不同的是添上了我给他那装着文件的两铁桶糖和两瓶虎骨酒。他正站在行列的旁边，和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说话呢。青年人衣着很朴素，也是布衣布鞋，手中也提个小包袱，长得很清秀，脸色发白，看样子很象一个站柜台的买卖人……正在我打量这个青年人的时候，老李同志发现了我，忙向我打招呼，从他的脸上我看出了一股满意的神色。这样我就断定他已经物色着他所需要的对象了，而且一定就是这个年轻人。

我忙向老李同志走去。他满面笑容地对我说：“你还来送我做什么，快回去吧。告诉‘家里’不用惦念，我在路上不会寂寞的，搭着个好伴，一路上互相有个照顾。”接着他把手向青年人那边一伸说道，“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汤原县城的……”

我记不清老李同志说的是什么买卖字号了，好象有个百货的字样。总之，我的判断是对的，这是个年轻的买卖人，商店的小伙计。

小伙计向我点点头，微笑中露出一丝腼腆。

老李同志又向小伙计介绍说：“我这位表侄是教育界里的人，书底子深，对人热诚，你再到哈尔滨的时候到他家里串门吧。”

“一定请你来。”我一边客气着，一边指着老李同志对他说：“老人家年纪大了，不常出门，请你一路上多加照顾，将来有机会我一定去致谢。”

小伙计忙点着头说：“好说，好说，请先生万安，我和老爷子一见就投缘，到汤原一定请他老到我们柜上住。”

老李同志听到这里响亮地笑了笑对我说：“你看，我们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我和这位老弟一定会成为忘年之交的。”他又

转过脸去对小伙计说，“你头会说以后要常跑佳木斯，那太好了！我二儿子在佳木斯‘聚源东’当二掌柜的，这次我在汤原小留几天，就到他那里去住。你以后到了佳木斯，不管和他们柜上有没有来往，就尽管去住，我嘱咐嘱咐他，让他款待你。”

几句话说得小伙计嘴都合不上了。我也想笑，可是我把笑声憋在肚子里。我心里明白，什么“聚源东”“二老板”，这完全是编出来的。可是老李同志却说得有声有色，有根有梢，不知道底细的人是一点也听不出破绽的。

旧社会里好多人都是势利眼，尤其是买卖人，更为眼俗。老李同志抓住这个特点，有枝有叶的这样说，无形之中就把自己放到“老太爷”的位置上去了。果然，小伙计更加亲热起来了。

这时，整个行列忽然骚动起来，睡觉的人睁开了眼睛，坐着的人站了起来，后边的人往前边挤着，前边的人往售票窗口探脖子，原来已经开始卖票了。

人这样一骚动，行列的密度骤然加大，人们一个挨着一个，稀疏的行列紧串起来。站在行列中的小伙计这时也被拥到前边去了。我和老李同志忙跟上去，同时，老李同志也作了一个要往行列里挤的姿势，却被小伙计伸出一只手来拦住了，小伙计说：

“不行，你老千万别进来，挤的要命，我替你老买票吧。有我的就有你老的。”

小伙计脸色涨红地说着。天气热，人再挤，汗珠从他的脸上流下来。

“好吧，我就不客气了。”老李同志边说着边掏出买票的钱，“来，这个给你，把你的包袱给我，我们到一边去等着。”

小伙计还要客气，老李同志没容分说把钱塞在他手里，顺便拿过包袱，我们两人一同向屋角处走去。

这是一间很大的票房子，还没有开始卖票的时候，屋边上、

角落里，坐有一些人。这时，有的已经跑到行列里边去；有的站在行外边，或者拥到窗口前边。拥挤和吵闹，都集中到那一带去了。屋子四周，反而显得空旷旷的，没几个人。我和老李同志走到一个旁边没人的长条椅子上坐下，他小声问道：

“你看这个人怎么样？”

“行。”我知道他问的是小伙计，便点点头说，“是好人，只是不知道他会给你些什么帮助？”

“我现在也说不上。”老李同志想了想接着说，“汤原我好久没去了，现在又出了叛徒，从前的熟人不知道情况怎么样了，发生变化没有？我不能贸然去找。现在有了这样一个人，就多了一条路。能在他们柜上落一下脚，总比住店安全哪。”

这时，一个挎水果筐的小姑娘走过来了。我们俩便停止了谈话，我掏钱买了两斤海棠果交给老李同志说：

“你拿着和新朋友在船上吃吧！‘老太爷’得有个老太爷的样。”

“好吧。”老李同志没有笑，严肃地说，“你放心吧，我一定尽全力完成任务，请你转告省委，有我在就有文件在，万一发生不幸的事，敌人也得不到它！”

“我一定转告省委，就盼望你能早去早回。”

我望着老李同志那双激动的眼睛，心也不由得急速地跳起来。这时，我们一对比亲人还亲的同志并肩坐在这里，可是一个小时以后，就将离开了！这样一位老年人，明明知道前方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是有危险的——甚至是生命的危险，却毫无所惧地向前走去。敌人，会在每一个角落，每一棵树后，每一座山岭间，阴险地等候着他。但是他却全然不顾，想到的只是怎样去完成任务，怎样保存文件。这样一种忘我的无畏精神，是常人能比得了的吗？如果还有人怀疑“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这句话的

含意时,就请他设身处地的想一想此时此刻的老李同志吧。一个没念过多少书的农民,在他的多半生中打满了受苦受难的烙印,但他却最了解怎样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最懂得怎样憎恨敌人,怎样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这样的人,是值得我们永远尊敬的……想到这里,我真想紧紧地握住老李同志的手,说说心里话。但是现实却不允许我们这样做,在这公开的场合里,是没有这种可能的。我只能望着他,热情地望着他,用眼睛把我们的心连在一起。

老李同志见我直望着他,悄声问道:“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没有了。”我轻轻地说。

“那你回去吧,离开船还有好半天呢。咱们俩在一起坐久了怕惹人注意。”

我点点头说:“你多加保重吧。”

我站起身来,一边和老李同志往小伙计那走一边说:“我和他打个招呼就走,你拿着他的东西,不要出去了,免得他多心。”

老李同志答应着。

小伙计已快排到窗口,这是他从早晨起站到现在最紧张的时刻,所以他也顾不上和我说更多的话,我们只简单地寒暄了几句,我就辞别他和老李同志,走出了票房子。

太阳正晒在头上,晒得石头马路都有些烫脚,松花江水变得白亮亮的。“远江号”轮船已经装完了货,先买完票的人又已排在跳板头上等候上船,几个伪警察分站在跳板左右,等着检查每个上船的旅客,看样子快要放人了。

我望着眼前的景象,想着老李同志就要排到这群人当中,经过警察的盘问,踏过这条跳板,坐在这条船上,顺流而下……

但愿老李同志能躲过一切危险,顺利地完成任务!

“远江号”轮船的汽笛响了，船锚拉起来，船头转过来，船后翻滚着层层浪花，顺着松花江宽阔的江面，向下游驶去。

在船舱里，挨着铺号，坐着一老一少两个旅客，两人唠得非常亲热，互相照顾得非常周到，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们是久别重逢的至亲骨肉呢。

这两个人便是老李同志和那位年轻的买卖人。从上得船来，两人真成了忘年之交。老李同志把省吃俭用积下来的钱大方地拿出来请小伙计到船头餐厅上吃饭，使小伙计感激得五体投地，恨不能把心掏给老李同志，真象尊敬“老太爷”一样尊敬这位上了年纪的人。他把自己的身世以及他们柜上的一切情况，都滔滔不绝地讲给老李同志听。老李同志感兴趣地听着，心里默默地记住他们柜上大掌柜的是谁，二掌柜的是谁，都有什么特征，以及其他一些细微的情节。老李同志虽然还没有到他们柜上，但对那里的情况已经了如指掌了。

船行了三昼夜，经过了巴彦、木兰、通河、依兰，终于要到汤原了！

汤原码头并不大，但是人却不少，这里除了等着上船和接亲朋的人之外，就是那些日寇的走狗——便衣特务和警察了。汤原是我们游击队活跃的地区，抗日的烽火一直在这里燃烧着，敌人用尽心机想扑灭它，可是烈火却越烧越旺，一直烧到敌人的眉毛边上。游击队的领袖夏云阶同志的名字，使敌人听到后就头痛。敌人从正面无功击破这个坚强的人民队伍，便企图割断游击队和外地的联系。他们在码头上派了不少警察、特务，严密地搜查来往客商。公开的警察是少数的，隐藏的便衣特务是多数的，他们象敌人放出来的猎犬一样，伸长着鼻子，转动着鬼祟的眼睛，阴险地窥视着。

老李同志深知码头这一关，是他能否完成任务的关键，闯过码头，胜利就在望了。船愈逼近汤原码头，他愈感到这一关不好过，心里没底。这样的感觉在他心里是很少出现的。他斜看了一眼糖桶，文件就在这里边装着，如果遇到叛徒，那就是说他可能被捕，那时怎么办？这么大一个铁桶，丢不掉，放不下。如果文件在手中拿着，还可以一口吞下，现在却隔着一层铁，怎么办呢？他在想，努力地想，老李同志沉默了。和他一样，小伙计也在想，他大概在想下了船后怎样接待这位“老太爷”吧？掌柜的如果不热情招待得怎么办呢？如果能先回去说明一下情况有多好。这一老一少都在想，都在沉思。

两长一短的汽笛声猛叫起来，最后一声尖长而凄厉，船到汤原码头了！

老李同志在沉思中猛然惊醒，立刻决定：必须尽快地到甲板上去，尽可能先看清岸上都有些什么人？他知道汤原码头水较深，跳板就搭在江沿上。甲板距离岸边很近，是能看清岸上的人的。他站起身来，拿好东西，招呼小伙计一声。小伙计一路上对这位“老太爷”言听计从。现在见他要早一点到甲板上去等候下船，便拿起包袱，跟随着下了扶梯，向甲板上走去。

船头正在向逆水方向掉转，等候下船的人必须先站在下层和码头相背的甲板上，等到船头掉过去，背面就变成正对码头的方向了。

甲板上等候下船的人还不多，大多数人还没出来，因为掉船头、下锚、拢岸、搭跳板，还需要一段时间，早出来也只能在那里等着。

到了甲板上，老李同志有意地站在小伙计和几个等候下船的人的背后，把草帽又往低压一压，尽可能使自己隐蔽一些。

船头逐渐掉转过来，又逐渐往码头上靠拢，岸上的人看得越



来越真切，先是一堆，接着分清了个数，大约有五六十人，衣着也能分辨出来，眉目也隐约可见。船身完全和码头靠拢了；甲板上的人和岸上的人相隔最多不超过五十米。

老李同志尽量睁大眼睛，全神贯注地往对岸上看去。对几个穿黄衣服的警察，他只扫视了一下，这不是他的主要目标，叛徒是隐蔽的，不会挎上洋刀。他把视线直射进那些穿便衣的人群里去，人群在骚动，他的眼睛也在移动，发现里面有几个行动鬼祟，服装可疑的人，凭着多年的经验，他知道这几个人是干什么的。但是他不怕他们，他们的面孔是陌生的，只要不是叛徒，最阴险的特务也能斗得过。但是这是关键的时刻，可万万不能粗心大意。他又把那些人观察了一遍，仍然没有发现熟悉的面孔。老李同志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暗暗高兴地想：这就好办了！只要这一关能闯过去，到了陆地上、山林里，你家老李爷子就插上翅膀了。真的，老李同志是有名的山林通，到了山上，他就会成为一只猛虎，敌人就难以奈何他了。

老李同志心一轻松，就想和小伙计唠扯几句，但就在他一侧头的工夫，忽然看见在一个小烟卷床子后面，和一个搽胭脂抹粉的中年妇女并排坐着一个家伙，戴着八角帽子，穿着一身半旧的黄衣服，被太阳晒得发黑的长脸上，突出来很高的颧骨，一双不断眨动的小圆眼睛，正往甲板上扫视着。这是谁？很面熟，在哪里见过？老李同志从记忆里一下子就搜寻到这个人了。那是老李同志在汤原工作的时候，在一个朝鲜族人居住的村子里曾和这个人接过头。对，正是他！名字记不清了，只记得他是朝鲜族人，是个共产党员。现在他在这里做什么？是闲坐着吗？他的穿着打扮，他的神态……不用再看，不用再想，一切都清楚了！叛徒终于出现在码头上！怎么对付他？躲是躲不了的，上岸的跳板正在往岸上拽，跳板只有两块，不足三尺宽，每个下船的人都得

从这上走过去，而且要排成一列，拉开距离，小心翼翼地走过去。叛徒只要盯准这块跳板——他一定会盯准的，那个小烟卷床子正斜对着这块跳板——就不会漏掉一个人。那么怎么办呢？跳板就要搭好了，人们就要开始下船了，难道就这样束手被擒？就这样让敌人、叛徒把文件拿去？党的机密，游击队的安全，都紧系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里。怎么办？把铁桶扔进江中去，那还怎么完成任务？再说众目所视，自己岂不成了疯子……跳板已经和对岸连上了，横木已经夹上了，就要下人了。怎么办？怎么办？必须当机立断，想出决策来。老李同志的脑子飞快地翻腾着，翻腾着。忽然，他灵机一动，看了一眼站在前边的小伙计，忙把手伸进大衫兜里，装作掏什么的样子，然后拉了小伙计一把说：

“哎呀！我有一个小包不见了。”

小伙计一愣神说：“什么样的小包？”老李同志随使用手一比说：“这么大，白布包。”说到这里，他忽然象想起来似地说：“对呀，一定是我头会掏手绢的时候，掉到船舱里了，我回去找找。”

小伙计着急地说：“就要下船了！”

“不要紧，我后下吧。”说着老李同志就往船舱里走。

“那我和你一同去找找。”小伙计说着也跟上来。

老李同志明知道他会跟上来的，便有意紧走几步，闪身转入船舱里面，然后象才注意到小伙计跟在身后似的，一回身，一伸手拦住小伙计说：

“哎呀，你别来了。我看这样吧，你先下船，回到柜上说一声，完了再回码头上来找我。如果你们掌柜的欢迎我去，我就不客气去打搅一番。”

这话正说到小伙计的心里去了，他的脸一下子红起来，不好意思地咕噜着说：

“咋好把你老一个人抛在码头上呢。”

“没关系，老弟，船上相处，你也看出我是个直爽的人，买卖不是你开的，你应该先回去和掌柜的说一声。”

“那么你老一定得在码头上等着我。”

“怎么！老弟还怕我说了不算吗？这样吧……”老李同志把手中的两铁桶糖和两瓶酒往小伙计面前一举说：“反正我东西也多，下跳板拿着不方便，你先把这两件东西拿到柜上去，有东西放到老弟那里，还怕我不去吗？”说罢又哈哈笑了两声，笑得那么坦率、自然，从这样的笑声里，谁能想到他正处在危机四伏的境地之中呢。

小伙计也随着笑了，这是真正高兴的笑，他真怕失去这位“老爷子”朋友呢。他忙把铁桶糖和酒瓶子捧过去说：“好吧，一言为定。我一定尽快地回来接你老。”

“不见不散。”说到这，老李同志往外一指说：“你看，开始下船了，你快走吧，我找完东西随后也上岸。”

小伙计答应着，心满意足地挎着包袱，捧着铁桶糖和酒瓶子向船舱外走去。

老李同志也举步奔往扶梯，走了几步，估计小伙计已经出了船舱门，回头看看，并没有人注意自己的行动，便回身从后面甲板向船头转去。他知道每逢船到一个码头，总有一些人从船舱里走出来，站在船头上闲看上下船的人。那里人多些，容易隐蔽，所以他便奔船头走来。

老李同志到了船头，隐身在别人后面，向跳板方向望去。只见岸上的四五个警察，正分头搜查下船的旅客。这是“例行公事”，除了一些坐头、二等包房的日本人、汉奸和伪官吏之外，每一个正当的中国人都要遭受这番搜查。警察背后，站着那几个服装可疑的人，装着看热闹，但装得一点也不象，每个细心的人都

会看出这几个笨蛋是在扮演着什么角色。那个叛徒，仍然坐在烟卷床子后边没动，但那两只小圆眼睛却直盯着每个下船的旅客的面孔，盯得那么狠、那么毒。老李同志真恨不能一下子把那两颗贼眼挖下来，抛到江心里去喂老鳖。

这时，小伙计已经走过跳板，站在警察的面前了。警察开始搜查他的小包，摸他的身上，最后，拿起铁桶糖来，狠劲地摇晃了几下，又用手敲了敲上下的盒盖。老李同志的心随着铁桶的晃动，也跳动起来。但是他并没有惊慌，他知道从铁桶外部是检查不出任何问题的。果然，小伙计平安地过去了，他一边扣着衣服扣，一边又回头望了望，大概是看老李同志下船没有。他站那犹疑了一下，便回身急步向远处走去。

文件已经随着小伙计装进“保险柜”里去了，但是老李同志自己呢？

下船的人已经走完了，上船的人经过搜查正往船上走，紧接着就要卸货、装货。看情况，已经快要拔锚开船了！

怎么办？老李同志猛然把牙一咬，心一横：冲出去！除此之外，别无良策，冲过去更好，冲不过去，到了监牢里再想办法，至少小伙计会想办法来探监的，那时再托他给哈尔滨捎信……

老李同志一边迅速地思索着，一边把草帽再往下拉了拉，转身绕过后甲板，向前舱门走去。

码头工人开始卸货了。

岸上的警察，这时已搜查完来往客商，几个同类聚在一起闲扯；那几个不三不四的家伙已经不见了。只有那个叛徒，仍然坐在原地没动，不过他也松劲了，眼睛不再直盯在跳板上，只是偶尔往这边看一看。

老李同志一看这情形，有可能混过去，便紧跟在一个背着大柳条包的码头工人后边，向跳板上走去。在那没遮没挡的跳板

上,他想借助于柳条包遮掩一下。他还存着万一的希望,如果叛徒能够不发现他,该有多好哇!

但是这并没有躲过叛徒的眼睛,他那双阴险的小圆眼睛已经停止了眨动,直直地投射过来,而且是越来越用心地,越来越紧张地盯视着,观察着……

老李同志走下跳板后,并没有向叛徒那边看一眼。如果叛徒已经注意上,看有什么用呢?只能使自己早一些暴露罢了。他只是向警察那边看了看,发现已经有两个警察看见他了,他知道混不过去了,便主动地向警察那边走去,同时把自己的身子转了一下,使叛徒最多能看个侧影。

警察们对这个最后下来的老头子搜查得比较马虎,只是捏捏包袱,摸摸身上,就让老李同志过去了。

老李同志没有回头,也没有向旁边看,一直向和叛徒相反的方向走去。他没有想这是向哪里走,只盼望能快走到街口上,拐进去,迅速地隐蔽起来。

但是还没等他走出五十米去,就听后面响起了杂乱的脚步声,由远而近,直奔自己而来!不用问,也不需要回头看,从那大皮鞋踏地的声音;从那哗啦哗啦的洋刀链子的响声中,老李同志已经知道是些什么人跑过来!预料中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他并不感到恐惧,仍然镇静地往前走着,象世界上没发生任何事情一样向前走着。但是他的脑子却在激烈地思考着:得怎样对付这群家伙?最主要的是那个叛徒。

脚步声响在老李同志的周围,大概有四、五个家伙,忽啦一下围住了老李同志,后边还有一个端枪的喊道:

“举起手来!”

老李同志并没有举手,他将身一闪,一回头,装成惊讶的样子问道:

“干什么？怎么回事？”

伪警察们被问得稍微一愣神，其中有两个猛回头向后边望去。

在后面，距离警察们十来步远的地方，正站着那个叛徒。他那两只小圆眼睛，死死地盯着老李同志，眼睛下边的两个颧骨，显得更高、更狰狞，活象旧小说上画的小鬼。

他见警察们投过来疑问的眼色，便点了点头，又向老李同志拱了拱嘴。于是警察们便象接通了电源的机器一样开动起来，不容分说地把老李同志的包袱、毯子夺下来，然后扭住胳膊，又一个扑上来浑身摸着……

在这一刹那间，老李同志也已看清了叛徒那副嘴脸，不由得怒气往上冲，真想向码头上、轮船上所有的人指着叛徒大喝一声：“你们来看，这是中国人民的叛徒！”但是老李同志马上控制住了这种感情上的冲动，他知道现在不能凭怒火、凭仇恨来对付叛徒，现在是更需要冷静和智慧的时候。

伪警察们迅速地搜查完了，便拥着老李同志向码头派出所走去。

叛徒已经快步走在前面，当老李同志还离派出所很远的时候，他已经闪身溜了进去。

## 决 斗

在敌人的派出所里。

老李同志被看押在墙角落里。身上的东西已经都被伪警察搜去了。“良民证”被拿进里边的一个屋子里，其余的东西放在一张桌子上。

当老李同志快进派出所屋门的时候，就从窗外看见叛徒正在屋里向一个伪警官“告密”。老李同志一迈进门槛，叛徒就尾随着那个伪警官钻进屋里去了。

现在，审问还没有开始，老李同志知道这是在等待那个伪警官和叛徒出来。他站在角落里，隐隐约约听见叛徒那硬梆梆的舌音不断地在嘀咕着。“告密”还没有完，乘这个不可多得的空隙时间，得迅速地把情况分析一下：他从叛徒方才在伪警官面前那种拱肩缩背，畏畏缩缩的样子，从这件事还被派出所控制的情况下，已经断定叛徒还没有取得敌人的信任，还没有爬上去，还在被敌人牵着当狗利用。从这样的判断当中，想好了自己的对策，他下决心说什么也不承认自己是李升。反正除了叛徒一人和自己见过一面之外，敌人再也抓不到任何证据。文件已经放在“保险柜”里，“良民证”上早已改了姓名，证据只是叛徒的一张嘴，而这张嘴看起来在敌人面前并不硬，这样自己就有希望闯过去，虽

然这希望不大，只不过是一线的希望，但也要紧紧地抓住……

屋里的门帘掀开了，伪警官从里面走了出来，这家伙刀条子脸，两腮下陷，牙齿发黑，很可能是个大烟鬼。叛徒没有跟在他的后面，但却从门帘下边露出两只皮鞋脚来。

伪警官把手里拿的“良民证”扔在桌子上，大模大样往椅子上上一坐，张口问老李同志道：

“你叫什么？”

“我叫王克勤。”

“你叫什么？”伪警官象没听见一样，又提高了嗓音问。

“姓王，叫王克勤，三横一竖的王。”老李同志也忍不住地提高了嗓音说。

“八嘎！”伪警官用日本话先来个下马威，“随便说话‘三宾’的给，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派出所。”

“那就要好好回答问题。你知道为什么把你抓来吗？”

“不知道，一点也不知道。”老李同志表现出无限委屈的样子说，“我一下船你们就不问青红皂白地把我抓来了，我平常走的正行的端，没有做过一点犯法的事……”

“少表白自己。”伪警官一瞪眼睛说，“你说，从多咱改名换姓的？”

“改名换姓？”老李同志惊讶得叫起来，“警察官，你这话从哪说起的？我从娘肚子生下来就姓这个王，已经姓了五十多年了，到老了为啥要改名换姓呢？”

“有人检举你。”

“谁？谁？”老李同志好象非常意外的惊奇得瞪圆了眼睛喊道：“警察官，你不能听一面之词，我要和这个人对证，这，这个人安的什么心？”



“好吧。”伪警官向屋里一回头喊道：“出来！”

门帘下的皮鞋脚一动，叛徒钻出来了，仍然是那副奴颜婢膝的样子，畏畏缩缩地站在伪警官旁边。

老李同志狠狠地瞪视着这个厚颜无耻、贪生怕死的东西，一个极有诱惑力的念头又在他心中升起，他真想一步跳过去，抡起老拳，对着叛徒那高颧骨猛打过去，将他打倒、打死！这个痛快的念头使他的神经抽动了一下。如果控制不住，就会把在危难中还可能闯出去的路子完全堵死。他极力地、痛苦地克制住了这个念头，然而愤怒却压不下去，他也不想压下去，这和他所需要流露出来的感情是没有什么矛盾的，只是要在这里边添加上理智和斗争的策略，在盛怒之下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很容易的，老李同志尽量把思路引向这一方面来。

叛徒出来以后，伪警官就指着他问老李同志道：

“你认识他吗？”

“他是什么人？从来没见过面。”

“他可认识你。”伪警官向叛徒一拱嘴，“说吧。”

叛徒斜看了老李同志一下，老李火辣辣的眼光直射过去，这眼光和叛徒的眼睛遇在一起，使得叛徒身子一抖，结结巴巴地说道：

“你，你说实话吧，老李头，事情已到这一步了……”

“什么？你管我叫什么？老李头？我和你素不相识，你认错人了？！”

老李同志直瞪着叛徒喊着，伪警官也直望着叛徒，叛徒又眨眨眼小圆眼睛看看老李同志说：

“我，我没认错，你是老李头，是，是共产党……”

“啥？你说啥？我是共产党？！”老李同志象第一次听见这个名词一样直叫起来。

“小点声！小点声！别象蝎子螫了一样！”伪警官敲着桌子说。

老李同志气得浑身发抖，眼睛冒火，手指着叛徒说：“你，你可不要血口喷人，你要好好想一想，这干的是什么事？”他说到这里，手指着前胸说，“你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你的祖先，你才三十多岁，还有后半辈子，你还要生儿养女，不要让自己的儿女跟着你抬不起头来……”

老李同志的话使叛徒的头低垂下去了。

伪警官并没有察觉到这话里边的双重含意，只是不耐烦地敲着桌子说：“算了，讲什么道！说，你是不是共产党？”

“共产党？”老李同志满腹冤屈地说，“警察官，你看我这个样子，这么大一把胡子，怎么能沾什么党的边儿，共产党是啥样我从来没见过，听这个名的意思好象是要共人家的产，若真是那样就是我的对头，我是个有家有业的人，我在乡下有地，我儿子王学义是‘聚源东’的二老板，我怎么能乐意共产呢！”

伪警官听到这里，探着脑袋问道：“你儿子是哪个‘聚源东’的老板？”

“佳木斯东门外的。”

“那么你上汤原来干什么？”

“我到佳木斯去看我儿子，顺便到汤原来办点事儿。”

“到汤原的哪块办事？”

问题具体化了，老李同志的脑子飞快地翻转着，在他和伪警察官接触的这几个回合当中，已经敏锐地发现这个家伙对有钱的大买卖很感兴趣，他那个“聚源东”的老板儿子已经引起警察官的注意。因此他便决定再用同船那个小伙计的买卖抵挡一阵。他知道这样做有些冒险，那个买卖就在当地，如果伪警官脑筋一动，一调查，那边再不承认，便一切都完了。但除此之外，一

时之间再也想不出好对策。时间是这样短暂，在敌人面前是不能露出一丝犹疑不决的神色的，敌人除了听，还在看，如果稍一犹疑，一切心思都白费了。想到这里，老李同志便顺口说出了那个小伙计买卖的字号。

显然，这招对伪警官又起了作用，他的脑袋又探出来了，不厌其详地询问这座买卖的各方面情况：什么买卖的股东有多少？伙计有多少？大掌柜的是谁？二掌柜的是谁？……从这些问话中，可以断定他对这家买卖是很熟悉的。但是老李同志是胸有成竹的，他已经从小伙计那里听到了这个买卖的一些主要情况，而且牢牢地记在心里了，因此回答得没有什么破绽。但不妙的是伪警官抓住这个问题不放，还在继续盘问，越问越具体。老李同志心里渐渐着起急来，他所知道的情况已经说得差不多了，如果再问下去就有说差的可能。他很想抓住一个适当的时机，把问话引到别处去，但却引不开，他的心紧张起来，不安起来！

就在这时，有人在外边敲门。

“谁？进来！”伪警官停住问话，向门外喊了一声。

门开了，进来的是小伙计，就是和老李同志同船那个小伙计。

他跑得喘着粗气，汗水湿透了上衣，一进门就瞪大了眼睛，向老李同志惊呼道：

“哎呀！老爷子，您怎么到这来了！”

老李同志一见进来的是小伙计，真是心里开了一扇窗户！但他还是装成恼怒的样子说：

“你来了？咱们爷们不顺当，一下船就遇上了天外飞来的横祸。”

“你来得正好。”伪警官也对小伙计点个头说，“你认识这个

老头儿吗？”

从问话中听来，伪警官对小伙计是熟悉的。

小伙计忙奔过去说：“这是怎么回事呀？我不但认识这位老爷子，他还是我们柜上的客人呢，我们大掌柜和二掌柜的打发我上码头来接他老人家，可万没想到在这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王老太爷是我们柜上的客人，您平常和我们柜上……”

小伙计才说到这里，伪警官把手一摆说：“你不要说了，我全明白了。”他转身对叛徒恶狠狠地，但是声音很低地说，“你这个混蛋，婊子养的，真的你抓不来，拿假的来胡弄我，让我去得罪商界的朋友，你这安的是什么心？”

“我，我是有罪的人，不敢欺骗。”叛徒鼻尖冒汗了，嗫嚅着说，“他，他是老李头。”

“你除了空口说白话之外，还能拿出来什么证据吗？”伪警官瞪着眼睛问。

“我，我的主意是……是再搜查他一下，他到汤原来不能空跑，一定有……有文件。”

“方才不是已经搜查过了吗？”

“那，那是一般的搜查，他们带文件有好多秘密方法，得，得彻底搜查。”

伪警官皱起双眉想了一下说：“好吧。”他刚要招呼人，老李同志忽然高声说：“警察官，我不明白，为什么搜了一遍还要搜，要再搜不出来怎么办？”

伪警官没说什么，却直盯着看着叛徒。

叛徒稍微迟疑了一下说：“我想会……会搜出来的。”

“说肯定点！”伪警官厉声地说。

“会，会搜，搜出来的。”叛徒点着头，口吃得更厉害了。

“好。”伪警官向旁边两个警士一挥手说，“彻底搜查！”

搜查开始了。这真是一次极彻底的搜查！老李同志的包袱被打开；衣服脱下来；衣服领子被用剪刀裁开；竹股扇子被撕开；布底鞋被拆开；鞋底被拆得一片一片的……总之，一切能够检查到的地方都被检查了；一切能藏住任何微小纸片的地方都被搜查过了。搜查进行了半个多小时，在这半个多小时中间，老李同志嘴里不断地叨念着：“搜吧，搜吧，看你们能搜出什么来，简直是砸人……”他嘴里叨咕着，脸上装着生气，心里可暗暗高兴地想着：这一下可给叛徒当头一棍，让他有苦难言，在敌人面前更加抬不起头来……

搜查结束了，他偷眼看了一下叛徒，那家伙脸色煞白，汗珠从头上流下来，手都有些发颤了。

伪警官双眉皱成个一字，极力抑制住盛怒，用鼻子重重地哼了一声说：“怎么样，你还有什么高招吗？”

叛徒嘴唇掀动了几下，没能说出什么来。

就在这时，伪警官猛往起一站，咬着牙骂道：“混蛋！骗子！你戏弄老子，你……”伪警官越说越来劲，忽然伸出左手，猛抓住叛徒衣领子，抡开右手，用足力气，啪啪就是两个耳光，随着下面就是一脚，同时破口大骂道，“去你妈拉×的吧，婊子养的！”

叛徒趑趄趑趄地退出好几步远，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嘴角边流下血来，嘴唇抽搐着……

伪警官又赶上前去，用力将他拉起来，一边向门口那边猛推，一边连声喝道：“你滚！滚！……”

叛徒被从门内一下子推出去，门被关上了。

门关上了，老李同志的心却敞开了。想不到一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就这样非常富于戏剧性地结束了！

真的结束了，至少可以说在派出所这一段是结束了。伪警官在赶走叛徒以后，又向老李同志说了几句好话，老李同志便和

小伙计拿着东西离开了派出所。

这时，老李同志已经想好了下步棋应该怎样走，他觉得派出所这一关虽然闯过来了，但是叛徒并没有完全死心，他挨了打可能要想法报复；另外，伪警官也可能在冷静下来以后，察觉出什么破绽。因此在小伙计的柜上是不能久停的，应该在拿到糖桶以后，立即想法脱身，迅速地到游击队去，然后转道佳木斯回哈尔滨。越快越好。

当我们在哈尔滨担心老李同志的安全，盼望他能平安回来的时候，老李风尘仆仆地回来了，而且是带着游击队的报告回来的！这真使人喜出望外！我又为他买了一小壶酒，祝贺他冲破了重重危难，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老李同志的情绪也非常好，他向我细致而有趣地讲了上面的经过，我听得津津有味。最后我问他：

“那个小伙计替你拿了糖桶，当了‘保险柜’，后来当叛徒说你一定带着文件，彻底搜查你的时候，他没起疑心吗？没怀疑到那铁桶里装着什么吗？”

老李同志笑了笑说：“除非是傻子才不起疑心呢。从搜查我以后，小伙计就不大说话了，有时拿眼睛溜着我，我当然知道他在想什么，可是我装不明白，不理他。我心里有数，猜定他是不会说的，头一样，他和我已经有了感情，拿我的糖桶是出于自愿；第二样，说出来对他自己也极为不利，真要从那里翻出文件来，他就成了‘窝主’，也得纠缠在里边，弄不好连饭碗子都可能打了；第三样，他不是个坏人。有这三条，就保险了。可是很明显他对我起了疑心。从派出所出来，和我说话也不自然了。到了他们柜上，把我先让到前屋，他到后屋去了好长时间才出来，跟他一同出来的只有个二掌柜的，大掌柜的没露面，我一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其实这正合我的心意。我简单地和他应酬了几句，就说在汤

原不顺心,要走。二掌柜的人还不错,一定要留我吃顿饭,我也真饿了,就吃了一顿挺丰盛的饭菜,吃完饭,小伙计把糖桶、虎骨酒,原封不动地还给我,我告辞走了。我走得很放心,我明知道小伙计已经把事情告诉掌柜的了,可是老买卖人更是胆小怕事,树叶掉下来都怕砸脑袋,他们不但不会说出我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就是那个警察狗子来问的时候,也还会帮着我编词呢!”

老李同志说完就哈哈大笑起来。

我也不由得笑起来。

李升同志真是有胆有识,智勇双全的红色交通员!

## 革 命 第 一

汤原县委书记兼游击队长夏云阶同志(后为抗联第六军军长),在接到李升同志送去的省委指示信以后,即来哈尔滨汇报工作。当我向省委报告以后,省委指示由我负责为夏云阶同志安排住处,同时商定他和省委接头的时间、地点。

由老李同志指引,我在南岗秋林洋行门前,会见了夏云阶同志。

夏云阶同志身体很魁梧,大高个儿,长瓜脸,二目有神。他身穿一件蓝布大衫,脚下是青布便鞋,头戴细纹草帽,左边衣襟上别着一个蓝红色的小牌,牌上画个小帆船,这是“家理教”的证章,戴上它,可以更好地隐蔽自己的本来面目。

我们会面以后,简单地谈了几句。我知道他已经在老李同志那里住下了,便问他那里安全不?他表示一切都没问题,都很好。最后,我们约定了和省委会面的时间、地点,便分手了。

夏云阶同志向省委汇报完工作以后,省委特派他为省委代表,返回汤原,领导全县的抗日工作。

这时,省委领导下的地方抗日活动有了很大的发展,省委为了加强领导,建立军队,便派冯仲云同志去珠河一带巡视工作。省委秘书长的职务,由李世超同志代替。



原来这时李世超同志已经从道外小店里搬出来，自立门户。关于这件事情，曾使李世超同志苦恼过一个时期，这是在“八一”飞行集会以后发生的事儿，情况是这样的：

有一天，李世超同志忽然来找我，从兜里掏出来一封信给我看。我一看，是他爱人石正芳从北京西城报子街娘家寄来的。我记得当我才来哈尔滨第一次和世超同志在松花江边上见面的时候，他曾经表示不给石正芳去信，现在她有信来，莫非说世超同志已经给她写过信？想到这里，我就笑问李世超同志道：

“你多咱给她去的信？”

“我一直没给她去信。”李世超同志仍象从前那样摇着头说。

“你没给她去信？”我感到奇怪地问，“那她怎么知道你来哈尔滨？”

“可能是从我妹妹那里打听到的。”

“你妹妹知道你在哈尔滨住小店吗？”

“不知道。”

“那么你是怎么接到这封信的呢？”

“你真粗心。”李世超同志指着信封说，“你看看那上边吧。”

我低头一看，那上边写着“沃伯英讯交”。我笑了笑说：“原来是拐这么个弯。”我知道这位沃伯英是李世超同志从前的结拜兄弟，在邮政局工作，同情革命，喜欢写些文艺作品，常在报纸上发表东西，写得还不错，在哈尔滨颇有点名气。李世超同志和他有联系，要争取他为革命工作。

这时，我抽出信来看。信写得很长，主要是说她母亲已经故去了，她如何寂寞，如何惦念李世超同志。她想马上就领着孩子到哈尔滨来，让李世超同志赶快回信，把住址告诉她。最后，她

说母亲故去后，留给她一部分遗产，已经折合成银洋一万元，还有些黄金、皮衣等，她将都随身带来。

看完信后，我沉思起来。这真是一件值得深思的事情啊！一个有钱的小姐就要拿着巨额的银元来了，来了以后将要在李世超同志的工作、生活中引起什么样的变化呢？另外，她对革命的态度会怎样呢？当然，我知道她从前是同情革命的，但现在呢？当她有了这笔遗产以后情况会不会发生变化呢？这些，都是值得人深思的。

李世超同志见我沉默不语，就着急地问道：“你想什么呢？发表意见哪。”

我苦笑了一下说：“我想你快要成个富翁了。”

“你快别开玩笑。”李世超同志涨红着脸，正了正近视眼镜说，“我要想当富翁，就不革命了。”

我见他这样着急，也后悔自己不应该说挖苦话，便也忙严肃地说道：“你自己的意见怎么办呢？你对大正是最了解的，你的头脑也是清醒的，应该作出正确的决定来。”

“决定是已经有了，只是不知道对不对？”

“你怎么决定的？”我忙问道。

“已经给她写了信，表明了我的态度。我告诉她：我现在已经不当教员了，我的住处不定，行踪不定。我生活得很艰苦。从前学生曾管我叫大傻瓜，现在没有人这样叫了。但是可能有人认为我比从前更傻了。因为我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为别人做事情上，有些‘聪明人’就管这叫傻瓜。而我的实际岁数也和我相貌出现了很大的距离，看起来老了很多。我的连鬓胡子长起来了，眼睛也比从前更近视了，后背也可能更弯了些……”

“我告诉她：这就是我的全部现实情况。这样的情况和你现在的实际生活比起来该有多么大的距离！这距离使我们必须考

虑一个最苦恼人的问题：我们今后能否共同生活下去？得怎样生活下去？答案只有一个：就是两个人当中一定要有一个放弃他现在的生活方式，牺牲他的生活理想，服从另外一个人。而我自己呢，是至死也不会放弃我的理想的，我把它看得比我的生命还宝贵。我的生命可以被外力夺去，但是我的理想，我的信仰，却是任何外力也不能摇动分毫的！我的工作，我的生活方式，我的一切，都必须服从于我的理想！那么，我这是要求你为我们的共同生活放弃一切吗？不，决不是这样的。我们已经共同生活几年了，你应该了解我，我不会这样自私的。那么我们怎么办？

“最后我写道：现实确实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大了，我们应该承认：我们走不一道去，我们必须就此分手了！当然，这是很痛苦的，但又有什么办法呢？痛苦对我来说，我相信是暂时的，工作会使我很快愉快起来；而对你我觉得也不会是长久的，你还很年轻，你会在未来的生活中找到你自己的道路，不管这道路好与坏。

“在信的结尾中我写道：如果在法律上你需要什么手续，请告诉我，我完全照办。”

听完他的话后，我又沉默了。毫无疑问，李世超同志这样彻底地处理这个问题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在他的私生活中，这又确是很使人为之难过的事情。我知道他们夫妻间的爱情是很深厚的，何况又生了两个孩子。可是私生活终归是私生活，它再不如意，也只是一两个人的事情，把它和我们的理想——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一比，则显得多么微不足道啊！想到这里，我就点了点头说道：

“我不反对你的做法，现实使我无法反对。但是我希望你等一等她的回信，看看她的态度怎么样？你的信发走几天了？”

“两天。”

“你现在是否还很痛苦呢？”我又问了他一句，我很想帮助他解除一些苦恼。

“工作起来也就好些了。但是……”他停了一下说，“但是，这事很扰乱我！你知道，我还是爱她的，甚至是想念她的，尤其是那两个孩子：大雄和二雄，我闭上眼睛就会看见他们。这种感情我想你会体会得很深的。你不但有妻子、孩子，还有一个最慈爱的母亲。你现在和他们离得这么远，不但不能见面，连通信都是困难的。但是你现在工作得很愉快。这就是说工作可以压倒任何苦恼。正象我给她的信上说的那样：这苦恼是暂时的。我会象你一样，压倒它！”

我点了点头说：“我相信这一点。”由于他自己已经把这个问题看得很透彻，我也就没有更多的话可说了。我只是又向他提议道：“我看你去和省委谈一下吧。”

他摇摇头说：“如果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就没有必要去找领导了。我现在就希望多做些工作，越多越好。”

这次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过了十多天，李世超同志又来到我的住处。他走得喘吁吁的，头上流着汗，进屋第一句话就说：

“老李，你看怎么办？大正已经领着大雄、二雄来了！”

我一听忙问道：“在哪里？”

“在沃伯英家里，他给我送的信。”

“你还没见到她吗？”

“没有。我先不能见她，我必须先决定得怎么办？”

我想了一下说：“你最好还是先见见她，看看她的态度……”

还没等我说完，李世超同志就急着说道：“她的态度我已经非常清楚了，她让沃伯英告诉我：她接到我那封信后，非常着急，也非常难过。她说我不了解她，不了解她对她的真情，她为我什

么都可以牺牲，过去是如此，今后还是如此。她从北京连夜到了天津，坐轮船到大连，从大连到了哈尔滨。她把什么东西都带来了，孩子也来了。你看这态度还不明确吗？”

我听完后点点头说：“这倒真难得，看起来她还是可能和你同甘共苦的。”稍停了一下我又说道：“现在我觉得你必须去找省委请示一下了。”

“好吧。”李世超同志看看表说，“我现在就去和省委接头，省委怎么指示我就怎么做。”

李世超同志说完就走了。

他去请示了省委，省委的意见是：从石正芳的坚决态度上看，她对革命还是同情的。李世超同志可以和她生活在一起，在共同生活中要多帮助她。对李世超同志的工作，省委也作了指示：认为码头工人的工作已经开展起来，以后互济会的工作面要扩大，因此李世超同志应该从店里搬出来，把家庭组织起来，这样更便于掩护。

几天以后，李世超同志在偏脸子七道街找妥了房子，和石正芳领着大雄、二雄搬进去了。接着又把世超同志已故爱人留下的一个九岁女儿——小英子，从吉林他妹妹那里接来，一家人都住在一起了。

现在，因为李世超同志工作调动，要重新建立联络关系，所以住处也要变动。他们一家人又搬到马家沟洁静街去住。

## 关 怀

自从我负责交通局工作以后，发行工作都交给大秦同志。她白天在外边跑，晚上又搞印刷，有时工作到深夜，稍睡一会儿，便又出去跑。原就不甚健康的身体，越来越感虚弱。但她素性刚强，每当我问到她的时候，她总是挺起胸脯说：“怕什么，年轻的，劲还有的是呢，再添点工作，我也能干过来。”她虽然这样说，我心里却总替她担心。

有一天，我先回到家里，买了一些黄瓜，正用水洗着，准备做晚饭，大秦同志忽然喘吁吁地走进来，手里拿着几本书，前额的短发下闪动着汗珠，学生装的后背已经被汗水潮湿了。我见她这样子，忙问她怎么了？

她摇摇头说：“没什么。”见我正洗黄瓜，急拿起一根来要吃。

我忙拦挡她说：“别吃，坐那先歇一歇。”

“不要紧，太渴了。”

我说：“大热的天，走那么急于啥？”

她紧蹙双眉，狠劲地咬了一口黄瓜说：“不光走的急，还生气呢！”

“生谁的气？”

“坏家伙！”

“什么样的坏家伙？在哪里遇见的？”我急忙问道。

“我到西区老赵家里去送宣传品……”

“这我看出来了。”我指着她放在身旁的书说。

老赵是我们党内的同志，公开职业是中学教数理化的教员。大秦常到他那里去送宣传品，每次去都打扮成个女学生的样子，手里拿几本物理、化学之类的书，有时还在中间夹上两本英语原文本子，老赵家里经常有这样年轻的女学生出入；有的是去补习功课；有的是去看老师；也有的是象大秦同志这样，为了达到更高的目的或是负着更重要的使命去的。

看样子大秦同志今天真是渴急了，她又紧吃了几口黄瓜说：“我从老赵家里出来，正往回走，忽然发觉背后有一个人跟着我，皮鞋脚踩在石头马路上不紧不慢地响着，我试着拐个弯，脚步声也随着拐弯，而且总是离我很近，象个尾巴一样甩不掉。是什么人呢？是‘狗’？‘狗’都是经过训练的，总是秘密地、阴险地跟着你，不会这样愚蠢地踩着我的脚印走。那么到底是什么人呢？我想看个究竟，便装作鞋带开了，蹲下身去系鞋带。可倒好，一双男人皮鞋脚竟紧贴着我的衣裙停下了。象绞锥一样尖尖的皮鞋头，迎着太阳直放光，我顺着笔直的裤线往上一看，是一个油头粉面的家伙，正咧着嘴嘻皮笑脸地看着我呢。

“这一来我全明白了：这是个流氓、无赖！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猛站起身来就走。哪知这个流氓象苍蝇一样讨厌，还紧跟着我，我快走，他比我走得还快，越来越近，最后，竟说上话了：

‘这位女士，请你慢点走。’

“真是个无耻之徒，我的气不打一处来，简直想回身给他两个嘴巴。可是我忍住了，和他纠缠下去有什么意义呢？我急于摆脱他，就坐上一辆洋车跑起来，不料他也上了洋车，跟着跑。

怎么办呢？这时洋车正好跑到一个十字路口，路口上站着 一个交通警，我便忙让车停下，下了车回身一看，这个无赖竟也将车停下了，还没等他下车，我就直瞪着他说：

‘好吧，你等着。’

“说完我就向交通警一直走去。谢天谢地，这一招总算好使，等我走到交通警前边的时候，这小子已经坐着洋车跑出好远了。

“我去找交通警，本来是不得已的办法，这时既然已经没事了，再没有必要和交通警多说什么，便装着问路，随便应付了一下，回头又开付了洋车钱，就走回来了。我怕那个无赖不死心，绕道再跟回来，就走得急了些。”

大秦同志说到这里，一根黄瓜已经吃完了。

我点点头说：“你做得对，这种地痞流氓，在政治上也必然是反动的，避免和他纠缠是对的。”这时，大秦又要去拿第二根黄瓜，我拦住她，让她喝点热水，免得生病。她听了我的话，去喝热水，可是已经晚了，疾病已经悄悄地侵入她那软弱的身体。

就在这天夜里，开始她说肚子疼，上了两次厕所，后来愈疼愈厉害，头上直滚汗珠，两颊也涨红起来，我一摸她的脑袋，哎呀！热得烫人，少说也有三十九度，发这样高烧，肚子又疼，决不是一般的感冒，必须赶快上医院！

离我们住处近一点的大医院，就是地段街头上的“红十字医院”。我叫了一辆洋车，把大秦同志拉到那里，挂了急诊，经医生一检查，确定是急性阑尾炎，必须马上住院开刀！

按这个“红十字医院”的规定，住院必须先交二十元的住院费，交不上钱，无论病得怎样重，哪怕是病人马上就要死，也不收你。旧社会里好多医院都挂着“妙手回春”的匾，但这“妙手”是伸向有钱人的。

二十元钱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本来从做交通局工作以



后,我手中常常是存些经费的。但这时正有些交通员要走,我已经把钱都给他们作旅费了。我个人经常是囊中空空的,现在却一下子要拿出二十元来,真是急死人的事!怎么办呢?去找组织?这时夜已深了,不在约定时间之内,我上哪里去找呢?找不到,拖长了时间,大秦同志的盲肠岂不要化脓!急切间,我又想到了交通员,他们有的还没有出发,手里都有旅费,是可以拿到钱的。于是我就用最快的速度,赶到了道外。事情总算顺利,我从交通员那里拿到了二十元钱!

回到病院,大秦同志一个人躺在冷板凳上,疼痛得汗水已经湿透了衣衫,医院里的人从她身旁冷冷地走过,连正眼也不看。这些人的心肠真比石头还硬。

医治急性阑尾炎,是刻不容缓的事,我立即交清了住院费。同时要求他们连夜动手术。根据病势的危急情况,他们同意了。

这一夜,我守在医院里,期待着,盼望着,真是度日如年哪!

东方快发白的时候,她从手术室里被推了出来。经过一整夜肉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紧张,她这时已经非常疲倦了。但看见我以后,嘴角边却挂上了微笑,微笑中虽然还夹着一丝痛苦,但这说明大秦同志已经从死亡的边缘上跨过来了!

医生不让我和大秦同志说话,同时告诉我说:“病人手术经过良好,只是身体太软弱,需要多住些日子院。”

我问:“得住多少天呢?”

医生很干脆地说:“两个星期。再短了对病人的身体健康是不利的。”

医生的话被大秦同志听见了,她乘医生不注意的时候,吃力地说:“不,不能住那么久,过两天能走动我就出去,一定出去!工作不能撂下……”

“你别着急。”我悄悄地对她说:“等我和‘家里’商量一下再

说。”

第二天,当我正要按着约定的时间、地点去找省委接头的时候,李世超同志却到我的住处来了。这真使我喜出望外,我忙向他汇报了大秦同志得病的情况,他听完后立即拿出二十元钱来,要我送还给交通员。同时对我说:

“要想尽一切办法把秦淑云同志的病治好,不要怕花钱。”

这时,我又把医生让住两星期院和大秦同志自己的要求向他汇报了。他说:

“你要说服秦淑云同志,让她听医生的话,住两个星期院。”

“恐怕她不听,她这人很刚强。”我为难地说,“她一直惦记着工作,开完刀还咬着牙说工作不能撂下。何况她又知道组织上的经费很困难……”

“再困难也要给同志治病。你告诉她,这是省委的意见,让她一定安心养病,病不好不能出院。至于她的工作……”李世超同志蹙起双眉,思索着说,“这倒真是个问题。”

“印刷工作我一个人能干过来,发行工作我也可以挤时间跑一点,但是……”

“你一个人是无论如何也干不过来的。”世超同志挥了挥手,稍停了一会,忽然问我,“上次我听大秦同志说她的妹妹小秦失学了,不知现在情况怎么样?”

“听说很苦闷。大秦从女师跑出来以后,敌人向女师训育主任李寡妇要人,李寡妇就把小秦从女中要去,逼着小秦说出她姐姐的去向,小秦秉性刚烈,不但不说,还骂了李寡妇。李寡妇一怒之下,把小秦关了好几天,后来在舆论压力下,放了小秦。小秦书也念不成了,也跑到她姑妈老谢家去了。前些时候给大秦同志来信,想要来,大秦怕给组织增加负担,始终犹疑不决……”

“这有什么可犹疑的呢!小秦来可以工作嘛!她跟我念过

书,我很了解她。”李世超同志说,“这件事由我来办,我想法让她快来,她来后大秦也多一个亲人照护。”

我随着世超同志的话频频点头。

关于小秦,我虽然没和她在一块工作过,却知道她是一个坚强的姑娘,在她那年轻的短短经历中,却经受过风暴的锻炼,她象只勇敢的海燕一样,冲过来了。

我在前边已经写过,大秦姐妹幼年丧母,“九一八”事变前父亲也死去了。家里只剩下伯父的儿子秦雨田一个男人,于是他就成了一家之主。这个秦雨田是个典型的纨绔子弟,依靠剥削来的一点家业,吃喝嫖赌,无所不好。“九一八”事变以后,伊通县就闹起土匪来,大股小帮,遍地都是,抢劫绑票,弄得人心不安。秦雨田见势不好,就想把家从伊通县搬到长春去。但城外到处是土匪,走不出去。偏巧这时有一个报字海龙的土匪头子,抢劫了一大批钱财,散帮插枪不干了,正在伊通县里游逛。秦雨田摸到了根底,曲意结交,想要靠着海龙的关系走出伊通县去。谁知海龙却一眼看中了小秦,要娶作儿媳,除答应保送秦雨田一家到长春之外,还给秦雨田很多钱。秦雨田本是个见利忘义的人,小秦又不是他的亲妹妹,自然满口答应。旧社会里包办婚姻本受法律保护,在老秦家这样的封建家庭里更是祖辈传流的制度。小秦知道后,哭啊、喊哪、闹啊都没有用,渐渐地心里就拿定了主意。于是就跟着秦雨田,在海龙和他儿子的保护监视之下到了长春。这时,海龙哄小秦说:从今后金盆洗手,远走高飞,到黑龙江省去安家落户,给儿子完婚。将来让小秦当家,要想念书,就再上学,只要跟小海龙好好过日子,一切都随小秦意。同时把一提包钱交给小秦,让她保管。小秦都一一答应了。临走那一天,小秦坚持不让秦雨田他们送行,自己和海龙父子到了头道沟火车站,当列车快要进站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拥向了检票

口，小秦却把海龙父子引到一旁去，把提包向他们面前一放，斩钉截铁地说道：“这是你们抢来的钱，我一文没动，如数给你们。你们现在自己提着，立刻上火车，我送你们走。咱们从此各奔东西，谁也别害谁。如果你们赖着不走，我立刻喊警察来，把老底都抖出来。”说完她立目盯着大小海龙。两个土匪万没想到二十来岁的姑娘有这么厉害的一招，当时弄得他们父子面面相觑，哑口无言。外面汽笛长鸣，火车已经进站了。小秦厉声催促快走，老海龙把脚一跺，叹了一口气说：“想不到我海龙闯过多少大风大浪，今天在小河沟里翻船了，好，咱们后会有期！”

小秦眼看他们上了火车之后，自己不敢多留，忙到同乡傅景顺家借了路费，坐上往吉林去的火车，找姐姐大秦去了。从此，她就在吉林女中上学读书。大秦从吉林跑出来的时候，姐妹未能见面，她还一直担心小秦的安全呢。

对于小秦这段经历，世超同志也听大秦讲过。所以他立即决定吸收小秦参加工作，并向我要了小秦的通讯地址。

我以为和世超同志的谈话已经完了，便急着要去道外给交通员送那二十元钱。但世超同志却拦住我说：

“我来想通知你另外一件事情，你认识一个叫朱协的共青团员吧？”

“认识。”我点点头说，“我从吉林才来的时候曾和他在一起住过。后来我搬了家，就看不见他了。只听说他表现得很不好。”

“岂止是不好！”世超同志双眉紧皱说，“这个败类，完全堕落投敌了！”

“是这样！”我一惊说，“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表现得很激进，对敌人好象非常痛恨，如果给他一支枪，似乎立刻就能向敌人开火一样。”

“完全是一时的狂热，现在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投机分子。敌人多少在他身上下点工夫，他就向右转了。他有一个亲戚是日本关东军的高级特务——这个社会关系他一直向组织隐瞒着。这个特务探知他和党有联系，便想方设法收买他，先给他钱，供他吃穿和读书，后来又给他在中东铁路图书馆弄了个挂名的馆员，每月光拿钱不干事，而且钱拿的比一般辛苦工作的馆员还多。团组织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就和他割断了联系。他也就彻底投敌了。现在经初步了解，工大党组织的破坏，孙保忠等同志的被捕，可能就是 he 出卖的。”

“原来他是这样一个坏家伙！”我愤慨地说，“当初怎么就没看透他！”

“这件事对我们又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我们要记在心里。”世超同志沉思了一下说，“现在的问题是他不但认识你，而且很熟悉……”

我见世超同志把话头转到我身上来，心里忽然一急，怕再出现刘、杨叛变后的情况，让我躲在屋子里，不出去，那可怎么办？我很怕世超同志再说下去，如果说出来，事情就不好转弯了。我忙一挥手拦住他的话头说：

“不要紧，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我没当他说更多的情况……”

“他知道你是党员吧？”

“他……知道是知道。可是除此以外我没当他说任何情况，他对我的了解也并不多。以后我出去的时候可以多加小心，万一遇上他，总会有办法对付的……”

“有什么办法？”

“这……”我挠挠脑袋说，“这得看当时情况，现在哪能规定呢？”

世超同志见我急得抓耳挠腮，也忍不住笑了。停了一下他又严肃地说道：“关于你的工作问题，领导上也考虑过了。现在你担负的工作比从前重了，大秦这会儿又病了，你当然不能关在屋子里不出去。不过你一定要提高警惕，特别是在南岗、道里一带活动的时候要多留心。他现在还挂着学生牌子，医大附近尽可能要少去。”

“我知道。”我急忙高兴地点头答应，“一定多加小心。”

世超同志又叮咛了一番才走。临走前，又留下十元钱，让我带给大秦同志，我知道这又是他从石正芳那里拿来的钱，便笑着替大秦同志收下了。

原来石正芳在李世超同志的影响和帮助下，从同情革命，渐渐地为革命做起事情来。当省委经费最感困难的时候，她把自己存在道里中国银行的钱拿出三千元来，交给省委。除此之外，李世超同志还不断地从她那里拿钱，帮助困难的同志。次数多了，世超同志也觉得不太好意思，于是他就想了一个颇有生活趣味的办法。每逢需要钱的时候，他就帮她洗衣服，擦地板。他们的生活一直过得很俭朴，李世超同志为了在劳动中锻炼石正芳，不让她雇用人，一切家务劳动都由自己来做，因此，需要干的家务劳动是很多的。平常因为工作忙，李世超同志不大伸手。这时他帮助一干，她自然非常高兴。这高兴倒不是因为他分担了她的家务劳动，而是因为在她的内心深处，唤起了一种夫妻间互相疼爱的甜蜜感情。李世超同志就趁这个时机，轻轻地一提，有时甚至是暗示一下，目的就达到了。天长日久，次数多了，她也摸到了这个规律，一遇到他主动找活做的时候，就笑着问他需要多少？他也就把手指头一伸，表示了数目，有时还笑着添上一句：“你这也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对革命的一点贡献。”

世超对同志的真诚我们是深知的，因此，当我再去医院把这

十元钱交给大秦的时候,她也只好感动地默默收下了。

我悄悄地告诉大秦,小秦要来了,她听见很高兴。关于要她住两个星期院的问题,开始她还执拗地要求快些出去。但当我严肃地说明这是组织决定的时候,她就无话可说了。

不几天,小秦同志就来了。原来是世超同志给她拍去了电报。她一来就迫不及待地要求工作,世超同志和她谈了话,便把一部分发行工作交给她。大秦同志见到妹妹,心里十分高兴,急着要出院,但世超同志仍然坚持让她住满医生规定的日期,同时让小秦晚间也住在医院里,看护和陪伴她。

这时天不断下雨,松花江水暴涨。有消息说今年还要发大水,不亚于一九三一年的水势。

一九三一年的大水曾给哈尔滨居民带来极大的灾难:无数座房屋被冲倒,人被淹死,连道外最繁华的“正阳街”都灌满了水,整排的楼房被泡在水里,人们被赶到楼顶上去,街道上唯一可以利用的交通工具就是小船。久住在哈尔滨的人们,一提起一九三一年的大水,都会蹙起双眉,唤起痛苦的回忆。

我们住的地方,地势较低,一九三一年发大水的时候,这里曾变成一片汪洋,白俄房东曾深受其害。因此当她听到还要发大水的消息以后,便忙作准备:找木匠做了一个大梯子,架到房檐头上,以便水来时好登梯上房;又把所有的金银细软之物,捆成了大小无数的包裹,便于携带。

几天过去以后,江水越涨越高,大有顷刻浸过残破的江堤,吞没市区的可能。沿江一带居民,人心惶惶,终日不安。

这时组织上考虑到我们的住处问题,如果大水一来,那里将首当其冲。如果一旦被水淹,和外边的联系就困难了,交通和发行工作都要受到很大影响。所以组织上就决定我们搬家,将机关迁移到南边较高的地带去。开始时我还有些舍不得离开那住

惯了的环境，但党决定我们离开，工作也要求我们离开，就不能再犹疑了。

就在大秦同志病愈出院的第二天，我们将机关迁移到西马家沟通道街去了。

这也是一个白俄的房子，房东入了英国籍，很有钱，住在前边的一所小楼里，楼南端，竖一小旗杆，悬挂着英国国旗。我们住了两间四不靠的砖房：一间厨房，一间卧室，环境很清静。同院还住着一个白俄警察，是房东的亲属。

这时，大秦同志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复原，原本不够健康的身体经过这场疾病的折磨更显得软弱了，于是组织就正式决定发行工作由她们姐妹二人分担。我们三人从此就同住在一个机关里。

四

①



## 狭路相逢

我们搬到马家沟以后，我的掩护职业仍然是家庭教师。家庭教师是知识分子的工作，那时候的知识分子，哪怕是小而穷的，也要准备一套体面的衣服，逢有大事小情穿在身上，免得被人瞧不起。有的赚低薪的小职员，常为一套西服，勒紧裤腰带，宁肯三根肠子闲上两根半，也要置一套西装，那情形真象果戈里在《外套》中所描写的小职员一样。《外套》所以成为名著，就是因为它把那残酷的社会本质暴露出来了。但是就在那时，革命的青年也不肯随波逐流，他们反抗这种旧的习惯势力，鄙视这种衣服的奴隶。我在从前，也是以这种感情对待旧社会的。参加党以后，这种感情表现得尤为强烈。再加上生活的艰苦，工作的忙碌，就更顾不上考虑这类问题了。但是自从做交通局工作以后，接触的交通员多了，有时他们也要化装成不同身分的人和我接头，我在这上还帮他们出过主意。而我自己却总是一身蓝布大褂，没什么变化，这显然对工作是不利的。

事有凑巧，正在这时，从上海来了一位广东的老胡同志，省委指示由我负责通过交通员把他送到游击队去。老胡同志穿了一套很好的西装，穿西装去游击队当然是不行的，不用说它不适应于游击环境，就是走在路上也通不过。那时小的外县城里还

很少有穿西服的，至于乡下，那更是象凤毛麟角一样的罕见。在这种环境下，如果穿套西装，系着领带，出现在衣服褴褛的农民中间，那真会象西洋镜一样被人们围看了。因此，老胡同志必须进行彻底改装，结果便把西装留给我。当我把这件事情汇报给李世超同志以后，他不但赞成，还给我配上了一件风衣。这套欧化的洋服，开始穿在身上时，总感到有些别扭，觉得不如穿中国衣服舒服。但是自从有一次我借助于它闯过了一个危难的关头以后，这种感觉就消失了。

有一天，正是初秋的季节，哈尔滨街头的树叶，已经不那么浓绿了；太阳一落下去，就吹起阵阵的凉风，一直吹到第二天太阳又出来，凉风里才透出暖意。

我在这一天里，要送几个交通员上路。有一位交通员，扮成一个身分较高的商人，住在道里一家旅馆里，我为了和他身分相称，便穿上了这套西装、风衣，揣起为他们准备好的二百多元旅费，往道里走去。

道里中央大街，是哈尔滨当时最热闹的道路之一，不太宽阔的人行道上，人流不断，磨得光滑的石头马路上，汽车有时也连成串。在行人中，除了中国人之外，还夹杂着好多外国人，白俄、日本人占大多数，有时还有其他国家、其他种族的人。人们走到这五花八门的街道上，精神总要比平时紧张些。

我从马家沟走到这里，太阳已经晒在头上。红日当头一照，路走得又急，就出了一身汗。我把风衣脱下来搭在胳膊上，边走边擦汗。正在这时，忽觉有一个人从斜侧里奔我走来，我歪头一看，这个人已经走到我的身旁了。他戴顶伪满大学生的四角帽子，个子不高，两只贼亮的眼睛正直盯着地看着我。我心里猛然一阵跳动，这真应了旧小说上的一句话：“冤家路窄，狭路相逢”。我当真遇上叛徒朱协了！他和我面对面地站在这熙来攘往

的人流中，阵势已经摆开，不容我后退一步，也不容我多作思索。我必须迎上去，而且要稳住心神，冷静地迎上去。我见他对我龇牙一乐，便也微笑着向他点个头。

“老李，好久不见了！”他一把拉住我的手说。他拉得很紧，不知是怕我跑掉了，还是故意地表示亲热。

“是呀。”我也拉住他的另一只手说，“好久我就想去看你，总倒不出空来。怎么样？生活过得不错吧？你比以前胖了！”

我怎么有心思去比较他的胖瘦呢，这是想尽量多说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好容出空来想出我的紧急对策。

他听我说他胖了，便得意地笑了笑说：“当然会胖些了，日子总是越过越甜哪！”说着，他又从上到下打量着我说，“你也和以前大不相同了，大有青年绅士之风，漂亮起来了！”

他这句话，猛使我灵机一动。是呀，他已经感到我和从前大不相同了，我何不在这上和他作文章呢！想到这里，我便也装得志满意得的样子笑了笑说：

“你方才说日子越过越甜，我也感到越过越有趣呢！”

说完我们两个人都笑起来，他的笑是硬挤出来的，从他那笑脸后边，我看见一副狰狞的面孔。

笑声刚住，他忽然一拉我说：“走吧，咱们找个地方谈谈。”

找个地方谈谈？找什么地方呢？管他呢，既然无法脱身，就不能畏缩不前。于是我也爽快地说：“对，找个地方谈谈吧。这么久不见了，真得好好谈谈。”

“上‘欢迎饭店’吧。”他指着前边说，“喝点啤酒。”

“对，喝啤酒去，今天我作东。”

“不，我请客。”

我和他一边客气着（真是虚伪地、各怀心腹事地客气着），一边往“欢迎饭店”走去。

“欢迎饭店”是一个开设在地下室里的白俄西餐馆。当时哈尔滨有好多这样的西餐馆，饭菜便宜，座位也比较清静，谈起话来比较方便。

走进饭店我和他拣了一个靠墙角的座位坐下，要了个“二盘”，两瓶啤酒。他把啤酒斟得满满的，一口气喝下去以后，对着我喷了一口酒气，眨了眨眼睛，然后把脖子探到我这边来，压低了声音，鬼祟地说道：

“怎么样？你和他们还常见面吧？”

我知道这“他们”指的是谁。我觉得这时不能装糊涂，必须表示我对这问题感兴趣，甚至是我也想谈这问题。否则就会显露出虚假来。于是我很坦然地摇了摇头说：

“不，很早就……”我把手往前一伸，往下一砍说，“一刀两断了。”

我的手几乎砍到他那伸长的脖子上——我是多么想砍上去啊！

他忙把脖子往后一缩，又眨了眨眼睛说：“那么他们不去找你吗？”

“开始时候去过，我干脆躲起来不见，他们就再也不去了。”

“你为啥和他们断了呢？”

我笑了笑说：“我再和他们闹下去就得饿死，我家里上有老下有小，总得想个谋生之道啊！”

“那么你现在做什么呢？”他又打量着我的衣服说。

“在我表哥开的‘大同运转公司’里做点事，顺便往下江捣腾点买卖。”

我表哥开大同转运公司，这是实有其事。我记得当我和他同住在一起的时候，曾经向他提过，因此就脱口说出来了。实际我和表哥已经如同路人，我根本不到他那里去。

他点了点头说：“那好哇，捣腾什么买卖呢？”

“没准，什么有利就捣腾什么。”说到这里，我忽然想起最近为了给交通员“装置”往下江去的东西，曾经了解过一些东西的行情，现在正用得上。于是我也把头往前探了探，装成机密的样子说，“最近我往下江走了一批上海益和出品的毯子，五磅半重的，得了一倍多利钱。过几天我还想再走一批呢。”

他忽然眉开眼笑地咂了一下嘴说：“哎呀，那么大利钱！想不到你还真有办法呢！”

我和他说了那么多的话，只有这一句话表现出了他那真实的感情，资产阶级见利忘义的本质一下子就显露出来了。这正是他的弱点，抓住这个弱点，就能化被动为主动，就能把他变成个蜡人，放在我手指头上随便捏弄。于是我就装出不足为奇的样子，轻轻地一笑说：

“这是常有的事，主要是应该多活动，心眼放灵活一些，多动脑子。”说到这里，我又往前凑了凑说：“怎么样？你有没有兴趣入个股，保险不到一年就看三倍利。”

“我？”他把两手一摊，两肩一端，摹仿着当地白俄的无可奈何的表情说，“钱到手就光了，哪有余钱做买卖呀！”稍停了一下，他又说道，“不过你要真想找财东，我倒可以给你介绍一个。”

“谁？”我故作期待的样子看着他。

他又看了我一眼，然后郑重其事地说：“我有一个亲戚在关东军做事，他在各方面都有力量，你要是需要财东，我可以把他介绍给你。”

这家伙把后台老板端出来了，我们只知道这是一个关东军的高级特务，可是不知道叫什么名字。趁这个机会我就进一步问地，“他叫什么名字？”

他神秘地、狡猾地笑了笑说：“等见到的时候我再给你介绍

吧。”

我见他不肯说，也把话收住道：“好吧，将来我一定见见他，同时请你们到我家里串门。”

“你家来了吗？”

“怎么能不来呢，赚钱就是为了一家团圆过好日子呀。”

“在哪里住？”

“暂时在‘劝业商场’三楼住，过几天找到好房子再搬家。”

“那好极了！今天午后我还有约会，不能去看望伯母和大嫂了，这样吧……”他从兜里掏出一迭纸币伸向我面前说，“把这点钱你带回去给老人孩子买点东西吧。”

一时之间我真猜不透这家伙给我钱是什么意思？是要收买我？笼络我？抑或是被我麻痹住了，真以为我有钱了，要以小引大？不管怎样，我总要让他相信我是比他有钱的，只有这样，才能完全制服住象他这样被资产阶级铜臭染污了灵魂的人。

我轻轻地把手往回一推说：“你的盛情，我完全心领了。不过我现在不是钱不够花，而是花不了，你看……”我顺手从兜里掏出准备给交通员的二百多元钱也往他眼前一举说，“我哪天都有进款，兜里总是鼓的。”

他直盯盯地看着这二十多张十元的票子。不知是垂涎？还是要查看里边有没有夹带藏掖？反正他的眼睛是直了。

我接着把钱抖了抖，钱一张一张的舒展开了，我说：“钱是不成问题的，你要用的时候只管张口。”我知道他不会才见面就开口向我借钱，何况他方才又要给我钱呢，就放大胆说起来。

他的眼睛从钱上挪开了，向我表示亲近地，甚至是故作甜蜜地笑了笑说：“好吧，今后我们一定要把友谊巩固下去。”说完，他把他那一迭钱揣起来了。

“对，我们一定要经常来往。”我也把钱揣起来了。

“不过……”他的脸色忧郁起来，声音也低下去，“我在个月二十天以后可能就要离开哈尔滨了。”

我忙问道：“上哪里去？”

“我已从医专毕业，以后可能要到穆棱县去当公医。”

“这么快就确定了吗？”

“学校当局当然不会确定这么快。”他稍停了一下说，“是我的亲戚要我去的。”

他这样一说我全都明白了！什么当公医，这不过和他现在所挂名的图书馆员一样，光拿钱不干事。他所要真正干的事是不言而喻的。穆棱也是我们的游击区，敌人要在那里织补特务网，他去不过是充当一根网绳而已！他能向我透露这个情况，说明他在我的面前已经完全解除了武装，他那警犬的神经已经完全麻痹了！他所透露的情况对我们是有用的，今后，在穆棱一带活动的同志，将知道在“公医”中有一个关东军的特务腿子。

我望着他那忧郁的面孔，故意安慰他说：“穆棱那个地方是有些偏僻，不过住惯了也就没有什么了。将来我捣腾买卖还可能去呢，去的时候一定多给你带些哈尔滨的好东西。”

他看着酒杯苦笑说：“但愿我能住得习惯。来！”他举起酒杯说，“我们干了吧。”

酒喝光了，菜也吃完了。他抢着付钱，我也装着拉他，实际上我怎能给钱呢，我的钱是人民的，是要花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当然，他的钱也是人民的，不过那上面沾满了血迹罢了。

当我和他要离开饭馆的时候，他拉住我的手，表示异常亲近地和我说：“老李，咱们过去所说所为都是因为年轻不懂事，瞎胡闹。现在的局势你大概也看清了，日本人在东北已经扎下了根，聪明人不能拿鸡蛋往石头上碰。你走的路是对的，不过有些消极了……这样吧，”他稍想了一下说，“明天晚上七点钟，你到道

外五道街，××阁大烟馆去找我，这是我那个亲戚开的。我在那里等你，我把你介绍给我那个亲戚。”

我明白他所说的“不过有些消极了”是什么意思，他是要我和他一样也彻底背叛祖国，成为敌人的积极走狗。多么无耻的叛徒！总有一天，让你看看天下是谁的，是谁在东北人民当中扎下了根！

他的话，也使我暗暗地吃了一惊，道外五道街一带，我是常去的，有时送交通员上船，有时去找人，想不到那个大烟馆竟是特务的据点，以后要汇报给组织和同志们，多加小心。

为了麻痹他，我答应明天晚七点一定去，不见不散。

我和他走出了饭店的门，他看了看表说约会的时间已经到了，要先走一步。我看他的样子象很着急，就故意地拉住他要再玩一会儿。我越拉他越着急，在这一拉一拽当中，我真尝到了那种因为戏弄敌人成功而在内心里引起的快感。最后，他还是走了，我还故意表示恋恋不舍的样子，送他上了汽车。

第二天我把这全部情况向李世超同志作了汇报。李世超同志认为我得到的情况有用处，今后组织将注意他的去向。最后，李世超同志指示我以后一定要多加小心，五道街一带要尽可能少去，道里要利用早晚的时间去，去时要提高警惕，要使这条狗再也找不到我的踪迹。我记下了这些指示。

由于这条狗的出现，使我的行动又受了一定的限制，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一个多月以后，李世超同志告诉我：这条狗已经被敌人牵往穆棱去了。继刘明佛、杨勃之后，又一个扰乱我工作的叛徒的威胁被宣告解除了！



## 老 万 同 志

朱协的叛变和出现，的确使我的工作受到了一些影响。为了党的工作安全，为了避免使革命遭受损失，我必须执行李世超同志的指示。

但是，就在我和叛徒朱协相遇的那几天里，按预先的规定，磐石交通员老万该到了。而老万同志住的地方，又正是在道外七道街一家商人客栈里。七道街和五道街只有一街之隔，按李世超同志的指示，我应该尽可能地少到这一带去。

那时，我和交通员的联系，都是事先规定好的。所有交通员的来踪去迹，接头的时间、地点、方法以及住处，都在我脑子里有一本账。当我送一个交通员上路的时候，要把他下一次来时所应该规定的一切都规定好。有的交通员在哈尔滨是已经定居下来的，如李升同志那样，就好办一些；有的是没有一定住处的，麻烦就多些。对这样的交通员，首先要确定他下次来的住处，其次是日期。日期不能规定死了，在预计好哪一天能到以后，总要留上个可以伸缩的时间，如一号左右、五号左右……谁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样的波折和危难呢？那时如果能象今天这样，人没到先拍个电报来，写明坐哪次列车，几点几十分钟到站，到时候去车站一接，该有多好啊！今天，国家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是自由的，

我们可以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条件，来加快完成我们的事业。但在那时，却没有这样可能。我们的条件是艰苦的，工作方法因受条件所限甚至是不科学的。我们为完成一件工作，往往要昼夜思索，绞尽脑汁，结果想出来的办法还不一定是使人满意的。我们是在重重困难之中来和敌人进行斗争。我们比敌人优越的——而且优越得无法相提并论的，主要是表现在精神和思想上。我们就是靠着自己的坚强信仰，对共产主义的向往；靠着对敌人的憎恨，来克服一切困难，战胜敌人！

我和交通员之间不规定死日期，就给接头带来一个困难：譬如，我们谈好了五号左右，但是一左一右就是好几天，知道他哪一天来呢？而他们又多数是住在客栈里，这是人多眼杂，众目所视的地方，我不能去的次数过多。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我们曾想出了一些暗号。如在公共厕所或者人们喜欢乱画着玩的墙头上画个记号。这记号不能太特殊也不能太一般：太特殊了就容易引起他人的思索和注意；太一般了也容易和别人乱画的玩艺相偶合。我们有时就画个三角形，里面再添上两点。三角形是很一般的玩艺，谁都可能画，但里边加上两点就不一般了。这两点是套在极一般的外形之中，通常是不易引起人们注意的。有时我们也规定在哪一棵树上挂个小布条，布条的颜色也预先说好，挂在树叶深处，人们要是不特别注意，是看不到的。所有这些暗号都由交通员来做，他们几时到了，几时就把暗号做出来。我经常巡视暗号，看到某种暗号，就知道某人来了，于是就到指定的地点去会面。

交通员老万同志来的日期按规定是在二十号左右。我遇见朱协的准确日子现在记不清了，大约就在二十号的前两三天。这样，老万同志来的期间正是情况比较紧张的时候。为了减少到道外五道街一带去的次数，我在二十号以前没有去看暗号，是

在二十号以后的一天去的。在我当时看来这样做是对的，这既符合省委的指示，又对工作的安全有利。谁知就因为我晚去这两天，却给老万同志带来很大的苦恼，这使我感到极大的不安和内疚。

我去的那一天，为了躲避叛徒的眼睛，又重新改了装，穿上了蓝布大褂。

道外七道街那一带树木不多，暗号是画在一个墙角上，我到那里一眼就看到了。实际暗号画的并不明显，但当一个人察看你自己最熟记的东西的时候，往往是不费吹灰之力的。

老万同志住的是商人客栈，所谓商人客栈，并不是不留其他职业的客人住宿，只是因为这里经常住商人，天长日久了，其他职业的人也就不大去住了。而老万同志也正是化装成农村商人的模样，住在这里正是适得其所的。

老万同志有五十多岁，雇农出身，劳动了一生，体格很结实。“九一八”事变以后参加了党，开始做玻璃河套农民会长。那时，我因送一个同志到游击队里去，曾和他见过面，因此也是久已熟悉的同志了。从前他不大在外边走动，刚一做交通员工作的时候很不习惯，但他肯钻研，心又细，所以不久就熟悉了。

他做交通员以后，常跑哈尔滨，总穿农民服装对工作是不利的。我就帮他改换为农村商人的装束：白市布衬衣外边罩上一件蓝市布大衫，黑便鞋，白袜子，草帽；又为他买了一条线毯子和一个很大的水龙布手提箱。这样一身打扮，再住在商人客栈里，是不易被人识破的。

这家客栈的底细我们已经做过了解，是比较可靠的。因此我们没有另外约会接头地点。看见暗号以后，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左右，见没有什么形迹可疑的人，就进了客栈。

老万同志住在一个小单间里，我敲了敲门，隔了一会，里面

才有气无力地应了一声。这使我心里很纳闷：往次我敲门，老万都是痛快应声，人随声到，今天为什么这样呢？我犹疑了一下，便轻轻地推开门。迎面就是一张板铺，老万同志正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板铺上，睁大了两只眼睛，直盯盯地望着屋门呢。他见进来的是我，先是愣了片刻，紧接着便猛然从板铺上坐起来，两只手同时抓住我的右手，用力地摇晃着，半天才迸发出一句话来：

“你，你可来啦！”

从他那异样的神态中，从他那湿润的眼睛里，我断定是发生了什么不如意的事情。我细看他的脸，本来是圆面孔，红脸膛，这时脸变长了，气色也不正，好象在红脸膛上蒙上了一层灰纱，皱纹也显得深了，象用刀新刻了一样。看着这情景，我不由脱口说道：

“你病了吗？”

“没有。”他摇摇头，把一只手撤回去，按在自己胸口上，沉重地说：“我饿的。”

“你饿的？你……”我几乎惊叫起来，但是一种习惯的警惕性，使我马上把声音压低。我回手关严了还留有一道小缝的房门，紧靠着老万同志坐下，低声地说：“你说——声音低一些说。饿几天了？”

“两天多没吃东西了。”

“为什么呢？”

“没钱了。”老万同志眼泪在满是皱纹的眼边上转转着，“我来的时候钱带少了，以为能象往常一样，我人一到，暗号一画出去，你就能来……”

“你是哪天到的？”我迫不及待地问道。

“十八号。”

“赶前两天？”

“嗯。可往常慢说赶前两天，就是赶前个三、四天，只要暗号出去，你也能很快的来呀。这回我左盼也不来，右盼也不来，盼得我眼发直，心冒火。我兜里只剩下五毛多钱，捏着指头算计着吃了两天多。从昨天早晨喝了一碗稀饭以后，就一直挺到这会滴粒未进。有心出去卖天小工，一则我这身打扮不象个卖小工的样子；二则我不能离开这间屋子，除了出去吃饭之外，不能动地方，我不知哪时哪刻你会推开门进来，让你扑个空不就误了事。”老万叹了一口气又说，“挨饿我倒不怕，以往扛大活的时候常挨饿。可顶折磨我的是不知道你出了什么事情？党出了什么事情？这么大个哈尔滨，党在哪？你在哪？我都不知道。我除了党，除了你，再没有亲人，你们要不来，我怎么办呢？杨靖宇同志和县委让我汇报的情况我向谁说去？杨靖宇同志让我带来的报告向谁送去？我完不成任务，我……”

说到这里，他说不下去了，眼泪扑簌簌地洒落下来，他用两只手把脸捂住了。

他的话句句都结结实实地打在我的心上，使我心中一阵难过。他——一个老年人，千里迢迢来到哈尔滨，结果却找不到组织，挨着饿，担着惊。而当他见到同志以后，只是难过地流着泪，诉说自己的困难处境，却没有抱怨组织，埋怨同志。越是这样，越使我感到不安，甚至是愧对这位老年人。不错，我来晚是有理由的，甚至是有充分的理由。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是否设身处地的为交通员想了呢？我是否把他们各方面的处境、种种的心情都想到了呢？老万同志的情况说明我在这方面想的是不够的。这是否就是对同志不够关心的表现呢？我是代表党来和交通员发生关系的，如果我在这方面有了过失，这就不是我个人的问题了，这是使我感到最痛心的地方。

我轻轻地把老万的手从脸上拿下来，用力地握着，低低地说道：“老万同志，你不要难过了，你批评我吧，无论有什么理由，只要我安全的存在着，来晚了就是我的过错。我还没有把我的心和你的心完全放到一起，这是使我很难过的。”

“不。”老万同志擦了下眼睛，摇着头说，“你快别这样说，我知道你的为人，你对同志比对亲人还厚道。你不说我心里也明白，若是没有特别原因，你不会晚来的。我不怪你。我方才说多了，是因为见到了自己的同志，见了亲人，把心里话就都倒出来了。”

他这朴实无华的话语，越发使我感动。这老人的心，真比纯金还可贵！他对同志是那样宽厚，对党又是那样忠诚。我们先不说他在客栈里饿着肚子躺了两天的难受滋味，且想想他在这几天之中是担着多么大的风险哪！他在这里等着和我接头，一天过去了不来，两天、三天都过去了还不来，这自然会使他想到组织上出了什么事情，也自然会想到我是否被捕。如果真的——在他那种情况下会把这想成是真的——发生了这样不幸的事情，那么他在这里躺着就是非常危险的。敌人随时都有可能推开这扇小门，闯进屋里来（方才我进屋时，他躺在那里直直地盯着门，又愣了片刻才起来，可能就是这种心理的反映）。如果老万同志是个懦夫，是个贪生怕死之徒，早就从这里溜开了。从此，他也可能就离开了革命，离开了党。但他却一直饿着肚子守在这里，坚持在这里，如果不是对党的无限忠诚，怎能做到这一点！

老万同志的话，使我感触极多。我本想再和他谈些什么，但我猛想起他还饿着肚子没有吃饭，应该马上和他去吃饭，吃一顿可口的，老万同志最喜欢吃的饭。

临去吃饭之前，我把生活费交给他，并向他提出：因为某种原因，我们不能在道外这一带逗留。我请他多忍耐一会儿，和我

一同到桃花巷。我提议坐一辆洋车去，他拒绝了，坚持要和我走。我理解他的心，便同意了。同时我又嘱咐他：在路上我们两个不必说话，要他跟着我走。若是看见一个穿戴很漂亮，矮个儿，和我年纪相仿佛的人和我谈话的时候，不管我有没有表示，他都要马上避开。我告诉他，这是防备万一，不一定那么巧就遇上这个人。老万一一答应了，我们就一前一后走出了旅馆，避开了五道街，直奔太古街，顺利地转到桃花巷，找了一个合适的饭馆，坐下了。

吃饭的中间，我没有和他多谈什么，我只是望着他香甜地吃着。

从饭店出来，老万同志已经恢复了往日的乐观情绪，甚至是神采焕发，生气勃勃了。

我们没有再回客栈，我把他领到夹树街铁路局大石头房子后边去了。从和李升同志第一次在这里会面以后，我就看上了这个地方，做了交通局工作以后，便经常领交通员来这里谈话。

我和老万同志边走边谈，有时也坐一坐，我们一直谈了很久才分手。临分手前，他伸手到里边衣服兜里，掏了半天，掏出一个小纸包，看看左右无人，便悄悄地塞在我手里说：

“杨司令给省委的报告。”

我接过来奇怪地说：“你怎么没好好‘装置’一下，就在兜里放着？”

他苦笑了笑说：“怎么能不‘装置’呢，等你不来，怕出了什么事，被敌人得去，就特意拿出来带在身边，万一出了事，好把它消灭了。”

老万同志真是个好同志，从这件细小的事情里，也可以看出他的赤胆忠心。

## 五磅“氯酸钾”

当我今天回忆起那些忠心耿耿的交通员的时候，我是怀着深厚的敬意的。他们不仅要在困难而又危险的条件下完成传送文件、指示和汇报工作的任务，而且有时还有更复杂和艰巨的工作等着他们去完成。

有一次，活动在珠河一带的游击队需要十多捆电线，组织上要我给买好，交由珠河交通员张石匠设法带回去。我按照需要的规格，在永兴电料行买妥。十多捆电线，有一百多斤重。堆大、分量重，不但不好携带，而且又显眼，很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我当时为这件事很着急，与张石匠在一起商量，我的意见还是想法应付沿途军、警、特的盘查，坐火车走，到苇河下车，然后起旱路运往珠河。但他却有另外的想法，他觉得坐火车虽然省力气，但不保险，不如徒步走好。我便依照他的意见，买了两个大挑筐，一根大扁担，把一百多斤重的电线分装在两个挑筐里，上面又放了一些别的东西。就这样，他挑着这副沉重的担子，奔向珠河。

由哈尔滨到珠河，有四百多华里的路程，不用说挑着百余斤的重担，就是空手走也要付出很大的力气。任何一个人都能想象得出这负重的艰难行程。但在张石匠那朴实的心里是：挑着



走能完成任务，就挑着走。其他一切，都必须无条件的服从于这个最高目的。

张石匠同志，是个地地道道的石匠工人，从他长到能够抡锤那一天起，就和石头打交道。一直到四十多岁，参加了党，当了交通员，他的掩护职业仍然是石匠。他仍然穿着一般穷苦石匠所穿的粗布烂衫，光着脚，穿着家庭做的鞞鞋，背着个装满石匠工具的“钱搭子”<sup>(注)</sup>，风里来，雨里去，走乡村，跑城市，巧妙地隐蔽着自己，从没引起过敌人的怀疑。说起来他不但服装是地道的石匠工人服装，气质是石匠工人的气质，长的也是一副石匠工人形象：身躯高大，体格魁梧，大手大脚，粗眉长眼，晒得黝黑的脸上，微有几颗麻子。他说话声音宏亮，让你感到他浑身有用不完的力量，使不尽的劲头。就凭着这副强壮的体格和一颗党员的赤心，他完成了好多艰巨的任务。

当他送完电线，风尘仆仆地从珠河按期回到哈尔滨时，又带来一项购买“药品”的任务。为完成这项任务，游击队还派来一位懂“药物”的同志。

购买的“药品”主要是“氯酸钾”，这种东西在医疗上的用途并不是很广泛的，只知道它能治口臭。我们买它的目的，并不是要用于医疗上，而是要爆炸敌人的军事设施和军用列车，“氯酸钾”是制作烈性炸药的主要原料。

当我把这个情况向省委汇报以后，省委指示：由我负责买好“药品”，送他们出哈尔滨。既然是做炸药用，数量当然就不能是很少的，游击队要求最好能买到五磅。这时我们已经了解到：敌人对“氯酸钾”的买和卖，进行了控制，曾命令各药商，不许多量

---

(注) 钱搭子：一种用白粗布做成的布袋，搭在肩上，两端可装东西。东北称“钱搭子”，华北称“捎马”。

出售。这就给我们在购买时造成了困难。经过一番研究，我们觉得单去买一样“氯酸钾”，数量又多，不仅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而且药房也必然不肯出售。于是我们就在“氯酸钾”之外，又按游击队对其它药品的需要，开列了一个大药单，把“氯酸钾”夹到其它药名之中，尽量做到不显眼，不突出。

药单开好以后，我们把哈尔滨几个大药房都作了一番比较，最后认为道外正阳街“协天西药房”买卖做得和气，好说话，资本大，货物全。在那里，不会因为几磅“氯酸钾”而引起震惊。这样，我就拿足钱，穿上那套西装，浑身上下打扮得整整齐齐，到“协天西药房”去了。

到了药房，伙计一看我掏出个大药单子来，样子也象个有钱的“老客”，就非常客气地让我坐下，给我点烟倒茶，问我是从哪里来的？

我告诉他：我是榆树县“云星医院”的，这次到哈尔滨来，想先试买一些药品，如果东西好，价格便宜，以后就要经常来。

伙计一听，非常高兴，忙又请来一位小掌柜的，和我客气一番，拿起药单来仔细地看，边看边点头。可是当看到一半的时候，忽然把双眉一皱，眼睛也随着离开了药单子，注意地看了看我说：

“哎呀！您怎么买这么些‘氯酸钾’呢？这不太好办哪！”

我早就预料到这一问，这时就笑了笑说：“多吗？若比起单子上别的药品来这不能算多吧。何况我们那边根本没有这样货，各医院、药房都很缺。少了，几天就卖光了。”

“可是，这种药品……”小掌柜的面有难色的眨了眨眼睛，然后将头凑到我的耳旁，小声嘀咕道，“您从远处来，大概还不知道，日本宪兵队有指令，不许多卖呀！”

“我知道。”我泰然自若地说，“可是五磅也不算多呀。”

“比起别的药来当然不算多,可是这东西……”他更加低声地说,“您当然知道,它能做军火,能做烈性炸药……”

我听他说到这里,也把眉头一皱,正颜说道:“您怎么说到这上去了,您和我是同行,都是正经买卖人,咱们买货卖货,是将本图利,别的乱七八糟事,和我们根本沾不上边。您既然这样说,咱们这买卖就不好做了。”说着,我就伸手去拿药单。

他忙往后一退,陪着笑脸说道:“您别过意,我不过是把底细告诉您,我们这买卖,在哈尔滨也不是没有名声的,主顾来了哪能往外推呢!”

我听他这样说,也忙把话拉回来:“是呀,我是诚心要和贵号拉主顾。贵号的名声,我早就知道,所以一下火车,第一家没去,就奔贵号来了,贵号总不能让我失望啊!”

“那当然,那当然。”他满脸堆笑地说,“敝号和主顾向来就是一家人一样,从来也没让主顾说出个不字来……您这事,也好商量……您先等一下,我去去就来。”

我点点头说:“您先请便吧。”

小掌柜的拿着药单点头哈腰地到后屋去了。

他这一走,使我心里很不平静:他可能是去找管事的老板商量去了。但有没有另外的可能呢?譬如敌人对他们是否有过其它布置?要求他们遇有人来买较多数量的“氯酸钾”时必须报告,或者是其他类似的阴谋。如果真要发生这样情况,我将怎么应付?当一个人只身在白色恐怖的包围之中,并且和敌人作你死我活的斗争的时候,他的神经是非常灵敏的,思想是特别活跃的,每一件细小的事情,都会引起一些不同程度的设想。我以为这不单纯是自卫本能的生理反映,而是因为工作本身就要求你这样。只有想得周密,才能镇静地应付那种可能发生的突然事件,冷静地对待一切突然袭击。

我的思路,使我不由得向药房屋内的四周扫视了一下:柜台前的顾客不多,没有发现什么形迹可疑的人。我把心稳了稳,静待事态的发展。

不一会儿,小掌柜的面含微笑拿着药单回来了。他向我点点头,又凑在我耳旁嘀咕道:“您看这样好不?我们诚心想拉您这个主顾,‘氯酸钾’我们如数卖给您,可是不能明来,发票上不能开,不知道您回去能交账不?”

“那没问题。”我点着头说,“买卖是咱们自己开的,咱们说了算。”

“那好。现在就点货,可是……”他又往前凑了凑说,“我们卖给您这玩艺可是担着很大的风险哪!您可千万不能……”

我笑着拍了拍他的手说:“老板,您放心吧,这还用您嘱咐,买卖人谁还不懂这个,我说出去对我也没有什么好处哇。”说到这,我表示无限感慨地叹口气说,“唉!这年头买卖真不好做呀?处处受限制,日本人的买卖又一天比一天增多,咱们的脑筋若不灵活点,简直就得关板。”

我这几句话,引起了他好多牢骚。他从买卖人的利益出发,也恨日本强盗呢。

药品很快就点齐了。“氯酸钾”被严密地包裹起来,夹入其他药品之中装进了箱子。我付足了钱,和小掌柜的又寒暄了一番,就离开了药房。

回到住所,我又把“氯酸钾”重新“装置”了一番。第二天,按照预先约定的时间、地点,我把这批“药品”交给张石匠和那位从游击队来的懂得爆破技术的同志。

一个月以后,张石匠同志带来一个十分令人振奋的消息:日军一列满载军火及军用物资的列车,被我们游击队在帽儿山附近炸翻了!

## 特 务 网

自从遇着叛徒朱协,使老万同志在旅馆中陷于困境的事件发生以后,我深深地记住了一条教训: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及时地巡视和交通员接头的暗号,而且要尽可能把时间往前提。如果是订在二十号左右来,一般我都是从十七号起就去看暗号。我想尽办法减少因去一个地方的次数多了而可能引起的敌人的怀疑。有时改换去的路线,也有时改换去的服装。我觉得能早一天和他们见面,也就等于早一天把愉快带给他们。我在心里暗下保证,决不能使老万的事件重演。

这时,交通工作开展得很好,好多地区和单位都抽调出最优秀的共产党员作交通员。交通员所分布的地区是很广的,基本上可分为南、东、北满三个大区域;南满有沈阳、旅大、磐石(中心县委);东满有延吉、浑春、河龙、汪清、吉东局(地委)及虎林绕河地区,穆棱、密山地区;北满为松花江南北、汤原、珠河(均为中心县委)以及海伦等地。这些地区,都派有专职交通员和省委联系,省委也专有交通员,跑上海中央等地。

省委对交通局工作抓得很紧,交通员一般也都能按时或提前来到,没有出过什么差错。但也有一次,在我和交通员老谢同志接头的时候,遭遇了一些波折。在这次遭遇中,老谢同志表现

得很沉着、冷静。

老谢同志原籍为山东省，年轻的时候他在山东打过铁，后来因为家乡闹灾荒，便流落到东北，在汤原金厂做矿工。金厂矿工的劳动是非常原始而又沉重的，矿主的剥削非常厉害。老谢同志在长年的艰苦生活和劳动中，省吃俭用地积攒下一两多分份分来的黄金。希望在未来的岁月中，能再多积攒些，将来好成个家，生儿养女，过几天好日子。但是自从日寇侵占东北以后，对矿工的剥削和搜刮更加严重了，老谢非但不能再有所积攒，就连只身一人的生活都成了问题。他对过去的希望逐渐发生了怀疑，并且对日寇的仇恨一天比一天加深。当冯仲云同志在汤原地方一开辟工作的时候，就和老谢同志有了接触，在党的帮助和教育下，老谢同志逐渐明白了一个既简单而又十分重要的真理——不革命，不赶走日本帝国主义，穷人是根本没有好日子可过的。这条真理，是通过老谢同志自己的切身体会认识到的，一经认识，就在他身上产生了不可阻挡的力量。于是，他便毅然地参加了党，并且将自己积攒下的一两多黄金，全部献给了党，作为党的活动经费。从此，他的生活目的和所追求的理想便完全改变了。他仍然象从前那样艰苦的生活和劳动着，但他再不是为了求得个人的幸福生活，而是为了整个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

老谢同志在金矿中团结了好多工人，进行了好多斗争。后来，由于党需要一位精明强干而又忠实于革命事业的同志作交通员，便将老谢同志从金矿中调出来，挑起了交通员的担子。

在做交通员工作中，他仍然象当矿工一样，生活得非常艰苦。组织上每天给四角钱旅费，他舍不得花，将节省下来的经费交给党。他自己再不积攒一个钱，他把党的事业完全作为他自己的终生事业！

他人很机警、灵活，跑过几次哈尔滨以后，便对这个复杂的

城市有了一定的认识,对各阶层也有了一定的分析,所以各方面应付得都很好。

他每次来都是穿一套工人服装。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工人,身上充满了工人的气质,穿着工人服装显得很合体,很带劲,所以我也没提议让他改换别样服装。但是因为我们俩在服装上所显露出来的社会身分有差异,在订社会关系的时候便把这个情况考虑进去了。我们议定:都是榆树县土桥子人,他是土桥子铁匠炉的铁匠,到哈尔滨来买五金材料,顺便来看我。

我和老谢同志的接头暗号,多数是挂在承德街的一棵树上,因为他来后多半住在这一带的旅馆里,对这一带的情况摸得很熟。

一天,我看见暗号挂出来了,便往“西门脸”的汽车站前走去。我们规定在那里见面。

“西门脸”这一带人杂,小贩多,过买过卖很热闹。我们只是在这里接头,并不在这里谈话。我走到“西门脸”汽车站前,没有发现老谢同志。汽车站前等上汽车的人很多,汽车一辆一辆地开过,人都争着上车,我不能在那里呆站着,便走到汽车站斜后方一块揭示板前装着看《大北新报》。我眼在看报,心却在汽车站上,因此就不时回头看一眼。就在这时,我发现在马路的那一边,一家五金行的门前,有一个穿深色西装的人,戴着一副淡墨镜,隔着马路向我这边“吊线”。他见我看他,便忙把头扭到一边去了。凭经验,我一下就猜到是被什么样的人“盯”住了。他“盯”我,可能是因为我站在这里时间久了,又不时地回头,不大象看报的样子,才引起他的怀疑。这样的怀疑,是不难对付的。但难办的是,就在这同时,老谢同志也出现在汽车站前了,并且也在向我这边望着。按规定:当我和交通员在公共场所接头的时候,他们不能先接近我,也不能先和我说话,因为他们不如我熟悉环

境。

两个人——一个是我急于想见面的同志；一个是和我势不两立的敌人，都在注意着我的行动，我得怎么办？我决定：不能再在这里停留，再停留，那个家伙就可能进一步察觉到我和老谢同志之间感情上的微妙联系。我必须马上走开，于是我再没有回头看那个家伙，也没有看老谢同志——我知道老谢同志会悄悄跟着我的，就表现得若无其事的样子，向南段南马路走去。

当我走了一段路程以后，装作看路旁墙上新贴的一张大招贴画，趁机迅速地往后面瞥了一眼，我发现：在我后边不远，走着老谢同志，而那个家伙，却鬼鬼祟祟地走在那边的马路上。我们三个人走成一个大斜三角形。这个形势是很不妙的，因为他一眼就可以看到我和老谢同志两个人的行动。我不知道老谢同志发觉那个家伙没有？如果老谢同志没有发觉他，心一急再紧追我几步，就很容易被他们看破我和老谢同志之间的关系。我很想向老谢暗示一下，但又怕被那个家伙察觉，只好仍旧向前边走着，一边走一边想应付的办法。

这时，正好走到裕昌源火磨（即面粉厂）拐弯的地方。趁着拐弯的时机，我又向后边扫视了一下：奇怪！我身后只剩下老谢同志一个人了，那个家伙已经不见了！我忍不住又细看了一下，马路两侧都没有他的踪影！这真出乎我意料之外，这条“狗”为什么半途隐没了呢？莫非我估计错了，不是“狗”？不，这是不可能的，从他和我“吊线”、跟踪以及所表现出来的精神面貌来看，这肯定是条“狗”。既是“狗”，怎能半途而废，不到黄河就死心呢？这真是个疑团。疑团不解，心里不安，我必须停下来，和老谢同志简单谈一下情况。

裕昌源火磨正在扩建，厂房的后面，堆置了许多青砖、木材等建筑材料。时间已近傍晚，火红的太阳隐没在高大的厂房



后面,建筑工人都已经下工了,工地上很肃静。于是我就站在一堆青砖后面,等候老谢同志。

大概老谢同志也急于要和我谈情况,他的脚步也加快了,很快地来到我身边。

没等他站稳脚步,我就迅速而低声地说道:“走着谈。看见‘狗’了吗?”

“看见了。不跟了。”他靠近我身旁,边走边短促地回答。

“从什么时候不跟的?”

“快到火磨拐弯的时候才听不见脚步声的。”

“注意钻到哪儿去了吗?”

“我回头的时候他已经没了。”

“他注意到你没有?”

“可能没注意到。”

“你住的旅馆安全吗?”

“安全。”

“好。”我迅速地想了一下,决定道,“现在情况不清楚,我们必须马上分手。”

“再碰头的时间、地点?”

“明早七点,夹树街大石头房子后边。”

我刚说到这里,就听后边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扑哧扑哧的,好象在跑。我心里一动,极力压低声音对老谢同志说:

“‘狗’又来了!别分开,别回头,随便谈。”

老谢同志也已感觉到了,他未加思索,好象早已准备好了,张口就说道:

“你看,你总也不回去,你们家大嫂脾气不好,妯娌不和,弟妹在家里很不好过,你不再回去,让她多伤心哪!”

老谢同志说的很自然,使我的心也马上沉静下来了。我也

就顺着他的话音答道：

“我哪有时间回去呀，道这么远，来回得好几天。现在事情不好找，请假天数多了上司不满意呀。”

“那你至少也得捎几个钱回去呀。”

“唉！”我表示为难地叹了口气说，“我每个月赚那么一脚踢不倒的几十块钱，我又交朋好友的，不够花呀！再说家里有吃有喝的，还缺我这几个钱吗？”

“大兄弟！”老谢同志装出为我着想的样子说，“你怎么这样不懂夫妻间的心意呢，弟妹在家也不是非得你的钱方能活着，你给她捎回几个钱去，让她心里好受哇！”

“她好受我可不好受了。”我顺口就这么说了一句。

“你看，你这人真犟。”老谢表示无可奈何的样子说，“这样吧，你给弟妹和孩子扯几尺布捎回去吧，天头快冷了，孩子大人也得换季了……你若实在没钱，我给你。”说着他就去掏钱。

我忙拦他说：“那倒不用。我张罗着给她们买吧。”

“好吧。”老谢不再掏钱，说，“我还得几天回去，买好了你给我送去吧。我现在还得上五金行办点事，你回去吧。”说罢，老谢便装出要走的样子。

我忙一把拉住他说：“别走，咱们上小馆吃点便饭去，喝几盅。”

“不，不，我吃过了。”

老谢同志向后拽，我向前拉，就着这一拉一拽的工夫，我的脸很自然地转向后边去，我看清了：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站着一个象瘦猴一样的家伙，他穿一件灰风衣，脖子上还围一条白串绸围巾。他见我看着他，忙把身子向后再一转，解开裤扣，对着墙缝，装作小便。

这个家伙的突然出现，先是使我愣了一下，但随即我就弄明

白事情的真象了：我早就知道敌人在有些地方布置了特务网，用接力的办法换班跟踪，目的在于迷惑对方。现在疑团解开了，原来那个戴淡墨镜的家伙所以中途隐没，是把我们交给这个家伙了。可能他们是在交接的时候误了一点时间，被我们拉远了，所以这个家伙才扑哧扑哧跑起来。从他这一跑，也可以断定这是个非常短练的家伙，是个才被放出狗窝的雏犬。想到这里，我便趁他背过身去小便的空隙，急对老谢同志使了个眼色，把老谢向前拉了两步，靠近他的耳边急促地说道：

“桃花巷，分头甩掉！”紧接着，我又大声说，“走吧，走吧，吃点便饭，还客气什么呢。走吧……”

我就这样拉着老谢同志的手，顺着前边一条直接通往桃花巷的小道走去。走了不远，后边又响起了那扑哧扑哧的脚步声，我们没有再回头，没有再理他，任他跟在后边。

桃花巷，这是个最复杂的环境，不只人复杂，那些狭小的胡同也复杂：一条挨着一条，互相串连着。好多小院，前门在这条胡同，后门就在那条胡同。人从这条胡同进去，不用走到头，就可以窜到另一条胡同去。接连这样窜几次，就把后边跟你的人窜迷糊了，甩掉了。所以这是甩特务最好的地方。为了防备敌人的跟踪，我和交通员们特别选择了这个地方，平常到这里来走动，把地理环境摸得烂熟，哪怕是在黑夜里，我们也能走通那极闭塞的角落。在我们心里，已渐渐地画好了一张四通八达的蓝图。凭着这张蓝图，我们就能把敌人甩在“迷魂阵”里，自己却安然离去。

我和老谢同志走到桃花巷口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入西天，夜幕正从东方拉起，街灯还没亮，街头上显得昏昏暗暗的，是俗话说“雀蒙眼”的时候。这真是甩掉敌人最好的时机！于是我在暗中用力握了一下老谢同志的手，悄声说：

“快走！”

老谢同志微点了下头，迅急地向旁道岔去。

我等老谢同志走出去两步以后，也转身快步走入另一条胡同。我晚走两步，有意识的把这条“狗”引到我这边来。我自信比老谢同志更熟悉这个环境，更有把握甩掉他。果然，我后边又发出了那扑哧扑哧的脚步声。我暗骂道：“笨蛋，非让你白出一身臭汗不可！”我加快了脚步，向前走去。当我走到一个昏暗的小门前时，将身一闪窜进去，绕过房屋，飞快地跑出后门。就这样，我错落着一连横插过几条胡同，后面的脚步声便听不见了。但我仍然不放松地快走，我尽量不走直道，多拐弯，走暗处。当我确信这条狗就是插上双翅，变成猫头鹰也难撵上我的时候，才急步走出桃花巷，向马家沟走去……

第二天，早七时，我和老谢同志又在夹树街大石头房子后边见面了。我们俩在幽静的林荫路上，在香气扑鼻的花圃旁，顺利地谈完了工作，我们带着胜利的愉快心情又分手了。

由于老谢同志努力地为党工作，在一九三四年冬，被提为中央交通员。从哈尔滨到上海，不只路途遥远，而且困难重重，要越过敌人的所谓“国境”（从关外到关内），得闯过敌人的无数搜索，才能完成任务。

有一次，老谢同志带着省委的报告到了上海。这时上海正处在白色恐怖的包围当中，反动派到处搜捕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老谢同志历尽了艰险，拿到了中央的文件。在回哈尔滨的途中，又因旅费不足，在青岛打了好几天铁，在大连卖了好几天短工。回到哈尔滨时，已被饥饿和危难折磨得瘦弱了。但他没有说一句怨言，没报一句辛苦。从老谢同志身上，我深刻地体会到了工人阶级的崇高品质。

## 来路不明的人

一九三四年的冬天,我和大秦、小秦按省委的指示将机关转移了;由马家沟搬到南岗八乍市四道街去。

为什么转移呢?是由一件很突然的事情引起的。

有一天,时近傍晚,我在外边工作了一天,拖着疲倦的身子往马家沟的住所走。

我们住的白俄房子,正象许多白俄房子一样,有一扇深绿色的大门,大门上又掏了一个小门。不走车辆的时候,平常只开小门。小门很矮,人向里进,必须先低头,后迈步,等身子进去,头方能抬起来。

我迈进院子,一抬头,忽然看见一个穿深灰色风衣的人,手里拿着一卷纸,正倒背脸站在院子当中,向四处张望着。他似乎听见后面有人进来了,一回头,和我照了一个对面。咦!这个人我似乎在哪里见过?至少是注意过:微黄的面孔,四方脸型,鼻子上架个眼镜……我顾不得多看,一刹那间,我的思想象暴雨当中的闪电一样,迅急而短促:在没弄清情况之前,我决不能贸然进屋,但退出门外已来不及了,他已经看见我了。我稍微镇静一下,便一直腰向院里走去,我走过他的身旁,站在他的前面,也象他那样子,向四外先张望了一下,然后说道:

“劳驾，这院有个姓王的吗？”

我住的房门呀的一声响了，大秦同志从里面出来了。她方一露面，我就急速地向她使了个眼色，同时点点头问道：

“劳驾，我借问一声，这院有个老王家吗？”

大秦同志从我的眼色、问话以及我身后站着人的情景中，已经猜到这是怎么回事了。她安静地摇摇头说：

“这院没有姓王的。”

“那这门牌号……”

“隔壁和我们是一个号。”

“啊，是这样啊！”我装着恍然领悟的样子向大秦同志说，“对不起，打搅您了。”

“不用客气。”大秦同志说完随手就去带门。

我也转身向外走去。

院中那个家伙仍然站在那里未动。我走出小门，向后瞥了一眼，见他并没跟出来，就快步走入附近一个小胡同里。

从这条小胡同里，我又拐进另一条街道，当我确信那个来路不明的人对我的威胁已经完全不存在的时候，我的心才松弛下来。这时我的思想就很自然地集中到一个问题上：我在哪里见过他？为什么感到面熟呢？……长年的地下斗争，锻炼了我的记忆力，我很快就想起来了：有一次——时间大概没隔多久，在电车上我曾注意过这个家伙。当时我站在电车头前，车窗开着，车一开动，凉风呼呼地吹进来，我觉着有些冷，想向后面走一走，就在我一转身的工夫，看见了他。他仍然是穿着这件深灰色风衣，风衣里是一套咖啡色的西装，手里也恰恰拿着这么一卷纸。从外貌上看去，倒象个教育界人士。但是使我感到可疑的是他那双眼睛：他的眼睛总是不停地在搜寻什么，观察什么，甚至是在捕捉什么。我知道，凡是敌人放出来的“狗”，跑到人群中以后，

总是没有安静的时候。有时他的外形是安静的,但是他的眼睛,却总象惯窃的眼睛一样四处找东西。有时你会从这样的眼睛里,看出来狼一样的贪婪的白光。遇见这样眼睛,不管他外貌装得如何近似人形,你也要加倍提防他那颗兽心。

当我在电车上觉察到这一点以后,便立刻警惕起来。趁他还没有注意到我的面孔的时候,马上把头回过来,同时也取消了往后边移动的念头。我应该尽量少活动,以免引起他的注意。

车上有这样一个家伙,是十分讨厌的事。我当时本应到通道街下车,但是车一停到教堂街,我就下去了……

想不到今天,他竟站到我的院子里来!他怎么来的呢?来的目的是什么呢?把那天在电车上的相遇和今天的出现联系起来看,他可能是经常在马家沟这一带窜动。那么他今天的出现就不是偶然的了,这倒是值得深思的事啊!

我边走边想,不知不觉已经又绕回离住所不远的地方。这时天色已经黑下来了,我惦记大秦和小秦,也想快些弄清事情的真象,便向住所走来。

走到院门口,我仔细一看,“平安警号”还照样贴在大门旁,心放下了一大半。

熟悉旧时哈尔滨环境的人大概都会记得,在白俄住宅的大门旁,经常贴着一些俄文告白,告白的内容是五花八门,什么事都有,如:“本院专修指甲……”“本院出卖虎头小狗一头……”“本院招不带男人的女房客一名……”总之什么事都往出贴,而我们那院的房东,更喜欢利用这种“宣传形式”,哪怕是最无聊的事情,她也把它贴出去,公诸于世。积年累月,她把大门左右都贴满了小纸单。我们搬进去以后,也就利用她这个特点作了“平安警号”,拣一小块形式特别些的旧告白角,用一个旧图钉按到

门旁的旧告白当中，看起来一点也不扎眼。如果遇有什么紧急情况，很容易便拿掉了。

现在“平安警号”依然存在，说明还没有发生危急的情况，于是我便一直走了进去。

屋里的电灯已经亮了，大秦和小秦正隔着窗子往外望，大概是正盼望我回来呢。我一进院门，她们就打开房门迎了出来。进屋后，我急将窗帘拉严，问大秦同志道：

“方才那条‘狗’钻哪去了？”

“不知道。”大秦同志摇摇头说，“你走了以后，他又在当院站了一会儿才走的。”

“他没问你什么吗？”

“没有。什么也没说，只是站那看。”大秦同志困惑地望着我说，“不知道他是怎么进来的？若不是你喊一声，我们根本就不知道院里有人。”

“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进来的，我一进院就看见他站在院子里……”

“那么是谁引进来的呢？”大秦同志紧皱着双眉说。

“我是在姐姐后边回来的。”小秦同志忍不住地说，“可是我进院以前都留神看过了，根本就没见有人跟着我……”

“也不一定是今天跟上的……”我又想起了在电车上遇见那个家伙的情形，思索着说。

大秦和小秦同志也都在思索，屋里静悄悄的。

这时，忽听外边有人敲门，随着就传进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张守仁先生住在这里吗？”

语调是缓慢而低沉的，声音是陌生的。

我们三个人在屋里一愣，这是谁？



大秦同志忙对我一指衣柜，悄声说：“快！”

我一转身，迅速地进去了。小秦同志随手关严了衣柜门。

衣柜是比较宽大的，一个人站在里面宽绰有余。我将眼贴在衣柜缝上，向外望去。

大秦同志已经敞开里屋门向外屋走去。外屋的电灯亮了，门也大敞开了，我看不见门外的人，只能看见大秦同志侧身站在门里问道：

“您找谁？”

“我找张守仁张先生，他是不是住在这里？”从门外又传来那缓慢的语调。

“是住在这里。”

“张先生在家吗？”

“他出去教课还没回来，您找他有什么事？”

“我……没什么要紧事。”

“您请屋里坐吧。”大秦同志将手往屋里一伸说。

随着大秦同志的声音，一个深灰色的物体靠在门前了。天黑，我又在衣柜里，看不真切门外的东西，只能影影绰绰地看见一些。从那反光的眼镜片上，从那深灰色的外衣上，我已经断定这就是方才来过的那个家伙。奇怪！他怎么会知道我的化名呢？问题真是越来越复杂化了！

这家伙似乎是将脑袋往门里探了探，随即又缩回去了。

大秦同志象唱“空城计”一样，把两个门都大敞开，把两个屋的灯都点亮，使他一眼望到底，表示我们光明磊落，没有任何隐情。

果然，这个家伙并没有进屋。他一边往回缩脑袋一边说道：“我不多打搅了。”

“那么请您留张名片吧，等他回来好让他到您那里去。”

“那就不必了。我改天再来吧。”

声音没有了。大秦同志也走出屋门去；小秦同志轻声地走到窗前，隐身在墙后，从窗帘的小缝里向外窥望着。我仍然静静地站在衣柜里。

外屋门关上了，灯闭上了，大秦同志走进屋来。我一步从衣柜里跨出来，急对小秦同志说：

“你先不要动，在那里看着点。”我又回头对大秦同志说，“你估计他会不会马上再回来？”

“我想不会的。”大秦同志摇着头说，“我们没有让他看出什么破绽，从他脸上的表情看，他是相信你不在家的。”

“那么我们赶快分析一下情况，研究一下对策吧。”

“好，”大秦同志点点头说，“方才我就想：他是怎么知道你的名字的呢？”

我也感到这是个问题，刚想说话，却被小秦同志抢在前面了：

“那上哪知道去。”小秦同志眼睛仍望着窗外，迅速而悄声地说，“快研究别的吧。”

“不，我们能弄清楚。”大秦同志说，“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只是站在院子里看，第二次来才问的名字。为什么第一次不问呢？”

“对！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我说，“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不知道，中间走出去一会，然后再回来，这就是说他到别处打听去了。”

大秦同志忙点头说：“我想正是这样的，他第一次来探知了我们的门牌号，有了门牌号他就会……”

大秦同志方说到这里，小秦同志忽然抢着说道：“对，他会上派出所问去。”她的头回过来了，眼睛直瞪着我和大秦同志。

我和大秦同志都点了点头。

我说：“可能是这样的，派出所离我们这里不远，来去都很方便。”

“他和派出所联系上了！”大秦同志说，“那么这问题就不简单了！我们应该赶快想办法……”她指着我说，“他来指名找你，又在这院子里遇见过你，你又装成是找人的，如果再让他在这屋里遇上你，问题就不攻自破了。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赶快离开这里。”

“那么你们呢？”大秦同志说的意见，我也考虑到了，但我觉得现在不只是我个人问题，而是整个工作安全问题。

“我们在这里支持着。”大秦同志说。

“对！”小秦同志的眼睛有时看着窗外，有时回过头来插几句话。

“那不成。”我挥了挥手说，“如果敌人是对我来的话，我不在了，他们自然会拿你们示问。我一个人走了，你们两个人就更不安全了。而且工作怎么办呢？”

“那么你看怎么办好？”大秦同志说

我没有马上回答她，我在想。

“我看我们三个人都走。”小秦同志说。

“不。”我坚决地摇摇头说，“我们不能扔下机关……这样吧，我们暂时都不动，马上动手清理东西，把应该掩藏的都掩藏好，应该销毁的都销毁掉。明天我们就想法和省委接头，请示省委应该怎么办。”

我的意见立刻变成了行动，我们马上动手清理东西。我们清理得很彻底，把认为可以被敌人拿作证据的东西都清理出来，没有保存价值的东西都销毁；需要保存的就马上伪装好由小秦同志用斗子车送到反日会负责人雷炎同志的家里。一直到后半

夜，才把这件事情做完。接着我们又坐下来，把早已准备好的相互关系、籍贯、职业、来哈尔滨的目的等，凡敌人可能讯问到的问题都又重新研究了一遍。我们必须做这样的准备，如果万一被捕，我们的“口供”一致，证据没有，就有利于我们。

我们把一切都研究好以后，天已破晓。曙光从窗帘的缝隙里钻进来，新的一天，战斗的一天又开始了！

当我们向省委汇报情况的时候，省委详细地讯问了一切，最后指示我们说：

“从敌人两次出现的情况来看，还是带有试探性质的，至少是没有摸到什么底。在这种情况下，估计是不会立刻采取行动的。”

省委同意我们暂时在那里坚持下去的主张。省委认为：如果敌人现在仅仅是怀疑我们，就没有必要马上躲开。我们一躲，就等于向敌人说：我们有问题。那样反倒会使事情发生急剧的变化，敌人会顺着我们这条线索找下去，后果是不利的。省委肯定了我们所做的准备工作，同时要我准备好“保人”，以便应付突然的变化。

最后省委要我们暂时把工作停下，尽量减少可能引起敌人怀疑的行动，听候省委下一步的指示。

停下工作的一段难熬的时期终于过去了！

那个家伙从那次以后始终没有再出现过。敌人给我们的威胁是极次要的，停下工作的烦闷是使我们难以忍受的，但我们忠实地执行了省委的指示。

我们度日如年地等待着省委的下一步指示。这样的指示终于被我们盼到了！

省委指示我们说：已经通过在敌警务厅工作的老赵同志进行了了解，正如省委所估计那样：那个家伙对我们仅仅是怀疑，

并没有把我们报到警察厅去。

但是省委认为：既已引起敌人的怀疑，我们再在那里工作就不安全。现在已经稳住了敌人，必须乘机找个借口，将机关转移到别处去，换个新的、安全的环境，然后才能开始工作。

这样，寻找新的环境，争取早日转移机关，开始工作，便成为我们最迫切的任务了。

## 转 移 机 关

我前面曾提到省委要我准备“保人”的问题。省委所以这样提出，因为在这以前，省委曾经批准过我一个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这个社会关系的名字叫王立夫。我们的新房子，就是从他那里找到的。

王立夫，是个“刀笔邪绅”，是姚锡九、刁子明等劣绅的“抗叉”<sup>(注)</sup>的，曾经当过延吉道尹，后为中东铁路的文牍及道外教养院院长，在哈尔滨一带颇有势力。他有一个侄子，名字叫王杲初，曾经当过哈尔滨道里警察署署长，现任职是中东铁路的秘书。这一老一少，都是坏蛋；一个道里，一个道外，狼狈为奸。

这样的坏人，和我们之间本来没有任何共同之点。但因当时环境不同，天下还是操在这一类人的手里，革命还是处在艰苦的形势之下，所以从革命的功利出发，有时还要适当地利用一下这些人的合法地位。

我有一个表姐嫁到王家，是王立夫的儿子媳妇。因为有这样一个社会关系可以利用，便托他们给我找房子。恰巧，王杲初的对面有一大间白俄小房准备出租，我便租下来了。

---

<sup>(注)</sup> “抗叉”为东北土话，意即家里有个可以依仗的人。王立夫当时即为姚等劣绅在官场及诉讼中的依仗和支持者。

我们向原来的白俄房东编了一个所以搬家的理由：说大秦同志有病，经常腰疼，要住火炕。白俄房东开始还挽留我们，并答应将来可以给搭火炕。但我们表示房子已经租妥了，不搬不好办。

这样，我们就搬到南岗八乍市四道街去住了。

新住所是一大间小洋房，独门独院，很雅静。对门便是王杲初的住宅。王杲初从前在道里当警察署长的时候，曾在道里住过。后来当了中东铁路的秘书，便在南岗买下了一所白俄的房子，将家搬到这里来住了。

为了使王杲初相信我，在事前我已通过表姐向他交清了“底细”，解除了他可能产生的某些疑问。例如我所以改名叫张守仁，是因为我曾经借别人师范毕业的文凭找过职业。在旧社会里冒名顶替、借用证件的事是常有的。在那尔虞我诈，贿赂公行的社会里，人们是不以为可耻的。另外我母亲也姓张，子随母姓，更觉情有可原。至于我和大秦同志的关系问题，他们早就相信了我和大秦同志是因“恋爱”而同居的，而且他们都猜测大秦同志很有钱……对这些，我也不加可否，只要是不猜测到我和大秦同志的真正关系，任他们怎样说都是对我们的工作无害的。

我们很清楚这一点：在这一带里只要能取得王杲初的信任，我们就是安全的，环境就是巩固的。这一带是王杲初的势力范围，以他作掩护，特务、警察便轻易不能上前了。

王杲初有个侄子叫王昭晟，住在他家里念中学。王杲初很喜欢旧文学，希望他侄子能在旧文学方面得到深造，要请一位教旧文学的家庭教师，乘此机会，我就介绍李世超同志给他补习国文。每天七点到九点李世超同志都到他家里来上课，有时王杲初也去听一听。李世超同志的文学基础是很深厚的，讲起课来引经据典，博古通今，使王杲初深为敬佩。这样，李世超同志也

进一步取得了合法的掩护。我和大秦、小秦十分高兴，我们每天都可以和省委的领导同志见面了！我们的工作，会取得省委的及时指导，我们的思想，会受到领导的及时帮助；我们的疑难，会得到领导的及时解决。在地下斗争的环境中，能够和领导同志每天见面，这是多么使人高兴的事啊！而且这种见面方式也是十分令人痛快的，我们不用躲躲藏藏，遮遮掩掩，而是大大方方地，明来明去地相会了。

因为我们的环境较安全，住处幽静，省委就决定在我们这里开办临时“训练班”，由省委组织部长老李同志（即何成湘同志）负责传达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文件及党的政策。

由于当时的处境不同，因此办“训练班”的方式也和现在完全不同。按通常的理解，既称训练班，就要在一个时候内，集合起一些人来进行集体活动和学习。但那时怎能这样做呢？环境再巩固，这也是不可能的。

我们当时只能采取分头受训的办法来进行。对象都是各地和各单位负责同志。每次只能来一两名。他们都化装成各种不同身分的人，用各种不同的社会关系来到我们这里接受真理和党的指示。

经常来这里的当然是老李同志了，他和我定为老朋友的关系。他的掩护职业是地方法院的职员。他都是在王杲初上班以后，按约定时间来。来后，我们在桌子上摆上糖块、瓜子、茶水等。由小秦同志在外边放哨，于是庄严而神圣的工作就开始了！党的声音，党的思想，党的政策就从这里传播出去，一直传到人民群众之中，化为行动力量，狠狠地打击敌人，消灭敌人！



## 为 了 工 作

一九三四年省委举办的“训练班”刚结束，哈尔滨的空气就紧张起来。

日寇为了加紧控制哈尔滨，便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户口大清查。妄想通过这次清查，窒息爱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捕尽革命的共产党人。

敌人成立了一个庞大的清查户口的组织。里面除有大批警察、特务参加之外，还搜罗了个别无耻的叛徒为虎作伥。敌人按户发下了大张表格，逐名填写，企图从中发现线索，进行搜捕。

这时，省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及城市的紧张情况认为：必须迅速地加强抗日游击区的工作，把党的干部尽可能地派到农村去，派到游击区去，发动广大群众，参加武装斗争。党的这一决定，是非常正确的。我们在城市工作的党员，热烈地响应了党的号召，坚决地听从组织分配，好多同志开始转移到游击区和农村去了。

首先接到省委指示，离开哈尔滨的有毛诚同志。

毛诚同志当时才从道外产科医院里出来不久，她生了个小女孩，是难产，产后身体比较虚弱。她接到省委调离指示时，小

孩才只生下来二十九天。

在临行的前几天,她到我们那里去了。我们之间因工作联系较多,同志间的感情是比较深厚的,我们早就希望她在走前能来谈谈。

现在,她来了,而且是把工作交代完以后来的,我们自然都十分高兴。但是,当我们发觉她没有把那二十几天的小生命抱来的时候,又有些感到奇怪了。大秦同志急忙问道:

“怎么没把小宝贝抱来?”

“她……”毛诚同志眼圈一红说:“她已经不在了!”

“怎么?孩子没了?”我们都惊讶得睁大了眼睛。

“孩子还有,但是不在我身边了。”

“哪去了?”

“我……”毛诚同志把头扭到一边去说:“我把她送到‘育婴堂’去了!”

“育婴堂”这个地方我们都知道,在道外十九道街,专门收留被舍弃的婴儿。在一所房子外面,挖一个四方的小窗户,亲人们把孩子抱去,往小窗户里一放,便再也见不到孩子的面了。孩子到那里,得不到充足的饮食,好多都病饿死去,活过来的也瘦弱不堪。而且更恶劣的是,这个标榜着慈善机关的地方,竟用这些弃儿作买卖,把孩子象商品一样偷偷地卖掉,从中牟利。这是贫困、黑暗、残酷、封建的旧社会的产物。所以当毛诚同志一说出把孩子送到那里去以后,我们的心情都感到很沉重。

大秦同志着急地说:“你怎么往那里送呀?”

“我也是想了好久才下定决心的。”

“你为什么不提出来和同志们研究研究呢?”我也抱怨她说。

“同志们工作都很忙,好多同志要走了,留下来的工作担子

更重了。我和他们说，他们就可能把孩子留下，怎么能再给他们添累赘呢！”

“那你至少应该和组织上谈哪！”我说，“组织上会给你解决这个困难的。”

“我知道。”毛诚同志点点头说，“组织上会给我想办法，甚至会把这个孩子收留起来。但是……环境这样艰苦，组织上也是困难的；怎能再因为个人问题去给组织增加困难呢。”

“那你就忍心……”大秦同志说了半句就止住了。

“我是忍着心……送去的。”毛诚同志低沉地说，“孩子是我的亲骨肉……我几次抱起孩子，几次放下，我把攒下的一元钱，掖到孩子的小衣服里，我再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给她了……”毛诚同志有些说不下去了，她又把脸扭到一旁去，半天，才接下去说，“但是，这终归是个人的事情，个人的感情。今天，我的确是忍着痛苦把她送出去的。以后，她也可能顽强地活下来，长大成人；也可能就终结了她那短促的小生命。但是，我却能因此多给党做些工作——现在党是多么需要我们能多做工作啊！我忍痛舍弃了孩子，只是我和孩子的不幸；可是将来革命成功了，就会有多少孩子免去这样不幸的遭遇！一想到这些，我的勇气就足了，个人痛苦的感觉就减弱了。我觉得个人的痛苦无论如何都是暂时的，如果因此而使多数人都得到幸福，你就会从这幸福中获得永久的快乐！你们说，我想的不对吗？”毛诚同志抬起头来看着我们，她的情绪激昂起来，她的眼睛是明亮的，痛苦的感觉完全从她脸上隐退了。

我们沉默地看着她，心情也同样激动。怎能不激动呢，一个女同志，为了革命，甘愿悄悄地舍弃掉自己那唯一的亲骨肉，如果不是共产党人，不是把革命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把党的事业作为终身的事业，怎会如此呢！

毛诚同志所舍弃的孩子，至今还没有找到。但愿这个革命者的骨血能长大成人！

毛诚同志从舍弃那个孩子以后，再没有生过第二个孩子。但是她的精神是愉快的，她一心一意为党工作，她不感孤寂，新中国儿童所过的幸福生活，对她就是最大的安慰！

## 北上前夕

继毛诚同志之后，我也接到了省委的通知：派我到汤原游击队去。这时我们已经知道，中央红军已经开始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长征。虽然我们知道的还不够具体，甚至就连在这同一时期所开过的伟大的遵义会议我们都不知道。但是长征本身，对我们就是一个莫大的鼓舞，它使我们更加相信我们党是不可战胜的，更加感到掌握武装的重大意义。

因此，当我接到通知以后，心情极为振奋：我也要直接参加武装斗争了！我将和自己的同志在一起并肩作战了！在地下斗争中，为了隐蔽自己，感情是受环境压抑的，有时甚至要在表面上向你所恨之入骨的敌人点头称是，这种滋味，真是使人难以忍受的。但是现在，我就要离开这样的环境，拿起枪杆子，向敌人射击了！今后，在我周围的将都是为共同理想而奋斗的亲密战友。我将战斗、生活、学习在革命的大家庭中间。一想到这些，我就忍不住地高兴，很久以来，我就向往着这种痛快的生活，现在终于要实现了！

但遗憾的是，大秦同志在这个时候偏偏病重了。本来在毛诚同志走前，她已经感到肋膜疼痛，经常咳嗽。但她并没有向谁诉说，只是悄悄地忍着病痛，照常工作着。后来，病势渐渐加重

了,任凭大秦同志再刚强,也经受不住那经常袭来的剧烈疼痛的折磨。在我的劝说下,她到医院去进行诊断,经医生确诊为肋膜炎兼肺结核。

这样严重疾病的打击,放在常人身上,会马上卧床不起。但刚强不屈的大秦同志,有时还坚持着出去工作。工作回来,要躺在床上喘很久,冷汗从额上津津渗出,有时还夹杂着阵阵剧烈的咳嗽,但她仍不肯停下工作。

当组织上通知我赴汤原游击队的同时,也通知她继续留在哈尔滨,坚持地下斗争。只是住处和领导人都要更换。

从一九三三年秋天起,我就和大秦同住在一个机关里。一年多的时间,朝夕相处,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铸下了胜过兄弟姐妹的同志感情,现在在她疾病缠身的情况下要分开了,自然会在我那兴奋的心情里添加上一缕惜别的感情。

我当时一方面积极准备行装,一方面照顾大秦同志,按省委指示,为她延医求治。

北方的冬天,来得特别迅速,几阵北风,几场严霜,再来上一次烟雪,就变得天寒地冻,没有棉衣,就无法出门了。

组织上对到游击区去的同志,照顾得非常周到,在经费困难的情况下,发下了在当时说来是很充足的制装费。我按组织上的要求,买了大皮帽子、大棉鞋、棉袍、棉裤……从上到下,都武装起来。但我买回的棉袍,大秦同志却发现里边絮的是弹花(更生花),她用手各处捏了捏说:絮的也不均匀,不能挡风寒。我自恃年轻力壮,抗寒力强,对这些倒不大在乎,一笑置之。

第二天,我出去了一整天,到晚上才在指定地点,听完省委指示回来。一进屋,只见大秦同志腰后垫个枕头,半靠在墙上,正缝我那件新买来的棉袍呢。她身旁放了一堆旧棉花;一床她自己的褥子,被掏空了搭在床头上……这一切,使我立刻明白

了，……我望着她那眼眉上都挂着棉絮的瘦削面孔，心里一阵发热。我走过去摸一把棉袍，软软的棉花絮得厚厚的。而她自己，却穿着一件半旧的薄棉袍……我直望着棉袍，一时之间不知说什么才好。大秦同志见我愣在那里，先说话了。她说：

“你发什么愣，穿上试试吧。”

“不用试了。”我望着她那被疾病折磨得瘦削不堪的面孔说，“你还没顾得上吃饭吧？”

“没有。”她笑了笑说，“还没觉得饿。”

“你等着，我去做饭。”

她没象往常那样抢着要做，只点了点头，又低头缝棉袍。

我做好饭的时候，她已经把棉袍缝完，叠好放在一旁。

在吃饭的中间，我告诉她：省委指示我要在明天十二点以前离开这里，拿着行装到指定地点去等候汤原县委组织部长老刘同志，和他一同到汤原游击区去。并且转告她：省委要她暂时留在这里，等候和新的领导接头。这里的房子也不退租，省委还有用处。

她默默地听着，没有多说什么，更没有说一句类似惜别的话，只是嘱咐我在游击队要好好团结同志，向老游击队员学习，遇事不要急躁——她深知我这个毛病。

吃完饭后，我就到王杲初家里去“辞行”，假说要回吉林，归期不定，房子还要留下。他们深信未疑，客气一番，我就回来了。

这时天色已经很晚了，屋里还点着灯。大秦同志仍然靠在墙上，手里拿着我的旧袜子，一针一针地缝补着，壁炉里只剩下几块半明半灭的火炭，屋里冷飕飕的，但她头上却滴着细细的汗珠。

她做棉袍已经劳累了一天，虚弱的身体已经疲乏不堪了，这时还不休息怎行呢！我便夺下袜子，强劝她休息，她不太情愿地

躺下了。

我又整理了一下东西，也就睡下了。整日在外奔忙，我也很疲乏了，头贴在枕头上，就鼾然睡去。

天刚亮，我醒来了，睁开眼睛一看，大秦同志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又坐那补上袜子了。头上的电灯用厚纸遮起一半来，我这边显得昏昏黯黯的。

我心里一急，忙一翻身坐起来说：“大秦，你这简直是……糟践自己的身体！”

“我……”大秦同志停下针线，笑了笑说：“我睡不着，找点活做总比干躺着强。”

“往天你怎么不这样呢？”

“往天……”大秦同志停了一下说，“往天同志们都在哈尔滨，现在你们就要到游击队去了，拿起武器……这样的战斗生活是使人羡慕的……我知道组织上没分配我去，是照顾我的身体。我身体不好，不能和你们一样给党做更多的工作。可是你们要走了，能让我多给你们做点事情，哪怕是很小的事情，我这心里也……”一阵咳嗽，使她说不下去了。

“看你，想这么多做什么！”我着急地说，“你在哈尔滨工作一样重要嘛！”

“我知道这个道理，可是从感情上我总想着游击队的生活。”

“那你就应该好好养病，病好了，组织上就会让你去了。”

“我这病……”大秦同志擦了一下头上的汗珠说，“就盼望能快好吧！”

“你得好好养啊，象现在这样怎行呢！……你快躺下吧！”说着，我就光着脚下了床，要去拿袜子。

大秦同志忙拦着我说：“你快躺下，小心着凉，我也马上就补完了。”



经她提醒,我才觉出屋里十分寒冷。壁炉里的火早已着尽了,窗上挂满了厚厚的霜花。

我忙穿上衣服,把我的被子又给大秦同志压在腿上。她不给我袜子,只好任她补下去。我忙着去点壁炉的火。

火点着了,水也烧上了。清晨的阳光斜照在窗上,霜花开始融化,屋里有了暖意。

大秦同志把袜子补完了,一共补了五双,叠得整整齐齐地交给我。

我原以为她只补了一两双,现在一见这样多,真有些愣住了。她几时补的?是否昨晚我睡下后她就偷偷地爬起来,彻夜未眠呢?我抬头望望她的眼睛,她那平日黑白分明的眼睛上已经挂上了红丝。我的亲密的战友和同志!你这样无微不至地照顾我,比亲姐姐对亲弟弟还亲,我将怎样回答你呢?我们是革命同志,我们之间不需要什么报答,我们所以这样亲密,只因为我们都是被一个远大的理想、被共同的命运联结在一起的。那么,我只有在今后的斗争中,努力为党工作;在战斗中多杀敌人,用胜利的捷报来回答你吧!

吃完早饭后,她要到医院去看病,我要送她去,她不肯,她郑重地对我说:

“省委指示你十二点钟以前到指定地点去,你在家收拾东西吧。不要误了去的时间。我争取在十一点钟以前回来,如果回不来,你就走吧。”

“你争取回来吧。”我一边送她往外走一边说。

外面,北风卷着马路上的浮雪,强劲地向人身上扑来。大秦同志艰难地走在铺满冰雪的路上。我真怕她跌倒,便叫了一辆人力车,扶她上了车。这次她没有阻拦,也没有说什么,只是紧蹙双眉,张着嘴喘着粗气……

人力车急速地跑起来，她走了！后来我才知道，她从这一天起病势转重了，肋膜生水，忍着疼痛到了医院，把肋膜水放出去才回来的。

大秦同志走后，我把东西都收拾妥当，把屋子也收拾得干干净净。十点多钟，我开始做面片，盼望她能早些回来，好一同吃。

十一点钟了，还不见她回来，面片已经下在锅里，锅里的水沸腾着，面片上下翻滚着，我的心也翻滚着：我想到医院里去看她，怕时间来不及，又怕走两岔去，只好等在这里。如果十一点半她再不回来，我只好走了。

十一点二十多分钟，大秦同志回来了。黄瘦的双颊，冻得发红。她见我还没走，就靠在门框上，一边喘着一边焦急地说：

“你怎么……还没走？快，快走吧！”

“好，我就走。”我扶她坐在床上，说：“你的病怎么样？医生是怎么说的？”

“不要紧。”她不肯多说病情，只催我快走。

我见时间不早了，便给她盛了一碗面片。她没吃，也没让我吃，只催我走。

我扛起行李，紧握着她的手说：“大秦，你要多保重，希望你不要向组织隐瞒病情，只有治好病，才能多给党做工作。”

她点点头，把头扭向一旁去。

我一转身，快步走出门去。

她没有送出来，我回头看了看，门儿关得紧紧的，风雪吹扫着门楣。同志，保重吧！如果你能战胜病魔，我们一定会在革命斗争的道路上，重新见面。那时，人民也可能是这个世界的主人了！

## 汤原路上

与大秦同志分别后的第二天清晨,我就和汤原县委组织部长老刘同志从哈尔滨出发了。

那时从哈尔滨到佳木斯还没有修通铁路,最方便的交通工具就是大汽车和小汽车。小汽车可以坐四个人,价钱高一些,但是比较清静,人不多,眼不杂,安全性大。因此,老刘同志决定坐小汽车走。他对这条路上的情况比较熟悉,我当然就听他的了。

我们在道外太古街找到了一辆小汽车,讲好了价钱,就坐上去了。我们只有两个人,需要再等两个座,才能开车。

这时天已大亮,太阳就要出来了。我望着东半天那变幻不定的彩云,心中止不住的高兴。从今天起,我即将迈入一个崭新的环境,和同志们战斗、生活在一起了!

我们在车上等了一会儿,来了两个人;前边的一个,穿着蓝缎子面的狐皮皮袄,外罩青色团花马褂(伪满初期,敌人规定蓝袍、青马褂为“国家礼服”);戴一顶土耳其式的黑帽子,长脸,面色黑灰,一嘴黑黄的板牙,向外龇着;围绕着两张厚嘴唇是一片青虚虚的胡子茬儿,面貌狰狞可憎!后边的一个,穿着青呢子棉大衣,围着白串绸围巾,也戴一顶土耳其帽子;棉大衣下边露半

截深蓝色的西装裤子，脚下是一双尖得出奇的漆皮鞋，鞋面上覆盖着一块当时正时兴的灰呢子“鞋盖儿”。天冷，大衣领子完全竖起来，脖子紧缩在里面，两只脚紧踩着碎步，大概冻得很难熬吧。他右胳膊还挟着一件水獭领子礼服呢的皮大衣，有皮大衣不穿穿棉的，显然这不是他的。

两个家伙走到车门前，后边的一个抢先一步拉开车门，于是“大板牙”（就是前边那一个，因不知其何许人也，姑且以面貌特征相称吧）就足未停步的昂然登上汽车，傲慢地坐在座位中间。另外一个也拱肩缩背地上来了，恭恭敬敬地把皮大衣披在“大板牙”那穿有狐皮皮袄的已经臃肿起来的身躯的外边，然后抱起瘦削的肩膀，挤在“大板牙”身旁坐下了。

小车不大，挤得满满的，我和司机坐在前边，旁边还挤了一个跟车的小伙子；老刘同志和后上来的两个家伙坐在后边。车门砰的一声关上，车子开始发动了。

这是两个什么人呢？后边的一个显然是跟班的，主要是这个“大板牙”。从他那相貌、穿戴，以及那目中无人的傲慢样子上看，决不是什么好东西，颇象一个小官僚政客。和这样家伙同坐在一个车上，真是件别扭事。

汽车的前窗上边，挂着一块长方形的小镜片，我从镜子里，可以看到后边几个人的上半身。我先注意看了一下老刘同志，他泰然自若地坐在那里，显得很安闲自在。老刘这种爱憎不形于色的自持能力，使我很佩服，如果派他在哈尔滨做地下工作，倒是一把好手呢。挨他坐着的“大板牙”，头仰靠在后座上，双目微闭着，不知为什么，在他那黑灰的面孔上，竟挂下两行泪珠来。他为什么这样伤心呢？我正在纳闷，忽见他张开大嘴，接连打两个哈欠，随着哈欠，泪珠又从眼角上滚下来。一清早，才上车，为什么这样困倦呢？莫非这是个瘾客……

车子开始上路了。但刚跑出不远，“大板牙”就把眼睛睁开了，向车外望了望，一扭脸，对他身旁那个跟班的说上话了。这是他上车以来第一次说话，他说的是什么话呢？我听不懂。我惊奇地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到耳朵上，聚精会神地听着，仍然听不懂。一直等到跟班的不断地答应“哈依”的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说的是日本话！这个“大板牙”并不是中国人，是一个穿着中国衣冠的日本人！日本强盗们！你们为什么要无耻地伪装成中国人呢？难道你们惧怕中国人民撕破你们那鬼脸皮吗？这个禽兽的本来面目一暴露，使我更感到别扭起来，才上车时的兴奋心情，被他给完全搅乱了。

我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车窗上边的小镜子，这时，我看见跟班的听完了“大板牙”的吩咐，就迅速地将身子往前探了探，一伸手拍着司机的肩膀说：

“把车停一下！”

“干什么？”司机没回头地问道。

“有要紧事。”跟班的狐假虎威地用命令的口吻说，“快停车！”

司机不大情愿地把车停下了。

跟班的忙把车门推开，请“大板牙”下了车。回头又对司机说道：

“车子先在这里等一下，我和‘参事官’办完事就回来。”说完，又回身看了看车号，才尾随着“大板牙”拐进一条街道里去。

司机对着他们的背影，赌气地咕噜了一句：“他妈的，真倒霉，拉两个鬼！”接着又对跟车的小伙子说，“去，跟着看看，干什么埋汰事去了，催他们快点回来。”

跟车的小伙子答应着跑去了。

我乘这个空，对老刘同志使了个眼色说：“咱们也下去走走

吧。”

老刘同志对我点了点头，又向司机打个招呼，我们就下了车。

我们并着肩走得离车远了一点，我悄声对老刘同志说：“真是好事多磨！怎么办？我实在不愿意和这种东西同车，咱们借口不能多等，换个车吧。”

老刘同志稍想了想说：“那不大好，突然换车容易引起人的疑心，司机也不能愿意。再说别的车也保不定都是好人……咱们不理他们，就这样凑付着坐吧。”稍停了一下他又说，“你没听那个二鬼子管他叫‘参事官’吗，他可能是哪个县城的，对咱们不会有什么妨碍，只要忍着点，不惹他们就行了。”

老刘同志的话是有道理的，我点头同意了。

我们不知不觉也顺着鬼子的去路走去。

正走着，那个跟车的小伙子从一所楼门里走出来了。我一看，原来是一所大烟馆！把这和“大板牙”那打哈欠泪涟涟的样子往起一联系，我不由得对迎面走来的小伙子脱口说道：

“啊！原来那两个家伙是干这个来啦！”

“可不是咋的。”小伙子一挤眼小声说道，“那个日本人抽的可厉害了，一个烟泡安上去，一口气都不缓，嗞嗞地就进去了，完了又安一个。我看没完了，就着急地催他，他一翻眼珠子说：‘什么乱七八糟的，进来看看的不要，外边的给。’那个二鬼子也跟我瞪着眼睛说：‘快出去，惹恼了参事官小心到方正县把你们扣起来！’我一看不行，别惹祸，参事官在县城里就是皇上，说啥是啥，咱车常跑这条线，惹不起，我赶忙出来了。”

“他们是到方正县的呀？”老刘同志问。

“嗯。”小伙子余怒未息地说，“到方正他们就滚蛋出沟了！”

我们忍不住乐了。方正离哈尔滨不算远，当天就可以到，但

愿他们能早些“滚蛋出沟”。

和小伙了一同回到车上。又等了好一会儿，老鬼子才和二鬼子回来。老鬼子抽了大烟，精神头足了，和二鬼子不断地说着什么。我再也不愿意看他们了，便扭头向车外望去。

午后，车到宾县，老鬼子领着二鬼子又走了。这回我们谁也没跟去看，让他喷云吐雾去吧，让那鸦片烟的毒汁，渗入他的膏肓，毒息他那侵略者的灵魂才好呢！

吃过午饭，又等了半天，他们才回来，车又继续开起来。

傍晚，车到方正，刚停下，老鬼子就急忙地下了车，领着二鬼子，踉踉跄跄地向前走去，看样子是瘾得难忍难熬了。

过去好象听谁说过日本人不抽大烟，事实证明，不但抽，而且还抽得很凶呢。侵略者所有的坏事都干尽了，怎能单丢下这件坏事不干呢。

在方正住了一夜。第二天清早，又往佳木斯前进了。这次车上换了两个商人模样的乘客，很客气。车上的空气顿觉不同，大家的心情舒畅起来。

车到佳木斯，我和老刘同志在东门外找个小旅馆住下。第二天清早，我们到了莲江口，在那里吃了早饭，然后直奔隔界河，去找区委书记张文俊同志。

## 汤原的反日会工作

汤原县是个土地肥沃,矿藏丰富的地方。盛产大豆、麻等经济作物;附近有黑金河等著名金矿,鹤立岗煤矿也在汤原县界内,有单独通往莲江口的小火车,从莲江口再将货物装船,运往哈尔滨等大城市。

汤原县的工作是于一九三二年,由冯仲云同志开辟起来的。冯仲云同志做了许多艰苦而又细致的工作。开始由几个同志组成了县委,以后又有了区委,工作开展得很快,人民的抗日热情很高,居民的成分也很好,除了农民之外,还有很多金矿工人和煤矿工人,省委一直很重视这里的工作。

我来到后,就暂住在隔界河区委书记张文俊同志家里。

张文俊同志是位忠厚的农民。原先家住抚顺,因迫于贫困和饥饿,流落到汤原。从小受苦,家里几辈子没有土地。艰难困苦的生活,练就了他坚毅不拔的性格。张文俊同志要干什么事情,就一定要干到底,百折不回。从他认清革命,参加党那一天起,就以这种精神为党工作。

我住在他家,是以叔伯弟兄身分出现的。我化名叫张文林,是抚顺人,从老家来看他父亲。

按省委指示,我参加了县委会的工作。经县委会讨论,决定



由我和老宋同志两个人负责领导全县的反日会工作。

老宋同志是木工工人出身，所以大家都管他叫宋木匠。从冯仲云同志在汤原一开辟工作的时候起，他就参加了党，他和夏云阶同志在一起，夺过地主武装的枪支，缴过“大排”<sup>(注)</sup>的械，是一名能干的同志。他原先就负责反日会的工作，情况摸得很熟。所以当县委会决定由我负责搞反日会工作的时候，我就提议把老宋同志留下，和我共同负责，县委会同意了我的意见。

反日会是个发动群众的工作，这和我未来汤原前，想到游击队去拿枪杆子，直接参加武装斗争的愿望是有距离的。而且它基本上也还是属于地下工作的性质。虽然这里的敌我形势和哈尔滨迥然不同，是游击区，党在这里的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红军游击队非常受老百姓的拥护，但是政权还是操在敌人手中。日伪军队还常在这里出没；便衣特务也常露踪迹；地主武装比比皆是，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在这种环境中工作，仍然要隐蔽自己，不能象我从前所幻想的那样：和同志们并肩作战……战斗、生活、学习在革命的大家庭中。所以开始时我的思想是不大通的，但是当我想到发动群众支援抗日游击队的重大意义时，我便积极地、自觉地投入了这一工作。

我和老宋同志研究了反日会的整个工作情况，发现群众发动得还不够广泛，工作做得还不够深入，会员还只限于少数人。有的基本群众，对日寇、地主有仇恨，但却没有很好地做他们的工作。我们认为：必须根据当地群众的抗日热情，用适当的方式和方法，把他们发动起来，使更多的人站到抗日和革命的旗帜下来。经我们研究后提出：用秘密募捐的办法，发动群众捐款

---

(注) 大排：又名为保卫团，地主武装的一种组织形式。大排上的兵，完全脱离生产，受一定的训练，每月吃饷钱。经费由当地集资负担，受地主阶级支配，保护地主。

慰问红军游击队。我们的目的并不在“款”上，而在于通过捐款的形式，使积极的群众有机会表现自己的抗日行动；使消极的群众意识到抗日救国人人有责，从而逐渐地积极起来。

我们的办法，得到了县委会的批准和支持。于是我们就印了募捐册，发动和布置会员，使他们和我们一道，去发动群众捐款。我们预先规定好，对于那些热心于抗日救国的贫苦的工人、农民，一定要控制他们的捐款数目，最多不得超过一角钱，不要因捐款使他们的生活更陷于困境。要和他们讲清楚，一分钱、两分钱也好，主要是表达自己的心意。

募捐册是油印的小本，一本十页，每页有副卷，作为收据交给捐款的群众。小本的封里上，印了一首快板诗，说明募捐的意义。诗为：

日本强盗太凶残，占我家乡吞我田。  
国破家亡不能忍，血债要用血来还！  
为国为民共产党，领导大家齐抗战。  
组织抗日游击队，人民群众来支援；  
冬送棉衣夏送单，过年过节把款捐。  
捐款不为钱财重，抗日救国表心愿。

恰当的工作方法和形式，往往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我们的募捐活动，在几天之内就暗暗地，但却是迅速地、蓬勃地开展起来了。它象无数条地下的洪流，悄然地冲激着人们的心灵，使人们紧张地活动起来了！每到日落黄昏以后，就有一些人怀揣着募捐册子，出东家入西户，到处奔走，募捐活动已经形成了一个群众性的抗日运动；有的从前不够积极的群众，这次积极起来了，不但自己捐了款，还自动去劝说落后于他们的群众；有的本来吃穿都成问题，却想方设法要多凑一些钱；有的不但家长一个人捐了，家里的姑娘、媳妇也把自己薅苗拔草攒下的小份子钱

拿出来写上了募捐册。对这样积极而又非常困苦的群众，我们都去找他们个别谈话，一方面鼓励他们的抗日救国热情；一方面劝他们把钱收回去。对他们来说，一分钱就是一滴血汗。但是他们却不肯。

在这个时期内，我为了便于领导募捐运动，和更进一步地发动群众，吸收会员，便暂时离开了张文俊同志的家，化装成农民，在太平川及二道岗一带活动。住处也不定，有时住在太平川西头，有时住在二道岗孙老五家里。总之是到处有群众掩护，工作得很顺利，我和群众的关系一天比一天亲近起来，新的会员也一天比一天增多起来。反日会的工作大踏步前进了！

在会员当中，有一个老高头，是个贫农。老两口子都五、六十岁了，却没儿没女，日子过得又冷清又困苦。但是他抗日的劲头却很高，对地主也很仇恨，是一个有觉悟的基本群众。我常到他家去，有时也住在他那里，老两口子对我非常好，真象对自己的亲人一样。如果逢我不在太平川的时候他家蒸了粘干粮，一定要给我留一些，有时都留得棒硬了，自己也舍不得吃掉。

春节，我是回到隔界河张文俊同志家过的。初二、三刚一过，我就到太平川去给会员和积极分子拜年，并谈一些工作上的问题。

到了老高头家里，一进门，我看老头正在给灶王爷烧香呢。使我奇怪的是他供的灶王爷不是印现成的，而是用红纸写的。红纸上边剪成一个三角形的尖，歪歪扭扭地写着：供奉灶君之位。当时印现成的灶王爷很便宜，一两分钱就可以买一张，他为什么不买张现成的呢？

老高头看见我来了，忙把香插上就往屋里拉我。我按照群众的风俗习惯，给他拜年，问好，就随他进了屋。

老婆婆看见我来了也很高兴，老两口说什么也不放我走，把

我帽子藏起来，定要我留下喝年酒。盛情难却，我只好留下。

老婆婆炒了一盘粉条，一盘木耳，熬了一碗酸菜，里面还有几片白肉，烫了一壶白酒，非常尊贵地端上来了。这样的酒菜，对当时的穷苦农民来说，已经非常难得了，真是一年也吃不上一两次的。

我本不能喝酒，只是陪老头沾一沾嘴唇。老头酒一进肚，话就多起来。我乘机就问他为什么不“请”（买）张灶王爷，偏要费事求人家写呢？

老头一听我问起这事，当时把眼睛一瞪，把酒壶用力往桌上一墩，说：

“请灶王爷？我得上哪‘请’去？”老头见我不答话，就自问自答地说，“得上老耿家开的小铺请去！老耿家你知道吧？”

我点点头说：“我知道。”

我怎能不知道呢，老耿家是这一带最大的恶霸地主。不但土地连成片，佃户数不清，还开着“耿家油房”、“耿家烧锅”（即造酒厂），就地用低廉的价格搜刮来农民的原料，榨成油、烧成酒卖出去。这还嫌不够，连卖日用杂货的小铺他也开设一个。他的小铺一开张，所有附近小本经营的小铺就都被挤黄了，于是他的小铺就成了这一带的独占资本。群众想买任何微小物品，也得到“耿家小铺”去，他要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否则就得跑到几十里以外的地方才能买到。老耿家对群众的剥削非常厉害，更严重的是他在政治上也非常反动，日本侵略者一来，他家就卖身投靠当了汉奸。日、伪军队一到太平川，就住在他家，他们就杀猪宰羊的招待。一九三四年，日本人没收了民间的枪支，但对老耿家等少数汉奸地主却特别优待，收完了又如数发回去。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老耿家和日本人勾结到什么程度。对这样万人共恨的恶霸地主，我们党早就加以注意了，我们的游击队也曾想

给他以狠狠地打击。但是因为他家戒备森严，武器甚多，地势又好，住在一个王八盖子形的高岗上，修筑着高大的院墙，院墙下挖着数丈宽的护墙壕，四角有坚固的炮台，简直就和一座小城堡一样。要想拔除它，需要有很猛烈的炮火，还得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以游击队暂时没有动它。但是对他家的各方面情况，我们始终密切注意的，以便在条件成熟时，广泛发动群众，一举攻下。这时我一听老高头谈到老耿家，就有意识地抓住这个话题，使他多谈一些情况，于是我又问：

“老耿家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没到太平川我就听说有这么个耿老疙瘩……”

老高头听我提起耿老疙瘩，气得一拍大腿说：“耿老疙瘩那简直是坟圈子的狗崽子——吃人肉长大的，生来就是十大恶的底子，太平川的老少没一个不恨他的！他没事就往小铺里一坐，专出坏主意：往秤砣里灌铅，油葫芦里塞秫秸棒，想法少给你东西。有一回我去打油，油葫芦还咕噜咕噜响着，就拔出来了。我刚探头要看看满没满，他一翻手就倒‘油漏子’里去了。你说，这叫开的什么买卖？简直和‘红胡子’差不多！”

“你老不会问问他，为啥不等油灌满就倒？”

“哼，不问还好，一问他不卖给你了，他就有这个拿手！这回我去‘请’灶王爷不就是这么回事。”

“你老已经去‘请’过了吗？”我放下筷子问。

“去过了。”老高头又喝了一口酒说，“你知道，年前我忙着会上募捐的事儿，再加上钱紧，就没有到城里去打年纸。腊月二十八那天，老伴催我，说眼看就到年三十了，香纸没买，灶王没请，怎么过年哪？我一听也着急了，怎么办哪？离年傍近的，只好上耿家小铺买去吧。

“到了那里，正碰见那个狗崽子耿老疙瘩坐在柜台里，我就

问他：

“线香多少钱一支儿(一束)啊？”

“他那母狗眼一眨巴说：‘五毛钱。’

“‘那么贵！’我可真吓了一跳，一支儿线香在街上有毛半钱撑死了，可他一张嘴就是五毛。简直是讹人哪！我真想问问他，这是做买卖还是勒大脖子呢？可是我又一想快过年了，惹气干什么呢，咱们不烧他这份高香到头了呗。可是灶王不能不‘请’啊！我就又指着灶王问他：

“‘灶王爷多少钱一张啊？’

“他把眼皮一翻愣说：‘一元钱。’

“‘啥？多少钱？’我寻思听错了，一张灶王爷哪能卖一元钱呢，就又问了一句。

“‘一元钱一张。’他把脖子往前一伸，又把两只手都张开说，‘十个一毛，懂了吧？’

“这可真把我整愣住了，半天我才说：‘你这是不是跟我说着玩呢？一元钱能买那么一捆子。’

“‘一捆子？’他象夜猫子似的笑了两声说，‘岂止一捆子呢，能买两捆子！可那是我买，现在是我卖。我就卖一元钱一张，你乐意买不买！’

“‘那我也请不起呀。’

“‘那就不供，少一个子也不行。’他又翻了翻母狗眼睛说：‘你请不起我可能烧起，你看我烧一个给你看看。’

“说着，他回手从柜台上就抽出挺厚一打子灶王爷来，划根洋火就点着了。这个狗崽子，简直是拿咱们穷人逗乐子呢！我一咬牙说：

“‘你烧吧，都烧着了才好呢！’说完，我转身就走了。

“回到家里，气得我饭也没吃，到东头老赵家求他们学生给

写了一张，又向人匀了半支儿线香，这才凑付着把灶王爷供上了。”

从老高头的叙述当中，我进一步看到了这个恶霸地主的狰狞面孔，这简直是农民的死对头！他吃着农民，喝着农民，用农民的血汗养肥了自己，反过头来却拿农民的贫困来寻开心，这真是残酷得没有一点儿人味！这样的剥削阶级如不彻底消灭掉，世界是永远不会好起来的！想到这里，我便对还在愤愤不已的老高头说：

“你老不必生气了，对这样豺狼成性的恶霸地主，我们不能拿他当人看。早晚总有一天，我们会象捏臭虫一样把他们捏住，让他们知道，穷人的血不是任凭他们白喝的。”

“要有那么一天，我先捏住他的脖子，问问他灶王爷到底多少钱一张？”

“对，要问他为什么对穷人剥削得那么狠毒……不过那一天不会自己到来，得靠我们自己。只要我们所有的穷人都团结起来，齐心合力，就一定能打倒他！”

老高头瞪着眼睛看着我，半天，用力地向我点点头，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 十 三 条 枪

反日会的工作在县委的直接领导下，深入地开展起来以后，我们党和红军游击队在群众当中的威望更高了，地位更加巩固了！

这时，我们的游击队已经发展到三百多人，是清一色的骑兵队伍。经费充足，弹药也多，有时候，夏云阶同志就率领这支队伍，从太平川横穿过去。队伍打着大红旗，吹着小马号，夏云阶同志穿着青衣服，骑着大青色马，人高马大，走在最前面，非常威武。

太平川有个伪警察署，每当我们的“小马号”在远处一响，红旗在村口一出现的时候，伪警察署就吓得双门紧闭。直等到我们的队伍过去好远，才敢慢慢地打开门。

和这情形恰恰相反的是那些穷苦的农民们，只要我们的队伍一到，他们的门就大敞开了，人们欢呼着涌到街心上来：首先是小孩们迎着红旗跑去；妇女们端着水，拿着干粮，走到队伍的旁边；老人们也嘻开嘴巴，向队伍不断地点着头；青年农民们亲切地和战士们搭着话。队伍和群众，霎时间合成了一片。这一切，正和那紧闭双门的伪警察署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们的队伍这样公开穿行于村镇之间，不但增强了老乡们



的抗日信心，鼓舞了他们的斗志，而且对敌人也起到了示威作用，使他们震慑于红军的威力，不敢为所欲为。事实也正是这样，那些伪警察在这一带，真象夹尾巴狗一样，溜着墙边走。至于特务，更象老鼠一样，只能在阴暗的角落里活动。政权虽在他们手里，但他们并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

这样一个振奋人心的局面的获得，并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本来冯仲云同志在汤原开辟工作的时候就注意了掌握武装问题，但因当时党、团的组织才建立起来，条件还不成熟，所以当冯仲云同志走时，就按省委的指示，把这个问题作为首要任务，交给了夏云阶同志。

这是一个非常艰巨而又危险的任务，所有的武器当时完全掌握在敌人手里，我们连一条枪也没有。这就规定：我们必须从敌人手中夺过武器，武装自己。

鸭蛋河村住有一撮地主武装“大排”，这个“大排”是新成立起来的，有十三条新枪。“大排”的成员也比较复杂，多半是当地的地痞流氓、无赖赌棍。这些东西拿起了枪杆子以后，更加耀武扬威，为非作歹。当地群众对他们异常愤恨。

鸭蛋河是一个汉、朝两族人民杂居的村子，其中朝鲜族占一部分。他们绝大多数人的日子过得极贫苦，经常缺吃少穿。而那些由汉族组织起来的“大排”兵，对他们又特别歧视，欺压得很厉害。再加上他们对日寇都怀着深重的亡国仇恨，这样，便在他们内心深处蕴藏着一股强烈的抗日情绪，如果把这股情绪发动起来，就会化为一种巨大的行动力量。

在鸭蛋河，也已发展了一些反日会员。党的组织也建立起来，其中汉、朝两族的党员都有。和我共同负责反日会工作的老宋（木匠）同志的三个外甥，陈家弟兄就是住在这里的党员。

县委当时研究了鸭蛋河敌我双方的情况，认为只要我们拿

出合适的办法来,就一定能狠狠地打击敌人,并用他们的武器武装自己。当时决定,由夏云阶同志负责,一方面充分发动鸭蛋河的群众,另一方面要想出既能夺取敌人枪支又不使群众受损失的巧妙办法。

这时正是春节刚过,人们都闲下来无事,这就给发动群众的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们东家进去西家出来,一点也不引人注目。群众很快地就发动起来了,大家情绪很高,纷纷献策献计,表示决心。

集中了群众的意见,经研究后决定:在旧历正月十六那一天,由村内的朝鲜族居民出面,请全体“大排”兵及几个主要地主吃饭,名为“会年茶”。理由是:感谢“大排”保护丰收;感谢地主给地种。这理由简直是讽刺意味十足,但在当时那些地主及其走狗们听起来,竟是十分受用,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

又决定:就在酒席宴前,动手夺“大排”的武装,并处理地主及“大排”兵。

这时最感困难的问题还是我们没有一支枪,虽然群众的劲头很大,甚至主张拿上几把菜刀就动手,但是夏云阶同志感到这样做把握不大,弄不好群众会有很大伤亡,应该想法先弄到一点武器,哪怕就是一支土枪也好。

经多方寻觅的结果,老宋同志和一个小“缙子”头联系上了。这个小“缙子”头报号阎老五,原是老宋同志从前的朋友,“九一八”事变后,被日寇“逼上梁山”,现正领一伙人在这一带活动。他们对贫苦的农民还比较和气,主要是抢劫地主富农及绑他们的“票”。自从鸭蛋河成立了“大排”以后,他们受到了限制和威胁,所以也有心吃掉“大排”,但因人数少势孤,未能动手。

老宋同志把这一情况向夏云阶同志汇报了。夏云阶同志认为从当前条件来看,也只有从他们那里才能得到枪支。这虽不是

上策，也是可行的权宜之计。于是让老宋同志和他们正式谈条件。

条件很快就谈妥了：他们借给我们三支装满子弹的匣枪，一切都由我们自己动手。事成之后，把枪还给他们。所缴获的“大排”枪支都归我们，他们只要几个地主。

条件对我们是有利的，我们主要的目的是夺得武器，地主归他们处理，也会解群众心头之恨。

枪支有了，一切都定下来了，就着手做进一步的准备工作。我们预计：夺得武器以后，除去党、团员及积极分子要拿起武器成为游击队员之外，对几家出头“请客”的朝鲜族同志的家属也必须进行妥善安排。否则定会受到迫害。

经和朝鲜族同志研究的结果，他们都愿意全家参加游击队，打日本鬼子。于是我们就在山里密林深处，挖了几个“地窖”，秘密地、陆续地运进去一些必要的粮食、家具、被褥等。

正月十六一天一天地迫近了，朝鲜族同志已经把“客”请妥。地点就设在“大排”的屋子里，这样我们就可以一网打尽，免得再费周折。

为了我们能多进去几个人，在前一天做了比较详细地安排和分工：所有厨子、端方盘的，都用的是自己人。老宋同志会做几样毛菜，就当了掌勺的。陈家三兄弟端方盘、打杂。朝鲜族同志分头“陪客”。夏云阶同志不能在敌人面前公开露面，除在暗中指挥外，并率领一些进不去的同志，悄悄地埋伏在外边，以便接应。对小“绉子”头阎老五也预先下了通知，到时候来领地主。

一切都在悄悄地、秘密地进行着，人们在激动地准备着、等待着。

这一年的正月十六天气特别冷，灰暗的天空下飘着轻雪，所有的树枝上都挂满了“树挂”，小鸡冻得翘起一只脚来，猫儿冻得

直往灶火坑里钻。往年过年过节遇见这样天气，人们就不大出屋，都坐在热炕头上寻消遣。今年情况可就大不相同，人们都早早地起来，把所有过年留下的猪肉都集中起来，蔬菜也集中起来，由几个朝鲜族同志送进大排院里。

老宋同志领着陈氏兄弟三人也早早地进去了。

“大排”住在一座草把子垒的黄土院套里，门口有一个拿枪的哨兵，正面五间瓦房，当中是堂屋地，东西四间屋子住人。厨房在东厢房里。院子的西南角还有一个马棚，里面拴着四、五匹马。

临近晌午，陈氏弟兄借口碟子不够，出来一次，找到了夏云阶同志，向他汇报了情况。夏云阶同志作了最后布置：三支匣枪，由陈氏弟兄三人分别带在身上，酒席分别摆在大房东西两屋，陪客的朝鲜族同志身上暗带绳索，准备捆绑地主。酒喝到中间，由老宋同志指挥动手。

一切都布置妥当，陈氏弟兄把匣枪掖在棉衣里边，回到“大排”院里。

“大排”的五间上房里已经开始热闹起来了，几个被“请”来的大地主，已经身着长袍马褂进了上房，作为主人的朝鲜族同志正在招待他们。今天的朝鲜族同志来得比较多，除了几个留着胡子的德高望重的老人之外，都是二三十岁的青壮年，他们借口要陪“大排”里的老总喝几杯，都以主人的身分进来了。

坐席的大圆桌面已经分东西屋摆好，每边两张，共合四张桌，每张八个人，可坐三十多人，除了四、五个地主，十几个“大排”兵之外，都是“陪客”的朝鲜族同志。

老宋同志借着往桌上摆碗筷的机会，又进去观察了一下：几个地主都坐在东屋喝茶水，由几位朝鲜族老人陪着；“大排”兵和朝鲜族青年同志都聚在西屋。

崭新的大枪分挂在东西屋炕里的墙壁上，东屋挂了六支，西

屋也挂了六支，有一根钉子空着，老宋同志知道这支枪是在门口岗哨手中。根据挂枪的位置，老宋同志又乘机把两个朝鲜族党员调出去，作了简短的布置。

晌午已过，酒席已摆好，地主、“大排”兵以及朝鲜族陪客已分别入座。宴会开始了！

按预先规定：朝鲜族同志都分桌穿插于敌人中间，他们多数素有酒量，这次又特别挑了几个酒量大的在酒席宴前有经验的活跃人物，分插在各桌上。因此，酒席才一开始，东西两屋就一齐热闹起来：劝酒声、划拳声、椅凳挪动声此起彼伏。陈家弟兄中的老二、老三的方盘端得也轻捷利落，陈老大提着一把装酒的铁水壶，各桌添酒。他们每回厨房一次，就悄悄地研究一次上屋的情况。厨房已经变成了司令部，原有“大排”上的一个做饭的，已经劝他坐席去了，留下的都是自己人。

“已经喝得差不多了，动手吧！”陈老大提着酒壶一步跨进来，悄声而急促地说。

“有没有喝醉的？”老宋同志问。

“有几个已经迷糊了，有两个说话舌头已经不听使唤了。”

“好，时机到了，马上准备动手！”老宋同志又嘱咐陈老大道，“你去解决岗哨的时候，一定要和外面埋伏的同志呼应起来，不要把他弄死，不要响枪，免得惊动敌人。岗哨解决完了，留下几个人守住大门，然后率领其余的人进屋接应！”

陈老大默默地、紧紧地点头。

老宋同志又环视了一下陈氏弟兄说：“一切都按照夏云阶同志原来的指示进行！同志们，赶快行动吧！”

同志们刷一下分开了，陈氏弟兄拔出枪来，推上顶门子，拉起机头。陈老二、陈老三把枪轻轻地放进方盘里，上面又盖上一块方盘（每次端菜都如此，因外面天冷，下雪，上盖方盘可以保

温、防雪)。陈老大仍把枪插在棉袄里面。老宋同志又郑重地扫视了大家一眼,然后向陈家弟兄一点头,轻轻地说声:“走!”

陈二、陈三手托着方盘先出去了。随后,老宋同志也来到院中。最后出来的是陈老大,他一只手伸进怀中,直奔院门而去。

这时,东西两屋的酒正喝到兴头上。那些开始还端然正坐,拿着身分的地主们,这时也不端架子了,说话也不择词句了,什么姿势都有,什么词句都出来了;“大排”兵的划拳声已经没有人味了,他们红着眼睛,直着嗓子象野兽一样嘶叫。有两个兵正按着一个兵往嘴里灌酒……满屋酒臭气,满屋怪叫声,一片混乱。

陈氏两弟兄轻捷地走进堂屋地,相对着互相鼓励地点了点头,迅速地分头走入东西两屋。

东屋里一个“大排”兵正用手往嘴里抓菜吃,一抬头见陈二又端着盘子进来,就咧开贪吃的大嘴问道:

“这……又,又是啥菜?……菜,真多呀!”

陈二把方盘往怀中一顺,大声说:“好菜,你吃吧……”

陈二话音未住,两块方盘“叭”的一声同时落地,拿在他手中的是一支乌黑铮亮竖起机头的匣枪,枪口对准屋内的人。

陈二当门而站,二目圆睁,大喝一声:“不许动!”

与此同时,两个朝鲜族青年同志一纵身跳上炕,也大声喝道:“不许动!”

这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屋里的人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直着划拳划哑了的嗓子问:

“这,这干什么?”

有两个“大排”兵已觉出不妙,借着酒劲,猛往炕上跳去,要去取枪。却被站在炕沿上的两个朝鲜族同志,猛力一脚,象踢足球一样,从北炕一下踢到南墙根去了。

“不许乱动,谁动打死谁!举手!”

老宋同志出现在门口了。他的声音,真比一颗炸弹还有力量,敌人都被镇住了;地主们筛糠一样的颤抖着,有一个已经站立不住,软瘫在椅子上;有一个干张嘴说不出话来;“大排”兵们洒也吓醒了一大半,哆哆嗦嗦地举起手来,有两个偷偷地往后退,被两个朝鲜族同志,一人一拳,打得手立刻举起来。

“转身,背过脸去,都上墙角去!”老宋同志又大声喝道。

敌人们转过身去,举着手向墙角挪去。有两个地主,干晃迈不动步,被朝鲜族同志从后边一推,立刻趴在地下,紧跟着又挨了两脚,于是就象狗一样,四腿落地爬到墙角去了。

“上绑!”

老宋同志命令一出,朝鲜族同志立刻拿出绳子,挨个捆绑起来。

老宋同志又回头向西屋喊道:“西屋怎么样了?”

从西屋传来陈老三的声音:“也正在上绑!”

“好!”老宋同志说,“我出去看看。”

老宋同志正要向外走,忽然传来一阵嘈杂的人声和脚步声。老宋同志站在堂屋地向外一望,只见夏云阶同志大踏步走在前面,陈大提着匣枪紧紧跟随,后面是一群手拿棍棒及杂乱铁器的老乡们。

“夏云阶同志,一切顺利,我们已经胜利了!”

随着老宋同志的报告声,群众中爆发了一片欢呼声。

夏云阶同志急步走入屋内,迅速地扫视一下说:“陈家兄弟,拿枪看紧敌人!”又回过身去说,“已经报名参加游击队的同志,到炕上去取枪!”

夏云阶同志的话音还未落,就有一些年轻小伙子跳上炕去,摘下枪来。人多枪少,有的晚到一步没有拿到,有的两人同时抓到一条枪,谁也不肯放手。

夏云阶同志见此情形忙喊道：“同志们，不要争，两人同时拿到一支枪的，年纪轻的先让给年纪大的，将来要重新安排！”

两个屋，十二支枪（有一支是岗哨的，夺得后，交在门外我们的岗哨手中），同时都握在我们同志们的手中了！我们获得武器了！

这时，夏云阶同志又布置人去请小“缙子”头阎老五；门口又增添了两个岗哨。同时，将“大排”兵都捆绑着押到东厢房去；地主都押到西屋去。群众涌进了东屋。

有的群众提出要惩治两个恶霸地主和几个无恶不作的“大排”兵。

夏云阶同志针对群众的要求，向群众作了答复和解释；对地主，因为已和小“缙子”头讲好了条件，不能失信，必须交出去。不过可以把群众的要求告诉他们，一定不要轻易放过那两个恶霸地主；对“大排”兵，想一律教育释放，向他们说清，如果今后不改过自新，作个好老百姓，还敢帮助日寇和地主为非作歹，游击队一定不会轻易饶过他们。夏云阶同志说明了这样做的好处，主要是在于今后不使别处“大排”闻风成为我们的死敌，给他们留条缴械不杀的活路，对我们以后争取“大排”的工作有好处。

夏云阶同志说服了群众。

接着夏云阶同志布置全家参加游击队的同志和家属先奔密林深处的“地窖”，派六支枪护送。

一切计划都顺利地实现了：小“缙子”头阎老五领人来把地主牵走了，借的枪送还了他们。由夏云阶同志向“大排”兵讲了话，他们也下了保证，今后一定做好老百姓，决不为非作歹。夏云阶同志命人把他们锁在东厢房里，候他们的亲人来了后，再放他们出来。

“大排”马棚里的马被牵出来了。刚被武装起来的游击队新



队员们集合了；七支枪在前边，后边还有一些拿着棍棒的同志们。

夏云阶同志领着同志们向老乡们一一告别，直奔密林而去！

一支崭新的由我们党所领导的抗日队伍——汤原游击队从此诞生了！

## 成 长 壮 大

游击队诞生了。游击队中的战士多半是党、团员和最受压迫的基本群众。他们抗日和革命的决心非常大，作战杀敌的要求也非常迫切。每天练习枪法，学习作战。但是摆在他们面前最大的问题还是枪支太少，有一多半还是没有枪的战士，虽然在游击队诞生不久后就捉到了几个便衣特务，缴获了几支短枪，但大枪仍然是那十三支。必须迅速壮大我们的武装力量，必须使没有枪的战士都在最短时间内扛起枪来，这样才能在未来的战斗中狠狠地打击敌人！

但是自从我们缴了鸭蛋河“大排”的械以后，附近其他“大排”都加强了警戒，轻易不好下手了。而“大排”又是我们在当时能够获得武器的最好对象，他们不但战斗力差，人数也比较少。舍掉他们，别的办法都不能使我们迅速地获得枪支。这时，有的同志也曾提出和“大排”硬干，或者黑夜进行偷袭。但夏云阶同志认为队伍新成立，枪支也太少，硬干或偷袭都易遭受损失，不如仍然想法智取。

夏云阶同志派出一些机智的同志四出侦察，找线索，找弱点，找对象。

当时团县委书记小于同志的姐姐家住在鹤立岗的东二堡，

通过她，我们了解到下面的一些情况：

东二堡的“大排”队有十几支枪，队长由一个推大烟的地主子弟担任。在他的指使下，“大排”大批贩运大烟土。把大批烟土从佳木斯廉价运来，再分斤论两的抛售出去。这是一个既效忠于地主阶级又毒害人民的毒窟。

夏云阶同志和团县委书记小于等同志在一起详细地研究了 这个“大排”的情况。从小于同志口中，知道他们防备的也很严，在一般情况下，生人不许走进“大排”的院子，烟土也不卖给生人，除非有可靠的熟人引见，才能接近他们。这恐怕也是因为作贼心虚的缘故吧。

上面的情况，就确定我们的斗争策略必须通过东二堡的当地群众，利用他们的关系来接近“大排”。

小于同志自己提出去做他姐姐和姐夫的工作，通过他姐夫再争取一两个和大排有来往的群众，待机下手。小于的姐夫是个老实人，在东二堡的人缘很好。夏云阶同志同意了他的意见。

几天后，小于同志来汇报说：他姐夫、姐姐都同意了。据他姐夫说，他曾经给“大排”干过零活，和“大排”上的人都熟悉。为了更有把握，他姐夫又和一个绰号叫“徐镬头”的农民串联好了。“徐镬头”有个叔伯内弟在“大排”里当兵，他自己和“大排”也有来往。他们几个都愿意在事成之后，参加游击队打鬼子。

于是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由小于同志的姐姐、姐夫、“徐镬头”三人带两支短枪先进去。他们进去后，由游击队解除岗哨的枪支，然后进去打接应。

小于同志由游击队里拿走两支短枪交给他姐夫和“徐镬头”，日期也约定好了，静待行事。

在一个傍晚，晚霞虽已隐退，夜幕尚未拉起。夏云阶同志率领着一小队持枪的游击队员，从丛林深处，迂回着靠拢了东二堡

的“大排”院落。他们在树林里又等了片刻，夏云阶同志见约定的时间已到，便命游击队员暂在原地等候，自己领着陈老大身藏短枪，走出树林，往“大排”院门方向绕去。

按预先约定：在一座小土地庙前边，他们看见了小于同志。夏云阶同志向小于同志点了点头，小于同志便知游击队员已到，转身向树林走去。

夏云阶同志和陈老大绕至“大排”门前，隐身在一堵墙角处。向“大排”门口望去。那里站着一个持枪的“大排”兵，象木头碾子似地不动弹。夏云阶同志向陈老大暗示了一下，陈老大点点头向“大排”兵的背后绕去。

隔不多久，从远处走来二男一女。走到“大排”院落门前，和岗哨点了点头，又说了几句什么，便走进院中去了。

夏云阶同志见时机已到，便从隐蔽的墙角处走出来，直向“大排”岗哨走去。走至近前，向岗哨点点头说：

“老总，借问一下，这里有位姓王的弟兄没有？”

岗哨把枪一横，上下打量夏云阶同志一眼，瞪目问道：

“哪个姓王的？你是哪的？”

“我从佳木斯来，我这有一封信，求你交给王老总。”边说边将手探进怀中，握紧短枪。

正这时，陈老大已经从岗哨背后摸上来了。他将短枪一下触在岗哨背后，低声而严厉地命令道：“不要动！”

岗哨一哆嗦之间，夏云阶同志的枪已经从怀中嗖地拔出来了，枪口对准岗哨前胸，低声喝道：“不许说话，把枪放下！”

岗哨象发疟子一样哆嗦着，枪仍在手中横握着。

夏云阶同志一伸手将枪夺下，命令陈老大道：“捆上！”

正这时，小于同志也从远处跑来。

夏云阶同志忙又对陈老大说：“把这个家伙交给小于，你快

去领弟兄们，跑步来！”

陈老大答应一声跑去。小于同志动手捆岗哨。

夏云阶同志隐住身影向院里望去。正见小于的姐姐从房门内急步走出来，夏云阶同志猜到屋内已经得手，便闪身走出来。小于姐姐一见，忙向夏云阶同志招手。夏云阶同志回身对小于同志轻声说：

“捆好后拴在门后，你先拿他的枪在门口放哨，迎接同志们！”说完，跑步向院中走去。

夏云阶同志一进“大排”的屋门，只见“大排”兵横三竖四地趴满地，“徐镛头”和小于姐夫一个站在炕上，一个站在枪架子前，握紧短枪，虎视眈眈地对准地下这群绵羊一样的“大排”兵。一个靠近门口的兵，听见有脚步声，偷偷地抬起头来，想要看一眼，被夏云阶同志一脚踩在脑袋上，厉声喝道：

“谁也不许动，不许抬头，老老实实地听话，不会要你们的命。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游击队，我们的队伍已经来了，谁敢反抗，当场枪毙！”接着，夏云阶同志就向他们讲了我们的政策，指明他们贩毒对人民的危害，告诫他们以后必须做好人，否则游击队决不会再饶过他们。

夏云阶同志利用等候同志们的机会，向他们讲了这些话。

陈老大率领着同志们很快地闯进来了，“大排”兵迅速地被捆绑起来。

这时天色已黑，夏云阶同志命令将“大排”全部看管起来。大门口加双岗，站岗的同志换上“大排”兵的衣服，有人来只许放进看起来，不许放出。游击队的同志就在这里吃晚饭。

小于同志被从门岗上换进来了。夏云阶同志当众表扬了小于姐弟、姐夫和“徐镛头”等同志的英勇行为，并宣布吸收小于姐夫、姐姐全家参加游击队。

游击队同志从“大排”屋内翻出半桶大烟土和三百多元现款。夏云阶同志命令将烟土倒入灶火坑内烧掉了；现款交给县委，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当繁星点点，月照当空的时候，游击队的同志扛着新缴获的武器，怀着胜利的喜悦，向森林里走去。

自从红军游击队两次智取“大排”以后，得到长短枪三十余支，游击队已经巩固地建立起来了！同志们的求战心很迫切，士气特别高。夏云阶同志根据同志们的旺盛情绪，和已经形成的战斗力量，乘胜又突袭了几次“大排”，每次都获得全胜，很快，游击队的人数就发展到一百多。这种席卷“大排”的猛烈形势，震动了汤原城内的日伪警备队，他们调动军队，几次出击，妄图消灭我们。结果他们不仅没得到便宜，反而被我们几次伏击，打得丢盔卸甲；我们的队伍加强了，手中不但有了许多条长短枪，而且得到了机关枪。

我们的战士，是从最受压迫的人民群众中来的；我们的武器，是从凶恶的敌人手中夺来的；我们的力量，则是从党的正确领导和远大的理想中来的。

在党的领导下，汤原的星星之火已经开始燎原，汤原的红军成长为一支坚强的游击队！

## 严惩汉奸地主

我在前面曾经写过，夏云阶同志曾到哈尔滨去向省委汇报过工作。当时省委指示：要开展抗日的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努力扩大武装，坚决消灭一切日伪武装及顽固的敌伪分子。

夏云阶同志回到汤原后，站在省委代表、县委书记兼游击队长的领导岗位上，坚决地执行了这一重要指示。

这些指示的执行结果：使太平川保卫团长张春福率部起义；使拥有五、六十支武装的地主黄有投向了我們；一些中小地主，有的已开始转向我們，有的骑墙，左右摇摆，有的过去曾给敌人通过风报过信的地富分子，经我们警告后，缩起头来，不敢露面了。

由于党的政策的英明，出现了空前良好的局面：敌人孤立了。和我们顽强作对的汤原县警备大队长廉成平（外号廉秃爪子）已经不敢小股出动。与此相反，我们的力量却迅速地壮大起来，光是武装就有三百多，至于散在民间的抗日力量，更是不可数计的。

但是地主阶级终归是一个最反动的阶级，比较开明一点的地主如黄有，也是在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以及在我们的威名震慑

之下,才投向我们。我们在欢迎和他们合作的同时,就准备坚决打击和消灭那些与我们为敌到底的反动地主。

这样顽固的反动地主的代表者有两家,一是长发屯老田家;二是我前面讲过的太平川老耿家。两家都是恶霸地主,他们都掌握着较多的枪支,是革命的死对头!当一九三五年初,要过春节的时候,群众都暗暗地组织起来慰问红军游击队,而田、耿两家却从中破坏,对群众进行威胁,施加压力。经县委讨论,决定给这样地主以严重的打击,首先攻打长发屯老田家。

老田家修着高大的院墙,四角有坚固的炮台,除有长短枪二、三十支外,还有一轰一面子的“老抬炮”;除去雇用的“护勇”之外,还有他们内部的“父子兵”。对这样的反动堡垒,如果硬攻,势必会有较大的伤亡,经研究后,决定先用一个尖刀班,插到敌人心脏里去,然后再里外一齐夹攻。如果不成,再行硬攻,在硬攻中伺机想办法。

在一个白雪翻飞的暗夜里,夏云阶同志率领着红军游击队的同志们,踏着没膝深的大雪,向长发屯田家反动堡垒前进。

走在最前面的是由十名经过特别选拔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组成的尖刀班。他们身穿白色罩衣,头系白色披巾,手提匣枪,腰别手榴弹。暗夜中,稍远一点望去,白雪和人形混为一体。

当队伍前进到距田家不远的预定地点时,夏云阶同志下令大部队拉成散兵线,包围田家堡垒,尖刀班匍匐前进!

灰蒙蒙的暗夜,雪越下越大,鹅毛般的雪花,飘落在尖刀班同志的身上。他们手扒着雪,脚蹬着雪,身上盖着雪,吃力地,但却是静悄悄地向田家堡垒爬去。他们滚过了好多沟坡,荆棘划破了脸,红血混着白雪,凝结在脸上,但他们还是不吭声不吭气地爬着……就这样人不知鬼不觉地爬到了田家的城堡下。他们



慢慢地站起来，靠到墙下，稍微活动活动手脚，便人搭人地爬上了高墙，放下了软梯，迅速地翻进了院内。院内静悄悄的，只有炮台上闪着灯光。尖刀班的同志们不敢怠慢，照样用人搭人的办法，爬上了靠近大墙的房顶。上房的微响声，惊醒了院内的警犬，直着脖子狂吠起来，一犬领头，数犬附和，犬吠声连成一片。

一个炮台的门开了，一个人提着一盏马灯走出来，向四处张望；上房的门也开了，一个人探出头来……

这时，一声清脆的枪声在田家的上空响起来。

随着这响枪声，四周的枪声象爆豆一样随之而起，子弹呼啸着，人们呐喊着，大地在震颤。

田家院内，顿时象鸟儿炸了窝一样，人们从每个房门里跟头把势地奔撞出来，拚命地奔跑着，嘶喊着，狼嚎鬼叫，乱成一片。

有的喊：快上炮台……

有的喊：守住墙头……

有的喊：顶住大门……

一个苍老的声音，在院当心嘶叫着：“不要乱，死守住……守住了咱们杀猪……各位炮手，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守住了我有重赏……你们大家……”

正在这时，一颗手榴弹从空而降，手榴弹在空地上闪起红光，冒起浓烟。刹那间，院内所有的喊叫声都吓回去了。

正房上的战士厉声喝道：“不要打了，我们红军游击队已经进来了！再打就要你们的命！”

厢房上也有人紧接着喊道：“缴枪不杀！炮手们，你们赶快开大门，不要给老田家卖命了……”

忽然几响清脆的枪声从暗处向房上打来，一颗手榴弹又从

房上向响枪处飞去,枪声哑巴了。

院外爆响着的枪声以及呐喊的人声已经越来越逼近,估不清有多少人,估不清有多少枪,人声和枪声混成一片,真有千军万马漫地卷来之势!

有几个护勇,见大势已去,怕顽抗下去性命难保,便悄悄地凑到大门前,打开了大门。田家父子发觉后,企图关闭,但已经来不及了,英勇的游击队员们已经象激流不断头地冲进来。

田家堡垒迅速地被打开!

雇来的护勇首先缴了械,田家父子也被迫地放下了枪。

田家的粮仓被打开了。除去一部分留作游击队给养外,其余的都分给长发电的老乡们了。

在田家还搜出数十两黄金,留作党的活动经费。

在长发电召开了群众大会,由夏云阶同志向群众宣布了田家父子的罪状,并决定将田家父子带走,在游击队内看管、反省。

打开了田家堡垒,消除了民愤,使群众欢欣鼓舞,游击队的同志更加斗志昂扬,一致要求打老耿家。但老耿家听见田家被我们击破之后,不仅日夜恐惧地加强防备,而且派人去汤原城内,要求日伪军队前来保护他。

我们了解到老耿家的防备情况,感到攻破田家的方法已不适用于耿家。耿家壕深墙高,警戒严密,无法偷越。因此决定作正面进攻。

正面进攻需要有猛烈的炮火,当时我们没有可能获得大炮,连小型的六零炮也没有。经同志们研究,决定做木炮。做的方法是选一根粗大的拧劲子木头,中间掏空,外缠铁丝,然后装上铁蛋子和火药,拉好导火线,放时点着就可以了。这种木炮的威力也很大,缺点是只能发射几次,射程近。我们用它主要是打开

耿家高墙的缺口,好能冲进去,所以是适用的。

正在我们积极准备的时候,汤原县警备大队,在耿家勾结下,由警备队长廉秃爪子率领全队人马,倾巢出动了。

当时我们正在东邵家村吃早饭,我们的侦察人员报告说敌人已经到了西邵家村。东、西邵家都是平原地带,不利于作战。夏云阶同志当即下令:大部队完全撤到二道岗,在那里埋伏起来。留下一小队人马,诱敌深入。结果廉秃爪子完全坠入我们的圈套,驱兵直入二道岗,被我们一阵猛烈地射击,打得落花流水,缩到老耿家的王八盖子里不敢出来。

在这次战斗中,夏云阶同志头部左颊被敌人射伤了。伤势虽不甚重,但在短时期内很难指挥作战。因此攻打耿家堡垒的计划虽然往后拖了一下,但在我离开汤原以后不久就攻下了。

## 再见吧，哈尔滨！

这时，东北各地红军游击队，在中央红军北上抗日的形势鼓舞下，战斗情绪更加高昂，为了配合中央红军的北上，都加紧了对敌人的攻击。

敌人不甘心于军事上的失利，更加疯狂起来。他们出动了大批的日伪军队，向各个游击队大举进攻，名为冬季“大讨伐”。在城市里，他们也加紧了特务活动，到处搜捕共产党人，凡有一点爱国思想的人，就以“思想犯”的罪名监视起来，法西斯恐怖气氛笼罩着每个城市。此外，敌人还利用朝鲜族人，搞了一个名为“民生团”的特务组织，打到我们各个游击队和地方的组织里去，企图制造我们内部的不和，从内部瓦解我们。但这种卑鄙的手段，并不适用于团结一致的共产党组织，我们很快揭破了敌人的阴谋，铲除了“民生团”的特务分子。

当时汤原县的党组织和游击队，也是处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之下：一方面是我们的不断胜利，不断壮大；一方面是敌人的内外夹攻。

县委开会研究了这种复杂情况，决定派一名县委委员，向省委去作详细汇报，并听取省委的指示。县委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

接到任务后,我立即准备动身。这时汤原城内空气很紧张,为了割断游击队和外部的联系,敌人在城内作了好多布置,汽车票控制得很严,上车时盘查的也很厉害,谁稍有可疑之处,就把谁扣押起来。

为了能够平安地闯过这一关,事先由老宋同志和城内一个可靠的统战对象王百家长取得了联系。王百家长原是我们游击区的一个村长,后搬到城里去住,这人精明能干。

我走时,仍由老宋同志送我到汤原城内,通过王百家长买到了汽车票,并由他送我上了汽车。这样,我就平安地到了哈尔滨。

在哈尔滨,我很快地和省委秘书长李世超同志接上了头,老同志见面,分外亲热。他告诉我说:我来得正好,省委正要调我来哈尔滨,重新分配我的工作。我问是什么工作?他说还没定下来,现在省委正在开会,要我等一等。我向他汇报了汤原县党组织及游击队活动的整个情况,并向省委请求指示。他听完后说:这些情况很好,有利于省委对整个形势的估计和战斗部署。又说:省委对汤原的指示很快就会交另一个同志带去,我不用再回汤原了,就在这里等候新的工作。最后,他郑重地告诉我说:哈尔滨的敌人活动得很猖狂,可能已经摸到了一点省委机关的线索,省委现正研究对策,也可能要转移,嘱咐我一定要提高警惕,多加小心,没事少出去活动。

临分手时,李世超同志沉重地告诉我一个使人难过的消息:秦淑云同志的病没有好,已经逝去了!

一位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和我们永别了!当我在哈尔滨和她分手的时候,曾盼望她能战胜疾病,在革命斗争的道路上重相见面。为时不过一年,她竟被疾病夺去了生命!秦淑云同志的一生虽然是短暂的,但却是战斗的一生,她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

贡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和青春，我们应该永远纪念这位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女战士！

和李世超同志分手后，我就按照他的指示，深居简出，提高警惕，等候着新的工作。

但是一天、两天过去了，不见世超同志前来；三天、五天过去了，还不见来！

怎么回事呢？莫非出了什么事情？不能再在屋里呆等下去了，我必须去寻找省委和李世超同志。

我马上到我仅知道的一个和省委接头的地点去。我不敢大意，先在附近留神观察了一下情况，当我接近这个接头地点的时候，我一下就会发现那里的平安警号不见了！这就是说的确是出了事情！我迅速地离开了那里。

我心情十分激动，回到住处，又等了几天，仍不见人来。怎么办呢？汤原已经离开一个多月了，情况也不知是否发生了变化？而且省委已决定我不回汤原。我又考虑了整整一天多，最后便下定决心：到关内去，到抗日的最前线去。

一九三六年初，我离开了哈尔滨，到关里去了！

后来我才知道，省委在当时已经全部转移。李世超同志在敌人的追捕下，仓促地离开了哈尔滨。不久，他就牺牲在敌人的刺刀下了。

# 第三部







## 辞 别 延 安

一九三六年，我与党的北方局组织接上了关系。在山西省同蒲铁路的介休站工作了一个时期后，转入延安马列主义学院学习。

这时，德、日法西斯所发动的罪恶战争已经进入疯狂阶段。德国希特勒匪徒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向苏联发动了突然的进攻。同年十二月，日寇又在太平洋上点起了战火。在这同时，日寇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提出了“完成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的口号，向我各个解放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围攻。抗战进入了最困难的阶段。

在这艰苦斗争的年代里，党一直高瞻远瞩地展望着胜利的未来，为了给将来的大反攻准备条件，党从根据地分批地派遣地下工作人员潜入东北敌占区的心腹重地，进行工作。

就在这时，我接到了重进东北，再入吉林的任务。

组织上对进入东北敌占区工作同志的指示是、在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上采取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原则。给我的具体任务是：除长期埋伏，等待有利时机进行必要活动之外，主要做知彼工作。为了更有效地开展这项工作，组织上给我派了一名报务员。

报务员的名字叫崔岳，吉林省延吉县人。“七七”事变前在北京一个高中读书，事变后，从北京来到延安，先后在鲁艺和党校学习，后调入报务员训练班。他年轻、聪明，不足的是，没经过艰苦斗争的锻炼。

有了报务员，却不能携带电台。敌人这时候正对我们层层封锁，好多地方都在修筑封锁沟、封锁墙；并且在游击区里采用“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在敌占区里推行“治安强化运动”。而要进入东北——伪满洲国，则要起办“入国证”，还要受到最野蛮的搜查，在这种情况下，怎能携带电台呢。所以组织上告诉我：必须先到吉林，取得合法地位，巩固好环境，然后再到哈尔滨去联系电台。我详细地询问了在哈尔滨接头的地点、时间、暗号等等，牢牢实实地记在心中。

我和崔岳办好了一切手续，做好了必要的准备工作，便于一九四一年九月十八日，离开了革命圣地——延安。

由延安进入华北敌区，由华北敌区再进入东北，这是一条遍布风险的道路。

我和报务员崔岳，从延安出发，路经绥德、米脂、葭县，在黑峪口渡过黄河，来到兴县我军一二〇师司令部的所在地。兴县已经被敌人全部烧光，一处完整房子也没有了。在这里，我们得到了陈钟同志的帮助，拿到了敌区的一切合法证明和备件。组织上为了使我们能够安全地越过敌人的封锁区，由第八军分区王政委，把我们介绍给前方的萧靖同志，由他率领一连武工队护送我们去敌区。

我们这一连人，在进入游击区杏坪以后，忽然和数倍于我的敌人遭遇了。敌人用大量的兵力包围了我们所抢占的一个山头，疯狂地向山上冲击，象饿狼一样的嚎叫声充满山谷，打倒一批，又上来一批。我们在萧靖同志指挥下，一方面沉着应战，一

方面组织人力,准备在必要的时候掩护我和崔岳突围。正在十分紧急的时候,忽然从远处杀来一股我们的队伍,这真象神兵天将一样,敌人登时乱成一团,在我们猛力地夹击下,仓皇撤退。

原来为我们解围的是山西工卫旅的六个连队。工卫旅是由太原工人自卫队组成的一支队伍,战斗力强,阶级觉悟高,如果这次没有护送粮驮的任务,他们一定不会轻易放过敌人。

经过一场鏖战和急行军,我们到达了青源县猫儿梁。这时,黄河的一条支流——汾河,横在我们面前。汾河两岸,都是敌人的“治安强化区”,沿河一带,敌人修筑了密密麻麻的碉堡,并有小股武装昼夜巡逻。

我和崔岳,经过一段休整,便在一个阴云密布的夜晚,向敌占区进发了。

当地县委派县委委员郑思华同志和一位熟知地形、机智勇敢的老武工队员带领我们偷渡封锁区。

这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我们在呼啸的北风中,走走停停,好多地方得匍匐爬行。我对这位老武工队员的熟知地形和机警沉着真是惊服不已,他好象长着一双夜明眼和一双顺风耳,我们看不见的碉堡他能看见,我们听不见的声音他能听见。当我们摸到汾河桥头接近一座临时木桥的时候,他突然让我们卧倒,我们弄不清发生了什么情况,直到趴下以后,才听见马蹄声由远而近地传来。敌人的巡逻队从我们的眼前走过去了。他趴在我们的前面,一个敌人策马从路边上跑过去,我们真担心敌人会发现他,如果敌人的马再往里面偏一点儿,说不定马蹄子就会踩到他身上。但他却一动不动,我的心真提到嗓子眼上来了。敌人的马蹄声听不见了。他轻轻地一跳,便站了起来,我们也随着站了起来。趴在我身旁的报务员,这时正往起爬,真是,行动为啥这

样迟缓呢！我忙伸手去拉他，隐隐觉得他身上似乎簌簌抖颤，我一愣神，忙悄声问他是否冷了？他喃喃地说：“没，没什么，有点冷，走走就好了。”我要把我的外衣脱给他，他不要，情况紧急，又不能多推让，只好拉着他一同去撵老武工队员。

我们就这样摸索着往前走，一直到天快放亮的时候，才算越过了封锁线。我们松了一口气，走进了敌占区的第一个村庄——五家堡子。

到了村口，老武工队员就和我们握手告别了。五家堡子村头上有座吕祖庙，郑思华同志告诉我们：看庙的老人是我们的人。

越过围墙，来到院里，郑思华同志隔着窗棂，敲开房门，在荧荧如豆的灯光下，站着一位须发斑白，皱纹深陷的老人。他慈祥地望了望我们，亲热地和郑思华同志握了握手，接着就为我们拾掇铺盖，安排我们睡下，然后去做早饭。

我们吃早饭的时候，这位老人上庙外去了。我们刚撂下碗筷，庙门打开，老人健步如飞地跑进来，一步跳到炕上，掀起炕席，三把两把拨开铺炕干草，揭起两块木板，向郑思华同志一招手说：

“快领他们进去！”

“有情况吗？”郑思华同志问道。

“敌人奔村来了！”

郑思华同志点点头，回头对我和崔岳一挥手说：“你们先进！”崔岳头一个进去，我和郑思华同志也相跟着进去，木板叭的一声盖上了。眼前变得一片漆黑，真是伸手不见五指。里面地方不大，蜷缩着可以躺下。郑思华同志摸索着把我和崔岳拉到里边，他自己紧守在进口的地方，隐约听见他推弹上膛的声音。

洞里边静得很，崔岳紧卧在我身旁，微微听见他心在咚咚地

跳，呼吸也有些急促，热气不断吹在我脸上。不久，我隐隐约约听见上面有人声，声音微小到象苍蝇嗡嗡一样。接着，又什么也听不到了。过了很久，头上有了响动，木板被掀开，刺眼的光亮射进来，随着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

“上来吧，敌人滚蛋了！”

我们相跟着跳出炕洞。外面的阳光直射在破旧的纸窗上，原来黑洞洞的屋子这时亮得让人睁不开眼睛。

“敌人进屋来过？”郑思华同志眯缝着眼睛向四外望了望说。

“来过。”老人仍是慈祥地微笑着说，“全村哪有他们没去过的地方！到处大喊大叫，说有共产党偷渡封锁线。”

“怎么！他们知道了？”崔岳瞪大了两只眼睛问道。

“当然能知道。”老人说，“可是他们是瞎叫唤，什么也捞不着。这会儿那个姓康的特务队长大概正领着他那群特务崽子在马村蹦跹呢。”

郑思华同志呵呵笑了，我们也笑了，一场虚惊，随着笑声飞走了。

就在当天，我们和地方县委书记老杨同志接上了关系。经研究决定，我和崔岳分两路走，老杨同志派七登同志送崔岳奔太原，又为我找了一个商人的社会关系，和我一同去榆次，然后我和崔岳在北平会合。

辞别了郑思华、老杨和崔岳同志，我就往榆次去了。

## 出 关 之 前

从榆次坐火车，安全到达北平。

我在前门外西河沿的平安旅社住下。规定和报务员崔岳会面的日子还没到，我不能空等，便决定一个人先到办理“入国证”的地方看看情形，做番调查研究，然后再和崔岳一同去办理手续。

翌日天刚发白，我顶着刺骨的寒风，直奔“劳务兴国会华北办事处”走去。

自从东北在日寇操纵下建立起伪傀儡政权之后，万里长城竟变成了一条“国境”的禁线，出入山海关就等于出入国境线，敌人借此来箝制人民，隔绝关内外抗日力量的联结。一个不具有相当证件和来历的人，想要出进关比登天还难，就是有证件和来历的人，也须经受严格的检查，百般的刁难，才能把“入国证”拿到手。

在“劳务兴国会华北办事处”的大门楼旁边，有一个狭小的死胡同，胡同里摆着两排木凳，木凳的尽头各有一个小门，在门楣上，一边写着“往蒙疆”；一边写着“往满洲”的字样。我来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排有三十几个人了。

天空布满了阴云，小北风不停地在小胡同里打旋。坐在木凳

上排队的人，冻得直打哆嗦，就连穿皮袄、大毡鞋的商人们，也冻得瑟瑟缩缩地蜷曲着身躯。傍七点钟，排队的已增加到百余人了。

直到人们冻得两手拘挛、双脚发木的时候，才见一个鬼子和一个中国特务相跟着从门口走了进来。那鬼子长了一对三角眼，眉梢往上吊，蛤蟆嘴的嘴角向下撇，两腮上满是青煞煞的胡茬。跟随在后面的那个中国特务，手提着一根又黑又亮的文明棍，瘦猴似的面庞上，最引人注目的是鼻唇之间的那撮日本式的小黑胡。

他俩走近排队的人们跟前，鬼子先开口叽哩哇拉地说了一句什么，那个特务紧接着扬起文明棍，向人们一捅一捅地厉声说道：

“现在开始检查，通通把上衣脱掉！”

排队的人们，陆续脱掉上衣披在身上。本来紧扣衣扣，缠着围巾，都挡不住寒冷的侵袭，这样一来，一个个冻得嘴唇不能合拢，哆哆的声音响个不停。

检查开始了。先是检查身上有没有枪伤和刀痕，然后又象狗一样用鼻子闻手。那个满脸杀气的鬼子，龇着两个发黄的门牙，这瞅瞅，那嗅嗅，活象一条时刻都要咬人的疯狗。那个瘦猴似的特务做鬼子的帮手，十分审慎而又缜密地检查着每个人的证件。

在检查中，是凡他们认为稍有可疑的人，都要被从排列里推搡出来。一边推一边还要搂头盖脸地捶打一顿。看到这里，我心头的怒火早已按捺不住，再也不愿多看下去了，便转身离开了这个鬼地方。我心里只盼崔岳能按约定的日子赶到，他会一口好日本话，再加上组织上给弄到的充足证件，或许可能免受侮辱，顺利地闯过这一关。

和崔岳约定会面的日子到了。我按着规定的地点，在二龙坑西巷一条僻静的路上和崔岳相见了。

我告诉他：我已经去过“办事处”，并将看到的情形和我的想法说给他。他听完后，在那白皙皙的面庞上现出了犹疑的神情，半天，才说道：

“我觉得这样去硬碰是不合适的，应该想别的办法。”

“你有办法吗？”我忙问道。

“办法倒有，不过……”他眨了眨眼睛，忽然掉转话头说，“关于怎么回去的问题，我也有一些想法，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你快说吧。”我往他身旁靠了靠，一边和他信步往前走，一边悄声说，“只要对工作有利就可以。”

“我觉得我们一同回到吉林，目标大，容易引人注目，对将来的工作是不利的。”

“你的意见还是分头走？”

“最好是错落开走，一先一后回到吉林。”他看了看我，又添了一句道，“就是起‘入国证’，顶好也把时间隔开，而且要隔得长一些才好。”

崔岳的意见，虽然和我最初的想法不一致，但却是值得重视的，应该尽量避免别人把我们两人联在一起。因此我想了想，又问他：

“那么你准备什么时候回去？用什么办法回去呢？”

“我原先在北平读过高中，现在有好多同学都在大学读书，我想找个门路，先进大学，取得了学生的身分之后，然后再回东北。”

“那得多长时间？”

“最多也不过三、五个月。”

“三、五个月！那我们的工作岂不是要延误下去？”



“我想不会有多大延误。”他胸有成竹地说，“你回到吉林，总要做些必要的安排，至少先要搞好一个巩固的环境，还要做些知彼工作，等到需要发报的时候，我一定会赶到的。”

听他这样一说，我才逐渐明白，原来他已经有了一整套的想法，把两个人的工作分得这样清楚。多少年来，从关外到关内，从敌区到解放区，和同志们在一起，有了工作都是抢着做，遇见困难都是抢着克服。作为阶级弟兄，革命同志，共同在白色恐怖的敌区里工作，有谁能不同甘共苦，同舟共济，为着一个共同的理想而一致奋斗呢。想不到我却遇见了这样一个同志，是由于觉悟低还是出于自私的目的？看他那理所当然的样子，也可能是出于觉悟低。是呀，不要把一个同志想得太差了，他还年轻，在今后的工作中多帮助他吧。想到这里，我便忍住心中的烦恼，说：

“你说的工作，我回到吉林以后，尽量快些做好。至于你要取得学生的身分再回东北，也是可以试验一下的。但是有一个原则，一定要快些，因为你回去后也要做些必要的安排，才能发报。如果上大学耽搁的时间长，就要放弃这个打算。希望你处处要以工作为重，在决定一件事情的时候，首先要想到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而不是自己。我们现在只有两个人，分开以后又只剩下你一个人，一切全靠共产党员的高度自觉。”

他那低垂的头忽然仰起来，眼睛直望着我，激动地说：“你的意思我了解，请你放心好了，我保证……”

他的声音越说越高，我急拽了一下他的衣襟，他也立刻警觉地回头看了看，然后压低声音说道：

“我保证快些回到东北，不影响工作。”

“好吧。你还有什么困难没有？”

“没有了。”

“把你的通讯处告诉我。”

他从小本上撕下一张纸来，写了个通讯处交给我，然后就分手了。我一边走着一边默默记着他的通讯处，记熟以后，将小纸头撕碎扔了。

回到旅馆，半夜未眠，我一直在想着怎样才能更快、更安全地返回东北？最后我决定去找同乡于勃想想办法。他在北平铁路局当了多年职员，认识人多，可能有门路可托。

次日见到于勃，我将如何久别故乡，探母心切的心情向他说了。于勃以同乡应有的热忱，立刻答应转托他的亲舅舅郎惠民给办理一下。郎惠民是伪满“弘报处驻京办事处”的高级特务，起办一张“入国证”，是不费吹灰之力的。

第二天，我从郎惠民那里拿到了一张由他签名的片子。他要我拿着片子到“劳务兴国会华北办事处”找他的本家郎科长。于是我又第二次来到了这个可憎的地方。

我拿着郎惠民的片子进了传达室，传达一看片子，立刻满脸堆笑，又倒水，又让坐，然后颇有礼貌地说：

“请您稍坐，我去去就回。”

不到半支烟的工夫，传达拿着又经郎科长签批过的片子回来说：

“郎科长公事忙，脱不开身，吩咐我来办了。”

我点点头，随着传达走到小胡同里。两条长凳子上已经排满了人。鬼子和那个汉奸特务还没有来。传达瞪着眼睛，在坐满人的凳子中间用手往两边拨拉，一边拨拉一边嘴里骂着，人们敢怒而不敢言地往两旁挪了挪，中间空出个地方来，传达用手往空地方一比划，对我说：

“您请坐吧。”

我被弄得不大好意思，但事已至此，只好硬着头皮坐下了。

不大一会儿，那个日本鬼子和汉奸特务相跟着来了。传达忙凑到特务跟前，用手指着我悄声说：“这位是郎科长的人……”

特务看了看我，对我一龇牙，点了点头。

检查开始了。仍然象上次那样脱掉衣服，检查全身，用眼睛看，用手摸，用鼻子嗅，有一点不顺眼的地方就拳打脚踢，更甚一点的就从行列里推出去，越是有钱的商人受的刁难越多。对铁匠、瓦匠等工人，倒是比较宽容，因为从他们身上挤不出油水来，而且满洲国这时正需要劳工，放他们到东北去是符合敌人的利益的。

检查到我的时候，日本鬼子问话，翻译帮助我翻，又帮助我回答，所以这第一关很顺利地就通过了。

穿好衣服，传达领我从小门进了办公室。这是一个长筒屋子，长长的柜台后面摆着一张张桌子。起“入国证”的人都站在柜台外面接受粗暴的询问。当传达把我领到第一张桌子前面时，他又轻轻向里面的人说了一句：“这位是郎科长的人。”于是里面问话的声音就变得温和了。问得非常仔细：姓名、籍贯、年龄、职业、从哪来、到哪去、干什么……一边问，一边写，写完了，便撕给我一张登记表。于是在传达引导下，又站到第二张桌子前，照旧是传达的介绍，温和的询问，如此走过四、五张桌子，最后的一张桌子，向我要一元三的“联银票”，没有“联银票”，须交银大洋，银大洋没有零钱，只好交两元。这也是一种变相勒索。交完钱，给了我一张四联“入国证”，然后到后院照相。这时，传达向我告辞走了。于是我就随着起“入国证”的人群，到了后院。

院里有很多人等着照相。照相机摆在院当中，在它前面，放了一个长方形的木头框子，照相人三个一伙，对准镜头，并排坐在框子后面。每人前面又放上一个小木牌，黑牌白字，上面写着号码。木框是固定不变的，人的身长却有高有低，于是便都以木

框为标准,高个的要弯腿,矮个的要跷脚。照相师有三个人,这三个人简直是三头饿狼,摆弄人就好象机匠摆弄别脚的机器一样,对矮个的就拽头发,对高个子就往腿上踢,一边踢一边骂,有的人把头探出了木框,他们跑过来对着脖子就是狠狠的一拳,同时骂道:“探什么王八脖子,也不砍你头!”

这三个家伙用兽性来追求工作中的最快速度。

这个可恶的木框,只便宜了中等身材的人。当我站在里面的时候,恰恰合适,既不用弯腿也不用跷脚,于是我又顺利地通过了这一关。

我拿着照完相时给的小票,又来到一个两头有门,象公共厕所一样的小房子里。一进屋,就让脱衣服,有一些穿着白大褂的男男女女,先是往胳膊上给擦酒精,接着用银白色的小铁钩子在胳膊上狠狠地钩了三下,抹上乳白色的药水,这称之为“种痘”。我被“钩”完,从另一端的小门走出去的时候,心里一阵憎恶,用手狠狠地在被“钩”处挤了挤,把白药水挤出来,用手绢一下抹掉。

种完“痘”,大家都在当院里等着发还四联“入国证”,这是最后一关了。

不大一会儿,有两个人搬着桌椅,拿着一迭四联“入国证”,威风凛凛地坐在院当中。他们旁边还站着几个不三不四的家伙。坐在桌子后面的人,一边喊着人名,一边相面,一边往“入国证”上打钢印。喊名时如果有人用军人的语调,高声答应一个“有”字,便要被身后站的人拉到一旁去,严加盘问。喊到我的时候,我只啊了一声,走上前去,坐着的家伙端详了我一下,把“四联证”往我面前一递说:“买票去吧,明天走。”

买火车票的地方就在这个院里的另所小房里,和起“四联证”一样,每张火车票他们都要多勒索一些钱。我买了一张“大

陆号”快车票，从北平直通东北的奉天。第二天四点钟，我心情振奋地登上了火车。

火车到山海关时，又受到一次严格的搜查，宪兵、路警、便衣特务，象一窝蜂子似地拥上火车，见东西就翻，见人就问，停车四十分钟，没有消停一刻。

四十分钟过去了。当列车拉长汽笛驶出山海关时，当漫无边际的辽西平原映入我的眼帘时，心一刻比一刻激动，想的也越来越远了。

## 归 来

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正午十二点，列车驶进了吉林。

一出火车站就看见高悬在各建筑物上的日本“膏药”旗和“红蓝白黑遍地黄”的伪满洲国旗；“完遂大东亚圣战”“建立东亚共荣圈”“日满一德一心”的标语和宣传“仁丹”“老笃眼药”的招贴画混杂在一起；协和服、战斗帽、打着裹腿的双腿遍布街头巷尾；日本货、日本商店、日本酒馆到处可见……眼望着这一切，千思万绪涌上了心头。古老的吉林城啊！我生在这里，长在这里，这里有我童年的欢乐，少年的幻想，青年的彷徨；在这里我接触了革命，认识了万恶的旧社会，在党的培养教育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十年来，我经常想着这里的山川树木，街道房屋，想着这里的同志、战友和亲人。今天我站到你的面前了，你却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涂画得面目全非，你被披上了可耻的外衣，打上了被奴役的烙印。所有这一切，怎能不使我百感交加，义愤填膺。也只有此时此刻，我才更加深切地体会到党派我们来到东北的重大意义，远在几千里以外的党中央和毛主席，好象看见了这里所有的一切，听到了东北同胞痛苦的呼声，于是一批又一批的同志肩负着党的希望到东北来了。

东北是人民的东北，如今虽然被蒋介石断送给了敌人，蒙受

了重大的灾难,但是在那敌人惨淡经营的“可耻外衣”的里面,却包藏着最优秀的人民,他们是未燃的火山,只等待火种去点燃,这就是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我相信,只要我们按照党的指示,做艰苦的努力,积蓄我们的力量,就一定会胜利。

我走出车站,随着下车的人流往前走,一边走一边想:我得先上哪里去找妈妈她们?经过十年离乱,她们现在在哪里?我想起当我离开吉林的时候,妈妈她们娘儿几个已经从家里逃出去了。后来妹夫告诉我:妈妈扔不下那“破家值万贯”的家,还要搬回去。对!妈妈他们一定又回到那住惯了的老地方去了……想到这,我立刻穿过北大街,折向锡家后胡同,来到了离别十余年的家门。我站在门前,心不由得怦怦地跳起来,手也随着砰砰地敲在门上。

“谁呀?”

传出来的声音本是很微弱的,但听在我耳朵里,却象久旱盼甘雨的人听到雷声一样响亮、亲切。我好象有一个世纪没听到这慈爱的声音了,忙应声道:

“是我,是我呀!快开门吧!”

门开了。母亲手拄着木棍站在门里面,刚要说话,却又马上停住了,她张着嘴,瞪着一双昏花的眼睛,直愣愣地望着我。半天,疑疑迟迟地问道:“你找谁呀?”

“妈妈!不认识我啦?”

“是,是……维民呐!”

母亲的喉咙好象被一团乱麻塞住,只说了这几个字,就一把拉住我,眼泪从眼角里簌簌地滴落下来。十多年来困苦、辛酸的日子,把母亲折磨得更加虚弱、苍老了,头发灰白,眼窝塌陷,脸上的皱纹又密又深。我心里一阵难过,忙扶住母亲说:

“妈妈!不要难过了,我不是已经回来了吗!”我一边扶着

母亲往屋里走，一边劝慰她说。

“回来了！回来了！”母亲一边擦着泪，一边却在嘴角上现出了笑纹，“整整十多年呀！我日头出来盼，日头落了盼，可算把你盼回来了！”

这时，由屋里跑出来一个十来岁的男孩，一见我扶着妈妈，就愣愣地停住了。

“快过来呀！这是你爸爸回来啦！”母亲向孩子急匆匆地说着。

我的孩子！我离开吉林时，还在他娘怀里抱着，如今长得这么高了！多么快呀！我猛将孩子接近身边，亲昵地看着。

母亲见孩子象木雕泥塑般呆站着，有些焦急了，便一迭连声地说：

“快叫爸爸呀！快叫爸爸呀！”

孩子仍然没有反应。十多年来，孩子只知道自己有爸爸，却不知道爸爸是什么模样。今天，突然出现了一个爸爸，怎能不使他觉得陌生呢！我一边从包裹里给孩子掏糖果，一边笑吟吟地向母亲说道：

“孩子和我有些发生，过几天就好啦。”

走进屋里，举目一望，年久失修的房屋，房基坍塌，墙皮脱落。我知道这个房东是只知道要房钱，根本就不管修理房子。房子里，由于母亲患病，无人拾掇，整个屋子狼藉不堪，一些东西横七竖八地散放着，发锈的铁炉子里没有火，屋角黑黝黝的墙皮上挂有一层毛茸茸的白霜。

我一边生炉子，一边听母亲说着。炉子里爆出噼噼剥剥的声音，整个屋子逐渐烘热起来。

“十多年来，我和你媳妇换班出外给人家做帮工，在四年头上我就做不动了，你媳妇接续做到如今，这个家全依仗她啦！”



我深怕再引起母亲痛楚的回忆，急安慰道：“妈妈！我这次回来不走啦，以后的日子就会好过了。”

过了一会儿，孩子将他妈妈找了回来。她方踏进屋门，一见到我，刚要开口说话，嘴唇一哆嗦，眼睛里立时盈满了晶莹的泪水，一种悲喜交加的激情，使她一时说不出话来……

我的妻子，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里，她纯朴、敦厚，能吃苦耐劳。十多年来，她代我挑起了全家的担子，看护妈妈，抚养孩子，为一家人的温饱而劳碌。她不知我在外做些什么，我也不能仔细地讲给她听。这时，我只能安慰她：

“家里的情形妈妈都告诉我了，这些年让你们受苦了。明天就把外面的活儿辞退了吧！”

妻子听我这样一说，泪水象断了线的珠链子夺眶而落。但刚强的妻子却没有哭泣出声，忙将泪水拭净，转脸问候一下母亲的病情，便屋里屋外手不停闲地拾掇起来。

我的归来，给这冷清的家庭带来了生气和温暖。母亲饱经忧患的双眼，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欣喜目光；妻子抑郁的脸上，也泛出了含有深情的微笑；那十来岁的孩子更是龙腾虎跃，欢喜异常。

晚上，一家人围坐在火炉旁，倾述着十年来的生活变化。

从母亲和妻子的叙述中，我了解到这十年间吉林的变化很大，很剧烈。我离开吉林到哈尔滨去的时候，伪满洲国才刚刚建立，溥仪还没有爬上傀儡皇帝的宝座，正在日本人的导演下，扮演着临时执政的角色。整个伪政权的法西斯统治机器还没有组装好，一切还在动乱之中。一九三六年离开哈尔滨去延安，这期间，敌人为了组装这部反动机器，建立了一个又一个的反动机构，撤换了一批又一批的汉奸警察。这些，母亲她们当然看不全，说不清。但是由于我的命运和时事的变化紧紧相联，就迫使她

们密切注视着社会上发生的一些事情。她们注意到当我离开吉林以后不久,原来吉林东关的警察局(离我家不远)忽然改成了警察署,先派来一个胖大的警察署长,接着又换来了一大帮新警察狗子。从我走后,本来有一个警察狗子隔三差五就上我家查问一番,可从改成警察署以后,这个狗子也不见了。旧狗不见新狗也没再派来。妈妈她们放心不下,托亲求友一打探,说那案子已经了结,没人再过问了,才把家搬了回来。而且在那案卷里,竟然没有把我的名字列上,不知是由于敌人的一时马虎,还是由于当时的反动制度不健全,组织不严密。总之,倒使我一点痕迹不留地脱离了敌人的监视范围。当妈妈她们得知这些情况以后,真是一块石头落了地,心里特别轻快。后来,在“国事调查”的时候,妈妈又给我报上了户口,写上了李维民的名字,职业写在关东洲当铁路警。

妈妈她们讲的这些情况,也使我心里十分高兴。我原来估计的形势要比这复杂得多,我是准备在最艰难和最险恶的情况下开展工作的。现在看来,一切都出乎意料的好,我怎能不喜出望外呢!在十分兴奋的心情下,就把我在外十年的生活和斗争,挑那些可以和妈妈她们讲的讲了一些。我知道,今后我的工作,也要在家庭掩护下进行,我必须从正面启发妈妈和妻子的阶级觉悟,让她们能自觉地为革命服务。所以当我谈到解放区和延安的人民生活时,讲得特别有劲,我在她们眼前打开了一个新天地,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贫困和饥饿的新世界。妈妈和妻子,对我过去的活动是很了解的。当党内同志在我家居住时,妈妈都把他们当作亲人。一直到今天,她还记挂着他们呢。因此,她们对我讲这新世界就很理解,很向往,妈妈听着高兴得闭不上嘴,妻子的眼睛里也一直闪着幸福的亮光。

夜已经深了,妈妈和妻子都睡下了。

屋外的夜风已煞住，冬日的深夜异常静谧，在黯淡的灯光下，我望着母亲在梦境中还挂着笑纹的面孔，计划着以后的工作。根据母亲告诉我的情况，我可以马上在市面上公开行动。我应该以商人的面目出现，编造商人的历史。我要去拜望所有的亲友，恢复社会关系，在光明磊落的行动中站稳脚跟，然后再进行下一步工作。在报务员来到以前，我要搞好一个巩固的环境，安排好可靠的掩护职业，最好是争取开设一个商号。而这当中最主要的是要建立一个精干的组织，做知彼工作。这是所有工作当中最困难的一项，我必须慎重地去做。

东方快要放亮了。我仍然在想着。忽然，妈妈翻了一个身，嘴中喃喃地说道：

“我儿子是从山西介休回来，在那开设转运公司，赚钱了……”

我笑了，是感激的笑。妈妈在梦中还念诵我们商量好的话呢。我忙轻轻地替妈妈掖了掖被头，让妈妈的梦境更幸福吧。

回家不到半个月，我走遍了所有的远亲近友。

我包了一辆人力车，买了一些礼物，大街小巷地跑起来。去的地方，有的是当地士绅、伪官吏或有钱人家；有的是小市民、知识分子和穷苦人家。

于是我回到吉林的消息，好象一股电流一样，在社会上和亲友中很快地传开了。有人说“李维民发财还家了”；有人说“李维民阔气起来了”；更有人以讹传讹地说“李维民在外边做买卖发了一笔大财，钱都用皮箱子装。”

旧社会有句说破世情的俗话，叫做“穷在世间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我“发财还家”的假象一经形成，立刻就有不少亲友请吃饭，有不少人登门回拜，冷落的门庭热闹起来了。

经过细心观察，我的心更加落底了。对我的反映是一面倒

的，所有的人都把我看成一个大商人，当谈起过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把我和革命、共产党联在一起，是遗忘了还是根本就不知道？时间，十年的时间，对我起了意想不到的掩护作用。

当时伪满洲国的政府规定，凡长期出门在外的人，虽然家有户口，也必须有“居住证明愿”方能成为合法的居民。我的“居住证明愿”也很顺利地弄到手。在这个见钱眼开的社会里，既是“发财还家”，还有什么事情不好办呢。原先我母亲有个远亲，叫做侯圣绂，是个暴发户，在吉林开设买卖，联系广，熟人多。当我母亲去求他帮忙起“居住证明愿”的时候，他立刻答应了，于是没费什么事，需要的东西就到手了。

我完完全全成为一个“满洲国民”，我的脚根站稳了。于是我开始实现第二步计划——开设一座买卖。

我有一个姐夫，叫做刘兰亭，曾经当过银号的经理，是吉林一个士绅。十几年前，当我穷困交加的时候，他和所有的有钱亲友一样，和我根本断了来往。现在，他又和那些有钱亲友一道，向我伸出了“亲戚”之手。听说我要做买卖，他便替我张罗。既对工作有利，我又何乐而不为呢。在他张罗之下，给我找妥两个股东：一个是前中华民国吉林省实业厅长马德恩；一个是清末举人，旧中华民国吉林省教育厅长王可耕。这两位老官员在“九一八”后一直隐居在家里，吃斋念佛。日寇几次相请出山，他们都以年老昏聩，体弱多病为辞拒绝了。日寇不再碰他俩，他俩也就做了顺民。这两人在吉林地方有一定的势力，也有一定的威望。他们答应作我的股东，拿出很多钱来。这正对了我的心思，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需要他们的名气更甚于钱。他们譬如地基，有了这样的地基，无论修盖什么建筑物，都更能经得住这个社会的风风雨雨。

经过一段筹备，在“牛马行”就出现了一座“估衣铺”，铺名永茂东。我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商人了。

## 寻 找

为了开展工作，必须迅速地形成一个小型、精悍的组织。只有这样，才能更为深入、广泛地占有敌人的情况。但比较困难的是，我从延安来到吉林，除了一个还没归来的报务员之外，竟没有一个现成的“关系”，其组织成员完全要由我自己去寻找。

到哪里去找呢？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铁路系统。当一九三三年吉林党组织遭到破坏的时候，只有铁路上还有一个党小组保留着，组长是吉海路列车长董国璋。他和他的弟弟曾经掩护着我离开吉林。现在不知他们的党小组情况怎样？十年了，是发展了还是……我决定先弄清董国璋的情况。通过铁路上的熟人，很快了解清楚了：董国璋早已离开吉海路，连家都搬走了。搬到哪里去了？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全家都悄悄搬走了？是不是党小组也出了事情？我都不得而知。我只好先放下在铁路上寻找的念头。

铁路上找不到十年前的党内同志，其他方面就更不好找了。何况我又不能公开地查询，只能暗自探访。

这是一项细致而复杂的工作，必须慎重而耐心地进行。

有一天，和母亲闲谈，当谈到妹妹出嫁的时候，妈妈忽然对我说：

“不提你妹妹出嫁我倒忘了。你回来这些日子，哪里都去了，就是忘了一个人。”

“谁？”我忙问道。

“你的同学关锡赓啊。”

“关锡赓！”我不由得惊喜地喊道。

“是呀。”妈妈点着头说，“人家可不忘旧啊，从哈尔滨一回来就来看我，以后也常来。你妹妹出嫁，家里没一个男的，多亏人家来帮忙，这回你可得好好谢谢人家。”

“他现在干什么呢？”我迫不及待地问。

“在税局子做事呢。”

“税局子？买卖开张时候我去上过税，怎么没看见他？”

“他常‘出張’，这一气没来，八成不在家。”

“好，我明天一定去找他！”我兴奋地说，“真没想到他回来了，真得好好‘谢谢’他！”

和母亲谈完了话，我一直处在兴奋状态中。关锡赓，根据我对他的了解，这是一个可以信赖的同志。记得一九三三年，我从吉林乍到哈尔滨的时候，就是通过他和组织接上的关系。当时他还年轻，在工业大学读书，是个共青团员，但是阶级立场很坚定，为人也很正直，是个热情奔放的好青年，好同志。我们已经十年没见了，这十年他的政治情况怎样？一想到这里，跟着就产生出一系列问题：他和党有没有关系？他还知道其他同志的下落不？他是学工的，为什么干了税务？……我想了许多，但无论怎样想，总觉得他是自己人，是可以信赖的，应该去找他。

第二天早晨，我迈着轻快的步子，往税捐局走去。早春的阳光从浮动着的云罅中投射下来，那一道道的光线，照在人的脸上觉得分外的洁净和亮堂。

税捐局的正门前，办理缴税手续的人来往不断，各色名目的

苛捐杂税把各色各样的人都聚拢到这里来。在那宽大的办公房里，烟雾腾腾，一片嘈杂。从一些横七竖八摆着的办公桌当中，我仔细辨认着，最后将视线停留在一个正俯首聚神抄写什么的中年人身上。这人的身材虽然不算高，却很强壮，鼻梁上架着的眼镜，随着头部的一起一伏，不时地泛出晶亮的白光。当我认出这确是关锡赓时，忙走过去说道：

“关先生！”

关锡赓猛一抬头，怔怔地望着我，半天，忽然在面部上闪出震惊而又冲动的神色：

“啊！——原来是你，老李！”

他的两只手猛伸出来，一下抱紧我的肩胛，用力地摇晃着。我紧盯住他的一双眼睛，他的眼角上已经出现了鱼尾纹，但他那火热的眼神却不减当年。我们这样望了半天，他嘴唇牵动着，似乎要说什么又没说出来。我一拉他的胳膊说：“能不能出去走走？”

“好。”他向对面一个人打过招呼，我们就一同出来了。

在一个僻静的墙脚下停住了脚步。关锡赓由于又惊又喜，满腔的话似乎要一齐迸发出来，但过分激动的心情，使他嘴唇颤动，一时竟不知从哪儿说起。稍微沉静了一会儿，他突然开门见山地问我道：

“老李！是从抗联回来吗？”

“不！从关里回来！”

“关里？”他直望着我说，“关里的什么地方？是不是……”

我知道他下面要说什么，忙接着说道：“走过好多地方，长了不少见识，可是‘水流千里归大海’，又回到老家来了。”

“你能回来太好了！这些年来，我一个人象个断了线的风筝，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工大党的组织被破坏了，我跑回吉林。

失学、失业，也失去了组织关系，最后被生活逼着，只好干了个小职员，可是这颗心哪，老李，你应该知道……”他用一双火辣辣的眼睛直望着我。

“我知道。”我忙点点头说，“我们要尽情地谈谈。你多咱能有时间，到我家里去吧。”

“今天下班后就去。”他不加思索地说，“你能在家等我吗？”

“好，我等着你。”

我点了点头，转身走了。

关锡赓一直站那看着我，我忙转身拐进一条胡同里，好让他快些离开那里。

一路走着，我不停地想着这短促的会见：从他那迫不及待、如饥似渴的神态中；从他那火辣辣的眼睛里，都说明我的估计是对的：这是自己的同志。但是，决不能心急，必须多谈一谈，多想一想。

晚间，关锡赓来了。在暗淡的灯光下，我们促膝长谈。当他听到我想要开一座买卖，准备做商人的时候，兴奋的脸色转白了，失望得几乎想站起身来走开。但是很快他又坐下来，极力想要证实这不是我真实的职业。我却尽量不作正面回答，我要知道他这十多年来的一切情况，知道他最细微的思想。渐渐地，他似乎明白了我的用意，便毫无掩饰地向我倾诉起来。就这样，我们一直谈到深夜，从他所有的谈话中，我看到了一颗离开组织而又渴望革命的苦闷的心，他说他象一个断线的风筝，我要把这根断线接上。

几天之内，我们一共谈了三次。当我从各个方面都证实我最初估计的是正确的时候，就把应该说的话告诉他了。他异常激动地拉住我说：



“维民同志，给我任务吧，不管做什么，我都将百倍努力去完成。”

于是我向他讲了当前国内外的形势和做知彼工作的具体方法，要他慎重而警惕地进行活动。他都一一记下了。

三人才能成众，我们现在只有两个人，连个组织都形不成。我必须继续寻找。我对吉海路仍不死心，过去曾在那里工作过，认识一些人，便决定直接深入到那里去找。经过一段努力，我终于找到了一位十年前的党的积极分子老李。他不属于董国璋小组，是和我直接联系的。我在吉海路当雇员的时候，他是操车手，十年过去了，他还是操车手。这是一个一生受尽剥削，阶级觉悟很高的劳动人民。经过侧面的了解和正面的启迪教育，在他前进的道路上又亮起了革命的火把。

我们有三个人了，一个小型精悍的地下组织开始形成。现在，我只盼望报务员能早日回来；电台能早日拿到手。这两件事情，都不能靠我的主观努力来解决。报务员那里我只能去信催促，信不能多写，词句也只能写得非常隐晦；电台连催促也办不到，只能等待对方的通知。我现在只能一方面积极创造条件，一方面焦急地等待。等待，这是个让人难受的字眼。

## 报务员的打算

一九四二年四月里的一天，报务员崔岳回到了吉林。

他总算回来了！他虽然让我等得心焦，但我仍然喜出望外，我把他悄悄领到家里，为他接风洗尘。

他自己也知道回来得太迟了，面带愧色地说：“在北平托人上大学耽误了些时间，进了大学后办理退学手续又拖了些时间，以后到‘满洲大使馆’起办回国护照也……”

“已经过去的事情，不用再提了，只要以后努力工作就是了。”我打断了他的话头，紧接着又说道，“目前，你急需找个公开掩护职业安顿下来，等电台一到手，就可以正常地进行工作了。”

一提到找职业的问题，他立刻眉飞色舞起来，并颇为自信地说：

“我有大学学生证，找职业是手拿把掐、毫无问题的。”

关于他的公开掩护职业问题，在他没回到吉林之前，我就做好了安排。我想将他安置在我们的买卖里做个伙计，既比较安全，行动又方便。不然的话，托人在“渔业公司”里找个职员当也可以，那里我也有熟人。想到这里，我便向报务员笑着说：

“你的掩护职业，我事先已经安排妥了。”接着我就把我的

意图完全告诉了他。

谁想他还没听我说完，刚才眉飞色舞的神情便完全消失了，白暂暂的扁脸立刻阴沉下来，他沉默了一会儿，几乎是感情冲动地说：

“这两种职业，我做都不合适……”

他的话以及神态的急剧转化，使我感到突然、难解。这个报务员，真有些让人无法揣摸。

“为什么不合适呢？”我忍不住地问道。

“做一个小商人或一个小职员，对我来说是不合适的！”他紧摇着头说道。

报务员对待掩护职业所持的不正常态度，又激起了我的不满，但我竭力抑制住自己，针对他的思想，严肃地说道：

“崔岳同志！我们的真正职业是革命，这里的职业只不过是掩护我们的身分而已。做什么有利于党、有利于工作，我们就应当做什么。”我顿了一下，看他仍然低着头，又说，“当然，一个革命者对于唯利是图的商人是厌恶的。但是，当你想到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党的工作，心里自然就会坦然了。能够适应一切环境，并能利用一切环境，正是一个地下工作者应该学会的本领。”

“不！我不是不服从分配，我只是想把问题提出来。”他抬起头来分辩说，“我觉得我除了完成报务工作之外，还可以多做些工作；但你给我安置的职业，却有很大的限制。”他说到这里，把一双发亮的眼睛用力地眨了眨，从他那清高自傲的神态里可以看出，好象他是一块纯粹的钢材，却不幸被我当做普通的木头使用了。这时我忽然想起在北平我们俩关于如何回来的那场争论，莫非他自己又另有打算了，我不由得问道：

“你自己想怎样做呢？”

“‘新京’的《康德新闻》正在招收新闻记者，我想去投考一下。做一名新闻记者，路子宽，接触面广，这对我们的工作是有利的！”他又志满意得地说道。

真不出所料，果然他又为自己安排好了。在北京时他好象除了发报之外别的事情全不管，现在却又从整个工作上着想了，这个同志，在哪儿学来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呢。

他见我沉默不语，急又说道：“我回来是要拿着大学学生证去报户口的。完了再用这样的出身去当店员和小职员，也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若是当记者，就不会引起任何怀疑了。而且这和我整个的……”他自己用手往身上一比说，“也是合适的。”

我随着他的手，看了看他那白生生的脸和那文质彬彬的仪表，也不由得有些动摇了。不管他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抑或是其他原因，他做知识分子工作倒是合适的。但是他去做记者，报务工作会不会受影响呢？想到这里，我便问道：

“你去那里做事，报务工作怎么进行呢？”

他听我口气有些变了，忙高兴地说道：“这个好办，我若有了新闻记者证，各地来去就都方便了，长春和吉林，相隔这么近，晚上回来，早晨就可以回去，决不会误事的。”

他已经想得这样具体，我也就只好点头了。

他见我同意了，立刻兴高采烈地说：“你放心吧，我自信是可以考取的，将来做起来也不会有问题，我会处处提高警惕，决不会辜负党对我的希望。你在北平对我说的话，我都记在心里，我既然自觉地参加了革命，我就会自觉地工作。”

“好吧，关于工作问题就这样吧。你离家已经有好多年了，第一步先回家看看，然后，就尽快地把掩护职业定下来。”

崔岳点点头，喜气盎然地说道：

“我打算今天就启程回家，到了家里就报上户口。关于报户

口我想是没问题的，我爸爸是屯长，和村公所关系非常好，我估计一切都没问题。我报上户口，在家里再准备一下考试科目；以后，直接去‘新京’报考，考取后我再返回吉林！”

为提高警惕，在他临走时，我特意叮嘱他：

“回到家里，不要向任何人暴露自己的身分！”

我和报务员崔岳在吉林的第一次会面，就这样结束了。

## 哈尔滨之行

在报务员崔岳回到了吉林不久,就接到了上级的指示说:“电台在哈尔滨‘忠灵塔’西南角大树下埋藏,以玻璃瓶底为记,须尽快取出。”

报务员的归来,电台有了着落,这使我心情非常振奋,力量骤增。现在,我们所面临的任务,是必须把电台迅速地运回吉林,然后正常进行工作。

当时,敌人的统治非常严密。日伪的特务、警察、宪兵多得赛过夏天里的蚊子和臭虫,到处都有;他们在路上和车上搜查频繁,盘问详细;要把电台从哈尔滨安全地运回吉林,确实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必须尽快将电台取到手,拖一天,和上级取得联系就迟一天。

殚思极虑,百般研究,我终于想出一套取运电台的办法……

初夏的一天,我搭车去哈尔滨。哈尔滨是我最熟悉的地方。一九三六年以前,我在这里做过地下工作。它曾是中共满洲地下省委的所在地,它的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建筑物,我依旧记忆犹新。当火车还没有驶进哈尔滨时,我浮想联翩,想起了冯仲云同志、老张同志、李世超同志,还想起了和我一起住机关、后来病逝的秦淑云同志……当我想到由于叛徒叛变,满洲地下省委遭

到严重破坏,并有好多同志英勇牺牲的情形时,心里阵阵作痛,对敌人的憎恨更加强烈……

火车驶进哈尔滨车站。我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走出站外。

街道上行人稀少,一片恐怖的气氛笼罩了整个城市。我刚走进大街,就听见敌人警务车的刺耳尖叫声从远处传来,片刻间,数十辆摩托车,由南往北疾驰而过,坐在车上的日伪宪兵满脸杀气。走路的人群被挤向路旁,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正在观察的时候,忽觉有人拉了我一下,接着就听有人叫我大哥,我扭头一看,原来是太古七道街开估衣铺的老杜。他是个在家理的“三番子”,和我有买卖上的来往,我知道他现在警护队当便衣特务,便忙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没正面回答我,只匆匆地说了句:“你不要坐出租小汽车。”就把脸转向人群了。我见这里不便久站,也转身走了。事后我才知道:原来当天有一个日本军官,坐在出租小汽车里被人杀了,日本鬼子正在捕捉“凶手”。

我离开车站,便绕着僻静的小路,来到了道里新城大街十道街一个铺子。

这是个规模不小的铺子,门口进出的人群川流不息。可是,真正购买物品的人却极少。我在铺子里停留时间不长,很快地买妥了两台缝纫机,然后将机头装入木箱里,用草绳子捆绑起来,把机架子故意显露在外面,让人看了一目了然。随后,我到门外叫了一辆马车,直往道里三十六棚吉江湖同舅爷家里拉去。

我的舅爷是个做点心的工人,表叔在三十六棚铁路工厂做工,家境虽然清苦,却有一个独门独院的小房。我以到太古街办货为名,在他家出来进去,颇不引人注目。

两天过去后,当我确信没人注意我的行动时,于一天早晨便到忠灵塔那儿去了。哈尔滨的忠灵塔又细又高,象个椰子似地

插在地面上，周围有很大一片绿茵茵的草坪，四周围绕着参差不齐的树木，塔的正门前和两侧，都修筑着柏油马路。因为这个地方靠近偏僻的市郊，平时游人很少，只有在日寇规定的祭日里，才有人到这里来“哭丧”。

忠灵塔下，显得阴森森的，走近塔边，我向四外扫望了一下：草坪上有三、五人在散步，看装束都是学生打扮，远望过去，两侧的马路上不时有汽车跑来跑去，不断传来“嘀嘀……”的叫声。天有点热，我脱下大褂搭在胳膊上，装作在散步中思考问题的样子，一边漫步地走来走去，一边低头向地下仔细搜寻着。当我在塔的西南角一棵大树下，发现了玻璃瓶底的一刹那，真是兴奋极了，我这颗心似乎都要蹦跳出来。我站在树下仔细地向周围瞧了一番，牢牢地记住了玻璃瓶底的方位。然后，我仍旧漫步地离开了忠灵塔，在回去的路上，顺便买了一把锅铲子，准备晚间使用。

傍晚七点多钟，天已见黑，我把锅铲子揣在怀里，就从舅爷家里开始动身去忠灵塔那儿取“货”。刚迈出门坎，表婶子问道：

“这么晚了，还出去做啥呀？”

“有点货没办齐全，还得跑一趟。”话说完，我就赶忙走出门外。

来到了忠灵塔，天已经大黑。空中悬挂着的上弦月被阴云遮得暗淡无光。忠灵塔的周围阴森森静悄悄的，连个人影都没有，我往塔四周的树林中望去，一片漆黑，只能看见一片树林的轮廓。我看四周无人，便急步绕过塔身向西南角的密林深处走去。

很快便在一棵大树下，找到了玻璃瓶底的所在地。我迅速地用小锅铲挖起来，一边挖着一边留神听着四周的动静：没有什



么意外的响动，只有泥土的沙沙声伴着树叶的哗哗声。我一口气把电台挖了出来。电台是用手提皮包装着，皮包外边裹了一层胶布，我把胶布用小刀割开，扔在草地里，然后又将土坑平上。

我刚提起皮包要走时，忽听西侧马路上传来“倭、倭”的皮鞋声：这是日本人的巡察队过来了！我蹑手蹑脚地向一棵粗大的树干后边隐蔽，屏住呼吸侧耳谛听，“倭、倭”的皮鞋声走近忠灵塔停止了。有几个日本兵叽哩哇拉地说了几句什么鬼话，然后又用手电筒向一片漆黑的树林照来，一道道白光，划破了夜幕，横扫着树身。我隐藏在树后一动不动，心里考虑着对策。那几个日本鬼子乱照了好一阵，其中一个人不知说了句什么，他们才又“倭、倭”地走开了。

我在树后停留十分钟左右，等听不见他们的动静时，才离开树身，提着皮包，大步流星地走出了忠灵塔，在马家沟文明街上了电车，又在军官街下车换了人力车，径直坐往舅爷家。

夜十点多钟了，舅爷家都已睡下。我敲了好长时间的门，表婶子才出来，并向我问道：

“怎么这样晚才回来，又买啥了？”

“啊！又买了些电器材料。买完东西正碰上戏院子里来了新角打炮，又看了一场戏！”

表婶子打了个哈欠，进屋去睡了。

深夜，人们都在熟睡中。我悄悄起来，把装缝纫机头的箱子打开，把其中一个机头拿了出来，然后把电台装了进去。一台是真缝纫机，一台是假缝纫机，两个的重量一样。如果不把箱子完全打开检查，是丝毫也看不出破绽的。包装好了，我才安然睡去。

翌日清晨，我穿着一件毛料的灰色大褂，带上一顶大草帽，

告别了舅爷家，来到“国际观光局”，买了个二等快车票。然后，又去办理邮便手续。行李房里打邮便的人很多，我一眼就认出了哪个是脚行头，挤上前去拿出两元钱递给了他，指着缝纫机，说：“劳驾，朋友，帮帮忙，我这东西等着急用，请给办办急件，随着这趟车走。”脚行头看我给他两元钱，没容再多费话，就把我的邮便手续提前办好。我在“扉子”上写的地址和人名全是假的，只有我记得清楚。取货单在当天就寄回了吉林。

为了避免暴露和发生意外的危险，我把买来的二等票撕掉不要了（因为车票号码已经记在托运单上了）。又到车站另买了一张车票，这样，最安全不过，一旦出了事，因为不是原票号，他根本无从查找。

在舅爷家临走的时候，我把由吉林来时故意留的胡子全都刮掉，脸上净光光的，头发上又擦了点油。随后我又将灰大褂脱下，留在舅爷家里，换上了一套全新的西装。我顺利地登上了火车，一路上真是又兴奋又紧张，恨不能一时就到吉林。

火车驶进吉林车站。下了火车后，我急忙奔行李房：我的“货”是否来到了？路上被检查了没有？走进行李房一看，正好有个脚行从门外将我的“货”扛了进来，放在离我不远的一块空地上。我仔细地瞧了一番，好！我事先搞的暗号纹丝没动。这说明没人怀疑它；也没人检查它。眼看着电台就要到手了，当时真有说不出的喜悦。我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家。

第二天托运单就邮来了。到底怎样把“货”取回来，这在当时也是件困难而又危险的事；可是，我在事先早想好了办法。

我知道大姐家认识一个姓李的，她家过去开过成衣铺，这个女人经常贩卖大烟。如果能动员她去取“货”正合适。这天，吃完早饭我就到她家去了，对她说：

“大嫂子！我在哈尔滨办了点货，另外顶账顶来几十两烟

土,你们要不要?”

这女人一听见有几十两烟土便乐得两眼眯成了一条线,忙说:

“要啊,要啊!是什么‘土’?算多少钱呀?”

“是好‘东土’,钱好说,和我办事还能给你们亏吃吗!”

这时,她凑上前,小声并殷勤地说:

“这玩艺儿男人去拿犯疑会,叫咱家妹子去取货吧!”

“那敢情好啦,我正好还有别的事要办,没有时间去。”这句话她不说我也是要说的,她这一说正合我的心意。我把取货单留给她就走了。

响晴的天,连点风丝都没有,天气闷乎乎的热。李家的妹子在前面走,我随后瞟着,相距不过十多步远。

到了车站行李房,李家妹子由人缝中挤了进去。不大工夫就把“货”取了出来。她叫了一辆马车,立刻将“货”拉出站。这时,我依旧随后瞟着,经过街头巷尾,虽然迎面碰见许多日伪宪兵和警察,但都平安地通过了。

马车到她家门口停下。我眼瞧着她把捆绑得结结实实的木箱抬进屋去,才走开了。

过了一会儿,我看没啥动静,就到李家去了。我和李家说:

“你们这儿人多眼杂,我箱子里还有别的货,现在把货拿回去,东西明天再给你们送来!”

“好!咋办咋好!”她边说边频频点头。

我把箱子拉回家中掩藏起来。到晚上,当四邻都已鼾睡时,我悄悄地把箱子打开,将电台取出放在装米缸的底下。

第二天,我又去找我叔伯弟弟。他在铁路上工作,托他买了些上好的“东土”给老李家送去了。回来的路上,我买了些白石灰,雇车送到家里。当天晚上,我扒开火炕,在炕稍的一个角落

里，隔开一个不通烟火，四四方方的小洞，洞壁都用石灰抹得光光溜溜，简直象个小客厅一样。我给这个新请来的小“客人”，预备了一所多么干净而又保险的住宅呀。过了一天，我就请这位“贵客”住进去了。

我和报务员崔岳，第一次发报和上级联系时，心情是多么紧张而又激动啊！

那是在一个无星无月的夜晚，室外漆黑，万籁俱寂。约在子夜以后时分，我把黑窗户帘拉下，把电台从它的“客屋”里取出来，然后又把报务员连同电台一起，用厚厚的大被子遮盖起来，我去门旁听了听动静，回来掀开被角向崔岳悄声地说：

“开始吧！”

崔岳把发报机放在大腿上（这样响动可以小些），开始拍报和上级联系。

我屏住了呼吸，站在门旁放哨。发报机发出嘀嘀……哒哒……的微音，隐隐约约可以听见。这轻微的声音，真是又亲切，又令人振奋！我这时，虽然是目不转睛地盯着门外，但心却激烈地蹦跳着。

大约有半小时，崔岳揭开被子，摘下了耳机，对我说：

“和上级联系上了！……”

顿时，我激动得流出了眼泪。

就在这一天，无形的电波，将我们所掌握的情况发走了。

从我们到东北以来，这是第一次向党汇报工作。这来自远方的声音，这无形的电波，好象领导亲自在和我们谈话，给我们增添了巨大的力量——使我们充满了胜利的信心和希望。

## 打进敌人内部

一九四二年初夏。

随着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相继爆发，时局日趋紧张。日寇对东北大小城市的统治，也越来越严酷了。他们到处设置特务网，对稍有嫌疑的人就抓起来，逼供、拷打以至处死。同时，对一些要害部门，控制和封锁得尤为严密，在所有的工事和军火仓库所在地的周围，都写上“禁止通行”的字样。被抓去修工事的人，都给带上脸罩，抬起头，眼睛只能直视到工事的一角，看不到全貌。坐火车若是路过一些军事重地，都强令把窗帘摺下。象“为了完遂东亚圣战，必须谨防间谍”、“守口如瓶”之类的标语，在大街小巷的墙壁上随处可见。大幅“防谍”的宣传画，和影剧海报、杀人布告贴在一块。“防谍”宣传画上画一个妖冶的女人头像，一只眼睛紧闭着，一只眼睛睁得又圆又大，上面写着“スパイ注意”几个大字。“スパイ”是“间谍”的外来语。诸如此类的法西斯疯狂措施，无疑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不少困难。

在铁路上做操车手的老李，这时具体负责编挂车辆的工作。每当有军用列车驶进车站时，他便手拿红旗凑到跟前，不管是什么车他都能推算出其中有多少军队。因为站台旁边有一排用铁板盖的房子，路过的军队都在那里煮饭吃，一看煮了几锅饭，就

能算得出有多少人来。慢慢地他不仅熟记了军用列车的代号，连几条铁路干线的运输效能也可以估算出来。

这时的关锡赓同志，开始和“五九〇”部队里一个赶马车的工人处得很好，他们经常在一起吃酒、聊天。这个马车工人，常拉军官出门，他们对他都不戒备，在车上随便闲谈，这使他不仅能了解敌人军队里的一般情况，就是很为重要的军事情况，也有机会知道。每当他回家和老关喝起酒、闲聊起来时，无意中常把这些情况透露给老关同志。

很显然，只是这样工作是不行的，必须设法深入到敌人内部去，以获得更为重要和更有价值的材料。

六月里的一天，出嫁的妹妹由乾安县回到吉林串门。一方面是看母亲；一方面也是来看看我，因为我们之间已有十多年没有见面了。

妹妹在婚前念过中学，思想很开通，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心里是极为愤懑的。她对我也是比较了解的，我长年在外做了些什么，这次又回吉林做什么，似乎都猜到些影子。她来我家的几天里，夜间总要我讲些关内抗日战争的故事。

一个星期天的傍晚，我由外面回来，刚跨进门槛，只见有一个身姿颀长、眉清目秀，年纪有二十六、七岁的女人，正和妹妹热烈地攀谈着。

妹妹见我回来，忙介绍说：

“哥哥，你认识不？”

“呵，我长年不在家，记不清了。”我笑着说。

“她是我的朋友侯乃英，听说我回来啦，特意来看看。”妹妹接着说。

这时，侯乃英颇有礼貌地站起身来问道：

“大哥上街了？”

“呵！买卖里有些零碎事，料理料理。您请坐吧！”我说完又向她端详了一下，这人举止大方，谈吐庄重。接着，我又问了一句：“您在哪儿做事呀？”

“在吉林第二军管区参谋处。”

“在里边打字。”妹妹从旁补充了一句。

我一听说她在军事机关里做事，心中猛然一动，但因初见，不摸底细，不能多问，便搭讪着唠了些有关生活上的琐事，就走开了。

她和妹妹、母亲直唠到天黑，方才离去，一家人满怀热情地把她送出门外。

军管区参谋处打字员侯乃英的出现，对我来说是一件很不平常的事情，我在设想能否从她这里，深入到敌人的内部去。但是，在目前我必须先摸清她本身的情况。

当夜，我便向妹妹询问有关侯乃英的情况。从妹妹口中我才知道：她和妹妹非常知己，是不啻手足的好朋友。原来，在我出外的十年中，侯乃英家曾经搬到我们东院住了几年。那时，侯乃英家一共是七口人，有个哥哥长年在外，不知下落，家里只剩下四个妹妹和一个双目失明的老祖母。她原在伪市公署打字。一家人全靠她一个人挣钱过活。

我家和侯家的处境仿佛，我同侯乃英的哥哥一样，也一直在外不知下落，家里也只剩下几个女人。境况相仿，同命相怜，自然是越处越近。当时，侯乃英只靠打字赚钱维持不了一家人的生活，便同我母亲、妹妹等在一起，给袜子工厂缝袜后跟挣钱贴补家用。她们每天晚间坐在一起，一缝缝到深夜，无话不谈，无苦不诉，有难处互相帮助，有愁闷互相解劝，彼此相处得深如亲生母女、同胞姊妹。

当我听说侯乃英的哥哥不知下落，便问起妹妹：

“她哥哥叫什么名字，到什么地方去啦？”

“叫侯小谷，听说在哈尔滨呢，好多年没有一点音信！”妹妹告诉我说。

听到侯小谷这个名字，使我突然一惊说：“怎么，她就是侯小谷的妹妹？太巧了！”

侯小谷这名字我是熟悉的，他是我们的同志，是共产党员，在哈尔滨工作时，我和他有过接触。组织破坏以后他被捕了，在狱中表现得很英勇，后来被敌人暗暗杀害了。

侯小谷的壮烈牺牲，侯乃英是不知道的。她只知道哥哥是共产党，关于这个，她除和我妹妹谈过之外，向任何人也未吐露过，每当有人提起她哥哥的时候，她便说：“做买卖死在外边了。”因此，她的邻居和所在的机关，都信以为真。由于她在伪市公署打字时，工作细心、谨慎，井井有条，打字技术又很好，所以军管区便要调她，在未调之先，军管区里的“思想对策室”（特务部门）对她还曾做过专门审查，结果认为她社会关系少，没有问题而采用了。以后，敌人对她也是信任的，因为侯乃英为人老实，再加她为了保住职业，端住饭碗，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工作中也是一直的小心谨慎，从未出过什么差错。

我把侯乃英的有关情况占有了之后，做了一番仔细地研究，最后确定争取她，从她的整个处境来看，是有这个可能的。

我想在妹妹没走之前，再进一步对侯乃英做些工作。

在妹妹临行前的一天晚上，我让妹妹将侯乃英请到我家吃晚饭。她带着她的小妹妹来了。

晚饭后，我同妹妹一起和她唠扯起来。这次谈话我完全是试探性的，先谈些家常话后，便有意地转了话题问道：

“你在军管区打字很累吧？”

“闲不着。”



“那里的日本人很多吧？”

“嗯。”她苦笑了一下，点点头说，“各部门里都有。”

“和他们在一起共事，能合得来吗？”

侯乃英看了我一眼，长叹了一口气，向我讲了那帮畜牲的所作所为，倾诉了他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又叹息了一声说：

“光恨有什么用，国家都亡了，咱们还不是被人家踩在脚下……”

“不！咱们国家不能亡，永远也不能亡！”我这低而有力的话语，使得侯乃英马上停止了未说完的话，抬起头来，睁大了眼睛，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我望着她和妹妹又进一步说道，“你们应该知道，恨日本人并不是少数人的心理，每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恨，都在抗击着日本强盗的侵略。问题是这些颗心还没有联结起来，还没有从怨恨变成行动，假若所有的人都能自觉地行动起来，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很快就会完蛋了……”

侯乃英一直聚精会神地听着我讲话，从她那略带惊讶的眼神里，从她那微微红晕的面庞上，我感觉到她的感情已经被激动起来。我必须进一步巩固她这种可贵的感情，把试探性的谈话，变成有意识的教育，把她的爱国心唤起来，使她逐渐觉悟到一个中国人的责任。于是我便接着向她讲起抗日的故事来，从东北讲到关内；从城市讲到乡村。她和妹妹俩静静地听着，我一边讲着一边注意观察着她的感情起伏，我见她的感情随着我的感情而变化，她的心也随着我的心在跳动，她和我之间的思想距离，渐渐地缩短了，缩短了……

我们一直谈到天黑，侯乃英似乎忘却了时间，仍然全神贯注地在听我讲。我这时看了看表说：

“时间不早啦，改日再谈吧。”

这次是妹妹送她走的。在妹妹去穿衣服的时候，我悄声地

对妹妹说：“你送侯乃英走，在半路上可以听听她对我的看法。”

妹妹晚上回来告诉我说：“侯乃英已经看出你不是一个简单的商人。至于你到底是什么人，她一时还摸不清。”

妹妹第二天一早就起程回乾安了。

又过了几天，我感到争取侯乃英的事情不能拖得太久，必须当机立断地和她作一次正面谈话。通过两次接触和侧面了解，已经完全可以断定她是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如果能够更加激起她的爱国热情，就可能争取过来，为我们工作；如果万一她胆小怕事，不敢承担，那也不会暴露我，因为我和她哥哥是同样的人。

一个月朗风清的晚上，我叫妻子把她请来了。一开始扯了些闲话，然后，我便郑重而又严肃地谈起她哥哥的事来：“我认识你哥哥呀，他在哈尔滨曾同我做过同样的事！”

侯乃英突然仰起头，惊讶地问道：“你认识他？哥哥十多年没有给家来信了。”

这时，一种对死难烈士悼念和崇敬的心情，使得我的声调缓慢而低沉下来：“侯小谷同志，在哈尔滨牺牲了……”

她“呵”的一声，脸色立时煞白，两眼呆呆地直望着我。我接着问道：“你哥哥是为啥牺牲的，你不知道吗？”

她的嘴唇抽搐了几下，泪水顿然从眼眶里滚落下来，声音有些颤抖地说：

“我听说他被捕了，可是原因我不完全知道……”

“他是为祖国人民、为民族解放事业而牺牲的，死的光荣啊！”……我的眼前出现了侯小谷同志那可爱的英雄面孔，想起了在哈尔滨我们共同战斗的年代，想起了那些可敬可爱的战友们，有多少同志象侯小谷一样，坚贞不屈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他们死得英勇，死得壮烈……

我竭力抑制住内心里的激动，向侯乃英慢慢地讲述着：“那年组织被破坏，你哥哥被捕了，开始敌人劝诱他投降，侯小谷同志愤怒地破口大骂。从此，鬼子便对他进行严刑拷打，他昏过去，又醒过来，倒下去，又站起来，他始终没吐一个字。最后鬼子对他没有办法了，便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里，从狱中把他拉出来，装在麻袋里，用汽车拉到松花江，在江心里砸开一个冰窟窿，他就这样……牺牲了！”

侯乃英听到这里，泪水纵横，蓦地趴在桌上“呜呜”地低声哭泣起来。半天，才缓缓地抬起头来，我望着她那满含热泪的眼睛，又激昂地说道：

“光难受是没有用的，做妹妹的有责任为哥哥报仇！杀你哥哥的不是别人，正是日本强盗！”

她点了点头，抽泣着说：“哥哥自从去哈尔滨以后，就断了音信，一家人经常叨念，尤其是祖母，白天晚上想，有时候长久地倚门四下张望，寻思哥哥一下子就会由哪儿回来。哥哥在外从事反满抗日的活动，我过去知道一些，可万没想到他会遭到这样的毒害……”她的话说到这里，又抑制不住内心里的剧烈刺痛，竟放声大哭起来。

随着她的哭声，我也更加激动起来，我站在她的面前说：“亲人牺牲了是要悲恸的，但是我们应当把悲恸和愤恨化为力量！在我们伟大的民族解放事业中，不知有多少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抛出头颅，洒尽鲜血，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但是，革命的力量是杀不尽的，倒下去一个，站起来千个，我们活着的人决不能让烈士的鲜血白白地流掉！你作为一个革命烈士的妹妹，应该继承烈士的遗志，沿着你哥哥走的道路勇敢地走下去！”

侯乃英止住了哭声，脸从手背上抬起来，睁大了两只眼睛直直地望着我，在闪烁的泪花中逐渐射出一股愤怒而坚定的光芒。

忽然，她攥紧了双拳，斩钉截铁地说道：

“对，我要继承烈士的遗志！我要替哥哥报仇！”

“对，应该这样做，也需要这样做。不过决不能盲动。”我坐在她的对面，直望着她说道，“经过几次接触，尤其是今天晚上的谈话，我是什么人你大概也清楚了。”她不加思索地说道：“你和我哥哥是一样的人。”我点点头说：“我希望你也能成为和你哥哥一样的人。现在，我想给你些事情去做，这是对祖国有益的事情，你只要做好了就等于给你哥哥报了仇，也等于给所有死难烈士报了仇！”我顿了一下，接着又说，“你应该知道，我们并不是单枪匹马的进行斗争，我们是和整个人民站在一起，而且我们和敌人斗争是有经验的，只要你按照我们党所指的道路去走，就一定会胜利！”我看她静静地听着，便向她阐述了一下国内外的形势，最后说，“……现在，我们中国到处都有共产党，到处都有抗日活动，日本帝国主义是长不了的！”

她擦干了脸上的泪痕，昂头直望着我。从她那诚挚热烈的眼光中完全可以看出，她对自己即将要做的事情，充满了信心。她十分激动而又坚定地表示道：

“我要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为祖国做一切需要我做的事情，请你完全相信我，告诉我怎么做吧！”

侯乃英的话语，使我深为感动，我高兴地频频点着头。

对一个刚刚工作的新同志，在工作方法上，应当采取先易后难的办法，否则，将会使她因感到困难而退缩不前。勇敢的性格，也是需要锻炼和培养的。所以，我第一次给她的任务，是叫她把吉林第二军管区的组织机构情况写出来。

她很爽快地接受了任务，并问道：“这件事情好做，什么时候给你送来？”

那时候，她还是一个未出嫁的姑娘，在旧社会，一个待嫁的

女人经常和男人接触是容易引起别人议论的，特别她是在敌人军事机关里做事，就更能引人注目。因此，我嘱咐她说：

“为了长期隐蔽下去，我们是不便多接触的。要采取暗接头的办法，你平常不要找我，有事的话，我会设法找你的。你把我所需要的情況写好以后，找个小铁盒装好，每星期三晚上八点半钟，放在你家门前的石头堆的空隙里。这个地方我昨天去看过，又僻静又不引人注目，我在相隔二、三分钟的时间内就去取出来，你看好吗？”

她点了点头，表示同意。我接着又叮咛她说：

“你到我家里来，也不是绝对不可以，一个月来一次或两次，还是没啥问题的。你来时，最好在星期六的傍晚，带你小妹妹一起来，装成串门的样子。”

一切谈定，她高高兴兴地走了。我望着她的背影，直感到好象换了一个人。

关于军管区的组织机构情况，我按时取来了。接着，我又给了她一件较容易的任务：将军管区里各组织机构负责人的名单开来。这个任务，她也很快就完成了。我觉得，侯乃英已经越来越勇敢了，再给她些较重的任务，也是可能完成的。

一天清晨，雾气笼罩着整个城市，清澈的松花江水，平静而缓慢地流着。我早晨起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清爽的空气，然后奔巴虎门外的北大马路走去。

这条路，是侯乃英上班的必经之路。她上班来的方向是从西往东，而我就从东往西慢慢地走着。果然，不久就见侯乃英从远处走来。当遇到一起的时候，我就站下故意提高声调问道：

“上班吗？”

“是啊！大哥你上哪儿去啦？”她也大声地回答说。

“我到‘岔路乡’办点事。”

这时，我们躲开路上的来往行人，站在路旁，我悄声而又快速地说道：

“你前两次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很有价值。目前，你再搞些新的材料，敌人越秘密的越是我们所需要的，保险柜里的东西，对我们最有价值。”

“好吧！”她轻声说完，又改换高声边走边说：

“你叫大娘来串门呀！”

“好哇！”

我们点了点头，就各自走开了。

打这儿以后，我对侯乃英寄托着很大的希望。每在星期三的这天夜晚，我的心就不能平静。因为，这是一个不平常的夜晚，又不知从侯乃英那里将会得到什么样的重要材料。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又来到了星期三。

晚饭后，天已昏黑，淡蓝色的天空中，缀上了几颗明亮的星星。我满怀希望向侯乃英家所住的岭前胡同走去。晚秋天气，夜里有些凉，皎洁的月光洒在地上，更给人增添了一些凉意。路上，行人稀少，我刚转入岭前胡同，恰遇侯乃英同志正在幽静的月光下，弯腰打扫门前路上的落叶。

她抬头见我远远地走来，急忙走到一堆石头前面，将身子略蹲一下，然后又向我微微点个头，转身走进院去。

从她借扫落叶在门前等我，以及点头示意等情形看，我预感到这回可能不是一般的材料。我左右环顾了一下，见四周静悄悄地没有行人，便急步走到石头堆前。

这次装材料的小铁盒没有放进石缝里，而是摆在一块大石头的下边。她是看见我来了，有些着急吧？我没有马上俯身去取，先用脚尖轻轻一踢，小铁盒便从石头下滚了出来，接着一俯身，便将小盒拿在手中。这时，后面传来几声犬吠，可能是有行人

过往,我没有回头,直向前方走去……

昏黑的夜里,万籁俱寂,趁人们熟睡的时刻,我把黑纸窗帘放下,将小盒里装着的软纸文字材料,用双手经心地摊开:“关于吉林第二军管区军队和装备的分布情况”的显著字样,倏然映入眼帘,我真是兴奋极了,一口气从头读到尾,心里不断地说:干得好,干得妙呀!这是多么有价值的材料!它给我们对敌斗争提供了多么重要的资料啊!这一夜,使我兴奋得好长时间没有合上眼睛。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侯乃英领着小妹妹来我家串门来了。我特意问了她的,上次的材料是怎样搞出来的?同时也将这份材料的重要意义,向她简要地说了一下。这时,侯乃英的眼睛里闪出了欣喜的光亮,接着向我述说了详细经过。她说:

“军管区里的敌人,对一些机密材料控制的特别严密,专门设有机密室。机密室里有个大保险柜,所有的重要机密材料,都装在里边。自从你在北大马路告诉我:‘敌人越是机密的越是我们所需要的,保险柜里的东西,对我们最有价值’。以后,我总在想着这句话,想着该怎么办?”

“正在这时候,机密室里的那个留撮小黑胡的鬼子,拿来一份材料放到我的桌前,急匆匆地说:

“‘侯桑(先生),三份的要,快快的……’

“‘是!’我说。

“三份材料只好打软纸,当我摆好材料往机器上安软纸时,我发现材料的标题,心里立刻就怦怦地跳动起来,我想:这是保险柜里的材料,太重要了,这正是我们极为需要的呀!怎么办呢?一边打一边记下来?不行!材料好几大篇,其中还有很多数字,是记不完全的;再不我就抄一份,也不行!这样做会被敌人发觉,同时鬼子对材料也要得很急,怎么办?怎么办?对!在

机器上安上四份软纸，多打出一份！”

侯乃英讲到这里，我笑着问她一句：

“这时候，你害怕不？”

“怕是怕，心总是怦怦乱跳。可当时，我并没有想被人发觉后将会怎么样，我只是想这份材料，一定是我们所需要的，无论如何也要把它弄到手才是。”

“不能光想怎样弄到手，也应该想到，如果万一被敌人发觉应当怎样说。我们的工作，万不可单凭侥幸。”我微笑着告诉她。

“是呀。”侯乃英的脸微微发红地说，“这些我事先都没有想好，幸亏事情顺利，万一出了差错，非惊慌失措不可呢。不过临时也能编出理由来，我可以说数错张数了，也可以说听错了。……”

“好哇，临时还能编出理由来就不错，一次、两次惊慌，三次、四次就会沉着了。今后再干，事先要周密考虑，设想着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编出各种理由来，到时候沉着应付。”我说完又对她进行了一些鼓励。最后据我所知道的近一个时期的国内外形势谈了谈，并有意识地向她讲了讲党的斗争历史，和一些有关党的基础知识。直到夜深，她才和小妹妹一同回去了。

以后，侯乃英通过种种方法，陆续不断地带出好多极为重要和有价值的材料。象军管区每月给伪治安部的月报材料，以及军队的部署、装备、思想动态等情况。甚至象在哈尔滨松江铁桥上日伪部队发生武装冲突事件的详细经过，以及伪军十一团在热河向我军进攻后，遭受打击的伤亡情况，也及时掌握了。通过实际的斗争锻炼，侯乃英同志的工作愈来愈大胆，思想更坚定。

除此之外，其他工作同志也不断地获得重要情况，如象日寇



关东军五九〇部队的分布情况、武器装备情况；另如吉林铁路局各线车、机、工电的人数以及在战争时期二十四小时内都能出多少次列车等情况，我们都掌握了。

在国际、国内的形势鼓舞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同志们的革命热情都很高，工作正在一步一步地开展着。

## 警 钟

凛冽的北风不停地呼啸着，漫天飞扬着烟雪，家家户户的门窗玻璃上，长满宛如银丝刺绣般的冰花，分外好看。一九四三年的冬天已来到了吉林。

我们的工作，由于能够不断地得到领导上的指示，因而，更加深入地开展了各项活动。报务员崔岳已当上了“新京”《康德新闻》的记者。每星期六夜晚返回吉林发报一次。我的隐蔽环境也愈来愈稳固了：在原有估衣铺买卖的基础上扩大了投资；另在别处开设一座估衣铺和一座织布厂。王可耕和马德恩都增加了投资。在当时，买卖越大，社会地位就越稳固。而且买卖一大，我也可以借口应酬多，不亲自经营了。具体掌管商务的经理叫别人去担当，我只是做个监理。这样就可以抽出身子多做些工作，同时，在与外界的结交上也创造了许多的方便条件。

随着买卖的扩展和兴旺，我把自己完全装潢成为志于经商的样子。这时，有些商人见面时已不再叫我的名字，而称我为“李维大”了。

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这是党经常谆谆告诫我们的话。我们的工作虽然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展，隐蔽环境虽然也更加稳固起来，但我并没有忘记：要时刻警惕着敌人。

一天清晨，我还没起床，妈妈忽然在外边敲着窗户招呼我：“维民！你快起来看看，咱们和老赵家的板障子被人扒走了……”

外边刮着大北风，妈妈的喊声我听不太真切。妻子又从外屋跑进来告诉我一遍，才听明白。我一翻身从炕上爬起来，迅速地穿上棉衣，一边系扣一边往院子里跑……

我家的院子是用整齐的木板圈起来的。那时候长白山的林木随便采，木材多，木板便宜，有些人家使用木板做院墙，当地人管这叫板障子。

这时我站在房门前一看，奇怪！临街的板障子还完整无缺，唯独我家和西邻赵家之间的隔界的板障子被人扒了二十多块。我走近前仔细察看一番：赵家那边地上留了很多木屑、脚印等痕迹，顺着这些痕迹往前看，发现他家邻街的板障子也被扒了，可能是从那里开始的……

我正在观察着，老赵家的房门响了，一个贼亮的大秃头从房门里探出来，刚向这边瞥了一眼，就“哎呀”一声，随着推开房门，一个胖大的身躯跌跌撞撞地向这边跑来。接着，又跑出来一个妖艳的年轻女人，手里举着一顶水獭帽子，一边跑一边细声尖气地叫着：“哎哟！我的祖宗！这么大的北风，你也不怕吹着……”

年轻女人撵上秃老亮，把水獭帽子扣在那亮脑门子上。

我这时忙向秃老亮打招呼说：“爷们儿，快来看看吧……”

“怎么回事儿？是让人给扒了吗？”秃老亮跑到我跟前，喘着粗气说。

“我正在琢磨呢。”我又一指他家邻街的板障子说：“还有那儿……”

他扭头一看，又“哎呀”了一声就往那跑。那个年轻女人也跟着他跑。他跑到跟前看了看，又奔到大街上猫着腰看。都看完了，才转回来走到我面前，眨着狡黠的眼睛，长叹了一口气说：

“全看明白了。爷们儿，咱们就认倒霉吧。这好象不是一般小偷干的，是套着大车来的，干得干净利索！”

我盯着他那张大白脸说：“再利索也得出点响动啊！咱们怎么一点响动也没听着呢？”

秃老亮用手向天上一指说：“刮大风啊！是老天爷帮了他的忙，他专挑这样的夜黑头干。”

这时站在他身后的年轻女人，弓肩缩背地一拉他说：“哎呀！老头子，这么大的风，你们爷们儿到屋里去唠吧。”

我一见这情景忙说：“你们回去吧，等会儿咱们再商量。”

“不，爷们儿，用不着商量。”秃老亮摆着手说，“这点小事，你不用管，我包下了，保准过几天就换上。”说完他哈哈一笑，领着年轻女人进屋了。

我也往屋里走去，边走边想这个人……

原来这个人姓赵，名明宇，那个妖艳的年轻女人是他新上手的小老婆。

赵明宇，是乌拉街的老地主，三番子头，也是个地道的大流氓。平日里除了想方设法剥削农民外，就东走西串，竭力巴结宪兵、警察和特务，为他们穿针引线，进行敲诈勒索。早年，我家曾和他的一个本家住过邻居。因此，当我一回到吉林的时候，他就和我“爷们儿”长“爷们儿”短的套交情。“爷们儿”在东北是上下两辈人的通称，长辈管晚辈叫“爷们儿”，晚辈也管长辈叫“爷们儿”。他既这样叫，我也就应付着叫起来。但我对他一直是心存警惕的。他见我“发财还家”，就极力表示亲热；我却对他不即不离，既不给他难堪，也不报以亲热；他要到我家串门，我只是对他特别客气，但并不和他深谈。天长日久，他也就不来了……

……我想着赵明宇这个人，想着突然丢失的板障子。由于我对前者心存警惕，对后者也就想了许多。吉林是个出木材的

地方，木板值不多少钱，为什么要赶着大车来偷呢？既有大车，为什么不到山上去伐新木材呢？而且赵明宇是个从不吃亏的大流氓，现在平白无故丢了板障子，他既不想法捉贼，也不找人报案，反倒自认倒霉，这和他的为人处事也对不上号啊？我越想越感到这里有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我要稳住神，看个究竟。

第二天，我从新开的织布厂回来，发现赵家那邻街的板障子已经修好了，用的是崭新的松木板子，修补得整整齐齐。我以为院子里大概也修上了，谁知推开院门一看，可倒好，一块木板也没补上，两个院子仍然通连着。

这是怎么回事儿？赵明宇不是说他“包下了”吗？我真想过去问问他。可我立即否定了这个想法，我要不动声色地观察明白。

一天、两天过去了，没有动静。越没动静我越警惕起来。又一个晚上，我一个人对着一盏孤灯看报，一边看一边留神听着窗外的动静。外面北风吹得正紧，窗户纸发出沙沙的响声，天空阴沉着，天上地下一片漆黑。我觉得屋里很冷，刚要站起来活动活动，忽听窗外“叭啦”一响，心里一惊，立刻想到这是我斜插在墙根下的一根木棍倒了。我在窗前插了好几根木棍，是起报警和“绊马索”作用的。我马上从椅子上蹦起来，两步跳到外屋地，从菜板上操起切菜刀，一推房门，蹿了出去。借着屋里射出来的灯光，影影绰绰看见一个胖大的身影，紧贴着窗框站在那里，我一举菜刀，喊了一声：“谁？”

“哎呀！是我，爷们儿，慢动手！”

是赵明宇。我把菜刀往下一放说：“是你呀！多险，我要一刀砍下去……”

这个流氓看我放下菜刀，竟嘿嘿一笑说：“你哪能不问明白了就砍呢。”他一边说着一边从窗框旁走过来，站到我对面，忽

然压低声音说，“爷们儿，你知道我来干什么？”

我没回答他，直直盯着他。

他又往前凑了凑说：“从打咱们的板障子丢了以后，我就加上小心了。黑天常出来转转，刚才正在我的院子里走，忽然听见你这窗户底下有响动，我就摸过来了……”

“你听见什么响动了？”

“好象是一个人的脚步声。”

“我怎么没听见？”

“你在屋里，隔着墙啊。”

“隔着墙我也能听见。”我直盯着他说，“跟你一样，我这两天也加上小心了。”

“对，对。多加点小心好啊！”赵明宇忙点着头说，“以后咱们两家就联络起来，免得人单势孤。这板障子也不用修了，两家院子通连着，遇事好有个照应……哎呀！你穿得这么单薄，别冻着，快进屋吧。明天见。”

赵明宇点头哈腰地走了。

在这漆黑的夜晚里，我却把赵明宇看明白了。这个家伙为了窥视我的行动花了多大的心思呀！但是他为什么要用尽心机地窥视我呢？我自信在他面前没有露过一点破绽，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引起他的怀疑。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干呢？莫非他听到了什么风声？莫非他受什么人的指使？在他那秃亮的大驴头后边还有一根线？这根线是从哪来的？果真如此，问题就复杂了。

为了躲开他的贼眼，我分别通知侯乃英、关锡赓、老李等同志，除非发生紧急情况，不要到我家里来；接头地点，完全改在别处，并且要他们提高警惕。唯一难办的是电台的发报工作，在没有弄清事情真象以前，还应该坚持下去，只是要更加小心了。

又过了一个时期，已进腊月，二十四日这天早晨，我起床后

刚刚刷完牙、洗完脸，正要吃早饭，赵明宇的大驴头又忽然探进了我的屋门。他一龇牙，说道：

“爷们儿，得闲吗？”

“有事吗？”我也一笑说，“请屋里坐吧。”

赵明宇一扭身子进来了。他穿了一件黑缎子对襟短皮袄，袄上闪出的青光正好和肥脸上的油光相映照；他的脖子后头嘟噜着一块肉，双眉脱落得只剩下两道肉岗。他将一对细而又长的眼睛，眯成一条缝，探着身子向我说道：

“爷们儿若得闲的话，过会儿请到寒舍说点事儿。”

“什么事情？”

“这个……”他左右看了看，挤眉弄眼，故作为难地说，

“这个事儿最好到寒舍去谈，用不了多长时间……”

“好吧。我马上去。”

赵明宇走后，我一边穿衣服，一边忖度着他找我干什么？从他那故作神秘的样子上看，莫非要向我作正面试探，抑或要向我摊牌？不管怎样，“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试探虚实。

穿好衣服，我就走进赵家。赵明宇一下子就把我领进他小老婆的卧室，让我坐下，倒了一杯茶水。然后推开门，向外探头看了看，又关严门，放下门帘；返回身来，又向窗外看，随后又放下窗帘。屋里顿时变得昏昏暗暗的。

这个老家伙弄什么鬼把戏？是不是要造成我心理上的恐惧？看情形是一开始就要向我猛扑过来了，不等他开口，我就先问道：

“爷们儿，干什么这么遮遮掩掩的，还有什么怕人的事情吗？”

他看了看我，没开口，只嘿嘿冷笑了两声，笑声在幽暗的斗

室里盘旋，就象从地底下钻出来的一样。他两眼直勾勾地看着我，一步一步地走到我的面前，半蹲下身子，一字一板地说道：

“爷们儿，你的案子犯了！”说完了就一动不动地盯着我，两只细长的小眼睛尽量往圆瞪，瞪得眼皮直哆嗦。

“什么案子犯了？”我猛往起一站说，“我一不做贼，二不害人；我开的买卖从阳历年前就关起门来清账，一直到现在也没进货，也没卖货，有什么案子可犯？”

“你，你……”赵明宇的小眼睛不再瞪了，接连着挤咕了几下。忽然一拍我肩膀笑道，“你别急，咱们坐下慢慢说。”

他紧坐在我身旁，将嘴凑到我耳边说道：“你最近不是要买房子吗？”

“这不假。不过柜上算下来的钱有数，若想买房子，买卖就不能发展了。”我把身子向远处挪了挪说，“可是买房子总不会犯法吧？这怎么能和犯案不犯案扯到一块儿去呢？”

赵明宇没有马上说话，他端起一杯茶水，连喝了两口，然后又凑到我的面前，目露贼光地说：

“有钱买房子倒不犯法，可是这钱是怎么来的……爷们儿！”他又嘿嘿冷笑了两声说，“你心里会比我明白吧。”

“当然明白，这有账可查！”

“这账谁也查不着，离这太远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你不明白我就替你说了吧。”他恶狠狠地用手向北边一指说道，“你的钱是从赤俄来的，是苏联老毛子送给你的！”

赵明宇的话，使我心里猛的一动。但是我立刻抑制住内心的震动，我不加思索地反问道：

“这话是谁讲的？是出于你的嘴，还是有人在借你的嘴说话？”



“我讲的怎么样？别人讲的又怎么样？”

“我自己倒不能怎样，不过我想有人会管这事的。俄国离这么远，他怎么会知道？钱是经他手转交的，还是他和俄国有勾通！”我的话使他张张嘴，没说出什么来。我不等他想好下面的话，就紧接着说道，“我生在吉林，长在吉林，从前是受过穷，现在学会了做买卖，靠朋友的帮衬，赚了几个钱，有人看着我的钱眼红，就想方设法要‘勒’几个。可是我这人向来吃软不吃硬。若是有人想在我身上打主意，我宁肯倾家荡产，也要和这人见个高低上下。”

“爷们儿，你这话是从哪儿说起呢？”赵明宇的脸忽然象巴掌打了一样，一红一白地强挤出一副笑脸说，“咱们赵李两家是老交情了，我个人怎能打你的主意？”

“那么是谁呢？”我见他已经软下去了，就直对着他紧逼一句。

“我，我这是受官府所托，出于无奈呀！”

“是什么官府？是省警务厅？还是市警务处？我从回来开了买卖以后，从来没有对不住哪位的地方。”

“这，这事情……”他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小眼睛不住地眨动。

我见他已经话到唇边，就又将了他一“军”道：“爷们儿，有什么你就说吧，我对人从来就是肝胆相照，两肋插刀，你这样吞吞吐吐，难道其中还有见不得人的事情吗？”

“不，不是。”他忽然把眉头一皱，一跺脚说道：“唉，爷们儿，你既然说到肝胆相照，我就看在父一辈子一辈子的交情上，对你实话实说吧。”说到这里，他往我身边一凑，压低声音说：“是省警务厅‘特高’股长葛警佐让我监视你。”

“葛警佐？”我心里猛然一动，极力保持住原有的镇静，冷笑

了笑说，“我和他素无瓜葛，他监视我干什么？”

“他是奉了日本宪兵队和‘二宪’的命令。”

“这就越说越远了。”我更加装出不以为然的样子说，“我一个买卖人，和宪兵队怎么能沾上边！我若偷税漏税有税捐局，贩卖违禁品有经济警察，宪兵队监视我干什么？”

“他们说你是共产党八路军！”

“哈哈！”我笑了笑说，“这是从哪说起的？一个买卖人和共产党真是离着十万八千里，怎么扯到这上去了？这话是谁给我编的？编的也太笨了。”

“这话都是葛警佐亲自和我说的，我若掺半点假，就不是人。”赵明宇脸红脖子粗地说。

“不要发誓。”我严肃地摆了摆手说，“我当然信得过爷们儿，我想爷们儿也信得过我。请爷们儿转告给他们，李维民是有根有底的买卖人，如果他们想做买卖，我可以帮忙，别的事情请他们就不要白费心思了。”

赵明宇见我起身要走，忙拦住我说：“爷们儿，咱们是父往子交，我才把这些话都告诉了你，你可不能向外说呀，这若传到宪兵队和葛警佐的耳朵里去，我这脑袋都怕保不住哇！”

“谢谢爷们儿的照顾，我不会亏待朋友。”

“再有，你也不能逃跑啊！”他又拦住我说道，“你不但跑不了，抓回来……”

我没等他说完，便大声说道：“请你不必担心，日本人和葛警佐的刀虽快，也不能杀无罪之人。我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为何要跑呢！”

“好好，爷们儿，以后彼此多关照吧。”

我点点头转身就出来了。

## 溯 本 求 源

和赵明宇的一番谈话,犹如一响警钟,它正式向我宣布:敌人已经在我身旁嗅到了什么,我必须更加警惕。

赵明宇所说的葛警佐,是个血债累累的特务头子,他名叫明福,字称方宸,是永吉县官马山人。早在一九三八年,他就在吉林当特务。他曾捕过我党的群众组织——“反日会”中三十多名同志。一九四〇年,他在桦甸警察局当警尉的时候,在日本特务头子的指挥下,改头换面,伪装进步,靠近我抗日联军杨靖宇将军的队伍,使我军方参谋等六位同志受害。他在东边道“讨伐”我抗联部队时,由于大捕大杀有功,日寇关东军野夫少将曾授予他一张“感谢状”。一九四一年,他又参加了吉林西北地区特殊班(特务组织)的罪恶活动,在他的指挥下,曾破坏了我抗联赵尚志部队所领导的“一日成功”的群众爱国组织,先后捕了十二人,其中有八人被害。

这样一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反共老手,自然要在他的日本主子面前倍受垂青了,于一九四二年便一跃擢升为警佐,充任了吉林省警务厅的“特高”股长。从此,他就专做所谓“思想对策”的工作,到处抓“政治思想犯”。他手下有六个警尉级的特务,一般的腿子和鹰犬就难以数计了。他的家与警务厅设有专

线电话,经常是白天睡觉,夜晚干事。葛明福自从上任以来,为讨好他的日本主子——警务厅长官田卿的欢心,又不知无辜杀害了多少爱国群众。在他的控制和掌握下,有一个监禁政治犯的“二六庄”(地点在吉林市二道码头原同文商业学校对过,宾筵春饭馆的南邻),这个地方,从外面看起来和日本人住宅一模一样,一座座日本式的小洋房,白日里鸦雀无声;关押、审讯和枪杀政治犯,都是在夜间进行。葛明福就常在深夜悄悄地来到这里。他的双手虽然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却罩上了一层雪白的手套,表面上从不参加捕人和审讯,好象恶事都是别人干的。但他的假面具没有瞒过人民群众的眼睛,如当时在吉林曾传诵着这样一首民谣:

人民若爱国,  
先除葛警佐。  
若想打日本,  
先杀葛方宸。

我开始被这样一个家伙注意起来,怎能不使我倍加警惕呢!

后来,我经过一番走访和探听,才揭开了葛明福派人侦察我的谜底。他对我的注意是从一台印刷机引起的。原来在一九三三年金景叛变时,我曾把一台印刷传单用的油印机,寄存在我的叔伯嫂子家里。以后,我便很快地转移到哈尔滨去了。

问题就是从这里发生的,我嫂子的哥哥——“正大茶庄”的郭经理,在一次闲谈中,无意中将此事透露给赵明宇。于是利欲薰心的赵明宇,便认为大发横财的机会来到了,很快地就报告给葛明福了。葛明福得知之后,便去“正大茶庄”进行调查。但是,查来查去仅是一台油印机,还说明不了我就是共产党。不过,在诡计多端的葛明福和他的日本主子的头脑中,对我这个

“商人”已经画了个问号。从此，便开始了对我的侧面侦察，想从我身上寻找出共产党的真凭实据，然后好向我伸出毒手。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葛明福所利用的赵明宇，非但未察出我的破绽，反将真情暴露在我的面前了。

一九四〇年以前，敌人实行大捕大杀、血肉横飞的政策。后来，改用了“怀柔政策”。目前，敌人没有向我伸出毒手，一方面是缺少实据，更重要的是他们想放长工夫进行侦察，梦想从我这里打开一个缺口，使一大批共产党员落入他们的魔掌。根据这种情况，我家随时都有被搜查的可能，我所最担心的就是电台，不能让它落入敌人手中，要将它迅速转移到安全地方去，一刻也不能迟疑。

一天清早，东半天刚刚透亮，我便将电台从炕洞里拿出来，装在提包里，悄悄地拿着出了门。离年近了，卖年菜的小车开始在街上走动，卖豆腐的吆喝声也不断从小巷里传出来。我不走小路，只走大道，不走道边，只走街心，行动不鬼祟，就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不大工夫，就来到了我的大姐家门口，我熟悉大姐家的环境就象熟悉自己家一样。我向四周扫视了一下，见没有行人，便用小刀从门缝里悄悄将门插关拨开，轻轻推开门，闪身进去，又悄悄将门关好。我站在窗外听了听，听见均匀的鼾声。大姐全家正在鼾睡。我转过身来，蹑足潜步地向堆放杂乱东西的小板棚子里走去。在小板棚的角落里，正堆着一大堆取暖用的大米皮子，我将大米皮子扒开，扒得深深地，然后将电台塞了进去。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藏好电台之后，我便出了板棚，又出了院门，照样将门关好，于是我就迈着轻快的脚步回家了。

回到家里，时光尚早，赵明宇这时仍然还在睡乡中。于是我便将预先准备好的白石灰拌好，动手抹炕。把炕洞子完全抹死，又和整个炕一样，糊好了牛皮纸（当时芦苇炕席完全军用，老百

姓没炕席，只好用纸糊)。现在，从我的家里已经查不出丝毫有嫌疑的证据了。

但是，将电台藏在大姐家院内的大米皮子里，并不是一个长远之计，必须换一个既可靠又能随时取用的地方。我们不能长久地停止发报，只要情况稍一稳定，就要恢复和上级的联系。

我想了又想，想到了原在永衡印书局一个姓刘的厨师。这个人老实、敦厚，社会关系少，平日家里来往客人也少。他家原是关内榆林县人，平日与我很要好，每当他生活上有了困难时，我常常接济他。他家对我满怀着感激的心情，若将电台藏在他们家里，一方面安全、可靠；同时他们也不会拒绝。

在夜阑人稀，星斗满天的时候，我又将电台从大姐家院内拿走了。

来到刘家门口已是深夜，我轻轻地敲开门，老刘大嫂在热被窝里爬起来，热情地将我让到屋里。我见刘厨师不在家，便指着提包说：

“刘大嫂！这里边是大烟斗、烟枪、烟灯罩，是柜上兑铺垫的时候兑来的，现在快过大年了，外边查得很紧，你这儿僻静，暂时藏到你家棚顶上吧！”

“行啊，行啊！放在这吧！”刘家大嫂满口答应说。

刘家厨房的天棚被烟熏得黑黝黝的，上面挂满了蜘蛛网和塔灰，我登上锅台，用一个小木棍将天棚板慢慢掀开，刘大嫂帮我把提包送上去，然后又小心翼翼地将天棚板放回原来的位置，蜘蛛网和塔灰大半还挂在上面，既没有手印也没有擦抹的痕迹。

安置完了，我又嘱咐刘大嫂，让她千万不要告诉别人，然后就告辞回家了。当天晚间，我把这一个时期发生的事情，当妈妈和妻子讲了，以使她们心中有数。

谁知妈妈一听这事是葛明福在背后操纵的，立即拍着手说：

“这个葛警佐我知道，他和侯圣绂家的交情可深了，我在侯家做活儿那咱，他常在侯家打牌、喝酒、抽大烟。侯家的话他能听。明个我去找老侯太太，让她给说说。”

我同意了。我知道侯家会为我们说话的，除了妈妈和他家的关系一直没断以外，我回来后，也曾到他家去过几次，我觉得这是个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

第二天，母亲到了侯家，借着闲谈的机会就向侯老太太和侯圣绂夫妇述说了这件事情。侯家夫妇果然是满口答应帮忙，侯家老太太更有些忿懑地说：“这葛警佐也太不认识真假人啦，维民是个大老实人，哪里能是共产党呢！”

当天，侯家老太太就吩咐把葛明福找到侯家。

侯家夫妇向葛明福责怨地说：

“李家母子都是老实人呀！做了什么坏事啦？你派赵明宇调查他！”

葛明福凶煞煞的脸上，滚动着一双墨黑的眼珠，假笑了一下说：

“这话是谁告诉李维民的？”

“是赵明宇呀，他亲自告诉李维民说，是你指派他监视李维民的。”

“这个混蛋东西，竟敢乱打我的旗号，随便胡说，我一定要处置他！”葛明福脸色愠怒并故作气愤地说。接着，他又转对侯家夫妇解释说，“这是没有影儿的事，请转告李家宽心，不要听赵明宇这老东西信口雌黄……”

葛明福为什么能给侯家这么大的情面呢？这其中的奥秘是不难理解的。侯家在地面上交游甚广，葛明福除了与侯家有旧交之外，在经济上也有往来，过去侯家也曾给他出过力，帮助过他。

过后，我听说赵明宇曾被葛明福找去骂得狗血喷头，赵明宇当时吓的骨软筋酥，下跪求饶，经过一番苦苦哀求，葛明福才宽恕了他。

但是我却深深知道：反动透顶的葛明福，对我的疑团并没有消除，对我的侦察也决不会中止。而流氓成性的赵明宇更不会就此住手，仇恨的暗箭，随时都有可能向我射来。为了减少和赵明宇的直接接触，我把家搬进了致和胡同，租住了“五”字会会长刘育春的房子。

搬进了新居，看不见赵明宇的大秃头了。但葛明福的爪牙却跟踪而至。开始，先有一个戴礼帽、身穿长袍的特务跟踪我。后来，又出现了一个新情况：我到买卖里去的时候，柜伙就告诉我：方才有一个“便衣”到柜上来找你，态度很蛮横，问干什么，不说；让等一会儿，不等。我从买卖上回到家里，家里人又告诉我：方才有一个穿短褂的人来找你，横眉立眼的问你上哪去了，请坐，不坐；倒水，不喝。临往外走的时候，一擦衣服，屁股后头露出一个黑枪嘴子来。

这种“捉迷藏”式的鬼把戏一直继续了好几天，弄得母亲、妻子和柜伙都惶惶不安，都劝我出去躲躲。但我心里明白，这只不过是一种低劣的恐吓手段而已。在敌人看来，只要我是共产党，一经恐吓，势必外逃，那时他们就可以手到擒来了。但是敌人的算盘打错了，这种低劣的恫吓，只能吓倒那种神经脆弱的人。对于共产党人，它除了起一个“报警”作用，时时提醒你提高警惕之外，还能有什么作用呢？如果有，那只能说明愚蠢的敌人已经查不到任何证据，不得已才拿出这敲山震虎的下策了。

事情发生以后，我每天都照常到买卖上去，我告诉柜伙说：“见怪不怪，其怪自败。”柜伙半信半疑地看着事态的发展。果然，几天以后，找我的人不来了，家里也安静了。母亲她们才松



了一口气。我却知道这只不过是暂时的平静，乘着这暂时的平静，我必须抓紧时间安排工作。

在这个时期里，我时时不忘的是恢复电台工作。侯乃英、关锡糜等同志又得到了一批有价值的材料，没有电台，发不出去，使我心急如焚。报务员崔岳已经有几个星期没来了。我计划先找好安设电台的地方，再和报务员接头。经过一番努力，在吉林近郊找到了一座简陋的草房，环境既僻静又不惹人注目。我想找一个可靠的掩护人，然后再将电台迁进去。但正在这时，我听到了一个非常令人担心的消息：报务员崔岳正和一个姓闵的女学生谈恋爱，对方是一个大地主家的女儿。这个消息一传来，立刻打乱了我原来的计划。我必须先和崔岳见面，弄清情况，然后再进行下一步工作。

我心里只盼望这消息是不准确的传闻，但愿崔岳能把党的指示记在心上，以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重。

## 工作不能停止

为了慎重起见,我在上长春找崔岳之前,先找到了崔岳的姨娘家,想先从侧面了解一下崔岳的情况,再和崔岳见面。谁知就在他的姨娘家里,我听到了比一切坏消息都坏的消息:崔岳被捕了!

坏消息是崔岳的弟弟从长春带回来的,崔岳在长春的住处已经被封闭,消息完全可靠。

崔岳为什么被捕?被捕后的情形如何?从延安出发到现在,崔岳在我的脑子里构成一个总的印象:意志不够坚定,思想不够健康,工作不够积极。这样一个人站在敌人的面前,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我感到眼前的处境更为艰难了。

报务员既然被捕,电台也就成了无用之物。呼号和波长等都装在报务员的脑子里,失去了报务员也就等于失去了电台。电台不能恢复,和上级也就断了联系。这对于一个地下工作者来说,简直就等于失去了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不,不能和上级失去联系,只要有一口气在,就不能停止工作。现在摆在我眼前的事情是:第一、隐蔽起来,坚持工作;第二、设法和上级恢复联系;第三、弄清报务员的被捕真象。

经过一番筹划,我将郊区的草房作为临时的“隐蔽洞”,花钱

买了一个户口，报了一个假名，住到里边去。

在这同时，我决定派侯乃英同志去哈尔滨和那里的党组织建立联系。侯乃英同志去哈尔滨有许多方便条件，她是伪“军属”（即伪军队所属的工作人员），路上可以免去许多盘查；另外她姑妈住在哈尔滨，她以到姑妈家探亲为理由请假，也不会引起怀疑。

我把和哈尔滨组织接头的时间、地点及接头暗语都告诉了侯乃英同志，她欣然接受了任务。

侯乃英同志先向军管区请妥了假。然后回到家里，将我给组织上的报告和一份软纸材料都夹在一卷手纸当中，外面再原封扎好，放在手提包里。第二天——当月的二十七号，她穿着伪“军属”的制服，启程上路了。路上凭着伪“军属”的身份，通行无阻地到了哈尔滨。

到了哈尔滨之后，侯乃英同志便按照指定的接头时间（每月的九号、十九号、二十九号。侯乃英同志到时正是二十九号的接头日子）和地点，用规定的暗号和哈尔滨组织接上了关系，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此后，材料的转递工作，就这样重新开始了。

在这期间，通过一些社会关系，已经把报务员被捕前后的情况弄清楚了。

原来崔岳所在的《康德新闻》，是伪满洲国的机关报，敌人对内部工作人员控制得很严，崔岳在那里担任第三版的编辑，敌人对他更是严加注意。在审查他的历史的时候，便对他产生了怀疑，后来就干脆把他捕起来了。

被捕后，他在敌人的威胁利诱下，供认了自己是共产党员，说出了是从延安被派回来的。任务是到抗联游击队去。组织上指定和游击队接头的地点是在大连广场。但他回来后，思想发

生了变化,并没有去大连接头,而是找了事情,并准备结婚,组织小家庭,企图苟且偷安地生活下去。崔岳这套谎言,敌人相信了。

崔岳虽然没有说出全部情况,没有暴露我和电台,但是作为共产党员,在敌人面前低下了头,向敌人哀哀求饶,这仍然是可耻的叛变。后来,他又接受了敌人的任务,变成了敌人的走狗。

在我弄清了崔岳的情况之后,马上走出了“隐蔽洞”。虽然危险并没有解除,我却不能长期隐蔽下去。长期隐蔽不但使工作受损失,而且也会使吉林的敌人对我产生新的怀疑。

我从郊区回到家中。家中和买卖上还都平安无事,葛明福在这个时期里并没来找麻烦,于是我又恢复了往常的工作。

## 危急的时刻

一九四四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一年，是希特勒匪帮在英勇的苏联红军的进攻下，迫近灭亡的一年；同时也是我解放区军民向日寇开始局部反攻、不断壮大的一年。日寇在太平洋的地位也愈来愈困难了。

我从敌人或我们自己的消息里，常常可以听到苏德战场和我解放区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消息。每一个胜利都给我莫大的鼓舞，使我激动得内心里长久的不能平静，有时彻夜不眠，我想到了转战在关内各战线的战友，想到了我的上级，想到了党，想到了延安，想到了抗战胜利。胜利后我们国家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新局面呢？我能回到延安会见我的战友和上级么？还是在祖国的东北欢迎他们的到来呢？啊！胜利就在眼前，我要在这条无形战线上，象同志们一样加倍工作，勇敢战斗，为党作出更大的成绩！

但是，自从一九四三年末以来，我的具体处境是愈来愈困难了，时常处在十分危急的时刻。

腊月二十三的夜晚，天无风，干辣辣的冷，窗上的玻璃结了一层厚厚的白霜，这真是呵气成霜，滴水成冰的季节。

这一天是过小年，远近处不时传来稀稀拉拉的爆竹声，人们正接着惯例送灶王爷上天。

虽然迫近了年关，我们一家人却没有喜迎春节的心情，特别是母亲和妻子尤为不乐，时刻为我的处境担忧。

今天晚上一家人都在屋，我趁此机会，解劝她们好好过年……

我的话刚落音，只听门外嘭嘭嘭有人敲门。我喊了一声“谁呀？”走出门外。

我借着玻璃窗透出的光亮，看见一个头戴黄色皮帽子，身着黑棉袍，脚穿一双高筒皮鞋的人走进院内，一进院就问：

“老李家在这住吗？”

我迎上前去，从他的装束和举止上我一下看不出这是什么人来，他不象知识分子，也不象商人，更不象工人……那么到底是谁呢？我一边猜疑着，一边答了话：

“是在这住。有事吗？”

“李维民在家吗？”他走近我的跟前又问。

我这时细细地向他打量了一下，这个人满脸粉刺，鼻尖通红，眼睛大而无神，白眼球上挂满血丝，黑眼珠不断地窜动，眼圈微微有些发黑，双眉稍向下低垂。我从他那不正的双眸中，立刻对这个人画了一个大问号，心里马上警惕起来。我回答他说：

“他不在家，出外头要账去啦。”

他听我这样说，没有马上表示什么，只是狡猾地微笑着，仔细地打量着我。我没有管他，仍保持着原有的镇静态度说：

“我是他的弟弟，有事向我讲也行。”

他眨了眨眼睛，又向屋里瞟了一眼，仍没有说什么。这时，我又向他反问了一句：

“您先生是哪的？”

“呵！我是新京永长路××商店王经理打发来的。”他泰然自若地回答说。

“我哥哥不欠他债，和他也没有往来呀！”

“不！带来点烟土样子看看！”他小声地说。

“我哥哥贩卖估衣，不贩卖烟土，你找错了门吧？现下，年关在途，我也不到派出所报告你贩卖‘违禁品’，你赶快走吧！”我撂下脸来，说完就要进屋。

他这时突然间象想起了什么事情，上前拉我一把鬼祟地说：

“唉！我还有点事，得到屋里说说！”

“好话不背人，背人没好话，有话就在这儿讲吧！”我立起眼睛故作愠怒地对他说。

他又奸猾地笑了笑，说：“唉！——有见面的朋友，没有见面的冤家。用不着这样，我也不是土匪，我到这里来，是为了好交情，是为……”说到这，他又打量了我一下，神秘地笑了笑说，“是为你哥哥李维民的生命安全来的！”

我听了他这一番话，迅速地想了一下：硬叫他走是叫不动了，倒应借此机会试探试探他到底是何居心？是何角色？我开始转为笑脸说：

“既然你讲朋友，那就请进屋吧！”

他听我这样一说，显然是高兴了，一边进屋一边说：“我姓邹，我想我们会谈得来的。”

进屋落坐后，我递给他一支香烟，我妻子给他沏了一杯茶。他狠狠地吸了一口烟，然后鬼鬼祟祟地说：

“李维民的案子犯了！”

从他那贼溜溜的眉眼，说话时的鬼祟神气，使我心里立刻一动！这样一个形象，对我并不是陌生的。他到底是什么人，我已猜透八九分了。从我目前的处境，从敌人对我所要的种种花招

儿,我预感到敌人对我所施展的一个新阴谋又开始了。我必须极端冷静地加以对待。想到这里,我就大声地说道:

“买卖从阳历年后就沒开板,没进货也没出货,什么案子犯了?”

这个家伙自从进屋来,眼睛始终直勾勾地盯着我。我的话音刚落,他又故作关心地样子说:

“不!李维民是八路军共产党!我这次来就是要交下这个朋友。有个林武雄警尉要抓你哥哥,我特意来送个口信!”

“咱们一家人一直做买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八路军共产党!”我斩钉截铁地说。

“不管怎样,李维民是八路军共产党,也就是我的同志,如果他不是八路军共产党,也是我的同胞!”他用力地看了我一眼,接着又装做十分愤慨的样子说:

“朋友,我告诉你我的底子吧!我原来是山东的八路军,以后被俘来到东北,日本鬼子让我给他们干事,可是我啥事也不愿意做,我们不能甘心当汉奸,我们都是黄帝的子孙,都有自己的祖国!……”

他喝了一口茶,接着又滔滔不绝地向我分析起当前的形势来:

“看形势,小日本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啦!现在世界上是两条战线:一条是德意日的所谓轴心国,一条是反法西斯的联合战线。目前,苏联已经向德国大反攻了;小日本在东南亚又吃了败仗。咱们八路军在关内也开始反攻了……看样子小日本是必亡了……”然后他又故作难受的样子说:“我现在是真想干它一场,可惜我回关内回不去,在此地又找不到伙伴,今天我到这里来……”

他这段话说得很流利,好象背诵课文一样。他说了好多我



们常用的政治术语，看样子真好象是“自己人”。但他挖空的心思白费了，他这段话，不但没有打动我，反而彻底地暴露了他自己！坐在我面前故作亲近的正是·一个狡猾的敌人，一个伪装的特务！如果他真是自己人，怎会一下子就在一个第一次见面的生人面前，把自己毫无保留地赤裸裸地暴露出来？难道他不怕被出卖吗？他依靠什么呢？这一切不正说明他和他的主子正是这个世界的当权者吗？我完全断定了：这是一个既狡猾而又愚蠢的特务！

他的话还没说完，我便表示出极不耐烦的样子打断他的话头说：

“你讲这许多话，我一点都不懂。我们是买卖人，只知道赚钱养家，你和我说这些有什么用呢。”我说完，又狠狠地看了他一眼。他对他的经过充分准备和演习的话，未能在这里起到应有的作用，表现出失望的神色，不过，从他滚滚转动着的黑眼珠来看，他并没有完全失去信心。

我这时，想试探试探他是不是要钱，又接着说：

“这几年，我们的买卖还算做得不错，我哥哥也是好交朋友的人，有哪位朋友遇着困难，我哥哥向来是很大方的！”

他目瞪口呆地寻思了一下，然后说道：

“我说了半天话白说了？我的话……”说到这里，他又停顿了一下，然后慢条斯理地说，“我说的话你哥哥能明白，我在这里等你哥哥回来吧！”说完，他又狡猾地看了我一眼，然后不急不忙地又喝了一口茶。

我一看他不但根本不要钱，还要进一步调弄我。此刻，我断定这个家伙的来路一定不小，非同一般的特务。待他说完，我顿了一下说：

“你和我哥哥谈谈也好，可是，他现在去舒兰了，一半天回不

来呀！”

“啥时候能回来？”他眨动着眼睛说。

“最早也得在二十五晚上。”

“那好吧！我在那天再来一趟。”他起身走了几步，忽又停下，盯视着我说：“请您转告令兄，好好想想我说的话，可别忠言逆耳，不认识自己人哪！”说完，才转身走了。

姓邹的走了以后，我一直在苦苦地思索着对策。

二十五日傍晚，姓邹的那个家伙果真又来了。他一进门，我便迎上前去说：

“唉呀不巧！我哥哥还没有回来呀！他来信说，二十七号才能回来。”

他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嘿嘿地笑了笑说：

“好吧，我再等两天，二十七号晚七点我再来！……不过，最好请你转告他——我想你是能转告他的：不要这样冷淡地对待朋友。”说完，也没等我再答话，就大步走开了。

我一看，这个特务显然知道我就是李维民，而且是死死地缠住我不能放开了，我不能让事情再发展下去，必须在二十七号以前拿出办法来。

这时，母亲和妻子都更加恐慌了，一天价吃不饱，睡不安。我一方面安慰劝解母亲和妻子；一方面积极想办法对付这个特务。

夜深，我翻来复去睡不着，想了很久很久，才最后拿定了主意：若想从被动转为主动，唯一的上策是去告他。假若不去告他，事后也可能反被咬一口，给安上个罪名。告了他，我当了原告事后就有话讲了，我也可能就此解了围。

到哪里去告呢？看这个姓邹的来路，定然是吉林省警务厅葛明福所指派的，我当然不能到那儿去，要到吉林市警务处去

告。省、市的警务机关，特务、警察众多，互相不完全认识。我早就听说过，省、市警务处因为吃贿赂分赃不均，两下矛盾很大，省警务厅又曾斥责过市里是“白吃饱”，连一个共产党和赤化分子也没抓着。市里对这个斥责是很不服气的，我就利用敌人的这个矛盾，用“以硬碰硬”的办法整一整这个狡猾的特务。也证实一下我自己的“清白”。

二十六日清晨，经过侯圣绥的介绍，我和吉林市警务处特务科的警尉王士俊、警长叶芳二人接上了头。我找到他俩之后，就将此事的详细经过向他俩说了一遍。最后我说：

“那个姓邹的，明天晚间就到我家来。”

“好吧！明天我们在侯经理家等你，那个家伙来了以后，你赶快来找我们！”叶芳说。

旧历二十七这一天，我的心情是紧张的，不知最后结果将会怎样？我在傍晚，特将我的表弟和妹夫请到家里作客，一旦出了其他预料不到的事情，他们尽可以为我出证。

七点钟以前，我就离开家去到侯家找王士俊和叶芳二人。他俩来时都穿的便衣，后屁股上都带有武器。我和他俩走到家门前，我看了一下表：七点刚过。

一进门槛，只见那个姓邹的特务正坐在屋里抽烟呢。叶芳见到屋里有许多人，就问：

“这都是谁呀？”

我一一介绍说：“这位是我的表弟，这位是我的妹夫，他俩都是职员。”我瞅了一眼坐在椅子上那个姓邹的，加重语气说：

“这位是邹先生，不知道他是做啥的。”我说完马上转对姓邹的高声说：

“你要找的李维民就是我呀！有啥事情说了吧！”

姓邹的眨了眨眼睛，向屋里所有的人瞧了一下，笑了笑，狡

黠地说：

“我头天来就知道你是李维民！”

这时，王士俊从姓邹的神色和举止上，似乎也看出他有些来历，因而，先甩着高腔试探地说：

“你是哪的？咱们都是给满洲帝国办事情的，若办案的话，咱们可以合起来办！”

这时，那个姓邹的有些茫然了，冷笑了一下之后，向我投来轻蔑的眼光。似乎在说：好一个李维民，你搬来这么多人，能把我奈何？

叶芳见他没有答话，在一旁有些按捺不住了，往前一迈步，指着他的鼻子问道：“你是哪的？是干什么的？”

姓邹的翻了翻眼皮，没有回答。叶芳是个年轻而粗野的警察，从来没见过有人敢这样蔑视他，一时火气上升，拍了下桌子，声色俱厉地问：

“你快说，到底是干什么的？”

那个姓邹的，不管叶芳怎样吵嚷，一直表现得很老练和镇静，有时只是尴尬的笑笑，不过，这笑里却包含着凌人的傲气。

这时，我看叶芳瞪圆了眼睛正要发作，借此机急上前说：

“这个人来好几次了，自称是八路军，也说我是八路军，硬要和我交朋友！”

“有这样事吧？”叶芳对他大声吼着，同时，拿出绳子将他捆绑起来，喊着：“走！跟我们走！”

我注意看着姓邹的，开始他双眉一立，二目圆睁，嘴角也抽搐了一下，象要发作。但他瞥视了一下身旁的人，立刻就把嘴角拉上去，不自然地笑了笑，十分勉强地吐出“好吧！”两个字。从这急剧变化的面部表情上看，他是一个经过训练能控制自己感情的特务。

这时，王士俊转对我说：

“你是原告，具个结再找两个保人。”

“找铺保，几家都可以。不过现在已经十点多钟了，天太晚了，找人保可以不？”

“可以。”王士俊点点头说，“二十九日上午，你还要到警务处特务科去一趟。”

我一边答应着，一边请表弟和妹夫给我具了保呈，王士俊和叶芳将那个姓邹的特务带走了。

他们去了以后，我家里的人也都长吁了一口气。这真是演了一出大快人心的喜剧。

但是事情并没有结束，姓邹的到底是什么人？他被带走以后事态将会怎样发展？我都不知道，而且二十九号——也就是再隔一天，我还得到警务处去呢。

为了弄清情况，我又找到侯圣绂，请他代为探听。

第二天，二十八号那天，我从老侯家听到下面情况：原来那个姓邹的果真是葛明福的主子——吉林警务厅长官田卿的腿子。王士俊和叶芳将他从我家绑走以后，他就说出了真实身分。王、叶这时骑虎难下，只好和他一同去见官田卿。官田卿这时正在家里，他家住在河南街后边，是老教育局的房子。当他们按完了门铃以后，官田卿从小窗户里探出脖子来，简单问了问情况，就对王、叶说道：

“他的我的‘嘱托’，放了的。明天我的你们处里说话。”

于是王士俊和叶芳只好将姓邹的放了。

当我听到上面的情况以后，已经有些放下的心又提了起来，明天就是二十九号，我不知道去警务处的结果会怎样？眼前摆着好坏两种可能，我必须争取“好”的结果，作“坏”的打算。我又请侯圣绂转托王士俊和叶芳，帮助完结这件事情。

我回到家里，就把情况告诉了母亲和妻子。我说：如果明天过了中午我还不回来，就可能被关起来了。我一被关，敌人就要到家里来搜查，并且可能逼问你们，要有思想准备，免得事到临头，惊慌失措。

母亲和妻子听我这样说，都忍不住哭起来。

母亲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说：“这些年来，你走死逃亡，我们也在针尖上过日子，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我这条老命早已豁上了，什么我也不怕，怕只怕的你万一有个好歹……”

“我不怕，日本鬼子的刀杀不了我。”我对着母亲和妻子说，“他们抓不着我什么证据，家里也搜不出什么东西来，只要你们不说两岔去，事情就不要紧。”

母亲擦了擦泪水说：“家里你放心，鬼子要问我，我就装聋，他问东，我说西，我已经六十多岁的人了，他们能把我怎么的！”母亲说到这里，又指着妻子说，“你媳妇是个刚强人，更不用你牵肠挂肚的，只要你告诉明白怎么说就行了。”

我对着母亲点点头。于是我就把敌人可能问到的问题，和她们应该怎样对答，一一说清楚了。

整个晚间，我们都没有睡好觉。

腊月二十九，就是旧历年的除夕。早晨起来，妻子熬的大米粥，炖的肉，我饱吃了一顿。浑身上下穿得厚厚实实的，毛衣、毛裤，外面又套上棉袄棉裤，脚下一双大棉鞋。又嘱咐母亲和妻子一遍，我就大踏步地往警务处去了。

街上人来人往，买卖午后就要关板了，人们在紧张地置办最后的“年货”。

八点半，我来到了警务处。一进门，一股特别强烈的漂白灰味直冲进鼻孔，刺激得我接连打了几个喷嚏。我知道他们这里正闹伤寒病，好多日本鬼子都病倒了，已经死了四、五个。

在传达室的前边，我见到了叶芳，他要我坐在传达室里等着，并悄悄告诉我：一会儿由一个日本人和王士俊的族兄王士英问我话，他和王士俊已经替我说了话，让我只管大胆回答问题。

九点多，我被叶芳领进一间宽大的办公室里，一张大写字台后面，坐着一个穿便衣的日本人，戴一张大白口罩，几乎遮住了他的全部面孔，只剩两只小眼睛露在外面，无精打采地望着我。在他旁边坐着一个中年警尉，我想这人大概就是王士英了。

写字台的前边摆了一张椅子，我被让坐在这张椅子上。

日本鬼子看了看我，向王士英翻了句什么，于是王士英就开始问我事情的经过。我从赵明宇监视我开始讲起，一直讲到姓邹的被绑走为止。为了使他们相信我是真正的“商人”，讲的中间我加进许多买卖中的事务。在我讲时，那个日本人不断地打着喷嚏，眉头也越蹙越高，后来和王士英小声嘀咕了几句，竟起身走了。

当我讲完事情经过以后，王士英说：“这些情况，你为什么不早来报告？”

“我是个买卖人，不愿意把事情闹大了。”

“以后再有这种事情发生你只管来。特务科会保护商人的。”

王士英说完往起一站，我知道问话已经完了，便也站起来说：“还有什么事情吗？”

“没有了，回去过年去吧。”

我点点头，就从警务处出来了。

这时街上的行人已经稀少，买卖开始关门闭店，有的人家已经燃放起鞭炮。我忙三步并作两步，往家里快走。

一进院门，妻子就领着孩子从屋里跑出来，我一边告诉他们没事了，一边急往屋里走。妈妈的肚子疼病犯了，正在炕上趴着，见我一进屋，猛地坐起来，听我说没事了，老人的脸上立时喜笑

---

颜开，肚子也不疼了。她大声地笑着说：“这可得谢天谢地！你媳妇连年夜饭都没心思做了，你快领他们张罗过年吧！”

为了使妈妈高兴，我一边答应着一边张罗着找爆竹，贴对子，妻子也忙着去做饭，孩子在我身旁前钻后跳，妈妈也从炕上下了地……

危急的时刻过去了，斗争却在继续。



## 胜 利 前 夜

一九四五年，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垂死挣扎的一年。他们又恢复了血肉横飞的政策，宪兵、警察和特务大肆活动，对他们所谓的“要视察人”和“视察人”严加管制。但是所有这些法西斯兽行，并不能掩盖日本帝国主义者所处的困兽之境。自从法西斯德国、意大利被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彻底击溃以后，好多迹象表明：日本法西斯已经处在总崩溃的前夕，侵略者的末日即将来临！

东北人民清楚地看到：日本的侵略兵源已经枯竭，绝大部分侵入东北作威作福的日本政客、特务、浪人……都穿上了军衣。年老体衰或因其他原因不能立刻上前线的，都被编为“在乡军人”，每日站在烈日下受军事训练；年纪稍轻、体力稍壮的都被陆续抽走，直接赶上战场。敌人不只抽走了一般机关里的日本人，连所谓要害部门的中坚分子也被抽走了。吉林警务厅的日本特务迅速减少了，伪省政府的日本要员也成了“皇军”的普通一兵；连正在读书的日本大学生，也逐渐地抽到前线去了。在所有东北的城市里，每天都可以看见大批手执写满墨笔字的膏药旗的日本人出现在街头，好多是留着小黑胡子的半老新兵，其中也有瞎了一只眼的和戴着高度近视镜的。每到深夜，那些预见到自

已行将变成炮灰的应征入伍者，便喝得酩酊大醉，唱着鬼嚎一般的哀歌，踉跄在街头上。所有这些迹象，都向东北人民说明：日本侵略者的“武运”已经不长久了！

东北人民更清楚地看到：日本侵略者的军用物资（包括武器弹药在内），已经挖空用光，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们先是迫使人们“献纳”铜铁器皿，接着就是到处搜挖。破罐头盒子、破铁桶、破洗脸盆子都收光了；有些早已变成氧化铁，根本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他们也象宝贝一样收起来。日本人原是笃信神佛的，但是这时却把“神社”的铁栏杆也拆掉了，大钟也抬走了；接着就收回了所有的敌伪硬币。最后，实在没有东西可收了，便动手拆除所有大建筑物上的一切铜铁装饰物，连日本人自己开设的大商店里楼梯蹬上镶的黄铜边都起掉了，弄得到处破头烂齿，疮痍满目。这时，所有的牙科医院和镶牙社，都没有金属原料了，人们只能用“代用品”来镶牙。“代用品”这个名词，成了当时最流行的词汇，它和各个阶层的人民生活都发生着极密切的关系，首先是人人都离不开的衣服和食物出了“代用品”。棉线布在市面上已经成了稀有商品，用破布烂线改织的“更生布”成了人们的主要衣料。到后来，又出了一种用纸条捻线织成的“布”，这种“布”只能晴天穿，一遇雨，就都粘在身上，得一条一条往下扯。这样一来，“更生布”也就成了好东西。如果有人在这时穿上一套新棉线衣服，那真是最值得人羡慕的事情了。至于吃饭，更使人忍无可忍，“中国人只能吃高粱米”这句话已经被日本强盗视为不可更改的真理。大米早已为日本人和部分汉奸所独占，名之为“军用物资”，不许中国人买卖，违者便以经济犯论处。到后来，他们竟连大米也吃不上了，往大米里放黄豆，再后，也只得吃高粱米了。当时曾流传过一句话：“小鬼子吃高粱米籽——够呛。”

除此之外,其他“代用品”更是数不胜数,比比皆是。最后,连写字用的钢笔尖那样微小之物,也出了化学制的“代用品”。总之,一切可以用于军事上的物资,日本强盗都挖空心思地换上了“代用品”,“代用品”这三个字当时真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人们从这数不清的“代用品”当中看到了日本侵略者的末路穷途。

兵源和物资,是战争中最为根本的物质条件。它譬如一盏灯里的灯油和灯捻,灯油熬干了,灯捻燃尽了,灯火便会在一阵风中熄灭。

但是疯狂的日本强盗是不甘心自己的毁灭的。

困兽在作垂死地挣扎!

他们疯狂地抓人、捕人、杀人。

他们到处抓“劳工”,把人们赶到“国境线”上去修筑工事。

他们把所有还未抓走的人都编成“义勇奉公队”,把他们从屋里驱赶出来,让他们戴上瓜皮一样的“战斗帽”,帽后还得钉上四块垂到脑后的黄布条,名为“垂布”,象窗帘一样把后脖子遮起来,说是为了防空;两条腿上都得缠上黄裹腿;脚上穿上一个大拇脚指头单分出来的胶皮水袜子;屁股后面还得掖条白手巾。这套人不人鬼不鬼的丑恶“行头”,耻辱地强加在东北青壮年的身上。最后,他们把年轻妇女也强行组成“防护队”,赶到大街上去。

每当深夜,汽笛一阵哀鸣,人们就都得从炕上爬起来,摸黑穿上全副“行头”,跑到大街上去进行“防空演习”。这种寝不安席,食不果腹,衣不适体的非人生活,一阵紧似一阵地折磨着东北人民。

我当时为了应付环境,麻痹敌人,坚持斗争,迎接胜利,便通过社会关系,挂上了一个“义勇奉公队”永远分区副队长的义务职。有了这块牌子,不但可以免当“劳工”,而且还可以了解更多

的敌情。

副队长是搞内勤的，每天要和所有各行各业的人一样到“义勇奉公队”里去，除了参加操练外，还要帮助写一点表报之类的东西。凡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敌情的材料，我都记下来。“奉公队”的办公地点就设在区公所里，我每天到这里“办公”，就和区公所的下级职员都搞熟了。其中有一个叫郑墉的户籍员，逐渐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个人乍看起来和其他小职员没有什么区别，每天趴在桌子上不声不响的工作，话不多，对人谦恭有礼，从来不和同事们冲突，大家都把他看成老好人。那时当户籍员的对来办户口的居民都拿个架子，甚至有好多时候是故意刁难人。但是他却老老实实在地给居民办理户口，遇着特别贫困的城市贫民，他办得更是尽心竭力，有的同事就嘲笑他傻气，他也决不反唇相讥，只是笑笑又埋头去干他的事情。这样一些情形看到我眼睛里，就对他发生了好感，于是就有意识地多接近他。开始，他只是对我笑笑，不多说什么。后来，当我的话越说越多的时候，他也似乎对我注意起来。经过一段了解，我发现这个郑墉原来是我过去一个邻居的侄子。我曾听他叔叔讲过他，依稀记得他好象在关里念过书，叔叔很夸奖他，说他胸怀大志，有抱负。这样一个有抱负的青年学生怎么跑到一个伪满区公所里来当户籍员？这倒是一个谜。我曾用话试探他到过关里什么地方，他却矢口否认。我渐渐把我认识他叔叔的话透露给他，他也不表示什么。又过了一个时期，他忽然问我一九三三年为什么离开吉林？我心里先是一惊，后来忽然想到他是否找到他叔叔了解了我的情况。我一问，果然是听他叔叔说的。这个人为什么对我这样“关心”？他叔叔当时并不知道我的真实情况，但对我的“突然失踪”想必画了问号，因此这个“有心人”才来问我。这个郑墉到底是个什么人？是敌是友？倒要认真研究一下。很显然，他也

在研究我，每逢我到区公所来，他都悄悄地看着我，有时就故意找话和我攀谈。我们两方面都“各怀心腹事”地彼此注意着，却又都表现得若即若离，一时之间谁也弄不清谁的庐山真面目。

有一次，在一场大规模的防空演习比赛完了以后，永远分区的区长一定要我给“义勇奉公队”的队员讲话。我被逼不过，便在一个小纸头上写了几行讲话要点，上去讲了。

讲完话的当天晚上，正巧郑墉在区公所里值班，我便有意识地溜达到区公所去。区公所里冷清清的，郑墉正要锁门走开，见我来了，便问道：

“这么晚了，李先生来干什么？”

我微笑着点点头说：“在家里睡不着觉，知道你值班，就来闲聊聊。”

“那好哇，我也正想和你谈谈呢。快进屋吧。”他拉开门，把我让到屋里坐下，又接着说道，“你今天讲话讲得很生动，很成功啊！”

“那里谈得上生动，邵区长非让我讲不可，我也就只好敷衍塞责了。”我一边说着，一边注意观察着他的神色，我猜不透他是什么意思。

“的确很生动，看起来你对讲话很有经验，还有个提纲呢！”他把“提纲”两个字说得特别重，说完就直盯着地看着我。

我一听“提纲”二字，心里猛一动。当时伪满根本没有这个词汇，只有在解放区才能听见和看见这两个字，莫非他……想到这里，我忍不住问道：

“提纲这两个字，你从哪儿知道的？”

“在关内有个地方。”

“这个地方你去过吗？”

“我想你也去过。”他的脸色涨红起来，嗓音激动得发颤地

说道，“李先生，这些天来我就留神观察你，我感到你决不是一个普通的商人。我问过我叔叔，他虽然摸不清楚你过去到底做过什么事情，但是他知道你当时是一个非常爱国的青年；他不知道你为什么突然从家里跑掉了，但是你走的时候正是吉林抓共产党和爱国人士的时候。把这些和你到关内去过联系起来看，我就猜到了你可能是个什么样的人。但我得不到证实，我一直苦恼着，今天看你讲话写提纲，我才敢断定，你一定是我的……”

“是你的什么？”我也不由得紧张地问道。“是……”他凑前一步，一把拉住我的手，低沉而有力的声音象是从胸膛里迸发出来的一样，“是我的同志！”

眼泪在他的眼圈上转转，闪光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我觉得全身直热，心也怦怦直跳。我尽量抑制住自己内心的激动，悄声说道：

“你不怕看错人吗？”

“我是经过许多了解，才向你伸出手来的。而且我相信我的眼睛。”

“好吧。”我想了想说，“过几天我找你，再谈好不？”

他点点头说：“好。我希望能快点。现在日本鬼子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一场新的斗争就要开始了，我们需要行动。”

说完，他又用力握握我的手，转身出去了。

外面漆黑，他的身影很快就看不见了。星光在天上眨眼，蟋蟀在墙脚嘶鸣，我仍然在激动地想着。从郑壙日常的表现，从他方才的谈话，从那激动的感情中，我可以信任他是自己的同志。但是我还必须慎重，我要再观察一下，再了解一下。如果他确是自己的同志，那该多好哇！

可在这个时候，一直和我纠缠着的葛明福又找上门来了。他派了一个姓张的警尉，到处找我，从买卖上找到“义勇奉公

队”，又找到家里。妈妈担惊受怕地说：

“总是这么找你，要出什么事吧，你再出去躲躲吧。”

“不要紧，不会有啥事的。”我望着妈妈那日见苍老的面孔，安慰她说。

“别总说不要紧，不要紧的。你既不愿出去躲，就再找老侯家给说说，别硬挺着。”

“好吧。”

我被妈妈催着，去给侯家挂电话。侯老太太接起电话，我问她：

“有个姓张的警尉到处找我，我不知道是不是葛明福派来的，您替我问问好不？”

“那好办，我把他找到我们家来问问，你要想见见他，你也来吧。”

和葛明福直接见面，而且是在侯家，这倒是一个好主意。我立刻答应了侯老太太，放下电话，就往侯家去了。

到了侯圣绂家，等了不大工夫，外面就响起了皮靴和洋刀链子的声音。葛明福进来了。一进屋，两只眼睛就死盯盯地看着我。侯老太太给我介绍一下，我向他点了点头。

葛明福慢慢地摘下雪白的手套，铁青的脸上不挂一丝笑容，一双贼眼始终没从我脸上移开，我也静静地看着他。

“李先生，我很早就想和你见见面，不想在这里见着了。”他把白手套轻轻地放在炕沿上说。

“不知道有什么事情？”

“我想知道你到底是什么人？”他的贼眼瞪得更大了，脖子往前伸着说，“你要对我说实话，你是什么党派？”

“葛警佐找我就是要问这些事情吗？”我微笑了笑说。

“我需要弄清你的情况。”

“方宸！”侯老太太在炕上插言道，“维民是知根知底的人，你何必……”

“不，姥姥。”我拦住侯老太太说道，“葛警佐既然问到这里，我也需要把情况讲清楚，讲清楚了葛警佐也少了一份心事。”我转向葛明福说道，“我现在是个买卖人，从前念书的时候倒和国民党的改组派沾过边，参加过几天活动。”

“国民党改组派？”他用鼻子哼了哼说，“那是什么时候？”

“民国十七年。”

“谁领导的？”

“朱晶华。”

“在什么地方？”

“警察厅东胡同，门牌三号。”

“有哪些主要成员？”

“除了朱晶华外，还有任重、张日新、于汉章、王逢春……”

“好了！”他紧皱起眉头，一挥手说，“你说说你到底是为什么离开吉林的？”

“因为日本人抓了毓文中学校长李光汉，魏校长等人也被抓走了。当时好多同学都吓跑了，我也就跟着跑了。”

“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到哈尔滨大同转运公司当伙计，后来又到了山西。”

“到那干啥？”

“妹夫在那当站长，我凑了点钱，和人合股在那开了个转运公司。在那一干好几年，剩了几个钱，才回家来。”

“这么说你这些年一直都是做买卖。”

“是。”我点点头说，“当然，要当差也可以找到，在关内我也有好些朋友，都是我的老同学，他们都从黄埔军校毕业了，有的当了少将，象梁致祥就是一个。我要托托人，一官半职的总可以



弄到手。但是我不愿干，那挣的是死钱，做买卖赚的是活钱。”

他听我这样说，眼珠转了转，铁青脸上的筋肉抽动了几下，忽然用手一指我，咄咄逼人地问道：

“李维民，吉林城内出现过一个怪电波，你知道不？”

“什么怪电波？”我也把头一伸，张大了眼睛问道。

他不回答我，接着又问：“你懂无线电吧？”

“不懂。”我摇摇头说，“有线电还懂一些，它分两种，一种是音响器；一种是打纸条的。符号都用注音字母代替，象‘哒——噉——哒——’我过去住过铁路，见着过。至于其中的原理，我也懂一些……”

“好了，谁问你这些了！”

“我不懂无线电，只好讲讲有线电。”

他用鼻子哼了一声，紧蹙双眉，又直勾勾地看了我好半天，忽又问道：“你认识金景不？”

“金景？是日本人还是朝鲜人？”

他听我这样说，大嘴一咧，噗哧笑了。但马上又收回笑容说，“好了，不谈这些了。我看你这人倒挺有些意思，这样吧，你给我做点事吧。给我当个嘱托（就是‘特务腿子’）怎么样？”

“当嘱托！这样重要的差事我可干不了。”我紧摇着头说，“再说我开着几处买卖，一天忙得脚打后脑勺，又经常出外地去办货，日子多了不在家岂不耽误事。”我见他眉头又皱起来，便又把话头一转说道，“这样好不好，我给你做买卖吧，这是我的老本行，眼下你就在我的纺织厂里入个股吧，一支线能赚不少钱，你若能帮助支呼支呼，买卖可以再扩大……”

“你的雄心倒不小！”他冷笑了两声说。

“没有雄心哪能发财。”我也笑了笑说。

“好吧，你去发财吧。我没钱了，我的钱都开纸房了。”

“那么还有别的事情要问我吗？”

“你请便吧。”他把脸扭到一边去了。

这场“审讯”，就这样有头无尾地结束了。从侯家出来的时候，侯圣绂送我到门外。我说道：“爷们儿，他让我当‘特务腿子’，我干不了，你看得怎么对付他？”侯圣绂说：“这是个狼啊，咱们惹不了他，拖他吧，以后我再给你说说。”离开侯家，葛明福的铁青面孔还不断在我眼前闪动，这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特务，在末日快要到来的时候，还这样死心塌地地效忠于日寇。我忍住满腔的憎恨，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加紧工作，用战斗来打击敌人。在眼前，我应该更快地了解郑墉的情况，如果他真是自己的同志，不但增加了革命的力量，而且在必要的时候，他还可以代替自己，坚持下去。在这危机四伏的情况下，应该做些必要的安排。

几天过去了，在这几天中，我对郑墉进行了多方面的了解和观察，不但没有发现一点可以引起怀疑的地方，而且信任的心情不断在增长。最后，我悄悄地把她请到家中，作了一次长谈。在这次长谈中，他向我讲了他的经历：“九一八”事变前，他一直在吉林念书。事变后跑到北平，在中山中学念书。芦沟桥的炮声响了以后，他从北平到了解放区，在延安“东干队”学习了一个时期，学习完了后，分配到晋察冀边区工作。一九四三年，由北方局派回吉林，任务是长期隐蔽，了解敌情，等待时机。

这真是自己的同志！多少天来系在心里的疙瘩一下子解开了，我那高兴的心情真可以用心花怒放来形容了。

在这次长谈中，我发现郑墉同志不但熟悉德胜区所有职员的思想情况，而且对特务——甚至是“特务腿子”的情况摸得都很熟，这是一个工作踏实、肯用思想的同志。

我把我的处境向他讲了，他深知葛明福的阴险毒辣，很替我

担心,让我考虑一下是否暂时离开吉林。我觉得葛明福虽然提出了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却并没有抓住真凭实据,否则早就向我伸出毒手。在这胜利在望的紧要关头,我必须留下。如果万一险遭不测,我的工作就由郑墉同志代替,我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再把工作关系交给他。但是关心同志的郑墉,却费了很多心机,为我准备了一条后路,几天以后,他悄悄地交给我一个贴着我的照片,盖着德胜区钢印的化名“国民手帐”,有了这个东西,可以在危险的时候离开吉林,用假名在它处藏身。

实际这个“国民手帐”并没有用上。“八一五”前夕,葛明福虽然曾在侯家散风说:“不定哪天,我就把李维民抓起来!”而且也真的把我定为政治“视察人”,但我并没有离开,党把我派到吉林,我就要在吉林坚持下去!

葛明福能够横行的日子不多了。胜利就要到来了。我要在吉林迎接胜利,并且努力积蓄力量,准备投入一场新的战斗!



# 第四部





## “八·一五”前后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夜一时，苏联红军飞机十二架，分三批轮番飞入吉林市上空，在松花江沿岸投下数不清的照明弹。照明弹象无数盏明灯一样悬挂在阴暗漆黑的夜空上。它照得江水如明镜，地面如白昼，它照亮了吉林人民的心。吉林人民在日寇的铁蹄下挣扎了十四年，十四年暗无天日，今天却好象看见了希望的曙光。

但它对日本侵略者来说，却象“照妖镜”一样，照得这群魑魅魍魉现了原形，吓丢了武士道精神，他们拖儿带女，连滚带爬地奔入吉林北山的丛林深处躲藏。巴虎门外日本人住宅区里，先是一片嚎叫，接着便荡无一人，连狼狗都跟着跑掉了。

和日本侵略者一样惊魂丧胆的还有那些大小汉奸们，他们也被末日前的恐怖心理所支配，好象苏联红军飞机专为摧毁他们一样，吓得钻头不顾腩。平日耀武扬威，鱼肉乡里的伪德胜区区长，这时竟吓得躲在臭泥坑里不出来，只剩下一个脑袋露在外边。

从八月九日以后，吉林市的天空上每天都盘旋着标有红色五星的苏联红军飞机，有时在军事目标上扔下几颗示威性的炸弹，使日本侵略者更加失魂落魄。

东北人民愈来愈近地听到了胜利的足音，他们朝思暮想，盼了十四年的那一天，就要到来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敌伪广播电台郑重地发出：正午十二时有重大新闻的通知。这一天，真是不平常的一天！这一天，松花江水虽然还是照旧流着，伪满那耻辱的黄旗虽然还是照旧垂挂着，但是，敌伪所苦心建立起来的“正常秩序”已经不存在了：广播电台一年三百六十天按时播送的“建国体操”不播送了；日本侵略者不出屋了，都象老鼠一样躲在“洞”里；从日本侵略者的“大东亚圣战”一开始，就强迫人们为之“祈祷”武运长久的正午“默哀”，也自动废止。人们的头扬起来了，都在紧张而激动地等待着。

正午十二时的钟声响了！

敌伪广播电台发出了十四年中最后的一次哀鸣，一个从肉体到精神都被奴化了的敌伪广播员，如丧考妣般地宣读了日酋的“天皇诏书”。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了！中国人民抗战胜利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束了！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动荡的一页。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一个自然形成的，欢庆胜利的节日开始了。

好多城市的大小“成衣铺”，十四日的一夜都自动开了通宵，整匹的红蓝白布扛进去，再变成大小的旗帜拿出来。人们热情地悬挂旧中华民国的旗帜，并不意味着怀恋那军阀混战的岁月，也不意味着欢迎那遗弃东北的蒋记“国民政府”，人们只是要借以表达十四年来积压在心底的热爱祖国的感情。十四年来，不能在公开场合大声说自己是中国人的东北人民，是多么盼望自己能成为一个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人哪！他们就把这种感情，用旗帜表达出来了。东北人民当时还不清楚这样的旗帜会给他



们带来什么样的生活和遭遇呢！也还不知道，在抗战中蹲在峨眉山上的蒋介石，这时已将内战的炮口悄悄地指向东北人民了呢！他们这时只知道欢乐，只想用一切方法来表达这种共同的感情。他们穿上节日的衣服，搜寻出可能搜寻到的好吃食，举行欢庆胜利的聚餐，然后就涌向街头，盲无目的地走，他们先是笑，向所有认识的人和不认识的人笑，接着便向日本侵略者和汉奸、特务们寻求报复：他们把日本侵略者的商店和部分住宅捣毁了；他们用各种方法把恨之入骨、罪大恶极的日本侵略者处死了；他们用棍棒把当时还持有武器的日本殖民主义的“开拓团”从乡下撵到城市里来；他们把逃窜在街头、血债累累的汉奸特务们扔到松花江里去；他们扭住那还不知羞耻的穿伪“协和服”的小汉奸们在街头痛打……在这强大的力量下，那些一贯作恶的汉奸、特务都在一时之间销声匿迹；至于日本侵略者们，则更加恐惧万分，那些自知难逃公道的日本军人、特务，便用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双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其中更有兽性大作的法西斯刽子手，竟拿起屠杀中国人民的战刀，刺了自己的全家老少，然后就用闻名于世界的“切腹”自绝术，将锋利的匕首刺进自己的左腹，再向右腹勒去……

所有与中国人民为敌的人在一霎时都失去了往日的凶恶气焰。东北人民在“八一五”以后的几天之内确实是扬眉吐气，精神振奋。但是就在这时，就在这被苏联红军、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联军，和奉朱德总司令的命令于八月十日以后开始进入东北的冀热辽边区的人民解放军解放了的土地上，悄悄地涌起一股蒋日伪合流的倒行逆施的反动暗流，这股暗流象吗啡一样注射到所有的汉奸、警察、伪军的身上，使他们又复活了。这些敌伪余孽，妄想借蒋介石之灵，还日本法西斯之魂。蒋介石的内战阴谋，已经暴露出来。

好多东北人民在当时还弄不清楚，为什么“八一五”后不几天之内，东北各地都先后挂出了“地方治安维持委员会”的牌子。在这个牌子掩护之下，好多汉奸、特务又袍笏登场。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行动这样一致？为什么日本侵略者在无条件投降之后还不放下武器？有些地方甚至还用日军来“维持治安”？这是多么令人气愤和费解的现象！莫非有人在背后指使？

事实上正是有人在指使。八月十日以后，当我们原在冀热辽边区抗击日寇的人民解放军，向东北进军，配合苏军和东北抗联军队一同收复东北的时候，国民党卖国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就“命令”朱德总司令：“所有该集团军（指人民解放军）所属部队，应就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在这同时，蒋介石又给汉奸、伪军、特务们下了一个荒谬绝伦的必须“负责维持治安”的命令。紧接着，于八月十五日，又向全国广播，要求中国人民“要爱敌人”。这个遗臭万年的蒋敌伪合流的命令和这个广播，就成了东北敌伪汉奸、警察、特务复活的根据，他们用这道“圣旨”把敌人已经弯下去的腰杆子又支起来，摇身一变，成了“治安维持委员会”的委员和国民党建军的头子了。一场蒋敌伪合流的丑剧，开始在东北上演。有些地方的一些丑类，虽然刚粉墨登场不久，就被人民撵下台去，但这场可耻的丑剧，是东北人民永远也不能忘怀的。

这时，我所在的吉林市，丑剧也开场了。

首先是伪“协和会”吉林省本部的汉奸们在暗中开始了活动。他们自知是不得民心的卖国贼，亲自出马挂帅行不通，便煞费苦心地搬出了马德恩和王可耕，想要利用他们那旧中华民国省实业和教育厅长的招牌，为他们支撑门面。经过婉转商谈，马德恩便做了“治安维持委员会”的会长，王可耕做了副会长。

有了正副会长，委员便也跟着“降生”了。先是土豪劣绅上

了台,通过他们,再以“蒋委员长”的命令为根据,于是大批的汉奸(多数为伪“协和会”省本部的委员)、警察、特务……都登上了委员的宝座,不几天的工夫,就发展了四百多名委员,什么样的人都有,地痞、流氓、吸鸦片烟的、扎吗啡的,真是无所不包。这些人间的败类上了台以后,怕人民不承认他们,于是就想了一个自我标榜的办法:每人都戴上一个白地黑字的袖标,上边标明“地方治安维持委员会委员”的字样。于是他们的胸脯又挺起来了,又骑在人民头上!

“地方治安维持委员会”的“办公”地点,设在粮米行三道码头俱乐部里。这个俱乐部是大汉奸熙洽开办的,两层楼的建筑,里面除有小型剧场、舞场之外,还有中、西餐厅和旅馆。过去是专供以熙洽为首的汉奸、特务以及资产阶级分子享乐和玩女人的地方。现在就成了“维持会”的委员们发号施令的机关,委员们每天到这里来吃喝、鬼混和盗窃国家资财。

“维持会”成了吉林地方上的最高权力机关,他们按照“蒋委员长”的指示,总揽一切大权。他们把伪吉林警察大队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也把伪政府的伪机构、伪职员保留下来。他们就用这套日寇得心应手的侵略工具,来继续统治吉林人民。

但是,这些极端自私自利的委员们,并没有忘了他们只是“维持会”的委员,所谓“维持”就是有时间性的,“维持”完了以后将怎么办呢?他们在等待着“中央”来“接收”的同时,也惧怕“中央”来“接收”。他们这时的鼻子还没有伸到峨眉山上,还没有嗅到“蒋委员长”的屁股后面会放出什么样的气味来,因此他们的心理是矛盾的。结果,便不约而同地向两个目的前进了:一是想法爬上去,使自己在“维持”完了以后,还能维持个地位;一是想法弄钱,有了钱,即或将来“维持”不住,也可以享乐终生。这两个目的,前边一个因为“接收”者还没有来,有些无从下手,

因此就无形中成了次要的；而后一个，却是最实际的，最能在一时之间满足私欲的。于是委员们便乘“处理敌伪物资”的时机，大发其“光复财”。他们借口“维持会”需要维持费，把可以拍卖的敌伪物资都拍卖出去。而会内外的奸商们的财源也立刻茂盛起来，他们里应外合，狼狈为奸；在互相勾结的同时，又互相欺骗和排挤。那些本钱多，胃口大的奸商，便在这场争夺战中逐渐形成了不可动摇的优势。裕华工厂（吉林当时最大的织染厂）的财东兼经理许鸿书，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奸商，他所发的“光复财”，是难以用数字计算的。

“维持会”的群魔，都在钱孔里乱舞起来了！

## 群魔乱舞

一九四五年八月末，苏联红军进驻了吉林市。他们在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原则下，承认了“维持会”的存在。于是“维持会”仍为吉林地方上的最高权力机关。

就在这时，在原吉林省伪日满协和会省本部的大门口上，忽然挂出了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中国国民党吉林市党部”几个大字。

吉林市的土国民党降生了，和“维持会”同样的又一出丑剧的锣鼓敲了起来。

国民党市党部的书记长叫何书元，据说是从伪满“天子脚下”的长春来的。何书元把牌子挂出来以后，就大肆活动。由“维持会”从“维持费”当中批了一笔办公费，他就用这笔办公费“招兵买马”，大量发展国民党员，办训练班，办油印小报，接着又办大报……于是那些伪协和会员们、小汉奸们，便效仿着那些协和会省本部委员的办法，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员。协和会员又回到协和会的老地方来了！

与此同时，又从长春爬来两个国民党的“临时接收大员”，这两人一个名叫王惠卿，一个名叫霍鹏九。

王惠卿是山东掖县人，伪满时开过碱锅，在碱锅兴旺的时

候，他娶了一个白俄老婆。后来，因为染上了一口嗜好，大烟抽得很厉害，没上几年，就把碱锅抽干了。“八一五”前碱锅倒闭，正在穷极无路的时候，天下变了。于是王惠卿就乘机活动，也不知从什么地方，挖出一张国民党“九一八”以后的“地下工作人员证”来，这张“证明”真比博物馆的千年古画还陈旧，上面字迹模糊，真假难辨。王惠卿就拿着这张稀世的珍品，找到了他的同类霍鹏九。霍鹏九在“九一八”前是个小土匪头，“九一八”以后，拿着抢劫来的钱财，在长春开了一座小店。小店虽然不大，内容可是丰富已极，有私设的赌场，有满屋乱窜的“野鸡”，有土匪，有骗子手，有烟鬼……总之，在旧社会里最肮脏、最腐朽、最没落的东西在他这座小店里都可以找到。在旧社会里要维持这样个小店，就需要学会一切最恶劣、最卑鄙的手段；见着硬的叫爷，见着软的就欺，有利可图就钻，无利可图就弃。此外，还要预备下几个打手，网罗一批流氓，结成一股恶霸势力。霍鹏九就正是这样一个典型人物，是个大流氓，大“耍人的”。他和王惠卿都是在家里的“三番子”，王惠卿经常到他的店里吃喝嫖赌抽大烟，两人臭味相投，成了知己。霍鹏九在王惠卿的眼睛里是个英雄；王惠卿在霍鹏九的眼睛里是个足智多谋的人物。两个人就这样勾结在一起。“八一五”以后，霍鹏九就在持有国民党“地下工作人员证”的王惠卿的鼓动下，激发起当大官的野心，把小店交给别人代管，领上两个亲近的流氓打手，和王惠卿一路风尘，赶到了吉林市。

吉林市“地方治安维持会”的委员们，开始不知如何对待这两位让人摸不清底细的国民党“地下工作人员”，他们开了临时紧急会议，最后认为既然有证明，就本着有奶便是娘的原则，承认这两位不速之客为“临时接收大员”。

于是“维持会”和王、霍的正式谈判就开始了。

开小店的霍鹏九干脆得很，一张口就说：“我们两个人在满洲国抗战十四年，出生入死，就为的是今天能得个一官半职的。现在，我们来到你们吉林市，看到市面很乱，我想主要是缺乏人材，没有抗战人员来领头是不行的。我的意思是让王惠卿先生作吉林省省主席，我呢……我是军人（霍原系土匪）出身，就当个公安局长吧。”

这真是一语惊四座。在座的“维持会”的委员们，听完了霍鹏九的话，都弄得面面相觑，哑口无言，他们还没想到这两位不速之客的胃口会有这样大，几乎要一口把吉林省都吞下去呢。

老奸巨猾的王惠卿一看情形不太妙，忙于咳两声，接着说道：“是这样的，兄弟们这次来，是要和吉林各位贤达人士，共同维持地面，这是我们……地下工作人员的责任，我们也是要等候我们蒋委员长从国府派人来的。所以我的意思……我就作代理省主席吧。至于霍鹏九先生，他是军人出身，老警务了，维持地面的治安，是绰绰有余的，他就作公安局长吧。”

空气缓和下来了，委员们默认了，谈判就这样结束。

霍鹏九在谈判以后，立即采取了行动。他从维持会要了一张“加委国民党地下工作人员霍鹏九为吉林市公安局长”的委任状，连夜到成衣铺花高价赶做了三套由他自己设计的“行头”：黑色的大盖帽子上围了一圈大白箍，正中是一颗蓝星的帽花（用布做的）；黑色的制服上安上了白领章，袖头上也圈上了白箍……这本是“九一八”以前老中华民国的警察制服，已经早被蒋记警察机关废弃了。但是“九一八”前当土匪的霍鹏九对这样制服的记忆是最为深刻的，所以今天能够连一个“零件”都不缺地迅速设计出来。

第二天一清早，霍鹏九就和他从长春小店里领出来的两个打手，分穿上这三套新奇的“行头”，雇了一辆大马车，直奔伪满

的警务处。半路上，他又到商店里买了三副雪白的手套，一副套在他那杀人放火的土匪手上，另两副套在两个恶棍的手上。他自己把两只戴有白手套的手平放在膝盖上，端坐在马车正当中，让两个打手坐在倒座上。街上的行人都停下脚步观看，谁也弄不清楚这是从哪家戏园子里跑出来的角儿。

警务处和警察大队的伪警察们，虽然在“蒋委员长”的“负责维持治安”的指示庇护之下；在“维持会”的支持和利用之下，没有解体，但他们经不住万人共恨的唾骂声，当千万只仇恨的白眼向他们不断地投来的时候，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靠自己的力量重振往日的威风了，他们是多么盼望能有一个有势力而又不仇视他们的人，来为他们重整旗鼓，再创江山哪！

这样的人被他们盼来了。挂着“国民党地下工作人员”招牌的霍鹏九，一到警务处就被他们拥护起来了。真是物以类聚，霍鹏九是多么合他们的胃口啊！

霍鹏九上任的布告贴出来了。首先是在警务处门前出现了一张大红纸，上面不伦不类地写着：奉维持会之命，加委霍鹏九为吉林市公安局局长，从即日起，登厅视事……接着，在市内各处，都出现了这样的大红纸。一个土匪、骗子手，不折不扣的大流氓，就这样当上了国民党的公安局长。

这时，和霍鹏九性格不同的王惠卿，也已上任当了吉林省代理主席。王惠卿没有采取霍鹏九那样大张旗鼓的干法。商人出身的王惠卿，早已打好了他的如意算盘，他知道自己的底细，清楚他这个代主席的好景究竟有多长，他要在这短促的时间内，伸出他那熬洋碱的剥削人的双手，尽量搜刮一些财宝，然后再找个地方，重新操他的旧业。在这方面极其敏感的“维持会”的委员们，很快就摸到了这位王代主席的心中奥秘，这真是不谋而合，殊途同归啊！他们彼此之间的心灵很快地就靠在一起了，于是



他们就勾结起来，把贪婪的手一齐向吉林人民伸去。开始时他们互相支持，互相利用；王代主席利用委员们对吉林情况的熟悉，利用这些地头蛇的优越性；委员们则利用王代主席的金字招牌和地位，另外，也利用他会俄语，能和苏联红军直接办“外交”的优越性。但是这种狼狈为奸的合作并没有维持几天，委员们很快地发现这位王代主席竟是一只贪而无厌的饿狼，他那没有底的钱口袋永远大张着口，恨不得把所有的钱都独吞下去。而且这位王代主席竟也悄悄地迅速地发展了他自己的势力，除了拉住几个能为他效劳的委员作为左膀右臂之外，又把一些围住他的投机商人、地痞、流氓勾结在一起，作为他搜刮财富的亲信。于是王代主席那作商人的才能便全部发挥出来了，他见缝就钻，不问钱多钱少，多么卑鄙，有利可图就干。

有一次，苏联红军要买一大批活牛，除了供驻在吉林市的苏联红军自己食用之外，还要运往国内。王代主席听到这一消息后，马上亲自去见苏联红军，说他对牛最熟悉，可以保证买到一批使苏联友人满意的肥牛。苏联红军见王代主席为他们的供应问题亲自出马，深受感动，马上拨给他经费，请他派人办理。

王代主席回来后，并没有通过“维持会”的委员们，他马上找来他手下的亲信，吩咐他们分头去找牛贩子，了解牛的行情，要用给苏联红军买牛的名义，用最低的价格大批的把牛买进来，然后集中在一起，再听候他的吩咐。

用低价买进来的牛很快地集中起来了。当他的亲信们向他报告完情况以后，他算计了一下说：“好了，够了。通知苏联红军，明天上午来过磅。现在你们准备好两袋咸盐。告诉看牛的，先不许喂牛，等晚上，我和你们一同去喂。”

亲信们按照他的吩咐去执行了，但心里很纳闷：准备两袋咸盐做什么呢？喂牛为什么还要王代主席亲自去呢？……

晚上，王代主席率领着几个亲信来到了牛群的前面。满院老牛，半日未吃草料，饿得嗷嗷直叫。王代主席吩咐亲信把原来看牛的都赶走。然后，他让亲信们把预先准备好的咸盐拌到草料里，拿给牛吃。饿极了的老牛，不抬头地吃着咸盐拌的草料，他颇为满意地看了半天。

临离开牛群之前，他又让亲信把看牛的找回来，吩咐他们夜晚不许给牛水喝，明天早晨他要亲自前来饮牛。

可怜的老牛，它们在王代主席的摆布下，经历了从未经历过的饥渴：先是饿瘪了肚子，紧接着吃了一顿下生以来从未吃过的带有咸滋味的草料，吃完后，口干舌燥，嗷嗷叫着要喝水。叫得看牛的人不忍心听下去；叫得附近的老乡睡不着觉。一直叫到第二天早晨王代主席率领亲信来到时，它们已经声嘶力竭，只是张口喘了。

王代主席吩咐马上担水饮牛。

我们平日形容人猛劲喝水的时候叫“牛饮”，这就是说牛是极能喝水的。但是平日吃淡草淡料的牛怎能比得上今天这些牛呢！它们在王代主席的帮助下，真是创造了“牛饮”的最高纪录。几个看牛的和亲信们一同担水也供不上群牛痛饮，一直到把一口井的水几乎都喝干了，老牛才抬起头来。

王代主席摸着滚圆的老牛肚子，奸诈地笑了。他吩咐亲信去找苏联红军，马上前来过磅。

苏联红军来了，看见这些肚大腰圆的老牛，满意地向王代主席伸着大拇指。

牛被苏联红军牵走后，钱就大量地流入了王代主席的口袋里。谁也弄不清楚他在这桩贩牛的买卖里捞到多少钱。但是肮脏的内幕却被看牛人识破，丑事很快地传开了。

## 针 锋 相 对

“八·一五”抗战胜利，所带给我的欢乐是极为暂短的。面对着吉林市的混乱局面，眼看着牛鬼蛇神们的相继出现和他们的反动气焰，我心里早已燃起了愤怒的火焰。抗战所以胜利，是由于我们党中央领导全中国人民浴血苦战八年的结果。八年来，我们党所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直是抗日的主力军；在关内，他抗击了日军的百分之六十九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在东北，抗日联军战斗的火焰一直燃烧着，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一直在活动着。正是由于我们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才打倒了凶恶的敌人，才消除了当时看来是中国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最大障碍。但是现在，国民党反动派，却在美帝国主义指使下，施展出一切卑鄙无耻的手段，硬要偷天换日地篡夺人民的胜利果实。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下，我们共产党人怎能不义愤填膺。

吉林的情况，已经急转直下，国民党的病毒，已经开始蔓延了！这时我真如婴儿之望母，久旱之望云，急切地盼望着党的领导同志快些到吉林来。我曾几次和郑墉同志秘密商议，要去关内找党组织，汇报情况，请求指示。但是交通断绝，而情况又一天比一天严重，敌人的猖狂使我们不能有一刻的迟延，应该马上行动起来，勇敢地战斗，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这时，国民党市党部办起一个油印小报，报上除胡吹国民党的“抗战功绩”外，还常常画些伸胳膊摆腿做体操的小人，企图以所谓“新生活运动”歌颂“蒋委员长的伟大”，向人民灌输正统观念，麻痹东北人民。

我立即与郑墉同志商议，决定也马上办一份油印快报，针对国民党的反动宣传给以及时地彻底地揭露，粉碎他们的无耻谰言，宣传我们党的方针政策，宣传八路军、新四军及东北抗日联军在抗日斗争中的英雄事迹，让群众了解在党领导下人民的真正的抗战历史。

我们感到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是人手不足，必须壮大力量，组成党的领导核心。几年来，曾经冒着生命危险为我党工作的几名同志，如关锡庚、侯乃英等都曾不止一次地提出入党的要求，但因当时我的工作任务和环境的的关系，不能发展组织。现在，我们的革命进入了新的时期，新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需要建立起党的支部，壮大力量，把工作迅速地开展起来。

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在郑墉同志住宅后院的房屋里，我们召开了一次新党员入党宣誓会议。参加会的有关锡庚、侯乃英、陈雪范、郑墉、王庆林等同志。我和郑墉同志简单地讲过话以后，他们便举起拳头，庄严地向党宣誓！然后我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几个共产主义者联在一起，这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我望着他们那严肃而兴奋的面孔、闪闪发光的眼睛，心里说不出有多么激动。我们成立了支部，又开了支部会议。几年来，我没有正式参加过支部会议，没有和几个同志在一起研究过问题，今天在斗争中我们壮大了力量。

支部会议上决定我为支部书记，郑墉同志为组织委员（后来和上级党组织联系上以后，正式批准了这个支部）。并决定立即把油印报办起来；会上作了分工，各项工作都有专人负责，秘密

进行,争取在两天内出版。出版者的名义也经过仔细研究,最后确定为“中国共产党吉林市特别支部”,报名为《前进报》。

当人们的政治热情高度发挥出来的时候,工作上的效率是不可预计的。在短短的一天时间内,我们得到了一切必需的东西:两台收音机、两台油印机和一批好白报纸。我们所得到的收音机,是敌伪最好的“四八”匣子,它虽然非常遗憾地收不到延安的广播,却可以清楚地让我们听到党从张家口发出的声音。我们掌握了和敌人战斗的武器,可以及时地知道国际、国内的真实情况,以及我们党对时局的主张和政策。

郑墉同志住宅后院的房子原被一个日寇所强占,“八·一五”后这个日本强盗惧怕群众痛打,悄悄地溜到日本学校去住。所有家俱都丢下不顾了。我们又把它重新布置了一番,成了一所很好的工作机关,不但可以坐下办公,而且可以睡在这里,占满屋地的日本炕,可以睡好多人。原先日寇为了和郑家划清界限,特别开了一个后角门,又在和郑家通连处修了一道矮墙,成了个僻静的小院落。日本强盗当年的强霸措施,却给我们创造了有利的工作条件。我们可以在这个不引人注意的小天地里,秘密地进行工作了。

夜晚,当万籁俱寂的时候,我们都聚集到这个僻静的房间里,分成两摊,围着两台收音机,聚精会神地等待着从解放区、从党中央发出的声音。郑墉同志一边调整着收音机的拨针,一边告诉大家要细心听、细心记,并且作了分工,把同志们编好号,有人记第一句,有人记第二句、第三句,记完再往一起连,这样可以记得更详细,尽量不漏掉一句一字。我们正在鸦雀无声地焦急地等待着,收音机里突然传出了清脆的女播音员的声音:“张家口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新闻……”播音员用那嘹亮、有力的声音播送了毛主席飞往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消息。

啊！我们听到了关于毛主席的消息，知道毛主席为了全中国人民，为了和平，亲自飞往重庆了！这是一件震动世界的大事件，这是一条多么激动人心的消息啊！尽管我们事前作了分工，但是，有好几个同志手拿笔杆，只顾侧耳细听，却忘了记录。

听完广播后，我们马上动手编写。我和郑墉同志又回忆着写了两段抗日英雄故事。最后，又写了一个简短的发刊词，说明我们党和东北人民的血肉关系，号召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内战。版面编排好了以后，就由郑墉等同志刻写蜡版，他写一手好钢版字，工作认真负责，后来我们的蜡版，一直由他刻写，有时忙起来不分昼夜，毫无怨言。

我们紧张而兴奋地忙了大半夜，才将报纸印完。这时离天亮已经只有两三个小时了。我们决定立即分头出去，在天亮前，把报纸贴完。我按照大家各自熟悉的地区，把负责贴报的区域划分了一下。因为大多数同志没有秘密张贴宣传品的工作经验，我又在技术上作了点必要的讲解。最后，我们决定：凡是贴有国民党小报的地方，我们就在它旁边贴上一张；凡是他们没有张贴的重要地方，我们更不能遗漏。我们必须使更多的人看到我们的报纸，让他们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中清醒过来。

黎明前的吉林古城是庄严肃穆的。整个城市都在酣睡着。吉林古城啊！你赶快醒来吧，第一期《前进报》正在每一条大街小巷里等待着和人民见面呢。

## 从 小 到 大

当太阳从东方升起,吉林城从酣睡中醒来,人们开始了一天的劳动时,《前进报》便在吉林市内轰动起来了。每张报纸前都围着一堆人纷纷议论着,他们知道了:在吉林市还一直有共产党在战斗着。党在什么地方办公,是怎样工作的?有人积极地打听,寻找着党的队伍。有一个名叫关凯的人,他是在关内游击区被日本鬼子抓来做劳工的,他接受过党的教育,一直在追求着党。当他看到报纸以后,就到处询问党的踪迹,询问不到,便在一早一晚去贴报的地方等候,一连等了三天,才见到了我们的同志,他热情地拉着我们同志的手,简单地叙述了他的经历,便积极要求参加我们的工作,跟着共产党走。以后我们也经常遇到这类事情,同志们都热情地接待了他们,经过严密考查、慎重研究后,又吸收了一批新同志,使我们的队伍壮大了。

这时国民党市党部又通过“维持会”接收了日伪《吉林新闻》报社的全部财产,改头换面地办起《吉林日报》来。那些日伪的编辑、记者在国民党官员的指示下,又拿起曾为日寇歌功颂德的笔,以用惯了的什么“美中提携,一德一心”等“协和语”为蒋介石、国民党唱起赞歌,对人民进行污蔑。更为严重的是,他们竟把日本新闻社发的消息原封不动地搬到报纸上来,象什么“小机

内阁拜受天皇大命”等大字标题，不断出现。这种报纸一出来，人民便给以唾弃和谩骂。这时，驻扎在吉林市的苏联红军卫戍司令部也看到了他们的报纸，经过检查，苏联红军认为这种报纸如继续办下去，是对整个反法西斯阵营的人民一个莫大的侮辱，因此，限令《吉林日报》即日停办。

我们支部当即决定：我们应该马上把报社接收过来。由我出面，向苏联红军进行交涉。在苏联红军卫戍司令部里，我向司令部秘书巴拉诺夫同志说明了来意，他立刻领我去见政治委员。

政治委员是一位上校同志，他严肃而客气地接待了我，他向我说道：

“您们办的《前进报》我看见过！”

“哪几期的？”

“几乎每期我都没有放过。”他扬了扬眉毛说，“工作职责要求我这样做。”

“您有什么意见？”

“我认为很好，是中国人民自己的报纸，人民的呼声。”

“所以我们还要办大报，人民的报纸必须回到人民手中。”

他沉思了一下说：“您需要筹备多长时间？”

我想了想说：“请允许我打听两个情况，报社的印刷机器损坏没有？印刷工人还在不？”

他歪头看了一下巴拉诺夫同志，巴拉诺夫同志马上答道：“我们已经去看过了，机器非常完整，电门一开，就可以转动。工人多数都留在那里守护机器……”

“要是这样，”我郑重地说，“明天我们就可以出报！”

政委的身子立刻向前倾了一下，惊奇地说：“明天？”

“嗯，明天，人民需要早一天看到自己的报纸！”



“那么不需要筹备吗？”

“我们早已有了准备，中国有句古话，‘未雨绸缪’，党也教导我们：做着今天，想着明天。我们有《前进报》作基础，同志们再全力以赴，明天一定可以出报！”

“很好。”他高兴地伸出手来说，“祝你们成功！”

从苏联红军卫戍司令部回来，支部立刻动员全体同志，一齐投入这项紧张的战斗中去。

第二天一早，我们的《人民日报》便以崭新的面目，和吉林市人民见面了。

## 由地下到地上

十月七日，我们从“维持会”内部得到一个消息：十月十日，“维持会”要召开一个有八万余人参加的“庆祝光复”大会。会议的规模是空前的，各方面代表人物都出席讲话。国民党及一切反动走狗们，都要在那拥有八万听众的讲坛上，宣扬他们的“功绩”和主张，我们共产党人怎能容许他们独占讲坛，篡改历史、欺骗人民呢？在这种重要关头我们更不能放弃斗争，一定要找出合适的办法，认真地对待这次集会。

我们虽然出版了《人民日报》，但是党组织还处在地下工作状态中，不可能接到大会的“邀请”。我们立即召开了支部会，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会上有的同志提出：根据当前的形势和工作需要，可有一部分同志由地下转到地上，这会使我们工作更方便，更能联系群众，更能增加战斗力，在战斗中进可攻，退可守，可应付任何的事态变化。同志们同意了这个意见。会上决定：以我为领导带领一部分人公开身分，搬到《人民日报》社办公；一部分人以郑墉同志为领导仍坚持地下秘密活动，以原工作地点为根据地。

会议又决定：十月十日，由我以共产党代表的身分到大会上讲话，讲话要有充分准备，要符合党的政策精神。讲话的合法条

件由我出面和“维持会”交涉。

在群众大会上讲话，我在关里倒是经常做的工作，但在吉林市，这么多年来还是第一次。公开的和群众见面，给八万人讲话，我深知，摆在我面前的任务是艰巨的，这是和国民党反动派在争取群众问题上的一场公开战斗，这场战斗如果胜利了，就给未来的工作开辟了道路。为了胜利，我必须象支部会上指出的那样，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一方面准备、酝酿讲话内容，一方面要争取讲话的合法条件。

十月九日上午，我穿戴得整整齐齐来到三道码头俱乐部楼前。一个留着花白胡须的老传达员问我：

“先生，你找谁？”

“找两位会长。”

“你是哪儿的？”

“我是共产党代表！”我的声音很大，讲得很有力量。在吉林，自一九三〇年起，我参加了我们伟大的党，先后从事过两次革命活动，但是，在公开的场合，在一个我不认识的生人面前，大声地宣布我是共产党员，这还是第一次，这怎能不使我感到兴奋，不充满了力量地说出这人类最光辉的名词呢！尽管我说得如此响亮，这个行将入木的老传达，却象没听清楚一样，眨巴着那昏花的老眼，伸出手说：

“你有片子吗？”

“有。”我从兜里掏出一张方形硬纸片子交给他。这是我临来之前自己用毛笔写的一张片子，我知道，旧社会的官场活动是离不开片子的。老传达接过片子，让我先等等，他转身往里走去。但走不几步又转回来，把手遮在耳后边弯着身子问道：

“你方才说是什么党的代表？”

我见他那个样子又好气又好笑，便对着他的耳朵加重语气，

提高声音说道：“共产党代表。”

“啊！共产党……”他点着头，边念叨边向里边走去。

等了很久，老传达方才回来，这次他见我先客气地哈下了腰，把“你”改称为“您”，说：“会长请您进去。”

我随老传达上了二楼，一进会长办公室，里边几个人都忽的一下站起来，有人投来敌视的目光，有的现出惊讶的状态。马德恩紧盯着我的面孔说：

“维民，原来真是你呀！你是……”这位曾作过我的股东的老官员，虽看过我的片子，仍然面现惊讶之色。

我微笑着点点头说：“我是共产党代表，两位会长，你们好！”我伸出手去，两位老官员很不习惯地同我握了握手，然后让座、让茶……

王可耕满脸堆笑地递过茶杯：“不要客气，老熟人了，想不到我们还有一位共产党的朋友，实乃荣幸。……”

“是呀，想不到呢。”马德恩又插言道：“维民，不知您是几时参加的？”

“有些年了。”

王可耕马上又接茬儿说：“啊！共产党真非凡人所能比，肉眼所能见的。这些年来您一直是不显山不露水地为国家效力，真是劳苦功高，可惜我们对您的协助实在微不足道。”

“两位会长，我们不谈这个吧。”我很严肃地向他们说，“过去为了彻底地打败日本帝国主义需要我那样工作，今天又需要我做另外的一些工作了。”接着我说明了来意，最后我单刀直入地问：“明天的大会，不知‘维持会’方面考虑到我们共产党的代表讲话的问题没有？”

“这个……”马德恩干咳了一声，又望望王可耕。

“当然考虑了。”王可耕眨眨眼说，“对共产党我还是早有了

解的，市面上出现的《前进报》我拜读过，文笔都很好哇，不知那个特别支部和你们是不是一个系统的？”

听到这个奇怪的问题，我忍不住想笑，干脆地回答：“我们共产党是统一的组织，从中央到地方，没有第二个系统。”

马德恩看王可耕有些尴尬，忙微笑着说：“当然，当然！好吧，明天的大会特请您参加吧，庆祝大会嘛，谁的功绩也不能埋没。”

“我们一定应邀出席。”我又加重了语气说，“我们要出席大会，并不是怕埋没了功绩。抗战八年，谁有功，谁有过，人民是知道的，将来在中国的历史上会写清楚这一点。我们出席大会，主要是向人民说明我党对时局的主张，号召人民起来反对内战，坚持和平，建设新中国！”我说完便同他们告辞了。

这一天夜里，我和几个同志整整准备了一夜讲演稿，最后抄了两份，一份带在身上，一份交《人民日报》全文发表，让它和更广大的人民群众见面。

## 在大会上

“庆祝光复大会”于十月十日早晨，在吉林市北山大广场开始了。

这是十几年从来没有过的群众大集会。人们怀着那还没完全被内战乌云蒙住的喜悦心情，自动地来到这里，他们希望从这里听到和平建设的声音，看到反对内战的行动。九时开会，八时半广场上就挤满了人。我就在这时来到主席台前。

主席台的四周直立着好多摘掉伪满肩章和帽花的警察，遇有委员之类的“大人物”通过，便举手敬礼；遇有衣冠不整的人靠前，便横加阻拦。我没有理他们，一直向台下走去。

主席台下，摆了一张签到用的长条桌子，旁边站两个年轻人。我已注意到：所有登上主席台的人，都先到这里，拿出一个粉红色的硬纸片来给年轻人看看，签到后领一个红布条挂在衣襟上，这才能到台上去。那粉红色纸片可能是请帖之类的东西，可是昨天两个老会长并没给我这样东西，不知是忘记了还是有意难为我。不管怎样，我今天一定要上台讲话，一定要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我毫不迟疑地走上前去，向青年人点点头问：

“这是签到的地方吗？”

“是，”年轻人伸出手来：“您的请帖呢？”

“没有请帖。我是口头邀请来的。”

“您是哪儿的？”

“共产党的代表！”

“啊！”两个青年同时对看了看，一个向我点头说：“您先等等，我去问一下就来。”他向台上走去。

他去问什么？管他呢，趁这机会我翻翻签到簿子，那上面已经有好几十个人名了。有一个名叫徐琴舫的人，我以为是唱评戏的小旦呢，但，仔细一看，顶上却写着国民党代表的字样，我又气愤又感到好笑，不知这又是从哪里钻出来的国民党代表人物？真是牛鬼蛇神、鱼鳖虾蟹都出来兴风作浪了。

这时那个青年领着一个短粗胖的人从台上下来，向我介绍道：“这位是市政府的崔科长。”我一看便认识，他就是伪满市政公署的科长“崔二鬼子”。

没等我答话，这位崔科长便皮笑肉不笑地说：“您是李代表吧？实在对不起，会长昨天已有交代，可是事情一忙，我们就给忘了……”他忙从衣兜里掏出个红布条递给我，“时间快到了，请上台吧！”

“请等一下，”我说着，拿起毛笔在签到簿上写下：共产党代表李维民。青年人又把写有“共产党代表”的红布条别在我的风衣上，我这才上了主席台。

主席台上几乎坐满了身穿长袍马褂、西服革履的大人先生们，这是吉林市旧时代头面人物的展览台。我——对他们来说几乎是陌生人——一脚踏进这个天地，自然会引起他们的惊奇，几十只各种形状的眼睛，一齐投向我这边来。我没多看他们，直向台下望去，台下聚集着八万余人民，这些人才是这个大会的真正主人，我只是他们其中的一个，我的位置是在他们中间，而我所以上台，只是要说出他们的希望。这是党给我的任务，有这样崇

高的任务，群丑们的无聊私语，怎能值得我一顾呢！

将近九点钟，台下忽然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几位苏联红军军官代表，由马德恩、王可耕等五、六个人陪同，威武地走上了主席台，和前排的人一一握手，然后就坐。

大会正式开始了。升旗以后，首先请“维持会”长马德恩老先生讲话。这位以“维持和平”自居的旧中国的老官员迈着四方步登上讲台，戴上宽边老花镜，掏出一张三、四尺长写满墨笔字的大纸条子，象读古诗一样，拉着长调诵读着他的讲稿。念完，国民党吉林市党部代表徐琴舫马上走上讲台。这是个梳着油光的大分头，身材瘦小，尖下巴的中年男人，他有自己的时髦派头：上台后先甩一下头发，又用手拢一下，再摸摸那刚穿上的崭新的中山装的衣领，最后，斜着身子站定，拉着怪腔怪调念起他的讲稿。他讲稿的题目是“三民主义之体系”，不知他都从什么书上生吞活剥的东抄西扯来的词句，念起来驴唇不对马嘴，台下群众听得很不耐烦，最后，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否念完，慌忙地擦了一把头上的汗珠，便走下台来。

接着，大会主席宣布，吉林省代主席王惠卿讲话。这位有“国民党地下工作人员证”的碱锅王老板，我是早已闻名的，但是今天我还是第一次见面。这个瘦瘪枯干、满面烟容的糟老头子，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站了起来，不知是因为烟瘾没过足，还是内心畏惧，他张了两下嘴却发不出声音，这位主席竟在八万人民群众面前颤抖起来。他的座位距离讲台不过几步远，但他却难以举步。这时，很快地从他身后站起一个人来，架住他的胳膊，艰难地走向讲台。我仔细一看，这人原是在牛马行开店的徐掌柜，是吉林著名的大流氓，现在他也登上官府宝座，成了王代主席的亲信，真是物以类聚！

徐掌柜架着王代主席站在讲台上。王代主席不知所措地东



掏西摸,半天摸出一块手帕来,哆哆嗦嗦地擦去头上的汗珠,然后艰难地张开嘴,结结巴巴地说:

“今天……今天……兄弟本要讲话,可是……可是兄弟头疼,兄弟头疼。”边说着头疼,边将两手合在一起,向台下作了一个罗圈揖。

台下的群众哄然大笑起来,笑声未止,群众便骚动起来,徐掌柜低头一看台下那骚乱的人山人海,两手也不免哆嗦起来,赶忙拉着他的代主席战战兢兢地退下台去。

堂堂的国民党接收大员、吉林省的代理主席呀,真象舞台上被唾弃的小丑一样,在群众的嘲笑和愤怒声中,表演了一出使人发呕的丑剧。

这时大会主席看台下有些混乱,便要请我上台。我毫不迟疑地走上讲台,面对着这一片人海,八万余双眼睛,我从心底里用力地喊出了一句:“老乡们,父老兄弟姐妹们!我代表中国共产党来和大家一起参加这个大会……”当我讲到代表中国共产党时,更加重了语气,而且扬起手来向大家致以亲切的敬意。这时台下肃静下来了,八万余双眼睛一齐望着讲台,有人向前探着身子,有的在低声私语,我知道这里有多少人是热爱党、追求党而又没有找到党啊!今天他们看见了共产党的代表,看见了共产党人,心里怎么能够不有所震动,怎么能不聚精会神地听党的代表讲话,了解党的精神呢!

我首先向帮助我们打败日寇,解放了东北的苏联红军表示了深切的谢意,接着便讲了抗战所以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及当前我们中国人民的任务。这里着重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篡夺抗战胜利果实,破坏和平,积极准备内战的丑恶阴谋;讲解了我们党为争取国内和平所作的重大努力,号召人民行动起来,制止内战,争取和平,要求成立联合政府,建设新

中国！

我每讲到一个重要问题，群众就热烈的鼓掌，讲完后，掌声更是经久不息。当我走下讲台时，苏联红军军官代表首先站起来和我热情地握手，并说：

“您讲得很好！祝您成功！”

其他委员之类的大人先生们，也都掏出片子一齐递给我，我没向他们多说什么。我知道，这些人看到我们党有了这样多的群众，内心有些战栗，便投机取巧逢迎上来。但他们今天向你伸出片子，明天就要向你伸出拳头和刺刀的。大会结束后，我走下主席台，有很多群众都围上我，问我共产党在什么地方办公，今后都做些什么工作，什么样的人可以参加工作？有几个在抗日游击区被抓来的劳工和从森林、矿山跑出来的工人，他们紧紧地拉着我的手打听一些同志的名字和下落，有人马上要报名参加革命工作，我把他们的名字和地址都记了下来。以后我们的同志们分头去找了他们。

我在大会上的公开出面和讲话能在群众中有这样大的反应，并不是因为我个人的话讲得好，这说明了我们党和群众血肉不可分的关系。我们党始终不忘东北人民，伪满十四年，我们党始终和东北人民战斗在一起，我们的抗联队伍，在东北写下的英雄史诗，永远记在东北人民心里，而现在，当他们了解了我们党的精神时，就会坚定不移地站到我们党的立场上，同敌人进行斗争。

## 喜 讯 传 来

十月十日的大会，党公开出面和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吉林市特别支部的讲话全文，在当天吉林市的《人民日报》第一版上发表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扩大了，我们的工作开展得更顺利了。

我们以木材工人为基础，成立了市工会；以女教师为基础，成立了妇女会；又吸收了一批新的工作人员，投入到各项工作中去。

这时，国民党也在兴风作浪，扩展它的反动势力：国民党市党部在大量发展党员；三青团在各学校建立组织；各建军头子到处招兵买马；霍鹏九也在极力地扩充武装，把特务走狗、地痞流氓都拉到他的警察队去，掌握了近千名武装。

豺狼是以吃人为本性的，霍鹏九的魔爪随时都可能伸向我们；蒋介石集团到处搜罗各色反动人物，向人民对准枪口，和平是被罩在内战的乌云之下，八年抗战所争取到的国内和平随时都有破灭的危险。我们中国共产党一直是在积极努力争取和平，如果和平争取不到，决不能去向敌人乞求，必须积极地拿起武器来准备自卫，进行斗争。因此，我们感到组织武装力量，成了当前最重要的迫切任务。这时，我们只有在民间搜罗到的几十支长短枪，这无论如何不能应付仓猝的事变，必须采取有效的

措施。

经支部研究后，决定派一批优秀的同志到敦化、蛟河、舒兰、桦甸等几个主要县城去。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力量，建立革命根据地。同志们没走以前，经过反复学习、讨论，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他们到了乡下，工作开展得很顺利，特别是在一些有过党的活动和影响的县份，群众一见共产党的干部又来了，都自动地跑来报告情况，要求拿起枪杆子参加斗争；有人把埋藏了多年的枪支、子弹都献出来。正在我们积极发动群众、建立武装力量的时候，喜讯接连地传来了。

首先是东北抗日联军的王效明同志，率领着一批抗联干部来到了吉林。

王效明同志是东北抗日联军周保中将军的亲密战友。他在周保中将军的领导下，一直在吉林东部的广大地区坚持战斗，直到抗战胜利。王效明同志的到来，使我们在军事上初步有了依靠。我们在一起研究了敌我双方的情况，最后确定：以王效明同志和他率领的抗联干部为核心，加上现有的武装力量，迅速地在吉林市内建立起一支保安队伍。

这时，又一件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了：我们党中央首长陈云同志和彭真同志来到了沈阳！这件喜讯，是我在一天夜晚，在王效明同志的宿舍里，听崔石泉同志（朝鲜族）特来报告的。崔石泉同志准备第二天一早就到沈阳去见陈云同志和彭真同志。

这件喜讯，使我兴奋得通宵未眠，我拿起笔来向这两位敬爱的首长写工作报告。我确信陈云同志还会记得我：当我在延安的时候，曾不止一次地见过陈云同志。十几年来，陈云同志那稳健、细致的工作作风，曾在无形中成为我克制急躁毛病的有力武器。今夜，我就要向他汇报工作了，千头万绪，不知从何开始。从我自延安派出来写起吗？把我所经历过的危难和欢乐都写上

吗？是的，我是多么想把我所经历的一切，甚至把我想到的一切，以及我对党的怀念都写上啊！但是，陈云同志肩负着那么重要的责任，每一时刻都和人民的利害密切相关，我怎能用一些琐碎的事情去打搅他呢。我必须挑重要的写，写清吉林当前的形势，提出当前重要的问题，向党汇报和请示。

信由崔石泉同志带走了，我们静候党的指示。

这时，在农村工作的同志们做出了很大成绩。我和王效明同志研究，又派王益三等同志到北吉林的化学工厂、人造石油工厂去开展工人工作。那时工厂倒闭，工人蹲在工房子里饥寒交迫，忍受失业的痛苦。其中有人已自动地结成帮伙去找工头们算账，有的抓着日本鬼子就要报仇。工人出身的王益三同志到了那里，和工人住在一起，给他们宣传了工人阶级要在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推翻旧世界，建立新社会的革命道理，很快工人们便纷纷报名要求参加队伍，王益三领着他们，拉着大队到吉林来了。

十月中旬以后的吉林，松花江开始结冻，严冬来临了。但我们的心头并未感到任何寒意。我们在农村、工厂、矿山发动群众、组织武装的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热火朝天。可是，我们的敌人，蒋介石、国民党的挑衅和进攻，却象那初冬里的寒潮一样，不断地向我们扑来。

十月十日，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谈判结束。十月十二日公布了双方会谈纪要，宣布双方必须“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但就在第二天，十月十三日，蒋介石便对其部下颁发“剿匪”密令。在这道罪恶的密令的唆使下，国民党向解放区进攻的内战炮火更加猛烈了。而对东北，国民党尤为猖狂地宣称要置于军事调处和政治协商范围之外。显然，他们是硬要独霸东北的。这时东北旧军阀、国民党军长何柱国的委任

状飞到吉林来了，伪满少校赵传芳、汉奸纪大作都被委任为建军师长，还有一个国民党的建军中将也潜入吉林。据说何柱国很快就要来东北接收，那时他所委任的建军系统，都将变成正规的中央军。霍鹏九因为有了后台的支持，也更猖狂起来了。

正在我们积极努力准备打击国民党的进攻时，我接到了一项庄严的通知：陈云同志和彭真同志已经到了长春，看到了我的信，要我立刻动身到长春去作详细汇报并听取指示。

每一个受母亲抚爱成长起来的人，当长年远离家门而回到母亲身旁时，都会感到无限的温暖和喜悦！但，这怎比得上我接到这项通知时的喜悦心情啊！

我接到通知后，立刻把党的工作交给郑墉同志，又和王效明同志研究了保安队的情况。王效明同志派给我两个富有战斗经验的抗联同志，负责保卫工作，我们三人连夜赶往长春。

## 在 长 春

长春,这个日本帝国主义苦心经营了十几年的统治机器的中枢,已变成了血迹斑斑的人间地狱。有多少中国“劳工”被抓到这里来修筑“八大部”和那所谓近代化城市的一切装饰品。传说秦始皇修万里长城时曾累死过成千上万人,但,有谁能统计出来,在这个日本鬼子一手扶植起来的“满洲京城”的土地下,埋葬着多少中国人民的白骨呢!

如今,日本强盗被赶走了,但是和吉林一样,蒋敌伪合流的群丑们,仍然趾高气扬地游动在街头,市面上也是一片混乱。

我和抗联的两位同志在宽阔的马路上走着,顾不得东张西望,恨不得一步就跨入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

按照通知的地点,我们停步在一座幽静的日本式的小洋房前面。我们知道,这是周保中同志的宿舍。陈云同志和彭真同志,有时就在这里工作或开会。

按过电铃,里面迅速地走出来一个青年人,他闪动着机警灵活的眼睛,向我们打量了一下,笑着问道:

“你们找谁?”

“找周保中将军。”

“你们是哪里的?”

“我们是从吉林来的，我姓李……”

“你是李维民同志吧？”

我一愣神，点点头说：“是呀，你认识我吗？”

他热情地拉住我的手说：“我不认识你，可是我知道你就要来了。”他又和两位抗联的同志握手问候，然后，就把我们让到里边去了。

青年同志引我们到一间会客室模样的房子里坐下，又很热情地给我们倒茶，问我们饿不饿，要不要预备饭。我拉住他，迫不及待地说明了我们要见陈云同志和彭真同志，他微笑了一下说：

“你们等一等吧。”说完，转身上楼去了。

会客室的门正对着楼梯，楼梯很宽阔，是折回式的，青年同志上去一半，就看不见人了，只能听见放轻脚步的皮鞋踩在厚木板上那种有节奏的响声。我的心随着这脚步声跳动起来。从事过地下斗争的同志，一般地都能够锻炼出抑制自己感情的本领，我自信是有这种本领的。但是此刻啊，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那激动的感情了。从青年同志让我们等着和他转身上楼的态度里，我已经断定谁在楼上了。

我忍不住地站起来，向前紧走几步，手握在门框上，直望着楼梯……

楼梯板响起来了，不是一个人的脚步声，是几个人同时走下来。我的心猛烈地欢跳起来。这时陈云同志出现在楼梯上了。在他旁边还走着一位同志，后边跟随着那位年轻同志。

窗外射进的阳光洒落在陈云同志那神采奕奕的脸上，露着和蔼的微笑，明亮的眼光，亲切地投到我身上来。几年不见，陈云同志稍微有些消瘦了。

我快步走到楼梯口前，陈云同志已经把手向我伸出来，叫着



我的老名字：

“李一民同志，路上辛苦了。”

我握住陈云同志的手，望着陈云同志的脸，一时之间不知怎样表达我的感情。离开延安四年了，四年的时间虽然是暂短的，但对一个离开集体，单独工作的党员来说，却感到无比的漫长。如今，我从四年的期待和渴望中回到党的身边，幸福和温暖的感觉使我的眼睛湿润了。我强忍住感情上的激动，说：

“陈云同志，您好！”

陈云同志含笑点点头，指着身旁的那位同志对我说：“你认识不？”

我刚要说不认识，但当我定睛仔细一看时，忽然认出是肖劲光同志，真怪我精神过分激动，几乎连我在延安时候的河防司令都认不出了，我忙歉疚地伸出手去说：

“肖劲光同志，您好！”

肖劲光同志热情地和我握过手说：

“从吉林来的？路上好走不？”

“好走。”

“你的信，我看过了。”陈云同志说，“你来的很好。现在就和我们一同到办公地点去吧。今天你好好休息一下，明天我们再谈情况，你看好不？”

我忙点头说：“好。”

当我们向外走的时候，我又把抗联的两位同志向陈云同志和肖劲光同志介绍了一下。我们就坐车走了。

陈云同志的临时办公地点，是在一座印刷厂里面。

陈云同志把我们介绍给他的秘书刘成栋同志，要他好好招待我们。然后，陈云同志就参加另外一个会议去了。

第二天，刘成栋同志通知我到陈云同志的办公室去汇报情

况。

在陈云同志的办公室里，我见到了彭真同志和周保中同志，使我更加高兴。这时我的全部精力就集中在一个想法上：我必须把一切主要问题和情况都向党讲清楚，如果我讲不清，就有负于吉林人民的委托了。

在汇报当中，陈云同志和彭真同志也不断地提出问题，有时在关键的地方还加以评论。

最后，陈云同志问我最迫切的要求是什么？

我表示除了盼望听到党对工作的指示以外，最迫切的要求就是能尽快地派去强而有力的领导同志，领导我们工作，如果再能派去一些老干部参加工作，那就更好了。除此之外，就希望能给些武装。

陈云同志笑着说：“一个人、一个枪，你要的都是革命最根本的东西呀。好吧，今天先谈到这里，我们研究一下，明天咱们再谈。好不？”

我答应着站起来，当我起身向外走的时候，陈云同志又笑着说：

“回去好好休息，我们会让你满意地回到吉林的。”

当我走到外边的时候，刘成栋同志告诉我：有一位我过去的老战友从沈阳来了，要看我，可能正在宿舍里等着我，让我快点去。

我喘吁吁地跑到宿舍门前，猛推开门，只见一个身材魁梧的人站在窗前向外望着，他听到门声，猛一回头。我喊了一句：

“冯仲云同志！”

冯仲云同志一步赶上前来，和我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了。冯仲云同志，我的老战友，老上级，自一九三四年在哈尔滨分手后，十多年来我们一直没见过面，也互相不知道消息，没有想到胜利

后的今天,我们在这里会见了!这一瞬间,使人想起多少革命的变迁,怎么能抑制住这一时的兴奋和激动啊!半天,仲云同志才撒开手,望着我有些湿润的眼睛说:

“老李,你还活着?我听人说你牺牲了。”

“不但活着,还活得很有劲呢!”我攥住仲云同志的手,笑着说,“这些年你都在哪儿?”

“在抗联第三路军。”

“一直没离开部队呀?好哇,干的一定痛快!”

“痛快,干革命还有不痛快的,你呢?”

“老本行,干地下,也很痛快!”

仲云同志听我说完,拍拍我肩膀哈哈笑了。

“哎!老冯,我看见过你的妹妹和侄儿。”我突然想起了这件事情,忙告诉他。

“什么时候?我早就不知他们的消息了。他们在哪儿?”他抓住我的手急问。

“四二年,在延安。”

“你们都到过延安?太好了!和党中央、毛主席在一起呆过,太幸福了!”

“不要着急,等到把反动派打垮,全国和平统一以后,你也会看到毛主席的!”

“那太幸福了!还有什么好消息,快告诉我。”

“要告诉你的事情太多了,十多年的事情啊!……”

十多年哪!谁能在一夜之间讲完十多年的经历呢!而且这不是普通的十年,是革命大风暴里的十年,是惊涛骇浪的十年。十年中,战斗在东北的同志,真象有人说的,是在“清水里泡过,血水里浴过,碱水里煮过”,十年的浴血奋战,十年的革命斗争,将同志们锻炼得更加坚强了。

这一夜，我和仲云同志睡在一张床上，盖着一条被子，望着窗外明亮的月光，听着呼啸的风声，一直不停地谈着。我们谈到李世超同志、王鼎三同志以及那些对党忠心耿耿、不惜牺牲自己的交通员和其他同志们，这些同志有的英勇牺牲了，有的还不知消息。十多年来，有多少战友和同志，为了革命、为了中华民族，在战场上，在敌人的刑场上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他们死得那样英勇，那样壮烈。当我们回忆起这些同志的时候，我们共同地感到：我们应当踏着这些同志的足迹，学习这些同志的革命精神，在新的革命历史时期里，更好地为党工作！

经过彻夜畅谈，第二天起床后真感到疲倦，吃完早饭，很想睡一觉，忽然刘成栋同志走来告诉我说，陈云同志要找我谈话，我一听，不但睡意全消，而且精神百倍了。

刘成栋同志引导我走进另外一间宿舍里，在这间屋子里，和陈云同志坐在一起的还有一位我不认识的人，是一位五十多岁，头发花白的老同志，他穿着土羊毛织的深蓝色干部服。我一进屋，这位老同志就亲切地直望着我，他的眼睛象年轻人一样明亮，眼神里闪耀着聪慧的光芒。

陈云同志对我说：“来，李一民同志，我给你们介绍一下。”他指着那位老同志说，“这是袁任远同志，党派他作吉林省委副书记，这回和你一同走，同去的还有很多同志，一会儿我介绍给你。”

我高兴地紧拉住袁任远同志的手。关于袁任远同志，我是知道的，在延安时他是三五九旅的政治部主任，是大革命时代的老同志，斗争经验丰富，工作有魄力。党派这样久经锻炼的同志来领导我们工作，真是吉林人民的幸福。

袁任远同志拉我在他旁边坐下，说：“听陈云同志告诉我，你是吉林人，已经在吉林开展了工作，这很好，工作有了基础，就好

办了。”

我说：“工作是大家在一起搞的，从前我们是摸索着干，以后有了党的直接领导，我们就什么也不怕了。”

陈云同志笑着问：“那么从前还怕什么吗？”

“从前，……”我不好意思地搓搓手，“从前当然也不怕！国民党再嚣张，也是反人民的，怕他干什么。只是没有党的直接领导，我们觉着心里没有底儿。”

陈云同志和袁任远同志都笑了。

陈云同志说：“好吧，现在我就给你交底儿。”陈云同志稍微想了一下，然后严肃地说道：“目前的形势很紧张，抗战胜利了，全国人民都要求和平，蒋介石在表面上装着接受这个要求，也坐下来和我们谈判，实际是用这些手腕来争取时间，掩护他的内战准备工作。现在他在美国主子的支持下，正积极地把一直躲在大后方的军队调往前线，他一面和我们谈判，一面进行内战，到十月中旬，已经侵占我们解放区三十一座城市了。”接着陈云同志分析了当前国内外的政治形势，讲清了我们当前的任务。陈云同志强调指出：“敌人是惯于使用两面手法的，我们对它不能存有任何幻想，我们现在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做好一切准备工作。”

陈云同志又向我们详细地分析了吉林的情况，指示我们今后如何进一步地开展工作。谈话中，他还不断地问我一些问题。

最后，陈云同志十分亲切地向我说：“你们在下边初步发动群众，扩大了武装力量，这干的很对。今后还要深入、细致地干下去。昨天你提出要人、要枪，现在只能满足你们一小部分。我和周保中同志商议过，由他先给你们一部分武器，但是人——革命战士，我手里没有。”他看了我一下，接着说道，“李一民同志，你说我们的战士都是从哪儿来的？还不是从人民群众当中来。人

民群众有了觉悟,有了党的领导,自然会拿起枪来组成强大的革命武装力量,这个工作,当然要靠你们的努力了。”陈云同志望了望坐在身旁的袁任远同志,又说:“现在,党除了派袁任远同志去领导你们的工作以外,还派二十一名老干部和你们一同走,有了这批力量,再加上吉林原有的同志和抗联同志,相信你们是会工作得很出色的,有没有信心?”陈云同志含笑地望着我。

我在陈云同志讲话时,一直拿着笔努力地记录着。陈云同志的指示,象一张明镜把我的思想完全照亮了,从前不明确的问题,现在完全明确了。我坚定地说:

“有信心!希望能马上回去,按照您的指示,在袁任远同志领导下,一定把工作很好地开展起来!”

“好。明天你们就动身吧。”陈云同志说:“你们的省委书记是张启龙同志,他暂时还不能去。先由袁任远同志负责,组成市委会,有什么具体问题,都请示袁任远同志吧。”

听完陈云同志指示后,当天晚间,我就和去吉林的同志们见了面。这都是在革命的风暴中经过锻炼的老同志,每一个人都积累了丰富的革命经验,现在聚合在一起了,这将是多么大的一股力量,能够在他们中间工作,对一个长时间单身工作的我来说,感到浑身增添了干劲和力量!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告别了陈云同志及其他首长和同志们,在袁任远同志率领下,坐上一辆敞篷大汽车往吉林市开去。在这辆车里,还装有二百多支步枪和十挺机枪,我深信,这些枪支很快地就会掌握在人民群众手里,发展、壮大我们的武装队伍。

## 严 重 警 告

在袁任远同志主持下,中国共产党吉林市委员会组成了。除由袁任远同志直接负责外,我为副书记,郑墉同志为代理组织部长。原来特别支部的党员,都留在市委工作。

为了迅速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组织武装力量,党又选派了一批优秀的同志到各个县城和保安部队去。吉林市的革命运动,面目一新地开展起来了!

但是,正当这个时候,有消息传来,驻在吉林市的苏联红军卫戍部队将要调走。我们预计到,负责警卫吉林地区治安的苏联红军走后,以霍鹏九为首的敌伪警察、流氓武装集团,必然会乘机对我保安部队以及党的组织发动蓄谋已久的武装袭击。因此,我们必须预先制止他们的蠢动企图。恰当此时,由万毅同志率领的部队从山东过海,来到了梅河口。梅河口距吉林很近,我们便派人连夜去见万毅同志。不久,这支久经疆场的英雄部队就开进了吉林市。他们以老八路军军民一家的优良传统作风,分住在老百姓家里。住的都是老乡家中最不好的地方,并且把一切沉重的劳动和他们能干的活都负担起来。挑水、扫院子、擦玻璃、洗衣服,使住有部队的各家各户室内室外都干干净净,焕然一新。他们闲下来还唱歌、学文化、讲故事、作宣传,和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不仅给他们居住的那条街道增加了愉快欢乐的气氛,更主要的是使人民群众对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有了真正

的了解,扩大了党的影响,加深了党和群众的关系。

这时,党的工作范围更扩大了,工作任务也增加了。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市委便迁移到原“道德会”的宽大院落里去办公了。

就在我们部队进驻吉林市的几天后,我们接到了“维持会”两位会长的请帖,请万毅同志便宴,并请袁任远同志和我作陪。为了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经我们商议,决定应邀出席。使人想不到的是,他们不只请了我们,还请了国民党的牛鬼蛇神们,反动透顶的王代主席和霍鹏九都来了。与狼犬同席,这真是使人难以忍受。而更加令人气愤和作呕的是霍鹏九的狡猾行为。这个坚决与革命为敌的反动家伙,这时竟象《镜花缘》中两面国里的人物一样,掩盖起原来的狰狞面孔,换上了一副极为虚伪的笑脸。在便宴开始以后,便使出他那惯用的无赖手段,嘻皮笑脸地和这个碰杯,和那个干杯,呼兄唤弟,拍肩拉手,极尽虚伪之能事。当他端着酒杯走到袁任远同志身旁的时候,便弯下腰,眯细了眼睛,抬着他那尖嘴巴说:

“‘袁省委’,请赏兄弟个脸,和兄弟干一杯。”

袁任远同志拿起酒杯,但旋即又放在桌上,直望着霍鹏九说:

“若是在方才介绍的时候我没记错的话,您是公安局的霍局长吧!”

霍鹏九连忙点着头说:“是,小弟正是霍鹏九,以后请‘袁省委’多栽培。”

“我听人说霍局长正在扩大自己的力量,大量招收武装人员,是吗?”

“这个……”霍鹏九万没料到袁任远会在这种场合向他提出这样的问题,擎在空中的酒杯往回缩了缩,斜着眼睛溜了一下直



望着他的万毅同志，结结巴巴地说，“小弟为了维持吉林市面上的治安，这个……不得不增加几个人手。这事小弟和‘维持会’商议过。”他又斜眼溜了一下马德恩。

马德恩的脖子从席面上探过来，要说什么。

袁任远没等马德恩开口，直瞪着霍鹏九说道：“霍局长扩大力量的目的我们先不去研究它，将来自然会明白。只是听说霍局长和我们搞摩擦，还要搞破坏，并且挑拨关系，这未免太过分了吧？”

霍鹏九那黑黝黝的脸立刻变成了紫茄子色，手中的酒杯向一旁倾斜下去，和他脸色一样的葡萄酒汁顺着大拇指流下来。他瞪着公牛一样的眼睛嚷着：“没有的话，没有的话。这是谁在‘袁省委’面前造霍某人的谣言，破坏合作？现在当着万司令的面，我敢起誓，我霍某人要是安这个心眼子，对不起我这杆枪。”

“难道还要我把人证说出来吗？”

“是谁？我立刻枪毙他！”

“你枪毙他我还能说吗？”

“不，不，‘袁省委’！你到吉林不久，还不了解霍鹏九的为人。”他的一只手用力拍着自己的胸脯，嘴里飞溅着唾液，“霍某人做事向来光明正大，走得正，行得端，一步踩不出三个脚窝来。”他用眼睛看看我说，“‘李市委’早就认识兄弟，他可以作证。”

“不用作证。”我忍不住地说，“霍局长的为人如何，将来历史会作结论。”

“对，我们现在不想对霍局长下什么评语，”袁任远的双眉皱得紧紧的，眼睛里闪着亮光，象要看透霍鹏九那颗心藏在第几条肋骨里一样，“我们只是希望，霍局长不要企图和共产党搞摩擦，共产党一向是讲团结合作的，但是要有人破坏合作，想找便宜，

那我们决不原谅他，一切恶果，都要由他自己负责。”

霍鹏九那紫红色的鼻尖上渗出了汗珠，一瞬间他的眼睛睁得很大，从里边闪出一线疯狂吓人的光芒。但当他的目光和万毅同志的目光稍一接触以后，那上眼皮马上就阖下来，迅速地变换出了一股驯顺得象羔羊似的眼神。这个市侩仿佛看到了我们部队领导同志背后的军事力量，如果一声令下，他这个小小的霍鹏九就会象臭虫一样被捏死。反动分子有他自己的传统哲学，于是他的嘴咧开了，嘻嘻地笑着说：

“‘袁省委’讲的都是金石良言，霍鹏九是什么样人，我自己说了也不算，路遥知马力，天长日久‘袁省委’就知道了。我霍某人说到哪算到哪，从今以后，一定好好报效‘袁省委’、万司令。”他举了举擎了很久的酒杯说，“来，让我敬‘袁省委’、万司令一杯酒，为诸位八年抗战的伟大功劳干杯！”当他的酒杯举在眼前的时候，才发现里面的酒已经都滴落在地下和他那光亮的皮靴头上了。他干笑了一声，忙去桌上倒酒，当低下头去的时候，那脖后粗糙的皮肤已变成了紫红色。

一直伸长脖子想说话又插不上嘴的马德恩先生，好不容易抓到了一个缓和紧张空气的时机，忙抓起酒杯，吃力地站起来，向大家说道：

“对，请诸位先生都举起杯来，为袁老、万司令抗战功绩干杯！”他又看了一眼已经倒完酒直起腰来的霍鹏九说，“也为霍局长的……功绩干杯！”

便宴就这样不欢而散。那丰盛的酒菜并没给人增加什么营养，和狼犬同席谁能吃下什么呢？但，便宴上袁任远同志的一席话对霍鹏九确是一个严重的警告，使他认识了人民的强大力量，并且在正气面前低下了头，不得不把他的狼尾巴暂时地夹起来了。

## 突然的袭击

万毅同志的部队在吉林驻了一个短时期以后,又接到上级的命令,调往长春地区去了。过了一个时期以后,部队又从长春回到永吉县(口前)双河镇一带。这时,由二支队(师)支队长管松涛同志派给市委一个连,做警卫工作。

这一连的战士都是富有战斗经验的老八路军,装备好,火力强,有九挺机枪,还有掷弹筒。他们就住在市委办公的那个古老的大院套里。

市委既有了坚强的警卫战士,便按预定的练兵计划,将王效明同志的保安部队,撤至吉林市外,进行严格的战斗训练和政治教育。

由于部队领导同志的努力和老八路军作风所传播开去的巨大影响,这一个时期的保安部队有了很大的发展。工农群众络绎不绝地报名参加自己的队伍,使部队很快就扩编为三个团,这些自觉地拿起武器的工农群众,热情都很高,决心也很大,只是没有经过正规的训练,没有掌握作战的技术。为了使他们迅速地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民战士,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因此,他们就按计划集中到二道河子、关马山一带去了。

从万毅同志部队进驻吉林市,到王效明同志的保安部队撤

至关马山这一段时期内，以霍鹏九为首的敌伪、流氓武装集团是比较老实些了。但随着吉林市内情况的变化，和全国形势的发展，霍鹏九那反革命面貌又很快地显露出来了。

一九四五年的十一月，正是美帝国主义制造与扩大中国反革命内战阴谋明显化的时期：十一月八日，美国侵华军队总司令魏德迈在上海威胁称：华北美军“可能向共产党军队前进”；十一月十一日，美国军舰三十一艘载运国民党军在秦皇岛登陆。十一月十五日，美国政府宣布以七千七百六十三万八千二百九十二美元物资援助国民党，补充内战经费。就在这同一天，美帝国主义竟公开地用大量飞机掩护着国民党的军队，罪恶地侵占了东北通向关内的咽喉要道——山海关！

十二月，美帝侵华海军开始运送国民党杜聿明部前来东北，进攻人民解放军。

美帝国主义用他们强盗的双手，帮助国民党反动派举起内战的旗子，使一切反动分子都在这面旗子下手舞足蹈起来。吉林国民党反革命集团分子的腰杆也硬了起来，罪恶的活动加紧了。霍鹏九见着我们领导同志的时候，虽然还是称兄道弟，但是眼睛里时时闪着阴险的毒光。恰巧在这个时候，苏军换防，于是霍鹏九们真的蠢蠢欲动了。

一天早晨，天刚放亮，忽然在我寝室外边响起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有人用手指轻微而急促地敲着我的屋门，低声地呼喊着：

“李书记！李书记！……”

早晨沉静的空气立刻紧张起来，我一翻身，从床上坐起来，迅速地打开房门。

办公室的一位青年同志一步跨进来，他脸色发白，两颊绷得紧紧的，棉袄敞开着，喘着粗气。

“什么事？”我望着他那敞胸露怀的样子说，“把棉袄扣系上，小心着凉。说吧，什么事？”

他稍微松了一口气，一边系着棉袄扣，一边急促地说道：“方才接到公安局内部工作同志的通知，霍鹏九要来缴我们的械！”

“什么时候来？”

“正在集合警察，可能马上就要来。”

这样的事，是我们早就预料到的，但没想到会来得这样快。这时袁任远同志到关马山练兵去了，郑墉同志也不在，我必须赶快作出安排。我急忙说道：

“跑步去通知警卫连，紧急集合！再通知所有同志，把文件收拾好，作战斗准备！”

青年同志应声跑出去。

我迅速地穿上棉袄棉裤，拦腰系上一条宽皮带，皮带上挂一支枪牌檐子，又把我最心爱的那支大净面匣枪从盒子里抽出来，插在皮带上。一切收拾停当，便抓起皮帽子，急步走出屋门。

警卫连战士全副武装以纵队形式跑过来了，战斗前的兴奋和紧张，使得他们健壮的脸上闪着红光，个个神采焕发。

队伍站定，连长作了简短的报告，我一举手，开门见山地问道：

“同志们，反动派要来缴我们械，我们怎么办？”

我的话音方住，战士们就齐声喊道：“打！”

“好！”我激动地说：“我们的枪是人民给的，谁也夺不去！但是，打，是我们在迫不得已时的行动，如果能争取和平解决，我们就放过他们这一次，否则，我们也不能轻饶他们。”我转身对连长说，“马上投入战斗！机关枪都架在正面墙头上，掷弹筒放在大门上，战士先隐蔽在墙后，不许露头，保持绝对肃静，听我命令！”

连长按照命令，作了简短的战斗布置，战士们便轻捷地、无声地向墙头阵地跑去。

在那高大的砖墙里面，我们早已搭好宽厚的木板，架设机关枪的墙头上，堆着装满沙土的草袋子；四个墙角上，搭着阶梯。正面是凹旋式的大门，两扇极厚的木板门上包盖一层乌黑的铁皮，很坚固，枪是穿不透的，大门上边有一个向外倾斜的雨搭，掷弹筒就放在那上面，人踩在横起来的木板上，大门照旧可以开关。

战士们都已进入了阵地。我又回头安排了一下办公室的同志们，让他们作为战斗预备队，暂时在屋里待命。然后便领着四个警卫同志向大门走去。

警卫同志，是预先选拔出来的四个膀大腰圆的山东大汉，冲锋枪挂在他们胸前就象安在宽大的门板上的小门插关一样，特大号的黑棉袄紧箍在他们身上，如果一用力，胸脯前的扣子就可能绷掉。

大门紧闭着，我让两个同志跑去把门锁打开，一边一个站好，拉住门环，听候命令。我又向警卫连长讲清了战斗意图，让他配合。并让他在四个墙角上放上了望哨机警地隐蔽住自己，不许被敌人发现。

这一切安排是在转瞬之间完成的。战士们紧握着步枪，一声不响地蹲在木板上；九挺机枪，拉开距离架在墙头上，弹带从枪膛里直垂下来；墙角上的了望哨兵，紧趴在墙头上，两只眼睛露在墙外边，一动不动地看着。这座古老的院套，仍然那么沉静，只有房檐下鸽巢里的一群鸽子清脆地叫着，在当院空中飞来飞去。

渐渐地，从远处传来了轻微的汽车马达声，声音越来越清，越来越近，好象不是一辆。我的眼睛紧盯住传来汽车声音方向的

了望哨，所有的战士也都望着他。忽然，他那一动不动的身子猛向下一沉，迅速地回过身来点了点头，所有木板上的战士都随着他这个动作半蹲起身子来。我把匣枪从皮带上拔出来，回头看了一眼警卫同志。他们紧紧地站在我身后，象四座黑塔，两个把门的同志，双手紧拉住门环，朦胧可以看出他们那一眨不眨的眼睛里，闪动着愤怒的光芒。

汽车声越来越大了，象一阵妖风似地从街那边直刮过来，汽车轮胎辗着冰冻的地面，发出吱吱的叫声。从大门缝隙里已经模糊地看见汽车的灯亮和车上那黑糊糊的人头……猛然间，第一辆汽车停在大门前了，第二辆也停下来，……

我直觉血往脸上涌，我抓紧匣枪，向门旁战士猛点点头，又向连长招了一下手。

两扇大门吱地一声猛向左右分开，我一用力，急步走至门外，四个警卫同志紧跟在我身后，四支冲锋枪口直对准第一辆汽车。第一辆汽车头前站着反动头子霍鹏九，后边还有两辆汽车，都站满了全副武装的敌人，有的敌人已经开始猫腰往车下爬，有的已经把车头上的机枪扛在肩上，但就在我们出现这一刹那，一切动作都戛然而止，车上所有的敌人都惊呆了，只见霍鹏九把手一扬，他们便把枪口一齐指向了我。我眼睛瞪的火辣辣的，直对着霍鹏九，厉声喝道：

“霍鹏九，你要干什么？”

“我，我巡逻……”一丝狞笑，挂在霍鹏九那黑灰的脸上，他的眼睛里闪着阴险的凶光，牙齿紧咬住嘴皮，忙往起举枪……

这时，刷的一声，我们战士的脑袋同时从墙里露出来了，所有的枪口，都居高临下的对准了汽车上的敌人。

我又喝道：“霍鹏九，你敢乱动！”

“不许乱动！”战士的声音象霹雳一样从墙头上飞滚下来。

汽车上立刻出现一片惊慌的骚动，极少数几个把枪口转向墙头，多数的都象一切怯懦者在惊慌失措时所表现的那样：有的将腰哈下，企图躲在别人背后；有的用力往下边站，想用车厢挡住自己的身体，……霍鹏九迅速地往墙头上和自己车后瞥了一眼，倒吸了一口气，挺直的腰身立刻佝偻下去，黑灰的长脸紧皱到一起，手上的枪口也垂下去了……

“霍鹏九！”我跨进两步，直指着他问道：“你要干什么？要来缴械吗？”

“我……”他嘴唇哆嗦了两下，下眼睑上的皮肉猛烈地抽搐着。

“你要缴械？”我手往墙头上一挥说，“你请看，枪有，子弹也有，可是枪得一支一支拿，子弹得一粒一粒给。”

“这……”霍鹏九的眼皮急眨了眨，脸皮上挤出一丝笑容来：“‘李市委’，这……这不是弄误会了吗，我怎么敢起那个歹心呢？……”

我不等他说完，紧问道：“没有歹心，为什么你倾巢出动？为什么全副武装？”

“我们……”他又挤了一下眼睛说，“我们是出来巡逻的呀！”

“巡逻为什么出来三大汽车人？”

“这……市面不安静啊。”

“为什么车到我们门前停下？为什么枪口对准我们？”

“这，这是出于误会……”

“不要狡辩！霍鹏九，你的一举一动我们都很清楚！过去你就不怀好意，袁任远同志警告过你，你也发过誓，没过多久，你就来搞鬼，你说，现在怎么办？”

还没等霍鹏九张嘴，墙上的战士就齐声喊起来：

“缴他的械！放下武器……”



“缴枪不杀！……把枪扔下来！……”

“‘李市委’……‘李市委’……不能这样，容小弟再说几句……”

我知道缴他们的械虽然是可能的，但却是不可行的，那样就会给敌人以口实，引起局势上的急剧变化。但给他们一点压力，教训教训他们，使他们出身冷汗还是有好处的。所以等战士喊了一会儿，我便向后面一挥手，止住战士们的喊声。

战士们的声音一停，霍鹏九就乘势急说：

“‘李市委’，小弟确实没有存那份心，小弟若是那样，就不是我爹做的。”

“你还抵赖！”

霍鹏九见我声色俱厉，忙止住话头，手往膝盖上一拍，装作无可奈何的样子说：“唉！‘李市委’，我就是有三张嘴也解释不清楚了……这样吧，过去的不讲，‘李市委’你往后看，看我霍鹏九是不是说话象放屁那号人，以后我霍鹏九一定报效共产党，若说了不算，我对不起我这杆枪！”

这个反革命流氓又发誓了，这使我极为反感，我不耐烦地一挥手说：“算了吧，酒席筵前我早已听过你的这些废话了！你的誓言就象吹气一样，吹出来就无影无踪；今天我们不缴你的械，我们的枪已经够用了。我们只希望你回去好好想一想；你这种无耻的反动行径，会给你们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共产党做事情向来是仁至义尽的，但是如果有人硬是不知进退，共产党也决不客气，到了必要的时候，我们会给任何侵犯我们的反动分子以坚决的打击！”

我没等他再说话，也没再理他，一转身，领着四个警卫同志，大步向门内走去。当我们快走进门里的时候，才听霍鹏九吵嚷着：

“‘李市委’，那……那我们就走了，等过两天小弟再和你好好解释……”

我向守门的战士一挥手，大门“砰”的一声猛关上了。

在大门里听到歹徒们的汽车“嘟嘟”地向远处跑去。

墙上战士的枪口移向远方。

太阳从东方出来了，阳光照在枪口上，闪闪发光。

## 一波方平，一波又起

赶走霍鹏九以后，我一方面布置警卫连加强各方面的警戒，以防敌人进行报复性的偷袭；一方面向住在关马山的袁任远同志报告了敌人的无耻行为，同时也请保安部队加强警戒。象霍鹏九这样的反动分子是什么事都可能干出来的；当面他可以向你磕头，暗地里却恨不能一枪打死你。

就在赶走霍鹏九的第二天早晨，又出了一件事情。

清早，我正在吃早饭，郑墉同志忽然接到报社的紧急电话，说市政府伪职员王兆祺领着一伙人抢报社去了。其中还有十几名武装警察。

我把筷子往桌上一扔，忙喊通讯员通知套马车，同时招呼两个警卫员带好武器，准备出发。

通讯员跑出去后，我急系上皮带，带好檐子、匣枪，抓起帽子，急步走出室外。

警卫员曲少卿和老徐同志跑来了，我迅速地检查了一下他们的武装，便命令两个人去开大门，我领另外两个同志向马车棚跑去。

我让警卫员帮助驾驶员迅速套好车，我们跳到车上，我急对驾驶员说：“报社，快！”

驾驶员一拉缰绳，马车向大门跑去。大门早已敞开，门旁的

两个警卫同志，没让车停下，也飞身跳上了马车。

出了大门，我忍不住地又说：“快，快，拿出最快的速度来！”

驾驶员弯下身子，拉紧缰绳，马脖子直竖起来，喷着鼻子，蹬开后蹄，以叫人头晕的速度，顺着马路向前疾驰。迎面猛扑过来的凛冽晨风，象刮脸刀一样从人的鼻子上、脸上刮过去，不一会儿人们的眼眉变成了白色，皮帽耳朵上也挂上了白霜。但是，任什么样刚劲的冷风也吹不散憋在我们心头的怒火，最有耐性的人也会对国民党这无耻的强盗行为发出愤怒的吼声。

报社已经隐约可见了，报社前蠕动着—群黑糊糊的人影。我心急如焚，两眼冒火，手抓住驾驶台下面的铁梁，猛力站起来。我看清了，站在报社门前台阶上挥手讲话的是报社负责人之一李之白同志，他旁边还有几个同志。台下有几个穿便衣的人，正对着台上乱喊着什么，靠前的一人个头很高，连鬓胡子，四方脸。我一下就认出来这正是汉奸职员王兆祺。人群两边马路上，有十多个警察，也平端着枪，马路的那一边，还有十来个穿长袍夹皮包的人，畏畏缩缩地站在那里，有两个蹲在地下。

急驰的马车已经接近人群了，我把匣枪从腰里拔出来，咬着牙向驾驶员说：

“对准这群王八蛋直冲过去！”

驾驶员—拉缰绳，这匹大马咳咳叫着，嘴里吐着白沫子，飞奔着向敌人当中直闯过去。他们象炸了窝的鸟儿—样，有人没命地喊叫着，有人抱头向路边滚爬。当马车往回兜圈子的时候，我就命令两个警卫员，趴伏在车后座里，将冲锋枪担在靠背上，监视住那群武装警察。我举起匣枪，向着敌人大声喝问道：

“你们要干什么？要行抢吗？……”

还没等车站稳，我和另外两名警卫员便纵身跳下来，直奔站在门前的几个受惊的呆鸟走去：

“谁指使你们来的？你们领头的是谁？”我直指着王兆祺那四方脸问道，“是你吗？王兆祺！”

王兆祺的连鬓胡子搔动着，向前挪动了一步说：

“是这样的，我首先对你这种横冲直撞的无理行为……”

“是谁无理？你们在枪弹和刺刀掩护下来行抢，有理吗？”我一把拉住他的胳膊说，“你说，是谁指使你们来的？”

他往后挣扎了一下，没有挣脱，嘴唇颤动着说：

“你为什么要动手……”

“不动手还给你鞠躬行礼吗？快说，是谁派你们来的？”

“霍鹏九局长派来的，怎么样？”

“怎么样？让你们象昨天一样夹着尾巴滚回去！”我甩开王兆祺，大踏步走上台阶，指着那群站在台阶下的人说，“你们，夹皮包的先生们，不要在这里做反革命的美梦了，这里没有你们的座位。人民的报纸，只有人民来办！如果不赶快的离开这里，定将受到人民的严厉惩治，这就是我对你们最后的警告！”说完，我对着站在台阶上的同志们一挥手说，“进屋，照常办公！”我又告诉李之白同志，“要霍鹏九的电话，我找他说话。”李之白同志答应着和同志们迅速地走进门去。

我又对一直随在我身后的两个警卫员说：

“留在门口，加强警戒！”我转身也向门里走。这时，王兆祺紧跟在我身后喊道：“我是被派来的，我要和你谈谈！”

我一转身，一把拉住他的胳膊说：“进来！”

王兆祺向左右看了看，一仰脖向门内走来。

我和王兆祺进了屋，李之白同志正擎着电话耳机等着我。

我对王兆祺说：“请坐。”

王兆祺故意装着泰然自若的样子，圆瞪着两眼，但那一只拿着纸单的手却在抖抖索索。他用力抓住自己的裤子，一屁股坐

在椅子上，把手套扔在桌上，两眼茫然地望着前方。

我从李之白同志手里接过电话听筒，大声问道：“是霍局长吗？”

“正是小弟。”电话里传过来霍鹏九那笑里藏刀的声音：“‘李市委’，找小弟有什么事情？”

“请你不要明知故问吧！昨天你们在市委门前压的汽车辙还没平呢，今天怎么又到报社来捣乱！你为什么说了话不算？”

“怎么回事？小弟我，我……”霍鹏九在电话里含糊不清地咕噜了两声，才支吾着说，“我摸不着头脑！”

“你摸不着头脑？那么十多个警察是哪来的？”

“我……我不知道哇！”

“胡说！他们是奉了你的命令才这样大胆的！”

“这事……可能是他们底下人干的。……”

“不要推卸责任！”

“‘李市委’，你不要误会……”

“我从来也没误会过你。昨天你领着武装进攻市委，今天你又指使武装警察抢劫报社，你们这是一连串的阴谋活动。我现在严正告诉你，立刻把人撤回去！”

“撤人？我，我还摸不着头脑怎么撤呀……”

“怎么，你还想抵赖和拖延时间？”

“不，我这人从来不会说谎，我要说谎，就是王八蛋。”

“用不着再起誓了，我已经听过好多次了。告诉你，如果你再这样闹下去，对你是不利的！”

“是，是，‘李市委’！”霍鹏九在电话里叫唤起来，“事情虽然不是我干的，可我终归是公安局长，咱们不要把事情闹大了，我，我让他们回来……”

“好吧。”我再也不愿和他纠缠下去了，用力放下耳机，急对

李之白同志说：“到门口去通知那帮警察，他们的头目霍鹏九让他们赶快回去。再赖在这里，就把他们扣起来！”

李之白同志答应着向外走。

我转过身来见王兆祺还站在那里发呆，轻蔑地又看了他一眼说，“快请坐吧，老兄，你不是要谈谈吗？有话就快说吧！”

王兆祺那四方脸上肉绷得紧紧的，他干咳了两声，说：“我是被派来办报的……”

我那刚开始平静下来的心，又被他这一句话激怒起来，我一挥手打断他的话说：“什么办报？你们的报纸，是人民所不需要，被人民封闭了的，如果你们还硬要办，吉林地方大得很，哪里都可以办。没有机器，你们可以向美国人要，美国人不是把飞机、大炮都给了你们吗？为什么要到我们这里捣乱呢？谁给你们这样胡作非为的权利？……”

正在这时，李之白同志从外边进来了，他精神抖擞，直望着我。当我的话刚一停顿，他就走过来说：

“李书记，警察已经走了。”他又转向王兆祺，客气地但却是非常尖刻地说：“这里只剩下你一个人，不觉得孤单吗？”

王兆祺狼狈地四面望望，张大了嘴，咽着唾沫：

“啊，他们……”他猛站起来，“他们走了？这不可能……”

他不等别人答话，猛转身趑趄趑趄地向外边跑去。

他的手套还在桌上撂着，我拿起来，向他喊道：“等等，给你！”

他惊慌地回过头来，向我恐惧地瞥视着。我一抬手，将手套向他掷去，他惊呼了一声，猛往旁边一闪，手套从他身旁飞过去落在地上。当他站稳身子，看清是手套的时候，才一把从地上抓起来，象夹尾巴狗一样逃跑了。

对着他的背影，我和李之白同志都忍不住笑了。

## 春 风 解 冻

就在王兆祺之辈在报社捣乱的同时时间里，我们的广播电台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当我在报社得到消息，赶到电台的时候，他们已经接到霍鹏九撤退的通知，夹起尾巴溜走了。

从两天来所发生的一连串事件里，我感到国民党正在进行着一个有计划的进攻阴谋。公安局和国民党市党部都动起手来了，如果第一天霍鹏九那缴械的阴险行动得逞的话，第二天他们对报社和电台的抢劫自然可以如愿以偿了。现在，他们虽然都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但是他们能甘心吗？从敌人那疯狂得缺乏理智的行动上看——这种疯狂性主要表现在国民党市党部不肯接受霍鹏九的失败教训，仍然按照那显然是经过预谋的进攻步骤来进行抢劫——完全有可能卷土重来。为了制止这种不愉快的事件再度发生，我们必须采取措施。

这时，我们深感到在吉林市内武装力量还不够充足，而敌人又是流氓成性的，当他自己觉得力量强大的时候，就决不会收起各式各样的冷箭。因此，我们认为必须加强武装力量。我们将这些情况写报告向袁任远同志做了汇报。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有必要和“维持会”的首脑进行一次正式的谈判。我知道国民党市党部在经费上完全依靠“维持会”，



而公安局又是“维持会”的所属单位。霍鹏九和国民党市党部的书记长虽然在实际上是各行其政,但如“维持会”出面干涉他们的行动,他们至少在表面上会收敛一些。

恰巧这时,万毅同志从关马山进城来了,我便随他一起找到了“维持会”的两位会长,向他们讲述了几日来所发生的令人愤慨的事情,请他们加以制止。万毅同志表示:我们共产党对敌人从来就无所畏惧,在伪满时,日寇统治得那样残酷、严密,共产党人也从来没有放弃过战斗。现在,我们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关马山下驻扎着我们的工农武装部队,广大人民也热烈拥护我们党的政策,如果战斗打响,胜利决不是属于国民党的。但是我们为了维护人民群众和平团结的愿望;为了不使吉林人民受到战争的炮火,我们已经作了最大的忍让。我们甚至把已经垂手待缴的大批武装警察,从我们门前放走,而这种情况是发生在我们受到进攻的情形下。告诉他们,我们的忍让已经到了仁至义尽的程度,和平固然是可贵的,但是我们不能用牺牲人民利益的办法来换取和平,如果国民党不知进退,逼人太甚的话,我们就将不惜一切代价,和他们战斗到底。

马德恩和王可耕这两位以“维持吉林市面治安”为基本政策的老先生,听完了万毅同志的讲述,也颇为愤慨。

他们表示:一定竭尽全力维持和平局面,在他们力量所及的

启龙同志,也在磐石办公。为了确保吉林市的治安和进一步控制以霍鹏九为首的伪警察、流氓集团,经省领导机关批准“维持会”同意,在吉林市内成立了吉林省警务处。由保安司令王效明同志兼处长,龚维明同志为副处长。下设相应的办事机构,经费由“维持会”供给。

在这同时,我们又考虑到必须进一步抓政权工作,以使我们党的政策能够在人民群众当中得到贯彻,从而削弱国民党的反动政治影响。当时伪“市公署”的机构还照旧“维持”着,伪职员变动也不大,除了伪市长和几个罪名昭著的汉奸已经畏罪潜逃之外,其余的都奉马德恩、王可耕之命,照常上班办公。但实际上却无公司可办,伪职员每天聚在一起闲聊天,盗窃国家资财的行为层出不穷。所有这些乌烟瘴气的混乱情况,我们都了解得很清楚。这样,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向马德恩、王可耕提出我们的意见。

在省委指示下,由我出面,和马德恩、王可耕进行谈判。我首先向马德恩和王可耕讲了我们所掌握的有关“市政府”的一切混乱情况,接着我就提出我们有做过多年政权工作的老同志,可以担任市政的领导工作。当我讲完混乱情况之后,他们已经感到这是一个他们无能为力的沉重包袱,所以后来我一提出具体建议和要求,他们完全同意由我们改组伪“市政府”,成立新政府。

这样,我们就派沈越同志为市长、李玉纯同志为秘书长、派韩容鲁同志为税务局长……接着我们又在下边安插了一些干部,把旧人员做了初步的整顿。我们的政权工作就开始发挥作用了。

这时,曾经猖狂一时的吉林国民党在表面上消沉下去,在街上遇见霍鹏九的时候,他会谦恭地站到一旁,哈着腰说:“李市

委’，有什么事情请指示兄弟，兄弟愿意报效……”国民党市党部的牌子虽然还挂着，可是早已门前冷落车马稀了。然而这一切，都不过是表面现象，谁如果被这些表象迷惑住，而丧失革命警惕性的话，谁就会在阶级敌人面前犯重大的错误。国民党在我们强大的力量面前，不得不象乌龟一样缩起头来，但是他们的贼眼，却从来没有停止过转动。当时国民党正开二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公开号召破坏政协决议；而美帝国主义，更加疯狂地帮助国民党出谋划策，运兵遣将，美帝派往国民党的军事顾问团也已成立；在美国特使马歇尔和美帝海军协助下，大批的国民党军队运来东北……所有这一切，都象吗啡一样扎在吉林国民党那一撮反动分子的心灵上，使他们精神兴奋起来，恨不能一时刮起那仇恨的旋风。他们在暗暗地进行那反革命的阴谋活动，除去搞了一些便衣特务之外，还开始组织“暗杀团”，企图刺杀我们党政领导干部。国民党市党部的书记长何书元这时也偷偷地下了乡，去组织地主土匪武装。另外，他们还进一步制造城市治安上的混乱，布置便衣特务，夜晚抢劫、鸣枪，恐吓群众。

有一天晚上，街头又响起枪来，我们的公安处副处长龚维明同志急忙率领几个同志出去巡察，当走到公安局附近的时候，突然在距离他们极近的地方，爆起两响极清脆的枪声，有一颗子弹裹着一丝热风，可怕地唿哨着从龚维明同志的脸旁飞过去；另一颗子弹从下边射穿了他的棉裤。

敌人敢在公安局附近行凶，公安局内又无动静，龚维明同志马上判断出事情的真象。他气愤地找到了霍鹏九，质问他，要他交出人来。霍鹏九当然不肯承认，极力狡辩，拿拳头捶着自己的胸膛起誓，说：“你是我的上司，我要敢那样，出门先让枪子崩死我……”

从这次事件当中，我们感到只成立省的公安处，并不能有效

地控制公安局，必须派进去。公安局从组织机构上讲是属于公安处管辖的，公安处派人去，霍鹏九当然不敢拒绝。这样，我们就派刘玉泉同志为副局长，下面又派邵大光等同志为科长。这些同志从公安局内部和霍鹏九等反动透顶的家伙展开了尖锐的斗争，他们那无所畏惧的精神终于压住了霍鹏九等人的反动气焰，使公安局这个反动堡垒开始解体了。

一九四六年的春风，刚一吹进吉林古城的时候，我们的省政府就由磐石迁入吉林市。

省政府的迁入，使吉林的国民党反动派大为震惊，他们怀着罪犯的忐忑心情，惴惴不安地观望了几天，便在人们不注意的时候，可耻地溜走了。首先是在“维持会”里找不到了盗窃国家资财的王代主席。这个开碱锅的掌柜的，在吉林使出全身解数，搜刮地皮，现在不知钻到哪里，用吉林人民的血汗钱，熬他的洋碱去了。和王代主席一样，霍鹏九也领着几个亲信打手，逃之夭夭，临走前还卑鄙地盗窃了公安局一笔公款，又欠下了吉林人民一笔债。王、霍一逃，国民党市党部的负责人也都无影无踪了，市党部的牌子不知被谁摘下来，背面朝天地扔在地上。

随着国民党匪首的逃窜，吉林市的一切反动小丑也都销声匿迹。

吉林市真正变成了人民自己的城市。人民组成了自己的参议会，马德恩老先生当选为议长，结束了“治安维持委员会”的混乱组织，那些汉奸委员们也都夹起尾巴溜走了。

象春风吹得万物复苏一样，吉林市出现了一派繁荣景象。市面活跃起来了，所有商店都开始了营业，夜间的枪声消失了，人们再也不用心惊胆战地天没黑就关门闭户。对人民生活我们也作了适当的安排，周济了部分贫困市民，将巴虎门外一片敌伪房

产,有计划的分给缺房少屋的市民住。从“八一五”后就停止生产的吉林化学厂、人造石油工厂,也积极筹备复工。文教工作,受到了从未有过的重视,旧有的中学、师范不但完全恢复了,而且新办了一所吉林大学,由何锡麟同志担任校长。以任虹同志为首的文工团,也从革命圣地延安来到了吉林市。吉林市的知识分子以惊奇的眼光看着这群穿黄棉袄的演员们,在他们的陈腐观念里,演员都应该是烫发、穿高跟鞋、西服革履……甚至应该是奇装异服的时髦人物,哪有穿二尺半棉袄的演员呢?他们懒洋洋地进了剧场,他们没有欣赏艺术的想法,有的是要满足好奇的欲望,有的是想从这里搜集回去一些谈话资料,以填补他们生活上的空虚。当第一个节目《黄河大合唱》的帷幕才一拉开的时候,他们还是无精打采地坐在那里。指挥任虹同志一走出来,他们望着这个瘦小的音乐家,竟窃窃私语起来,有几个资产阶级的女士,嘴撇得象个瓢……但是,所有这一切,都被咆哮的黄河声浪给淹没了、冲跨了!被日寇统治了十四年的东北天空上,几时飘荡过这样激励人心的歌声呢!在那殖民地土地上,几时欣赏过真正的人民艺术呢?真正的艺术,会起到人们想象不到的效果;当果戈里在《钦差大臣》里指着鼻子骂贪官污吏的时候,台下的贪官污吏却忍不住笑得流出了眼泪;当意大利画家达·芬奇画蒙娜·丽莎的微笑的时候,用尽千方百计也不能使她笑得合适,结果却是用音乐使她的微笑永远保留在达·芬奇的杰作当中了。现在,我们的《黄河大合唱》,正是起到了这种效果。当任虹同志的指挥棒停在头顶上那一刹那,所有观众都惊呆了,场内静得可以听见任虹同志转向观众的声音,任虹同志微笑着向观众敬礼,台下听众的心这时才从那怒吼的黄河边上回到剧场里来,暴风雨般的掌声响起来了!才隔几十分钟,人们就都用尊敬的眼光,望着任虹同志,望着所有的演员。我们用艺术,教育了

观众，驱走了他们头脑中的陈腐观念。

随着工作的开展，原吉林市特别支部的同志都派到下面工作去了。关锡庚同志去做税务工作；侯乃英同志去做学生工作；王庆林同志去做敌伪物资工作；陈雪范同志去做群众工作。我和郑墉同志仍在市委工作，党派申东黎同志为市委书记，我仍为市委副书记。

春风不停地刮着，柳条抽出了嫩绿的柔丝，松花江解冻了，江面上漂过了第一批木筏。江沿上出现了三五成群挖野菜的小姑娘，在他们斜挎着的小柳条筐里，装着白色的“小根蒜”和深绿色的野菜。渔民在他们新织的渔网上，涂上了最后一层防腐剂，钉补好的木船，已经推下水去。他们的心象春天一样充满生机，准备在这解放了的第一个春天，赢得一个空前未有的丰收！

但是，正当吉林人民幸福地沐浴着温暖的阳光的时候，万恶的国民党却更加疯狂地将内战的乌云吹向东北、吹向吉林的上空，使松花江南岸广大解放了的土地，蒙受了重大的灾难！

## 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

一九四六年四月，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指挥下，向东北人民的进攻达到了疯狂的顶点。美国海军已经替蒋介石运进东北三十多万人马。再加上收编的数十万敌伪军队和政治土匪，牛鬼蛇神联结在一起，气焰万分嚣张。

四月中旬，美式装备的敌人大举进攻四平，我军展开了英勇的四平保卫战，血战进行了三十三天，在严重地打击了敌人的有生力量以后，我军奉命做战略上的撤退。撤退的部分队伍，排着整齐的行列，不断地经过吉林，向东北方向开去。

国民党的内战炮火，疯狂地推进着，吉林市明朗的天空上，遮上了灾难的乌云。

五月二十五日，吉林省委召开了领导干部会议。会上由周桓同志代表东北局宣布了从吉林撤退的决定。

从周桓同志的报告里，我体会了我们的战略思想：当敌人比我们强大的时候，我们就把大城市丢给他，让他背上包袱，用包袱压住他，然后我们再来各个击破；我更明确了我们斗争的艰巨性，当敌人的反动兵力暂时超过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必须作最艰苦斗争的打算，我们不能依靠东北的大工业，我们只能依靠东北的人民，在乡村里建立根据地，用步枪加小米，打败敌人。敌人

是一定能够打败的，他们的强大，不过是暂时的。我们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正义和真理都在我们这一边，全中国人民都拥护我们，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周桓同志最后指示：在撤出吉林市以前，一定要保证城市治安不受到任何危害，要防止坏人趁火打劫，只要我们在吉林市一天，就不能让老百姓的利益受到一点损害。

会后，市委立即按照东北局的指示，召开了紧急会议：一方面布置撤退；一方面安排公安局确保城市治安的工作。

撤退分为两路：一路从吉林过江奔蛟河去延吉；一路由乌拉街直奔舒兰。市委全体同志，在袁任远同志率领下，走后一路，先撤家属，后撤干部，并指示龚维明同志率领公安人员要坚持到最后一分钟。

我的母亲、妻子和孩子需要随着家属队伍先走。母亲在吉林居住了一生，经过多少世事的变化，每次变化都使母亲的头上增添了白发。但却从没有离开过吉林，母亲象根深蒂固的松树一样，生长在家乡的土壤上。这一次，我原以为动员母亲和队伍一同走，要费一些口舌，谁知我才一开始讲撤退的道理，母亲就说：

“咱们的队伍是不是都要走？”

“都走。”我沉重地说。

“那你还拐弯抹角的讲什么道理？咱们的人走了，我们能留下吗？走！咱们的人走到哪我们跟到哪！”

母亲的坚决态度，使我很激动，残酷的阶级斗争，使母亲的思想早已超出了一般老年人的思想水平，故土难离的旧思想已经束缚不住她了！

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八日，我们撤出了吉林城。当我们渡过松花江的时候，已经隐隐地听见了远方的炮声。同行的同志



们都严肃地、默默无言地走着，我不时地回头看看越来越远的吉林古城。心里暗暗想起毛主席的话：“当着天空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是的，吉林是人民的，国民党的强占，只是暂时的现象，我们定要回来！

敌人侵占吉林以后，其势更为猖狂。白崇禧竟叫嚣说：“要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消灭共军。”侵入吉林市区的全部美式装备的新六军龙天武的第十四师，自以为是蒋介石嫡系军队五大主力之一，更加气焰万丈，竟疯狂地沿着我们撤退的线路，分为两股追来。消息传来，同志们都义愤填膺，要求给以迎头痛击。人民解放军这时早已布下了天罗地网，我们集中优势兵力，在蛟河附近，将敌十四师一个团全部包围，除去有十几个敌人侥幸脱逃之外，其余自姓危的团长以下全部被歼，缴获了敌人全部的美式武装。捷报飞来，同志们都拍手称快。

当我们到达舒兰以后，省委立即召开了会议，会上决定：将小丰满、天岗、江蜜蜂、乌拉街、缸窑五个地区划为永北县，我为县委书记，高景之、徐国藩（即朱济范）等同志为委员，一同领导这一带的游击斗争。

从小丰满到缸窑，正好围着吉林市拉了一个半圆圈，这是一个极好的形势，我们可以从南、东、北三面随时袭击盘踞在吉林的敌人。

敌人既然强迫人民接受挑战，人民就必须拿起武器和他作战。蒋介石既然“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

蒋介石向东北解放区的大举进攻，是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信号。一个月以后，中国人民彻底解放自己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就正式开始了！



# 第五部





## 接 受 任 务

一九四七年六月，我接到一项新的任务：深入到国民党在东北的总指挥机关所在地——沈阳市去。领导一组同志，做知彼工作。

分配给我任务的部长同志和我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说组织上考虑到我曾在吉林市公开过身分，而吉林现在还在敌人手中，因此我在沈阳的处境必然比较艰难，要特别注意巩固环境和隐蔽自己。部长要我把妻子和最小的孩子晓滨带去，妻子这时已经掌握了译电的技巧，可以作译电员。同时又派给两位女报务员，装作我的妹妹。五口人，组成一个“家庭”，在沈阳安家落户。平日要深居简出，少露头角，主要是领导组内同志进行工作，把同志们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这个组的主要成员都是一些青年同志，我的助手白浩同志和他的爱人高皃同志已经早在一九四六年五月就派到沈阳，接着派去的还有交通员张健同志和他的爱人纪群同志，他们四个人都是党员。还有一个非党同志叫康祥春，早已有入党要求，部长嘱我到沈阳后再进一步帮助他，经过充分了解以后可以接受他入党。除此以外，还有两个比较可靠的进步人士，一个是国民党抚顺税务局长杜鸿儒（住在沈阳），一个是国民党沈阳市教育

局长陈硕彦。

部长同志说这个组的工作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基础，下面也发展了几个工作关系，组内的同志工作热情很高，很勇敢，只是缺乏做地下工作的经验。

部长同志告诉了我走的路线，但没有告诉我进入敌区的方法。这须等到达我们的前沿地区康平县以后，由那里的有关同志设法弄到证件，并送入敌区。

部长同志给我开了一封介绍信，要我到白城子辽北省委见陶铸同志，请他给以指示和帮助。

最后，部长同志强调了任务的重大意义。他从抽屉里拿出来一张五月三十日的《东北日报》，指着第一版上一篇《中共权威人士评目前时局》的文章，问我读过没有？我回答说已经详细地读过了。

“应该再读一遍，这是毛主席的论断，你听，”他把报纸按在桌上，用手指点着读道：“‘和全民为敌的蒋介石政府，现在已经发现自己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无论是在军事战线上，或者是在政治战线上，蒋介石政府都打了败仗，都已被它所宣布为敌人的力量所包围，并且想不出逃脱的方法。’”他兴奋地拍了一下桌子，“说得多么有力量！蒋介石二十多年的反革命统治，这回快要到头了！正象主席所说的：‘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他把报纸往前轻轻地推了一下说，“在我们东北，也正是这样情形。敌人曾经说要象‘秋风扫落叶’一样地打我们，可是从现在开始，他们自己恰恰要变成落叶了。从五月十三日开始，东北民主联军已经从东西南满各战场同时开展了强大的夏季攻势！”他打开一张画着红蓝铅笔道的地图指着说，“我们的目的，是要打通南北满两大战略区的联系，歼敌有生力量，打开局面，解放受压迫的人民！现在在我南、北满直接配合之下，

横扫拉吉线,进击梅河口和怀德县。敌人拚命地南抽北调,拼凑了不足五个师的兵力增援怀德,却被我军在怀德附近的黑林镇将敌七十一军主力歼灭;在怀德东北地区又把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的新一军击溃。敌人增援梅河口的新二十二师、五十四师也在清原以东被我全部击溃,并且歼灭了一大部分。这样……”他用两只手从西边的怀德、东边的梅河口用力往里边一合说,“我们就从东西两面,把敌人的整个防御体系,打开了两个大缺口!……现在攻势还没最后结束,但是我们东西南北满和热河、冀东等各解放区已经联成一片了。从此,东北战局将起一个根本的变化,这个变化,一定会加速蒋匪军队在东北的总崩溃!”部长说到这里,稍稍停了一下,在他那开朗的面孔上,双眉微微往起蹙皱着说:“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事物的另一方面,蒋介石是相当看重东北这块地方的,从‘八一五’以后,他就要一口把东北吞掉,在美国人帮助下,他运来了‘美械化兵团’,五大主力他运来了两大主力,并且把所谓缅甸远征军的‘名将’杜聿明也运来了。现在这个‘名将’虽然被打成了败将,但是困兽之斗,有时是更加疯狂的。而且蒋介石裤兜里还有别的‘名将’呢,到时候他会往东北放的。他们在东北已经竭尽全力投下了血腥的赌注,不到全部输光,是决不能舒服的。所以今后的战争还是很残酷的。至于他的兵力,估计不会增加太多了,蒋介石已经没有什么机动兵力,所有能够赶到第一线上的兵力都赶过来了。但是,为了挽救他在东北的可怕命运,到必要的时候他会用挖肉补疮的办法,从其他战场上抽调一些兵力的,这是你到那边以后,要特别注意的情况。”部长特别加重了后面的一句话,他直望着我说,“沈阳是敌人总指挥机关所在地,在那里是大有可为的。要想法知道敌人在东北各方面的军事情况,对于沈阳市敌人的防御力量也要留心,任务是艰巨而又重要的。‘知己知彼,百战百

胜’，你们的工作做好了，就可以使咱们更快地走向胜利。”

部长所要指示的话，显然已经说完了，他沉默了一下，问我道：“怎么样？有什么困难没有？”

我摇摇头说没有。

部长忽然亲切地笑了：“听说你还有些留恋永北县的游击斗争？是真的吗？”

“从前是有的，”我也笑了笑说，“可是听完部长的指示以后，已经没了。”

“没了就好。我知道你们这些同志的心思，总觉得干地下没有拿枪杆子痛快。实际上任何工作干好了都是痛快的，你们的工作要干好了，会胜过多少兵马的力量，这难道还不痛快吗！痛快不痛快不能从个人兴趣出发，应该从党的利益出发，你说对不对？”

我心悦诚服地点点头。

“听说你在东北从伪满一直坚持到‘八一五’，是吗？”

“中间曾到过一次延安，一九四一年党又分配我回到东北来。”

“我知道，当时党曾经派好多同志来到东北。”

“我就是那些同志当中的一个。”

“是的，党派你们好多同志来，在困难的条件下做艰苦的工作，这正说明我们党始终不忘东北，始终是和东北人民站在一起的。可是蒋介石却硬要强取东北，要把我们和东北人民分开，这真是自取灭亡！现在，我们就要在东北给他个致命的打击，让他知道：血肉的关系是谁也分不开的！正因为这样，你到那边就要加倍地努力工作，多占有他们的情况。我想你这次去，工作条件会比四一年的时候好多了，你有得力的助手，助手下边还有助手，报务员也有两个，还有译电员。你看这不是一切具备，只欠



东风吗。”部长愉快地笑着说。

“我一定努力地完成任务。你看我几时动身合适？”

“沈阳的交通员张健同志最近几天就能到，你和他一同走。从现在起你就把一切都准备好，要争取快些走。现在我们的夏季攻势快结束了，休整一下，可能就要开始秋季攻势，你最好能在秋季攻势开始以前赶到。”

和部长同志的谈话结束以后，我就作了出发的准备。我弄了三个柳条包，把我自己所有的衣物和从公家领来的都装到里边去，另外又捆了三个大行李，还有两个大皮包。我已经暗暗地打好主意，如果在康平弄不到合适的证件，我就装作逃亡地主，硬闯沈阳。

## 上 路

七月初，由沈阳交通员张健同志引路，我们经过白城子，绕道直奔康平县。

我改名叫王益，曾在齐齐哈尔铁路局工作过。两个报务员，一个胖一些的，长得有些象我，作为我的亲妹妹，改名叫王玉璜；一个瘦一些的，作为叔伯妹妹，改名叫王玉琛。妻子抱着才四、五个月的孩子晓滨，坐在大车上，给我们这一行人增加了好多家庭气氛。

我们很顺利地到了白城子，我拿着部长的介绍信，在辽北省委里，见到了陶铸同志，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他说我来得正好，他们正开完书记会议，我们可以和五地委书记曾志同志同路上康平，于是他又把我介绍给曾志同志。我们就一同上路了。

曾志是个女同志，她不坐车，骑马。马骑得特别熟练，是一位好骑手。她热情地称我们为尖兵工作。一路上，向我介绍了好多边缘区的情况，使我们受益不少。

到了康平，为了不引人注目，我们把“家”安置在一个老百姓家里住下，然后由曾志同志把我介绍给铁岭县长刘永川同志，后又指示刘永川同志给搞个证件，说这是件政治任务，定要设法完成，并负责送我们过去。

铁岭县城当时还被敌人侵占着，围城四周，是我们的游击区。刘永川同志是“马上县长”，办公用具都装在“马搭子”里，搭在马身上，他走到哪里县政府就到了哪里。他主要是领导武工队打游击，围着铁岭县城出没无常，打得敌人龟缩在铁岭城内，轻易不敢出来。

象每一个对党的事业、对同志认真负责的好同志那样，刘永川同志表示一定负责搞到我们需要的一切证件，并送我们过去，只是要我们多等几天。而这正是我所不愿意的。按照部长的指示，我们一定要在我军秋季攻势以前赶到，而且是越早越好。因此我就向刘永川同志提出，如果证件不容易搞到，就不要因为它耽误时间，能给我们在敌我“拉锯区”找一个关系就可以。但刘永川同志却特别看重我们的安全，要我们耐心等一下。

这时候，天也变了，东北的七月阴雨，连绵不断地下起来，乌云从早到晚压在人们的头上，总也不肯散去；雨点也大一阵小一阵向早已泥泞的地面上洒落着，已经沟满壕平，还是不肯住下。天气的好坏，对那些紧张工作的人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但对于期待工作而又不能马上开始工作的人来说，却大大地加重了烦恼和焦躁。我们“一家人”挤在老百姓的一间小屋子里，听着淅淅沥沥的雨声，看着铅板一样的天空，路上的高兴劲头都没了，只觉得又烦又闷。妻子因为着急上火也断了奶，晓滨的哭声也象雨点一样紧一阵慢一阵不愿停下。我一天往地委去找曾志同志好几次，催他们快和刘永川同志联系，请他快些来。我心里已经打定主意，不管事情办得如何，决定要走。

刘永川同志被盼来了。好心的同志听说我的孩子断了奶，就从“马搭子”里掏出来一铁桶美制奶粉和一包白糖，乐呵呵地递给我，说是他们打伏击的时候，从一个国民党军官那里缴获来的。这确是很珍贵的礼品，它可以使一个小生命健康地活下去。

但当时对我来说最迫切希望得到的还不是它。我眼巴巴地盼望他能再从“马搭子”里掏出来证件一类的东西，那我将以高于得到奶粉十倍的感激心情收下它。

刘永川同志见我直盯盯地望着他，就遗憾地、温和地笑了笑说：“我知道你的心情，不要急，再等几天。武工队正在想办法，他们会弄到证件的。”

“那么人呢？拉锯区的人找到没有？”

“人已经找到了。”

我忙问：“现在哪里？”

“过一两天就会来。这个同志姓高，是铁岭梁家窝铺的农民，‘八一五’后就给我们做工作，一直和武工队有联系，很可靠。你们不但可以住在他家里，而且他家里还有马、有车，能送你们进敌占区。”

我忍不住地高兴说：“妥了！请你快催他来，他一到我们就动身。”

“证件还没弄好呢！”刘永川同志为难道说。

“不用了。”我握住他的手说，“这就很感激你了。说实话，就是任什么也弄不到我们也要走了，何况现在已经有了这样可靠的关系。”

“关系也只能起一定的作用，何况他也只能送你们有限的路程……”

“过了封锁线就好办了。”

“不，国民党天下乱得很。”

“我们正是要利用这个乱。如果他们处处都有秩序，我们就没有活动的余地了。”

“那太冒险了！”

“冒险是需要的，有证件也需要冒险。就象你拿枪打游击一

样,有枪也得冒险。”

“可是我还希望你再等几天,你看……”他指着外面说,“雨不停的下,路上都是稀泥……”

“下雨有下雨的好处,”我半开玩笑地说,“至少是比太阳晒着凉快些……请你放心,让我们走吧。”

……就这样,在我一再坚持下,刘永川同志才同意催老高同志快来,来到就走。

我回到住处,悄悄地和大家研究了一下。因为没弄到证件,路上不保险,所以决定暂时把电台留在康平地委,等到沈阳安好“家”,再派人来取。

因为马上就要走,大家都兴奋起来,天虽然还下着雨,心却亮堂多了。

三天后,我们坐着大车到了铁岭县梁家窝铺。梁家窝铺村子虽然不算太小,但象所有“拉锯区”一样,显得很荒凉,村道上行人不多,听不见犬吠声,家禽成了稀有动物。一群小孩在村头积水深的地方打水仗玩,多数都光着身子,有几个穿衣服的也都补钉摞补钉,东一条西一块,风一吹,肉就露出来,和光着身子的也差不多。只有他们才感不到国民党内战炮火的威胁。

老高家住村东头,独门独院,很僻静。老高是个有些文化的农民,三十多岁,精明强干。他父亲就是农村中的场面上人物,老于世故,能说会道。大概就由于他们父子的能干,在这“拉锯区”里还能把家维持得象个家的样子,两匹马一挂车都完好地保存下来,没让国民党抢走,这也真算个奇迹了。

高家父子热情地招待了我们,我们研究了一下走的路线。据老高讲,从我军攻打四平以后,开原的国民党五十三军害怕被打,已经把分散在四乡的兵力大大地往城区四郊收缩,第一道封锁线已经撤至离城五十里的地方。从梁家窝铺出发,还得走一

天多才能到。这样,我们便决定第二天早晨出发,中途找个地方住下,第三天过封锁线。

第二天,天阴着,没有下雨。出了梁家窝铺,路上人更少了,野兔在道上横跑,四里五里遇不见一个人。马跑的挺快,惊得蛤蟆扑通扑通往水沟里跳。

车在泥泞中又走了大半天,到午后,雨却又淅淅沥沥地下起来,大家在车上把一块大油布扯起来顶在头上,继续往前走。雨不停地下,风也越来越大,头上的油布拚命地向上鼓涨,好象一撒手就能被吹到天上去。老高紧抽鞭子,想要快些赶到前面村子里住下。谁知忙中有错,在快到村子边上的时候,车却陷在稀泥里,老高抡圆了鞭子,扯着嗓子吆唤着,牲口喷着鼻子,蹄子把泥浆溅到人的脸上,全车的人,除了我的妻子抱着小孩之外,都下来帮着推,却怎么也无济于事。老高叹着气,擦着头上的汗珠和雨水,望着我说:

“不行了,非得到村里去借马不可了。”

我说:“好吧,咱们俩去。”

老高想了一下说:“我看留下一个人看车,其余的人都去,找个大院套,一则借马,二则借宿,免得在雨里浇着。可是有一样……”他看看我说,“地主都眼俗,溜须当官的,你最好……”

我明白了老高的意思,忍不住笑了笑说:“好吧,见机行事吧。”

于是我们把张健同志留下看车,就一同进村了。

我们找到了一家姓党的地主,老地主有五、六十岁,嘴上留着稀疏的胡子,两腮上的肉松软地往下坠着,两鬓的头发都没了,说话声音尖细,一看就知是一个酒色过度的老家伙。他用眼睛斜溜着我,悄悄地问老高道:

“这位王先生看样子不象普通人,他是……”

老高故意机密地，但声音却不低地说：“当官的。”

老家伙眼睛一亮，忙又打量打量我。我装作没闻没见，眼睛望着墙上的一张黑灰色的字画。这时，又听他向老高问道：

“至少是县长吧？”

“八成是。”老高故弄玄虚地微笑着说，“我也不十分清楚。”

老家伙鬼鬼祟祟的样子，使这场面很尴尬，我忍不住地高声咳嗽了两声。老家伙忙堆下笑脸来和我搭话，一口一个王先生。他表示借马、住宿、吃饭都没问题。说 he 自己是交朋友的人，在家靠家，出外靠友，既然走到这就是有缘，因此就一定和我交朋友。象当时的一切反动地主阶级一样，他将全部未来的希望都寄托在国民党匪帮身上。他竟“安慰”我说：

“不要着急，王先生，‘国军’会打回你们那里去的，眼下你就象旅行一样，到‘奉天’城里领着家眷逛几天，完了再随着‘国军’回去收拾那帮穷小子。”在他说到穷小子这几个字时，狠劲地揪一下他那稀疏的胡子，象要连根揪掉似的。他越说越兴奋，“咱们‘国军’的力量，还没完全施展出来呢……‘国军’进开原城那一天，我特意赶到城里去见识了一下子，你看那个威武劲，不怪说美式化，真开眼哪……后来，‘国军’进了我们村子，我连忙把营长接到家来住，我和营长说：需要什么只管吩咐，咱们是一家人……后来，有人说‘国军’在村子里抢东西，我说抢点东西怕什么，自古以来兵还有不抢东西的……不错，共产党的八路军在我们村子住过，他们没抢穷棒子的东西，可是他们要抢我们财主家的地，要抢我们的房子……”

老家伙脸涨红着，手在空中直比划，象中了病魔一样。我心里直冒火，怕他从我的眼睛里看出问题来，便微闭上两只眼睛，装出困倦的样子。精明的老高忙说：

“王先生一路上没睡好觉，是不是困了？”

多亏老高，才使老家伙的话匣子闭上了。当我躺在炕上的时候，老家伙那张牙舞爪的样子还在我眼前浮动，从这个反动地主身上，我更加明确了我们现在不只是和国民党军队作战，而是和整个的反动阶级作战，一切拿枪的和没拿枪的反动阶级，都同流合污地联合起来了，都对人民张开了仇恨的爪牙。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彻底迅速地消灭他们，消灭整个的反动阶级！



## 闯进蒋管区

早晨,东天边上逐渐闪出来一线红光,天要放晴了!我暗暗地通知大家,再换上一点干净的衣服,准备过封锁线。当老地主出来送我们的时候,一再地向我说:将来回去的时候,一定还到他家里住,他和我这个朋友算交定了。

离开老地主家,车又走在泥泞的路上。火红的太阳从东边冒出来,照得人眼发花。连日的雨水淋在条包上、行李上,东西增加了好多分量,三匹马吃力地拉着,绳套拽得吱吱响。越往前走行人越少,谷地里长满了野草,高粱在水里泡着,地里看不见人,一片荒凉。已经接近封锁线了。

⑦

七月的太阳不出来便罢,一出来便显示了它全部的威力,潮湿的土地被烘烤得蒸发着热气,人象在蒸笼里一样闷热。我让妻子把花洋伞打开,罩在晓滨的头上;又帮助两个报务员打开一个行李,拿出两条提花毛毯,铺在大车上。车上的人已经都脱下了沾满泥浆的衣服,穿得干干净净。我换上了一件灰市布大衫,西服裤子,黄皮鞋,草帽,长长的头发,黑漆漆的胡子茬儿,风尘仆仆地坐在车前边的新条包上。

一条弯弯曲曲的河流出现在我们面前,闷热的天,真使人见着水就想洗个澡。但前面出现的情况,使人精神马上紧张起来:

公路前面出现了一座桥，桥上模模糊糊地晃动着黄色的人影。  
老高头一歪，低沉地说：

“到了！”

我回头瞥视了一下车上的同志们，大家都坐在高高的行李上，探着身子，紧张地向桥梁上直望着。

“随便一些。”我对同志们说，“你们不要动，问你们话也不要随便回答，由我和老高、张健应付。”我知道张健同志有国民党区域的居住证明（他和我定为表兄弟的关系）；老高也有国民党勤劳队的证明，这都是我们可以利用的条件。

车往前走，已经离桥头比较近了。桥头两旁用草袋子堆起两个临时战斗掩体，机关枪从草袋子中间探出乌亮的枪身，两个端枪的国民党兵站在掩体里，十几个国民党兵站在桥顶上，听着一个军官模样的家伙讲什么……河对岸，也有几个国民党兵在河沿上走来走去，有一排桥头碉壕横在那边桥头旁边，里面也有大兵。车又往前走了几步，为了争取主动，我便和张健同志从车上跳下来，快步走在车的前面。离桥头还有十几米远，掩体里的国民党兵忽然直着嗓子喊道：

“站下！”

我稍停了一下，回头让老高把车站下。便又和张健同志向前走去，这回大兵没有再叫喊，只是把枪口紧对着我们。我紧走两步，到大兵前边，点点头说：

“辛苦啦！”我故意提高声音，好让桥上的军官和大兵听见。

军官果然停止了讲话，领着那十几个兵，大步向我走过来。军官是个中年人，只穿着一件美制的黄色军用衬衫，颈下的扣子都敞开着，宽皮带上挂着一支手枪。

我尽力使自己脸上露出兴奋的笑容，就好象遇见老朋友一

样,我把帽子在头上举了举,亲切地说:

“您辛苦了!”

这个家伙以君临一切的傲慢姿态站在桥头上,头向上微仰着,却把眼睛低垂下来,上下打量着我。

“从哪来的?”

“梁家窝铺。”

“是那儿的人吗?”

“老家在那儿住,在齐齐哈尔铁路局做事。”

“啊,齐齐哈尔……”这个家伙是地道的东北口音,他一边叨念着一边从桥头上走下来,直奔我们的大车走去。他围着大车转了一圈,向每个人的脸上打量着。晓滨看见生人,在她母亲怀里大哭起来,她母亲拍着他,嘴里还哼着什么。军官又掀起毛毯的一角,向里看了看,又拍了拍行李,然后转过身来又打量我一番,才象看透一切似的问我道:

“怎么,北边斗争有钱人还没完吗?”

“还没完。”

“你怎么样?”他直盯着我问。

“我跑出来了。”

“好吧,到这边就没事了。”说到这,他忽然直指着张健同志问道:

“他是你什么人?”

“是我的表弟,他在沈阳住家,特意去接我的。”

张健同志迅速地掏出居住证明给他看,他扫了一眼,点点头说:

“好吧,我不检查你们了,你们……”说到这,他忽然闭住嘴,眼睛望着前方,阴沉、绝望地说:“但愿用上帝的力量保佑我们打过去吧!我在那边也有地呢……”

“您也是北满人？”我故意表示惊讶地说。

“我……”他睁着绝望得可怕的眼睛，想要说什么，忽然又忍住，指着前边问我道，“你们在那边听到什么消息没有？”

“没有。”

“八路的队伍在哪？”

“听说康平城里有很多，在这边路上遇见过八路的武工队……”

“在哪儿遇见的？”他向前跨了两步，说，“离这多远？”

“离这大约……”我装出计算的样子说，“大约有四、五十里地吧。”

“四、五十里？”他想了—下，忽然对我们—挥手说，“好吧，你们走吧。”

随着他那挥动的手，老高的鞭杆子晃起来，大车跑上了桥头，越过了桥后的堑壕。堑壕里的大兵望着我们，大声地议论着：

“又是一伙逃亡地主……”

“上沈阳城去的……”

“沈阳的旅馆八成都没地方装他们了……”

我们几个同志坐在车上互相对看了看，都轻松地、会意地微笑了。

我们知道，闯过了第一道关口，以后的就好应付了。果然，在大清河边上、在二寨子，我们都遇到了五十三军的敌人，大清河边上还有“清剿队”呢。我们都用争取主动的办法，先和他们道了辛苦，再随机应变地应付几句，就顺利地通过了。在大清河上，车马必须用渡船渡过去，国民党兵甚至把其他过河的人都拦在后边，让我们先过了河。敌人从来都是自作聪明的，他们只相信自己的眼睛，而他们的眼睛又是被最愚蠢的头脑支配着。

## 黑暗的一夜

黄昏前,我们进了开原县城,城里挤满了国民党五十三军的大兵,好多店铺都关了板,齷齪的街道,褴褛的居民,在街头漫游的醉兵与伤兵,使这个城市充满了凄凉的灾难色彩。

每个旅馆门上都挂着客满的牌子,进去一看,所有的房间都让大兵占上了。我们费了很大劲,说通了站前一个小旅馆的掌柜,他把他和伙计住的一个房间让出来。房间在楼上,掌柜的说这也是客房,他自己的房间被营长强占了,他只好和伙计挤在这里住。我们一来,他们又被挤到柜台上去了!

这个店里住着五十三军一个营部。

我们把行李搬进房间,大车由老高赶着住大车店去了。

房间很狭小,墙上涂着一撇一撇的臭虫血迹,发出难闻的气味。木板床上只能挤下三个女同志和一个小孩,我和张健同志只好躺在地上睡。

对面的房间正在痛饮黄浆,划拳的刺耳尖叫声一直冲进我们屋子里来,两个男的对叫完了又换上一个女的,这个女人的叫声又尖又长,她把“俩好”都喊成“咱们俩好”,最后的尾音拖得象唱京戏的旦角念“引子”那样长。好容易划完拳了,又传来另一个女人淫荡的小调声,听着让人身上直起鸡皮疙瘩。我不得

推开门向对门望了望，对面的门紧关着，上面挂着一个牌子，写着“官佐宿舍”四个字。“管栈的”伙计以为我有事，忙殷勤地走过来（正因为这里住的都是大兵，所以他对仅有的客人就特别殷勤，希望从这里多得些“小费”）。我向对门指了指，他机灵地闪身进屋，掩上了门，悄悄地说：

“营长和军官的临时家眷。”他斜看了一眼坐在床上的女人，凑近我耳朵说，“两个‘野妓’，合伙包下的。”

这时张健同志正凑过来，问伙计附近有没有方便的饭馆。

“有是有……”伙计又瞥视了一下女人们说，“可是乱得厉害，您们去怕不大方便，到处都是‘国军’……”

“算了吧。”我说，“求伙计给买些烧饼来吃吧。”

“那方便，附近就有。”他伸出一只手来说，“五千元一个。”

对这个巨大的钱数，我们并不感到十分惊讶，蒋家天下恶性的通货膨胀，物价的飞涨，我们早已清楚。如果以抗战前夜的物价为标准，到日本投降前夜涨了一千八百倍，时间没过二年，到现在已经涨过六万倍，越涨越猛，真象脱缰野马一样，蒋介石用尽一切办法，也挽不住马缰了。

张健同志给了伙计十万元法币。请他给买十个烧饼来。

当我们吃完烧饼的时候，对面屋那歇斯底里的叫嚣声已经停下来，人也都从屋子里走出去了。我们没有开灯，我嘱咐大家悄悄地躺下睡觉，明天好起早离开这个肮脏的地方。为了防备出什么事情，我把行李横在门里，堵住门睡。

周围静了下来。一路劳乏，使我们很快地合上了眼睛，但就在我方要熟睡过去的时候，却从楼下传来了持续不断的喧哗声，声音愈来愈响，愈来愈真切，这些声音是由：天杠、地杠、九点、毕十……组成的，中间还夹杂上许多咒骂和怪叫声。这声音吵得我睡意全消，再怎么也睡不着了，我借着出去解手的机会，趴在

楼梯上向下看了一下：楼下空地上摆了一张桌子，一群大兵和军官把桌子围得水泄不通，一个军官双脚蹲在凳子上，黄衬衫袖子挽到胳膊肘上边，汗流满面地推着牌九，他后边有两个抹着厚厚胭脂的烫发女人帮助“照拐”（替收钱、开付钱，以及照看场面）。我站在楼梯上，居高临下地看着桌上的无数只青筋暴露的手，移动着、哆嗦着、挥舞着，看着许多纸币，从这只手传到那一只手，从那一只手再夺回来；看着贪婪的眼睛，张大的红嘴，颤抖的肌肉。看情形这一夜他们是不会散局的。

当我回到屋里的时候，张健同志从地板上抬起头来，愤慨地、低沉地说：

“简直是一群鬼！……这种兵还能打仗！”

“他们也只能这样生活，用赌博、女人和酒来麻醉自己。他们不敢想到未来，未来对他们来说就是死亡，死亡越迫近，他们越不敢想，唯一的逃避方法就是鬼混……”

“让他们吵吧，吵不多久了！”张健同志悄声地说。

楼下的牌九一直推了一宿，楼上也不时有人走动，我们谁也没睡好觉，憎恨的感情一直在大家心里翻腾。窗上已经泛出白光的时候，楼下的吵声还不住。我们就趁他们声嘶力竭的时候，和旅馆算清了房费，找来了老高，把行李悄悄地运到车站，等候火车去了。

火车没有一定的钟点，抢上哪趟算哪趟，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办了“自理”，带着行李和条包，抢上了一列敞盖货车，大家坐在行李上，挥手和辛苦的老高同志告别！

列车缓涩地往前爬行，风很大，从车头上吹过来的煤渣子猛劲地往人脖领子、耳朵、衣服缝里钻，每个人脸上都挂上了一层黑灰。从开原到沈阳不过二百多里地，但火车走走停停，一直爬到过午才到了我们的目的地——沈阳市。

## 和同志们在一起

一个从解放区来到沈阳市的人，一下火车，便强烈地感到自己是踏入了一座混乱的罪恶城市。当你冲过那狂乱的下车的人群以后，就会看见无数烦躁、不安的面孔，他们一个个面色苍白、愁苦，象有无限解不开的心事。一些显然是从解放区逃亡来的地主、汉奸们，因为找不到合适的旅馆，坐在墙角行李堆上，蹙蹙双眉，长吁短叹；一些商人打扮的走私贩子，鬼祟地向人打听解放区的消息和物价情况；警察们在人群里左顾右盼，贪婪地搜寻着可以勒索的对象；特务、便衣用饿狼一样的眼睛查看着每一个他们认为可疑的人；穿着美式军装的国民党军官们在人群里横冲直撞，他们在人民解放军面前是懦夫，但在赤手空拳的群众当中却是“英雄”。在他们身旁往往走着极为妖冶的女人，这种女人在解放区里只有在舞台上才可以看见：紧缠在腰身上的旗袍，垂在肩膀上的长头发，隔百步之外就能看清楚的大型耳环子，红唇、白脸，被拔净以后又画上去的黑眉毛……跟在他们背后的是衣服褴褛的乞丐，伸着枯干的双手，乞讨着。……

当你走上大街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个都市的美国殖民地化的畸形繁荣，商店里充满了美国商品，橱窗里陈列着玻璃提包、玻璃袜子、玻璃雨衣；西药店的门前贴着“请用清血解毒的配



尼西林”的大字广告；街头上贴满了“好来坞”电影的招贴画，美国军用吉普在街上飞驰；咖啡馆和跳舞厅鳞次栉比；头发染黄的烫发女人和梳着飞机头的男人，恬不知耻地紧靠在一起……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国民党和他们的美国主子在用资本主义最没落的毒液浸渍着这个城市，在这些最丑恶腐化生活的后面，就是他们的末日——死亡！我和我的同志们，今后就要在这个城市里，为加速他们末日的早一天到来，而努力地战斗下去！

我们在张健同志引导下，直奔南五马路爱南路二九号，国民党空军第十六号官舍，康祥春同志的住宅。

已经是下午四点多钟了，可是八月的太阳还是高高地从西边照下来，晒得人脸上直淌热汗。在货车上刮在我们脸上的黑灰，让热汗一冲，一道一道的，煞是好看。几个女同志一边相对地笑着，一边拿出手巾擦脸，我也胡乱地擦了擦。

康祥春同志的住宅，是一座日本式的小平房，很僻静。张健同志去敲了敲门，从里面走出来一位衣着朴素的青年妇女，张健告诉她我是康祥春的朋友，现在全家到沈阳来，要见一见康祥春。

青年妇女帮助我们把手行李抬到屋里，说康祥春就快下班了，让我们等一等，她去预备饭。乘这个时候，我让张健同志去找白皓同志。

五点多钟的时候，屋门开了，走进来一个穿着国民党空军少尉制服的人，年纪不到三十岁，中等身材，黑黢黢的圆脸上闪动着—双大眼睛。他略带惊奇地望着我和几个女同志。从张健那里，我已经知道康祥春的外貌了，我忙走上前一步说：

“您是康祥春先生吧？”

他点点头，眼睛又落到我们那一堆庞大的行李上。

“我叫王益。”我自我介绍道，“今天和张健一同到的沈阳，

他去找一位姓白的朋友，一会儿就回来。”

“啊！”他的大眼睛里立刻充满了喜悦的光彩，“您是从北边来的？”

我心照不宣地点点头。

他快步走过来，用力地拉住我的手，摇晃着说，“我早就听说要来人了，这太好了！你们一共……”他又望着我身后的女人们。

我向他介绍了我的妻子和两个“妹妹”，告诉他我们全家都来了。

他挨个热情地握过手，兴奋地和我谈：“人再多点我这里也住得下。”他推开屋门，指着外面两个门说，“去掉厨房还有两间屋子呢，我们自己住一间，你们住一间，那一间张健和白皓住。”

“他们俩也住在这里吗？”我感到有些意外地问他。

“我们从来就住在一起。”大概他看出我的神色有些不对，忙补充说，“我这里环境很好，左右住的都是空军军官，宪兵和查户口的不大来。”

我没有再说什么。正这时候那位青年妇女进来了。康祥春向我们介绍说是他的妻子，刚从乡下搬来不久。这是一位很和善的农村妇女，象大多数经济上不能独立的妇女那样，爱人的一切就是她的一切，她见康祥春对我们非常热情，她的热情也高起来，忙着给我们打洗脸水，放桌子，盛饭，里外屋紧忙。我的妻子和“妹妹”也伸手下了厨房，我们很快地就象一家人了。

吃完晚饭后，张健同志把白皓同志找回来了。和康祥春一样，白皓也穿着国民党空军少尉的制服。他身材瘦小，朝气蓬勃，一见面，就用他的双手紧紧地拉住我的手，久久不放，就象亲人久别重逢一样亲热。我知道，张健同志已经向他传达了上级的指示，他对我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

为了能更快地开展工作,晚间,我就请白皓同志和张健同志汇报工作情况。通过汇报,我更进一步地知道了白皓同志和康祥春同志的一些情况。

白皓同志和康祥春同志都是伪满“建国大学”第四期的学生,在学校时,偷偷地读到一些抗日书籍,以后由他们六名同学,组成了一个自发的抗日组织,名为“东北青年抗日救国团”。组成后不久,因为往伪“法政大学”传送书籍,被敌人发现了线索,在危机四伏的时候,他们假造了“出国证”,在一九四三年冬天,一同闯出了东北,流亡到关内,以后又辗转到了重庆。在重庆,他们目睹了国民党在政治上的黑暗反动,在抗日上的消极妥协;尝到了失学、失业的痛苦,便在内心深处,对国民党异常憎恨起来。以后,经高崇民先生的介绍,参加了“东北救亡总会”的活动。“九三”胜利后,他们正式和我们党的组织联系上了。按照党的指示,康祥春同志留在敌区,并考上了国民党空军日文翻译。考上以后,按照个人志愿,被分配到驻沈空军十三地区司令部作少尉翻译。这时,白皓同志已经经由武汉,转道北上,进了东北解放区,参加了工作,不久,又参加了党。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康祥春同志到长春和白皓同志接上了头,组织上让他继续留在国民党空军内部工作。以后,康祥春同志被派到空军第一工程队当少尉文书员。不久,白皓同志也从解放区派到了沈阳。

白皓同志到沈阳不久,正值康祥春同志所在的空军工程队招考工程技术员,条件是要大学工程系毕业的。白皓同志对工业一窍不通,根本没有可能在这条出路上打算盘,但是勇敢而机智的白皓同志,却作出了大胆得出人意料的决定,他在康祥春同志的帮助下,竟用日本国最高学府,东京帝国大学工程系毕业的假学历,毅然地报上了名。他临时找了几本工程技术书籍,昼夜

攻读，记会了一些名词术语。又通过陈硕彦的关系，请教了一位东北大学教工程的刘教授。刘教授是和我们站在一起的进步人士，尽心竭力地帮助了白皓同志，指点他怎样画设计图，怎样看图，怎样施工。结果，在康祥春同志暗中相助下，他居然顺利地被采用为少尉工程技术人员。这时国民党正是非常缺乏工程技术人员，临时抱佛脚的时候，再加白皓同志那日本“东京帝大”毕业的金字招牌，竟使国民党空军工程队的胡队长非常器重他，一开始就把设计北陵机场的独立任务交给了他。白皓同志接到任务后，白天在班上拿出图纸来左描右画，却在晚上悄悄地跑到刘教授那里开夜车。刘教授一边替他设计一边讲给他听，设计图画完了，他也学懂了其中的道理。图交上去以后，很快地就被批准采用了。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奇妙的结果，国民党的飞机场还在施工，我们的军事机关已经知道了他在修多大的飞机场，跑道多长、多宽，能够同时起飞多少架飞机、降落多少架飞机、容纳多少架飞机。敌人的飞机场已经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了。接着他又用同样的方法，设计了弹药库、飞机场油库、工事等等。这样，他这个工程技术员的地位就巩固了，而我们也获得了敌人飞机场的一切最可靠的情况。

我听着白皓同志的汇报，心里特别兴奋，我为有这样敢作敢为的同志和我在一起工作而感到幸福。为了完成党所交给的任务，能够不惧危难，做常人所不敢做的事情，这正表现了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的本色，这样的同志，是真正把党的事业看得高于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的人。但是，由于我对同志们的行动所负的重大责任，使我不能不在兴奋中冷静下来，想到事情的另外一方面。我详细地询问了白皓同志在工程队当中的情况以及人事关系。据白皓同志说，到现在为止，队长对他是信任的，周围的人对他是没有怀疑的。我听完后，向他提出了几个问题，并说

出了我自己的意见。我说：

“你在四周都是敌人的时候，能够这样相信自己的力量，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是，有些可能发生的情况，你想到没有？譬如说，敌人忽然有一件极机密的设计任务，不让你回家去找刘教授，把你留在工程队里，甚至把你载到别的地方去设计，那时你怎么办？再譬如说，敌人又派来一个工程技术人员，让你们两个在一起共同设计一个工程，而那个人又是国民党的忠实走狗，这时你怎么应付？”

“我可以找个理由临时请假。”白皓同志胸有成竹地说，“我还可以提出我个人的要求，在他们没有怀疑我以前，总还要听取我的意见。”

“好，就算你应付过去了——要知道，这种应付是很容易引起敌人怀疑的——这时候，忽然有一个从前认识你的人，是你的老同学或者是老朋友，知道你的底细，和工程队的人谈到了你，证明你根本没学过工程，这时怎么办？甚至于很偶然的有一个“东京帝大”毕业的人，否认你的学历，你怎么办？”

“这种情况是不容易发生的。”白皓同志微笑着说。

“但是也难保险它不发生，时间长了，什么情况都可能遇到。而且最主要的是，你现在所负担的工程技术员的职务，不是你力所能及的，你所完成的每一项设计任务，都需要拐很多弯，想许多办法，这其中能一点痕迹不露吗？不定在哪个环节上，稍一引起敌人的怀疑，就可能露出马脚来，那时候敌人就不会放松你，敌人会抓住你这条线追下来，那就可能给工作造成重大的损失。”

白皓同志睁大了眼睛看着我，我知道他已经重视我的意见了，便接下去说道：“你前一段工作，凭着你的机智勇敢，瞒过了敌人，作出了成绩，这是完全应该肯定的。但是，这种蒙哄敌人

的方法却不能长久使用下去,得意不可再往。我建议你冷静考虑一下,最好找个适当的时机退出来,不要再这样干下去了。”

“不这样干了?”白皓同志惊疑地望着我说。

“对,不这样干了。”我肯定地说,“空军工程队那里有康祥春同志一个人就可以了,他是空军司令部派去的,又是从大后方来的,所担负的工作也能胜任,只要他多加注意,敌人对他会始终信任的,他可以拿到我们所需要的东西。至于你……”我直望着白皓同志说,“你今后的任务不是比从前轻了,而是加重了。有些下面工作的同志,我不能直接和他们接头,都要通过你来联系和领导,因此,你也不适宜固定在一个工作岗位上,那样反倒会受到限制。你考虑一下对不对?”

“那我的掩护职业呢?”白皓同志有些困惑地说。

“掩护职业……”我望着他那崭新的空军少尉制服思索着说,“我的意见最好是能够想一个办法,既不去上班,又能保留你现在的职业,军服也最好能留下来。国民党的空军吃得开,能够利用就继续利用它。”

“那就只有试着请长期病假。”白皓同志说。

“请什么病的假呢?”

“我看肺病最合适。”张健同志插言道,“这种病看起来和好人差不多,能走能跳,养好了又需要很长时间,行动也不受约束。”他直望着白皓同志微笑着说,“而且白皓同志长的也瘦,说他有肺病,别人一定相信。”

我望着白皓同志那瘦削的面庞,也不由得笑了,说:“行,再把腰弯一点就更象了……那么就请肺病长假吧。”

白皓同志摸着自己的瘦脸,也愉快地笑了。

问题就这样解决了。接着,他们又汇报了下面工作同志和工作关系的名单和情况。当谈到康祥春同志的时候,我传达了

部长同志的意见：在进一步帮助他以后，可以考虑接受他入党的问题。白皓和张健同志都认为他已经具备了入党条件，可以吸收他参加我们的党。最后决定由我再和他谈一次话。

在工作同志名单当中，我发现有一个叫王昭晨的同志，原籍是安徽怀远人，职业是国民党一个委员会的运输科长，还经营着一个叫“聚成贸易行”的买卖。我听着心里一动，忙问这个同志的外貌如何？

白皓同志说这个人长得很魁梧，身材高大，性情直爽，脸上有几个白麻子，稍微有点近视……

我越听越高兴，忙问他俩几时可以见到这个同志？

张健同志说他的爱人纪群同志就住在他家里，由他掩护，今天晚上就可以见到他。

我忍不住兴奋地说：“那很好，你见到后问问他母亲是不是姓薄？他从前是不是叫过王照永的名字？如果是，你明天告诉我。”

“你怎么认识他的？”张健同志说。

“如果问对了，他就是我表姐的儿子，小时候在我家里住过。后来我在哈尔滨工作的时候，利用过他叔叔的房子，他叔叔是个大坏蛋。”

“对，你说对了！”张健同志忽然高兴地说，“他曾经和我说过，他有一个姓李的表舅，是老共产党员！”

我一愣神说：“他怎么知道的？我们有十多年没见面了。我在哈尔滨做工作的时候是很隐蔽的，他那时候才念中学，怎么会知道呢？”

“他说是前两年听他姨告诉他的。”

我想了想，忽然明白了，我说：“一定是我妹妹告诉他的，我妹妹知道我一些情况。他现在工作得怎么样？”

“很好。”白皓同志说，“很积极，现在他正在开始接近军运指挥所一个名叫李文升的译电员，如果能把这个人争取过来，对我们可大有好处。”

我考虑了一下，问张健同志：“他家里方便不？”

“方便。”张健同志说，“在南京街住，两间房，除爱人外，有一个小孩。”

“好。你先不要说我来了。等对实以后，我想去见一见他。我现在应该尽快地把户口报上，使自己赶快合法化。根据我的工作情况，我想报商人的职业更合适些。现在王昭晨正好开买卖，如果能利用他的买卖，把商人的职业更具体化一下，不是更好吗？”

同志们了解了我的意思，自然没有异议了。

当他们谈完情况以后，我向他们讲了目前的形势和上级对我们的要求。最后，我强调了两个问题：一是要告诉同志们多接近敌人，尤其是敌人中机要部门的人物和上层人物，这样才能更有效地开展我们的工作；一是要绝对遵守地下工作的原则，一点也不能马虎。我说象我们现在这样都住在康祥春同志家里就不合适，哪怕他的住处再保险也不合适。如果我们当中一个人出了问题，就会全部落到敌人手中，那就辜负了党对我们的期望，我们必须争取尽快地分散开，个人有个人的据点，彼此不发生横的关系。只有更好地隐蔽自己，才能有效地打击敌人！

我们的第一次小会开完了。晚上躺在床上，心里止不住地激动，久久不能入睡，一场新的战斗正式开始了！



## 第一个掩护职业

我军在历时五十天的夏季攻势当中,把东北敌人打得丢盔卸甲,狼狈逃窜,共歼灭敌军八万余人,收复县城四十余座,将敌人完全压缩于中长及北宁路之少数据点上。蒋介石在惊怒之下,把杜聿明赶下了司令的宝座,派来了他的参谋总长陈诚,妄想用这个狗头军师,来扭转东北的战局。

一九四七年八月,几乎就在我到沈阳的同时,这个奉了美国主子和蒋介石“圣旨”的陈诚,也来到了沈阳。一下火车,他就夸下弥天海口,说什么“只需六个月即可恢复东北的优势”,“不管困难与代价多大,我们一定要从共军手中收复满洲的一切失地”,他决心要在东北住五年,说“今后‘剿匪’重点无疑即在东北”。这个不自量力的狂妄匹夫,象一头疯狗似的乱吠起来了。

为了更进一步地了解一些情况,通过白皓同志的联系,我和经常接近国民党上层人物的杜鸿儒和陈硕彦见了面,据他们讲:陈诚的确是抱着所谓“恢复优势”的梦想来的,他企图打通中长路,维持北宁路的交通,等待美帝国主义的援助。和一切反动政客一样,他来到东北后,第一手就是树植私人势力,妄想独霸东北江山。首先,他把和他一直有夙仇的杜聿明狠狠地整了一下。他到沈阳时,杜聿明抱病不到机场去接他,他就从机场一直跑到

杜聿明家里查看病情，紧接着就在一切场合，痛加攻击杜聿明的指挥失常，把杜系的将级军官大加裁撤和调动，尽量换上他的亲信。对特务系统，他也大加“整顿”，严厉地批评了军统和中统，打击了军统特务头子文强，尽力扩大三青团的特务活动。把挂着大学校长招牌的亲信冯庸也利用起来搞特务活动。冯庸的家里，每天挤满了人，表面上是他的学生，实际上他们是特务头子和特务爪牙、腿子的关系。他们借着大学校长和大学学生的文明招牌，干着反动透顶的勾当。除此之外，沈阳好多公共场所，如电影院、旅馆、浴池，甚至理发馆都有特务站、点。据说，还准备严格地清查一次户口，企图用白色恐怖来镇压人民对反动统治的反抗。

和杜鸿儒、陈硕彦见面以后，我就派张健同志回康平交通站，一方面汇报情况，一方面联系取电台的事情。

在张健同志走前，我和王昭晟同志见了面。

十三年未见，几乎都不敢相认了。他留在我记忆里的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样子，现在却是将近三十岁的壮年人了。他拉住我的手，亲热地管我叫舅舅，兴奋得脸发红说：“你不知道，我是多么想念你。自从听我姨说你是革命者以后，就总也忘不了你，我真后悔，在哈尔滨的时候怎么不知道你是革命者。”

“在哈尔滨的时候你还很年轻呢，……就是年纪大也不会让你知道的。”

“可是那时候我已经知道了一些革命道理。”他急着说：“你还记得给我补习国文的李世超老师吧？”

“是我介绍去的，怎会不知道呢。他每天教你那两小时课，也是为了掩护自己。”

“可是他在讲课的时候就暗暗地给我讲了一些革命道理。后来他走了，又给我介绍来一位老师，也给我讲。从那时起，我

就向往着革命,对我叔叔也越来越憎恨了。”

“你叔叔现在在哪里?”

“不清楚,我们早就断绝叔侄关系了。”

“对,应该划清界限!”我拉着他的手坐下说,“听说你到关里去闯荡过一回?”

“是,去受过一次实际教育。”他紧蹙起双眉说,“去时还有一点幻想,谁知越往大后方走越黑暗,真象往地狱里走一样。一切最无耻的事,国民党都能厚着脸皮干出来。中国封建社会里一切坏东西都换汤不换药地被他们接受过去了。就在我最憎恨他们的时候,遇见了白皓同志,他们给我不少帮助,使我决心跟着共产党走,革命到底!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我就非常地想念你。”

“我完全理解。”我点点头说,“论关系,你和王杲初是叔侄,比我近,但是因为他反人民,所以你和他割断了联系。而我和你呢,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同志。同志,这是世界上最亲密的关系,所以你怀念我,是很自然的革命感情。”

“你说的太对了!”王昭晟兴奋地说,“以后你经常帮助我吧。我们能经常的见面吗?”

“不一定。”

“你住在哪里?我能去找你吗?”

“现在还没有一定的住处,也没有一定的职业。”我稍停了一下说,“听说你开了一个‘聚成贸易行’,是真的吗?”

“是真的。不过不是我个人开的。”他脸微红了一下说,“我也正想和你谈谈,这个贸易行是怎么搞起来的呢。”他稍停了一下说,“以前是因为国民党地区物价飞涨,每月赚几个靠不住的薪水钱根本维持不了生活,所有国民党大小官僚都靠发外财过日子。但是贪赃枉法的事我不能干,敲诈勒索又是我所憎

恨的。这时就有几个朋友张罗集股开个贸易行，货物是一手来一手去，需要本钱不多，我就参加了。这在国民党机关里本来是最普通的事，它比贪赃敲诈总要体面些。后来，接近革命了，多知道了一些革命道理，才明白自己做错了，作为一个革命者，这是可耻的行为。所以我就和白皓同志表示要退出来，宁肯自己生活苦些，也不干这发展资本主义的勾当。但是白皓同志说能从思想上认识就可以了，暂时不但要做下去，而且还要利用它。第一利用它多接触一些人，多得到些情况；第二利用它作掩护，使自己更合乎国民党的潮流。这样，我就没退，但是心里总感到别扭，不如退了干净。”

“不要退，白皓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我们在敌区工作，必须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条件来进行巧妙的活动，要学会斗争的艺术。有些条件，从现象上看起来的确是不符合一个革命者的思想要求，但是不要怕，只要我们是為了更有效地打击敌人，加速革命的进程，那我们就可以大胆地去做。所以我不但不同意你退出来，而且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也想参加进去呢。”

“怎么？你……”王昭晟同志先睁大了眼睛直望着我，但随即又笑起来说，“是不是也想以这个作掩护呢？”

“正是这样。”我点点头说，“你看有可能吗？”

“有。”王昭晟同志满有把握地说，“不成问题。”

“需要参加股份吗？”

“不需要，挂个名就可以。”

“这样最好。挂什么名呢？最好是不牵挂什么具体事务的。”

“挂个‘监理’名义你看怎样？”

“可以。”我想了想说，“但是必须让那里所有的人都承认，有人问到的时候不加思索地就点头答应。”

“能办到，他们都还尊重我的意见。”

“不，光靠情面上的尊重不行。必须想办法让他们从心里愿意承认，那才可靠。”

“那好办。”王昭晟同志胸有成竹地说，“我就说我有一个舅舅，是个大商人，和国民党好多上层人物有交往，如果请他做我们买卖上的‘监理’，就可以打开更大的局面。这样一说，又不要买卖上什么报酬，他们自然会用请帖来请你，如果可能的话，你再出面见见他们，就万无一失了。”

“好吧。”我满意地点点头，“你多咱进行？”

“马上就办。”

“好。记住：我的名字叫王益，是齐齐哈尔人。其他的你就看需要编吧，象过去做过什么差事啦……”

“办妥后怎么通知你？”

“我会让人来问你。”我拿起帽子，握住他的手说，“好吧，望你努力为党工作。”

王昭晟同志紧拉住我手说：“我们以后能常见面吗？”

“看需要吧。”我见他那依依不舍的样子，就郑重地说，“我们所处的环境和工作性质使我们不一定能常见面，有些事情我也不一定直接来找你，我们必须克制个人的感情，把对党和对同志百倍的爱藏在心里，化为力量，去对付敌人！等到把敌人彻底打倒了，我们就可以每天在党的直接教育下工作和学习了。如果我们在一个城市工作，就可以天天见面，互相帮助；如果我们两地分开，也可以经常通信，彼此鼓励。只要天下回到人民手中，我们就是完全自由的！你说对不？”

王昭晟同志激动地点着头，更加用力地握了握我的手，好象是在说：我一定努力地为党工作，使胜利的那一天早日到来！

由于王昭晟同志的积极奔走，我很快地就取得了“聚成贸易

行”监理的身分。紧接着,就由康祥春同志出面,找妥了一个国民党军法处姓戴的上校法官,和康祥春同志共同为我担保,“全家”报上了户口,起到了居住证明。于是我就成为国民党统治区的“合法居民”了。为了应付局面,我印了一盒片子,上写:“聚成贸易行监理王益”。

## 康祥春的理想实现了

陈诚来东北后扩充特务组织的白色恐怖政策，在白皓、康祥春所在的空军系统里也很快地表现出来了。一个新成立的特殊组织“政工处”的牌子挂了出来，在“政工处”里面还有一个秘密的不挂牌子的组织，叫“反情报科”，专门在空军人员里从事特务活动。除此以外，人事科里也增添了几个不三不四的家伙。这些敌情的出现，促使白皓同志迅速地执行了原来的计划：把自己装扮成肺病患者的模样，递了请长期病假的假条。敌空军工程队的胡队长，一直很看重白皓同志的“设计才能”，接到假条后深为惋惜，特别把白皓同志找到队长办公室去，表示关切地说：

“白技术员，你的病很重吗？”

“报告队长，好多天以来我就是勉强支持着上班。”白皓同志佝偻着身子说，“最近更是打不起精神来，一到午后就觉得四肢无力，晚上躺在床上咳嗽得睡不着觉，勉强睡着了就出盗汗。”

“从前就有过这样病吗？”

“在日本‘东京帝大’读书时得的，那时候功课追的紧，书太深，就累出肺病来了。从那以后，我就严格控制自己，不敢太累，也从来没犯过。但是，自从到队上以后，我就没法控制自己了……”

“我知道。”胡队长点点头说，“你的辛苦，我心里都有数。”

“为了报效队长的栽培，这是应该的。”

“唉！我本来想提拔你一下，谁知道这样不凑巧，你又生病了！”

“只要白皓的病能好，一定再来报效队长……”白皓说到这里，一阵剧烈的咳嗽，手捂住胸口，说不下去了。

“你不要再说了。我相信你对党国的忠诚。希望你好好养病。”他看了看手中的假条说，“你的病假，我批准了。队里给你长期保留军籍，你好好养病，几时病好，几时回来。”

“谢谢队长的关照。”

白皓同志的假顺利地请妥了。从此，他就以国民党空军少尉技术员为掩护，专心一意地和我在一起工作。

白皓同志退出空军系统以后，对空军的知彼工作，主要就靠康祥春同志。就在当天晚上，屋里只剩下康祥春同志和我两个人的时候，我悄悄地和他说：

“祥春同志，老白退出空军，你肩膀上的担子更重了。”

“我知道。”康祥春同志紧坐在我身旁说，“请组织放心吧，我一定想尽办法拿到有价值的材料。”

“是呀，要多想办法。”我从窗帘的空隙里，望着空中的星光说，“空军，总是配合陆军作战的，知道了敌人的空军活动情况，就可以预测出它的陆军部署，所以这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能够多得到一份有价值的材料，就等于多打一个胜仗。”

“是的，我也常常这样想。空军是国民党的命根子，输送军队、给养用它，打仗用它，逃跑用它。它给我们解放区的和平居民所造成的危害也最大，而疯狂的敌人却以滥炸和平居民为



乐趣，一想到这些，我就恨不得能把他们一下子都消灭掉了，让天上飞的都是我们的飞机！”

“这样的日子也不会远了，问题就在于我们的努力。”我用手拉严窗帘的缝隙，更靠近康祥春同志说，“现在你的工作重点一方面是要尽量取得胡队长的信任；一方面就是抓紧你发展的工作同志，多帮助他们，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

“我一定努力去做。”

“司令部人事处打字员乔俊芳最近表现怎样？”

“很好。”康祥春同志点点头说，“她的弟弟在咱们的东北大学学习，她在四六年初就和我有了工作关系，拿出过一些重要的人事材料，经过考验。”

“她在其他机要部门里有没有熟识的打字员？”

“司令部‘作战指挥室’里有一个打字员和她很谈得来。”

“‘作战指挥室’！好，好地方！”我兴奋地说，“怎么样，有意识地进行工作没有？”

“乔俊芳正在努力接近她，据她说有希望。”

“要抓紧，还要稳妥。要象打铁一样，火要紧烧，但是必须看准火候。”

“我再和她谈一次。”

“要细致地谈谈，这是一件很有价值的工作。另外，你自己就要多在胡队长身上下功夫，你是工程队的文书员，实际就是秘书，秘书当好了，就可以掌握到机密的材料。”

“现在最机密的材料还是在他自己手里。”

“要取得他的信任，让他全部交给你。”

“我正在努力，因为我是从司令部派去的，和司令部里有些人始终保持着联系，所以他也很看重我。”

“对，司令部是空军的心脏，也要多下功夫。最好能抓住他

一两个高级一点的军事人员。”

“有一个钱国勋很信任我，他是司令部补给处处长。”

“什么军衔？”

“中校。相当于国民党正规陆军的少将。”

“具体情况怎么样？”

“安徽桐城人，在黄埔军校毕业以后又在‘航校’受过训，当过较长时间的空军教官，是国民党空军里的老资格。”

“爱好什么？”

“爱钱，常用飞机捣动买卖。也爱玩女人，现在跟他在一起的是三姨太太，对他看得很严。”

“你和他是怎么接近的？”

“一九四六年初在锦州的时候在他下面做过事，还给他接回家，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有意识地接近他，一直没有放松过。”

“好。抓紧进行吧。”我考虑一下说，“将来时机成熟的时候，你可以把我介绍给他。”

“把你介绍给他？”康祥春同志有些感到意外地说。

“是的。他爱钱，常捣动买卖，而我是‘商人’，帮他作两回买卖，再有你的关系，就可以成为‘朋友’。要知道，你和他终是上下级的关系，有一层限制。可是‘朋友’就可以无话不说了，咱们两面夹攻，相辅相成，就可能多得到些东西。”

“好。”康祥春同志高兴地说，“这个办法好。”

“可是不要性急，你先抓紧他，将来看需要和可能，再进一步研究。”

“对，以后我随时向你汇报情况。”

“以后我们恐怕不能经常在一起了。”康祥春同志听我这样说，便睁大了眼睛困惑地望着我。我知道他还不清楚我们准备分散据点，便乘这个机会向他解释了一下分散的必要性，最后告诉

他现在白皓和王昭晟正在给我找房子，争取快些搬出去。他听完后颇为惋惜地说：

“你说的当然是正确的。过去我们对地下工作的原则注意不够，总以为我这里很保险，没问题，这正说明我是很麻痹的。所以我现在完全服从组织的决定，不再留你们住在这里。可是……”他望了望我，低沉地说，“可是在感情上我是不愿意你们搬出去的。过去白皓同志曾经对我进行过长期的耐心的帮助，现在你来了，住在这里，我希望能得到更多的帮助，使我快些进步，能够早一天成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我明白你的意思。”

“几年来我一直追求着……”

“白皓同志已经和我详细谈过。”

“只恨我自己进步不快，到现在……”

“如果经过对敌斗争的严峻考验，了解你的同志认为你已经具备了入党条件呢？”

康祥春同志激动地站起来，直睁着眼睛望着我。我用力握住他的手说：“康祥春同志，愿你永远忠实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在我没搬走以前，我再给你讲一讲党章，你再谈谈自己的认识，好不？”

康祥春同志紧紧地和我靠在一起，用力地点着头。

几天后，就在我搬走的前两天，康祥春同志宣誓入党了，他眼里含着兴奋的泪水说：

“党员的称号，重于我的生命，从今以后，我的一切都是属于党的。”

康祥春同志的理想实现了！同志们都勉励他永远进步，永远做个好党员！

## 伪 满 余 孽

在我强大的夏季攻势以后，敌人已经完全被压缩在中长路及北宁路的少数据点上。陈诚“恢复优势”的狂妄叫器，已经成了吹不响的破喇叭。无论蒋介石的“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或者杜鲁门特使魏德迈的飞落沈阳，都不能使这匹困兽擅越雷池一步。“重点进攻”一下子就变成了“重点防御”。一些被打得丢盔卸甲的蒋家“将军”，失去地盘的“党国要人”，以及血债累累的汉奸、地主们，都象漏网鱼一样溜入了沈阳城。所有公寓、旅馆、小店、妓院里都挤进了各式各样的丧家犬。这些地方挤满了，就挤民用住宅，沈阳城发生了空前的房荒。人们世代相传的租用房屋的习惯已经无人沿用，想要住上一间房子，都得拿黄金去兑换，金条和元宝代替了法币和流通券，国民党滥发的票子在兑换房屋上早已失去效用。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想要用很少的代价，找到一处合适的房子，实现分散居住的计划，也真是不容易呢！多亏白皓同志，各处奔走，通过一个赵家马车炉赵经理的社会关系，花二两黄金，兑了两间小房。邻近的人，都说太便宜，我们却觉心疼，代价太高了。

新房子，在北市场工业区广场附近。前边是个皮铺，邻居多

数是小商小贩。杂人多，环境乱，不够理想。要把不理想变成理想，必须熟悉环境，适应环境，进而利用环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利用每天早晚买菜的机会，尽可能多在前后左右转一转，看一看，听一听。谁知这一转，却转出事情来……

一天，太阳刚冒红，狭窄的街道上还是人稀车少，许多老式店铺的木头闸板还紧紧关闭着，蜷缩在廊檐下的乞丐还在瞌睡，间或有一、二名败残的伤兵醉卧在他们当中。

我这时正站在一个地豆摊前边观看市面萧条的情景，忽觉有个人站在我身旁了，不言不语，越靠越近，这是什么人？要干什么？我微微一侧脸，只见一张满脸胡茬的黑黄面孔，正睁着一双呆滞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我。我的心猛一跳，血往上涌，记忆一下子就飞回到几年前去：在吉林牛马行的伪满派出所里，穿着“虎皮”，挟着洋刀，横行一时的警尉所长王明瑞，从什么地方又钻出来了！伪满，我在吉林以开买卖作掩护的时候，在他管下住过，为了巩固环境，站稳脚跟，曾和他称兄道弟地交往过，应酬过。他现在在干什么？狗不能变成人，狼永远是最阴毒的动物。我在吉林公开过身分，现在……现在他显然认定我了，他已经张开嘴了……

“大哥，还认识我不？”他龇着黄牙，表示亲近地说。

“面熟，可是……”我盯着他，摇摇头说，“一时认不清了……”

“我姓王……”

“啊，明瑞，是你！”我象猛兽似地说，“你把胡子刮一刮嘛。”

“顾不上了。”他那呆滞的眼睛灵活起来了，狡猾地眨动着说，“落魄了！”

我又试探地问道，“还有谁在这里？”

“有李雪年<sup>(注)</sup>，还有葛明福。”说到葛明福的时候，他语气特别加重了，并且直盯盯地看着我。

我心里一紧，但尽量不动声色地笑了笑说：“啊，老熟人。”

“是啊，葛明福当我没少叨念过你。”他又狡猾地眨眨眼睛。

“谢谢他还没忘了我。”我淡然一笑说，“怎么样，过得不错吧？”

“混的不好。”狡猾的笑容仍没从他脸上滑走，“你呢？真想不到在这里遇上了。”

“这叫无巧不成书。”

“自己来的吗？”

“全家都来了。在这安家落户了。”

“那好极了！”他走近一步说，“我得去看望大嫂。”

“今天太匆促，家里有客人，明天我找你。”

他眼睛转了转，稍稍迟疑一下说：“好吧。”

“你住在哪里？”

“我……”他又思索了一下，“这样吧，你明天午后三点钟到工业区电影院找我。”

“工业区电影院……”我嘴上重复着，心里不由一动，我已经掌握了一些敌情，这个电影院，正是特务点。真象已经明白，必须快点摆脱掉他，我点点头说，“这地方好找，你在影院哪里等我？”

“你找关经理就找到我了。”

“关经理？”

“对，不是外人，都是朋友。我给你写个条，把条子给他他就

---

(注) 李雪年为伪满警正，相当于县城伪警务局长。

明白了。”

他掏出一个破本子，撕下一张纸来，迅速地写好字条交给我，我瞥了一眼，只寥寥的几个字，让多“招待我”。我把条子顺手放在兜里说：

“好，明天三点一定到。”

“不见不散。”

点点头，他转身走了。我站在那里看着他，没出十步，他就鬼祟地回过头来张望。这个举动，早在我预料中，没等他视线落到我身上，我就向前紧走了几步，举起手来向他喊道：

“喂，明天午后三点你一定等我，别让我扑空……”

他先是愣了一下，紧接着“啊啊”两声，勉强地挤出一脸干笑，忙乱地点着头，转回头又向前走去。

我稍微想了想，就仍回到菜床子前边，买了一点地豆——虽然地豆价钱昂贵，来时我还不想买，但现在却必须买了，而且要好好挑选，就象所有的买菜人一样。我把地豆装在筐里，付过钱，便悠然地向和他相反的路上走去。

③ 走在一个胡同口上，我毫不犹疑地拐进去了。胡同中间，有一个大门，门上钉了许多写着人名的小木牌，是个大杂院。大门闭着，旁边有个小门，我估计身后的“尾巴”，已经甩进胡同，可以看清我的行踪了，便从容地跨进门去，随手关严门。院里有好几排房子，我绕过第一排房子，随意走进一家屋门，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正在淘米做饭，我客气地点点头说：

“麻烦您一下，打听件事情。”

女人打量着我说：“打听啥事？”

“这院有没有出兑房子的？”

“哎哟！”女人爽朗地笑了，显然她对这件事情很感兴趣，“你早来一天好了，前天还搬进来一家，两间房子，四个宝，便宜

透了，还带不少家具呢！”

“什么家具？”

“写字台、穿衣镜……”

女人不厌其烦地扳着指头数起来。好说的女人到处有，能和这位媲美的却不多。我顺着她的兴趣唠下去。锅里水已经翻开，米在水里泡着，她还在和我交谈。太阳从窗上斜照进来，时光不早了。我估计那个自作聪明的跟踪者已经认准了我的“居家住处”，牢记了门牌号码，心安理得地离去了。便向这位好心的女人客气了几句，并请她以后多替我留心兑房子的事情，就告辞出来了。

我迅速走出门外，借着回身关门的机会，左右望了望：胡同里冷冷清清，没有“跟踪者”，也没有行迹可疑的人。我仍向相反的方向走，出了胡同口，略微地观察了一下，便坐上一辆三轮，绕路回家。

路上，脑子仍然紧张地活动着，把方才发生的事情又分析了一下：从他那落魄的样子上看，大概还没在敌人面前赚到什么，要我去工业区电影院找关经理，可能是要拿我作“晋见”的阶梯。跳墙的狗是和饿狼一样凶狠，他正在我身上打着最卑鄙的算盘。而且不止他一个人，葛明福、李雪年……这些牙齿里浸透人民血迹的特务、汉奸——蒋敌伪合流的骨干，都是和革命势不两立的凶恶的阶级敌人。在伪满，葛明福曾向我伸过无数次毒爪，今天，知道我在这里，这个嗜血者将重磨毒爪，四处搜摸。处境复杂化了，更要加倍地警惕，努力地工作，让这些阴魂，早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 功 亏 一 篑

蒋介石是靠警察、宪兵、特务维持白色恐怖统治的。特务组织从梢到根，象无数根大大小小的吸血管一样通连到蒋管区的每个角落里。伪满余孽王明瑞通连着特务点——工业区电影院，点连着站，站再向上连，一直连到特务老巢；然后再分开连下去，连到各个吸血管的末梢，特务机器便在又一个新的情况下开动起来。正因这样，我和王明瑞的遭遇，就不只是对付几个伪满余孽的问题了。要把警惕扩大到更广的范围。不认识这一点，工作就可能受到损失。但眼前最应注意的地区，还是北市场一带。怎样注意呢？更加深居简出？和工作同志暂时割断联系？甚至躲在家里暂时不出去？……这都不可能。警惕和畏缩、细心和怯懦，有时表现形式虽然近似，但实质却相差万里。警惕是为了更好地工作，怯懦是因为要保全自己；警惕是要多研究策略，更巧妙地打击敌人，怯懦是踟躇不前，因噎废食。

我们分析了目前的情况，决定我暂时离开北市场住处，再到康祥春同志那里去，继续工作。

就在这时，交通员张健同志从康平交通站回来了，带来了一个好信息：我们来时放在康平的电台，可以派人去取。已经约定：三天后，由交通站派一班战士，把电台护送到敌我拉锯区的

铁岭双树子，交给我们派去的同志设法带回来。

我们盼电台，就象哑巴盼说话，聋子盼听声一样。靠交通员来回联系，是“手工业”的方法。有了电台，就可以千里信息一刹传，上级指示，也就倚马可待了。有两次，我们甚至企图由交通员直接拿回来，但因没经过比较周密的布置，携带又不方便，所以没能实现。这部电台，是从美蒋特务手中缴获过来的。在美造军用电台里也是上品，性能很好。它本身也并不大，只占两个饭盒子的地方。麻烦的是外配了一个颇为沉重的变压器，就不好携带了。

经我们研究后，决定由白皓同志去取。利用他空军军官的身分，再由康祥春同志在工程队开一张护照，加上白皓同志的机智勇敢，如果不遇特殊情况，大致不会出什么差错。

白皓同志穿起崭新的军装，提着一个大皮包，揣着特别任务的军事护照，精神抖擞地出发了。

盼了两天，白皓同志风尘仆仆地回来了。我兴奋地拉住他的手，准备了足够的力量去接提包，谁知却轻飘飘地，就象把涂着黑色的木棒误当铁棍一样，忽悠地提起老高。我一愣，直盯着地看着他。白皓同志长吁了一口气说：

“扑空了！”

“没见到人？”

“没有。”

“也没找到东西？”

“没有。”

“完全按照指定地点？”

“铁岭双树子。”

“村外树林里？”

“一点没差。”

“时间？”

“准时到的。等人人不见，所有能藏东西的地方都找遍了，一点痕迹也没有。”

我们相对沉默着。怎么回事？有了什么意外的情况？出了什么差错？必须尽快地打破这个疑团。我们决定立即派交通员，驰赴康平，弄清情况。

交通员很快地回来了，带回下面的情况：交通站完全按预定计划，派联络员带了一班战士，往指定地点送电台。电台分由两名战士携带：变压器分量重，由老战士背在身上；主件比较轻，由新战士拿着。走在中途，遭到敌新六军的突然袭击，敌兵数倍于我，战斗很激烈。我们在奋勇冲杀之后，打死了一些敌人，便不得不退回来。就在这时，那个拿电台的新战士负了重伤，在他挣扎着从阵地上爬出来的时候，电台丢失了！……

就象俗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久已龟缩回去的蒋匪兵会忽然探出头来，造成了这次颇为偶然的遭遇。不然的话，白皓同志会把电台取回来的，这真是“功亏一篑”了。电台没有取回来，和上级的联系还得靠交通员。我们决定立刻和交通站联系，增加力量，添派精明强干的交通员，在没有电台的情况下，使交通工作，尽可能做到及时、准确。

## 在龟蛇遍地的地方

康祥春同志入党以后，工作更加努力。用他自己的话说：共产党员的称号在脑子里生了根。每时每刻都意识到自己是个党员了。它使自己在疲倦的时候焕发出精力；在困难的时候生长出信心；在周围都是敌人的时候，能够无畏镇静。他的工作进展得很快，在工程队里，已经进一步取得了队长的信任，印鉴已经掌握在手里，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让它为我们服务——白皓同志去取电台的护照就是这样拿出来的。某些秘件也可以代拆了；其他工作也还顺利。只是对空军司令部第四处处长钱国勋的工作效果不显著，从他口中得不到更多的材料，这使他很着急。在我又搬到他住处以后，我问他是什么原因？他说：

“他在我面前总放不下官架子。”

“当官的嘛。”我说，“国民党的官有几个没架子的，没架子就不成官僚了。”

“可是他在女人面前，在富商大亨面前，在他三姨太太面前就没官架子。有时候好象骨头都没了。”康祥春同志愤愤地说。

我忍不住笑，说：“说得对，这正是他的本性。”

“是兽性！”他加重语气说，“他的三姨太太都怕他兽性发作，乱搞女人，象看贼一样看着他。”

“那能看得住吗？”

“他怕这只母老虎。”

“不一定怕吧，《玩偶之家》里的玩偶娜拉，从表面上看起来也象说了算呢。”

“这和‘玩偶’不完全一样。三姨太太能钻营，能大把地弄钱，钱国勋也就爱钱，和他的姓一样。”

“三姨太太能钻营、弄钱……”我把注意力集中了一下，说：“她用什么办法弄钱？”

“什么办法都有。最近还和我说，要我帮她搞投机买卖呢。”

“你怎么答复她的？”我心里一动，忙问。

“我说等我找一找门路，等等机会。”

“好个找门路，等机会！你答复得好，这个‘机会’让我们等上了。”

“等上了……”康祥春同志困惑地重复着。

“是呀，利用这个机会给她做买卖。”

“过去我也给她做过。”

“这次不是你给她做，是我。”

“你？……”康祥春同志直望着我说。

“对。你不是答应给她找门路吗？我就从这个‘门路’进去。”

“可是你现在的处境……”他犹豫地说，“不容许你多出头露面哪。”

“必要的时候就应该出头。”

“那太冒险吧？”

“不能因噎废食。”我肯定地说，“钱国勋这个对象很重要，我们一定要多下功夫。你过去的工作很有价值，他们对你的信任，对我就是最有利的条件。你和他在一起，你是下级，官级和

年岁，相差都很远，就不易谈得多。你和他的关系也是利用关系——就象所有资产阶级里人和人的关系一样。他信任你，是要你多为他干事；从他的资产阶级观点出发，他认为你那样‘勤快’，还不是希望借他的力量得到提拔？他不可能得出别的结论，你说是不？”

“正是这样。”康祥春同志点点头说，“他已经当我表示过好几次了。”

“对，他有了这张王牌，就可以对你摆架子。可是我呢，情形就不同了。我不是他的下级，我给了他好处以后，他没法和我‘互利’，为了再得好处，他就只好主动靠近我，和我交朋友。有对你的信任，有我给他的好处，这朋友很快就可以做成，成了朋友，就不愁达不到目的……”

“但是你的安全……”

“不要担心，我们见机行事。最好我们明天上午就进行。”

“到他家里去？”

“对，先从他家里开始，打好底子，不愁狐狸不上套。今天就找王昭晨同志，摸清市场情况，看什么东西最赚钱，什么东西拿在我们手里最容易抛出去。”

“好吧，我就进行。”

谈话结束了，我的思路却没有停住，我在想着明天……

同泽街南九马路，住的大多是国民党的军官和政客。军用吉普车，妖冶的女人，大盖的军帽，耀眼的皮靴，不时在这个街头上晃动，钱国勋就住在这龟蛇遍地的地方。

康祥春同志领我停在一座独门独院的典型日本住宅前面。他轻轻地对我说：“这就是。”

我望着写有“钱寓”的门牌向他点点头说：“叫门。”

随着门声，走出来一个中年女佣人，对着康祥春同志殷勤地笑说：

“康秘书来啦！快请里边坐吧。”

我们进到屋里，还没站定，就从对面房间里传出来一个女人声音：

“谁呀？”

“是我。”康祥春轻快地向前走了两步，同时迅速地瞥视了我一下。我会意地微微点点头，面对里屋的门帘，静静地站在那里。

“噢，是康秘书哇。”门帘一动，走出一个年将三十的女人来。一件绒衣罩在紧裹住腰身的旗袍外面，一束髻发盖住前额，白脸上突出一张红嘴。

还没等她张口，康祥春就敏捷地把手向我这边一指说：

“钱太太，让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表哥，‘聚成贸易行’监理——”

“王益，打扰您了。”我接过康祥春的话说。

“哪里，哪里。”她把握在胸前的双手迅速地向左右一分，说。

一阵虚伪的礼让过去后，都坐下了。

“我当表哥经常介绍您和处长。”康祥春对她说。

“祥春说您和处长经常关照他，钱太太为人更是热情、爽快。我今天一来看望钱太太，二来感谢对祥春的关照。如果钱太太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愿尽微薄的力量。”

“哎哟，初次见面怎好麻烦您哪。”她用食指把鬓边的髻发向后一挑，斜睨着康祥春说：“王先生的贵宝号是……”

“‘聚成贸易行’的监理。”康祥春说。

“是喽！我方才没听清。”她故露歉容地笑着说，“王先生的

原籍……”

“在北边，后到这里的。”

“表哥从前也是做事的。”康祥春说，“后来才经营商业。”

“对喽！我看王先生也不象一般商人。”她精明外露地说，“是哪一界？政界？学界？……”

“宦海浮沉，哪一界都做过。可是这都是过眼烟云的事了！”我作出看破世情的豁达态度，高声笑了笑说，“现在做起商业来，是买卖人了，过去的事就不提了。”

“哎哟，商业是好行业嘛！谁的生活能离开商业。我就喜欢交商界的朋友，国勋也是这样。买卖做好了，有了钱，什么事不好办？王先生将来想做事也是现成的。”

“曾经沧海难为水，不想再做事了。”我感慨系之地说，“一做上事就是‘官身不由己’，赚的又是有数的钱，不如做个自由自在的商人好。”

“您说得真对！商业做好了，一本万利，要什么有什么。”

“我倒不完全是为自己发财致富。做商业开始也不十分内行，都是朋友们信得过我，拿钱出来，集资开个贸易行，我也怕事太多绑住身子，另外又请了个熟手做经理，大笔营业我管一管，小事他们就代办了。货物多半是一手来一手去，全凭信用。在营业上朋友帮我，我帮朋友，有朋友找到我，总是尽力而为的。”

“表哥是热心肠的人，办事向来钉是钉，铆是铆，所以我才和表哥一同来见钱太太。”康祥春同志把话引到正题上说，“钱太太上次和我讲的意思我已经和表哥说过了，他极愿意出力。”

“哎哟，我真不好意思麻烦王先生。”她故作羞涩地，用一只手掩住半边嘴说，“说起来不怕王先生见笑，靠国勋赚的有数几个钱撑持着门面也不容易，物价又是这样飞快上涨，所以我就想帮一帮他，可是我人又笨，不象人家做太太的能钻营……”



说话间我从西装小兜抽出一支钢笔，递到她面前。

她接过去看看我，疑问地说：“五十一派克？”

“这东西体积小，价值高，利钱大，携带方便，做起来不招风。”

“噢，您想得真周到，太好了！”她两手握住钢笔，眉飞色舞地称赞着。“可是市面上……好出手吗？”

“不用您操心，只要进来货，一切交给我。”

“进货好办，您看进多少合适？”她又高兴地说，“飞机常跑广州、上海，带货极方便。”

“十打二十打都可以。”我故意停顿一下说，“如果您需要资金……”

“不需要哇。”没等我说完她就紧摇起头来，摇得鬓边的髻发来回直晃动，就象名种髻毛狗撒欢那样，“现在他们‘天上的’都发财了，哪一趟不带些美国货回来：玻璃雨衣、玻璃袜子、玻璃皮带、玻璃钱包……哪个人不是成箱成包地带。苦就苦了国勋这样的‘地下的’，想飞飞不出去，只能看着人家宝呀条呀的往兜里揣。”她象无限委屈似地说，“他们都发财了！让他们先给垫上个十打二十打的笔钱，他们谁好意思摇头哇。”

“那样也好。”我干脆地说，“货一到手，您就通知祥春，由他转告我，多少本钱，我马上差人送来。等货物出手，赔了算我的，您不用再拿钱；赚了再把利钱全部给您送来，我完全白尽义务。”

“哎哟！怎好那样！”她几乎从沙发上站起来。一刹间，把那些可能是照着镜子，朝夕苦练出来的造作姿态都忘了。她睁起圆圆的眼睛直望着我，几乎是真情流露地说，“怎好那样！……从来做买卖都有赔有赚……从来都有提成的规矩……您这样……”

“那是一般商人的规矩，至于我……”我含蓄地笑了笑说，

“为朋友办事，一向是这样。这件事是开始，越往后您越会了解我。”

“不，我现在已经了解您了。您爽快、慷慨！回头我告诉国勋，他一定乐意交您这样朋友。”

要谈的话已经谈完，预期的效果已经达到，我看了一下表说：“时间不早了，您休息吧。”

“不，不……”她机灵地张开两只手说，“您不能走，一定在这里吃午饭……来人哪！”她气派十足地向后面叫了一声，还没等人露面，就喊着说，“去叫酒菜……”

“谢谢您。”我站起来说，“今天我还有事情，不能再耽搁了。”

“不要客气，今天一定不让您走，去南菜馆叫南菜，您尝尝。”

“钱太太。”康祥春机警地说，“表哥今天午间的确有约会，有朋友请他吃便饭，请帖我都见了。”

“真的吗？”她故作失望地说，“真是太不巧了！”

“以后再搅扰您吧。”

我们告辞走出来，她送我们到门外，在我们后面挥着手，喊着再见，一块小手绢，迎风直摆。……

大街上刮着西北风，有些冷，但却使人感到无限清爽，就象从嘈杂的人群里才挤出来一样。望望身旁的康祥春同志，他长呼了一口气，轻松地笑了。

我们沿着马路向前走去，一辆军用吉普风驰电掣地迎面飞来，快得象要腾空而起，我和康祥春同志忙躲向路旁，避开车轮搅起的飞尘。靠近我们身后，是一所和“钱宅”差不多的小洋房。这时，房门忽然开了，从门缝里挤出一个鬓发蓬松，浓妆艳抹的穿西式大衣的女人来。紧随着，又从门缝里探出一张蓄着小黑胡子的黄脸来。女人回身，双手按在双膝上，腿微屈着，向黄脸

深深地鞠了一躬。黄脸男人溜见有人，马上把头缩了回去。门关上了，厚厚的帷幕遮住了小房子的门窗，阳光被遮在外面。

那个女人走在我们前面，腿仍微屈着，脚贴在地面上，迈着急步，头也不回地向前走。望着她的背影，联想着她那奇特的行礼姿态，我的感觉——非常迅速地——被引回到伪满去：那时在吉林、哈尔滨的街道上，梳着高高的发髻，抹着厚厚的胭脂，穿着花花绿绿的宽袖圆领衣服，拖着木屐，得意洋洋地走在街道上的，不正是这样女人吗！

我不由回头望了望那些颇为相似的小洋房，在这些小洋房的深处，在那厚厚的帷幕后面，都在发生些什么事情呢？……

## 称心如意的办法

敌人在我秋季攻势的沉重打击下，各方面都处在惊慌、混乱的状态中。尤其是经济生活的败坏，达到一个从没听说过的程度：物价一日数涨，前些时候用一元钱能买进来的东西，现在就要在后面多添一个零数了。国民党银行的印刷机日夜不停地飞转着，票面额一天比一天增大。但是，物价却紧紧咬住印刷机的尾巴，就象猫咬住耗子一样。票子印得越多越没人要，黄金代替纸币直接用在各种交易上。不可能持有黄金的穷苦市民被挤到冻饿的绝境上去。忍无可忍的人民，盼望着早一天能得到解放。

军事上的溃败，经济生活上的混乱，人民越来越强烈的反抗，使陈诚和他的喽罗们坐卧不能安席了。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们只剩下了一件法西斯分子祖传的法宝——警察、特务的白色恐怖。敌人妄想用血腥的杀戮来维持趋于毁灭的反动统治。根据可靠情报：敌人准备在一九四七年年末以前进行一次大搜捕。

这时我已经又回到北市区的住处，但因环境不巩固，和同志们联系不方便，极想另找一个地方。白皓同志打听到一个姓秦的国民党少将，想出兑一所房子，地点僻静，房间适用。但是出口就要黄金三十两，简直是一种讹诈行为，对我们只能当新闻听听而已。但这却也提出一个实际问题：想兑房子，必需黄金，而

且要比我才来的时候贵出几倍。象我现在的住房——二两黄金的兑价,已经成为历史上的数字。另外,工作方面的必要经费,以及油米烧柴等生活中的必需开支,都是有增无减,现实情况迫使我们必须增加活动经费。

正在这时,杜鸿儒和陈硕彦两位同志通过工作关系送信给我,要和我见面,有重要问题必须当面研究。我当即答复:请他们来北市场我的住处会面。

他们二位按约定时间来了。

他们所带来的气氛是紧张的,见面后就转入了正题,情况是:

前一天,国民党辽宁省主席徐箴,忽然在家里召见杜鸿儒和陈硕彦。

徐箴的客厅里还坐着国民党辽宁省教育厅姓卞的厅长,这是个以老“教育家”自居的反动政客,教过陈硕彦,在陈硕彦面前摆着“恩师”的架子。他们对杜鸿儒和陈硕彦很客气,呼烟唤茶,问寒问暖,闹腾了一阵以后,徐箴忽然告诉他俩说:有人告发,说他们和共产党有密切关系。他们当时表示非常惊讶,非常意外。徐箴又进一步说,如果有关系,希望告诉他,他会替他们想办法。他们二人当时矢口否认,并且表示这可能是有人捏造事实,想要陷害他们。徐箴见他们态度这样坚定,就和那个卞厅长俩人一齐把话往回拉,说既然没有关系也就算了,让他们不要介意。最后又说了些冠冕堂皇的话,希望他们为国为民好好做事……

他们介绍完情况,杜鸿儒焦急地说:“从他那里出来,我们就决定赶快和你见面,研究一下怎么办?……”

情况显然是严重的,对突然的事件必须采取断然的行动,我一边想着办法,一边征求他们的意见说:

“您们二位觉得怎么办合适？”

“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想出妥善的办法来。”杜鸿儒说，“事情已经表面化了，硬挺着恐怕是不大妥当的。”

“对，不能硬挺。”我说，“现在正是敌人疯狂的时候，他们从来就是宁肯错杀一千，也不错放一个革命者的，何况是现在。”

“是呀。”陈硕彦说，“我担心他们很快就要下手。”

“这也要看情形，下手是要下手的，但是时间……”我想了想说，“从您们方才讲的经过上看，敌人很可能还没摸到确实的线索，但是又有怀疑——这怀疑的时间也可能不短了，所以就等不得了，才采取了一次突击式的、试探性的谈话。在这次谈话当中，你们应付得很主动，占了上风。这也可能使敌人暂时迷惑一下，但是……”我加重语气地说，“我们却不能因此就抱有任何侥幸心理。希特勒、蒋介石、陈诚，以及所有的大小反动派，都是反复无常，嗜杀成性的。我们必须赶快想出对策来。”

“我也曾想找找朋友，走走门路。”杜鸿儒说，“但是我又觉得靠不住，在国民党官场里的所谓朋友有哪个不是势利交情，一听到这样政治问题，躲还躲不及，谁肯出头；碰到更坏的，再落井下石，反倒坏事。”

“对，不能找他们，要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我说，“办法只能我们自己想，而且要当机立断，马上行动！”

“您有什么主意？”杜鸿儒说。

“主意倒想出一个。”我说，“但是主要还得看您们二位的意见。”

“您说吧。”他们直望着我说。

“我的意见是马上离开沈阳市！”我用手向北一指说，“到我们自己的地方去！”

“去解放区！”杜鸿儒惊喜地说。

“对，到解放区去！”我着力地说，“解放区的人民一定非常欢迎二位，那里有的是工作可做。”

“太好了！”杜鸿儒兴奋地拍了一下手说，“能到解放区去比什么都强，从今后再也不受国民党的窝囊气了！这真是称心如意的好办法！”

杜鸿儒说完望着正在欲言又止的陈硕彦，我也望着陈硕彦。

“到解放区去当然是上策。”陈硕彦犹疑地说，“只是家怎么办？能带走吗？不能带走怕要受到迫害……”

“这的确是让人不放心的事。”杜鸿儒说，“但是家一动，就要惊动敌人，而且要耽误时间，拖儿带女路上也不方便。所以我的意见最好不带，我只盼望咱们能快走。我决意把老婆孩子都留在这里。”

“对，夜长梦多，要快走，而且不能惊动敌人。”我望着陈硕彦说，“如果您也同意把家先留在这里的话，您们就先走，二位走后，或者由我们把家送过去，或者另作安置，我们一定设法保证两家老小的安全，使您们能够很快地和家人重聚。”

“这太使人……感激了。”杜鸿儒激动地说。

“要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放心走了。”陈硕彦也面露喜色地说。

“几时动身？”杜鸿儒问。

“您们回去后马上准备，明天清晨听我的信。”我考虑一下说，“为了应付路上可能遇到的麻烦，您们最好悄悄地开张护照，再编一个合适的外出理由准备着。”

“护照好办。”陈硕彦说，“外出的理由也现成，往北去，路经法库，我老家在那里，就说回家探亲。”

“我岳父家也在法库，正好和陈一道。”杜鸿儒说。

“好吧。准备要迅速，要轻装，要机密，说走就走。”我稍微

想了一下说，“也可能我和二位一同到哈尔滨去，也可能另派别人送二位去。一切都由我们来安排，只请您们作好出发的准备。”

.....

我们的谈话结束了。我留他们吃了晚饭。送走他们后，我立刻让报务员把白皓同志和张健同志找来，经过研究，决定下面几件事情：

首先，决定由我和杜鸿儒、陈硕彦一同去哈尔滨，因为在哈尔滨除了安排他们二位之外，还要向领导汇报工作，并且领取当时特别需要的经费和电台。

我们研究了走的路线，决定我和杜鸿儒、陈硕彦分头过封锁线。为了防备敌人的追捕，杜鸿儒和陈硕彦不坐火车，通过工作关系，搞一辆马车，由一个可靠的工人同志赶着送到三面船，过辽河，奔法库，然后到康平与我会合；我扮作商人，坐火车到铁岭，然后徒步奔赴康平。

他们二位的家属安全问题，我让白皓同志相机行事；或者送走；或者另作安排。进行时要尽量隐蔽，要少露面，但一定要保证不出问题。

在我离开沈阳时期，组内工作由白皓同志负责，我争取尽快回到沈阳。

我嘱咐康祥春同志要常到钱国勋家里去。“五十一派克”笔一到，就将本钱送给那个贪财的钱三姨太太，然后将货物交给王昭晟同志，赶快出手，利钱也如数送去。如果在这个时期内他们来找我，先应付一下，等待我的归来。

对其他工作也作了细致的安排和研究。

我把有关事情迅速地通知了杜鸿儒和陈硕彦，于是我们就分头向风雪严寒的北方进发了。天冷，但我的热却生自内心深处，我又将回到党的怀抱里，接受领导的亲切指示，同志们的热



情关怀。这时间虽然是暂短的,但却会在我未来的工作中产生巨大的力量!我抬头北望,仿佛看见杜鸿儒和陈硕彦也正坐在奔跑的马车里,顶风冒雪前进。他们和我奔的是一个方向,去的是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和他们这生活了几十年的旧天地不能相比,那是一个崭新的世界!他们的心情,定会更加激动。但愿他们能平安地闯过一切阻碍,胜利地到达康平!

## 在 风 雪 中

杜鸿儒、陈硕彦和我先后到了康平。虽然分手只有几天，却象阔别好久一样。解放区的一切对他们都是那样新鲜，真是换了一个人间：谦虚的干部、诚朴的战士、热情支前的妇女、争赴前线抬担架的翻身农民、拿着红缨枪的儿童，以及亲如一家的军民关系，情同骨肉的同志友爱……所有这一切景象，和飘荡在空中的歌声交织在一起，是多么激动人心哪！让你不由得也想跟着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怎能不喜欢呢！尤其是刚从那样一个黑暗、齷齪的社会里跨出来的人，心真象开了花一样！这边和那边，相隔不过百里，头上顶着一块天，脚下踩着一块地，但却是两种生活，两个世界，地狱和天堂，多么分明！这样的激情，化掉了一路上的疲乏，驱跑了北方的严寒，心中的热情催着我们快走。

康平不通火车，我们坐上一辆胶皮车，直奔郑家屯（双辽），正好有列货车开往白城子，我们在上面铺了几捆干草、几条被褥，准备好两壶开水，一口袋干粮。真是有铺有益，有吃有喝，一切都使人满意。我们爬上高高的货箱，听着汽笛的吼叫，随着车轮的移动，离开了郑家屯。货车开到白城子，我们又登上了一列开往齐齐哈尔的客车，直往北方驰去。

祖国最北方的城市——齐齐哈尔，冰雪盖地，冷风刺骨。黑龙江省政府热情地接待了杜、陈二位，副省长顾卓新和教育厅厅长关梦觉，为他们设宴接风，临行又送给我们每人一件军用黄大衣，厚厚的棉衣，使我们暖在身上，热在心里。

到了哈尔滨，我向部长汇报了工作，并说明了杜鸿儒和陈硕彦的情况。部长对他们二位的到来，特别欢迎，除了嘱咐有关部门热情接待，照顾他们充分休息之外，并特向东北行政委员会首长报告，妥善安排了他们的一切。

部长又详细地询问了我们的工作情况，随时作了重要的指示。最后，根据我们的需要，批给我们一笔经费和一部电台。

我按照部长的批示，选好了电台，领到了经费，就准备上路了。正这时，高崇民同志把我找去，交给我一封介绍信。他告诉我：收信人是沈阳国民党第一公安分局（城里区）局长，过去曾经和我们在暗中打过交道，后来断了联系，现在应该再做些工作。但是对这样一个人，工作是不好做的，要细致，要耐心，要注意方法。应该找个适当的时机，由我自己去做这件事情。我珍重地收起介绍信，兴奋地回答：一定按他的指示去做。

我尽快地办好了一切事情，辞别了领导，告别了同志，再一次离开了这座我熟悉的城市——哈尔滨，又一次踏上了奔赴康平的大道。几个月前，这条道是雨水泥泞，现在却是冰封千里了；几个月前，正处在我军秋季攻势打响的前夕，路上队伍不绝，马声不断；现在，却又准备一次更大的攻势——冬季攻势了。路上仍然是队伍不绝，马声不断，但情形却大不相同。这个不同，不止是战士的服装变了——从一层布的单衣，换上了厚厚的棉衣——而是各方面都变了：从来没有过的巨型大炮，碾碎坚硬的冰雪，轰轰隆隆地过去了；联成串的大卡车，满载着军用物资，搅起阵阵雪烟，撵过队伍，风驰电掣般地过去了；队伍里：机关枪多

了，冲锋枪多了。我们的战士——翻身人民的子弟兵的腰板也挺得更硬了，个个面放红光，劲头十足，淡黄色的牛皮靴，轻快地踩在雪地上，发出有节奏的嚓嚓声，崭新的皮帽子，一把捏不着肉的棉大衣，整整齐齐地穿在每个战士身上，穿得那样暖和，那样如意，这样的装备，就是整天趴在雪地上，凉气也钻不进去。和这样的队伍走在一起，让人感到浑身是劲，浑身是胆，真想扛起枪来，和他们走在一起……战士同志们，快走吧，早一天走进沈阳城吧，那里的人民还在水里火里盼望着你们呢！为了让这一天早日来到，我和我的同志们，愿意献出所有的力量，为你们“铺路、搭桥”。

在康平，我很快地见到了地委曾昌明同志，向他汇报了情况。当他了解到我携有经费和一部电台的时候，马上问道：

“你打算怎样带过去？”

“经费想法带在身上。”我回答说，“电台要再想想办法。”

“问题就在电台上，为了你的安全，我们的意见你还是不能带。”

“不能带！”

“嗯。我告诉你个情况：前些日子，有一位工作人员到南边去，也携带一部电台，路上被敌人翻出来，当时就被逮捕了。”

“他是怎么带的？”我着急问道。

“无论怎么带都不保险，现在敌人很疯狂，我们要对你负责，不能让你冒这个险。况且听说沈阳最近经常停电……你的电台是用什么样电的？”

“交流电的。”

“是呀，你带过去没有电不还是白看着。先放在这里，还是用交通员联系吧。你们现在有几个交通员？”

“三个。”

“是呀，三个交通员，勤跑着点，误不了事，你看怎样？”

我还能说什么呢！只好把电台又放下了。现在就剩下经费了。经费的带法，我早已想好。回到住处，打开预先准备好的白布，把经费都贴肉紧缠在身上。

一切收拾妥当，我就按照地委曾昌明同志的指示，直奔法库大杨家窝堡，去找铁岭县长刘永川同志。熟人相见，分外亲热，刘永川同志要在我那里休息两天，等边缘区武工队赵区长来了以后，由他负责送我进入敌我拉锯区。我等不得，他无奈只好一方面派人去大公主屯给赵区长送信，一方面准备车送我上路。

正这时，天忽然变了脸，先刮风，后下雪，风卷着鹅毛大雪，漫天乱舞。一九四七年的冬天，是东北地区多少年来最冷的一个冬天。尤其是康平，蒙古的冷风一刮过来，冷得就出奇了，从屋里一到外边，鼻子就象针刺一样酸疼，几滴清鼻涕落下来，马上就变成冰，风刮在脸上，冷气往肉里钻，一会儿就冻麻木了。狗冻得蜷成一团，嘴巴狠劲地插进后腿里，鸡冻得翘起一只脚，连麻雀都不愿意出巢了。

刘永川同志见天气这样坏，又劝我再等一等。我因赶路心切，坚持着上路。

刘永川同志派了车，但我却不敢在上面多坐。一坐下来，脚便冻得象猫咬一样疼，风往衣缝里钻，雪往脸上打，只好跟在车后面跑。雪越下越厚，每步下去都没到踝子骨上边，跑一会就要喘，喘又不敢张嘴，不张嘴风雪还灌得人透不过气来呢。可也有一样好处：就是身上暖和了，暖和了就再坐车，冷了就再跑……就这样折腾了一路。快到大公主屯的时候，已经接到刘永川同志通知的赵区长领人迎了出来。

赵区长，和马上县长刘永川同志一样，是马上区长，领着一

支武工队,打得拉锯区的“清剿队”象耗子见猫一样望影而逃。他见到我非常热情,受他热情的感染,我几乎连冷都忘掉了。

赵区长告诉我,刘永川同志已经通知他:预备好三石高粱,装好一辆大车,我装作捣运粮食的投机商人,把粮拉到拉锯区梁家窝堡老高家,仍由老高同志赶车送我进敌区。

在战争时期,粮食比任何时候都宝贵,我提出另想办法。但赵区长的态度象钢梁上的铆钉一样不可摇动。他说蒋管区缺粮象干裂的土地缺乏雨水一样。粮食成了敌人的救星,见着就往里放,用这个方法最安全。何况这是县领导的指示,他怎能变更。

党对一个同志的关怀,胜似任何亲人,有哪一个党员,不时时感到党的爱抚呢!

进敌区的方法确定了,我吃完了饭,立刻要走。但赵区长却要我等他去转一圈再走。他立刻带领二十名武工队的战士,到拉锯区去察探敌情。

天黑了,西北风一阵紧似一阵,朔风裹着飞雪,敲在毛头纸窗上,飒飒直响。在我焦急地盼望中,赵区长回来了。他浑身上下挂了一层白霜,眉毛都变成了白色,进屋后紧跺脚,我帮他脱靴鞣,靴鞣冻得棒硬,和冷汗凝在一起,紧粘在脚上,好不容易才拽下来,脚已经冻得象冰块子了。他自己忙熟练地打来一盆带冰碴儿的冷水,把脚泡在里边。脚一伸进去,颜色煞白,很久,才渐渐有了血色,这真和用冷水缓冻梨差不多。他一边泡着脚一边告诉我:他们转了一圈,没发现敌人的踪迹,拉锯区还平静。于是我便决定立刻上路,连夜到梁家窝堡,再进敌区。

从梁家窝堡出发,是午夜一点钟。雪住了,风小了,但冷却加劲了。一点以后,正赶上“鬼龇牙”的时候,滴水成冰,呵气成云,

针刺一样的冷风，钻透了棉衣。我跟在大车后面紧跑，大车的铁轮子在暗夜里也直闪白光，碾在冰雪上吱呀吱呀的响。一路上的村庄遭到了敌人的严重破坏，有的很好的房屋却没了屋门和窗框，都被国民党匪兵摘去烧火了，石头磨被推翻在地下，磨盘被拿走，拴马桩子被拔去……饥饿和寒冷，使国民党匪兵成了更加凶残的恶鬼。但也正因为这样，才使我们有机可乘。正象赵区长所说的：敌人见着粮车就往里放。于是我在粮车掩护下，没费什么周折就通过了封锁线，安全地进了铁岭城。交通员袁凌同志正在铁岭等我，我把粮食交给他处理，告别了送我的老高同志，登上火车，驰回沈阳。

## 一个好主意

一到沈阳,我马上召集党员同志开会传达上级指示,并请同志们汇报工作。

我离开沈阳时间不长,但由于同志们的努力,工作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敌空军司令部人事处做打字员的乔俊芳,已将敌“作战指挥室”的几份材料,及时地送出来了;白皓同志正按原计划,在做敌第六补给区安秘书的工作。第六补给区是敌东北地区的总后勤部,是敌人的重要部门,工作是有价值的;康祥春同志又发展了一个工作同志,是空军工程队的文书。此外,又接近了敌炮十二团的一个青年军官。炮十二团是国民党自认为最好的榴弹炮团,是他们的命根子。国民党把一个营留在山东,其余的主力秘密运来东北,给陈诚保镳。康祥春同志和这个敌军官是早年同学,他对康祥春无话不说,使我们知道了好多炮兵的情况。另外,王昭晟同志有一个同学,是敌“军运指挥所”的译电员,王昭晟同志也正在做他的工作,他本人有进步的要求,但决心不大,还有些左右摇摆。

我们研究了上面的一些情况,对工作作了进一步的安排。因为“军运指挥所”的译电员是一个重要的工作对象,他本人又在摇摆不定的状态下,所以决定找个合适的时机,由我代表党出



面和他谈话,争取他早日为人民工作。

对钱国勋的工作,也有了进展:钱三姨太太的钢笔买卖已经作成,康祥春同志已将利钱如数送去,这个爱钱如命的女人象狗得了肉骨头一样高兴,几次要康祥春同志传话,请我和我的妻子过去串门。关于他们,康祥春同志又谈了一个新的情况:钱氏夫妻已经预感到我军又将开始一个更加强大的攻势,在这情况下,他们就象暴雨前的蚂蚁一样,害怕巢穴覆没,想要往更安全一点的地方迁移。但是,钱三姨太太又怕把钱国勋一个人放在沈阳,象春天的公狗一样,到处乱窜,因此放心不下,举棋不定。而钱国勋呢,虽然盼望这只“雌虎”赶快“归山”,却不敢过多地发表意见,怕引起妒意,反为不妙。康祥春同志窥穿了其中的奥妙,便乘机向钱三姨太太做工作,帮助钱国勋说话,说这里兵慌马乱,不如北平生活好,气候好,怂恿她快下决心。康祥春同志在这里边有他的安排,他想把钱三姨太太劝走,倒出房子,让我搬进去住。

我搬到同泽街“钱寓”去住,这确是一个大胆而有益的主意,如果能办得成,不但巩固了环境,便利了工作,且可多接近钱国勋。因此,我除让康祥春同志加紧怂恿钱三姨太太快走之外,并决定我和我的妻子一同去钱家“串门”,把关系拉得更近些。

沈阳的天气,虽然比康平好一点,但是在一九四七年那猛烈得少见的寒潮侵袭下,也是奇冷。大街上的雪一层压一层,马路高起来了,人走在上面,冰雪很快就凝结在鞋后跟上,一会就变成个冰疙瘩,甩也甩不掉,象穿了高跟鞋一样。那些从南方运来的国民党兵,薄薄的美式装备,挡不住刺骨的寒风;冻得僵硬的美制胶皮靴子,穿在脚上象拔去毛的熊掌一样可笑。他们走在大街上,缩肩弓背,丝丝哈哈,冻得象没毛小鸡一样可街乱窜。有的乞丐都可以向他们表示骄傲,因为乞丐还有两条麻袋披在背

上抵风御寒呢。

我平素是最不怕冷的，再冷的天气，也可以不戴皮帽子走在街上。但是今天，却因为需要，和我的妻子都穿上了从哈尔滨带来的皮大衣，妻子又围上了一条黑狐皮，我头上戴了一顶名贵的紫貂帽子，柔软的貂毛紧贴在腮上，顶着西北风还觉得热烘烘的。

同泽街南九马路，是旧地重游了。我们进了“钱寓”，脚跟还没站稳，钱三姨太太就从屋里飞跳出来，那股虚假的热乎劲，就是多年不见的至亲好友遇在一起也不过如此。她呼烟唤茶，拉住我妻子问寒问暖，眼睛从妻子的头上飞快地移到手上，停留在手腕子上，那里戴着我们活动经费的一部分——一副黄澄澄的金镯子。

谈话很快就转到“五十一派克笔”的买卖上，连成串的感谢话从她嘴里冒出来，就象泉水从泉眼里冒出来一样。象大多数女人谈话一样，话题来得快，转得也快，转来转去就转到她要回“北平”的问题上去了。她说有意要回“北平”住一个时期，现在的房子想找一个可靠的朋友来住……我们没有一下子提出自己的打算，只是含蓄地暗示了一下我们现在住的房子很不理想。

象她这样的女人是把善猜人意作为自己的本领的，话一点就透。但她却没有再往下多谈，这可能是因为她还要和钱国勋商量，也可能因为这又是一笔“交易”，而且是“直接交易”，在和我们正表示亲热的时候，不好意思马上张口讨价。管她怎样呢，事情已经露了头，就不愁没办法。

从“钱寓”出来，我马上找到康祥春同志，让他看准时机，赶快促进。

事情进展得比我们预料的还快。两天以后，我的门前停下了一辆崭新的军用吉普车，一个国民党空军少尉从上面跳下来，

快步走进我的房子，皮靴后跟一碰，向我敬了一个礼。我忍不住笑起来说：

“祥春，什么事这样兴高采烈的？”

“奉钱国勋处长之命，派车前来接您。”康祥春同志象演戏一样地忍住笑说。

“什么事？”

“他没说，只说要和你见见面。”他恢复了正常态度，把声音放低些说，“但是我猜想可能是要谈房子问题，他的三姨太太已经决定回北平了。”

“他在哪里等我？”

“在办公室。”

“好，马上走。”

我擦了一把脸，迅速地穿好衣服，就向外走。康祥春同志忙抢到我前边，快步到车前，一手拉开车门，两足靠拢，身向前微倾，手向里一伸，恭恭敬敬地说：

“请王监理上车。”

我忍不住要笑，他却把脸绷得紧紧的，象个石膏像，真是个好演员。我会心地向他点点头，举步上车，车门在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了。他忙跳进前座，说声“司令部”，车轮便应声而动。开车的斜戴着美式军帽，在北市场的狭窄街道里，他竟把车开的要飞起来。我望着路两侧惊慌躲闪的行人，忍不住地向康祥春微微示意。康祥春忙对司机说：

“开慢点。”

汽车速度减慢了，司机的眉头却皱起来。靠近车站的“中山广场”上，环形大楼里挤满了国民党的军政机关。空军司令部门前警戒森严。汽车刚一停住，康祥春就敏捷地跳到地上，拉开后边车门，我一下车，他就象对待高门贵客一样，侧身前导，通行无

阻地把我引到二楼钱国勋的办公室里。康祥春在我和钱国勋之间，作了简要的介绍，就很有礼貌地退出去了。

钱国勋，约有四十六、七岁，蛋形的脸上刮得没一根胡茬儿，头发也光溜溜地紧贴在头上，纹丝不乱；笔挺的制服，油亮的皮鞋，浑身上下溜光水滑，还散发着一股香水味，真象才从美容院里走出来的一样。

这是个很善于辞令的人，应酬的话语，感谢的词句，在他嘴里是那样现成，不用选择，不用思考，就能说得流利动听。而且让你感到他这人似乎很爽快，甚至是很诚恳。他的言谈真和他的外表一样光滑，没有破绽，没有间断，真可谓表里一致了。他大概就是靠了这一套，在国民党反动官场里跳，在女人当中混，在钱眼里钻。

当一般的应酬话已经谈得差不多的时候，他就把话锋一转——转得很妙，如果不留意，还以为他是在闲谈中另找话题呢，但我却知道是进入正题了。

“我最近想把内人送北平去。”他微微一笑说，“王先生大概听说了吧？”

“听钱太太提过。”我不动声色，静以待动地说。

“如果从目前局势上看，本来也没有必要马上这样做。讲军事力量嘛，我们国军还占优势，将来鹿死谁手，还难断定。但是……”他眉头忽然皱起，油光的脸上象罩上了一片阴云，稍停了一下，才又把眉毛舒展开说，“但是现在毕竟是在战争时期，家小住在这里总不大合适，我事情又忙，照顾不过来，所以就想把家先送到北平去，当然喽，这也不是长久之计，等将来局面稳定下来，还是要回来的。这样一来我现在的住宅暂时就空下来了。”

“您自己呢？”

“我另外还有住处，一个人没有必要住那么多房子。再说，

听内人说王先生对现在的住宅不大中意……”

“嗯，不大理想。”我点点头说，“住惯了从前的房子，就不愿再受憋屈，挤一点就受不了。”

“那当然。所以我和内人研究，如果王先生不嫌弃的话，等内人走后，就请搬到那边去住。我里边的一切家具都原地不动，电话不动，烧柴不动，户口也不动。王先生迁过去以后，和我报同居就可以，咱们大家都省事。”

户口报同居，这是我意想不到的，这样我们的工作环境将更加巩固了。我心头一喜，却尽量不形诸于色地说：“这真使我受之有愧了。”

“我们彼此不必客气。内人屡次对我说：王先生从前也是做事的，不是一般商人，对朋友最热心，办事最爽快，今天一见果然如此，这使我非常高兴，我这人正喜欢这样。所以咱们就不来俗套子，房子您住，咱们也不讲兑，现在我需要点钱，内人去北平也要路费，你给我十两黄金就可以了。”

他要黄金要得这样轻松、干脆，随便得象要支烟卷一样。而且还说得那样慷慨大方，冠冕堂皇，明明是要钱，却把关系拉得这样近，真是只老狐狸。但在这样关头，面对这样的人，却丝毫不能示弱，我忙一摆手说：

“十两太少了，别的忙帮不上，需要钱，您只管说。”

“不，不，十两足够。”他也挥了挥手说，“以后我还要常上那里去，咱们虽然相处不久，但是我却非常了解您，这真叫一见如故了！”他大声笑了笑说，“以后我的私人信件还要寄到那里，找我的电话也可能打到那里，一切还得麻烦您。”

“您放心，只要我在那里住，您的一切东西我都给您保管好，丝毫不会差。”我也高声笑着说，“而且欢迎您随时去。”

“我一定要常去，咱们的户口关系就报亲属。我在那里还有

个勤务兵，连烧锅炉带跑街，人很可靠，你要用，也留给你。”

“我不需要。”我忙摆摆手说，“勤务兵跟您跟惯了，现在佣人好找。”

房子“交易”谈妥了，借着一个小下级军官来批公事的间歇，我便起身告辞了。

康祥春还在外边等我，钱国勋送我到门外，又让康祥春用车送我回去。回到住处，我把经过告诉康祥春同志，他很高兴。十两黄金代价虽高（比起市价却又低得很），却十分有利于工作：环境巩固，联系方便，也为进一步接近钱国勋铺平了道路。

我把从哈尔滨带来的经费交给张健同志，要他立刻去城里金店，换成一整条黄金（十两），由康祥春送交钱国勋。

三、四天以后，我们“全家”搬进了“钱寓”。“钱寓”的牌子依然挂在门上，户口上的户主仍用钱国勋的名字，一切都很顺利。

这所房子，独门独院，前边有高墙，后边有严密的铁丝网。屋里房间也多，一进门是间客厅，软软的地毯，宽大的沙发，亮漆的衣橱，啾啾响着的暖气……让人感到原来的主人是在尽其所能地炫耀这个反动家庭的阔气。但也可能这一切都是日本侵略者留下的敌伪物资，被钱国勋“劫收”下来了。现在，却又为我们服务了。从客厅进去，就是卧室、餐室，在屋子的一角，还有个小小的浴室，地方比较隐蔽，将来取来电台，但却是个最理想的地方。麻烦的是整个房间有一套单独的暖气设备，锅炉不大，却有一套技术。从前是钱国勋的勤务兵烧。一个国民党兵，怎能继续留在这里？不用说兵，就是普通人也不能用。这就象门不能留缝，房不能留洞一样。所以烧锅炉的事，只能自己动手干。天这样冷，暖气不能停，停一天，这一冬就别指望它再为我们服务了。这样，我就和勤务兵说：我有一个亲戚，来给我烧锅炉，但是

得两天后才能搬来,请他再替我烧两天,勤务兵欣然答应了。于是在他烧锅炉的时候,我就装作一副悠闲的样子,走到锅炉间去,一边和他闲谈,一边用心地看他怎样泵水,怎样挑炉、添煤、压火、清炉……两天的时间,我都悄悄地看会了。勤务兵走了,我就自己动起手来。

怕人撞见,引起怀疑,每天都是起大早干。运煤、扒灰,透汗一出,身心轻快。刹那间,仿佛又回到在延安学习时候的炽热生活中了。几天过去后,身体也觉得结实了。只是出了一个问题:手一伸出去,象从染缸里才拿出来的一样,沾在上边的煤灰,用多少肥皂也洗不掉,越洗越乌黑油亮,手指上也出了一道一道干燥的裂纹,就象木刻画上的刀纹一样。“手是人的第二面孔”,这样的手,说是经营煤厂的还贴边,怎能是贸易行的“监理”?小处不留意,大处就要出毛病。我忙买了两副白线手套,套在一起,干活的时候戴在手上,干完活再摘下来,这才算两全其美了。

## 敌“军运指挥所”的译电员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东北我军冒零下三十度的严寒，向敌人展开了强大的冬季攻势。攻势一开始，我军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奔袭包围沈阳敌外围要点法库、彰武等地。战斗一打响，就在法库以东地区全歼敌军两个团。沈阳的敌人顿时慌作一团，急从各地抽调兵力，增援巩固他的老巢沈阳市。

为了能及时了解敌军调运、布置情况，我通知王昭晟同志，一定要抓紧做敌“军运指挥所”译电员的工作，并把我和他的见面时间提前，越快越好。

第二天的晚上，我按约定时间到了王昭晟同志的家里。王家在南京街附近，住两间房，爱人梅煊同志，已经参加了我们的工作。我到时，她正在外屋等我，她悄悄指了指里屋说：“来了，正等您。”

我点点头，走进里屋。一个高大的青年，迎面站起来。正赶停电，摇曳的烛光，看不大清面孔。站在一旁的王昭晟同志忙指着他说：

“这是我的老同学……”又把手伸向我这边说，“这是老张。”  
改姓张，是我们预先约定的。

王昭晟的话音方落，大高个的青年忙抢前一步，一把拉住我



伸出来的手。他的手很凉，手心湿漉漉地，却很有力量。

“能见到您，真是荣幸。”他激动地说。

“让你久等了，快坐下谈。”

我们面对面坐下。王昭晟同志小心地拉了拉已经遮严的窗帘，转身出去了。屋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我把红烛移近一些，烛光照在他那红红的脸上。

“听昭晟说您最近方从北边过来？”

“嗯。”我点点头说，“你和昭晟是在铁路学院同学？”

“是的。我们在一起无话不说，他最近常当我谈到您，说您一直在东北做革命工作，还到过关内……”

“这么说我们互相都已经了解了，他也当我介绍过你的经历。”

“我的经历……”他不自觉地用手摸了摸涨红的脸说：“说起来真觉得惭愧，受完了奴化教育，一直是颠沛流离，苦闷彷徨，社会太黑暗，使人找不到出路。”

“你说的我完全理解，很早以前我也苦闷彷徨过。”

“可是您找到了出路。”

“想要找，谁都可以找到。只要能看清谁是为人民的，谁是反人民的。”

“您说得对。从前，我还认不清国民党，现在……他们的所作所为，简直使人再也不能容忍了！”他的脸越发涨红起来，拳头握得紧紧的，过了一会儿又说，“远的不说，单说我在那个‘军运指挥所’里，一个主任叫韩慕州；一个副主任叫宋国春，两个坏蛋，一个胖的象肥猪，一个瘦的象皮猴，他们从到东北后，就不断地从鞍山用铁甲车大量地往天津捣运钢管、钢板，大发‘光复财’。黄金楼多了，就花天酒地地过最糜烂的生活。韩慕州已经有了两个老婆，还嫌不够，除了在妓院舞场里乱搞女人之外，又

看上了所里一个年轻的打字员，威逼利诱地娶为三姨太太。在所里；会拍马的爬上去，不会溜须的踢下来，最卑鄙的人最得势，最正直的人最受欺……您看，这是什么世界！”

“这正是国民党整个世界的缩影，不光是一个‘军运指挥所’，所以人民才起来革命！”

“我最近就正在想这个问题，从遇见昭晟以后，他给我不少开导，使我更恨这个腐朽透顶的社会了。”

“光恨不行。”我抓住关键，单刀直入地说，“譬如有一座陡峭的高山，挡住了太阳，使山下的人永远过着黑沉沉的日子，这时候怎么办呢？光恨，山能倒吗？”

“不能。”

“对，山不能自己倒塌，水不能自己沸腾，必须用人的力量来征服它！”

“‘山’若是太大呢？”

“架不住人人都恨它，人民的力量可以移山倒海，何况这‘山’又光剩了一座空架子。就象我们的毛主席在一年以前向美国记者所指出的那样：‘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我兴奋地站起来说，“可惜你没有到过解放区，你如果能亲自看到那里人民的情绪，然后再站在人民群众当中，回过头来看看这座‘山’，你就再也不会感觉‘山’大了，你就会信心百倍地参加到人民的行列里，去推翻这座‘山’。”

“您是说我的勇气不足吗？”

“我感到你需要更多地了解人民的力量。”

“您能不能多花一点时间……”他稍微迟疑了一下说，“更详细地讲一讲？”

“我愿意向你介绍一下解放区的具体情况。”我坐在他身旁，望着那跳抖的烛花，屈指一弹，烛花飞出去，火光向上一跳，屋里

亮起来,我的心也随着亮了。一想到解放区的情景,就象在酷冷的天气里想到了春天,心亮了,身暖了,精神也更激动起来。我向他讲了解放区的各方面情况:土地改革、青年参军、人民支前,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上下级和同志间的关系等等。最后又讲到敌我军事力量的变化,全国反攻的形势,蒋介石的日暮途穷……我讲得兴奋,他听得也兴奋,我笑,他也笑。当我讲完的时候,他紧紧拉住我的手,睁着火辣辣的眼睛,说:

“好,从今后起,我不再犹疑了,一定跟着共产党走!”

“要跟着走,就要立刻行动!”我也紧握着他的手说,“现在我们的冬季攻势已经开始,敌人仓皇迎战,调运频繁,我们要尽可能地及时掌握情况。”

“这我了解。从现在起,我一定尽力去做。”

“好。有了情况后就和昭晟联系,如果你要找我,也让昭晟转告。”

“希望您以后多帮助我。”

“我们共同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吧。”

我们握手告别。从此以后,在敌“军运指挥所”的译电室里,坐下了一個我们的译电员。敌军未动,电报先发,我们掌握了主动权。

山东李弥的部队,是国民党的主力之一,本来要死守山东,但是当东北的陈诚被我们打得哀嚎求救的时候,蒋介石就不得不用挖肉补疮的办法,从山东割来两个师增援东北:第一个师代号双杭,从山东调运锦西韩家沟;第二个师调运锦西杨杖子。电报飞到敌“军运指挥所”:要多少“《车》”(有盖的车),多少“×车”(没盖的车)……敌人的车轮还没有转动,我们已经知道了它的始发点和终到站,连车上共有多少“货物”,都清清楚楚了。他们自以为行踪诡秘,却不知早在我们掌握之中。

## 在欢欣鼓舞的心情下

一九四八年一月七日，我军于沈阳西北方公主屯地区，以不可抗拒的强大力量，只用一昼夜的时间，就彻底、干净地消灭了敌精锐部队之一——新五军的全部人马。丧报传进沈阳，陈诚吓得手足失措，蒋介石在南京也坐不住了，立即飞奔沈阳，慌忙召开军事会议。在会上，这个贼头还没听完汇报，便大发雷霆，猛捶着军用地图，厉声骂道：“混蛋，要面子！”真是人有人言，兽有兽语，虽然只是五个字，一句骂人话，但是那些挨骂的奴才心里都明白，这就是蒋介石的重要指示。翻译过来就是：“你们混蛋！为什么光图面子上好看，把兵力搞得这样分散，让人家各个吃掉？应该缩短战线，放弃一些据点，集中兵力！”

蒋介石这次来沈阳的情形，以及他在军事上的主要意图，我们从敌“东北行辕”一个少校作战参谋那里及时地知道了。连同他那“五字真言”的“指示”，都成了重要材料，马上让交通员送走。

这时，四八年的春节快到了，我在欢欣鼓舞的心情下，开始作争取敌沈阳第一公安分局局长的工作。

我按照电话簿子上的号码，在家里往局长室挂电话。当问清楚接电话的确是本人以后，我说：“我是从远地方来的，您有

一位亲戚给您捎来一封信，让我面交。”

“啊！啊……远地来的……”对方稍停了一下说，“您贵姓？”

“姓王。”

“您打算什么时候到这里来？”

“现在方便不？”

“现在……可以。”

“直接到您办公室去？”

“好的。我等您。”

放下电话，穿好衣服，把高崇民同志写的介绍信揣在里边衣服里，坐了一辆三轮车，便赶往城里公安分局。

在传达室里，传达问清楚了我姓王以后，马上放下了阎罗殿前小鬼的架子，换上一副面孔说：“啊，王先生！局长已经吩咐下来，他正在局长室里等您。”

我按照传达告诉的位置，找到了局长室。一个穿着国民党警官制服的中年男子正坐在一张宽大的写字台后面写对子。桌子上、地下摆了很多墨迹未干的双红纸；长条的春联、方形的福字、整张纸的“大门心子”、短短的“抬头见喜”，一张挨一张，形式多样，红火热闹。这倒是个很不一般的场面！当整个沈阳城的敌人都处在惊魂难定、寝食不安的情形之下时，这位先生却这样闲散，是真的心境悠闲，还是故意摆出来的样子呢？

听见门声，他从桌上抬起头来，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我。

“您是局长吧？”我也直视着他说。

“正是。”他放下毛笔说：“您就是王先生？”

“对。方才在电话里已经自我介绍过了。”

“好，很欢迎！”他从桌后走出来，跨过地下的红纸，指指沙发说：“请这边坐。”

沙发摆在一座火炉前边，火炉里煤火正旺。我脱去大衣，他走到门前把门关了关。

“我来打扰您了吧？”

“哪里，没有什么事情。”他指了指对联说，“朋友们让我给写，我只好乱涂一阵。”

我望着地下的对联说：“您写一手颜体字！”

“好久不拿笔了，让您见笑了。”他又眨了眨眼睛说，“您是从……”

我把手向北边一点，含蓄地微笑着说：“从那边过来的。”

“几时来的？”

“不久。”我伸手从兜里掏出介绍信向他面前一伸说：“这是您那位亲戚带给您的信。”

他接过去，静静地看着，信上的字不多，他却盯盯地审视了半天。抬起头又看了看我，才笑容满面地说：“谢谢您，看见他老的亲笔信，我很高兴，我一直在惦记着他老人家。”

他一边说着，一边从容地站起来，走到沙发后面，打开火炉的铁门，赤红的火焰在里面竞相跳抖，他轻轻地一抛，介绍信便落在火焰当中，稍稍一抖，就踪影全无了。他随手关上炉门，若无其事地说：“他老在那边怎么样？”

“很好，身体很健康，心广体胖，工作、生活都很好。他老很感谢您，他的爱人和孩子到解放区去您帮了很大忙。”

“尽了点微薄的力量，算不了什么。”他面有得意地笑了笑说。

“他老希望以后多和您有些联系。”

“能那样是最好。”他稍停了一下说，“您现在住在哪里？”

我见他问完后直望着我，知道他不放心，便很干脆地说：“住在一位空军处长的家里。”

“那里方便吗？如果不方便的话……”

“特别方便，象住在自己家里一样。”我知道他问这“方便不方便”就是安全不安全的代词，便特别强调了一下。

“那好极了！”他会心地笑笑说，“您能告诉我一下那边的情况吗？”

“您愿意听多少我都可以讲。”

于是我便把解放区繁荣、发展的情况讲给他。我讲了党的土地改革政策、工商业政策，以及在土地改革以后，青年翻身农民踊跃参军的情况。这里我着重讲了人民子弟兵自觉参战的革命性，因此，才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我又联系到最近我军在大公主屯活捉敌新五军军长陈林达的胜利战况。他听完这些战况以后，不动声色地说：“军事上的消息兄弟都听到了，有些情况也都在意料之中。”

“那么您对未来还有什么预料呢？”我忍不住地问了一句。

“未来……”他高深莫测地笑了笑说，“大的方面还没仔细考虑过。”

“大的方面在我们看来也是非常明显的。”我抓住话机，非常肯定地说，“正如我们的权威人士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评论时所指出那样：与全民为敌的蒋介石政府已经处在全民的包围之中。无论是在军事战线上，或者是在政治战线上，它都打了败仗，都被人民的力量所包围，并且想不出逃脱的方法。现在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时候了！我们非常欢迎一切进步的和愿意进步的人士和我们合作，能够给人民做事情的人将来人民一定不会忘记他。”

“这些我都很了解，您在这边有什么困难我愿意帮助。”他稍停了一下又说，“您准备在这里耽搁多久？”

“还没一定，可能过了春节以后回去。如果您在那边有什么

事情或者有信要带的话……”我意味深长地望了望他说，“我完全可以做到。或者我过几天再来一次也可以。”

“好吧，那就麻烦您再来一次吧。”

这次谈话，就这样结束了。从他那里出来，一边走一边想下一步的做法。我想起了高崇民同志的指示：“……对他这样一个人，工作是不好做的，要细致、要耐心、要注意方法。”用这指示来检查我方才的言谈行动，有没有不耐烦的地方？说话有没有太直的地方？方法呢……能不能再找出其他方法……把关系拉得更近一些？一想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他写的那笔颜体字，记得去王昭晟同志家里的时候，曾看见他有一部精致的颜真卿（颜鲁公）传世碑刻，四册分订着，是个不可多得的“蝉翼拓”本，墨色清淡，非常匀净、清楚，没有一点模糊的地方，技巧之高，令人望洋兴叹。拿这样好的“颜体”字贴，去送给写“颜体”字的人，他将象“如获至宝”一样高兴呢。

回到家里，我立刻打电话给王昭晟同志，请他把碑贴送来。



## 春 节 前 后

一九四八年，沈阳市居民过了一个不平常的春节，大年三十的晚上，不听鞭炮响，只闻大炮声。阳历一月末二月初，我军攻克敌军重镇辽阳市，歼敌近万，大军直逼浑河彼岸。敌溃军象潮水一样涌进了沈阳近郊，沈阳城里的敌人一日九惊，大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势。关于我军胜利推进的传言象沉雷闪电一样，一个接着一个传来，有人甚至说我军已经快要攻占北陵了。沈阳城和外地的交通联系在旧历三十和大年初一两天几乎完全断绝了，火车只能从沈阳南站开到北站，就象从炕头走到炕梢一样。这时，在全市最热闹的太原街上，出现一张快板诗，上面写道：“陈主任真不善，跑到东北打内战，带领大兵几十万，围着沈阳团团转，火车只通南站到北站，陈主任急得出冷汗，蒋委员长呀！这可叫我怎么办？……”

是呀，怎么办呢？“三十六策跑为上策”吧。于是一些国民党“劫收”大员的家眷，以及各色各样的反动地主、富商大贾们，都竞相逃往关内。火车不通，地上走不了，便都挤到“天上”去了。飞机票成了他们幻想中的救命符，黑市票价一口数涨，再涨也被人抢购一空。他们自以为坐上飞机，就可以飞到他们的“理想世界”，再过剥削生活。谁知飞机也会开玩笑，却把他们当中的一

些家伙送上了“极乐世界”。有一架“民航”飞机，在浑河机场塞满了这样一些“奇货”之后起飞了，人数本已超过定额，而这些“奇货”又真重得出奇，一个人有两个人的份量，不是因为胖，是因为他们身上都缠着黄金。飞机才飞出不远，便象“打摆子”一样乱颤起来，紧接着便一头扎到地下，象小孩玩的“摔炮”一样响过一声就散花了。飞机一坠地，肇事场地就被军警“保护”起来了，“保护”得真严，局外人连看一眼都看不到。于是一场骇人听闻的事件发生了：一群国民党军警象恶狗一样睁着血红的眼睛，冲进了血肉横飞的场地，在一片嚎叫、求救的哀鸣声中，他们先动手搜刮摔死者的黄金，然后又去搜刮能喘气的、半死不活的，然后再给上几脚，一些挣扎往起爬的被打倒下，会说话的被踹得咧开了嘴。一个叫李寒冰的，是在东北参加国民党较早的女党员，又是“劫收”大员孙心操的老婆，就作了这样的“冤鬼”，四个孩子死了三个，只有当时昏迷过去的一个小崽，算是捡了一条命。这群搜刮者把所有沾满血肉的黄金都揣到兜里，一片哀鸣的场地肃静了。事情象是结束了，但是更热闹的丑剧还在后面：因为分赃不均，引起了狗打架；还有几个生命力特别顽强的家伙，在这场浩劫之后，竟象奇迹一样活过来，出头告了状，于是事情传出来了……一个偶然事件，却本质地暴露了国民党的内部真实。这件事象寓言一样，让人们预感到国民党那最后的下场！

一九四八年的春节，就这样过去了。春节一过，我又给第一公安分局那位局长挂电话，约好去见他。

轻车熟路，进了局长室，仍只有他一个人。他的态度还是那样悠闲，浑河彼岸的炮声、市面上的纷乱局面，似乎都没给他什么影响。

我把颜真卿碑贴拿给他，他象个真正鉴赏家那样一张一张地翻看，一边看一边啧啧称赞，收下的时候谢了又谢。

当收下碑贴,更换话题的时候,他打量着我说:

“听您的口音象是东北人,您是北满人?”

“您判断得真准,我是吉林人。”

“啊,巧极了!”他高兴地说,“兄弟老家在洮南,也是东北人。”

“我们是老乡!”我也高声笑着说。

“老乡见老乡,必定唠家常。”他颇有风趣地说,“您是几时离开吉林的?”

“一九四六年。”

“以前呢?”

“大半也都在吉林。”

“伪满呢?”

“也在过。”

“啊……”他眨了眨眼睛说,“那时候您在吉林做什么?”

从这一连串的“家常”问话里,我知道他是还在继续了解我,还有不放心的地方。第一次见面我只告诉了他住的地方安全,现在我必须进一步交“底”,提高他的胆量,使他没有后顾之忧,于是我就含蓄地笑笑说:

“那时和现在做的是一样事情。”

“和现在?”他稍显惊异地用一个手指向地下一指说,“也做这个……”

“正是。”我点点头,“不过对象不同了。”

“啊!是这样……”他身子往前探了探说,“您一直在东北?”

“中间曾离开过一段,一九四二年从延安又回到吉林,一直到四六年。”

“啊!”他吁了一口气说,“听说日本鬼子统治的很残酷呢!”

“斗争是很尖锐。但是有我们党的领导,有党的政治影响,

就能战胜一切困难。十几年来我们的武装同志在东北一直拿着枪杆子；在城市的同志也一直坚持着斗争，在斗争中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敌人统治的再残酷，也奈何不了我们。”我在语气上特别加重了后面的两句话，他点点头说：“对于共产党的力量，我从过去到现在都很了解；对于您，我现在也完全了解了，能和您在一起谈谈，兄弟感到很高兴。不知您在这里打算住多久？”

“暂时可能不走，如果时间再长一些，也可能找个事情做一做……您是了解的，如果长住，总得有个正当职业才好。”

“您能常在这里最好，希望您能常来，我这里……”他笑了笑说，“倒是我们谈话最好的地方……至于您要做事，那没有问题，兄弟最近可能接手省田赋局的事情，可以想想办法，安排一下。”

“那么就等以后再研究吧。”

正这时，有人在外边敲门。一个炊事员端着盘子走进来。他一定留我吃饺子，我便坐下了。在吃饭中间，我相机引导他谈情况，他也非常巧妙地、不露痕迹地谈了目前敌人的内部情况和活动情形。凡是对我们有用的，我都一一记在心里了。我知道，做这样人的工作，只能采取这种形式，两边心照不宣，颇为微妙。

吃完饭，饺子是什么滋味我也没尝出来，就这样囫圇吞枣地装了一肚子。从他那里告辞出来，一路上默记、整理着他所谈的情况。回到住所，排开其他事情，立刻一个人坐在屋子里，遮好窗帘，全神贯注地把这些新材料记下来，准备交给交通员送走。

## 第二个掩护职业

浑河彼岸的炮声停了，我军在围攻鞍山和法库等地。沈阳的火车有时可以从南站、北站开出去，但最远的地方也只能东通抚顺、西通新民、北通铁岭，方圆不过三、四百里，还时通时停，象得了抽风病一样。

沈阳的局面从表面上看好象缓和了一点，实际上却越来越明显地变成了一座孤立的死城。四周战略要点相继被我攻下，敌人象被套上了一道致命的铁箍，越箍越紧，想不出一丝逃脱的办法。于是便只好紧蹬四蹄，口吐白沫，作垂死前的挣扎。在他们兽蹄尚能踩到的地方，一方面公开地宣布要进行户口大清查，组织起宪兵、警察、特务、联保等四万多反动爪牙，准备分区、分片地进行大搜索；另一方面则在暗地里加强了特务活动，一些不三不四的家伙，随便闯入人家，任意搜查，滥肆逮捕，沈阳城蒙受了更大的灾难。

我自从搬到“钱寓”以后，环境还是比较巩固的。而且和钱国勋接近的目的也完全达到了。他每个礼拜都来两次，取他的私人信件。来了以后我好好招待他，尽量留他多坐一会儿，和他“闲聊”。他既把我当成“自己人”，谈起来就毫无拘束，毫无顾虑。再加上我有意识地引导，于是敌人的内部情况，便不断地从他嘴

里溜出来。我们坐在家里，敌人送上门来，这确是使人高兴的事情。

我们工作上的顺利，敌人搜索的猖狂，几方面都提醒我们必须更加提高警惕。我的环境虽然比较巩固，但也不是毫无破绽可寻，一个“商人”，住在敌人非军即政的住宅区域里，至少是容易引人注意的。当敌人惊魂不定，草木皆兵的时候，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割断每一条可以让敌人琢磨到的可疑线索，哪怕它再细，也不能忽略。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又打电话给那位公安局局长。他让我到家去找他。他住在大南门里旧青年会前边的胡同里。我按照他说的地址很顺利地找到了。

我刚一跨进他的屋门，他便高兴地迎过来，说：“我的事情已经决定了。”

“是到省田赋局去？”

“对。主要是管粮食。现在委任已经下来了，这边事情一完，就过那边去。”

“恭贺您了。”

“也要恭贺您。如果您暂时不走的话，想做事情马上就可以定下来。”

“就请您下委任吧，我决定暂时不走了。”

“兄弟可不敢给您下委任。”他意味深长地摆着手说，“如果您不嫌屈就的话，做个督察怎么样？”

“督察？”

“对，田赋局的督察，主要是查市场粮。”他含蓄地笑笑，“这是个大有可为的事情啊！”

“是个发财的官。”我直截了当地说。

“事在人为。”

“我做事的目的您是清楚的，绑住身子，各处跑腿的事情我不能做。”我郑重地说，“所以请您再考虑一下，有没有光担名不做事的事情……”

“光担名……那也好办。”他稍微想了一下说，“聘您做个专员怎么样？”

“可以不做任何事情吧？”

“完全随自己的便。”

“这样最合适！”

“好，一言为定，聘书随后就到。”

两天后，专员的聘书和证章一齐拿到手，我立刻将这新“职业”报在户口上。这样，我的掩护职业也就适应了环境，把从前的“职业”也保留下来，一官一商，可以随机应变。

敌人的户口大清查是大张旗鼓进行的，先在报纸上发表了日期，到规定时间鸣笛为号，全市统一行动。后来，敌人似乎也感到这种做法是徒劳无效的，它除去能在一般居民中制造一点法西斯恐怖气氛，和乘机进行一些敲诈勒索之外，其他什么目的也不会达到。于是敌人又耍了一个愚蠢的花招，在报上又登了一个延期清查的启事。但这只能使敌人自己得到一点小小的安慰，我们却已经知道这是故弄玄虚。

户口清查按原来规定进行了。半夜三点钟响起汽笛，不一会儿就有人来敲我们的外门。我们早有准备，女同志们都睡在床上不起来，我一个人穿着宽大的睡衣，端着灯（无电）去开门。联保主任带着五、六个武装军警和两个穿着对襟短褂的家伙站在门口。我装作睡眠朦胧的样子问道：“什么事情？”

一个为首的家伙上下打量我一番，忽然堆下笑脸说：“对不起，打扰您了，奉上级的命令，清查户口。”

“进来吧。”我没再多说什么，一转身，先走进客厅。这群家

伙也跟进来了,那个为首的跟在我身后。我放下灯,取出户口簿子,放在桌上说:“这是户口簿子。”

为首的家伙翻了翻户口说:“您是户主钱处长?”

“不,我姓王。和钱处长同居。”

“是王专员?”

“嗯。”

“您家里有没有外人?”

“没有,女人们都在睡觉。”我稍指了指卧室说。

“那么……”他回头和门旁那帮家伙交换了一下眼色说,“打扰您了,我们这是奉上级的命令,您当然了解……”

“对,这是公事。没什么,你们辛苦了。”

这群家伙走了。我关上了门,在门旁又静静地站了一会儿,听见他们又在敲隔壁的门……

我不想再睡了,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便脱下睡衣,换上烧锅炉穿的棉袄,走出屋门,踩着坚硬的冰雪,往锅炉房里运煤去了。



## 从日落到日出

我军冬季攻势的战果正在迅速扩大，法库县于二月十九日宣告解放。同一天，人民军队攻克了鞍山市！这座由日本侵略者掠夺压榨、惨淡经营了几十年，充满了工人阶级血泪的钢铁城市，终于回到人民手中！二月十九日，鞍山的工人阶级用劳动的双手，写下了第一页英雄的诗篇。鞍山的英雄时代从此开始了！

胜利的消息迅速地传到我们耳中，同志们的工作热情更高起来。康祥春同志所在的空军工程队，这时已改为六〇一工程队，直属敌国防部空军总司令部管辖，所有指示、命令、军事机密文件，都由敌总司令部直接下达。工程队的工作范围扩大了，工程任务重了。队长胡某是个酒色之徒，每天进出酒馆、舞场，灌完了黄浆便和女人纠缠，时间不足支配，精力不够消耗，再加上康祥春同志自己的努力争取，于是这位队长便将所有秘件的启封、掌管等事情，都一股脑儿交给了康祥春，敌人的保险柜向我们敞开了铁门。

一天傍晚，康祥春兴匆匆地走进我的住处，见屋内没有外人，劈头便说：

“我把敌人陆、海、空军电报密码本拿出来了。”

“在哪里？”

“在这。”他拿出一个大封筒递给我。

火漆封的封口已经打开，封筒上盖着红鲜鲜的“至急”“绝密”等戳子。里面装着两本印满小字的薄册子，我一边翻着一边问道：

“几时接到的？”

“今天。一接到我就锁在保险柜里了，没让任何人看见，下班后就拿了出来。”

“几时送回去？”

“明天上班前一定要拿回去。敌人马上就要改用这份密码。”

我望着密码本上那密密麻麻的小字，想着：这么多字，怎么才能一字不漏地记下来……康祥春同志也在想着。

“好吧。”我对康祥春同志说，“今天晚上连夜把它抄下来。”

“能抄完吗？”

“只好破破例，多用人抄。”我敲着密码本说，“把白皓、王昭晟、高皓都找来，再加上你我和这里的同志……一共有八个人，突击一宿，无论如何要把它抄完。明天一早，在你拿走密码本的同时，交通员就可以送走抄本。现在交通站近了，当天就可以送到。”

“好，你先准备一下，我马上就去通知白皓、高皓同志。”

“我打电话给王昭晟。大家在太阳落山以后分头到我这里来。”

康祥春同志走了以后，我让报务员和妻子把两盏煤油灯都添满油，把方桌拉在地当中，铺好台布，把麻将牌倒在桌上，放上筹码，摆好椅子……

天渐渐黑下来，同志们陆陆续续来了。拉严窗帘，关紧外门，燃亮油灯，四个女同志，对坐在写字台两边；我们四个男同

志，象打牌一样各占一方围着方桌坐下，牌在桌子当中铺平，筹码放在一旁，灯放在牌上，如若有人闯来，牌声一响，纸张一撤，女同志在旁边一坐，一件庄严的工作，马上就会变成国民党官场中司空见惯的景象了。

我们把两本密码两下分开，本少人多，又不能拆开，便把抄页竖起来，四个人，两边看，每边又分成上下段，于是八个人，八支笔，齐头并进地工作起来。

夜越来越深了，屋子里八个人在工作，却静得象没有人，只能听见笔响，看见手动，偶尔有翻转纸页的声音。每个人都把全副精力贯注在自己的笔上，唯恐抄错一字，抄落一行。这里稍一马虎，将来就可能耽误大事。

屋外面，隔一会传来一阵汽车的马达声，偶尔还能隐约听到爵士乐曲的靡靡之音，这种声音，我们已经听得习惯了。我们对面住着一个新一军姓黄的敌团长，每礼拜至少要举行两次“家庭舞会”，每次门前都停着吉普车，天冷，车怕冻，隔一会发动一次，马达便象发寒热病似地哼哼一阵。他的老婆，妖冶得象个卖淫的娼妓。有一次，到我屋里来借电话，站在屋地当中，把两手一张说：“哎哟！这屋真宽敞，能跳开十对！”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今天，他们又跳舞了。半夜，还不散，如果万一有人来，那边跳舞，这边“打牌”，倒也调和。

工作越紧张，时间过得越快，钟点随着笔声飞快地过去了。我从窗帘的缝隙向外望望，一轮明月已经偏西，皎洁的月光照在白皑皑的雪地上，分外清明。对面黄家门前汽车灭了，汽灯灭了，群鬼走散了，这说明黑夜快要过去了。我们还有一部分没抄完，我回头告诉大家要加快速度，一定要在天亮前抄完。

真是忙中出错，就在我说完不久的时候，写字台那边的女同志忽然低声叫起来，我们猛抬头一看：她们桌上的灯灭了，一盏

煤油灯横躺在密码本上，煤油从灯里面流出来，流在本子上……我们忙奔过去，油灯被扶起来，本子已被煤油沾污了好几页。年轻的报务员脸红到耳朵后边，大张着两只手站在那里，一看就知道这“祸”是她闯的。怎么办？密码本在天亮前必须送回去，现在离天亮不远了，纸这样湿，煤油味这样大，怎能“完璧归赵”呢？正在大家发怔的一刹间，不知是哪个女同志想出了用熨斗烙的办法，这可真是个好主意，亏了有女同志，她们和熨斗的关系到底要近一些。

熨斗里很快地装进了半红的木炭，密码本沾湿的篇页上又铺上了一层薄纸，一张一张地烙下去，湿纸变干了，煤油味飞走了，连一点痕迹也没留下。大家轻松地出了口气，一场微波平下去了。大家又闷头往下写，写呀，写呀，写到三星隐退，东方发白，太阳欲出的时候才大功告成。

大家把抄页集合在一起，也装成两本，珍贵地包起来。原本又回到康祥春同志的皮包里。

两种“版本”的密码同时送走：一个向北，一个向南；一个到了我们的交通站，一个进了敌人的保险柜。它将在同一天的同一时刻里，被同时使用起来。敌人的密码，也将服务于人民了。

## 同志们，再见吧！

三月九日，吉林守敌在我大军压境的情况下，惧怕围歼，仓皇逃窜，我军兵不血刃地解放了吉林市。三月十五日，历时九十天的强大冬季攻势宣告结束了。至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区缩小到不到东北全境的百分之一。沈阳、长春等地在我重兵包围之下，完全成为孤立的死城。

吉林市解放以后，那些顽固到底的反动家伙大部分都挤进了沈阳市。经过了解，其中一部分警察特务分子爬进了敌城防司令部第二科；另一部分则相继跟着当上了特务腿子，其他连“腿”都没有拽着的，便象饥饿的野狗一样，红着眼睛到处找食吃。而这些野狗，几乎都认识我，我的行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正当这时，白皓同志也出了点差子。一天，他穿了一套破旧衣服，出去做下层工作，才出家门不远，忽从斜路窜出一人，一下挡住他的去路，他定睛一看，不由得暗暗吃了一惊：这个人叫胡秉元，是白皓同志早年同学，后来跑到关里，参加了国民党。在国民党“政治大学”里受过特务训练。在重庆时，就是国民党的“高级特务”，和白皓同志有过接触。当他探知白皓同志倾向共产党的时候，就曾经打过主意。后来白皓同志到东北来了，就再也未见到他。不想今天在家门口遇见了！他站在白皓面前，劈头一句：“白皓，想不到在这里遇上了！”

“是呀，真巧。”

“我以为你早上哈尔滨去了。”

“上哈尔滨？”白皓苦笑了一下说，“现在吃饭都成问题了。”

“别瞎扯了，就凭你精明强干的……”他一边说着一边狠狠地打量着白皓。

“精明强干能当饭吃吗？”白皓满腹牢骚地说，“一场大病闹得什么都完了，饭碗子没了，到处找事，到处碰壁，想去拉洋车，又没那把力气；去卖小工，人家一看我这把瘦骨头，不要。”白皓伸了伸胳膊说。

望着白皓瘦骨嶙峋的胳膊，他半信半疑地说：“想不到你真的弄得这样……”

“我自己也想不到，可是又怎么办呢？今天走运，遇上你了，老同学总不能看着挨饿不管吧。”

“这没有问题。”他看了看表说，“这样吧，我今天有约会，明天去找你，好好唠唠，你住在哪里？”他迅速地掏出个小本，拔出钢笔来望着白皓。

“我住在小店里……”白皓故作脸红的笑了笑，低下头拍了一下又脏又旧的棉袄说，“那里太脏、太乱，谈话也不方便。如果你不嫌的话我去找你吧。”

“哪里的话。你去吧，我非常欢迎。”他在小本上飞快地写了一行字，哧一声撕下来，向白皓面前一递说，“明天早晨，你到这来找我。”

“好，我一定去。”白皓接下小纸片和他分了手。

白皓同志转了几条街道，当确信没有人跟踪的时候，便转到我的住处，讲了上面情况。

敌人已经被甩掉了，从表面看来事情是简单的。但对方是个“高级特务”，相遇地点又正在白皓同志住处附近，如果见白皓

同志不去找他,疑心四起,在那一带布下爪牙,事情就复杂了。但一时之间又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能让白皓同志提高警惕,多加小心。凭着白皓同志的机智,或可不出问题。

这时,沈阳的市面已经混乱到极点:米珠薪桂,物资奇缺,小贩从抚顺背进的煤,一吨要半两黄金;米盐吃食更非黄金不换,国民党的纸币几乎完全失去了交换价值。曾见一个女人,坐在洋车上,丝袜上落上一个泥点,就从钱包里拿出一大张钞票,往丝袜上轻轻一抹,远远抛在地下,纸币只能起手纸的作用。随着市面的混乱,国民党东北政局也更加混乱。败仗加深了内部矛盾,被打得焦头烂额的将军和“光杆司令”们都变成了疯狗;失去地盘的政客也成了红眼的丧家犬。这时,那个狂妄匹夫陈诚被打得吓破了胆,使人在蒋介石面前活动,象金蝉脱壳一样,只留下了一个行辕主任的空名,溜进了关内。只在半年以前,陈诚还说“要在东北住五年”,“只需六个月即可恢复东北的优势”。如今,整整是六个月,时间打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他夹起尾巴溜走了。代他来挨打的是又一个国民党“远征名将”卫立煌。这位倒霉的卫立煌,在群犬狂吠的局面下登上了摇摇欲坠的“剿总”宝座。在绝望的叹息中,强自挣扎着调运军队,象蜘蛛修补破网一样,企图在风雨飘摇的境况中能够苟延残喘,多支撑几时。

由于处境的复杂化,我们的工作也困难起来。但是在胜利形势的鼓舞下,同志们的工作劲头非常高。困难长一尺,工作精神增一丈,越困难工作劲头越足,困难从来也挡不住共产党人前进的道路。随着敌人军事上的调动,我们加紧进行工作。我们用更加隐蔽的方法,从敌第六补给区里拿出了敌人官佐名册和敌军在东北新的详细军事部署情况表。从敌作战指挥室以及敌军运指挥所等地汇集起来的材料,使我们知道了敌军还有多少战斗部队,主力运到哪里等等。

但是无时无刻不在关心我们的党，从吉林解放后，已经估计到我处境的困难。党通过交通员张健同志传来了调我回哈尔滨的指示。指示中要求我把在沈阳工作同志的情况全面了解一下，有不安全或者没必要再留下的同志就一同回哈尔滨，把组织重新加以整顿，缩小机构，化整为零。

党的指示，必须立即执行。经过研究，决定白皓、高皑、张健、纪群同志第一批先走。我留下，整顿组织，然后和康祥春同志、两位报务员及妻子同时回哈尔滨。

我们把留下的同志和工作关系划分为两个小组，一组由王昭晟同志负责，另一组由刘兴仁同志负责。刘兴仁是从上海来的，有地下工作经验。两个小组各自独立，两个组长也互不相识，组内也完全是单线领导。王昭晟同志搬到我的住处。我告诉钱国勋说全家到南边去，他深信不疑，要送我走，我婉言谢绝了。

我们在临走前，又突击了两部分材料，第一部分由高皑同志带走，第二部分由我带走。

五月四日，由我在田赋局开好护照，和康祥春同志领着“全家”，登上火车，离开了这座混乱的孤城。沈阳城在国民党的铁蹄下蒙受了重大的灾难！为了使这座城市获得永远的新生，我们留下的同志正在这艰苦的环境里继续战斗着。同志们，再见吧！我深信，只要不久，解放的红旗就一定会飘扬在沈阳的上空。那时，我一定争取首先进入沈阳城，和你们并肩站在红旗下欢庆胜利！

火车飞快地前进，我的思路也飞快地扩展开来：青年时代的苦难生活，伪满的斗争，古老的吉林，美丽的哈尔滨，混乱的沈阳城……一座座城市，一件件往事，此起彼伏地兜上心头。值得回忆的事情这样多，这样纷乱，但是，有哪一件能离开党对我的培养和教育呢！如今，身在途中，我的心却早已飞向哈尔滨了。



## 后 记

这部革命回忆录，早在十七年前——一九六三年的冬天就整理完了。当时李维民同志还健在，他盼望这本书能在出版前听到熟悉这方面情况的同志们的意见，再经过修改，早日和读者见面。为此，春风文艺出版社排出了征求意见本。但是，就在这吋，文艺战线上的斗争越来越尖锐、复杂，文艺界跌到修正主义边缘的说法已经传遍各地，李建彤同志写的革命小说《刘志丹》被打成反党的大毒草，一大批领导干部由此受到株连。文艺界内揪毒草、挖黑戏的逆风也已越过山海关刮到了东北，刮到了辽宁。在这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情况下，《地下烽火》一书，也就没有出版的可能了！

书未出版，罪却定了，白纸黑字，在劫难逃。文化大革命风暴一刮，革命的回忆录就变成了反革命的黑标本。为革命写书的李维民同志，被诬为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的大叛徒；整理者也成了为大叛徒树碑立传的反动文人。那时候我以为这部书稿真的要背着反革命大毒草的黑锅，象石沉大海那样，埋葬于泥沙巨浪之中，永世不得露面了。

感谢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从此乾坤扭转，被颠倒的历史又颠倒过来。那些祸国殃民的坏蛋被沉入了海底，而被

他们沉入海底的革命同志，却从那被诬陷的深渊里升腾起来。春风扫尽他们身上的污垢，阳光照还他们本来的面目，重放的鲜花吐出了郁积多年的芳香，革命回忆录《地下烽火》终于和读者见面了！李维民同志的多年宿愿也终于实现！但令人万分遗憾的是，维民同志在五年前已经含恨离开了人世！

李维民同志从一九三〇年入党那一天起，就在东北坚持地下斗争。除中间有一个时期回到革命圣地延安，并在刘少奇同志身边工作了一段之外，其余时间则完全转战于吉林、哈尔滨、沈阳以及汤原等地，迎接了东北全境解放。在十多年的地下斗争中，他置个人生死于度外，抛妻弃子，背井离乡，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党分配干什么就干什么，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更不计较职位高低。从领导岗位变化到做具体工作，他都是同样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他从来没因为职务变动而讲过半句价钱，发过一句牢骚，放松过一分钟的战斗。在他的脑子里，根本不存在工作有高低之别，上下之分。我想只有把自己的一切，完全贡献给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共产党员，才能表现得这样无私、纯真和高尚吧！正因如此，他才能在那样残酷的白色恐怖环境中，表现得坚定不移，临危不惧；在异常困难的境地中，从未动摇、退缩过。他有好几次和党失去了联系，却都能越过千难万险，重新回到党的怀抱。在他的经历中，只有失去党的领导和不能为党工作才是最痛苦的。

维民同志的生动革命经历，解放初期就在鞍山群众中流传着，越传越广，逐渐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口头文学。这中间有人几次提出请他编写成书，发表出来，以飨读者，但都被他拒绝了。直至一九五九年，全国掀起了大写革命回忆录的热潮，维民同志才在领导动员和群众要求下，开始讲述。

从维民同志讲述，到整理成稿，共用了四年时间。最初

阶段，是由刘大今、鲁洪艺、崔甲玉三位同志执笔的。后三年多，是由我统一整理的。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我完全沉浸在庄严的革命斗争气氛中，处处受到革命的传统教育和熏陶，这是我一生中得到革命教益最多的一段时间。

在维民同志讲述和我执笔整理过程中，使我感受最深的是维民同志那种谦虚谨慎，爱憎分明，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革命者的无私精神。他在讲述的时候，总是把他所能记得起来的战友都讲到、讲透，很怕遗漏下一个人一件事。有时我在整理当中，感到头绪太繁，枝杈太多，就适当地减去一些时，他看后总是摇着头不以为然，提出让我再写上去。有一次他干脆批评我：不能因为行文上的方便，就删掉了不应删掉的内容，这种“以词害义”的作法，是文人的通病。他这深刻的见解，一直记在我的心中，使我得益不浅。与此相反，遇到写他个人的时候，他却常说，描写多了，渲染过了，这时，我不得不为这个和他争执。我总认为在保持事物本来面目的情况下，多描写几笔，加一点渲染，把气氛写得紧张些，是应该被允许的，因为这是用文学样式写的革命回忆录啊。而他则要求越朴实越好，用他的话说，就是“少加花花点”。每当他自己动手把那“花花点”给勾掉时，我真有些尝到所谓“割爱”是什么滋味了。但出于我对维民同志的敬爱，凡是 he 亲自动笔勾掉的地方，我都不再更改。今天看来，他那越朴实越好，反对雕饰的文学主张，还是很有见地的，可惜我当时太幼稚，没有很好地理解。

我最后一次见到维民同志是一九七四年的春节。那时他还没有被宣告“解放”，所以虽值春节，也有门前冷落车马稀之感。我到他家的时候，门关得严严的，敲了半天，才从里面拉开一道缝。他拄着一根粗大的木棍，身子佝偻着，探着脑袋

打量我（他的眼睛已经不大好使了）。当他看清是我以后，便大打开门，困难地往前挪了两步。我一见老人那疾病缠身的样子，心一酸，眼泪不由得夺眶而出。我扶着他进了屋，刚一坐下，他就滔滔不绝地说起来。维民同志从来都是以待人热诚直率而被同志们爱戴的。这时他身体虽然不好，谈锋却依然犀利。他从中央一直议论到地方，忧国忧民，满腔义愤。他虽然和外界接触不多，却知道好多事情，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党和国家的命运哪！

后来，我离开鞍山，住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去了。这中间，我听说他已被“解放”，被送到北京治病。我听后心里非常高兴，盼他能一扫愁颜，拿出当年的战斗精神，战胜自身的疾病，等我再回到鞍山去敲他家门的时候，能看到他健壮地站在门前……这时我怎么知道，他受“四人帮”的长期折磨，已经积愤成疾，病入膏肓了。就在这以后不久的一天，维民同志的一位老同学、长影的老导演张辛实同志忽然跑来告诉我说，他从《辽宁日报》上看到一条消息：维民同志在京病故了！我脑袋轰的一声，前面我叙述过的，他为我开门那最后一面的情景，一下又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心又一酸，泪水模糊了双眼！

今天，我怀着对维民同志的深切悼念和对老一代革命者的敬爱感情，借本书正式出版的机会，又作了一些文字加工和个别处的修改。因为维民同志不在了，为保持他的原意，我对本书不可能做大的增补和删节，希望读者见谅。

陈 琦

一九八〇年四月十日于鞍山